
伪满洲国的
统治与内幕
——伪满官员供述
中央档案馆 编
证人



ISBN 7-101-01888-2
9 787101 018882 >
定价：56.00 元

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

——伪满官员供述

中央档案馆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
ISBN 7-101-01888-2

Ⅰ.伪… Ⅱ.中… Ⅲ.满洲国(1932)-史料 Ⅳ.K26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8)第15372号

责任编辑:侯 明

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

——伪满官员供述

中央档案馆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5¾印张·567千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56.00元

ISBN 7-101-01888-2/K·866

前　言

本书选录了伪满洲国皇帝、大臣、少将以上官员共40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的交代材料。交代材料中,有些数字和情节互有出入,但都是他们在任伪职时所做所经之事,基本上反映了伪满洲国从成立到覆灭的概况,对研究这个傀儡政权的历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综合起来,这些材料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它妄图占领中国、称霸世界野心的重要一环,事后的历史进程更证实了这一点。

2."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很快就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为巩固其对占领地区的统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拉出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儿皇帝,并搜罗一帮汉奸,拼凑了一个傀儡政权。傀儡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权力都操纵在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关东军手里,如:伪满政府机构的编制以及官员的提名、任用、考核、升迁都要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认可;大小机关都安插了日人做副职,实权却掌握在这些副职手中;各项方针政策都由日人提出,伪皇帝从形式上裁定,各级官员去执行;伪满军警的编成、训练、作战都由日人提出和指挥,实际上是伪军中的日人顾问指挥一切。在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十四年的统治中,日军不仅大肆对我国东北地区抗日军队进行"讨伐"、"围剿",使抗日军民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在东北地区从上到下建立了严密的控制网,残酷迫害各阶层人民,大肆掠夺东北的物力人力资源;在全

东北大修军事工程,使东北成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并且大量移民东北,极力推行日化教育和鸦片毒害政策,妄图灭我种族。十四年的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3.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实现自己复辟的美梦,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甘心充当儿皇帝。还有一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投降日本侵略者,作了伪满洲国的军政大臣。他们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帮凶,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各项政策,甘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奴仆,更充分反映出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和殖民地性。

4.本书所辑资料反映了伪满军警的来源、编成、训练和作战等情况。这些军队及他们的指挥官,在日本侵略者指挥下,对抗日军队进行大"讨伐",协助日本侵略者实现了对东北的军事统治。

5.东北抗日联军、原东北军的一部分将士以及东北广大人民,在日伪军联合"清剿"、"讨伐"等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长期斗争,付出了重大牺牲,严厉打击了敌人。他们是中国人民应该永远牢记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爱国精神应该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

对于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效忠敌人,残害人民的罪犯,依法给予严惩是他们咎由自取。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战犯仍然实行了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并给予他们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经过长期耐心细致艰苦的教育改造,使他们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自己的罪行,改恶从善,重新做人。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陆续特赦。战犯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安排了工作,有病的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后来溥仪等不少人成了政协文史专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后半生为人民

做些有益的工作。把一批战犯特别是把一个傀儡皇帝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切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宽广的胸怀,才有能力有信心进行这样一次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践。

自日本宣布投降至今五十余年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千方百计歪曲历史,企图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但遭受巨大苦难的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

为了保持本书所收资料的完整性,除少量内容重复,或认识性表态性的段落予以删节外,均保持材料的原貌。有的供述者文笔较差,笔供中文句不通的情况亦有存在,我们为保持其原貌,亦未予修改。

本书以供述者为单位顺序排列,不分问题,其笔供在二件以上者,则按供述时间顺序排列。

有些笔供提到许多抗日组织、人物和案件,以及其他事件与人物,编者未作考察或说明,均按原文编入,以保持材料的完整性,请读者加以鉴别。

为便于阅读,编者加了些简略的脚注。编者订正资料上的错字,采取在错字(词)后加正字(词),正字(词)上加〔　〕;填补的漏字上加〈　〉;衍字上[　];缺字用□□□表示;删略处注明〔中略〕、〔下略〕。

目　　录

附　录:

爱新觉罗·溥仪笔供

(1954年6月1日)

姓名:爱新觉罗·溥仪。年龄:四十九岁。出身:伪满皇帝。籍贯:北京。文化程度:由六岁到十七岁家庭读书。

家庭状况:生父:载沣。母:已故。妻:郭博罗·婉容(已故),次妻:文绣(离婚),谭玉龄(已故),李玉琴。

自三岁过继满清同治帝,兼祧光绪帝。

详细履历:

一九〇六年生。

一九〇八年作满清皇帝。

一九一二年退位。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活动失败。

一九二四年出故宫,随后到日本公使馆。

一九二五年到天津居住。

一九三一年应日寇土肥原贤二要求到了旅顺。

一九三二年当伪满执政。

一九三四年当伪满皇帝。

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去日本,为向日寇裕仁表示感谢日本对伪满帝制实施和伪满建国的帮助,以及派他的兄弟雍仁到伪满对伪满帝制实行庆祝的答礼。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去日本见裕仁,接“天照大神”。

一九四五年日寇降服，我在沈阳被苏军逮捕。

一九四六年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当日本战犯的证言人。

一九五〇年回到祖国。

罪恶事实提纲：

第一阶段，在北京时的罪行：投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公使馆和被日寇秘密送到天津。

第二阶段，在天津时的滔天罪行：(1)我给南次郎写信，希望帮助恢复满清帝制的叛变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2)我对高田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以及后桑岛总领事的民族挑拨离间阴谋表示同意，且表示中国实行帝制好；(3)接济刘凤池作满清复辟活动；(4)接济白匪谢米诺夫作满清复辟活动；(5)命费毓楷作满清复辟运动；(6)答应土肥原贤二要求走上背叛祖国反人民的道路，上了东北的汤岗子和旅顺；(7)执行日寇板垣征四郎的话给马占山写信，瓦解抗日，把别人也拉到汉奸的泥坑；(8)在旅顺我受板垣威胁，答应了板垣征四郎的要求，承认了日本人同样当伪满官吏和日、鲜也是五族中的成员，答应当伪执政。

第三阶段，在东北的滔天罪行：(1)当了伪满执政；(2)承认日寇本庄繁要求的密约，断送了人民利益，把日寇占据东北成为合法化；(3)国际调查团来东北，我作了掩盖日寇侵略的欺骗宣传；(4)签定日满议定书，日军驻东北合法化，把和本庄繁签的密约公开法律化；(5)命工藤忠(即工藤铁三郎)上日本刺探伪满国体；(6)伪帝制实行，日寇用伪满皇帝的名义来独裁统治东北人民；(7)伪协和会；(8)第一次上日本回来颁布伪“访日回銮训民诏书”，用“一心一德”的话，大大加强日寇对东北的殖民地化统治；(9)张景惠、植田谦吉“拓殖议定书”的签订，使日寇大量移民到东北，这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策，使东北逐渐成为日本的领土；(10)承认日寇梅

津美治郎的要求，接“天照大神”来东北，并颁布伪国本奠定诏书，建立伪神庙，执行日寇宗教侵略和灭绝中华民族血统，麻痹人民的恶毒政策；(11)听吉冈安直的话，对于日寇种种的支援一束；(12)承认植田谦吉的要求，伪满加入所谓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13)签定所谓“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14)支持日寇太平洋战争，发布“伪时局诏书”，奴役、压榨东北人民，尽所有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15)执行梅津美治郎、吉冈安直的话，叫日本为“亲邦”，写所谓“亲书”，无耻向日寇战犯裕仁表示所谓“谢恩”；(16)特派张景惠上日本送大米三十万吨，盐七千万斤，并向裕仁慰问；(17)十四年的一切伪诏书、敕令、法令，一切都由我签字裁可，才发生效力，这一切帮助日寇，危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我必须负全责任；(18)对我的用的人虐待，我打死孙博元的罪行；(19)对于我的妻子压迫的罪行。

罪恶事实：

(1)我的罪恶思想根源(第一个阶段——在北京)

我自幼生长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受封建思想教育的毒素，娇生惯养，身无一技之长，只是妄自尊大，坐食享受。存在着极深刻的身份等级观念，轻视劳动人民，根本不懂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家庭读书，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孟学说和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歪曲历史，竟把“忠”字看成是对封建制剥削阶级的帝王的尽忠，竟把“祖国”看成是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的“祖国”。这一切都是从个人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的。因此，我所做的所想的都是开倒车、反人民的、行不通的，处处触壁的。更加上崇拜帝国主义，受它的欺骗的奴化思想教育，并且竟妄想恢复满清的罪恶统治迷梦。竟认敌为友，要利用帝国主义，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万恶工具，成为祖国的叛徒。伪满十四年由我当

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给予东北同胞带来无限的悲辛凄惨的大灾难,并且大大帮助了敌人侵略力量,给予全祖国同胞带来了历史空前的大灾难。我的罪恶实在太大。所有这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我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所造成的。

(2)我怎样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窟,到了日本公使馆和到天津的经过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后经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接我到日本公使馆。从此便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罗网。

我在日本使馆住了些日子,后来罗振玉和日本参赞矢部又劝我上天津日本租界,我也愿意,后经日本公使芳泽派日本警察数人乘夜车秘密送我到天津日本租界内(罗振玉同行)。

(3)我在天津的时候的罪恶活动(第二阶段——在天津和旅顺)

在天津不久,罗振玉和日本参赞矢部来劝我上日本留学,我不愿意去,陈宝琛、朱益藩和我的家里人载泽也反对这事,不愿我离开家乡。

我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借保护为名,经常住在我的院内,我出门时,日本警官总要跟着,并且他还要把我的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我在天津的一切环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还是封建分子、崇拜和亲日分子在我的周围,我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的溶合,当时竟以为中国的所以有内战,就是因为没有帝制。更羡慕日本帝国主义,以为它的富强,是由于明治维新。一脑袋瓜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思想。

郑孝胥更建议让我给日本南次郎陆相写信,希望他帮助恢复帝制,并中日的共同防止赤化。郑孝胥常常作反共言词,他竟说共产共妻,没有礼教(指封建孔孟礼教),是赤色恐怖者这些名词。我当时根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连三民主义都不知道是什么,旁人说什么,我信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过皇帝瘾,怎么会知道。这就是我的根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思想根源所造成的。我自生下来,就是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受封建的思想教育。我长大了以后,在我的思想中,以为祖国是一家一姓帝王的祖国,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正统。辛亥革命让政时,我岁数还小,那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郑孝胥是一贯主张君主〈制〉的,所以我信他,以为他是对我的所谓忠臣。他的建议就是要恢复帝制,自己没有实力,必须得外国的支助。日本是强国,是和我们最近的国家,它是君主国,一定同情君主制度。在日本最有势力的是军人,南次郎正是陆军大臣,他如果支援帝制,是最有力量的。同时,日本人远山猛雄(家庭日语先生,

教我妹妹和弟弟日语的)也极力赞成。我同意了郑孝胥的建议,由他起稿,经我写的信竟交远山猛雄给南次郎送去了。[①] 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和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我在天津时,日本总领事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时常请我吃饭。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和日本领事馆、司令部往来很密。天津日本司令官高田丰树曾对我表示过,大意是:过去清朝时代,满洲民族是如何兴盛,到了现在满洲民族受汉族压迫、歧视,名为五族共和,却是汉族专政,而且汉族经常内乱,这不如清朝时候好了。我当时深深同意日寇的话,而正是中了帝国主义对我民族挑拨离间的毒计。后来日本桑岛主计总领事谈过也和高田丰树所说的相同的话,我也对他说同意,我表示只有中国实行帝制,才能统一富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土肥原贤二对我要求上东北,我完全是盲目的轻信他的话,并且没有任何条件的。我在天津所做所为,都是盲目轻信,因为我只是一心专想作恢复满清的迷梦。同时郑孝胥、罗振玉也都是经常以恢复满清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事业。罗振玉经常对我说清朝的列祖列宗的所谓"深仁厚泽",凡是有天良的中国人,没有不念旧,回想本朝的。并常常称赞日本有了所谓明治大帝,日本才有那样富强。郑孝胥常常以中国古代"伊尹"和"臣縻"自居,表示他是复辟人物。二十世纪的今天,竟说这些鬼话。

我在一九二五年到了天津不久的时候,有东北旧军阀许兰洲曾见过我,由他介绍有叫刘凤池的,说他在他部下做过事。他盛夸他的材干。说是"当今的诸葛亮"。给我介绍和我认识后,他就常

---

① 这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之后。——编者注。

和我要钱当路费，为的是出去做政治活动(路费少则一二百，多则三四百)，他说能游说东北各将领，让他们倾向于清朝的复辟。我信他的话，给他路费。他更要我拿出古董、表等物，由他拿去随便送人，为我连络。由他介绍了胡毓坤、马占山、毕浣章和我见过面。胡、马只是和我见一见，没有谈什么重要事。只是毕浣章谈过愿为我出力，在各方面连络、策划满清的复辟。我都信了。毕浣章也和我要钱，我每月收入简直是不够给他们的钱，他们是一个月内就不知要多少次。当时我醉心复辟，对于他们的话或是来信是有求必应，甚至抵押东西也给他们钱。刘凤池又让我拿出表给张学良的私用日人顾问黄慕(原姓荒木)大尉连络他。黄慕后随张学良入关时，在天津曾见我道谢。刘凤池也还是继续和我要钱要东西，久而久之，竟如大海捞针，只是让我花钱，他是一点成效也没有。起初我对此事没有告诉陈宝琛，因为刘凤池告诉我别跟旁人说(郑孝胥知道这事，很赞成的)。我被他逼得没有办法，拿不出钱来，我才和陈宝琛说了。陈说这是大骗子手，为什么理这样人呢？于是我不给他钱了。他来信很生气，我也不理他。过了一二年，听说刘凤池在黑龙江为吴俊升枪决。这罪虽然没有成，可是这都是我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反人民的罪恶。

还有一件罪行，是郑孝胥的介绍给我见了俄国白匪谢米诺夫。郑孝胥盛赞他有潜在力量。说他正苦于没有钱花，他要和我要钱，应当借他钱帮助招军买马，替清朝出力，帮助复辟。我听了又信以为真。郑孝胥说借他六万，我没有现款，郑孝胥把我的银行定期存款想法子给拿出来了，给谢米诺夫六万元，并由郑介绍刘凤池和毕浣章和谢米诺夫见了面，来计划满清复辟。上述的刘凤池、毕浣章由于陈宝琛的揭破他们的骗局，后来谢米诺夫也是一去不复返，任何帮助复辟音讯没有，这件事就无形作为罢论。这同样是我的反

人民的大罪恶，我必须负责。

第三个事情，又有一个名费毓楷的见我。也是自称能为我奔走出力，在外连络复辟，我也信了。过了些日子，他说曾和日本河本大作连络，河本大作允许帮助复辟。[①] 费并向我要钱作各方面的联络。陈宝琛听说了这事，告诉我河本大作是日本炸死张作霖的凶手，这人阴险，万不可和他连络，而且费毓楷是居心不良，是欺骗的。从此，我不再和费毓楷见面。我的岳父荣源说有一天费见他，气愤地说他要向蒋介石政府控告我阴谋复辟。荣源对他说，你给溥仪写的自己要担任为满清复辟效力的信，还在溥仪的手中呢！费毓楷因此没有敢控告。

（4）我在天津和到东北的经过

日寇占据东北，在东北树立了汉奸地方维持会，天津日寇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找我上日军司令部见面，他劝我上东北准备主

① 据河本大作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自供材料，溥仪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曾由其翻译墨田七郎通过荒木五郎（张学良的模范团长）介绍与河本大作连络，表示希望河本大作“来天津访问”。为此，河本大作首先在东京得到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同意，而后到旅顺与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会议，结果取得以下两点结论：一是认为“将来可以利用溥仪解决满洲问题”。其理由有三：“一，依溥仪的性格看，在政治态度上不会有变化；二，以溥仪的满清皇帝的历史，对外宣传上比较方便；三，满蒙地区一般百姓对溥仪是欢迎拥护的。”二是认为“暂不给溥仪‘皇帝’地位，而先给‘执政’的职任为好”。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溥仪当“皇帝”，必设庞大宫庭，经费负担太大；溥仪当“皇帝”，谒见上太麻烦。由此可知，溥仪当伪满执政关东军早于此时就定下来了。尔后河本大作即以平民旅行者身份由大连赴天津，在天津英租界溥仪的一个亲戚家与溥仪见面的，参加者除河本大作外，还有墨田七郎（翻译）、朱某（溥仪的财政管理人）。在会见中，溥仪说“把张学良像张作霖一样的打倒了，把东北的当权者都打倒了”，“才有利于他〔指溥仪〕去东北”。河本大作问溥仪：“将来日本解决满洲问题时，你有否去满洲的志向？”溥仪答：“我经常希望去东北，所以才派人到日本连络的。”河本大作还说：“关于溥仪去满洲，是溥仪自己与日本军方活动的；第一次与溥仪的交涉则是河本大作进行的。”但溥仪未交代他与河本大作会见的情况，故特将河本大作的供述节录于上。——编者注。

持政权。罗振玉和一日本人也早在这里,经罗介绍,才知道是上角利一(日寇板垣征四郎的代表),罗振玉交我吉林熙洽给我的信,要求我上东北主持一切。罗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我对香椎说回去考虑考虑。我回来向陈宝琛、胡嗣瑗(我的秘书)商量,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对我是极不妥,陈宝琛以为罗振玉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这是决不可能的。他认为这里面有诈,他认为我去时容易,回来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没有答应香椎的要求。香椎又找我第二次去,还是要求上东北,我拒绝了他。

随这前后,在我旁边发生了一些恐怖事情。一次有人拿赵欣伯名片(当时,赵欣伯我并不认识)给我两筐果品,打开以后,发现炸弹两枚。当时我害怕极了,告诉日本警察,由日本警察和来的日本军官拿走炸弹,不一会儿他们回来说,经检查是中国制造的。又一次,还有一个饭店(英租界,我常去的饭店)侍者来电话,告诉我别再来这饭店。他说有人称张学良派的人在饭店各处找你,问溥仪在那里,他看见这人衣服露出手枪和刀子。还有许多匿名威胁信(内容记不得了),当时我感到深刻不安。可是这些事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故意做的烟幕。

后来土肥原贤二日本大特务头子来见我,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本庄繁的部下特务头子,是日本军部的权威者,他既然一口表示日本没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这是没有错的。我想这是恢复满清的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又经郑孝胥、郑垂的极力赞成,竟认为我答应土肥原是完全正确的。日寇土肥原见我及对我的利用是有步骤有计划的。这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当日本战犯的证人时,我曾听国民党反动政权副检查官长裘劭恒对

别人说过，当我在天津承认了土肥原的要求后，土肥原立即打密报给日本军部什么人告诉我的承认。这说明他是按计划来实行的。而我又是一心想恢复满清罪恶迷梦，一向想利用日本帮助恢复满清，所以土肥原一说，正和〔合〕我意。这就和蛾的喜火自焚一样，断送了东北，危害了祖国以及亚洲，把自己变为历史上万代唾骂狗彘不食的大汉奸、罪人。所以我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的思想以及卖国利敌的滔天罪行是分不开的。

尔后香椎日寇司令派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大尉真方勋接我到了天津白河，登船后他们就回去了。郑孝胥、郑垂早在船上等候，并有日人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大谷以及日本军二十多人同行到了大沽口。换了日本商船“淡路丸”，日本兵回去了。我由大沽到营口，日寇板垣征四郎派甘粕正彦迎我到了汤岗子(罗振玉也在营口接我)温泉旅馆，过了一星期左右，日寇又让我上了旅顺。[1]

初到旅顺，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说，板垣让问谁认识马占山，我说我认识(在天津见过一面)，上角即告我写信劝他放下抗日，投入满洲新政权，并说明新政权是完全自主的。丧心病狂的我答应了他的要求(郑孝胥起稿)，写信交上角转交板垣。我就这样执行日寇的话，来动摇、来瓦解马占山的爱国抗日，自己当了汉奸还拖别人入汉奸泥坑，拉别人也当汉奸，真太不是人。

过了些日子，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参谋到旅顺来见我，正式的要求我上满洲当执政。并告诉我这个国家名满洲国，给我看新国旗样子；并告诉首都是长春；他说，满洲国不是

---

① 据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厅警务局高等警务课报告：《从溥仪逃离天津直至就任满洲国执政的经过》记载，土肥原贤二于1931年11月初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变”，溥仪于11月10日离开天津，13日在营口登陆，住于汤岗子，又于18日由汤岗子出发，19日到达旅顺。

清朝复辟，是五族的新满洲国（汉满蒙日鲜），因此，日本人同样当满洲国官吏。我当时以为这是与我一切作主的话完全不合，日本人怎么能当满洲官吏，怎么能算五族之一，我表示不能接受，拒绝了板垣的要求。板垣忿忿的走了。到了第二天，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万绳栻都被板垣叫去，他们回来由郑孝胥说：板垣参谋在旅顺大和旅馆找他们去命转通知我，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他认为就是日本的敌人，那么他将采取自由措施与行动对我。就这么一句话，已吓着我了。郑孝胥更说，如果我不答应板垣的要求，他也就只好告辞回家了。郑垂接着说，不如将计就计，答应了他，我们有了政权，有了自己的力量，再对付他不晚，不然徒死无益。鼠目寸光、怕死贪生的我就完全承认了板垣的要求。于是，这就走上了名符其实的该死的汉奸道路。①

过了不久，日寇一手制造的伪民意代表汉奸冯涵清、赵仲仁、张燕卿、谢介石、凌升等到旅顺，对我请愿要求当满洲国执政。②在汤岗子张景惠冒充代表东北三千万人民民意，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和伪奉天市长赵欣伯来对我表示欢迎和拥护我当伪执政。

罗振玉在旅顺住，经常以恢复满清罪恶迷梦的活动自居。如"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就由旅顺到了吉林和汉奸熙洽见面，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合，都是企图恢复满清的罪恶统治的。罗振玉以后便拿着熙洽给我的信来到天津，在日军司令部交给我的（这是罗振玉在旅顺告诉我的，由日寇的斡旋，才达成他们的勾结，这是肯

① 据上述关东厅警务局高等警务课的报告记载，伪民意代表共派有两次；第一次在1932年2月29日至3月1日，第二次在3月3日至4日。

② 张景惠等到汤岗子迎接溥仪是在1932年3月7日。3月8日溥仪由汤岗子出发，9日到长春就任伪执政。

定的)。

(5)我到东北后情形,到长春就任伪执政(第三个阶段——在东北)

我到长春,首先郑孝胥告诉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让他当伪国务总理,经我承认,由伪执政名义派郑孝胥当伪国务总理。随后郑孝胥开出伪内阁名单,一一经我签字任命。

接着郑孝胥说本庄繁通知他告诉我必须订一密约,包括东北的矿山、航运、港湾、陆运(铁道管理)并经济同盟、移民、军事顾问特权,都委托日本经营管理,说这是日本既定方针,不能更动的。就在日寇通告下,经我签字。我就这样出卖了民族利益,使日本占据东北一切人民权利为合法化,这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一九三一年,本庄繁所制造的伪协和会成立。主持是本庄繁,主持和策划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参谋),驹井德三(伪总务长官)。协和会说是和伪政权表里如一体,民族协和,宣德达情。实际上它一切是为日寇服务,催迫人民为日寇出荷,强迫人民为日寇充当劳役、献金等等,更宣传殖民地化奴化的建国精神,宣传伪神道等。后来我更听说,它还为日寇作特务,刺探抗日爱国人民的工作。该会成立时,日寇本庄繁当名誉总裁,让我也当名誉总裁。郑孝胥当会长,后为张景惠当会长。于静远、井上忠也、桥本虎之助、三宅光治等先后当本部长。令伪满文官全当会员。每年开的伪中央联合协议会,照例我出席一次,宣读所谓敕语,充当欺人的幌子,然后回去。这个会的实质就是推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作欺骗榨取和奴役人民的工具。

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先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等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本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

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一九三二年的所谓“日满议定书”，是日本武藤信义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和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的，这是当天郑孝胥拿来给我看，说是武藤大使通知要签订的议定书，经我承认并签名郑孝胥的全权委任状。不一会儿，武藤来了，即时举行郑孝胥、武藤的签订。这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制造，再通过汉奸政权的签字，使日寇驻兵东北的合法化，即所谓“日满共同防御”，这就是对外作战，伪满军由关东军司令官指挥。议定书后果，东北成为日寇的军事基地，伪满军成为日寇的帮凶，成为日寇的一翼。因之，帮助日寇打击抗日联军，屠杀爱国人民；伪军到华北，帮助日寇侵略祖国。尤其是日本有了东北的军事基地，大大帮助日寇侵略力量，它的罪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议定书还有一个副件，就是把一九三二年本庄繁告郑孝胥和我订的那出卖民族一切利益的密约加以正式法律化。

一九三七年日寇植田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根据我和本庄繁所订的密约，内有“移民”政策，于是他要求和伪满订立一个“拓殖协定”，经我认可，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日本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签订了这个“拓殖议定书”。由于这个“议定书”施行的后果，使东北人民的原有土地为日寇抢去，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不仅如此，这就使得日本人在东北一年比一年人多，使东北完全变成日本。我的这个罪恶之大，是不可估量的。

武藤信义向我说过，将来满洲的国体问题，他说：日本很关心这个问题，只是将来是皇帝、国王和总统还没有决定。当时无耻的我想最好是改为清朝皇帝，要不然当满洲皇帝也比当国王好，昏昧的我想以为满洲皇帝是和日本天皇名义上是平等的。我不愿意总统制，一则我不能永远当元首，二则日本人也有当元首的可能。我

曾和罗振玉、工藤忠谈过伪满国体问题。罗振玉主张让工藤借口告假上日本国内各方面打听动向,我也同意罗振玉的意见。工藤走了一个来月回来时说,日本各方面意见还没有一致,近卫文麿和日本军部(南次郎在内)多人是主张满洲实行帝制,但是他们都反对满清的复辟。这以上就是我为了自己当皇帝,和罗振玉又勾通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工藤上日本作为伪帝制的刺探活动。这是反人民的罪行,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四年伪满实行帝制。我听说在伪满实行帝制前,熙洽曾聚集些人企图作帝制的请愿,受日本宪兵的禁止。不久菱刈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通告郑孝胥满洲国实施帝制,并伪造了三千万东北人民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帝制,不让有国会(吉冈说过议会制不适宜于满洲),就是为了通过伪满皇帝名义上的独裁,来实行其统治东北的手段。就在日寇通告下,制造伪民意拥护下,汉奸的我当了伪满皇帝。

(6)当伪执政时对日寇那些人经常接触和谈话

我在天津到营口同行的有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以及在营口接我的甘粕正彦。在旅顺住在满清肃亲王家的小平总治(我在旅顺曾住过这里),这些人都经常和我见面,板垣征四郎让他们住在伪执政府内。后来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移到外面去住了,板垣又介绍中岛比多吉(板垣在旅顺和我会谈时的翻译)也住在伪执政府。在这些人里,我当时信任工藤铁三郎(我听说他是满清陕甘总督升允的用人。升允是一向主张满清复辟的人),工藤又经常表示他不满意板垣在旅顺对我的威胁。他经常表示愿意继承升允遗志,愿为恢复满清帝制而努力。当时我以为他是和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是忠于我的。因此,有一天工藤希望我给他起一个名字,我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忠”——工藤忠——这是表示他忠于我个人的。工

藤在伪执政府当侍卫处处长。小平总治(这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代表,川岛是管理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家中一切,善耆死,川岛仍然管理他的家。川岛芳子,宪均的姊妹,他是川岛的干女儿),当伪执政府内务官。甘粕正彦一度当警卫官,后辞退。中岛比多吉当伪执政府秘书处秘书。

一九三二年,武藤信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到东北后,又向我举荐了他的亲戚退役少将石丸志都磨来当伪满的侍从武官,这是在吉冈安直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监督我的。石丸常说我不应当干涉伪国务院的,不要驳回它的议案。满洲是内阁责任制。这和后来菱刈隆、吉冈安直的话都是大致相同的。

(7)伪帝制实施,第一次我去日本

一九三四年我当了伪满皇帝,接着日本天皇裕仁派他的兄弟秩父宫雍仁到了东北,致贺伪满的帝制实施。并给我日本的大勋位、菊花颈饰、菊花大绶章,给我老婆宝冠章。我招待他宴会、阅伪军。雍仁走后接着不久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告郑孝胥转告我赴日答谢。一九三五年,我上了日本见裕仁,表示对日寇帮助伪满建国和实施伪满帝制以及对派雍仁访伪满致贺伪帝制的感谢。裕仁招待我宴会、阅兵并拜日寇的桃山、多摩二陵。我还见了裕仁的母亲,他领我登土山,无耻的我竟扶着裕仁的母亲上山,途中并作诗有:"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的话来阿谀日寇。在神户途中,伪满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告我,回去后还要颁发一个诏书表示对日本的感谢。这次我上日本,吉冈安直就开始来了,随我上的日本。他是关东军司令官专派的监督和管理我的人。

我回到长春,吉冈安直告诉我,等郑孝胥把诏书拿来的时候,让我告他,加上几个字:"我对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满洲国人民应当和日本一德一心"的意思,让我记下来,经我认可(郑孝胥当伪总

理时，伪诏书由他起稿。张景惠当伪总理一切由日人总务厅的佐藤知恭作的)。等郑孝胥来了，我告诉了他，他又把文字整理一下，于是在伪国务院就发表了。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告我召集伪总理、各部伪大臣、参议府议长、参议、总务厅长等来伪宫内府，让我发表上日本感想(吉冈在旁边听着)，我说不少阿谀的话，主要说明“一德一心”。我说:“如果满洲臣民对于日本不好，就是对满洲国皇帝不尽忠诚;如果日本臣民对满洲国不好，就是对日本天皇不尽忠诚。”无耻的为日寇当宣传品。

以下是吉冈安直怎样操纵我，我是怎样当日寇的驯服走狗一束:每当我重要谈话之先，由吉冈预先指出谈话范围，写在纸上，让我照这个意思来说。这是对特别召伪总理、总务长官谈话时，以及对年例各伪省长、各军管区司令官报告式、宴会时，如果有特别谈话时都是这样。

我在伪满所谓地方视察，都先由吉冈通知我，一方面由伪国务院和伪宫内府订出“日程表”。在我到那里之先，先预备好了。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伪国务总理、总务长官在旁站立，我在中间站着，伪省长、军管区司令官照例报告，站在那里像念书似的念完了就退下。视察时，吉冈一步不离。这和在长春每年他们的报告一样，他们不能随便来见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这汉奸作幌子的例子。后来我还听说，凡是我到的地方，日伪宪兵警察拘禁许多人民，认为有容疑或判过刑的人都拘禁，一直等我多日走后，才放出他们来。

吉冈对我讲，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当司令官的时候)是你父亲，他是代表天皇的。一九三五年我上日本时，他又说日本皇太后是你的母亲。他自称是我的准家族。当粮谷出荷时候，吉冈便告我找伪总理、总务长官来特别谈话，指示鼓励他们多为日本出荷

粮谷,多增产。我执行了强盗的话。太平洋战争起,一次伪军管区司令官照例报告后,宴会时吉冈告我鼓励他们,说明日满一体不可分,伪满军是日军一翼。又说,美英敢于侵犯我们,断乎予以歼灭。又一次伪军管区司令官报告前,吉冈交我一张字纸,让我当他们来时,告诉伪军事部大臣,对于伪军队应当用铁石精神、铁石团结练成铁石部队,当日本皇军的一翼。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吉冈告我,要和我个人订一密约,如果将来我有儿子的时候,五六岁就要离开我,送到日本留学教养,我签字了。吉冈还告我对日本献铁,并将门饰的铁、铜都取下来。后又让我把白金、钻石以及地毯、衣服给日寇,都是帮助日寇的侵略战争。这是到了日寇快完了以前,它愈失败,愈要大肆搜刮,它强迫人民献金献铁。伪满的一个铁石部队长日本人上华北时见我,我宣读吉冈决定,伪宫内府作的所谓敕语,努力维持治安,作皇军的一翼,来鼓励他。当太平洋战起,日寇愈临近死亡时,它就愈要最后挣扎。日寇由关东军选的充当"体当""肉弹"的士兵,由吉冈带来见我,在他们来的以先,吉冈告我对他们鼓励(这是日寇一面驱使日本人民当兵当炮灰,当肉弹,一面令傀儡汉奸再替他给日本兵鼓励,让他们卖命,增加侵略力量),让我给预备好酒,和他们握手喝酒。最后还让我和这些人一块喊日本天皇万岁。我就这样恬不知耻地,丧尽人格地,唯强盗的话是听。

一九四一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吉冈让我向张景惠表示把正修建的伪宫停止继续修建,为的是节省材料支持侵略战争。我答应,告诉了张景惠。这是我支持日寇侵略战争的又一个罪状。

一九四〇年,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吉冈通知我,上日本见裕仁,迎(他们的祖宗)天照大神来到满洲祭祀。吉冈说:为了表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关系,日满应当有同一的宗教信仰。

我说满洲原来有宗教,何必多此一举。吉冈顿时变色说:是奉关东军司令官命令通知你的,这是日本既定方针,没有考虑的余地。丧失人格的我就承认了。在这准备出发时,日寇在我的院子里旁角就开始伪神庙的奠基式了。我出发上日本,吉冈又交我一纸,告我对裕仁说话的范围,主要是要我表示我感谢日本的帮助满洲建国,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我愿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来满洲国奉祀。我到了日本,见了裕仁同他老婆。当时我就拿出这字纸,一面看着一面说的。裕仁明知故问的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自己愿意,我就从命了。"这句话刚说完,顿时起来用手指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放在桌子上的一个长方匣和三件东西对我说,这就是神器(镜、剑、勾玉)。我接过来,又放在桌上。后由伪宫内府大臣熙洽拿着。裕仁对这事一字不提的,装好人似的问我健康如何,运动什么。我问他健康。这时候裕仁的礼官引导他和他的老婆同我上另一室,看我给裕仁的东西(伪满总务厅准备的搜集东北各处人民的财产、矿石、鱼类、谷类等等)。时间到了,我向他告辞回赤坂离宫。不一会,裕仁回访,对我表示感谢满洲国支援日本的圣战。昧着良心,失了人格的我,又重对他表示感谢日本的帮助建国。后来就说些应酬话。他问我的老婆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对于伪神的事他还是一字不提,不一会他走啦,后招我宴会一次。我见了他的母亲,又看了他兄弟雍仁的病(我后来听说,我上日本的时候,裕仁是派秩父宫雍仁接我的,他不去,他反对伪天照大神移到东北,另外还有别的事,因此把他隔离起来,改换高松宫到横滨迎我。吉冈让我看他病,他躺在床上坐起来,看着完全不像有病样子。后来听说他被隔离到富士山什么地方)。由东京我到京都,按照他们规定又到奈良橿原神宫膜拜。上橿原神宫的途中,我在火车上,心里太难受了,我哭了,当时我只是想到侮辱自己的祖先。

由大阪登日兵舰回东北。在离大阪船上时候，吉冈命我同着日本接待员、伪满随员向东方遥拜。在回东北的车中，吉冈早把印好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原文给我看，说这是回国颁发的诏书。我回长春，由伪国务院把诏书交伪满尚书府交我签字后，由伪国务院发表了。伪国务院交来任桥本虎之助（前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伪祭祀府总裁，沈瑞麟当副总裁的任命状，由我签名。经吉冈告我，一方还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伪祭祀府日本人的规定，由桥本虎之助告诉我每月定期向伪神庙拜。日寇规定伪官、伪军向它拜。日寇的侵略战，每当它的报纸登载日寇裕仁大本营发表侵略胜利时，吉冈也命我向伪庙拜。还让我打电报给裕仁贺捷。每一次的侵略者宣传胜利，吉冈都让我给裕仁打电报，一面又让我向伪庙拜。等到他的报纸的报捷消息越来越少，这里的皇军玉碎了多少，那里的皇军又玉碎了多少，这时候吉冈又急急忙忙地让我改向伪庙祈祷了。伪满政权本着日寇的规定，对于伪庙失礼，就是大不敬，受严惩。吉冈又由日本约来一个为裕仁的妈讲他们神道的人，到长春为我讲了四个月的神道，旁边吉冈也听着。张景惠、臧式毅、张海鹏、吉兴等等也在旁边听着，谁要是要睡，吉冈就说这人建国精神不好。在外面对伪官吏也讲伪神道。日寇这种宗教侵略，是企图赶尽杀绝，要消灭中华民族的血统，要使东北人民永远陷入日本的殖民地当奴隶地位。这个滔天罪行必须由下列几个人负责：总主持者是裕仁、主持者梅津美治郎、策划者饭村穰（关东军参谋长）、吉冈安直、星野直树（总务长官），我是施行日本宗教侵略，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我太对不起祖国同胞啦。

一九四〇年正当日本的两千六百年纪念，后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交我裕仁给的日本两千六百年纪念章和支那事变从军章。说日满一体不可分父子的关系以及满洲国对日本物资援助，

这对日本圣战有所贡献，裕仁派他送我这两枚纪念章。无耻的我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祖国的纪念章。吉冈让我给裕仁打电报致谢，一面吉冈又命我向伪建国神庙、向天照大神谢恩，他说日本天皇是神，不是人，天皇给的就是承天照大神的神意给的，所以应当向天照大神谢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对美英帝国主义宣战。当天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即派吉冈通告我，立即就颁发一个伪诏书(时局诏书)。他急急忙忙把作好的诏书给我看，说今天晚上在伪国务总理、各部大臣、参议府议长、参议列席，由我宣读。并告诉我如何来说明这个诏书的意思，我答应了。不一会儿，各伪官吏到齐，由我宣读，并先说明，主要就是日本天皇今天下了诏书和美英宣战，满洲国也即时由我名义颁布这个诏书，共同完成日本的圣战等。以后即由我念这个伪诏书。这里主要的话有：生死存亡，断弗分携，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由于这个伪诏书，便把东北人力物力全拿出来为日本强盗的侵略战服务。这就是日寇的将近灭亡之前，还要榨尽东北人民最后一滴血汗，来为强盗贡献生命和财产。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的我以及伪国务院的一群汉奸走狗的出卖人民，真是罪大恶极。

一九四二年建国十周年以前，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吉冈安直告诉我，满洲管日本叫“亲邦”。后吉冈安直又告诉我给裕仁写“亲书”，同时他把拟好的原文让我写下来。吉冈说派张景惠用“谢恩大使”名义代表我见裕仁，对“亲邦”日本十年来对伪满建国、实施帝制种种的帮助表示感谢。我承认了，更〔便〕一面由伪国务院交伪尚书府的“谢恩大使特派状”交我签字。吉冈建议送裕仁的礼物，由伪宫内府准备的屏风等等，张景惠就去啦。

一九四五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派吉冈安直通知我乘飞机上日向裕仁表示慰问，并送日寇东北大米三十万吨，盐七千万斤。我当时实在是不愿意再上日本啦，我对吉冈表示我有病，实在是不能坐飞机。吉冈回去，过了几天，吉冈告我可以不去了。他说由我名义派张景惠去，我承认了。虽然我没有上日本，可是派张景惠的上日本，同样是我支持日寇侵略战争的罪行。

一九四五年，苏军大举进攻日寇，解放东北。正在苏军开始攻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参谋吉冈安直令我全家以及伪满总理、伪大臣等即日移住通化大栗子沟(经一再说三天出发)。他们说日本军将作持久战，坚守南满。吉冈告我说，你如果在新京，苏联军队来了会杀你的。吉冈到这时候，还预先教我对张景惠、武部六藏等人说，这是日本战略的退却，所以我们搬到通化去，日满的关系是生死存亡，断弗分携，必然获最后胜利。

我这时知道日本快完了，虽然我素日听反苏宣传，不知道苏联真相，可是这次苏联来，我并没有感觉害怕，当时我心里感到日本运我到大栗子沟，是要杀人灭口。到了大栗子沟，别的伪政权汉奸都回去了，只留我和家里人、伪宫内府的人在那里。吉冈说要送我上日本，想不到飞机到了沈阳，遇见苏联〔军〕，此后到了苏联。

根据以上事实，我的罪恶是数不尽的。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当日寇的走狗；由伪满的成立，东北成为日寇军事基地，给祖国带来历史空前大灾难；伪满十四年，给东北人民带来殖民地的无限灾难；十四年的伪满一切伪诏书、法令，都是施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统治东北人民的。这一切伪诏书法令都是我签名和裁可才发生效力。这签名的罪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这一切滔天大罪，完全是我的责任。

日寇的军官是常转任调走的，唯有吉冈由中佐到中将，由日本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数个任内，十年间没有离开过我，一直到日寇降服在沈阳飞机场一同被苏军逮捕为止。

特别必须指出，日本参谋吉冈安直对我要求的一切事项，一切都是由我同意施行的。这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政策，所有这一切罪恶事实及其后果，我必须负完全责任。

我初回祖国的当时〔1950 年 7 月〕，在哈尔滨道外，写履历时，还不说实话，如给南次郎写信的事，我竟一字不提，以及在天津上旅顺的经过，我也避重就轻，歪曲了事实，欺骗人民政府，这真是罪上加罪。

再者，在我旁边还有侍从武官处，有侍从武官长一人，武官若干名。他们的任务是如我出门时或是伪满官吏的亲任式时以及典礼时，武官长、武官在旁站立或随从。其次，武官长和伪军事部有事务上的连系，每年许多次由武官长、吉冈帝室御用挂以及伪军事部联络派遣武官用我派遣名义到日满军及日伪军医院、军事学校等处慰问，回来后作书面报告，由武官长交我看。还有伪军事部把一部伪军出动汇报给武官长交我看。这在伪满成立后都这样作，但是后来自吉冈来以后，过了些日子，便没有给我看。伪军事部决定伪军的出动后，由伪军事部大臣向我做书面报告或当面的形式报告。

关东军司令官和我每月见三次。和伪总理也有定期的见面。

当植田谦吉当关东军司令官时，当“张鼓峰”、“诺门汗”两事件发生时，植田说过这是苏联军的侵略，日本军为了保护满洲起而应战(事实上是日本军在“张鼓峰”向苏军挑衅。“诺门汗”事件是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苏军以同盟的关系，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日本侵略者遭到苏军的痛击，完全失败）。植田极力宣传苏军脆弱，不堪日军的一击，说击坠苏军大量飞机、击毁坦克等等。植田特邀我到一个飞机场，让我看苏联飞机和日本飞机起飞速度的比较，一个快的飞机，他说是日本的，一个极慢的飞机，他说是掳获苏军的飞机。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祖国后，有一次植田谦吉对我说，这是中国军队向日军挑衅所引起的。他同样说中国军队的脆弱无能。他宣传日本军接连获得赫赫战果，前些日子占领了多少地方，近日又占领了多少地方。这时日寇操纵伪满报纸也大肆宣传日寇的胜利。当时我的思想，中国是敌不过日本的。我又想过，日本军完全胜利后，它一定公开吞并满洲；日本败了，蒋介石也不能容我。这说明我的封建利己思想，只顾个人利害，随时随地都表现着。

一九三九年，西班牙驻日本公使兼伪满公使来东北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通告伪满总理张景惠，由日本斡旋伪满和西班牙同日追加入一九三八年的"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经张景惠对我报告，由伪国务院发表。据阮振铎说，这是日本的决定，让伪满和西班牙同日加入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伪满的参加是由日本外务省向德意介绍追加的。当时日本总理大臣是近卫文麿，外务大臣东乡茂德。

一九四一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梅津美治郎的通知，通过伪满总理张景惠告我，派臧式毅当特派大使上南京，和日本、伪汪政权签订"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经我认可，并由伪国务院交伪尚书府转交我臧式毅的特派大使任命状，经我签名，随即举行任命式。这个三国共同宣言包括"在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同盟"。臧式毅到了南京和汪精卫、日本驻伪汪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大将签订的。

从一九三七年，张景惠、植田谦吉订立“拓殖议定书”以后，一九三八年又通过伪满国务院国务会议成立的“开拓总局官制”，它专办理收买土地为日本移民的事。日寇移民预定二十年把五百万日本人移到东北，把当地人民赶走。名义上是收买，那不过是敷衍面子，欺骗人的。就是给的钱也是极少，连房子带地都归了日寇，使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我听说早在小矶国昭当关东军参谋长时（大约一九三二年），就曾把开拓要纲草案给伪满民生部大臣臧式毅看过，随后小矶就拿走了。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开拓总局（属产业部，后属兴农部）局长为日本人结城清太郎。我听说在一九三九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参谋片仓衷和伪满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伪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以及伪三江省省长卢元善，到东京和日本近卫内阁见面，商洽日本移民事，并表示欢迎日本移民到东北（据卢元善说，他是专为伪三江省要求移民的）。此后，日本移民更加强化。

（8）对我的用人虐待，对我的妻子压迫的罪行

我个人生活是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养成自尊自大，身份等级观念，奴役为我劳动的人。我对我的用人经常是信疑不决，同时更对他们压迫和奴役。在满清封建王朝专制制度，无论皇帝的叔叔、兄弟、侄子等等都向皇帝自称“奴才”。因此，在我当时，我的用人对我自称奴才，我的侄子以至我的叔叔也都对我自称奴才。我看别人都成奴才，唯有我是高于一切。这说明满清封建制度是如何的腐败、专制。也说明我是如何的腐败专制的罪恶思想。满清宫中素来信神信佛，信占卜星相，无例外地我更是念经占卦，问吉问凶。同时嘴里不断的“大慈大悲”，同时对人打骂。又迷信，又昏暴，又胆小，又猜疑，这是我的阶级特征。过去在满清宫里设有敬事房，是管执行用板子打太监的，偷东西的容疑者还有夹木棍。还

有慎刑司,也是执行的机关,打人囚人等。同样是大太监打小太监,一级打一级。而我是谁有错不骂即打。我在北京、天津、长春都一样的常常打骂我的用人。我并订出规则和限制很多,不许隐瞒,不许庇护结党,不许有错不管。尤其可恶的,对使用的所谓"随侍"不许他们互相谈话,硬说谈话有了感情,就要彼此庇护和有错不管。这是何等荒谬绝伦、奇特的暴虐。只要别人一起誓如"天打五雷轰"的话,就信这个人确实可靠,或者是确改悔错误了。有一次要赶走一个用人,他咬破了一点手指,流出血,写"如不忠诚,天打五雷轰",立时便把他留下了。我的侄子,我也同样的打,硬说这是"家法"。这就是封建家长专制制度。后来仍是一贯打人,甚至给人灌凉水,跪铁索,打手板,打木板,打嘴巴更是常事。后来有一次竟发生一件打死人的惨事。事情的经过:我用了些人,专是为打扫、打饭作零事的人,所谓"殿上""勤务班"。他们有许多是从"博济慈善会"来的"孤儿",这没有父母、贫苦最可怜的人,而昏暴无耻的我用他们的时候,有了错,就命用的人打他们。有一个名"孙博元"的,因为惧怕挨打,逃跑,被抓回一次(我规定过有错,必须管,不管就受处罚),因此,我的用人不敢不打他。当我听说他回来的时候,我也想到他是又冻又饿,告先别打他,让他憩一憩,可是已说晚了,用的人已然打过他了。他连冻带饿再挨打,以致身体不支。我急找黄子正大夫赶紧给他注射救治,但是越来越严重,可怜的他,终于死去。这完全是我的罪恶责任。是摧残自己的同胞,反人道的行为。我对帝国主义,就是那样怕它,它说什么,听什么;对于为我出劳动力受我剥削的中国同胞就这样摧残、暴虐!现在,我认识过去种种行为简直不是人的行为。

我吃的饭,是单一个厨房,可是专为我打扫的所谓"殿上""勤务班"的人,就吃另一个厨房的饭,他们的饭菜是恶劣的,但是我也

从不注意好坏和够不够，以致发生叫范楚江的（也叫范博江）勤务班，他打开窗户上我的厨房拿吃的东西，经查出来，也不问他吃饭够不够，竟给扣上偷东西的帽子，又被毒打一顿。像这类打骂用人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我就这样对待给我出劳动力的中国同胞。简直我是走狗、汉奸、恶霸兼而有之。现在我认识我过去的罪恶，我痛恨自己，痛恨封建主义，痛恨帝国主义。今天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低头认罪。

还有关于我结婚的经过，我愿意说一说。按照满清制度，皇帝挑选充当皇后和妃、嫔、贵人等等。当我结婚前，是由家族和内务府在各处搜集许多女人照片，让我选择。我选定一人名文绣的，她家里很穷。因此，我家里人不赞成，让我重选择。这次选择了荣源的女儿婉容，可是家里人又说啦，文绣的照片曾一度被选中，现在不要她也是不对，可以让他当第二老婆（当时名淑妃），因此，娶了两个老婆。他们之间，我听大老婆的话，经常不理二老婆。在天津大老婆硬说二老婆骂了她，不依不饶，我的大老婆经常以死来要挟，我不敢违她的意，也帮助责备二老婆。结果她受不了这气，出去起诉，首先要和大老婆分居，令我一月去几次。终因大老婆的反对，双方离婚了，我给文绣些钱，就算了事。我后来与大老婆感情也就日益不好。在长春我的大老婆和一个当差的发生恋爱，经我察觉，把当差的驱逐走了。从此，更不理婉容了。我打算和她离婚，这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知道了这事，他说，皇帝皇后没有离婚的可能，因而作为罢论。我又娶了一个二老婆名谭玉龄的，她和我感情非常好。后来她有病，中国大夫说是伤寒病，后又找日本大夫看，起初还很用心，除注射还输血，但是吉冈安直听此事后，把日本大夫找去密谈很长时间，回来后，我就看见他不像以前的频繁诊治和注射。第二天早她就死了。日本大夫说是什么“粒粒结核”，

当时我心中想是吉冈害的。不到一个月,吉冈便拿来许多日本女人像片给我选择,我没有看中。他拿了好几次,他问我是不是不喜欢日本人,我说不是,无论什么种族,彼此如没有感情,是终身的痛苦,他也无词。后来又拿来旅大的中国学生照片,并又带来受过日本教育的女学生来见我,我也没有看中。他后来又拿来中国女人照片,我希望要一个年少的,他拿来东北小学学生照片,我看中了李玉琴(十五岁)。当时我顾虑,一个吉冈就这样厉害,我怕再来一个吉冈的内面特务。我要和她见面,须双方同意,经吉冈带来,李玉琴也同意了。于是就娶为我的第二老婆。

这是我过去结婚的经过,一方面说明我过去压制女人,蹂躏女人的封建积毒和婚姻制度的极端专制的万恶,更说明吉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至于我任意对人加以私刑,蹂躏人权,违反人道,以致孙博元冻、饿挨打致死,这是我的非人行为。

以上就是我背叛祖国,危害人民以及个人的暴虐行为。在经过我人民政府三年的苦心教育、学习,我认识了我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根本罪恶,我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认清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现在认识了自己的罪大恶极。现在我诚恳的向我祖国人民政府和祖国人民认罪,请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119—2,1110,1,第5号

爱新觉罗·溥仪补充笔供

（1954年6月21日）

补充我对于我的罪行的认识，我的“认罪书补充”：

在六月十四日，首长在战犯认罪大会上极恳切的告诫，以及日本战犯桥本的衷心坦白认罪，我想他是日寇，在祖国人民政府的教育而深深地认识自己的罪恶。连日以来，我也想自己交代问题够不够，对自己罪恶认识的透不透？我在十七号小组座谈会上，我还是想我是执行日寇侵略政策，而指使我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如吉冈等罪更大，我的罪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暴露自己罪行同时，必须暴露主持和策划、指使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主动罪行。后来，又通过所方发的“拘留室规则”的学习，内有“……罪犯要达到彻底认罪……必须努力学习革命的科学理论，联系自己的实际罪恶，深刻反省。对己对人要展开严肃地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①] 这是用革命理论联系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恶，是更进一步的改造武装我的头脑，使我站在人民立场，拔尽汉奸皮。这是实际的学习。我们的人民政府苦心教育，三年如一日。这次认罪检举期间，像我这样罪大恶极的人，人民政府真是一而二，二而三的无微不至的教育启发。我经过自己再三反省的结果，我认识我认罪是认罪，可是认识罪恶的程度是太不深透。

① 文中的着重号均是原有的。——编者注。

这就是我的认罪书中，我的认罪观点的偏差和错误。因为我强调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吉冈安直的指使，虽然这是事实，不是我捏造。可是这就在我的主观上把主动罪恶的重点，放在一方面。也就是说，把罪恶主动责任一手推卸到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吉冈安直的一方面，把主持和策划的罪恶当作首要，把汉奸的施行当作次要。而认为自己是一切被动和不得已。这是在认罪态度和认识上极端的偏差和错误的。连日本战犯桥本都认识自己的罪恶，表示那样真切。他有长官，也有部下，他没有表示他是被动的态度，这是认罪的正确认识。他的认罪也给我深刻的激动。经我的再三反省思维和分析我的罪恶，使我认识日寇是主动的罪恶，同样，我也是主动的罪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就是我的满清统治阶级的罪恶思想和行为是主动的，同样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主动。这正是我要利用日寇恢复满清的封建统治，日寇要利用我当工具，达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统治东北。我没有利用了它，反为它所利用。因此，这些罪恶的开始，我就不是被动的。

首先，我说明这内容，日寇和我互相勾结和利用。在我的认罪书中的北京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和天津的“第二阶段”。

（一）我自投罗网地上了日寇北京公使馆，无耻的求敌人保护（这以前日寇武官和日人医生同郑孝胥到我父亲家里，要接我上日本使馆兵营，让我托病上医院为借口，虽然由我家里人反对而没有作到，这就有利用我的心）。后来经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和庄士敦的建议，我上了日本公使馆。日寇不仅接受我的要求，而且派日警官对我随时所谓保护。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还表示不赞成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的举动。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还发表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日本公使并派日警官以及天津日本警察署长秘密把我送到天津。日本公使事先的联络，所以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

带许多馆员到车站接我。为什么日寇对我这样殷勤和表示所谓帮助呢？这正是日寇早有利用我的心。所以，“九·一八”事变，日寇的占据东北后就利用我，绝不是偶然的。

（二）我到了天津以后，为什么日本领事馆专派日本警官一人和华捕数人经常驻在我的院内，并且日警官借保护为名，凡我出门，他必随从。不仅如此，他还把我每日行动和见什么人，一一的都汇报日领事馆。我看见在日警官室内桌上就摆着对我见人和行动的“日志”。这是什么意思，他对别人怎么不这样作呢？这不是明白地它是在平日考察我的一切行动合乎他利用的条件与否。这是日寇处心积虑的对我的调查和衡量。

为什么日寇天津领事馆和司令官常常地请我吃饭，殷勤招待，联络私人感情，这一一都是企图利用我的明证。并且日军高田丰树司令官以及后来的桑岛主计总领事先后都公开表示过，中国还是帝制好，而且有意地对我作民族挑拨的毒计。

我由于封建的思想教育，我一贯地以恢复满清为自己唯一目的。于是听郑孝胥的建议派家庭日语教习远山猛雄上日本，把我的信交给陆相南次郎，要求他帮助恢复帝制。这就是我要利用日本来为我恢复满清统治。日寇素来有利用我的心，我又这样自动要求他的帮助，这岂不是正合日寇的心理吗。

日寇的“大陆政策”是它一贯的帝国主义侵略企图。它要鲸吞中国是不可能，它便用蚕食办法，用“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办法。日寇占据东北，因而土肥原贤二到天津要求我上东北。如果把日寇的过去对我的种种历史个个分析，可明白它的要利用我，早在北京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土肥原的要求我上东北，现在我认识这就是我给南次郎写信要求恢复满清帝制，当时他虽然没有回答，可是当日寇占据东北后，土肥原的要求我上东北，日寇的利用我当它的

走狗，正是南次郎对我的无言的实际的回答。

到了伪满汉奸政权成立以后，我的罪恶更是数不尽的。我为什么执行日寇的话，我是想维持自己的地位。我是不顾人民的死活，我是不顾祖国中国的如何，不惜叛变祖国，签订卖国密约和议定书。断送了东北人民的一切利益，支援日寇，使日寇占据东北为合法化。这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汉奸生命和地位。为什么日寇不利用别人当伪执政、伪皇帝，当了伪皇帝还能十四年始终不动摇，这说明是我当汉奸合日寇的口味。日寇说一，我决不作二。虽然我心里对日寇的不满，这个不满不是为了别的，乃是没有实行满清的所谓“复辟”，不满足我的个人封建统治阶级的欲望。所以自从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给南次郎战犯写信，以及土肥原贤二战犯要求我上东北起，直到为日寇利用，作了它的忠实走狗，把东北成为十四年的殖民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的根本“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所造成的。难道说我是被动么？我的封建统治阶级利己主义正是我的主动罪恶。这个主动罪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动罪恶相勾结，所以日寇的罪恶是“半斤”，我的罪恶也是“八两”。因此，我认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吉冈安直的每次所教我所作所为（这事实在我的认罪书中已陈述）都是我基于利己主义，甘心充当这万恶的“卖国贼”，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无耻顺驯走狗。由于伪满汉奸政权的建立，帮助了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凶焰，给祖国人民带来历史空前大灾难，给东北人民带来十四年殖民地的无限灾难。我应当负这一切罪恶责任。我向祖国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前恳切的衷心认罪。

119—2，1110，9，第14号

爱新觉罗·溥仪笔述

(1954年7月15日)

检举伪满汉奸的支派表材料及罪行:

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伪满汉奸的支派大体可分这几种派别:

(1)封建的满清复辟派别。我过去纯粹是满清统治阶级,自幼一贯地受封建的腐败透顶、愚昧落后、自私自利的教育思想的毒素。一贯的以梦想恢复满清开倒车的迷梦。而在我周围的一群寄食我的封建分子,更是希冀着藉我要自己升官发财,如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以及谢介石等都是这一系。我想利用日本来恢复满清,他们也是一贯的这样主张,我更深信他们的话,因而勾结日寇,成为叛卖祖国的罪魁。而这些汉奸们都成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在伪满都当了显赫的大汉奸官吏。

(2)东北土著的封建地主阶级——旧军阀、官僚等派别,如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袁金铠、于冲汉、于琛澂、于芷山、赵欣伯、冯涵清、丁鉴修、孙其昌以及张文铸、阮振铎、黄富俊、金名世、王之佑、于静〔镜〕涛、吉兴以及后加入的邢士廉、张焕相等都是这一系。

日寇占据东北后,首先就利用、勾结当地军阀官僚,如张景惠、臧式毅、熙洽、袁金铠、马占山、于冲汉、张海鹏、赵欣伯、于芷山等,更利用我的过去封建满清的关系,来麻痹东北人民,来羁縻和纠集这些土著的军阀官僚等地主阶级的民族汉奸,因而招致这封建势力的集合。他们都一致地表示对我的所谓“拥护”,而共同组织了

伪满汉奸政权，成为日寇的有力的奴役、屠杀、掠夺的统治工具。

其中的熙洽更是满清的所谓宗室—我的远支家族—他纯粹是封建复辟派。张海鹏曾参加过过去张勋的叛国实行短时期的所谓“满清复辟”。上述的这些汉奸都当了伪满的重要汉奸官吏。

其中于冲汉是一贯著名的亲日汉奸(黄富俊、阮振铎、赵玮曾知其详)，所以他的儿子于静远也继承他父亲而当了大汉奸。赵欣伯是留日学生，是亲日派，所以也为日寇所重用。于静〔镜〕涛是张景惠的干儿子，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寇板垣征四郎给张景惠三千支枪，让他上哈尔滨继续当“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的时候，张景惠的伪警察队长就是于静〔镜〕涛。当伪满汉奸政权树立初，这一时期日寇还没有限制我见人的时候，于静〔镜〕涛当哈尔滨警察厅长到长春时曾见我几次，这是旧官场“溜须”“拍马屁”的行为。但是后来他见我也不能对他有任何“好处”，日本人是掌进退实权者，他见我就少乃至不来了，大显身手地对日寇的谄媚，不然怎么当了长春警察总监，后来竟当了伪大臣，而且是勤劳奉公部大臣，他为日寇奴役人民而出了大力。

(3)后起的所谓“旅大地区”，也就是日寇一手培养制造的所谓“日本皇民”，像韩云阶、谷次亨、卢元善、阎传绂、王贤沣、王子衡等等许多人，他们的思想教育纯粹和日本人一样。他们当中的谷次亨、卢元善、韩云阶、阎传绂都当了伪大臣，得与我的连系来共同为日寇服务来残害奴役和掠夺人民。最明显的是谷次亨、卢元善、王贤沣都当过伪“总务厅次长”的最重要地位。这是直接能参加日人“火曜会”的。这个次长会议的——火曜会——是日寇掌握操纵伪满的发动机。它是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的代表第四科参谋、日人总务长官为中心和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总务厅次长和各伪部日人次长所组成的公开秘密会议。这个会议是在伪国务会议和伪参议

府会议以前的日人会议。它是决定伪满一切政策、根本大法以及一切法令的。任何伪满官吏也不能参加，可是这样机密机关，为什么会有中国人的总务次长能参加呢？这充分说明是只有日寇一手培养制造的“旅大地区”的所谓日本皇民的谷次亨、卢元善、王贤沣等才能当总务次长，也就是只有他们才能参加这个秘密会议。我所知道的听说他们对日寇效忠的实例，如在一九三九年，吕荣寰、谷次亨（当时总务厅次长）、卢元善曾和日寇参谋片仓衷以及日人结城清太郎都上了日本，和日寇近卫文麿首相、小矶国昭拓相见面，表示欢迎日本快快地多移民到东北，楞说这是对东北有好处。因而更加速日寇的大批移民到东北，使东北人民遭到破产丢家，流离失所。这样实例正不知有多少。唯其如此，他们才是名符其实的日本皇民、心腹、走狗。所以当总务厅次长，参加“火曜会”，当伪大臣，绝不是偶然的。恰恰相反，正是和日寇有根深蒂固的根本因缘的。并且旅大地区日寇所培养的走狗在满铁作事的也当然很多。阎传绂正是其中的一个，当过满铁嘱托。

(4)伪满协和会，这是次于伪满〈政权〉的和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的，为日寇奴役统治人民的第二架主要工具。因此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当该会名誉总裁，我在伪执政时代也当名誉总裁，照例每年要宣读我麻痹人民并为日寇服务的所谓“敕语”，要宣读关东军司令官的所谓训词，伪满官吏都得充当会员。它推行伪满政策为日寇服务，来督促、榨取、强迫人民为日寇粮谷出荷、国防献金、强迫劳役、为日寇侦察爱国抗日人民，真是无恶不作。它的内部的本部长是重要的地位，像于静远、桥本虎之助、三宅光治、井上忠也[也]都当过这个位置。于静远的身份正和日寇前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日本陆军次官、伪满祭祀府总裁、伪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的身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来，是完全相等的身价。所以才

能当上这个重要汉奸走狗地位。他当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也就是日寇对他的汉奸资格的培养，后更当了伪大臣。听说由于他的家中一贯当汉奸，日寇很器重他，曾是张景惠伪总理的后补人。像阮振铎、曲秉善、王子衡都在协和会内当过要职。所以他们随后都升官，阮当了大使，当了大臣。曲、王都当了省长，再进一步，无疑地一定能当伪大臣。

(5)最后则是在日本留学的人。这是很多的人，尤其伪军人更多。这都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灌输亲日思想，他们在东北为日寇服务，日寇比较放心。像熙洽、臧式毅、邢士廉、曹秉森、吉兴、谷次亨、吕梦龄、阎传绂、王庆璋、甘珠尔札布、正珠尔札布、郭文林、宪均等等，那真是不胜枚举的，他们都是在日本留学的。〔中略〕

综合以上，除上述五个大区别外，还有满铁，这些汉奸都是为日寇服务的走狗。

由于以我为首的这些汉奸的背叛祖国，出卖人民利益，使日寇占据东北为合法化。由于日寇的利用我，纠集了一切反动封建汉奸的势力。由于伪满的成立，东北人力物力全被剥夺来支持日本法西斯血腥侵略战争。给祖国带来未曾有的历史大灾难。这都是这些汉奸所造成的，尤其是汉奸的中心，罪魁的我所造成的。〔下略〕

119—1—496

爱新觉罗·溥仪补充笔供

（1954年8月11日）

一九四二年是伪满汉奸政权成立十周年。日寇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殖民地化的侵略政策，在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吉冈安直的主持策动下，梅津命吉冈对我说，由于日满的不可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日本是父，满洲国是子——应当称日本为“亲邦”，为的是和其它国家称“盟邦”“友邦”的区别。无耻的我完全承认日寇的要求。同时武部六藏在伪国务院也说（我听谷次亨说的）日本是满洲国的产婆，有了日本，才有满洲国，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应当称日本为“亲邦”。

到了伪满汉奸政权成立十周年纪念日的当时，伪满举行所谓庆祝仪式。事先，梅津命吉冈曾内面对我说应下一个诏书，庆祝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纪念，他曾把伪诏书原文给我看过。更由张景惠对我的内面报告，经我签名而颁发的。它的目的完全是通过伪皇帝的名义来为日寇加强奴役统治和麻痹人民的。这是开始称亲邦，并加强伪“国本奠定诏书”惟神之道。该伪诏书内有两句话是：“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这就是自认日本强盗是父亲，伪满成了儿子了。这结果更可以使日寇为所欲为地奴役压榨、掠夺统治东北人民。因而更借东北的一切物资支援日寇，增加侵略势力。使日寇的对东北的奴役统治愈加巩固，东北更永远成它的殖民地奴隶地位，更打下了日寇最后正式合并东北的基础。我执行

上述为日寇服务的伪诏书，增加了日寇统治东北的力量，增加它侵略力量，为它造成将来正式合并东北的准备条件，给祖国东北人民带来了侮辱和痛苦灾难。我实在是没有脸对祖国和人民，我应当负这罪恶的完全责任。

其次，梅津美治郎更命吉冈安直告我给日本天皇裕仁写所谓“亲书”(这是武部六藏所制定的)，把原文给我看，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日本称亲邦，说明日满父子关系，一切都是天照大神所谓神麻和日本天皇裕仁的保护。说明伪满对日寇的感谢，感谢它十年以来对于伪满的一切所谓“援助”。并派张景惠充“谢恩大使”，上日本面交这“亲书”，经我承认。更由伪总务厅交来这“亲书”原文，由我写好，并签署了伪“谢恩大使”的特任状，交与张景惠。他便上了日本，见了裕仁，完成了这汉奸使命。

上述的“十周年纪念诏书”和这个“亲书”的总目的，前者是对内，后者是对外，它起相互的推动作用的。前者是企图麻痹人民，增强日寇的殖民地化奴役统治，后者是企图为日寇的侵略作烟幕，掩盖它的侵略，使伪满表示对日寇的感谢，是出于伪皇帝的自愿。更可替它遮蔽奴役统治东北，来欺骗世界。所以日寇对“大东亚共荣圈”各汉奸政权称伪满是长子，其次二子、三子。这就是以伪满作它的借口作为标榜，来实行其由“蚕食”、“分割”，进一步的“鲸吞”的总目的。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现阶段上，发展和巩固它的掠夺、屠杀、奴役东北人民的统治，麻痹人民，助长侵略势力和对外欺骗，掩饰它的侵略，利用汉奸傀儡当它的掩蔽物，当它的奴役统治人民的工具。最终目的则是正式合并东北，更达成其吞并亚洲，独霸世界的法西斯迷梦。我执行了为日寇一切利益服务的，根本危害祖国东北人民，助长日寇侵略政策和奴役统治东北，并给予日寇打下了正式合并东北的基础的侵略国策，而向裕仁写了这丧

尽人格的所谓"亲书",这个罪恶及其无限罪恶后果,我应当负完全责任。我在我的祖国人民政府和人民面前低头认罪。

再者,附带说明我在宣布这个伪诏书和写无耻的所谓"亲书"时,我是什么感想?我在当时对这事情,实在是心里太痛苦,可是敢怒而不敢言。我的心中,只是认为这是对我过去满清皇帝个人的侮辱,凭什么令我称日本为父,自己承认是子,这是对我自己祖先的大侮辱。我当时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为祖国人民利益打算,一切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的——利己主义——所打算。也就是说出发点只是为自己身〔生〕命、利益、地位打算。因此,也就是反人民的,脱离人民群众的,以及贪生怕死的,恐怖帝国主义的(由崇帝国主义,亲帝国主义,更成为恐怖帝国主义的)。由于把个人生命、地位、利益看成是第一位,结果,便无恶不为,便不惜出卖祖国人民一切利益,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驯顺走狗。所以日寇说什么,听什么。因之,给祖国人民带来了破天荒的大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大侮辱。这都是我的封建主义思想所造成的,同时也就是把我铸成历史上万代的罪人。

那时候,我也想到日本这样一步紧一步地来对待我,将来是没有好结果。将来如果日本全胜了,它是要公开的正式合并满洲的。可是由于上述我的封建个人利己主义,恐怖帝国主义,因之也就丝毫不敢违反日寇,只是自己苦恼,还对谁也不敢说,怕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从此可以看出,就是日寇对我在北京、天津早作了一贯的调查、衡量,唯其是十足的封建主义,所以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我认识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由于它们的被打倒,才有今天的人民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119—2—1110,10

臧式毅检举溥仪的材料

（1954年9月9日）

〔前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夜，苏军开始解放东北，空袭驻长春日寇，日寇败军，拟在山地抵抗，将关东军司令部退至通化，叫溥仪先赴大栗子，再转赴日本之计划。八月十日，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召集张景惠、臧式毅、吉兴、张文铸（伪侍从武官长），在伪宫内府告以溥仪将赴大栗子，均以为有斟酌必要。五人同见溥仪，问他的意见。溥仪说山田亲来说，先赴大栗子再转赴日本，已答应山田（当时之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了。五人又同去见山田问意见。山田最后说，事情已落到这地步，不能不离开长春云。同日伪国务院、伪参议府会商，大臣、参议各约半数随行。十二日夜溥仪离长春经吉海路赴大栗子。伪参议府随行者：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参议张焕相、井上忠也、高桥康顺。伪总理张景惠、大臣卢元善、阮振铎、于静远、伪兴安局总裁巴特马拉布坦等。十四日午间到大栗子。同夜我等回通化，在通化〈住〉两宿，十七日武部六藏由长春空路来通化，在省署召集大臣、参议，为溥仪退位事同赴大栗子。当夜过半，在大栗子某旅馆楼上，有伪总理、总务长官、大臣、参议等开会，由武部六藏提案，为请伪满皇帝溥仪退位问题，并由武部提出诏书，大意谓时局有重大变化，引咎退位。众无异议，经我与以通过，即由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吉兴、桥本虎之助等，面

请溥仪退位。经溥仪认可退位，我等遂于当夜（十八日晨）经四平街径回长春，武部六藏用日文把诏书宣布。

119—2—1110，3，23

张景惠笔供

（1954年6月11日）

姓名：张景惠。[①] 年龄：八十岁。[②] 姓别：男。原籍：辽西省台安县。家庭现住址：长春市自强街。学历：私塾一年，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中略〕

9 个人详细履历（从事社会作事起）：

一九〇一年任八角台团练练总，一九〇二年充奉天西路游击马队中哨哨官。一九〇四年充奉天前路巡防马队第三营管带官，一九一二年改充陆军第二十七师步兵五十三旅一〇五团团长，一九一四年转充同师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一九一六年充同师步兵五十三旅旅长。一九一八年任援湘军副司令，一九一九年任中央第一师师长，一九二〇年任察哈尔都统兼奉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任全国国道督办，一九二四年辞职。一九二六年任陆军部总长，一九二七年任实业部总长，一九二八年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三〇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三二年任伪满军政部总长兼参议府议长，一九三五年任国务总理兼协和会会长。

10 在各种职务中的各种活动具体说明：

---

① 张景惠曾用名叙五。

② 根据张景惠1953年4月31日所填登记表，生于1872年5月4日。

一九〇一年，清慈禧后偕光绪帝出走陕西，人心骚动，盗匪蠡起，地方秩序陷于糜乱，新民知府遂准八角台村民之请，由予组成步骑团丁百五十名，维持八角台暨附近村屯治安。但为达成保持村屯安宁起见，乃与张作霖等结识。迨增韫知新民府事时，收编张作霖部为西路游击马队，并将予之所部编入该队，予则充任中哨哨官。在此期间，仍维持新民治安，曾赴青蘇坎捕获新民南方一带巨匪杜立三之弟杜老秃子。一九〇四年，奉天将军赵尔巽成立五路巡防，予改充前路巡防马队三营管带官，担任洮南治安之维持，曾讨伐蒙古巨匪陶什陶，更击溃蒙牙戳等。一九一二年，奉中央命中前两路巡防改为暂编陆军二十七师，予亦改充该师步兵第一〇五团团长，驻于奉天，曾奉命讨伐窜扰东西丰、开源一带巨匪于小钉子，而击溃之。一九一四年改充骑兵二十七团团长，曾率本团并指挥步兵一〇五及一〇七团各一部，击溃盘据郭家店蒙匪巴布扎布，跟踪追剿至白音太来而归。一九一六年，任步兵五十三旅旅长。翌年，黑龙江省巴英额、英顺两旅长，因不满意该省第一师长许兰洲，迫走督军毕桂芳，谋夺督军职位之举，遂各集所部于呼兰，并扩大兵力而对峙，中央虽解除许兰洲职务，派鲍贵卿接充该省督军，但巴英等仍不服从命令，张作霖乃命予前往调解，幸告和平解决。一九一八年，任援湘军副司令，率王良臣、阙朝玺、邹芬各旅南进援湘。一九一九年归后，改充中央第一师师长，驻于北京南苑，无何特别活动。一九二〇年任察哈尔都统兼奉军总司令，仍驻北京。直皖战起，曾命方维新营援助直系，解除皖系宋子扬部武装。一九二二年，奉直两方不睦，且将导致内战，予曾主张和解，未被采纳，迨战争发动，只得依命进出良乡一带，奉军失败，即将所部交归奉方，辞去本兼各职。同年任全国国道督办，而实际上乃中央对于不主张战争之表示耳。一九二四年，辞去该职，闲居北京。当年秋，

二次奉直战起，冯玉祥回师北京，直军失败。一九二六年，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予任陆军部总长。一九二七年，改任实业部长。在以上两期间，均无特别活动。一九二八年，随张作霖回奉，车经皇姑屯后，炸车事件爆发，张被炸死，予则腿部受伤，愈后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二九年秋，援助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根据中俄、奉俄两协定争执平等用人权，发生中苏两国冲突，其后，由哈尔滨外交特派员蔡运升和平解决。一九三〇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曾赴南京就职月余，将院长事务交由副院长代理后，归还哈尔滨任所。一九三一年，予为赴锦县吊丧(张作相父故于锦县)及参加南京会议，曾经奉天去锦。回归奉寓后，适逢九·一八事件爆发，吾寓即被日人监视，并搜去私有枪支若干。更有日人名新井者(与内弟徐宝斌相识)来寓，问肯否愿与日关东军板垣参谋一谈？许之。板垣来称：奉天事件将来须直接交涉，汝能否对北满治安负责？如不反对日方，扰害侨民，则可回哈。当告以负责维持北满治安，乃于二十一日由日人新井伴随归哈。抵哈埠后见民心已呈动摇，兼有领事团暨商民之请求，遂命成立警察队补助一般警察，共维治安，以免日军借口侵入北满。

某日早〔九月二十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白武清一〔晴吉〕来署，传达日本军方意旨，令予立即表明态度，如不脱离中央则不承认现状。当告以事属重大，非经会议，不能决定，难以即时答复。彼去后，即召集有关各方举行会商，未能获得一致而散。迨晚，白武更来询问会议经过，且坐待解决，以便翌日早向军方复命。乃复召开会议，结果虽认为脱离中央系属绝对不可者，但奉吉已被日军占领，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因此，始以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电

稿交彼持去(如何处置则不明)。翌日,即派梁朝栋、王树声去北京面见张学良,陈述回哈后一切经过,并请其速定办法,以免别生枝节(因在回哈车中曾与罗振玉相遇,彼语言间似有成立某种政权之意)。学良告以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其后白武清一〔晴吉〕令对黑龙江省治安及马占山不再攻击日军负责。当告以日军如不进攻,彼亦可不行反攻。白武应允不再进攻而去。予召派英顺赴江省暂维治安,更劝马占山退据海伦。一九三二年二月,[①] 予偕马占山赴奉参加日本关东军所召开之会议,与熙洽、臧式毅等决定即时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予任会长,暂维治安。当晚九时,日方忽令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关东军提出之市民请愿书,请溥仪主持政务,并告以军方已决定赞助此举。因而对此不仅无可审议,且系突然发生,无暇详加考虑,遂决定予及市民代表等前往请愿,尔后予回哈埠。三月一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任执政,[②] 郑孝胥任国务总理。

回想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信国联,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的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

① 马占山于 1934 年 4 月之《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中对此有如下记述:"当(1932)2 月 16 日,占山为明了日人制造满洲伪政府之真相起见,又因日方邀请,冒险赴辽宁会议。翌日晤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据称,东三省大部已被日军占领,仅吉、黑一小部分,谅难抵抗,希予日方合作等语。是晚,又强迫在赵欣伯宅会议……"据此,所谓四巨头第一次会议是在 2 月 17 日晚召开的。

② 1932 年 3 月 1 日张景惠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表伪满洲国成立宣言,3 月 9 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执政。

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三月一日〔三月九日〕伪满宣告建国时，予任军政部总长兼参议府议长。在总长期间，成立奉天、吉林、黑龙江、哈尔滨、热河、兴安各警备司令部，其后改为第一至第五及兴安各军管区，并完成部队编制及事务条例等。一九三四年改为康德元年时，曾命各军管区部队之一部参加在长春举行之大典观兵式，又曾被命为特命检阅使，检阅奉天、吉林、哈尔滨、黑龙江各军管区司令部，并其附近驻军、学校之一部，暨禁卫步兵团与军政部之实迹，更计划实施黑林镇南岭间之秋季大演习等。至于参议府所司事务，系代溥仪审议各部院之兴革事项，故予任内除由副议长暨有关参议，对各部院兴革事项加以审议，由予转奏外，并无其他活动。一九三五年任国务总理兼协和会会长期间，虽有十年之久，但只记得下记各事：

(1) 撤废治外法权，收回铁路沿线各附属地(除大连至长春线者)；统一警察权。

(2) 统一伪满国有各铁路，委托日本满铁统一经营。

(3) 改组各部(详情不记得)。

(4) 颁布国兵法、勤劳法、粮谷出荷法。

(5) 兴修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哈尔滨至大连公路。

(6) 筹办伪满建国十周年祝典。

(7) 对汪精卫访问伪满曾奉命往南京答礼。

(8) 曾赴日本出席日本召开之大东亚会议，与会者有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度、汪精卫各代表，通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宣言。

(9) 派遣赴西欧视察团。

（10） 日本东京被炸后，曾以粮食若干慰问。

关于协和会事务，由本部长负其全责，予无任何活动。〔下略〕

119—2—1134，1，4

王子衡检举张景惠的材料

(1954年5月14日)

(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事变后,日寇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即访张景惠(当时的东省特别区长官)于奉天的私宅,秘密协议。说明北满因有苏联的关系,日寇一时不便进军,要求张景惠速回哈尔滨,维持地方治安,保护日本侨民;日寇拥护张景惠为东北最高首领。张景惠当场允许,即从日寇手中领出大枪三千支,[①] 子弹若干万发回哈尔滨。首先组织保安警护队,委于镜涛为队长,并拉拢马占山等进行东北独立工作。板垣征四郎又通过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秘书官松本益雄,[②] 与张景惠密议数次,达成协议。条件是:(一)张景惠组织东北政府,发表声明脱离中国,实行自治,凡事和日本直接交涉,日本拥护张景惠为东北最高首领。(二)军事共同,由日本军官担任教练并指挥作战。(三)政治独立,但须用日本人为顾问。(四)经济提携合作。(五)铁路共同经营管理。(六)允许日本人买土地,任意杂居。这些条件张景惠都已签字。但声明东北政权成立后才能生效。当时张景惠以为自己力弱,恐难单独组织政府,想从天津把张作相接回共同

---

① 据于镜涛供认,此时张景惠向板垣要求并得板垣同意给三千支枪,于十月由于镜涛派王嘉瑞从奉天关东军司令部领回的。

② 根据张景惠1953年4月所填登记表记载,"九·一八"后,经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介绍,松本益雄始充当张景惠的秘书。

合作。后来张作相没能回来，张景惠即于一九三二年二月间，以东北政务〔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委员为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正式宣布东北脱离中国，实行独立自治。一方面又率同所谓各团体代表赴旅顺，请愿溥仪出来，执政东北，建立伪国。以上事实都是松本益雄（伪满国务院 秘书官）对我说的，并且张景惠也亲口对我说过这事。因为张景惠当伪国务总理时，往往感到日寇的压迫，曾牢骚地对我说："当年日本人允许我的条件都不履行。"我问：什么条件？张景惠就说出上述六项条件的大意。并说双方都已签字承认。原议是"政治上我方为主，彼方为客，其他事情共同合作，平等同权。现在他们反宾为主，独断专行，真是无法……"张景惠出卖祖国，出卖民族，不辩自明。

（二）一九三八年春季，张景惠想往华北伸张势力，为日寇巩固后方，派松本益雄（伪国务院秘书官）赴天津见张作相，要求他出来组织华北政府，日本必然拥护他为华北最高首领。同时又见日寇驻华北军司令官等斡旋此事，以便促成所谓"满华一体"。后来虽然没成事实，但张景惠的甘心卖国，百口莫辩。

（三）一九四三年度，伪满粮食的"出荷量"日寇原定计划为七百二十万吨。但张景惠说："今年的年景不错，可望丰收，出荷量不妨增加一些"（松本益雄对我说的）。因此，这年的出荷量又增加三十万吨，而为七百五十万吨。张景惠并常常对日寇说："我是庄稼人出身，明白庄稼地的事情，这样大的满洲国，那有粮食不足饿坏人的道理……。"因此，粮食出荷量年年增加，最后一九四五年增加到九百万吨。

（四）　伪满强迫人民供出劳工，年年增加。张景惠在伪省长会议和伪满协和会中央联合协议会及其他各种场合，常常说："亲邦日本皇军在前线战场上，为保卫大东亚和巩固我国的安全，天天

拚命流血。这样神圣的牺牲,我们实感痛心。我们在后方平安无事,实觉惭愧。所以应当好好劳动,流点汗水,算不了什么。食粮配给偶然地差一点,大家紧紧裤带就过去了……。"因此劳工供出越来越多,人口死亡增加不已。

119—2,1134,4,第31号

于镜涛检举张景惠的材料

(1954年5月26日)

一　投敌的罪行

(一)当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他在奉天勾结日本浪人新井,得与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见面。他要求担任北满治安的维持,与日本合作。得到板垣的许可,就回到哈尔滨,以东省特别区长官的名义,召开地方各机关和各法团的会议,成立哈尔滨治安维持会,由他担任会长,发出通电,声明脱离中央政府,与日本人合作。[①]

在九月末,[②]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政治部长驹井德三、大桥哈尔滨总领事、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馆附宫崎繁三郎少佐等,在哈尔滨市地段街日本饭馆武藏野与张秘密会议,张在口头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是经济合作,铁路共管,森林和矿山的开采,聘请日本人的军政顾问与日本移民等项。出卖了祖国和人民的一切权利。

(二)在十月初,他为保护个人和哈尔滨市日侨的安全,并镇压人民反抗运动,向日本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要求武器扩充实力,由

---

① 据满铁哈尔滨事务所《关于哈尔滨地方情况的记事》记载,张景惠于1931年9月24日由奉天返回哈尔滨,9月27日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张景惠为会长。

② 据《关东军特务部沿革概要》记载,应是1931年12月末。

日方发给步枪三千支，成立了队长以下的约三千余人的警备队，驻在哈尔滨市和四郊，做镇压人民的工作。

在十一月初，吉林省政府在哈尔滨市设立，被他驱逐退到宾县。

在十二月下旬，丁超、李杜在哈尔滨发动抗日运动，他坚持与日本人合作，并不参加这个运动，坐视丁、李的失败。

他一贯维护日本，对于日本侵占东北，他说不怨日本人，都怨张学良把日本悬案推给蒋介石，日本人要求解决，却置之不理，日本人没有法子，才这样来做。我们要与日本合作才行。这是他做的反动宣传来迷惑人心。同时他还勾结张作相脱离张学良来东北，共同谋夺东北政权，来作日寇的侵略工具，出卖祖国。

(三)在十一月，他为巩固日本人对他的信用，一方面向日方保证马占山能受他的指挥，一方面乘马占山江桥抗战失利，与地方劣绅吉祥勾结，威胁马占山离开黑龙江省城，并派英顺带警备队占领该地。以后又用黑龙江省长职位来诱马占山与他共同合作，就在松浦镇与马会面，约定两人共同一致来处置东北问题。马一时的为他诱惑，影响了抗战意志。

二　建立伪满经过

(一)在他与马占山在松浦镇会面后，决定进一步地来出卖东北。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他与马占山会同奉天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在奉天开四人会议。这个会议在汉奸赵欣伯家中开的。当时举他为东北政务〔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发表宣言，脱离中央政府，东北自治独立。

(二)在四人会议当天晚间九点钟，由他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伪满洲国，迎请溥仪担当伪政权的执政，就由他率领东北各法团

林鹤皋等，到旅顺向溥仪表示伪民意的拥戴。在那时候他是不择手段的来出卖祖国，为自己打算谋取相当统治地位。〔下略〕

119—2—1134，4，11

金名世检举张景惠实行鸦片毒害政策的材料

(1955年6月3日)

一 鸦片毒害政策的开始

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关东军就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并是弱种亡身的唯一工具，遂决定采用鸦片毒害政策，以祸害东北人民。当由关东军征得伪临时执政溥仪的同意承认实行这种鸦片毒害政策。即于一九三二年的秋季，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言说鸦片是满洲人民所嗜好的东西，政府为应人民的需要，准许人民领取执照栽培罂粟；领取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鸦片由政府专卖，预定在一九三三年度实行。即由该驹井德三同伪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等积极筹备，更由伪总务厅法制局制定鸦片专卖条例，由伪国务会议通过，更经伪参议府会议，由伪议长张景惠和各伪参议的同意通过，在同年冬季即由伪临时执政溥仪裁可，公布实行。当于一九三三年设置伪专卖公署于长春，由伪临时执政溥仪任命姜恩之为专卖公署长，隶属于财政部。并设置各专卖支署于各重要城市，专管鸦片专卖各项事务。更由伪财政部大臣熙洽指定各省鸦片批发人。批发人的营业地点定名为鸦片批发处。复由奉、吉、黑、热各伪省长指定各该省的鸦片零卖人。在第一次各省所指定的鸦片零卖人是一千三四百名，吉林省是三百六十几人。当第一

次鸦片零卖人指定后,各省要求增加名额,复经伪财政部增加各省鸦片零卖人名额约共三百名左右。在鸦片零卖人须具有三千元保证金才有申请的资格,他的营业场所定名为鸦片零卖所。当时并由伪专卖公署组织大满号和大东号两个大烟土庄,专事搜集各地方所生产的鸦片。在大东号则专管搜集伪满东部地区所生产的鸦片,大满号则专管搜集伪满西部地区所生产的鸦片。把种烟人民所生产的鸦片掠夺到手,提供于专卖公署发交各省鸦片批发处,供给各鸦片零卖所来做毒杀东北人民的买卖。自从各省鸦片零卖人指定后,零卖所即开始营业,张灯供客。旧日之烟禁从此大开,使东北人民日益沉沦于鸦片毒素之中而走向于死亡道路的人是不知有若干万人。

在伪满政府实行鸦片专卖制度,一面是为收取重税,广开财源;一面是执行日寇的毒杀政策,消灭东北人民。是以当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实行的时候,对于栽种地域并无限制,是凡伪满境内到处均可栽种,迫使人民领取鸦片栽种执照,大量栽培,以便达到它多收税金和多收烟土的目的。至于在这个专卖阶段,每年所栽培鸦片面积的土地数目,以及每年的鸦片收获量数,伪满政府是保守秘密的,向不在伪政府公报和报纸上发表,只有主管其事的伪官吏方可知其底蕴,在局外人是无从知晓的。不过按当时的情况,栽培土地的亩数和每年收获量数,都须有很大的数字。这是伪参议府议长张景惠通过鸦片毒害办法,伪临时执政溥仪公布鸦片专卖条例开始实行鸦片毒害政策的大概情形。

二 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

鸦片专卖制度实行五年,伪满全境到处都能看到罂粟花的开放。似此大量栽培毒物,有违当时的国际公约,因之致招国际间的责难,以及世人舆论的攻击。伪满政府为逃避这种责难和转变舆

论攻击起见，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但因鸦片是大利所在，又为日寇毒杀东北人民的主要侵略政策，在根本上是不能够放弃的。乃于一九三八年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同伪总务厅长星野直树策划之下，一面欺骗世人宣布禁烟，一面把种烟地域化散为整，加强管理机构，以期一举两得的办法，当即请准伪皇帝溥仪的裁可，遂用敕令公布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随之成立伪禁烟促进委员会，由张景惠任会长，星野直树任委员长，伪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任干事长。即由该禁烟促进委员会起草制定危害人民的“禁烟法”。这个法律制成以后，由伪皇帝溥仪用敕令公布，并由星野直树对国外放送，大吹大擂，言说伪满洲国从一九三八年起开始禁烟，每年递减鸦片栽培面积，到第八个年度就不栽种鸦片，到第十个年度就把所有鸦片瘾者完全戒除，企图淆惑国际观听，转变世人耳目。更由伪国务院派谷次亨带领伪总务厅秘书官崔正儒、伪总务厅参事官雍善耆等到各省重要城市宣传禁烟，替日寇张目，作欺骗人民的工作。

根据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的规定，伪满政府于一九三八年设置禁烟总局，并任命袁庆濂〔清〕为禁烟总局长，直隶于伪民生部，当把专卖公署所掌管鸦片专卖的业务完全拨归伪禁烟总局接管；同时并取消各省的鸦片批发人以及搜集鸦片机关大满号、大东号；并把官督民营的鸦片零卖所一律改组为管烟所，由各市、县、旗直接经营管理，所有种烟、收烟、卖烟的业务，统归禁烟总局领导监督，也就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统一办理。因之，对于栽种鸦片的省份加强机构，在伪热河省公署和兴安西省公署，均设置烟政科，隶属于伪民生厅内，领导当省的种烟、收烟事务。并于栽种鸦片的各县、旗都添置烟政股，执行本县的种烟、收烟业务。更在种烟的各县、旗一律成立鸦片生产组合，办理鸦片生产和集体缴烟的

事务。同时,由伪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市、县、旗都添置禁烟科或禁烟股,专司卖烟的业务。由于这种种措施,伪满政府就更进一步完成榨取种烟人民所生产的鸦片,和以鸦片毒素危害东北人民的密网。

更在伪禁烟总局成立后,即开始实行鸦片瘾者的登录。当经先后两次登录的结果,共登录鸦片瘾者是九十九万余人,也就是差一个人不满一百万人。已登录的吗啡海洛英瘾者是四万五千人,两者统共是一百零四万余人。自从实行鸦片瘾者登录后,对于已登录的鸦片瘾者,由伪禁烟总局发给登录证每人一份,到所住附近的管烟所登记,每日持证到管所领取当日所配给的鸦片烟份,在该管烟所里吸烟。对于未登录的鸦片瘾者根本不配给鸦片烟,倘被查出吸烟时,则按私吸鸦片治罪。在实行鸦片瘾者登录的时候,伪满政府因为把榨取种烟人民所得来的鸦片提出一部分,作为对外贩毒做暴利的买卖,所以当时对于未成年的鸦片瘾者和鸦片瘾轻微的人约有五十万人左右,一概不予登录。而伪满政府反大肆夸耀宣传,言说这是根据人道主义,不让青年人长此中毒,所以不予登录。这种谎言,真是卑鄙龌龊无耻已极。所有这些都是伪满政府公布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后所作所为的简要事实。

由于这些事实,就可以知道伪满政府实行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并不是真正根本禁烟,而是盗用禁烟的美名,企图欺骗世人转变舆论,在禁烟的烟幕笼罩下,加强种烟、收烟、卖烟的严密组织管理,完成了榨取鸦片和毒害人民的进一步工作。并实行鸦片瘾者的登录,利用有一百万瘾者的存在,更是最好的借口,以便大量栽培鸦片。一面作为对国内毒害人民的需用;一面作为向国外贩毒暴利的资本。这是打算望长久远做此毒害人民的发财大买卖。对于禁烟问题,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在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大纲”开始实行的时候，对于种烟地域，伪满政府指定热河省和兴安西省一部分地区为栽培鸦片地域，其余各省一概不准栽种，这是把种烟地域化散为整，纠正以往散漫栽种而变为集中的栽培，以便于容易经营管理，并可避免世人耳目。在一九三八年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第一个年度，伪满政府规定热河省鸦片栽培面积是三十六万亩土地。当由伪热河省公署接到这项命令后，经伪省政会议指定西部国境线兴隆、滦平、丰宁三县暂时不许栽种，以免鸦片流出华北。其余各县、旗必须一律栽种。当把伪中央所规定的三十六万亩土地数字分配于各县、旗，命由各县、旗直接强迫人民领取栽培鸦片执照实行种烟，当人民领取栽培鸦片执照的时候，征收栽培鸦片特税每亩土地五元，也就是未种烟先纳税的苛敛办法。并按土地的等级缴纳鸦片的多寡。当时的规定是，上则地每亩应缴纳鸦片十五两，中则地每亩应缴纳鸦片十二两，下则地每亩应缴纳鸦片八两。至于鸦片收买价格，是在每年割烟的时候，则由经济部临时指定，当时称之为“指定价格”。也就是以最低价钱把种烟人民所生产的鸦片掠夺到手，而对种烟人民的疾苦则不闻不问也。这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皇帝溥仪制定公布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和危害人民的“禁烟法”，是冒着禁烟的美名而加强加深危害东北人民的大概情形。

三　扩大鸦片栽培地域加重奴役东北人民

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实行到第四年的时候，适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进攻南洋各地，因为制造麻药的需要，而鸦片成为军用的重要物资。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以此为词，向伪满政府索要大量鸦片。当于一九四二年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合意之下，谁准伪皇帝溥仪，为应日寇的紧急需要，乃派古海忠之送去鸦片五

十万两。以后每年为例,有增无减。于是,伪满政府最高当局张景惠、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为便于日本帝国主义予取予求起见,遂决扩大鸦片栽培面积,加重奴役东北人民,为日寇栽种鸦片。不但把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大纲”所规定的每年递减栽培面积办法完全推翻撕碎,而恢复了热河省和兴安西省所递减的面积,并且重新指定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的鸦片栽培地域,实行集团栽培办法。在一九四二年,奉、吉两省的鸦片栽培面积是各五百陌。每陌等于十五亩。四平省的鸦片栽培面积是三百陌。一九四三年奉、吉两省的鸦片栽培面积是各七百陌,而四平省的栽培面积是五百陌。在一九四四年奉、吉两省的栽培面积是各一千陌,而四平省是七百陌。在伪满崩溃的一九四五年,奉、吉两省的鸦片栽培面积是各一千五百陌,而四平省是一千陌。自从扩大鸦片栽培地域后,每年递加诛求无已。吉林省的鸦片栽培地点是乾安县。至于所谓集团栽培者,就是限制各该省指定一个县内的最少数村来栽培鸦片,不许分散多县多村栽培,这是便于伪政府易于监督管理和集货,防止鸦片流出的毒辣办法。此是一九四二年伪皇帝溥仪、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扩大鸦片栽培地域,加重奴役东北人民,替日寇生产大量鸦片,协力日寇进行侵略战争的大概事实。

四 大批贩毒危害中国内地人民

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一面是为毒杀东北人民,一面是认为鸦片是大利所在,作为对外贩毒暴利的财源,故当鸦片专卖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不分地域不规定一定的栽培面积,只是强迫人民大量栽种,多多益善。虽然自一九三八年起,实行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规定栽培面积,限制了栽种地域,并由伪禁烟总局成立后,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两年,曾把已经登录的鸦片隐者分批戒除三十七、八万人。但是,对于鸦片的栽培面积不但未予减少,

而在一九四二年更行扩大。这就完全暴露了伪满政府为保留一部分鸦片瘾者好作为借口，以便大量栽种鸦片，向国外贩毒发厥横财的事实。当时贩毒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内地。在伪皇帝溥仪、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领导下的伪满政府，向国外贩毒的事情是不知有若干次的。仅就我个人所知道的最后三件，特为检举说明如下：

（一）　伪满政府在一九四四年春季，卖给德意志希特勒法西斯政府鸦片六十万两。关于这批买卖两国双方的经手人：在伪满政府方面，是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德意志政府方面，是德意志驻伪满公使华根纳。这项鸦片卖妥后即于当年春季交由华根纳点收，因为德国潜航艇未能即时来取，曾由德国公使馆出款在沈阳建筑专用仓库保管。

（二）　伪满政府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初旬，卖给南京伪国民党政府鸦片三十万两。双方的经手人：在伪满政府方面，是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南京伪国民党政府方面，是驻伪满大使陈济诚。双方交易讲妥后，由陈济诚在十月间把这项鸦片点收，亲自运往南京。关于此项鸦片，伪满政府的卖价每两是五十元，而伪满政府在该年向种烟人民收买鸦片的价格是：特等每两十八元，一等每两十六元，二等每两十四元，三等每两十二元。当时伪满的鸦片私行市每两是六七百元，想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暗行当必更高。在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购买这批鸦片做暴利的买卖，当然是毒害中国内地人民，则又不问可知了。

以上两项事实，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到民生部大臣伪职，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间，伪禁烟总局烟政科长张明徵代理伪禁烟总局长李叔平，向我报告该局行政概况后，在杂谈中所谈及的。在张明徵说后，嘱我不要向外说出。因为伪满当时对于职务上所

知道的事情如有泄漏是有责任的。我乃告述他，出君之口，入我之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三） 一九四五年二月上旬，伪满政府卖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吗啡一吨，是由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亲自送到北京，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交货。关于此事是一九四五年我在伪厚生部大臣任时，伪厚生部次长关屋悌藏在四月初旬的某日到我办公室中杂谈，因我问他对栽种鸦片的人民有无配给物资，他说同粮谷出荷一样，也是配给棉布、棉线。因为谈到棉布的问题，他乃说出二月初旬，伪满政府卖给华北政务委员会吗啡一吨，是古海忠之亲自送到北京交货。他并说出这吨吗啡是由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所制造的，在制造这吨吗啡时，是需要三百吨煤的火力等等。这是古海忠之代表伪满政府，向华北贩卖大宗吗啡毒害中国内地人民，而由他的同伙亲密的朋友关屋悌藏所亲口说出的，这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五 榨取鸦片瘾者劳动力

伪满末年劳役繁兴，在一九四四年征用劳工已达一百六十万人，而伪满政府犹以为不足。于是伪满政府的日寇当局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长古海忠之、伪民生部次长关屋悌藏等，认为已登录的现存鸦片瘾者五十万人，以及鸦片潜伏瘾者（无鸦片登录证而私吸鸦片的人）约一百二十万人，两者人数庞大，是具有劳动力的潜在力量，因而想出榨取鸦片瘾者劳动力的办法。但因征用鸦片瘾者的劳动力，其先决条件，必须先把瘾者的烟瘾戒除，然后才能有担负劳动的能力。因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乃商得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同意，于当年冬季由伪国务院法制处、企划局和伪民生部联合起草制定鸦片断禁法，以便根据这个鸦片断禁法而成立伪鸦片断禁协会，实行一部分鸦片瘾者的

戒烟。大约在十一月间起草完了，经火曜会的次长会议通过。于十一月下旬，由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提出伪国务院会议，由他说明立法理由后，经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咨问各伪大臣的同意一致通过。复于十二月十日左右，提出伪参议府会议，经伪议长臧式毅和各伪参议的同意一致通过。遂由伪皇帝溥仪裁可，而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的日期用敕令公布实行。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于静远调任伪经济部大臣，由我任民生部大臣伪职，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后开始办公。我因看见伪政府公报公布这个法律，用我的名字同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副署，当时是很诧异的。因问伪民生部次长关屋悌藏，经他的说明，才知道以上的经过事实。因为公布日期我已到任，故用我的名字。

迨同年三月十二日，伪满政府中央机构改革，废止民生部，成立厚生部、勤劳部，由我任伪厚生部大臣，同日并成立伪鸦片断禁协会，由我以伪厚生部大臣名义兼任伪鸦片断禁协会总裁。伪满政府并任命刘绍裔为该协会理事长。更由伪国务院把以前伪禁烟总局所管，已经荒闭数年的康生院一共一百八十处，拨归伪鸦片断禁协会，重新整备经营作为戒烟场所。在伪鸦片断禁协会成立开始办事后，即由该协会派人到各市、县、旗，接收已经荒闭的旧康生院，进行整备修葺，配置人员医生，准备开业戒烟。对于所用戒烟药名“东光剂”，是由日本某医生所发明，经试验对戒除鸦片烟瘾具有特效，由伪满政府收买其发明权，给予代价一百万元，并赠给勋章，由我代表伪满政府在伪厚生部礼堂授予。当即由伪厚生部次长关屋悌藏与日本大阪制药会社订立代制戒烟药“东光剂”合同，预定在一九四五年是二十万人用份，十月末旬交货。一俟各康生院整备妥当，戒烟药到，即根据鸦片断禁法分期戒烟。在伪满政府成立伪鸦片断禁协会执行戒烟任务的真正使命，就是专为榨取鸦

片瘾者的劳动力，并不是对鸦片瘾者的普遍戒烟。所以戒烟的对象，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壮年瘾者实行。以待把鸦片烟瘾戒除，即由伪勤劳部编成劳工队，派到治水、筑路以及各种厂矿，担负各种劳作，而与被征用的一般劳工同样为日寇做奴隶劳动。这是伪满政府对鸦片瘾者实行戒烟的真正目的。当时更由伪厚生部次长关屋悌藏，同伪总务厅监察参事官王纯古，鼓动鸦片潜伏瘾者一百二十万人应当登录的空气，以作将来正式登录的账本，待实行登录后，即按其年富力强者实行戒烟，以便榨取劳动力。所幸者这种危害人民的办法正在进行之际，而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打垮日寇，伪满崩溃。这是我所知道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命令制定危害人民的"鸦片断禁法"，经伪皇帝溥仪咨询伪参议府裁可，用敕令公布实行，成立伪鸦片断禁协会，着手榨取鸦片瘾者劳动力的经过事实，故特检举有如以上所述。

六　鸦片的集货

关于鸦片集货问题，据我个人所知道的是为两个时期。就是从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实行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这五个年度的鸦片集货，是由大满号和大东号直接向种烟人民收买鸦片。当每年鸦片成熟收割的时候，由大满号和大东号到种烟的各县、旗设立出张所，办理鸦片的集货业务。同时并由各地方的专卖支署派有缉私队，督促种烟人民把所收获的鸦片尽数卖给大满号和大东号，不准种烟人私自保留，私相贩卖，以政治的压力胁迫这两个大烟土庄搜集鸦片。在缉私队更有稽查鸦片走私和搜查种烟人民私藏鸦片的权限。因之，致发生扰害种烟人民的事情是不知有若干件的。这是关于鸦片集货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对于鸦片集货虽然不知每年究有若干，但是，在该时期是伪满全境普遍栽培鸦片的时代。就事实来判断，鸦片的产量和伪满政府掠夺到手

的集货数量，当然是很大的。迨到一九三八年伪满政府实行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后，则对鸦片的集货是由伪禁烟总局直接办理。到割烟的时候，派工作人员到热河省和兴安西省种烟现地，指导种烟县、旗的鸦片生产合作社办理集货业务，实行集体缴烟办法。对于稽查鸦片的走私流出，则由该管地方警察担当取缔的责任，而取消了以往的缉私队。在一九三八年因在割烟的时候霪雨成灾，致使鸦片欠收。在该年热河省的鸦片集货数量是三百四十万两。据说兴安西省因与热河省受同样的灾害，该年的鸦片集货数量是二十五万两。该年度伪满政府的鸦片集货总数量是三百六十五万两。在一九三九年热河省的鸦片集货数量是四百五十万两。据说兴安西省该年的鸦片集货量是六十万两，该年度伪满政府的鸦片集货总数量是五百一十万两。在伪满崩溃的前一年，就是一九四四年伪满政府的鸦片集货数量是七百万两。据伪禁烟总局所报告，这是实行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后，最高的集货量。在每年鸦片集货后，即在现地包装，由伪禁烟总局直接运往中央，以一部分发交奉天、铁岭、绥化三个鸦片烟膏制造厂，以便制造鸦片烟膏做成烟份，发于各市、县、旗管烟所，来做毒杀东北人民的买卖。尤其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比较完备，并能制造吗啡、海洛英等毒物。其余的一部分鸦片则解往中央，由伪政府直接保管，作为对外贩毒暴利的资本。掌管这个鸦片经济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掌管经济部门的次长。伪满最后几年直迄崩溃，就是日寇古海忠之。这是在伪皇帝溥仪、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领导下的，伪满政府掠夺榨取种烟人民的大概事实。

七　鸦片特别会计

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以最低的价格把种烟人民所生产的鸦片榨取到手，再以最高的价钱卖给吸食鸦片的瘾者，和做对

外贩毒暴利的买卖，在此一转易之间就获得了最大的差额利润，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鸦片专卖开始实行的时候，伪满政府就把鸦片会计定为特别会计，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掌管。对于鸦片的收支是关防严密的，在局外人是无从知其详细的。在伪满的初年，听说伪专卖公署长姜恩之向伪财政部大臣熙洽报告，在鸦片专卖第一个年度，就是一九三三年鸦片的收支相抵外，就有六百多万元的盈余。在第二年度，就是一九三四年更是蓬勃直上，有将近千万元的利益。大概以后每年都是递涨，有升无降。在伪满建国的初年财政是困难的，伪满政府得到这笔从毒害人民所得来的巨款，而用之于巩固其伪政权的政费，有如“治安工作费”“讨伐费”来镇压东北人民。就伪满政府说来是有极大的补助；就人民说来这是何等惨痛的事情。迨一九四五年我任伪厚生部大臣，在四月的某日，伪厚生部次长关屋悌藏到我的办公室中杂谈，因谈到鸦片特别会计，他说在一九四四年度对于鸦片的开支统共是一亿一千多万元，而鸦片的收益是三亿元，除了鸦片支出外，则一九四四年度净剩纯益一亿九千万元左右。似此庞大巨款，想像绝对不归伪满政府所独得，当必与关东军两方平分赃物。所以伪满政府的鸦片特别会计，在个人认为是与日寇关东军有密切联系的。这也就是日寇关东军所以使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的一部分原因。至于在伪满政府中，日寇伪官吏与鸦片特别会计最有关系的就是古海忠之。他在伪满政府成立的时候，就任伪总务厅主计处科长。在一九三八年实行欺骗的“鸦片十年断禁政策”时，他任伪总务厅主计处长。以后任伪总务厅次长，掌管经济部门，是鸦片特别会计的最高责任者。这是仅就我所知道鸦片特别会计的一部分事实，特为检举说明如此。

八　鸦片毒害政策对于人民的损害

伪满政府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实行鸦片毒害东北人民的结果，致使东北人民直接间接所受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是无法算清的。当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实行的时候，就由伪专卖公署印发大批鸦片吸食证，交由各地方伪警察机关代为公告，准许人民请领。在人民请领之际，只须交纳鸦片吸食证工本费五角，该证的有效期间半年，并不过问鸦片烟瘾的有无，更不限制年龄的老少，随意领取。领鸦片吸食证之后，就可到鸦片零卖所公开吸食鸦片。其领鸦片吸食证领烟在家中吸食者也可，广开吸烟方便之门，驱使东北人民大量中毒而走向衰弱死亡的道路，以消除其对民族压迫的反抗斗争意志。这种既榨取其金钱，又摧毁其身心的办法，手段的毒辣是无以复加的。这种恶毒办法行之数年，竟使东北人民原来本无鸦片瘾而新染鸦片嗜好中毒者，就有二百六七十万人之多。更因政治黑暗，社会不良，女子没有生活出路，因为有了鸦片零卖所，而青年女子到鸦片零卖所里充当女招待，过着堕落寄生生活的，更不知有若干万人。

东北地域在旧政权的时代，虽由军阀统治，政治未上轨道，但对烟禁是严厉的，对于栽种罂粟，贩卖鸦片，吸食鸦片，都是律有专条。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够抽大烟者，只是占统治地位的人和有势力的资产阶级人物，至于一般的人民则是绝无仅有为极少数的。据当时的统计，全东北的鸦片瘾者至多不过二十万人，迨日寇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从一九三三年起到一九三九年六个年间，在伪禁烟总局实行鸦片瘾者登录时为止，正式登录的鸦片瘾者欠一个人是一百万人，吗啡瘾者是四万五千人。并在登录的时候，伪满为把榨取种烟人民所得来的鸦片作为对外贩毒获得最大暴利的资本，因之对于烟瘾较轻即抽“耍烟”的人和未成年人的鸦片瘾者约五十万人，一概不予登录。这是仅就伪禁烟

总局在一九三九年实行登录时所知道的，在这六个年中东北人民染有鸦片嗜好中毒的，就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之多。至在实行登录时而未要求登录的，当必也有相当的人数。更据伪禁烟总局在一九四四年的调查，伪满全国的鸦片潜伏瘾者(没有登录证而私吸鸦片的人)约共一百二十万人。由此看来，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仅据伪满官方的统计，染有鸦片中毒的就有二百七十四万五千人。至于因染有鸦片嗜好中毒而死亡的人，根据伪禁烟总局的统计，自一九三九年鸦片瘾者登录后，到一九四四年六个年间，所正式登录的鸦片瘾者一百万人中共死了七万人；吗啡瘾者四万五千人中共死亡了四千人。其在伪禁烟总局成立以前，就是自一九三三年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一九三八年这六个年间，是在伪专卖公署管理的时期，当时只是发给鸦片吸食证，驱使人民吸食鸦片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并未实行鸦片瘾者的登录，想在那个时候对瘾者的死亡，是不能够有统计的。但是在那个时期，吸食鸦片的人和吗啡瘾者最少已经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以登录后六年间一百万鸦片瘾者死亡七万人作为标准，可以推定一百五十万瘾者在六年间的死亡数是十万五千人，也就是从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开始，到伪满崩溃十二年半的期间，被鸦片所毒杀的人民，最小限度是十七万九千人。这就是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使东北人民大量中毒，以及因中毒而死亡的大概事实。

其次，种烟人民的损害，在伪满政府对种烟人民是完全采用榨取的手段，每年在鸦片成熟割烟的时候，以最低的价格强行收买种烟人民所生产的鸦片，在种烟人民所得到的代价是不够维持他的起码生活水平，这就标志了伪满政府是白白榨取种烟人民的劳动力，而替它生产大量鸦片。〔下略〕

119—2—1134，4，61

臧式毅笔供

(1951年7月)

姓名:臧式毅。性别:男。年龄:六十七岁。原籍:沈阳县城南三道岗村。现住所:长春市柳条路三〇七号。〔中略〕

个人详细履历

一九一二年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少校马术教官,一九一三年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少校学生连长,一九一四年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

一九一九年黑龙江督军署上校参谋。一九二一年吉林督军署上校参谋兼卫队团团长,一九二三年吉林督军署少将参谋长。一九二四年奉天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一九二五年奉天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一九二八年奉天兵工厂总办,一九二九年奉天兵工厂中将督办。一九三〇年辽宁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任伪满民政部大臣兼奉天省长,一九三五年任伪满参议府议长,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捕。

在各职务中间具体措施具体说明:

自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一二年在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充教官,前后七年。于一九一九年转黑龙江督军署上校参谋,从事幕僚职务。一九二一年转任吉林督军署上校参谋兼充军署卫队团团长,仍从事幕僚职务并担任省垣及军署之防卫。一九二三年任吉林督军署参谋长,任职未久,因督军孙烈臣病故,继任者张作相新旧交

代后，于一九二四年调充奉天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专从事于军事之整理及军队之教育训练等事。

一九二五年调充奉天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该公署自上将军以下有总参议、参谋长及各处而构成。自一九二六年张作霖上将军入关，总参议杨宇霆及各处重要职员多数随行，遂以参谋长留守奉天。张氏入关后数年未归，此数年间内乱不已，东三省军队大部分奉调入关。奉天全省治安关系重要，不能忽视，只以少数军队及省长所辖之警团队维持现状，以彼时之治安状态而言实觉武力单薄，只得会同省长责成现有之军警团队竭力维持，以图防患于未然。不过因内乱不已，战事频仍，前方军队需用浩繁，后方之供给维艰，取之于民用之于战，其影响人民之生活及地方之安全甚大。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旬，张作霖氏出关列车行至皇姑屯南满铁道线老道口铁桥下突遭爆炸，事后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经详细调查，确知系日本关东军派人在该桥下预先安设炸弹，炸死张氏，希图乘乱占领奉天。不过当时张氏仅身负重伤数处，入城后始因伤重致死。而日人之阴谋并未得逞，即所谓哄传各方骇人听闻之皇姑屯炸车案是也。当时奉天省垣全体大为震骇，以为大祸之来临，无不惊惶失措，甚至有纷纷避难者，商市有闭门者，秩序甚为紊乱。最可恨者驻奉天日本守备队亦取战时姿势，以为我方遭此惨变或有其他举动，彼则利用机会借口出动，以伸其魔手。值此一发千钧，危急振撼之际，为安定人心计，惟有对张氏之死秘不发表，一面力持镇静，严嘱各界各安生业，以维持秩序，而避其锋。不过各方面尚有未得真相者，当时中外人士纷纷前来探询，而尤以日本方面为甚，日本领事则一日数次用种种方法前来探问张氏之生死，其居心叵测，来意不良，甚为显然。幸全体严守秘密，未由我方泄露真相。东三省骤然遭此惨变，人心异常慌恐，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加以三

省长官均未在省，如黑龙江督军吴俊陞与张氏同车被炸，即时身死；吉林督军张作相率队在前方未归，更兼奉天大部军队由张学良等率领由前方陆续撤退中，尚未出关。三省政权无人主持，终非久计，不得不急电请张作相等速归，主持一切。彼时南北隔阂，遂会同省长刘尚清，商由省议会公推张作相主持三省政权，张作相力辞不就。遂又公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之死至此始正式发表。张学良就职后始为其父发丧，迄总司〈令〉部组织成立，余即转任奉天兵工厂总办。彼时杨宇霆为兵工厂督办。一九二八年冬当杨宇霆、常荫槐事件之发生，兵工厂卫队被缴械，省垣人心又大为震惊。因身居总办，惟有力持镇静，维持厂内秩序，以安人心。幸员工均能顾全大局，照常服务，照常工作，全厂未致糜乱，一场风波幸得平安渡过。

一九三〇年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当时在我方则内乱无已，在敌方则节节进窥，形势日见险恶。身任斯职以来，对于政治素乏经验，于省政毫无进展，毫无建树，只能维持现状。在以前张作霖时代，东三省采取割据政策，凡一切政治经济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独自为政。以后张学良主政，鉴于全国情势不统一不能一致对外，遂将东北各省政府均归中央政府节制。因这个重大的改变是于日本不利，所以日本侵略东北之情势也就益常加紧了。

查日本对我之外交向出以强硬无理之手段，并捏造事实，以图借口而逞其阴谋，中村大尉事件即其一例。一九三一年夏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突以中村大尉在屯垦区域内被该地驻在军队杀害，焚尸灭迹等语前来，提出交涉，态度异常强硬。当以事出一面之词，事之有无及其真相如何我方毫无闻知，并事关军事范围，俟转达军事主管机关调查真相后再议，此项交涉明知是遮近诬赖，任彼狡展多次，均未予以答复，则九·一八事变突发矣！此案虽

非事变之主因，亦系敌方捏造问题希图借口之一端。

日本侵略我东北之阴谋日甚一日，其军队竟假造问题诬赖我北大营兵士破坏其铁道，借口进兵，突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将半，炮击我省城东关兵工厂、东大营，并围攻北大营。当以事出仓卒，一面由我交涉署用电话向日本领事责问，并嘱其制止日军行动，迄无具体之答复；一面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因我方毫无抵抗，敌人竟得以节节进攻，于当夜辽宁省城即完全被敌人占领，我北大营驻军亦于当夜不得不向东边撤退。敌军入城后首先将警察缴械驱散。所有各重要机关亦均有敌兵把守，官厅失去作用，官吏失去自由。当此次事变时三省长官无一人在省，张学良在北京，吉林督军张作相因奔母〔父〕丧在锦州，黑龙江督军万福麟亦在北京。日人认为有机可乘，遂敢公然进兵。事实虽如此，然余身为疆吏，省城竟被敌军占领，人民惨遭屠害，事先既不能预防，事后又不能挽救，坐失城池，深感责任重大，终难辞其咎。十九日晨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将辽宁改为奉天，并派其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市长。

同日即有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者，带领宪兵及军队多人将住宅包围，大事搜查后遂将余逮捕拘禁于大西关五纬路鲍宅之楼上，闭锁于一室，以宪兵严重监视，内外隔绝，任何人不得会面，即家人亦不得通信，因此以后关于省内情状毫无闻知，完全失去自由三月有余。于十二月中旬某日〔十三日〕夜间突被释放，归宅后始知同被拘禁者尚有教育厅长金毓绂、实业厅长刘鹤龄，均分别监禁于别室，始终未得相晤。

此时省垣已设有治安维持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及委员数人主持省政。并由日本军派有顾问把持一切。次日突有日本关东军

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来寓，以强硬之口调传达关东军司令官之命，声称因为要请你担任奉天省长故将你释放，现正在商会开会推举云云。当以事出离奇，莫明究竟，遂坚词拒绝，无结果而散。同日午后，又有治安维持会高等顾问金井章次者，偕同维持会委员长及委员等来寓，声称委员会现已被解散，请旧任省长复职，并由该顾问声言日本军绝不干与内政，请即到省署就职云云。不容分说即将余一同拖至省署，时省署内外已布满武装宪兵警察。在这武装宪警监视之下，强迫就职。当以事变后被日本军监禁数月，各方情形毫无闻知，该大佐所谓商会开会是由何人召集，与会者何人均不得知。欲与各委员及关系方面详询究竟，该维持会亦于是日在武装宪警监视之下突被解散，各委员亦不得其真相。所谓商会开会者系假造民意，所谓不干与内政者，已派有顾问把持一切，竟受敌人之威胁欺骗而任职，措置失当，实属咎有难辞之处。当时对于前途尚希望中央政府对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以解决此重大问题耳。

余由日本军释放时起，即派有宪兵军曹横山政雄者长期跟随监视，美其名曰保护。该军曹出则同车，入则驻于宅内，公厅私宅任便出入，凡有来客访问须先告知该军曹，得其同意后方能传达接见。每次会客则进入客厅坐听，监视与客人之谈话。

就职后与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会晤谈及顾问责任问题，彼仍大言不惭，谓东三省人民遭旧军阀之虐政，民不聊生，日本为拯救三千万民众，将建设王道乐土；奉天省政既主持有人，日本军绝不干与内政，所派顾问纯系帮忙性质云云。实际上完全相反，不数日，原维持会之高等顾问由该司令官命令改为奉天省政府最高顾问，主持省政，所有各厅及各金融机关之顾问均归其统辖指挥。

在维持会时代省垣即有指导部之设，以于冲汉为部长。该部

全由日本人主政，全省各县之用人行政统由该指导部直接主持指挥，省政府对于各县只有监督权而已。当时地方之縻乱已达极点，认为恢复各地方之秩序为目前之急务，但全省军事统由日本军部直接统辖，东边及洮辽两镇守使之军队内已派有日本军官为顾问，所有指挥调遣均受该顾问等之节制，省方不能随时调用。全省警务机关亦均派有顾问指导官等。在各地驻在日军之区处统系之下归日本宪兵队之直接指挥，省政府欲谋恢复各地治安，进行诸多阻碍。

各地警察机构因事变而破坏残缺，又均亟待整顿，省政府只有财政实业两厅，拟设置警务厅一时未得认可，直待伪满政府成立后始得实现。而厅长一职又被日本人占据，所有一切警政名为隶于省政府，而事权仍归日本人掌握。

全省教育机构成为全部破产之现象，学校停顿，学生离散，校舍器材多半损失，学生长期失学，职教员长期失业，终非久计，所有各地各级学校有积极恢复之必要。省政府只有两厅，为谋恢复教育机构及各地学校起见，应速设教育厅，以便进行恢复工作。展转多日，设厅一时尚难做到，只认可先设教育筹备处。将着手组织，又派日本人坪川某为顾问把持一切，进行上又诸多障碍。但学校之恢复不容稍缓，当责成该处按当时地方治安状态，尽可能范围积极恢复各地之中小学，速召集职教员陆续复职开学，以免学生长期失学，职教员长期失业。然因受地方治安之影响，及金融机关均被日本人把持，致经费困难，诸问题进行颇费周折。教育厅之设，直至伪满政府成立后方得实现。

奉天省政因受指导部之影响，遇事诸多抵触，无法进行。认为省政府条例有修改之必要，提出后几经周折方得认可公布，始得将各县长归省政府直接指挥监督。

一九三二年新年前后日本军又逞其无厌之野心，进出辽河以西，相继占领锦州、山海关，至此奉天省全部被敌人占领矣。此后始将东边镇守使所部军队之一部调至奉天南部及辽西一带维持治安。

日本军司令部内设有统治部，专管对于我方政治诸问题。主其事者为该军部之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遇有重要事件时常与我方接洽者，均系该大佐牵头。

自日本军占领奉天全省后，该大佐声言为东三省组织问题须召集奉、吉、黑、哈各首领来奉天会议。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长马占山、哈尔滨长官张景惠，均由该大佐亲赴各该省召集来奉开会。时该大佐首先提出东三省要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就以各省省长、长官为委员，推举一人为委员长。结果遂决定成立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为委员，并推张景惠为委员长。该会成立时有驻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在场催迫，唯恐成立之迟滞。成立后要我们以各委员名义先打个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

酝酿多日之东三省建设问题，至此便由该大佐公然提出建设新的国家，定名为满洲国，并迎溥仪为元首。宣布后并言时日无多，各省长可回省准备一切，但须留下代表人员在奉天继续开会讨论以下各问题。各省长去后，代表人员即在奉天教育会内继续开会，所讨论者为国号(大同)、国都所在地(长春改为新京)、国旗(五色黄地)，国体问题有主张帝制者，有主张委员制者，所有各项问题均系由该大佐提案，所表决者亦是他的原案。再则每次开会席上均有日本军部参谋和知中佐及法律专家松木侠在场监视。在此种情形之下，名为开会，佯为征求意见，实则一方面宣布办法，我方又无具体意见，只俯首听受，任人拨弄，开会则徒具形式而已。时奉

天省长代表为实业厅长冯涵清、高等检查厅长李梨、省署参议金毓绂。日本军方且屡屡大言不惭的声言，日本为拯救满洲三千万民众起见，将建设王道乐土云云，满街贴出此等标语大事宣传。并在奉天省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设有靖安游击队，以日本人和田劲为队长，该队兵士只有千余人，本部内有政治宣传各部门之组织，每月经费较他队多至数倍，始则不知是何用意，其实分赴各地宣传建国工作，并召集各地商民代表来省请愿。

时已三月初旬，该大佐又令各省派代表赴旅顺向溥仪请愿，请其为满洲国元首。先后两次，始则拒绝，继则允就。于三月八日又经各省代表由汤冈子迎赴长春，遂于三月九日在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

各部总长之决定，各省长均须担任总长。我们以为地方官不能兼任中央职务，经一再讨论还是非兼不可，结果奉、吉、黑、哈各省长均分别担任一部之总长，仍兼各该省长。余遂被任为民政总长。

第一次国务会议首先讨论国务院及各部组织问题，所有院、部、各处、司、科等，均由日本人总务厅长驹井德三者详细列表提出，日本人职员之位置亦均指定。我们以政府内用日本人为职员事与总务厅长有所讨论，以为一个政府内用两国人为职员事先毫无接洽，毫无闻知，突然列表提出，认为有斟酌的必要。总务厅长厉声说，这是本庄军司令官之指定，事在必行云云。实则各该职员等已分别到各指定处所开始执行职务矣！次日总务厅长即改为总务长官，阶级反倒增高。

民政部之组织，自总长、次长以下有总务、地方、警务、文教、土木、卫生各司及土地局之设。总务、警务两司长为日本人，以次长葆康代理部务。初成立时日系职员人数约占百分之四十，其计划

逐渐增至半数以上，警察官则尤多。当以如此办法中国人官吏之失业者必日渐增多、技术人才有时尚可取之于国外，一般官吏之生活途径不能不加以顾虑，但终不得解决，日系职员仍是有加无已。

待遇之不平等。虽具有同等学历同一阶级，其薪俸等级则相差悬殊，例如日本人为一百元，中国人不过六十元之比，咸抱不平，然皆敢怒而不敢言，虽经过改正，但终不能得其平。

总务制由政府成立时即实现。计中央国务院有总务厅，各部有总务司，地方省有总务厅，县有参事官室，为其长者皆系日本人，俨然成一命令统系，遇事竟直接指挥。

日本为实行其向东北大宗移民政策，有以二十年为期移送五百万人口之计划。为达成此目的，在东北大量收买土地，先设有满鲜拓植会社，继又设有满洲拓植会社等机关。实行收买均以最低价格取得多数土地为目的。其始收买民地每垧估价十六元至二十四元不等，荒地每垧只给两元，水田每垧不过四十元。如此估价已属过低，而地又分为数等，收买时又故意低其等级，其结果人民所得每垧不过十余元。至收买手续之复杂，索照给价之繁难，人民实不堪其扰害。地被收买，所得无几，当时即不能生活，又无力向他处迁移，另谋生途，因而流离失所者在在皆是，政府亦并无补救办法。

东北地方因连年内乱，军队大部调赴关内，时有匪徒出而扰乱地方。为维持治安，除警团外，多赖民间自卫的力量。各地方自卫团体等所用枪枝为数不少，维持地方颇资得力。日本人以为民间有如此多数武器，恐于日本军不利，自伪满成立后，拟由警察机关将民间自卫团体所用枪枝全部收缴。我们以为民间自卫用武器种类甚为复杂，以之防匪尚可勉强应用，收缴一节大有缓行之必要。而日本人则急不可待，由民政部警务司督饬各地方警察机关雷厉

风行，不分大小枪枝一律收缴，大部分交由各地驻在日本军队销毁。自此民间骤失去自卫力，匪徒益见充斥，人民生业颇受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员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

当该团到奉天之先，日本人将满街所贴之各种标语涂刷罄尽，连在奉天城内金銮殿胡同驻在之日本宪兵分队门前所挂之木牌子都摘下去了，以避调查团之耳目。及该团去后则又挂出来了。

曾阅本庄繁军司令官与该团之谈话记录中，有日本人绝不干涉满洲内政，各机关之顾问是他们满洲人所请求而派者等语。其实顾问此时已改为总务厅长矣，彼尚出此欺人之谈。

该团在奉期间曾一度来奉天省署访问，接见时寒暄后作极简单之谈话。该团长李顿曾提及旧政权时代兵工厂购料葫芦岛筑港，对于西商之欠款将如何办理？当答以预定组织积欠委员会逐项清理云云。当时所用翻译系日方指定市公署之英文翻译尤某，省署准备之翻译概不得用。此次会见只有来访，日方不容答拜，盖恐我等与该团直接谈话耳。

一九三三年冬月，菱刈隆关东军司令官召集郑孝胥总理及各部总长宴会，席终菱刈命小矶国昭参谋长当众正式宣布，大旨是拟将满洲国改为帝制，执政改称皇帝，定于明年三月一日建国纪念日实施就任典礼云云。改为帝制乃其既定方策，不过以执政为过渡时代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伪满改为帝制，执政改称皇帝，是年改为康德元年。帝制实施后各部总长均改称大臣。

日本为贯彻其统治伪满方案，又因原有四省一特别区之省区

过大，事权太重，政治推进诸多困难，为使诸般行政易于渗透起见，于帝制实施后复逞其阴谋，将省区重新划分，除兴安各省外改组为十个省。计改为奉天、锦州、安东、吉林、滨江、三江、间岛、龙江、黑河、热河等十省，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实行开办。所有新十个省省长均系新被指定选出者，于同日一律就职。

民政部次长葆康调任奉天省长，继次长任者为原奉天民政厅长赵鹏第。

余原兼任奉天省长，迄今则改为专任民政部大臣矣。自九一八事变被捕释放时，日本军所派之宪兵军曹横山政雄者，足足跟随监视我三年余，迄今始行撤去。

是年十二月下旬，由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当面催促谓满洲建国已三年于兹，现已实行帝制，你亦应该到日本去一趟，视察行政并访问各处，以表示敬意。满洲各大臣都已去过，民政部大臣不能独异，勿再迟延云云。不得已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起程赴日，首席随员为民政部总务司长清水良策，及中日人职员七八人同行。在东京逗留旬余，见过他们的天皇各宫家、国务总理及各部大臣，并在野诸要人。离东京到横须贺、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奈良、伊势、广岛、下关、门司等地到处参拜访问，先神社，次陆海军，再次则商工会议所、府、县、市等处。每日忙于应酬，奔驰于酒宴间，所谓视察则徒具空谈耳。于二月初旬归还〔返〕长春。

一九三五年五月某日，忽接国务院通知各部大臣于五月十九日午后八时到总务长官官邸会议，届时齐集均不知何事。不多时每人单独被召至一室，只见有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大臣张景惠及总务长官长冈隆一郎二人在座，遂由张景惠宣示某人转任某职，均系每人单独面告，并未当众宣布。至此始知是内阁改组，张景惠为第二任国务总理，旧阁员只有司法部大臣一人留任，其余均转任他

职。继任阁员亦是同样单独告知,事先毫无接洽,亦未征求个人同意,骤然宣布,言已决定不能变更云云。至于改组动机,改组原因,以及旧阁员辞职手续均未言及。散会归来则见住宅内外有制服者有便衣者五六人出入,乃系日本宪兵驻守。次日上午新旧任阁员均到宫内行亲任式,出门时即有制服武装日本宪兵同车随行。亲任式毕归宅下车后,所有制服者便服者均消踪隐迹而自行撤退矣。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一阁员之进退尚如此严重监视,盖唯恐我等中有策动者耳。

此次改组余被任命为参议府议长。

参议府之组织由参议及秘书局而成。参议无定额,由参议中任命议长副议长各一人。八一五以前共有参议十一人,计:中国人参议六人(内一人为议长),蒙古籍者一人,朝鲜人参议一人,日本人参议四人(内一人为副议长桥本虎之助)。秘书局长为日本人,局员日本人占十分之八。

参议府之性质。参议府直隶于伪满皇帝,为皇帝之咨询机关。所有各项法令由政府主管机关立案,经过国务院会议通过后送呈皇帝,由皇帝咨询参议府审议,参议府受到咨询时以合议制性质开会审议。参议府之会议分为:

定例会议,普通案件每周开会一次;

临时会议,遇有紧急案件则开临时会议;

御前会议,遇有特别重要案件由皇帝亲自出席开御前会议。

每次会议由政府国务总理大臣、总务长官、主管部大臣,及经手责任者出席说明案情并质问应答,经各参议审议讨论通过后送呈皇帝裁可,以敕令公布之。

参议府无命令权,无对外责任,无所属机关,府内一切事务由秘书局长负责办理。

伪满之法令政令照章应由各主管机关立案，提出国务院会议通过方合手续。实际则不然，凡应提出之重要案件，均须先经过总务长官、总务厅次长、各处长、各部次长及有关责任司长等日本人，并有日本军部第四科人参加单独会议，名为火曜会议，每周一次。此会议中国人绝对不得参加。经火曜会议决定后方能提出国务院会议，这种提出文件经咨询到参议府会议时，参议有提出咨问或意见时，日本人不曰既定方针，即曰国策如斯，再则曰军方之指定或授意等等之答复，不得已而原案通过者屡矣。我在参议府十年余，经过案件不下数千百件，就没有否决过一个案。所谓参议府会议不过徒具形式耳。

伪满成立伊始，一切公文即用中日两国文字，及帝制实施后新学制公布时，竟公然将日本文列为伪满洲国文，日本语为伪满洲国语。总务长官并声言满日两国文语均为满洲国的正式国文国语，凡公布法令及各机关往复公文均以日文为主，满文次之。

各级学校亦均偏重于日本文语之教授，每星期有十二次之多，约占全课程之三分之一；大学则多用日本文语教授，所用口令、仪式、礼节纯系日本式。

新学制竟废止初中、高中制度，改为国民高等四年毕业，程度极低，国民高等毕业后投考国内外大学均感程度不足。名为趋重实务教育，实则不过多加勤劳奉仕耳。

各大学之程度亦极低下，毕业后充中学教员深感程度不足，至高等文官之考试及格者更少，似此则中国人之为高等文官者益少，不得已只能充委任官吏。

缩短年限，低其程度，使一般青年不得深造求学，前途受种种压制，日人在伪满实行奴化教育之阴谋莫此为甚。

伪满自帝制实施后，屡将中央及地方机构大事其改革，其中以

一九三七年之改革为尤甚。计：

将民政部缩小改为民生部，取消地方司另设内务局，将外交部取消改为外务局，均直隶于国务院，为该院之外局。内政外交事权均集中于国务院。

军政部改为治安部，将警务司拨入该部，将军警之全部事权集中于一部，担负治安之责。

实业部改为产业部，扩大其组织，扩充开拓机构，将开拓司改为开拓总局，以庞大之预算办理日本大量移民事宜。

取消文教部改归民生部内为一学务司。文教部原成立较晚，今又将部取消，其忽视教育之重要性，频为变更，于教育前途之恶影响甚大。

财政部改为经济部，扩大其组织。

土地局改为地籍整理局，直隶于国务院，为该院之外局。

随此次之改革，特将各部之总务司长改为各该部之次长，各省总务厅长改为省次长，各县之参事官改为副县长。以上均系日系职员。以国务院总务长官为首，俨然成一直接指挥监督之命令统系。

一九四〇年将内务局又改为地方处。内务局原为国务院之外局，此次改为总务厅内之一处，内务行政之事权又集中于总务长官之下。

将产业部改为兴农部，名为发展农业，实则为搜括民间粮谷出荷。原产业部之工商各部门均拨归经济部，而经济部又大为扩充。

一九四二年又将外交部恢复。

一九四三年恢复文教部。该部屡废屡复，其对于教育之不重视毫无疑义。

治安部又改为军事部，将军事部内之警务司改为警务总局，明

文规定以该局长直隶于总务长官之下。全国警察权又均集中于总务长官矣。

因历次之改革，有关法令亦不得不随之修改，每改一次则总务厅之组织大为扩充。事权则益形扩大，所谓大总务厅制更为加强。此外在省县又大事扩充其科之组织，增大科长之权限，名为大科长制，盖省县之重要科其科长多为日本人占据。各省县机构之改革更为频繁。中央及省县机构历年改革不已，其用意专为扩充日本人之权限无疑。伪满初成立时，因无专用法令而援用中华民国之旧法令，凡与日本人之侵略政策不相抵触者皆援用之。以后由日本招来法律专门人，分任编纂伪满各种法令。例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会社法、亲属继承法等及其他各项法令多种，逐年陆续产出公布施行。施行后则屡屡修改。其内容纯系日本法令之脱胎拿到伪满来使用，日本法令每有修改，则伪满法令亦必随之急为修改，期其一致，其用意之阴险可知。

曾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下旬，为华满日三方面共同宣言签字事，余奉伪满皇帝特派为全权代表赴南京，首席随员为外交部次长日人三浦武美，其余中日人共七八人，均系外交部职员，并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派之参谋山田少佐同行。于十月三十日在南京与伪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驻南京日本大使阿部信行大将共同签订三国共同宣言。其宣言内容大致为：1. 三国互惠；2. 经济提携；3. 共同防共。此项宣言，系华满两外交部及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事先在南京开预备会议所决定之原案。在南京逗留期间与汪、阿部及驻南京日本总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将、海军司令官岛田大将等互为宾主，酬酢数日，于十一月四日回长春复命。

曾于一九四二年，因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曾一度来访伪满，

余奉派为答礼专使，首席随员为参议府参议朝鲜人清源范益，其余有国务院、参议府中日人职员共约十人，于七月上旬一同赴朝鲜京城与小矶总督会见。在京城与小矶及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大将等互为宾主酬酌数日，并参观各处外曾赴仁川参观筑港，共逗留四日间归还长春复命。〔下略〕

119—2—1135，4，11

臧式毅笔供

（1954年8月9日）

〔前略〕

九一八事变及我就任伪奉天省省长。

日寇为实行其侵略中国大陆政策，自日俄战后，时出强硬无理外交手段，每制造问题，引起交涉。一九三一年以中村大尉事件的交涉无结果，遂诬赖奉天北大营兵破坏南满铁路，而于九月十八日夜炮击奉天，在我方无抵抗下，将省城完全占领。十九日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即派日寇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市长，改辽宁为奉天。彼时我正任辽宁省主席职务，坐视省城失守，深感责任重大。

同日，日寇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将我逮捕，拘押于奉天大西关五纬路鲍〈子仪〉宅楼上。迄十二月初旬，日寇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向我提出一个临时写的文件，其中的要求大致为：

1．要我参加东三省政权组织，充任官吏。

2．日本军队驻在东三省境内。

3．国防由日本军队担任。

4．东三省分任〔担〕日本驻军军费。

5．东三省境内铁道由日本经营、使用（当时的要求是经营或使用，已记不清楚）。

对于以上五项，由于我的贪生怕死而同意签名，遂在十二月中

旬被释放回家。次日日寇板垣征四郎来说，商会举你为奉天省长，命我随其到奉天省公署就职。到省公署后，知我被押期间，以汉奸袁金铠为伪会长的“治安维持会”已被日寇解散，我即就任奉天伪省长。以上是我贪生怕死，背叛祖国，铸成百身莫赎罪恶的开始。

伪奉天省长时期：

1．日寇因奉天东边道地区尚有于芷山镇守使所部军队驻在该地，并未表明态度，故派人与于连络。而日寇板垣征四郎更叫我派人前往劝降。乃命省署伪秘书长赵鹏第劝于来省，保障其安全和地位。汉奸于芷山乃降敌来省。

2．九一八以后，张学良设辽宁省政府于锦州，并有军队驻于锦州、绥中一带。当有日寇军部参谋片仓衷大尉，向我传达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示，叫以我的名义与张学良去信，劝其将驻锦州、绥中一带的军队撤入关内。我派省署伪咨议徐绍卿持信，并在日寇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陪同下，将信送达于张学良。该信的内容大致是：日本军就要占领锦州、绥中一带，应将各该地东北军及军民机关一律撤入关内，免致发生战争，人民受其涂炭等语。该信送去后，虽未得到答复，其后张学良已将军队及省政府撤去，日寇则相继占领锦、绥及山海关一带。

3．一九三二年初，日寇军队进出辽西之前，曾以我的名义，在辽西各地散发传单。其后知其内容为宣传日本军的德政，詈骂张学良的虐政。

以上，是我劝降于芷山，收抚了奉天旧有的军队，并劝张学良撤去锦、绥驻军，而完成了日寇对奉天全省的占领。

4．九一八后，奉天南部各县，因无伪军驻在，防务空虚，日寇关东军司令部，乃由黑龙江省调来新成立的伪军王殿忠、李寿山部约一千五百人，分驻于营口、安东，任该地防务。

5. 日寇关东军司令部，以奉天伪军不敷分配为词，命成立伪军。遂召集一千二百余人，定名为靖安游击队。经日寇军部指定以其退役军官和田劲为队长，美崎丈平为参谋长，后来转属于伪军政部。

6. 一九三一年冬，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派代表出席在奉天兵工厂举行的会议，当派省署伪咨议王庆璋、祁靖黎前往，对方为日寇吉田大佐。彼宣布兵工厂内各项机器、武器均为战利品，故由日军没收，其余建筑物等做价为省有财产，但与日军合办工厂等语。当由所派代表签字后而回。

7. 伪满的筹建，及傀儡溥仪就伪执政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亲自与我谈及召开各省首长会议东三省组织问题。我表示同意后，彼亲赴吉、黑召集两省长来奉(汉奸张景惠已早在奉)，遂在二月十八日晚，开始举行下记各次会议：

当晚会议地点为伪奉天省长公署。出席人员为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伪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日寇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及日寇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当由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提议，以我们四个大汉奸组织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大汉奸张景惠为委员长、余为委员。我等同意后散会。

翌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伪奉天省公署正式成立，并举行祝宴后，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指定东北行政委员会应以委员长及委员名义，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其电文内容大致为：张学良在东三省的虐政，日本商民亦颇受其害，日本以同文同种的友谊膺惩张学良，驱除其势力，为拯救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于水火，并拥护日本之既得权，有建设王道乐土、新政权、新组织的必要。

第三日晚，我等四大汉奸和日寇板垣征四郎及土肥原贤二，在伪奉天市长赵欣伯私宅集会，汉奸赵欣伯亦列席。首由日寇板垣征四郎宣称："东三省政权以溥仪为元首，建设新国家。"次由日寇土肥原贤二说："这个国家，是满洲人的独立国家，日本人处于指导援助地位，并无领土野心。"我等俯首听从与以同意而散。

第四日，大汉奸熙洽、马占山、臧式毅和日寇板垣征四郎，在大汉奸张景惠私宅集会。日寇板垣征四郎提议，伪省长和长官于会议后可速回任所，由大汉奸熙洽负责在长春筹备溥仪和伪政府中央各机关的厅舍，奉、黑、哈派员协助之。更提议留派代表于奉天，会议"国名"、"国体"、"国号"、"国都"、"国旗"各问题。大汉奸熙洽、马占山留派代表后，即于当晚回任。所有留派的代表如下：

奉天省伪代表：伪实业厅长冯涵清、伪高等检察厅长李槃、伪省公署参议金毓绂。

吉林省伪代表：伪长官公署秘书〈长〉张燕卿、伪外交署长谢介石。

黑龙江省伪代表：伪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

哈尔滨伪长官公署代表：伪长官公署咨议葆康。

尔后，各留派的伪代表，即在奉天伪教育会约举行了一星期的会议，除各伪代表及日寇板垣征四郎外，每日更有日寇军部法务官松本侠和参谋和知（忘其名）〈鹰二〉中佐主持会议，大汉奸张景惠和我亦常列席。该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日寇板垣征四郎的下记提案而闭会。

国名：满洲国；国体：君主；国号：大同；国都：改长春为新京；国旗：黄旗带五色。

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命派遣代表赴旅顺请傀儡溥仪为伪新国家的元首。当时即以会议的各代表前往请愿，傀儡溥仪辞不肯就。

更依据日寇板垣征四郎的意旨，带去我等四大汉奸对于君主制度的意见（大汉奸熙洽的意见是皇帝制，大汉奸张景惠和我的意见是委员制，大汉奸马占山赞同委员制），做第二次的请愿。傀儡溥仪允就一年。于是又赴汤岗子（傀儡溥仪已先期到汤岗子）做第三次迎请，该傀儡于三月八日自汤岗子乘专车出发，我从奉天上车随行至长春，而于九日就任伪满洲国傀儡执政。

关于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经费及代表迎请傀儡溥仪的旅费，均由日寇关东军司令部支给。计伪代表的旅费，每人为三千元，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经费为二十万元。这种经费，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奉天伪留派代表冯涵清和黑龙江伪留派代表赵仲仁到伪省署对我说："现由日本军部给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经费二十万元，交与大汉奸张景惠的公馆，经各留派代表的协议，分给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四万元，委员长办公费一万元，下余七万元归委员长所在地哈尔滨。"等语。我因既已分配，不便交还，将该四万元交省署秘书处保管。伪满建国后，将该款分给奉天伪留派代表冯涵清、李槃、金毓绂、省署伪秘书长赵鹏第各五千元，伪市长赵欣伯一万元，高等检察厅书记官二千元，及出席推举溥仪为皇帝大会代表商务会长方旭东旅费数千元。对于该款我虽分文未取，但系由筹建伪满背叛祖国而来，我甘愿负其责任。

8. 伪满洲国政府最初成立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日寇板垣征四郎大佐在奉天与我接洽伪总理问题，因大汉奸熙洽和我皆不肯就，遂找大汉奸郑孝胥任伪总理。又在各部伪总长问题上，他最后决定大汉奸张景惠、熙洽、马占山和我除分任伪中央的部长外，更兼任原有的伪职务。至于次长由我等推荐。其后我同他赴长春与大汉奸郑孝胥（已先在长春）、熙洽会见，且一同视察为傀儡溥仪准备的厅舍后，集会于伪吉

长铁道警备司令部。当时列席的汉奸人员为郑孝胥、熙洽、荣厚(九一八时吉林财政厅长)、金壁东(伪吉长铁道警备司令)及我。日寇板垣征四郎宣布大汉奸熙洽为伪财政部总长、臧式毅为伪民政部总长,其余各部伪总长由日寇军方指定等语而散。

三月十日为宣布伪满洲国政府的成立,举行第一次伪国务会议。我到场后,在面前放置的纸袋内,看到伪政府的组织表,有如下的记载:

总理: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臧式毅　　次长:葆　康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次长:未设

财政部总长:熙　洽　　次长:孙其昌

军政部总长:马占山　　次长:王静修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次长:未设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次长:未设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次长:未设

教育部总长:郑孝胥兼任　　次长:许　芬

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贝勒　　次长:日寇菊竹(忘其名)

总务厅长:日寇驹井德三(日寇军部统率部长)　　次长:阪谷希一(日寇拓务省官吏)

参议府议长:张景惠　副议长:筑紫熊七

立法院长:赵欣伯

监察院长:于冲汉

最高法院长:林　棨

最高检察厅长:李　槃

该组织表上载明各部各司的组织(因不记得不能举出),凡中国人的汉奸任司长者则标以黑圈,日寇任司长者则标以红圈。更

载明各伪部所用日寇职员的标准数字为十分之三(后来则无标准)。

关于采用日寇为各伪部职员,事前并无连络,故大汉奸熙洽曾当场以事前未向伪执政报告为词提出质问。而日寇驹井德三的回答是:"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 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等语。未出三日,既由日寇军方命令将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改为伪总务长官。

十日,更在报纸上看到伪满洲国的组织法和人权保障法的公布,其经何手续产生则不详。总之,伪满洲国傀儡卖国政府,就是这样产生成立起来的,而给人民带来十四年史所未有的灾难。

9. 奉天各县,早在伪治安维持会时期,派有日寇的参事官和警察指导官主持县政。故在我任伪奉天省长后,向尚未派遣的东边道区,如长白、临江等十余县,陆续派遣。这是我将东边道区各县的行政,又入于日寇的掌握下。

10. 一九三二年汉奸于芷山部下营长唐聚五,在通化一带起义抗日,奉天伪军无力"讨伐",当由我面请板垣征四郎大佐派队前往"讨伐",并令各该县与伪省方派去的人员连络,对于供给日军物资等予以协力,结果使该起义抗日部队溃败。

伪民政部总长及大臣时期:

1. 一九三二年伪满建国后,伪民政部向吉林、黑龙江、热河各省及奉天省的一部,陆续派遣日寇充任各该县的参事官及警察指导官,约经二年多的期间,先后派遣完了。这种派遣的结果不仅形成二重政治系统,尤其使地方行政完全入于日寇的掌握下,而有利于日寇殖民地统治的实施。

2. 伪民政部所属警务司内设有侦缉室。这个组织极为机密，是一种特别任务的警察机构，专为地下工作而设。其组织上有主任一人，当时以日寇退役宪兵少佐海村圆次郎充之，其下有职员若干人，以约二百名的干部(各种人才都有)，专指挥各省、市、县警察厅、局的特务科日系员警构成工作网，在日寇军宪指挥下从事地下工作，专搜查东北人民对于日满的思想动向。每年所要人事费约四十万元，其他费用由伪政府临时支给。这个侦缉室，即是伪保安局的前身，在我任伪民政部长时期，有这种工作，结果对于东北人民的思想动向上，就寄〔给〕与了很多很大的危害。

3. 由伪民政部立案，伪执政的裁可，以敕令公布了下记各官制：

(1)伪首都警察厅的官制：该厅设伪警察总监一，伪副总监一，内有五科：即警务科，掌管人事、预算、庶务等；特务科：掌管思想、宗教等；司法科：掌管取缔违警行为及协助司法事务；保安科：掌管交通、保安、风纪等；外事科：掌管外国人的移居、旅行、及入境检查等。

(2)伪省警务厅的官制：该厅设伪警务厅长一，内有警务、特务、司法、保安和外事各科(黑龙江省无外事科)。其掌管事务与伪首都警察厅各科相同。此外更设有卫生科，掌管卫生事务。

(3)伪市警察厅的官制：该厅设伪警察厅长一，内有警务、特务、保安、司法、卫生各科，掌管事务与前述各该科所掌管者相同。而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更有外事科之设，其掌管事务亦同前述。

(4)伪中央警察学校的官制：该校设伪校长一(由伪民政部警务司长兼任)，伪主事一，伪教官及办事员若干名。学校为二部制，即一部是招考高小和初中以上学校的学生，受一年的警察教育后任伪巡官；一部是由各省、市、县选拔伪警长级者入校，受半年或一

年的教育后，任伪巡官或回原职。但一九三四年后，日本人的警察出身者亦入该校，如是，该校不仅培植了统治人民工具的干部，更为日寇警察官吏掌握伪满警政树立了阶梯。

(5)伪地方警察学校的官制：地方伪警察学校设于伪省公署所在地，该校设伪校长一(由伪警务厅长兼任)、伪主事一、及教官若干名，教育既成的伪警官(教育期间不记得)。

(6)伪特殊警察队的官制：所谓伪特殊警察队者，即伪国境警察队、伪海边警察队及伪游动警察队。伪国境警察队本部的官制，已不能记忆。一九三二年日寇甘粕正彦任警务司长时，于伪满国境山海关、满洲里设置伪国境警察队本部。各队的任务为检查国际列车，取缔出入国境旅客，特别对于中国人取缔甚严。

一九三三年日寇长尾吉五郎任伪警务司长时，更在黑河、绥芬河(在东宁设有分队)、安东、瓦房店和古北口增设伪国境警察队本部。伪警尉以上干部共约二千二百名，概系日寇退伍宪兵系统，百人中有一二名中国人充任翻译，其实有兵力不详。

日寇长尾吉五郎在营口设海边警察队本部，内有总务、取缔、训练、外事、警备、船舶、机动、补给各科。在安东、庄河、葫芦岛设有分队，人数共约二千名，有炮舰四艘。伪干部均系日寇海军退伍者，纯为日寇海军系统，表面上为保护海面船舶，实际是海军训练，其担任的区域为山海关至安东一带的海面。

伪游动警察队，即哈尔滨市与长春市的游动警察队。该队设有伪队长一，伪队附一。内有警备、警务、特务各股，以协助市警察的警备为主要任务。

由于以上各官制的公布，树立和充实了伪满警察机构，警政既因而确立，则便利了虐民政治的推行，而为殖民地统治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4. 一九三三年以敕令公布伪民政部立案的“治安警察法”。该法与一般独立国家所实施的维持地方治安警察法特异之点，是扩大了警察对于犯法容疑者的检举取调权，遂加强了镇压人民工具的淫威，增大了对人民的危害。

5. 一九三三年五月，伪民政部为取缔人民的私有枪支，以部令公布了“暂行取缔枪炮规则”。并令各警务机关依据规则施行取缔，计收有约一百万的杂色枪支。但各伪警务机关均系日寇主持，其取缔手段激烈，不仅人民不堪其扰，且消除了人民的反抗力量和杜绝以枪弹援助抗日军的义举，而有利于日寇的统治。

6. 伪民政部起案的“出版法”，曾以敕令公布。关于出版虽亦说是自由，但凡有启发民族思想意识的出版物，均在禁止之内，于是麻痹奴化了东北人民的民族思想意识。

7. 一九三二年由伪民政部提案，以伪敕令公布了“惩治盗匪法”和“惩治叛徒法”。这种法的施行，就镇压了东北富有民族意识的人民，危害了爱国抗日的志士。

8. 一九三三年冬，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及各伪总长等，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官邸宴会时，日寇小矶国昭参谋长宣称：“满洲国体改为帝制，执政改称皇帝，定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施行，应速筹备登极大典。”等语。在座者均鼓掌赞成。其后，即组织大典筹备委员会，内有地方、总务、典礼等若干部，以汉奸郑孝胥为委员长，我以该会委员身份任地方部长，主要担任警备事宜，由所属的警务司负责办理。日寇为预防具有反满抗日思想者的乘机策动，乃从各省调来伪警察共约一千名，增加长春伪警察力量，密布警戒网，对于市内往来商民、旅店严加检问检索，凡无职业，行踪无定，以及无证明者，被拘押达一千名左右，事后虽陆续释放，但已危害了人民的自由，蹂躏了人权。特别是符合了傀儡溥仪的宿愿，促

进其一意为日寇服务的心理,有利于日寇的统治。

9. 伪民政部立案的"暂行保甲法",曾由伪教敕令公布后,为了该法的实施,更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以伪部令公布了"暂时保甲法的施行细则"。所谓"暂行保甲法"者,乃过去我国旧东北曾实施过的"十家连坐法"。故该法的实施,是在伪警察力量尚未充实之际,以十家连坐的高压,抑制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思想意识和行动,而巩固其统治。

10. 一九三四年伪民政部以训令公布了"户口调查规程"。爰旧东北时代,向无户口的精确调查,而外人旅居东北者为数又属不少,故该"户口调查规程",在表面上是为明瞭伪满洲国国势的人口,实质是使日寇借以掌握可剥削的劳力,更与伪特殊警察队相联系,清查外人在东北的旅居状况,来防止"反满抗日"的策动及保密,而有利于统治。

11. 一九三四年春,由伪民政部土本司对于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先后进行了都邑的测量和建设;又于同年七八月间,为傀儡溥仪临幸大屯车站西方阜丰山附近实施的伪军秋季演习,修筑了自大屯车站到阜丰山的道路。

12. 日寇因原有各省区域广大,政治不易渗透,拟将原有省区,重新划分改为十省,遂由日寇关东军司令部内的特务部作成纲要,交由伪民政部立案,经伪国务院会议通过后,更由伪民政部令行各省实行改组。除热河省仍旧外,计取消哈尔滨特区,并将奉天省划分为三个省:即奉天省(伪省长葆康)、安东省(伪省长王兹栋)、锦州省(伪省长徐绍卿);吉林省划分为四个省:即吉林省(伪省长李铭书)、滨江省(伪省长吕荣寰)、三江省(伪省长金名世)、间岛省(伪省长蔡运升);黑龙江省划分为两个省:即龙江省(伪省长孙其昌)、黑河省(伪省长钟毓)。各省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正

式组织成立，各伪省长亦于同日分别就职，各部伪总长亦于同日一律改称大臣，奉天、吉林两兼任省长改为专任大臣。

这种改划省区的结果，是使各伪省署日寇职员大为增加，二重政治系统益形强固，因而强化了日寇的统治。

13.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对我说："现已实行帝制，你应该去日本作拜访和视察。"等语。我乃带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清水良策、土木司长王庆璋等七八人，于十二月末出发到日寇东京住于帝国旅馆，连日拜访日寇宫廷皇族各宫家、神社、陵寝，并访问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以下各省大臣、参谋总长及教育总监并其朝野人士，迄二月初旬归还。我在东京日寇新闻界权威者德富苏峰的招待茶话会上，曾当众说：伪满建国和帝制的实施，感谢日本的指导援助。并就日、满人的相互疑惧问题说：日本人对满洲人多疑，满洲人对日本人多惧，这是日满亲善上的障碍。日本人在满洲凡事都要自己做，例如拉人力车的一样，在天黑路不平且又不识途径下，一拉车就翻了，为何不叫满洲人去做，自己站在指导地位上呢？又在日寇财阀水野炼太郎招待的午餐会上，说了感谢以往的援助，请求将来的指导，并为日满亲善上愿共同努力的话。这说明我的卑鄙无耻和民族意识的泯灭。

14. 伪民政部曾以部令公布了"外国人入境取缔规则"，限制外国人的入境，特别严行取缔了关内中国人的来东北。于是达成了日寇隔绝东北人民与祖国的往来，和防止外人寄〔给〕与不利于日满影响的企图。

15. 奉天东边地区一带，村落星散，日寇为防止当地人民与抗日军的联络，曾由伪民政部命令伪警务机关，执行了强制人民集团居住的政策，使人民聚居于指定场所，将原有星散家屋一律焚毁，以致耕种食宿，均大感困难，妇孺行动亦受限制，疾病死亡为数甚

众。尤其杜绝了人民与抗日军的联络,影响了抗日救国活动。

伪参议府议长时期:

1. 伪参议府的组织、任务及工作状况:

伪参议府计伪议长一,为大汉奸臧式毅;伪副议长一,为日寇桥本虎之助;伪参议(无定额)为汉奸王静修、蔡运升、丁超、张焕相、博都额(蒙族)、中野(鲜籍,忘其名)、日寇高桥康顺、井上忠也、鹿耳岛(忘其名)。府内设有伪秘书局,局长为日寇冈田(忘其名),掌管该局的一切事务。局内设有庶务科、秘书室、审查室和图书室。

伪参议府直属于伪皇帝。其任务是伪皇帝将以伪国务总理名义奏请的案件,咨询伪参议府,经伪参议府通过后,再由伪议长奏请伪皇帝以敕令公布之。

伪参议府的工作状况:会议分为定例会议、临时会议(二会议均在参议府行之)、御前会议(在伪宫内府行之)。会议出席人员在伪参议府方面为伪议长、伪副议长、各伪参议、伪秘书局长和伪秘书(翻译记录等)。在伪政府方面为伪国务总理、伪总务长官、伪法制局、伪主管部大臣及关系的伪次长或司长。会议程序,为议案到参议府,先由伪秘书局长率局员进行审查(伪参议亦有时参加)后,于星期二日将其结果向伪议长、伪副议长、伪参议报告之(是即所谓审查报告会),以便于正式会议时进行审议。

在正式会议前,伪副议长及日本人的参议与伪秘书局长等先进行会商,并与伪国务院的伪总务长官和伪法制局长,于每星期日的定期会谈上交换意见。

每星期五日举行正式会议。由伪总务长官或伪主管部大臣说明提案理由后,由各伪参议进行讨论,最后由伪议长宣布,如无异议,则予以通过(通过法的性质为合议制),倘有质问,则由伪总务

长官予以答复。

2．伪满洲国法令公布程序：

伪满洲国政治的特殊性是二重政治。即凡有法则规定，事先有由日寇军部指定者，有由主管机关请示日寇军部而决定者，一切政治均由日寇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掌管，因而对于伪满各机关的干预、接洽，由该第四课指定的参谋负其专责。

伪满洲国的法令，是由主管部起草后提交伪总务厅法制处审核，在审核中日寇军部、伪总务长官、伪法制处长和伪主管部次长等，有密切的联系。

伪法制处审核后，由伪总务长官交还伪主管部，更以伪主管部次长名义，提出伪总务厅次长会议是即所谓火曜会议。这个会议的构成，是在日寇军部参谋长代理第四课长参加下，以伪总务长官为议长，伪总务厅次长、伪各部次长、伪总务厅各处长、伪兴安总局参与官及伪总务厅文书科长等。这个会议是伪满洲国二重政治最高的会议，最发生效力的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案件，虽伪国务院、伪参议府、傀儡皇帝亦不得变更之。

提出的案件，经这个伪次长会议通过后，再以伪主管部大臣名义，提出伪国务会议。经伪国务会议通过后，以伪国务总理名义奏请傀儡皇帝溥仪。更由其咨询伪参议府会议被通过后，以伪议长名义奏请傀儡皇帝溥仪以敕令公布，由伪国务总理大臣与伪主管部大臣或关系部大臣副署之。

法令公布后，因各省市情形的不同，对于法令的施行细则由各该省市拟出后，由该省市次长、副市长申请伪主管部次长核定(名曰假申请)。经伪次长核定后，方能由伪省长或伪特别市长正式呈请伪主管部大臣批准或备案。

3．审议通过的法令：

在农产及特产物方面：日寇为了掠取东北农民劳动血汗的结晶——大豆、高粱及苞米等，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公布“主要粮谷统制法”，更公布了“米谷法”、“面粉法”等；为了统制农产物的交易，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公布“农产物交易场法”，以掌握农产物的交易场所；为扩大粮谷管理，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公布“粮谷管理法”，以便向日寇国内输入大量粮谷；更为了蘑菇、药材等特产物的管理，于同月公布“特产物专管法”，为限制棉花的耕种面积、价格、贩卖，于一九四三年公布了“棉花统制法”；复于一九四四年扩大统制范围，公布“农产物管理法”；特别为了强化粮谷统制的实施，于一九四〇年将伪产业部改为兴农部。由于以上法令的公布，不仅以贱价垄断剥削了一切农产物和特产物，更因配给上既有日、满，及官需、民需之别，且由于配给量的不足，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及身体健康和幼儿发育。又在督励出荷上带来了种种灾难。对于日寇方面仅就粮谷一项说来，自一九四〇年至四五年的粮谷出荷量，由七百二十万吨增至九百万吨，其中运往日寇国内者，由二百万吨增至五百万吨。更以国际贸易名义在华北换取三亿至五亿元价值的煤、盐、席等物资。总起来说，东北粮谷年产量二千万吨，被“七二五”的贱价剥夺了半数。

在劳工方面：过去东北的劳工来源，向皆仰赖于就食东北的关内劳动人民。伪满傀儡政权树立后的初期，日寇为杜绝东北人民与祖国的联系及经济往来，曾限制关内劳动人民的入境，彼时入境而来的劳工，年不过百万人。殆进入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力大感不足，乃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公布“满洲劳工协会法”，缓和劳工入境的限制和所挣工资汇兑上的便利，于是每年来的劳工约增至三百万人。嗣因输入日寇国内粮谷数量的增加，减低了运入华北的粮谷量数关系，又以限制汇兑来限制劳工入境。但为

补足劳力和解决各会社漫无统制的雇用劳工，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改“满洲劳工协会”为“劳务兴国会”。又于一九四二年，以伪民生部令制定“劳务新体制实施要纲”，用保护劳工的美名来诱致东北人民充当劳工，卒因实质是由诱致出发，则被诱来的劳工人数不能满足要求，演成了“强派”和“乱抓”的现象。乃更设立勤劳奉公局，于一九四二年公布“勤劳奉公法”，来剥削青年的劳力。伴随太平洋战争的进展，于同年以劳务新体制要纲为基础，公布了“劳动统制法”。如是，在日寇帝国主义者不珍惜劳力的劣根性下，伪满更为其殖民地统治，因此，由于衣食住的恶劣，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死亡率。

在鸦片种植贩卖方面：一九三二年十月已有“鸦片法”的公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更公布了“鸦片麻药断禁法”。如是在标榜着十年断禁下，成立禁烟总局，指定鸦片种植面积，调查吸食者，成立制膏局，并整备省、市、县的烟政机构。而实质上，是将过去商卖的鸦片，改由官方专卖，来做进一步的剥削。故武部六藏更于奉天、吉林、四平等省扩大种植面积，每年增产约一千万两以上。一九四四年，将伪禁烟总局改为伪厚生部的“禁烟司”，在该司监督下更成立了“禁烟协会”。如是，销减了伪政府对于禁烟机构方面的预算支出，使禁烟协会方面所需的经费，得以取之于鸦片贩卖上，是又增加了剥削。总之，伪满鸦片政策的实施，使六十二万的瘾者，增至一百二十万人以上，更剥夺了年约一亿六千万的金钱。如在押犯古海忠之所报告，每年以高价出卖于华北的烟土为四吨，而换取了相当的军需物资。至于对我国人民的身体上和弱种上的毒害，更是不可估计的。

在日寇向伪满的开拓移民方面：一九三七年，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日寇驻伪满关东军司令官兼大使植田谦吉，在伪满长春签定

了"满拓公社协定"。其后,伪满产业部内成立"开拓总局",专办日寇向伪满移民事务。据该伪开拓总局长日寇结城清太郎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召开的次长会议上说,日寇根据上述协定,预定以二十年为期,向伪满移民二十万户,约一百万人口。自一九三八年至四三年,日寇移来的人民为八万户约有五十万人口。伪政府除对移来的日本人民每人给与了二百八十元的安家费外,更对移民村的建设上用去了六亿元;在第二松花江郭尔罗斯前旗和东辽河开水田的治水费上,用去了五亿元。这就说明了为日寇的移民所用去人民的大量膏血,以保持其傀儡地位。一九四〇年伪兴农部以部令公布了"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该要纲中,虽规定购买的用地为沙、碱、二荒等地,但在收买的一千七百万垧的土地中,仅有二荒地五百万垧,而说明了有一千二百万垧的良田被剥夺。同年五月为了日寇开拓团的自由发展和自卫,公布了"开拓团法",而日寇开拓移民,可不受伪满的政治约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公布了"开拓农场法",则日寇移民,得以其附近的大量土地为农场,进行农产物的种植、试验、研究及牲畜的饲养与贩卖。由于以上各法的公布,使日寇多年来移民杂居的欲望得以实现,使东北人民失去生活根据的土地,且受到种种的欺压与剥夺。

在税收方面:伪满初建时,仍沿用旧有的税则,一九三六年五月始公布"国税征收法",为后来的增税立下基础。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公布了"事业所得税法"。该法实施后,虽街头的小小摊床事业,均在纳税之内,而表现了广泛的剥削。一九四二年七月公布了"地税法",则土地买卖上,亦遭受到严重的剥削。更鉴于劳工工资的每年总计不下五亿元之巨,遂于同年十月公布了"劳动所得税法"。如是,说明了苛税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也说明东北人民在苛税下所受的剥削。

在法律方面：伴随日寇对中国内地进行侵略的局势，伪满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公布了“军机保密法”，以保持军事设施、资源和生产力等的秘密。于一九四一年公布“特别法庭设定之件”，即随时随地以临时成立的特别法庭，进行对思想案件的秘密处理。依乎经济统制的加强，为了迅速处理经济犯罪者，将“三审制”改为“二审制”。于同年十二月公布“国防保安法”，加强国境地带治安机密的保持。又当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上呈现不利时期，对于思想犯罪容疑者，于一九四三年公布了“思想矫正法”。对于无生活根据，及无正当职业者，于同年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取消伪司法部掌管监狱的行刑司，于伪中央设立矫正总局，更于其他各地设立了数十所辅导院，名为施行辅导、矫正，实则镇压人民和强取劳工的别一方式。为了巩固其统治，于一九四四年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以取缔不利于太平洋战争的言行。以上各法的公布，使日寇得以种种借口，剥夺了东北人民的自由，蹂躏了人权的保障，而饱尝了血腥统治下的灾难。

在矿业及重工业开发方面：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公布了“矿业法”。遂以技术不良，资金不足，有误生产，和国家有收回必要的种种借口上，摧残了东北人民的民族矿业。同日更公布了“矿业开发株式会社法”，即以该会社收买未开采的矿山，为日寇财阀开辟了掠取东北矿权的道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公布“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管理法”，为日寇生产军需物资，即是以四亿资本扩建以煤铁为主的重工业。其所谓产业开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部由伪满政府投资，先后设立了以日寇鲇川义介为首资本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特殊会社达三十余个。伪满政府并以准备金项下的补偿，保证各股东的六厘股息。以追加的预算，补助各会社的经营损失，而维持供给日寇的军需物资生产。结果，是培植日寇重工业在

伪满的垄断，造成对东北民族工业的摧残；另方面，是以东北人民的膏血，维持供给日寇进行侵略战争上的军需生产。又伴随着"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管理法"的公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所经营的鞍山昭和制钢所，在名义上亦应加入，但为保持其独立经营，于一九四一年公布"株式会社昭和制钢所法"，这就使其所制的铣铁除自用外，更每年为日寇国内掠取去约十万吨的铣铁。

在其他的统制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公布了"贸易统制法"，结果，是将对外的贸易为伪国家所垄断。一九三八年五月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凡资金不足二百万元的煤、铁矿产业，遭受了摧毁，每年剥削去煤约六十万吨，铁矿石约百万吨。同年，公布"钢铁类统制法"，而将民用钢铁转入于军需，以致农民的生产工具等，虽用高价购买亦大感困难。一九三八年决定经济统制方针，实行"七二五"的评价，即用贱价购买商民的物品，使其大受损失，故仅奉天一市的商家，迄一九四三年，就造成了倒闭、歇业、破产者各约十分之二。一九四〇年六月公布"物价及物资统制法"，而使对于既成品的剥削，推广及于物资。一九四二年十月公布了"产业统制法"，使日寇进出东北的产业部门，得到充足的物资和劳力，并扫除其贩卖上的竞争者的东北民族产业。一九四三年公布"物品贩卖业统制法"，以补足日寇物动计划不足的缺陷。以上又摧毁了东北民族产业，使日寇用贱价剥削了产品、物资、劳力等，有助其战争的遂行。

在中央的官制改革上：日寇以所谓"七七"事变为契机，开始以武力侵略我国华北。伪满傀儡政府为供给其所需的一切物资起见，大事改组傀儡政府，修改伪官制。将伪实业部改为伪产业部，掌管军需生产物资及农产物；伪民政部改为伪民生部，掌管劳工；伪民政部的地方司，改为伪国务院所属的内务局，更改为伪国务院总务厅的地方处。于是地方权归属于伪国务院；伪民政部的警务

司改属伪军政部的一司，并改伪军政部为伪治安部；伪财政部改为伪经济部，掌管商工业。是即供给日寇进行侵略战争的中心部门。

其他方面：

一九三七年公布“总动员法”。其后，即施行特殊技能等的登记和一切物资的检查保管，以备日寇对于伪满人力、物力的随时征用。如在铁岭龙首山，为修筑地下仓库，曾征用大车约六千辆，而人马的损失约为十分之一点五；又在通化为日寇修筑弹药、飞机等仓库，曾征用大车约七千辆，其损失约为十分之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公布了“满洲土地开发株式会社法”，进行荒地的收购，于是日寇财阀、政客们，变成了东北的大地主。一九三八年公布了“银行法”，而使资本较小的银行或歇业，或为大银行所并吞，因而摧毁了东北的民族钱庄和银行业者。一九三九年以兵役为人民应尽的义务和提高伪军素质而公布了“国兵法”，自一九三九年开始检查，迄四五年止，计入队兵不足十万人。但从不合格者中取得的劳工则约四五十万人。说明了该法的实质是剥削青年的劳力。一九三九年五月公布“国债法”，用以剥削人民的膏血，为其对中国侵略战争遂行之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公布“满洲必需品株式会社法”，结果是限制东北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购用，以补日寇国内生活必需品的不足。一九四〇年公布“兴农合作社法”，该法的表面，虽以农民为会员，组织团体机关，以便对于农事有所改良，但其贷款既不及时，且以高利贷与非会员者。更对于农民用具，无论需要与否，竟统一摊派。结果该社成为赢利剥削机关，农民饱受困难。同年公布“商工金融合作社法”，该法的标榜是为发展工商业，须有资金周转机关，但结果是以大部资金贷与日寇商工业者，而是发展了日寇的商工业。一九四二年六月公布“国民储蓄法”，而在鼓励储蓄的美德外衣下，来吸取遂行侵略战争的资金。同年又公布“爱国储

金法”，该法自一九四三年实施，计一九四三年为十六亿，一九四四年为三十亿；一九四五年为六十亿。为了达成这个定额，就展开了强行摊派办法，达成了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的定额。而东北人民为缴纳这项储金，也就卖去食粮和衣服，使生活愈益困难。一九四三年公布“资金管理法”，名为吸收游动资金而重点使用之，实际是缓和通货膨胀，特别是限制东北人民的资金运用，而剥夺之以供战争的遂行。一九四三年一月公布“兴农金库法”，虽说是为了扩大农产面积，提高产量，其实是以榨取东北人民的膏血，贷与了日寇的开拓移民，而说明该法只是扩大开拓移民的农产面积和产量。一九四三年八月公布“金属类回收法”，是又以“七二五”的评价，特别榨取了人民所特有的生、熟黄金和白金等金属品。一九四三年公布“临时邮件管理法”，用以防止军情等的泄漏，因而对于往来信件、邮寄物品施行严密检查，稍有涉及战争或思想的言词，则予以没收。就使伪满国内的挂号信件，约减了十分之四，国外挂号信件，约减少二分之一，一般的信件，亦受相当影响，而妨碍了通信自由，有利于日寇的保密。一九四四年公布学生的“勤劳奉公法”，规定中等以上男女学生，每年分班轮流实行四个月至六个月的校外劳动，或到厂、矿、农村从事劳作（由伪文教部的勤劳司统一支配）。至于小学校的学生，其如何勤劳奉仕，由各该省市计划支配之。如是就减低了学年，奴化了思想，剥削了劳力。伪满曾以敕令公布了“道路法”，该法系为交通、运输及所谓治安维持而建筑国道、省道、县道及警备道路。实施后，不仅侵占了人民土地，剥削了劳力，特别有利于日寇对抗日军的行动和国境的对苏联作战，并增加对所掠夺物资与商品输出运送上的便利。

伪满国有铁道线，均委托日本南满铁道会社经营，即一切修筑经营，受日寇关东军的指挥。每有修筑，则由该会社代为调制计划

及预算，经由伪交通部提出报告，来取得伪参议府的谅解，铁道修成后报告决算，更经伪政府承认作为年息五厘的借款(一九四四年起免除利息)。总计伪满时期共修筑了一万二千启罗的铁道线路，其积欠借款达二十一亿之多。似此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为将来以铁路偿债打下了基础。

以上是经我审议，奏请公布和谅解通过的部分法令，虽不足以说明我在法令方面的罪行，但可以表现出使东北人民在经济、产业、土地、和劳力方面遭受的剥夺；在思想、言论、通信等方面的压迫；在健康、发育、生命方面所受的危害和屠杀，以及对于日寇侵略战争遂行上的援助。因此，也就说明我的罪恶的严重性和应负的重大罪责。

4. 伪满政府派我为签订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的全权代表(已由在押犯韦焕章于九月举行过预备会议)，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偕同随员伪外交部次长三浦武美、日寇关东军参谋山田少佐等，由空路赴南京。于三十日在南京政府大礼堂与汪逆兆铭主席、日寇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大将，正式签订了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其内容为共同防共，三国互惠，和经济提携等。于十一月五日归还。这就进一步团结了日寇统治下的傀儡政权，助长了日寇分割中国领土的策谋。

当正式签订的晚间，举行祝宴时，三国在无线电上均有所广播。我广播的内容，大致是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已签订，从此日本为盟主，则三国的团结可日益巩固，颇堪庆祝。蒋介石仍执迷不悟，不与汪政权合作是不对的等语。其后更在南京首都饭店与新闻记者作了与上述概同的谈话。

5. 日寇小矶国昭任朝鲜总督后，曾正式访问伪满，故傀儡溥仪派我为答礼专使，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初旬，偕同随员清原范益参

议等六七人赴朝鲜,到京城受其接伴委员会的招待,住于朝鲜旅馆。除向日寇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谢其访满厚意外,更访问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及政务总监田中(忘其名),在京城酬酢三日,回长春复命。这是我代表伪满傀儡政权表现了满日的亲密团结关系。

6. 一九三八年伪满成立赤十字社,我任伪总裁。该社组织,在伪总裁下有伪理事长(日寇退役中将充之)、伪副理事长(中国人充之)及理事(中国人约占四分之一)。社务由伪理事长负责统辖办理,直属于伪民生部,更以省、市、县长为支部长。该社资金,是在东北全境内展开普遍的募集而来,由中央各伪机关以至于区村施行公然的摊派。故自成立后取得的捐款总数,最小限不只一亿余元。其募款证书,是我与理事长(最后的伪理事长为日寇三浦中将)共同出名。该社仿效日本赤十字社的办法,协助日本赤十字社的不足,尤其自所谓大东亚战争发生以来为日寇的战争服务,即以东北人民的血汗金钱,供日寇侵略战争之用。

119—2—1135,1,5

于静远笔供

(1954年11月30日)

姓名:于静远。年龄:五十五岁。籍贯:辽宁省辽阳市东二道街。文化程度:留学瑞士国炮兵士官学校。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个人出身:官吏。

学历:

一九一〇年入辽阳启化学堂小学初等班。

一九一二年秋入沈阳第六模范小学高等班。

一九一四年冬入辽阳县立中学插班。

一九一五年秋入大连公学堂(两星期即退学)。

一九一五年秋入辽阳文德中学附课。

一九一六年春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语言科。

一九一九年冬上海同济大学语言科毕业。

一九二〇年冬自费赴德国留学。

一九二一年春转赴瑞士国留学。

一九二一年夏入瑞士国炮兵新兵学校。

一九二一年冬入瑞士国炮兵下士官学校。

一九二二年夏入瑞士国炮兵士官学校。

简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当沈阳东北大学德语讲师。

一九二四年三月到一九二八年春当哈尔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

司令部少校参谋。

一九二四年夏兼横道河子特警总署长。

一九二四年秋到一九二八年春兼哈尔滨木石税局副局长。

一九二五年冬到一九三一年秋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参议。

一九二六年冬到一九二七年冬兼哈尔滨东北航务局顾问。

一九二七年夏到一九二九年冬兼东省铁路理事长公署顾问。

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三一年秋当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当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顾问,十二月兼自治训练所长,兼监察部长。

一九三二年四月当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兼伪满奉天省公署秘书。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当伪满驻东京公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

一九三五年兼伪满留日学生会会长,兼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

一九三六年兼伪满协和会驻东京委员。

一九三七年四月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

一九三八年二月当伪满新京特别市长,兼伪满协和会首都本部长,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兼伪满军人后援会副会长。

一九三九年兼伪满总务厅企划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〇年六月当伪满产业部大臣,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〇年八月当伪满兴农部大臣,兼伪满协和会员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二年九月当伪满民生部大臣，兼伪满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当伪满经济部大臣，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委员。

犯罪事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底，我当哈尔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接到总司令张作相由天津来电，令我赴天津，并未指示为何事情。我想，他是要问九·一八事变后的情形。我于十月三日回到辽阳，向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探询日寇侵略东北的情形。他回答我，他不知道。于是我令人回哈尔滨向参谋长赵金麟报告，我未得到材料，不能赴天津去了。我就在辽阳住下了。这是我怕牺牲，为张作相去卖命不值得，把国家跟张作相分离开了。十一月三日，大汉奸于冲汉忽然赴沈阳，于十一月九日当了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长。即日令人来叫我去沈阳，他令我当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顾问（我猜他与日寇有联络），负伪自治指导部与伪部长间的连络事务及代理伪部长的职务。伪自治指导部顾问日寇关东军司令部附今田新太郎大尉，领我及王子衡、王秉铎、林钧宝（还有二三人记不住了）去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他对我们讲话的内容是，日军仗义出兵把张家政权打倒了，除去虐政，你们要努力把地方自治办好。我曾代理伪部长赴各县参加伪自治执行委员会的成立，如海城、盖平、复县、营口、辽阳、抚顺、安东、铁岭、开原、昌图、梨树、黑山各县。在伪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式典上我曾讲话说："过去张家政权是暴虐的，现在日本仗义出兵把张家政权打倒了，我们能够自治，是要感谢日本的，请大家把自治的事情办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兼当伪自治指导部自治训练所长。训练所的目的是养成作为自治指导员的人材，好分派各地替日寇统治东北人

民。共训练十数名(内有中国人五六人,日寇七八人,朝鲜人一人)。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该训练所归并入伪满大同学院。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兼伪自治指导部监察部长。我曾参加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招待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等的宴会,在沈阳大和旅馆。伪自治指导部解散,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招待伪自治指导部的人员,我作主宾。三宅光治致词说:“诸位为地方自治是有功,很劳苦的,今后尚希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特备粗宴略表慰劳之意,并祝诸位健康。”我答词说:“我们过去承阁下的指导得无大错,何功何劳可言,今蒙盛宴招待,实为感谢,望今后仍赐指导,是为幸甚。”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原是日寇关东军司令部一个办理政治的机构,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日寇把它拿出来,令大汉奸于冲汉当伪部长,以掩盖世界的见闻,好来统治东北。我从这天起甘心作日寇的忠实帮凶,到处宣传日寇的欺骗政策,麻痹人民的抗日的思想,涣散抗日的士气,为日寇成立伪满洲国殖民地政权打下基础,又为日寇造就了统治危害东北人民的人材。这是我投降日寇帮助日寇侵略、统治和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经伪满奉天省公署最高顾问日寇金井章次的介绍,当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兼伪满奉天省公署秘书。一九三二年五月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副处长日寇小泽开策通知我,令我同伪满奉天省公署秘书长兼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组织处长阮振铎及“满洲评论”编辑人日寇小山贞知三人,前往沈阳大和旅馆去见国际联盟调查团,说明伪满协和会的组织情形。三人到了大和旅馆,有位很精通中国话的团员出来接见,向阮振铎和我说:“协和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未等我二人回答,

日寇小山贞知当即说:“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成立的。”团员对他一笑说:“我知道了。那么协和会有多少会员呢?”未等我二人开口,日寇小山贞知当即又答:“有会员二十来万人。”团员对他一笑说:“我知道了。”即向阮振铎说:“您是作什么的?”阮答:“我是医生。”接着问我是作什么的?我答:“我是个落伍的军人。”团员说:“啊!您是在家纳福呢。”团员说:“好吧,我一定把今天会见的情形报告给团长李顿卿,你们请回吧。”这是我帮助日寇欺骗国际联盟调查团,是把日寇侵略东北的罪行给掩盖了,是我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伪满协和会令我代表东北青年,拿着伪满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给日寇外务大臣斋藤实的介绍信,赴日本要求日本承认伪满洲国。我到了东京之后,见着日寇外务大臣斋藤实,把信交给他,他即向我说:“日本承认满洲国,只是法律手续上的问题。”我当时向他说:“请阁下决心来决断这件事情。”我曾在东京朝日新闻讲堂讲演,讲演的内容是,感谢日本仗义援助伪满洲国的成立,而伪满成立后治安是安定了,工商业有了发展,产业开发很有希望,在民族协和的情形下是具备了独立国的条件,请赶快承认吧。我在东京还见过日寇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冈田启介、文部大臣鸠山一郎、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我在名古屋市、京都市、大阪市、福冈市作过讲演,,内容与在东京讲演的相同。一九三二年七月初旬回到沈阳。这时候祖国一致反对日寇侵略我们东北,而我倒代表东北青年去说日寇来侵略吧,把日寇侵略我们东北事实的真象〔相〕给掩盖了,这是我叛祖国反人民帮助日寇侵略最大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伪满新京国务院礼堂开伪满协和会的发会式,有伪满执政溥仪、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及伪满各部总长、司长等到场。我当发会式的司

仪。当场推举伪满执政溥仪为伪满协和会名誉总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伪满协和会名誉顾问，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伪满协和会会长，伪满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为伪满协和会理事长，伪满外交部总长谢介石为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日寇中野琥逸为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这时伪满协和会的经费全年为三十来万元。办的事情是派人（主要是日寇和会说日语的中国人）跟日寇关东军所到之处作宣抚工作，宣传日寇仗义援助成立伪满洲国，要人民归顺伪满洲国。是我帮助日寇侵略，欺骗东北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二年十月，伪满协和会派我代表伪满协和会赴日本久留米，参加日本九州在乡军人大会，在会上我介绍了伪满的发展及民族协和的情形，和感谢日寇仗义援助伪满的成立。我还说："欧美人素来瞧不起我们东亚人，现在日满两国应当携手谋东亚的兴起。我又赴长崎市，在长崎市作了讲演，介绍了伪满的发展和民族协和的情形及感谢日寇对伪满的仗义援助。十月底我回到大连。这是我助长了日寇侵略野心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死亡后，我继承了他出卖祖国权利的中日合办鞍山铁矿振兴采矿无限公司经理，每年鞍山制铁所仍旧给我三万六千元。这是我继续出卖祖国权利的罪行。一九三二年春，我带同于静溶、冈村俊子在沈阳日本总领事馆立案造林公司的合同是这样的：一九二一年，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跟日本人冈村某在本溪县境内祁家堡子、连山关下马塘一带合办造林（冈村某是住在祁家堡子，作买卖窑木营业的）。由冈村某出树栽子和种树的及其他一切费用，有山场的人只出山场，于是共植松树三百数十万棵，我家的山场种有七八万棵。一九二八年冈村某死去，由其妻冈村俊子继续经营，但是没有向政府请求立案。一九三二年我的父亲大汉奸于冲汉死去，冈村俊子要出

卖她的权利，因无人买，没有卖成。这时有山场的人恐怕后来发生纠葛，于是于静溶（我的同祖哥哥）代表有山场的人跟冈村俊子订立正式合同，我也在场参与一切。合同规定将来卖了树木，冈村俊子得十分之五点五，有山场的人得十分之四，余下十分之零点五作为经营的费用。合同订好后，在沈阳日本总领馆立案。这是私自跟外人合办造林，我负有出卖祖国权利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的四弟于静纯赴东京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向日寇在我的父亲于冲汉死后赠与勋一等旭日章道谢。到东京后，日寇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曾招待我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山下奉文及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柴山某都曾招待我们。我曾进日寇宫内向日寇天皇裕仁签名问安。现下我认识到，那是我帮助了日寇的侵略政策，作了它的帮凶，危害了祖国人民，才得到日寇那样的待遇。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伪满外交部派我当伪满驻东京公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一九三四年四月我赴东京到差。一九三四年我承继我的父亲于冲汉得的伪满建国功劳金三十万元。这是日寇拿东北人民的血汗奖励汉奸的钱，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我曾参加日寇天皇裕仁的观樱会。一九三四年秋萨尔瓦多共和国承认伪满洲国，我曾参加伪满驻东京公使丁士源招待萨尔瓦多共和国驻东京总领事的宴会。一九三四年秋，我曾参加日寇秩父宫代理日寇天皇裕仁访问伪满，赴伪满新京之前，在其宫邸招待伪满公使丁士源的宴会。日寇秩父宫由伪满回到东京，日寇天皇裕仁为慰劳他和其随员一行曾开慰劳宴，并招请伪满公使丁士源和我作陪。这是我作了日寇欺骗政策的工具，我负有欺骗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春，伪满与苏联买卖东省铁路的契约成立（这是日

寇强夺的)，我曾参加苏联驻东京大使馆招待伪满外交部次长日寇大桥忠一、伪满公使丁士源及日寇外务省人员的宴会。一九三五年四月，伪满皇帝溥仪访日，乘日军舰到横滨，我曾代理伪满公使丁士源登舰欢迎。伪满皇帝溥仪乘车到东京站时，日寇天皇裕仁以下都在车站欢迎。我曾参加日寇天皇裕仁招待伪满皇帝溥仪的宴会，日寇总理大臣冈田启介招待伪满皇帝溥仪的宴会，伪满皇帝溥仪招待日寇接伴员的宴会，日寇接伴员招待伪满皇帝随员的宴会。一九三五年五月，伪满皇帝溥仪由神户乘日寇军舰回伪满，我曾代理伪满公使丁士源由东京赴神户奉送。这次伪满皇帝溥仪访日，表面上日寇故意以独立国元首的仪礼接待，实则欺骗世界，而行其侵略掠夺政策。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侵略的罪行。一九三五年夏，伪满公使丁士源被调回伪满，我临时代理伪满公使，我曾赴各国驻东京大、公使馆投名片拜访。一九三五年七月伪满驻东京公使馆改为大使馆，伪满参议府参议谢介石来当伪满驻东京大使，我仍当伪满驻东京大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一九三五年七月，我曾随伪满驻东京大使谢介石向日寇天皇裕仁递伪满国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希特勒德国由伪满购买大豆的协定成立，我曾代理伪满大使谢介石招待希特勒匪帮代表基浦，这是日寇外务省在中间拉拢成立的协定，是日寇掠夺我们东北大豆，去向希特勒德国换取物资，我负有帮助日寇行其掠夺政策，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伪满大使馆学务处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监督、统治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成立伪满留日学生会，我当伪满留日学会会长，日寇陆军少将平田幸雄(日寇陆军省推荐的)当副会长。由日本各大“会社”捐款百余万元修筑伪满留日学生会馆(一九三八年落成的)，日寇陆军少将平田幸雄当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长，我当伪满留日学生会馆理事。伪满留日学生寄宿在伪满留日学生会馆者被监视，

被强制拜"天照大神"小庙。伪满文教部在伪满新京设留日预备学校一所，由该校毕业的学生才能得伪满文教部的许可赴日本留学。伪满大使馆学务处根据伪满文教部的许可及留日学生志愿入的学校为之介绍考入学校，否则学校不予考试或不收。一九三六年伪满文教部施行了"新学制"（所谓实务、实习教育，中等学校设专科）。我在思想上也赞成这种学制，因为看见旧日普通中学毕业的人不能就业，就是没有专长，这样一来，不就可以纠正了旧来的偏差吗！岂知，我的思想犯了很大的错误，那有侵略者给被侵略者设想的，否则也不成为奴化教育了。所以伪满文教部施行了"新学制"的结果，全伪满国民高等学校十之七八为农科，余为商科、工科。这是日寇奴化东北人民的政策，使东北人民停留在落后的农业水平上，以供其压榨、奴役。一九三六年伪满大使馆学务处因伪满留日学生在私立大学旷课的甚多，于是要求日寇陆军省军务局对伪满留日学生跟日本学生同样也授以"军事训练"，如果伪满留日学生不受"军事训练"，也跟日本学生一样得不到毕业证书。以致伪满留日学生不得不忍受日寇的"军事训练"。这都是我帮助日寇压迫、奴化伪满留日学生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春，我兼当伪满协和会驻东京委员。这时伪满协和会在东京设一事务所，常驻的人是伪满协和会职员日寇五郎丸保，委员是日寇多田骏、浅原某、片仓衷。我曾参加过聚餐会四五次，在席上也没有作过什么决议，只是些杂谈，我没有看出来伪满协和会驻东京事务所有什么活动。一九三六年夏，日寇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满蒙班长少佐片仓衷，找我陪同他在东京会馆去向日寇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等五六人，说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为伪满协和会对伪满政府地位的声明。他告诉我，不用我说一句话，不用带翻译，只在那一坐就行。可是，我在场经三小时，

看斋藤隆夫等对片仓衷的质问是很剧烈的。这是我帮助日寇欺骗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我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我到差后即扩充预算为六百万元，实行二位一体制，即伪满省、市、县长兼伪满协和会省、市、县本部长。我继续施行“青年训练”，为养成束缚人民思想和推行伪满政府诸种政策的骨干。一九三七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吉林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和答辩。一九三七年六月，以伪满协和会的名义埋葬张作霖的灵柩，我同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日寇甘粕正彦、关东军司令部附大尉辻政信赴沈阳，把张作霖的灵柩由小东关珠林寺送至小西边门外的沈阳车站，专挂一辆车箱送往高山子。我因有病只送到沈阳车站就回长春了。是日寇甘粕正彦亲身送到高山子坟地埋葬的。这是日寇故意刁买人心，欺骗东北人民，才这样作的。而我执行它的政策，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以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名义曾出过布告，言词荒谬绝伦（内容记不得了），压制了人民的抗日思想。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欺骗政策，危害祖国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七年秋，我曾参加伪满三江省依兰县湖南营日寇开拓团的伪满协和会分会成立。

一九三八年，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组织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伪满警察和地方行政，如传令、防空、防火、防谍、宣传，推行伪满政府的诸种政策。妇女儿童也要勤劳“奉仕”，参加防空、防火，致人民受了压迫和奴役。一九三八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安东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和答辩。一九三八年夏，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访问意大利、希特勒德国经济使节团的协和礼装。

一九三九年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助伪满警察和地方行政实行粮谷统制及粮谷“出荷”，致人民受了掠夺和迫害。一九三九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会长张景惠招待法西斯意大利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的宴会，我负有参加招待共同侵略我们中国的轴心国法西斯意大利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的罪行。一九四〇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北安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和答辩。一九四一年夏，我曾参加伪满协和会兴安北省联合协议会，在会上我没发言和答辩。

一九四一年秋，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推行伪满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致人民的生活受到迫害。一九四二年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推行伪满政府的储蓄政策，致人民受到了严重的压榨。一九四三年秋，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开会时，我曾对代表们作了民族协和的演说，内容是伪满协和会跟伪满政府的关系，各民族应当互相协和，“一德一心”援助“亲邦”之战。我推行了日寇欺骗东北人民，要求东北人民甘受奴役的政策，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奴役政策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了粮谷“报恩出荷”政策，是强迫人民以自动的形式出卖粮谷，所以一九四四年度超额强收了粮谷三十万吨为八百五十万吨。食粮不够吃的贫困农民也得按耕种的土地面积负担增加的“报恩出荷”数量，致人民遭到极残酷的掠夺和压榨。我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我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八年之久，参加中央本部委员会二百余次，所决定的事情都是协力推行伪满政府的诸种虐政，致祖国人民受了很厉害的灾难，我负有帮助日寇欺骗、侵略、奴役、压榨和掠夺政策极严重的罪行。

伪满协和会不仅是为伪满政府宣传、欺骗人民，推行伪满政府政策的机构，从伪满协和会的产生是日寇关东军主张成立的来看，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伪满协和会名誉顾问植田谦吉大将的声明，伪满协和会不是伪满政府的对立和从属机关，而是伪满政府的政治母体，是跟伪满政府表里一体的来看；从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是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的“委嘱”来看，都可以看出，伪满协和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假造民意的机构，是日寇关东军一个政治机构，是跟伪满政府并立的。伪满协和会为掌握人民的思想动向，实行了“青年训练”，以束缚、压制人民的思想，强制民意，好来达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请愿“日满合并”，如日韩合并时的朝鲜一进会那样。一方面以受了训练的青年强迫他们作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的骨干，补助伪满警察来迫害人民，如强迫出卖粮谷、严行经济统制、强制“献纳”飞机和铜铁、强制“爱国”储蓄、强制“报恩出荷”。我当了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中央本部长和中央本部委员八年之久，参加作迫害人民的决议，我负有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压迫，假造民意政策的极大罪行。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当伪满新京特别市市长兼伪满协和会首都本部长、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伪满军人后援会副会长。一九三八年春我曾赴日本东京参加伪满留日学生会馆落成式。一九三八年夏我曾参加伪满省长会议，在会议上我没有发言，我负有推行伪满政府的诸种政策，致人民被压榨、奴化的罪行。一九三九年春，我曾赴日本东京参加日寇在东京召开的东亚市长会议。参加会议的市长除我以外，有伪满奉天市长郑禹、伪满哈尔滨市副市长日寇大迫幸男、伪南京市长高冠吾、伪上海市长傅小庵、伪济南市长朱某、伪青岛市长赵祺、伪天津市长潘某、伪代理北京市长侯某、伪张家口市长韩某和日寇代理东京市长三边某、横滨市长、名古屋

市长、京都市长、大阪市长、神户市长某。在东京市议会开东亚市长会议上我曾致词说："满洲国新京市的建设是满洲国的财力、中国的人力和日本的技术,除感谢中日两国外,今后还求援助,把新京市建设得更美丽。"在帝国饭店东京市长的招待宴上,我曾代表伪满市长和伪市长等作答词,内容是,伪满新京各市和伪南京各市得到现在的发展,都是日本援助所致,除向日本感谢外,今后还求东京各市不吝援助,以求共同的发展。我曾参加日寇总理大臣平沼骥一郎的招待宴和日寇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的招待宴。在宴会上的答词是由伪市长分担的。由东京到横滨市、名古屋市、京都市、大阪市、神户市参观游览,在神户市解散。这是我帮助日寇宣传它的欺骗政策和掩盖它的侵略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夏意大利访问伪满经济使节团来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访问,我指示伪满新京特别市公署国都建设局副局长日寇武藤某说明市的建设计划。这是我宣传日寇援助伪满国都建设计划的罪行。〔中略〕

一九三九年夏我曾参加伪满省长会议,在会上我没有发言,我负有推行粮谷统制和粮谷"出荷"政策,致人民受了掠夺的罪行。一九三九年我被伪满总务厅任为伪满总务厅企划委员会委员,我曾参加过两次会议,我记得,会议的事情是建筑材料的统制。我曾为伪满新京特别市计划建筑新的戏院要求配给材料,后来因为募集股本未成,新的戏院也没有兴建。伪满总务厅企划委员会是日寇掠夺政策推行的机构,我当该委员会的委员,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一九三九年秋,为供给市内病院病人喝的牛奶设立"酪农会社",在市郊收买了农民的土地一千垧作为牧场,致使人民遭受了失地无家的苦难,可是人民决没有住病院喝牛奶的权利,我

为日寇谋了幸福，负有推行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冬，我曾代表伪满军人后援会，赴伪满热河省承德参加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院内“忠灵塔”的落成式典。这个“忠灵塔”是为被击毙的伪满军少将支队长朱家训等建立的，朱家训等是被命于一九三七年支援日寇侵略我们中国的。伪满军人后援会是要伪满军人安心地为日寇作帮凶，如给伪满残废军人找职业和给伪满军人家属找副业。我负有帮助日寇侵略、奴役政策的罪行。一九四〇年春，对于伪满国兵法的实施我的认识不够，在我的思想上曾发生过根本的错误。那时我想，东北青年手中有了武器，有了锻练，时机一到，不就是力量吗？因之，在我的思想上是赞成伪满国兵法的。那时我没有认识到，东北青年是被奴役了，是作了殖民地政权镇压人民的工具，也就为傀儡政权和侵略者服务的，跟美帝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是一样的，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所要采取的一种政策，是达成它使殖民地人民去作炮灰的目的。我没有认识到伪满国兵法是奴役、迫害东北青年的，我推行了伪满国兵法(市长是地方征兵官)，我负有推行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当伪满产业部大臣。一九四〇年九月，我当伪满兴农部大臣。“日满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吉本中将，日寇委员是日寇驻伪满大使馆参事官花轮某、日寇关东局总长三浦某、日寇开拓事务局长某，伪满委员是伪满外交部大臣韦焕章、伪满经济部大臣蔡运升、伪满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日满经济委员会”的内容是关于“开拓”和“日满”合办的经济事业。一九四〇年秋我曾参加一次会议(是什么议案和议案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这是我帮助日寇掠夺人民的土地，榨取人民的财富的罪行。我继续推行了强夺人民的土地二千六〈百〉五十万陌的“开拓政策”，致二百万人遭受了失地无家奇重的灾难，其中一百万

人被强迫搬家流离失所,余者被强迫给日寇开拓团耕种土地变成佃户,遭受农具和牲畜被掠夺及家畜被杀害的损害,农民悲愤交集,共死亡五万四千人。在伪满国务会议上我提案和在一九四〇年度伪满省长会议上说明施政方针,是推行"粮谷管理法",规定粮谷"出荷"数量为六百三十万吨,每吨一百四十元(市价贵一倍),人民损失八亿八千二百万元,每人每月配给食粮量为十七公斤。指示伪满各省长努力执行规定的计划。在一九四〇年度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上,我作了同样的施政方针说明,希望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好达成计划的粮谷"出荷"数量。后来,只实行配给九公斤,都市的人民因食粮不足而饿死的每年有三千人。因实施奖励金制度而农民被迫自杀的、被毒打伤重死亡的、"出荷"完了没有吃粮饿死的每年有二万人。

一九四〇年秋我推行了苞米早期"出荷"案,致苞米的水分太多,卖不上价钱,为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一九四〇年秋我曾在伪满国务会议上提案"开拓农场法"、"开拓用地整理法"。一九四〇年冬,我曾赴伪满滨江省呼兰县、巴彦县视察督励粮谷"出荷"情形,以致造成了人民的食粮严重地被掠夺。一九四〇年我支持了继续执行的日寇为巩固其侵略政策的,为准备进攻苏联的北边镇护案,是一九三九年通过的,是以三亿元的巨款于三年间分配给兴安北省、黑河省、三江省、东安省、牡丹江省、间岛省,作修筑"国境"线上的监视哨及其宿舍、各省境内的"国防"道路、警备道路和电话之用(三江省于三年间分得三千万元)。为了修筑这些工程强征民工和马车,致人民被奴役,人民的财富被掠夺。我负有帮助日寇奴役、掠夺政策的罪行。一九四一年夏,我在伪满省长会议上说明的施政方针是,伪满兴农部计划规定一九四一年度粮谷"出荷"量为六百八十万吨,每吨为一百九十元(市价为二倍),人民损失二十五亿

八千四百万元。指示伪满各省长努力执行规定的计划。在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上作了同样的施政方针说明，希望伪满协和会各地分会协力，好达成粮谷“出荷”数量的计划。

一九四一年，我将鞍山铁矿矿权及大石桥附近的苦土矿矿权卖给“昭和制钢所”，得六十万元，存在“昭和制纲所”，每年取息三万六千元。这是我出卖祖国矿权，致人民财富遭受损失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秋，我支持了经济统制案，是日寇限制和降低人民消费的政策，是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布了一定的价格(低于一般行市的价格)，令商店出卖存货，如棉布、棉线等。可是，货物的来源从此断绝，则大部分的商店关闭了。于是乡村的农民买不到棉布和棉线。如果农民因有急需，就不得不冒着“经济犯”的危险用高价去买“私布”，卖一百斤大豆的钱(只有十来元)，也买不了二尺布(需十多元)。农民就这样地受了经济上极大的损失，而还穿不上衣服。我负有推行日寇压榨政策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我支持了伪满交通部提出的修筑“哈大”道路案，是日寇准备侵略战争，便利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所要修筑的，由哈尔滨到大连道路延长一千公里，道路宽二十六尺，无偿地强占人民土地四万亩，致人民遭受失地的损害。我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一九四一年秋，将伪满大豆专管公社、谷粉会社、粮谷会社合并为伪满粮谷公社，统一强化了掠夺的机构，致伪满各县使用伪满警察和伪满协和义勇奉公队的力量，来搜查人民的粮谷。例如伪满龙江省林甸县副县长日寇某，带伪满警察强迫人民“出荷”，到处搜粮，殴打农民，农民们不堪殴打，逃避远处，则他竟将农民们的房子烧毁，致人民受了严重的损害和挨了饥饿。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我被派代表伪满政府赴东京参加“日满华经济恳谈会”，十二月二日到东京，于十二月五日在东京帝国饭

店开的“日满华经济恳谈会”上，我致词的内容是，感谢日本援助伪满经济上的成就和发展，今后尚希中日两国的援助，伪满已经准备好二千六百五十万陌“开拓”用地，力求农业增产，好达成伪满担负食粮“基地”的任务。在会上决定了不偏重发展重工业，而须求发展农业和增产；简化通关手续或废除关税，以便物资交流。我回伪满后，实行了这些决定，致日寇每年掠夺了粮谷三百五十万吨。我曾参加日寇陆军、海军、外务、农林大臣的招待宴会，又曾参加日寇东条总理大臣的招待宴会。八日上午我谒见日寇天皇裕仁，退出时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在回伪满途中曾参拜了日寇的伊势神宫，参观了朝鲜汉城，住了两天，日寇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和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曾设宴招待我。十二月中旬我回到伪满新京，曾对伪满兴农部职员讲话，内容是，我在东京时奉读日寇天皇的宣战大诏，痛感伪满担负食粮基地责任重大，希望我们负“兴农”责任的人和国民打成一片，努力完成责任，仰体“帝旨”以援盟邦之战。我负有帮助日寇太平洋侵略战争、危害东北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伪满兴农部计划强收粮谷七百三十万吨，每吨价为一百九十元（市价为二倍多），人民损失三十余亿元。一九四二年春，伪满兴农部批准伪满畜产会社在兴安北省强收马匹、牛、羊。马五千匹，每匹价二百元（市价八百元）；牛两千头，每头价一百五十元（市价七百元）；羊二万五千只，每只价十五元（市价一百元），蒙族人民共损失六百二十二万五千元。伪满兴农部马政局是为掌握马籍，以备日寇关东军征用和强购，表面上借名改良马种，迫使农民以骒马交配，产马驹时则须登记作价，以备作征用和强购时的根据。因之农民都感配马为苦事，二年间共掠夺了三千匹。伪满马政局之下有伪满马事公会，专营赛马赌博勾当，每年收入巨款，

一九四二年不下一亿四千万元，以一千四百万元交马政局作为改良马种的经费，因公开赛马赌博贻害人民不浅。

伪满兴农部林野总局每年直接砍伐及许可砍伐“国有”林的木材共为七百万立方米，制成材料，把珍贵的木头供给日寇关东军用，如落叶松、楸子木、水曲柳等木，余者大部运往日本。可是，民有林是不准随意砍伐的，农民修盖房屋、制造车辆，沿江沿海渔民制造船只，是买不到木料的，困难已极，生活和生产都受到了危害。一九四二年秋，我同伪满柞蚕会社理事长日寇木村某赴海城、岫岩、庄河三县视察柞蚕生产情形。伪满柞蚕会社专为日寇关东军强收柞蚕茧，以供制造日寇军用落下伞及军用服装的絮棉。山岳地区放柞蚕的农民因伪满柞蚕会社强收蚕茧的价格过低，不够生活和生产的费用，异常贫困，遭到压榨。以上都是我当伪满兴农部大臣，负有帮助日寇宣传、掠夺、压榨和侵略祖国，致东北人民挨了饥饿，受了奇重的灾难和不可估计的损害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当伪满民生部大臣。我提案“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根据此法把伪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青年编成“国民勤劳奉公队”，我当伪满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一九四二年征集“国民勤劳奉公队员二万人，一九四三年征集八万人，一九四四年征集十二万人，预定每年征集二十万人。我前后曾赴安东、营口、锦西、阜新、鞍山、梨树、怀德、沈阳、吉林、双城、桦甸、克山、虎林、大连、本溪等地视察督励“国民勤劳奉公队员”，对他们讲话内容是，对“国家”勤劳奉公是光荣的，要服从队长的指挥，好好地工作，以期早日完成任务，并应注意身体的健康，免得疾病致误工作。一九四四年秋鞍山被炸后，我还去鼓励在“昭和制钢所”工作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员”，对他们说，大家不要怕，日本必胜，大家要安心工作。在安东劳作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员”是挖水

沟、造木船、修筑铁路路基。在营口也是造木船，在锦西是修筑铁路路基，在阜新是挖露天煤矿上的土皮和挖露天煤矿，在鞍山是修筑哈大道路和在“昭和制钢所”内作杂工，在沈阳是在制造军用落下伞的某“会社”作工和在“满洲飞行机会社”作工，在吉林是修筑小丰满水电站，在双城、怀德是修筑哈大道路，在桦甸是修筑河坝，在克山是挖河道，在虎林是修筑日寇军用工事，在大连是建造水泥钢骨的轮船，在本溪是挖掘石灰石矿。“队员”住的是席棚，下雨就漏，吃的极坏且不够，又无青菜，劳作时间在十五个小时以上，因过劳生病死亡的约为百分之四。伪满国民勤劳奉公局长半田敏治报告我，一九四二年“队员”死亡了八百余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了三千二百余人，一九四四年死亡了四千八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夏二千余人在辽阳市修筑防水工事，三个月间因过劳酷暑生病死亡的有一百七十余人。一九四四年秋鞍山被炸伤亡的有一百二十余人。共九千来的宝贵青年被奴役而死亡了。

一九四二年我推行“劳务新体制要纲”，是由伪满各县劳务股按村屯摊派“劳工”编成大队，送至矿山、工地劳作，三个月为一期轮换；每年为数一百万人。我听说，因衣、食、住的状况极为恶劣，又加农民不惯于矿山劳作，致被日寇打死的、过劳累死的和冻饿死的不下百分之十。一九四二年冬，伪满劳务司长报告我，西安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六百余人。我曾去西安参加煤矿工人死亡者“慰灵祭”。一九四二年伪满劳务司长报告我，“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了十万人。本溪湖煤矿瓦斯爆发“劳工”死亡了一千八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劳工”死亡了十万人。人民的中坚在四年间被奴役和迫害而死亡了四十余万人。伪满劳务兴国会与伪华北劳务协会协定，由伪华北劳务协会用欺骗和强制的方法，计划每年“募集”“劳工”来伪满，为数五十万人，但未达到计划的数

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我到大栗子时,我听说有“战俘”二千来人在大栗子铁矿作工。

一九四二年我支持了赔偿“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利润的案件二三件,每件的数目均为一千万元以上(确实的数目记不得了)。这是为供给日寇侵略的军需物资,如钢、铁、煤、铜、铝、铅等。日寇资本家们投资在东北“开发”重工业,而伪满政府保证赔偿其一定的高额利润。结果,日寇得到了侵略战争必需的廉价的军需物资,日寇垄断资本家们得到了高额利润和日寇总裁、理事长及职员们得到了高额的薪金,而东北人民财富不单宝贵的矿产被掠夺,还负担赔偿高额的利润和每年付出百万的劳动力,其中牺牲的即占百分之十。人的物的损失是极巨大的。我负有帮助日寇掠夺政策的罪行。

我继续推行“禁烟”政策,实则是借“禁烟”之名,而去剥削种植鸦片的农民和毒害人民的身心,以增加一项巨款的收入。自从伪满成立后,于一九三三年在热河省强制种植鸦片四十万亩,每亩须交出二十两鸦片,共为八百万两,每两只给二元,而出卖的价格为八元,尚加二成料子,共剥削五千七百万元。在强收鸦片过程中,伪满警察对种植鸦片的农民,不论男女用刑毒打,强逼出卖鸦片,农民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一九四一年实行吸鸦片者的再“登录”为数六十万人,外加上不“登录”吸鸦片的人和吸海洛英、打吗啡的人共不下百万人遭到毒害,每年死亡一万九千人。全伪满设“康生院”约百处,强制收容吸鸦片的人和打吗啡的人,为之戒除,戒完之后送至矿山、工地劳作,每年四千人死亡一半约两千人。一九四三年夏我曾视察呼兰县“康生院”和哈尔滨吸鸦片的人戒除后在五常县下修筑水沟。在热河省强收鸦片八百万两,由朝鲜输入四百万两,掺假一半每两卖四十元,共剥削四亿八千万元。一九四四年我

提案扩大鸦片种植面积，以贱价在奉天、四平、吉林三省十二县内强收人民土地十五万亩，由伪满禁烟总局管理的“组合”种植，产鸦片二百万两，运往上海换得大量的棉布。东北人民只因误吸鸦片，受了剥削，又遭到有形无形的毒害，最后还被奴役死亡了，足证日寇侵略政策是怎样的恶毒了。

一九四三年春，我对伪满全体教员广播了伪满建国精神，内容是“培国本于唯神之道”，“振国纲于忠孝之教”，与日寇一其德、一其心。一九四三年我支持了“矫正法”，致每年有三万人被抓去送往矿山、工地劳作，待遇极坏，因过劳、生病、冻饿而死的不下半数，残酷已极。一九四三年我支持了增税和新设税案，增税是烟税、酒税、交通税、游兴税、饮食税、所得税、承继税，新设的税是门户税，为农民加重了负担。这是日寇的压榨政策致东北人民遭受了损害。一九四三年我支持了土地造成案，在梨树县、郭尔罗斯前旗境内强收人民土地三十万垧，造成水田，致人民遭受损失一亿五千万元。一九四三年我与伪满文部大臣卢元善共同提案“学生勤劳奉公法”。一九四三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县境内发生百斯毒，由我令“保健司”派去的“防疫队”，用我同意的烧毁方法烧毁房屋二百余间，烧死患者或疑似患者共七百人。伪满警察和“防疫队”在检查百斯毒过程中有侮辱妇女和杀害牲畜的事件很多，人民遭到极严重的迫害。一九四四年我支持了伪满国务会议决定的粮谷“报恩出荷”案，虽未达成所期的数量——八十万吨，然又多掠夺了三十万吨，一九四四年度粮谷“出荷”量才达到八百五十万吨。一九四四年秋，我曾被邀赴沈阳北文官屯日寇九一八部队，参观其制火药工厂，为的是要我对在工厂工作的劳动群众讲话，以安定劳动群众的心情。我讲话的内容是，大家勿需惊恐，要安心工作，日本操必胜之算。这是我负有为日寇宣传、欺骗劳动群众，要他们效劳于日

寇的罪行。以上是我当伪满民生部大臣，负有帮助日寇奴役、掠夺、压榨、欺骗、禁烟政策，致祖国人民遭受极大的迫害和毒害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当伪满经济部大臣，我继续推行了储蓄政策。在东北人民已经不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还计划一九四五年的储蓄额为八十亿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完成了三十亿元。人民卖粮须储蓄，人民卖房产土地须储蓄，人民卖东西须储蓄，人民领“配给”须储蓄，人民遭受极严厉的压榨。在经济统制政策下，手工业者得不到原料和燃料；人民买不到生活资料，如农具、车轮、车套、麻袋等；买不到生产资料，如布疋、棉花、针线、靰鞡、油类和燃料，人民没有穿的、没有烧的挨了冻。可是，东北人民的财富，一九四四年被日寇掠夺了煤、焦炭一千二百万吨，钢、铁百余万吨，其他我不知道数字的矿产如铜、铅、铝、云母、石棉、工业用盐等很多。一九四四年伪满税收为十一亿元。一九四五年伪满经济部专卖总局专卖食盐每百斤为六元，共剥削二千四百万元。伪满中央银行到伪满灭亡时发行纸币一百二十亿元，贻害人民极巨。一九四五年春，我支持了慰问日寇案，这是一九四五年春因日寇遭受空袭缺乏食粮，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带同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满总务厅次长王贤湋赴东京慰问，并赠与日寇大米三十万吨，食盐七千担。这些珍贵的大米足够全东北人民吃半个月的，而送与人民的敌人，致人民连粗粮都吃不着，挨了饿。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当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我曾向伪满经济部职员们讲话，内容是，苏联虽于今天早晨向日寇宣战，大家不可惊慌，静候东京的决定再与其周旋。这是我到伪满灭亡的前夜仍执迷不悟，甘作日寇的宣传工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伪满国务院决定一部分移往通化，我被指定随伪满皇帝溥仪赴大栗子。八月十一日晚伪满总务厅给我

送来伪满纸币十二万元，作为安家费和旅费。这都是东北人民的膏血，我竟无耻的接受了，致人民又受了损失。〔下略〕

119—2—1152，1，5

阮振铎的笔供

(1954年7月14日)

姓名:阮振铎。年龄:六十二岁,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二日生。性别:男。原籍:铁岭县西关。现住所:伪新京市北安南路九〇七号。文化程度:大学毕业。

学历:一八九九年入私塾,一九〇七年铁岭银冈小学堂毕业(四年),一九一一年奉天省立实业学堂毕业(四年),一九一二年奉天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肄业(一年半),一九一八年奉天日本南满医学堂毕业(六年),一九二〇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医化学(一年半)。

经历:一九一八年充奉天满铁医院内科医员,同年临时兼奉天省城预防鼠疫医,一九二二年临时兼奉天省高等文官考试襄校官。

一九二三年任奉天公立医院长,同年兼东北大学校医,一九二四年兼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医,一九二五年兼中华全国医药学会奉天分会长,同年兼奉天高等检察厅检验吏讲习所主任教员,一九二八年临时兼洮辽一带预防鼠疫帮办。

一九三〇年任长春吉长吉敦铁路医院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任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顾问,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任伪奉天省政府秘书长。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任伪新京国都建设局长,一九三三年临时兼伪国道局国道会议委员,同年临时兼伪国务院官衙建筑委员会

委员，同年临时兼伪满洲电信电话会社设立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一九三六年临时兼伪满洲图书会社设立委员长。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任伪驻日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三八年兼伪满留日学生会长，同年兼伪协和会东京事务所长。一九三九年临时兼签订满波互设领事馆协定全权委员，同年临时兼签订日满意贸易协定全权委员，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临时兼特派参加西园寺国葬仪式大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伪交通部大臣，一九四一年临时兼特派赴日谢恩大使随员，同年九月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

一九四二年十月任伪经济部大臣，同年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同年兼日满经济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伪外交部大臣，同年兼日满经济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四月临时兼特派赴日慰问大使随员。

我的罪行：

一九一八年四月我从南满医学堂（在沈日本站附属地）毕业后，就在奉天满铁医院充当医员，给日本人服务。

一九二〇年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就更深一层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因为和日本人接触了七八年之久，就养成了崇日亲日思想，看不起祖国的一切，竟把日本的医学校完全看做是能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不明白日本的用意是要将中国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设立医学校，正是为推行这种政策的一种前驱手段。由于我个人的崇日亲日思想较深，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金井章次（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医学博士）作帮凶起，加入到伪政权。我和金井的结识，是我在奉天公

立医院当院长的时期(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因一九二八年洮辽一带发生鼠疫,为办防疫与他认识的。

在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任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顾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金井章次充当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最高顾问,当时我在长春吉长吉敦铁路医院当院长(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底止),由于他的介绍,我于同年十一月七日就当上了该伪维持会顾问。这是我认敌为友,甘心放弃了十七八年的医业,做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走狗的开端。我在吉长医院,每月薪水四百五十元,并未感到生活困难,日寇也未曾威胁过我,可是竟甘心去当所谓伪顾问,只是为贪图更多得些收入,过更富裕的生活,为自己打算,未顾及到祖国的前途,完全没有一点民族观念。

伪维持会委员长是袁金铠,副委员会长是阚潮洗和赵欣伯,委员是翁问卿、高毓衡、张成箕、吴贯一、王光烈、方煜恩等,伪维持会的日人最高顾问是金井章次,顾问是升巴仓吉、高井恒则和三浦等。在"九一八"日寇占领沈阳后,省城各机关都被霸占和破坏,尤其是把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金融机关,也都被日寇宪兵所看管,省城各商号关门闭户,路上行人断绝,已陷于无政府状态。伪维持会首先替日寇在省署内恢复了各科,并成立了财政、农矿两厅,伪财政厅长是翁问卿,伪农矿厅长是高毓衡,都是袁金铠从委员中派出兼充的。此外还有伪奉天市公署,伪市长是赵欣伯(在日寇占沈阳后,由关东军大佐土肥原贤二当市长,赵欣伯是继土肥原贤二之后),省城的警察大队由他统辖指挥。伪维持会主要是筹备和恢复政府的机构,维持一时的局面,听候问题的解决。在同年十一月以后,城内各商号渐有开始营业的,因为买主极少,还是做半日的生意。

我在伪维持会主要是阅每天收到的公文和给委员长袁金铠办理与金井章次之间的连络事情，这就便利了日寇掌握省公署的行政，也就给以后成立伪政权造下了一部分的基础，是应负相当责任的。

在伪奉天省公署秘书长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任伪奉天省公署秘书长。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伪维持会解散，臧式毅出任伪省长，成立伪奉天省政府，改委赵鹏第为伪财政厅长，冯涵清为伪农矿厅长，并成立伪教育筹备处，委韦焕章为伪筹备处长。同时委我为伪秘书长，我就继续做伪省长臧式毅和日寇金井章次之间的连络事情，和阅每日省署收到的公文等事情。过了几天，由臧式毅委了三名参议是：金毓绂（“九一八”前的辽宁省教育厅长）担当文化教育，帮同韦焕章成立伪教育厅；穆元植担当行政，帮助我阅公文，王兹栋（日寇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和臧式毅同学）担当军事。又委了数名咨议是：王庆璋（以后当民政部土木司长，奉天市长，驻上海总领事、邮政总局长等职），阎传绂（以后当奉天市长、滨江省长、吉林省长、司法部大臣等职），徐绍卿（以后当奉天实业厅长，锦州省长，驻意大利公使，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等。又委了数名秘书：是曹承宗、关义铎、黄骊庸、郭秘书等。在这时，省城市面稍见恢复，但一般人心仍是惶恐不安。

当日寇占领沈阳后，辽宁省陷于无政府时，祁彦澍（当过辽宁省教育厅和财政厅厅长）等，在锦州成立辽宁省政府，以省长臧式毅名义，对于各县继续办事。在十二月臧式毅当了伪奉天省政府省长，伪省署也以臧式毅的名义，对于各县下令，都是向各县和各税捐局要钱，一时使它们无所遵从。到一九三二年春，日寇出兵占领了锦州，于是全省陷入了在伪政权统制之下。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臧式毅在奉天和由哈尔滨来奉天的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由吉林、黑龙江乘飞机来奉天的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于奉天市商埠地孙督军花园楼上，开“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议”，当日出席的，听臧式毅事后说，还有赵欣伯和日寇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板垣征四郎等，委员长是张景惠。在会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东北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保境安民”的声明，并通电全国。在当时的各报上，如东三省公报，盛京日报等都有登载。这就是东北公然变成日寇殖民地的开端。

在伪维持会成立同时，于省署楼上成立伪“自治指导部”，部长是于冲汉，有日人中西敏宪、结城清太郎（以后当过国都建设局总务处长，开拓总局长等职）等主持一切。当时于静远、王子衡、曲秉善等都在该部工作。自治指导部主要是派日人指导官到各县，特别是沿南满铁道线的各县，如海城、辽阳、铁岭、开原等，各组织县地方维持会，办理县行政，都说是自治，不用省长派县长，完全由自治指导部去指导。这个自治指导部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政府成立，改为资政局，隶属于伪国务院，不久就取消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由各省派“代表”上旅顺去欢迎很早就在旅顺等候当皇帝的溥仪，以前是极秘密，在这时才发表。当时奉天省是由臧式毅派葆康、冯涵清、方煜恩等去的。吉林省是林鹤皋等去的。哈尔滨特区和黑龙江省都有“代表”。三月九日，由张景惠亲自以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同赵欣伯到汤岗子，迎接已经从旅顺到汤岗子坐等的溥仪赴长春就任伪执政。同日成立伪满洲国，发表伪年号为大同，改长春市为伪新京市；公布伪“政府组织法”。在伪执政府内设内务、参议两府，国务、立法、监察三院和最高法院等；在伪国务院成立民政、财政、军政、实业、外交、交通、司法七部和总务厅；并发表“建国宣言”，主要内容是，感戴日寇

的仗义，驱逐了东北军阀，说伪政权的成立，是出于民意，并对于日寇在东北时代抢夺的既得权，承认继续有效等，替日寇掩饰侵略。

同时发表了“临时省县的组织”。伪奉天省政府是在三月九日改为伪奉天省公署，成立总务、民政、实业、警务、教育五厅。由伪执政委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长，金井章次为伪总务厅长，赵鹏第为伪民政厅长，徐绍卿为伪实业厅长，三谷清为伪警务厅长，韦焕章为伪教育厅长，都是由伪民政部总长臧式毅推荐的。这五个厅有两个厅长是日人，其他三个厅长虽不是日人，而总务科长都是日人。在各县政府和成立维持会的县，一律改〈为〉县公署，把原来在各县的自治指导官，由伪国务总理和伪民政部总长委为县参事官。奉天省各县是由伪奉天省长臧式毅推荐的(其他各县都是由各该省长推荐，经伪民政部总长提出，伪国务总理加委)。从此省县都正式加入日人，就是一切行政都归日寇掌握了。

在同年五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到奉天住在“大和旅馆”，当时有关东军的嘱托小山贞知(大连满洲新闻社长)到省署叫我同他和于静远去见调查团，并告诉我说，“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指使军队破坏铁路线，日寇关东军为自卫不得已出兵，至于伪政权成立，是出于三千万的民意等话。因调查团甚忙，见了未能说出。以后在报纸上把这个意思发表了。这是我替日寇掩盖侵略的行动。

以上是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通过我在伪奉天省署所做的和我听说的伪政权当时的情况。其中在伪奉天省公署成立各厅时，我也同意日人加入，并和小山贞知等去见国际调查团，在报纸上给日寇掩盖侵略，欺瞒人民，这些我都应当负责任的。

在伪新京国都建设局长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任伪新京国都建设局长。一九三二年三月

九日，在长春建立伪满同时，成立伪新京国都建设局。局长是日人丸山。建设计划是以长春县城和南满铁路终点的长春车站为基础，向县城西南方展开的一种都市计划，也就是把南满铁路长春车站附属地扩大的一种计划。这个计划内容，是由恢复日本东京地震所谓“震灾复兴局”的技师近滕安吉，当时是伪国都建设局技术处长，和大阪市建设科技正沟江五月，当时是伪国都建设局计划科长等计划的。在丸山局长时，是一面计划，一面收买土地，一面建筑房屋(因为当时各伪部局院都租民房使用)，建设经费和收买土地费，均由伪政府的一般会计项下开支。这个计划未完成，丸山局长被撤。我于同年十二月到伪建设局继任局长后，在一九三三年底，才完成全部的计划。并改变建设经费为特别会计，采用整买零卖，贱买贵卖收购土地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伪建设局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的策划，经我同意的。建设计划是采用放线式和棋盘式的街道，路幅宽分五、十五、二十五、五十、六十米达五种，在十五米达以上的道路，不设架空电线，所有路灯线电话线等均从地下通过，不修路面电车，预定在必要时修地下铁道。房屋建筑高度，不超过二十米达，是为多卖地号，距离都有指定，是为防火灾。又为使都市的全面繁荣，在各居住区内设商店街，不设商业专区，特别是为作政治中心的都市，在建设区域内不设重工业，仅设必要的轻工业区。像这样计划建设的伪国都，集中了各官厅的建设，很明显不是长久为满洲建设，更谈不到是为中国人民建设，而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进行殖民地化的政治中心地，进而作为侵略全中国和全亚洲的根据地。我实施了这个计划，就是给推行这种政策，应负有重责的。至因实施建设造成的破坏农村，使农民失业，住户流离失所，也负有责任的。

伪国都建设局的计划区域面积，是以长春县城西门外高台子

为中心，向东约八千米(启罗米达)，西约七千米，南约七千米，北约十千米，总面积为二百万平方千米，约土地三十万亩(一亩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达)。实际建设计划区域是由长春县城西门外起，西至孟家屯车站，北由满铁附属地起，南至南岭以南，和长春县城西北方一部分，共面积为一百万平方米，合土地约十五万亩，作为第一期计划建设区域。伪建设局印有大小各式的建设计划区域图，在伪政府公报上也有登载。预定建设完成后，能容一百万人口。

这个建设计划，是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间起，由伪建设局技术处长近滕安吉、计划科长沟江五月等开始计划，于一九三三年作成，经我同意，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因伪建设局是伪国务院的外局)提出伪国务院会议，通过伪参议府由伪皇帝裁可公布施行的。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间，伪建设局实施建设的面积，约二十一万平方米，即由长春县城西门外和满铁附属地起，向西南方展开，已将主要的道路，所谓大同大街，兴安大路(南北称街，东西称路)等和公园，所谓大同公园，白山公园，牡丹公园等，都大部分修筑完成。

伪建设局买收土地：在建设计划区域内所占用的土地，除原来长春开埠局剩余的一些零星土地外，大部分是买收郭前旗齐木特色木丕勒蒙王的土地(约占全区域面积的四分之三)，和农民所有的耕地以及菜园地。蒙旗地，是由蒙王在长春市内设立的租子柜手中买收的，在一九三二年已经大部分收买完了，这些土地中荒地或沟渠(多作了公园)甚多，买收价格，规定荒地和沟渠地每亩二元至三元，耕地和菜园地是按土地等级，每亩由二十元至四十五元。但实行买收时，伪建设局土地科时常压低等级，就是顶上等菜园地，一亩得到四十五元的极为少数。在建设计划区域内，农民所有

的土地不卖不行，这是因为在一九三三年公布有“土地收用法”，强制买收，这个法令是于同年由伪建设局内专门制定规则法令等的山田正夫和伪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以及民政部土地局、伪总务厅法制局长三宅福马等作成的，经我同意，由伪总务厅提出伪国务院会议，通过伪参议府会议，经伪皇帝（当时是执政）裁可公布施行的，是一种强抢农民土地的恶毒法令。

伪建设局将买收的土地分成地号，按坪（每坪合三十六平方尺）出卖。在商店街的地号出卖价格每坪二十元至二十五元，大广场周围四十元，住宅区地号每坪一律八元。商店街地号所占的面积，较住宅区地号所占的面积甚小，仅约占住宅区地号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下，如平均都按每坪十二元计算，每亩是一百七十坪，可卖得二千余元，就是市利二千倍。伪建设局以这项买卖土地的差价，作为建设道路、公园和买收土地等费用。

这样边买边卖，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仅买收二十一万平方米区域内，约七八千亩的耕地和菜园地，就消灭了新发屯、杏花村、杨家林子、黄瓜沟等村屯，和撵走了长春县城西门外散居的各住户，总共约有三百余家，都指定迁移到县城南关伊通河东岸二道河子区，重新盖房居住。但是农民因为再得不到土地耕种，无法谋生，不得已就投奔他乡，原来贫户因为领的迁移费不够盖房，也就流离失所了。给农民造成失业破产，和使多数居民遭受无家可归的意外灾害，我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三三年，我在伪建设局时期临时兼伪“满洲电信电话会社”（简称电电会社）设立委员会委员。当时伪政权的各部总长、次长、局长等，和长春市各大商号老板，以及各地方银行经理等，都罗列为委员。委员长是日寇退役海军中将山内静夫，副委员长是三多（蒙古人）。这个会社是满日官商合资，伪满是以原东北各地电

报局、电话局等的各种设施作为现物出资，并加入一部分股份。委员会目的就是为募股，因之各委员不拘多少都得认股，每股一百元，分四期交纳，我认了二十股。这个会社于同年成立，把伪交通部所管的电报电话和放送等事业，全部交给该会社经营管理。这个会社因有日寇方面出资，是属于特殊会社的一种。由于这个会社成立，就遮断了东北人民对内对外的消息，任凭日本侵略者捏造欺骗宣传。我是设立该会社的委员，我是应负有责任的。

此外还临时兼伪国道局"国道会议"委员。委员长是伪国道局长植木伦太郎。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地点是在长春大马路伪国务院会议室(原吉长道尹公署)，由植木说明国道对于交通治安的重要性等。出席委员人数和姓名想不起来了。

还临时兼伪官衙建筑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是伪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干事是伪总务厅营缮处长等，开会时，由伪建设局技术处长近滕安吉代我出席。

在伪文教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是在头一天晚七时至十时，于伪新京总务厅长官邸，由张景惠(当时是伪军政部大臣)和伪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传达溥仪的命令，并叫次日到伪宫内举行所谓亲任式。我到伪文教部是继郑孝胥的后任，继续做了恢复奉天农科大学、吉林高等师范和接管了哈尔滨工科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由哈尔滨日寇特务机关管理)，并各省立中等学校。一九三六年各地方小学校学生数，仅恢复到事变前的百分之六十约八十万左右，中学校学生数约五万、高等学校学生数不足一万。因为各地缺少学校，造成失学的学生数是很大的。就是进入了学校，由于原有的教科书不准使用，新教科书又没有，特别是小学教科书，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在伪文教部内经编审

官任意删改后，还得送到日本国内印刷（说是因为有带色图画，实际是拿到日本去看），印出来的又改，改后再印，并且册数不多，滥行发送，造成有学生无书，下学期才能看到上学期的教科书，在校的学生和进不去学校失学的学生一样，就是比较好的奉天省内各学校，多半是这样，其他交通不便的省，实际等于没有学校。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春伪文教部制定公布的所谓新学制要纲，使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升学。

所谓"新学制要纲"，是在一九三六年远滕柳作当伪总务厅长时，由日寇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大佐（当时管伪文教部的事情，以后当溥仪的"御用挂"），指使伪文教部总务司长皆川丰治和学务司长神尾一春起草未作成，在一九三七年春经继任伪学务司长都富佃一手做成的。在要纲做成后，曾招集一次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和中学以上的学校长等在伪文教部内开会讨论。当时出席的，有吉林省伪教育厅长张书翰、吉林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冠标、龙江省伪教育厅长荣孟枚、三江省伪教育厅长单作善、锦州省伪教育厅长魏象贤、奉天省伪教育厅长韦焕章、奉天农科大学校长宇田等。由都富佃说明要纲内容，主要是施行所谓实务教育，中等学校毕业年限缩短一年（以前中等学校分为初级三年高级三年三三制）改为五年制等等。在开会后不久，这个要纲经过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会议，由伪皇帝裁可，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名义，伪文教部大臣阮振铎和伪民政部大臣吕荣寰附署，在伪政府公报上公布了。由于这个要纲施行所谓实务教育，缩短中学毕业年限，教科内容低下，就造成了中学毕业学生，不可能向中国内地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升学，使有为的青年学生，只有接受奴化教育和由中学毕业变成劳工以外别无出路。日本侵略者的这种奴化教育政策是通过我来施行的，也就是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陷害了数十百万的青年，承认这个罪

行是最严重的。

一九三六年临时兼伪“满洲图书会社”设立委员长。该会社于同年成立，就把书籍出版完全统制了。

在伪驻日大使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任伪驻日特命全权大使。六月三十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伪大使馆内，七月二日向日本裕仁递了伪皇帝国书，并发了一个所谓声明，大意是要努力和日本亲善，完成所谓一德一心的使命，在当时东京各新闻都有登载。最可耻的是在十一月间南京被日寇攻陷的时候，我还到裕仁处签名祝贺，这个行动是一点也没有中国人的味了，自己承认是天良灭尽。

一九三七年冬，伪满和西班牙弗郎哥伪政权“互相交换承认”的公文书，是以我的名义(驻日伪满大使)代表伪满政府交给驻东京西班牙公使的。并发表加强枢轴国家力量等谈话，在当时东京各报上有记载，还有的报纸上登了我和西班牙公使的握手照像。这是我和反人民政权的握手，也就是我反人民的一种行动。

一九三八年春，德国希特勒承认伪满时，我曾到驻日德国大使馆，向德国大使表示两国发生国交的感谢，并发表了满德两国今后将日益亲善，和伪满国际地位增高的谈话。同年，意大利也承认伪满，是由意大利驻日大使用电话告知我的，我当时也表示了感谢，并发表类似对德一样的谈话，这些谈话，都在当时的东京各报上有登载，特别是在东京日日新闻纸上，还登载了我听电话的照像。这是我忠于反人民的伪政权，也就是给日本侵略者增长了气焰。

同年秋，东京市长主办，在东京市后乐园运动场内，举行所谓“日德意防共协定”成立市民庆祝会。会场上有东京市立几个学校的学生，和由市区町会拉去的一些市民。当日被邀出席的主宾，是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和德意两国驻日大使。陪宾中有我和西班牙驻

日大使,以及罗马法皇驻日代表等。由东京市长致开会词后,广田和德意两大使都各演说,大意不外什么“加强枢轴”、“共同防共”等欺骗日本人的那一套,我也以伪满驻日大使的资格,念了一篇祝贺协定成功的词,尽了拍捧的任务。这个情况,在当时东京日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等报上,都有登载。我参加了这个庆祝会,并念了祝词,就是赞同他们欺骗人民的防共宣传,也就是站在各帝国主义国家方面帮助反对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秋,意大利访日满经济使节团约十余名,由团长埃脱列昆奇(我的译音)率领,先到日本,在东京约住两个星期后到伪满,在伪新京也约住了两个星期。他们是和伪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日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一同由伪满回到东京的。听星野直树到伪大使馆说,该使节团在伪新京的时期,由星野直树、企划处长松田令辅、主计处长古海忠之以及伪外务局和他们商定一个“满意贸易协定”草案,内容主要是以满洲产的大豆、豆油等交换意大利的机器、汽车等物,并对我说,伪政府已经授权叫你代表伪满,和日寇外务省、意大利经济使节团签订所谓“日满意贸易协定”。在第二天(日子忘记了),就在日寇外务省内,我和日寇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意大利经济使节团长,互相在所谓“日满意贸易协定”书上签上了名字,并发表了声明。伪满的声明,大旨是从此可以加强枢轴国的力量,当时在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上都有登载。以后虽然不知供给意大利的大豆、豆油数量有多少,可是,只看见意大利输入来的小汽车(菲亚特汽车),也就知道一定是拿大豆换来的。由于我签订了这个协定,才把农民的辛勤劳苦血汗结晶供给意大利法西斯者,助长了它们残害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我支持了日本帝国主义。

同年秋,伪政府还授权我为所谓“满波互设领事馆”签订协定

全权委员。在东京伪满大使馆内和波兰驻日大使签订了“满波互设领事馆协定”，内容是波兰在哈尔滨，伪满在华沙各设领事馆一处。但互设领事馆不等于波兰承认伪满，仅在设立领事馆一点上两国发生了关系。可是在声明时说两国已发生外交关系，并未露出在设立领事馆一点上，是容心欺骗世人听闻，妄图抬高伪政权的地位。这就是我忠于伪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卑鄙可耻的行为。

此外还参加过在东京日本赤十字社内由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和日本赤十字社理事长签订的“接收日本赤十字社在满洲财产的协定”。把这种财产作为伪满红十字社的财产，实际上伪满的红十字社就是替日本赤十字社办事，也就是日本赤十字社事业的扩大。我参加这个协定，就是赞同被日寇利用的政策。

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间，每年一次或两次赴日本各地慰问日寇陆海军病院，对于京都、名古屋、大阪、九洲、四国、北海道各日寇师团司令部所在地陆军病院和横须贺海军病院都去过了。各地慰问金数目不知多少。慰问词是由我念的，都是祝“武运长久”、“治愈再起”等拍捧的话，就等于我祝血染满身中国人血的恶魔，快起来把中国人杀绝了才好。凡是人就不肯做的，我竟做了，承认是罪大恶极。

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东京兼“留日学生会”长。一九四〇年秋，日寇宪兵和警察秘密逮捕了留学生十余名，当时未抗议，也不敢抗议，一直到同年底我回长春时，还未完全释放。我是只顾自己当伪大使作伪大臣，不关心保护学生。以后虽然放出来几名，听说其中姓石的学生送到长春后还判了七年的徒刑。这是我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中国人民的。

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东京兼伪协和东京事务所长。这是因为日寇国家制度上不许可日本人设立外国机关在国内活

动，所以叫我担名。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东京临时兼特派参加西园寺国葬仪式大使。

在伪交通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伪交通部大臣。交通部的机构，是由伪大臣、次长（当时是饭野）、技监（当时是坂井）、官房和道路司、水路司、铁道司、邮务司、航空司、都邑计划司以及各科组成的。并直接管辖有邮政总局和各工程地的土木工程处。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伪交通部主要做的工程是：

关于所谓“国道”的修筑和补修工程，约有一九四〇年所修的“国道”总延长里数三千余公里的一倍以上，这是因为桥梁等已经架好，仅做土路基和铺石子，所以较快。原来所谓“国道”，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东边道和热河省境内沿边一带的所谓“警备道路”；一种是由漠河到黑河等沿黑龙江岸一带的所谓“国防道路”；一种是由哈尔滨起到大连的所谓“哈大道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十月间，主要修筑的“国道”，是黑龙江沿岸由黑河到漠河的“国防道路”，热河省境内沿边的“警备道路”的一部分，和由辽阳到鞍山、由公主岭到双城县境的“哈大道路”的两大段，共计总延长约六千五百余公里。这些道路线的计划和测量等，基本上是早在伪国道局（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属于伪国务院外局之一，在一九三九年废止并归并伪交通部内）作成的，在伪交通部实际施工时多少有些变更。两年中，共动员劳工约百万人，这些劳工，除一部分修筑桥梁等工程的熟练技术工人是由关内骗来的以外，主要是由各省县摊派出来的，送到工程地经土木工程处（是由合并伪国道局一同归过来的）交给包工人使用。因为包工人是只顾自己发财，对于工人的待遇极为恶劣，经常克扣工人的给养，用腐败的食物，还不给

足，没有卫生设施，就是有，也是形式，等于没有一样。工人们住在一层破席棚内，不能遮风挡雨，阴湿已极，夜间没有被盖，蚊蝇甚多，染患疟疾、痢疾的不少，更因为强度劳动，所以伤亡的不少，死亡率在百分之十，有的竟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可是，我并未到工地去看一次，也未过问，这是对于中国人漠不关心，自己不是中国人的态度。所谓"国道"和各"省县道"，是可以公开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全境道路总延长约八万余公里。关东军直接修的军用道秘不发表，还不在内。仅就修完的八万公里的道路，也得先后需要数十百万的劳工。尤其是修筑所谓"国道"，主要目的是为便利日寇的军事输送，其中"国防道路"是为防卫和准备进攻苏联，"警备道路"是为打击抗日军和镇压人民，"哈大道路"除供物资输送外，还准备作飞机的滑走路。我在伪交通部指挥修筑这种帮助日寇侵略打击人民抗日行动的道路，并使广大人民服劳役，遭受伤亡灾害，是应负责任的。

关于所谓治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主要修筑了穆稜河堤，辽河水系太子河流域的蓄水池，彰武县境内的蓄水池，和辽中、盘山、彰武等县境内的辽河下游土堤等工程。这些工程，是由伪交通部水路司计划的（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计划的），经我同意，由各该地的土木工程处兴修，特别是辽河下游土堤的计划，两岸土堤的距离为一启罗米达（公里）。这两年中已在河的一岸成段的修了几部分，堤高类似铁路的土路基，当地居民认为是修铁路，不知道是修河堤。可是等到将来两岸的土堤都修成时，夹在土堤内的沿河村屯，全得破坏，不迁移，就得被淹没。这项治水工程动员劳工约十余万人，大多数是由省县摊派出来的，有一部分是组成"勤劳奉公队"派遣出来的，从各省摊派出来的劳工，也是由该地的土木工程处交给包工人使用，遭受的恶劣待遇，和修道路的劳工大致

相同。这种治水工程的目的，说是为防止河水泛滥，兴修水利，实际是怕洪水侵害像鞍山等那样为日寇作军事生产的基地，并准备给日寇移民辟水田使用。我给日寇执行这种残害人民的治水政策，是应负责任的。

关于航空，伪满在奉天设立有“满洲飞行机制造会社”和“满洲航空会社”，社长都是日寇退役军人，属于特殊会社，不受伪交通部指导，可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伪交通部土木工程处给它们修了约三十余处飞机场。这些飞机场多数是供军用；伊兰境内就有十余处，目的是为镇压人民军抗日的活动和加强对苏联的防卫。我执行这种反人民的建设帮助日寇侵略，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一年我到伪交通部知道，伪满把东北各铁路从委托到满铁经营后，在每年度终，由满铁和伪交通部铁道司，将满铁一年中新建设的程度和在这一年中经营的情况清算一次。这是在一九三三年伪满根据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和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签订的所谓“日满议定书”(在报纸上发表了)和“附件”(未发表)，把铁路筑路权、经营权委托给日寇，就是把原来东北各铁路，奉山路、打通路、四洮路、洮昂路、吉长路、吉敦路、奉吉路等，委托满铁经营管理。这个手续是在同年由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办的。每年的清算一次，就是满铁把委托经营后，新修的敦图线、四梅线、梅临线、延佳线以及北安到黑河、锦州到热河等铁路垫款和利息中，扣除委托经营的各铁路每年营业的收入，尚欠满铁垫款多少加以清算。这个欠款数目是每年增加的，在一九四二年就有二十亿元之多，这个委托经营，就是把东北铁路筑路权和管理权等全部交给日寇了。欠款数目又年年积累增加，伪政府担负这种债务，就是给东北人民身上加了负担。我还在一九四二年的伪省长会议席上报告铁路总延长有一万一千余公里，表示是因

委托经营，才使交通迅速发展，在报纸上也常有同样意思的谈话发表。这就是替日寇宣传，掩盖它们掠夺东北铁路手段的真像，这种利敌行为，我是有责任的。

此外我在伪交通部时期，还统制了营口中国人多年经营的轮船航运事业，轮船总吨数约二十余万吨，其中最大的船户是李汉山等，使他们归会社管辖，给日寇作军用物资的运输，就是我帮助日寇进行侵略，陷害这些船户受到巨大损失，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临时兼特派赴日谢恩大使张景惠的首席随员。赴日情况，是由大连到神户来回坐轮船。随员中有冯涵清（重工业会社副总裁）、赫莫侠（伪军事部参谋司长、中将）、松木侠（伪总务厅次长）、罗福葆（伪宫内府秘书处长）、植木贡太郎（伪新京特别市副市长）、松本益雄（伪国务总理秘书官）等十余名。还有日寇关东军有马少佐同行。伪大使和随员等的任命是在伪政府公报上发表的。到日本后住在东京帝国旅馆。由张景惠在宫内向裕仁递了伪皇帝的亲书。于当日晚张景惠在帝国旅馆大食堂内招待东条英机内阁总理、各大臣、各团体、各新闻社代表等约二百余名，在宴会席上张景惠发表了来日本的使命，是为伪满建国已十年，得到“亲邦”日寇的援助表示谢意。对日寇称“亲邦”是从此时起的。次日东京各报纸都有登载。在东京期间张景惠领了日寇的最高勋一等桐花大绶章，我领了日寇的勋一等瑞宝章，作了拜“明治神宫”、“大正的坟”、“靖国神社”，慰问日寇陆军病院（日寇陆军医学校病院）和海军病院（横须贺）等行动。到京都住在都旅馆，作了拜“明治的坟”、“僵原神宫”等行动。因为我始终是随着张景惠一同行动，就是我对日寇叫了“亲邦”，拜了祖坟，慰问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群凶手。也就是我背叛了祖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先，愿意日寇残害中国。还把中国人血做的章带到身上不以为耻，实在是天良灭

尽。

一九四一年九月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不足一年)。十月出席了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主办的所谓“全国联合协议会”,是在伪新京协和会馆内举行的。出席人数约二百名以上,伪政府方面有伪国务总理以下各部大臣、次长,伪协和会方面有会长、正副本部长以下各部长,和由各省派来的所谓民间“代表”协议员(是在各省联合协议会产生出来的),日寇关东军方面有参谋副长(秦彦三郎)、第四课长(小尾参谋)等。开会第一天午前伪皇帝临场,由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念“协和会敕语”,走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训词。午后由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主持协议各省联提出的问题,连续三天。地方协议员们提出的问题,由有关系的各部伪次长一答复,就叫下情上达,结果伪政府的政策,是丝毫不能变更,反而由于开会,更加增了人民的负担。我在这次会上,报告了伪交通部修穆稜河、补修道路和辽河治水计划概略,要求协议员协力等,这就是让他们协力供出劳工,也就等于我亲自拿伪大臣、伪副本部长的权威,逼人民作劳工一样。

一九四二年春,出席伪“省长会议”,是在伪国务院总务厅会议室内举行的。出席的伪省长有伪奉天省长金荣桂、伪吉林省长阎传绂、伪龙江省长黄富俊、伪热河省长王允卿、伪安东省长丁超、伪牡丹江总省长三谷清、伪兴安各省长和伪新京特别市长金名世等,伪政府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各部伪大臣、次长、各局长、伪参议府参议(随意出席),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等。日寇关东军是参谋长秦彦三郎和第四课长等。开会情况,由张景惠读伪诏书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训词,各伪省长报告各该省的情况,武部六藏说明本年度的施政方针,各部伪大臣说明各该部本年要举办的各种事项,会议连续三天。我

在这次会议上说明了伪交通部一九四二年对于辽河水系应修的太子河流域蓄水池和彰武县西辽河流域蓄水池等工程,并关于所谓国道、省道各种道路的补修和保护等事项。主要目的是对各伪省长要求供出劳工。可是,我向他们要求供出,就是叫他们向人民去摊派,也就是等于我直接迫使人民出劳力修工程一样。同时这些工程中,修蓄水池,是为日寇移民种稻田,修道是为日寇军事行动方便,并不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而是替日寇谋发展,也就是给日寇推行殖民地政策。

在伪经济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十月任伪经济部大臣。伪经济部的机构,是由伪大臣、次长(青木实)、官房和矿山司、钢铁司、轻金属司、工务司、金融司、税务司、贸易司以及各科组成的。此外还直辖有专卖总局和特许发明局。

一九四三年伪经济部主要做的,是加强经济统制和增加军事物资的生产。这是根据一九四二年伪政府制定的第二个五年"产业开发"计划(由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这个计划是由伪总务厅企划局策划的,经过关东军第四课参谋与各部伪次长的所谓火曜会议和有我参加的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伪皇帝裁可后公布施行的。所使用的手段,是以东北广大人民的劳动力,来开采东北地上和地下资源,供给日寇作侵略使用。根据这个计划,在一九四三年关于工业方面,主要的生产,其中铣铁和钢铁的生产,仅鞍山钢铁会社的七个熔矿炉,每个年产量约二十万吨,就有一百四十万吨,加以其他本溪等地的生产量,至少总在一百五十万吨以上。这些钢铁的大部分约一百一二十万吨,是供给日寇国内使用,所剩下留在伪满的一部分数量,由于"矿业统制法"的限制,除作为钢材外,不准作其他的用途,实质上和供给日寇是一样。就这样,

还是不够用，于同年八月由伪总务厅企划局和伪经济部制定“金属类回收法”，是以我的名义附署公布施行的，仅在哈尔滨市就征收了价值约五千万元的旧机器和旧铁，在奉天市也征收了约值七千万元的旧机器和旧铁。又根据这个法令，使用征收和献纳的手段，拆毁了热河承德于乾隆时代修的有历史价值的铜亭子，没收了德都县境内五大连池附近庙里的铜佛约二百余个，毁灭了沈阳城内中街二三十家多年惨淡经营组成的铜行和其他各地所有铜的加工营业。在伪新京市和其他各地，把人民私有的铜锅、铜盆、铜制门拉手、铜窗钩、柜箱上的铜锁等，都令献纳给没收了。此外还征收了金、银、白金、水银等物，也都供给日寇使用了。

同年煤的产量约二千七百万吨，其中约一千万吨多炼成焦炭运往日寇国内，其余大部分在伪满作了工业生产燃料，一部分归石炭组合统制，一般人民是不容易得到的，在哈尔滨市和其他都市发生煤荒是常有的现象。

石油年产约五十余万吨，其中就供给日寇国内约四十万吨，因之农村普遍地不能点灯，终年过黑暗生活。

此外，铝、铅、锰、钨等生产数量虽不甚多，也尽数被日寇掠夺去了。

关于农产方面，听说一九四三年伪兴农部所管的所谓粮谷出荷量七百五十万吨中，就供给日寇国内三百万吨和关东军七十万吨。

和以上增产供给日寇同时，更加强产业统制，就是以各特殊会社和各大中小会社以及各种组合联系起来，组成严密地纵横交织经济统制网。各种会社一九四〇年以前有八十余个，到一九四三年已经归并成四十余社。把鞍山昭和制钢和本溪制铁等会社加入满洲重工业会社，取消了采金会社，把采煤各会社统归在满洲炭矿

会社，火力、水力发电统归在满洲电业会社，其他盐业、纤维等会社也都有些调整，并扩大了生活必需品会社的经营范围，和各种罐头会社、制糖会社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更加强了生产统制的力量。同年又由伪经济部制定公布了“事业统制组合法”，在各地方增添了各种组合，仅奉天市就有七十余种，甚至连农民卖鸡蛋都必须加入组合。再加上一九四二年施行“配给制”，扩大物品种类统制范围达八十余种。这就把东北的工农业生产和消费，完全统制在各特殊会社和各大会社里，也就是把东北人民的经济命脉操纵在日本侵略者手里了。由于这些大会社的垄断和军事生产，助长了日寇的力量，延长了侵略时间，使小手工业者失业、贫困、破产，工商业倒闭等，我是应当负责的。

一九四三年加强金融统制，“修正了银行法”，限制各地方银行营业的范围。这是伪经济部金融司和伪总务厅企划局等计划的，由我提出伪国务院会议，经过伪参议府、伪皇帝裁可后公布施行的。只许可在银行的基金百分之二十以内做生意，百分之八十须担负公债。并只许可向各会社放款，对一般户的借贷加以限制。因之基金少的银行必须合并起来，才能维持营业，长春益通银行和益发银行的合并，就是因此。至对各城市工商业的金融方面，由伪经济部制定有“商工金融合作社法”，成立商工金融合作社来限制，各商号如不去存款，也得摊储蓄。

对农村的金融方面，于同年由伪经济部和伪兴农部制定和公布“兴农金库法”，成立伪兴农金库，在春季向农民贷款，到秋季由“出荷”粮价内扣留，并向农村摊派储蓄，在一九四二年为二亿元，一九四三年为四亿元，成为统制农村金融的总枢纽。

由于以上的金融统制网，又把东北的金融完全操纵在日寇手里了。

一九四三年伪政府为向各大会社投资，增加预算，由伪中央银行滥发了伪纸币约四十亿元；因为各会社特别是重工业会社所生产的是大量消耗性物品，在粮谷“出荷”，又一时发出巨额伪币，经常超过市场的需要额，所以伪纸币贬值，更因物资缺乏，遂引起物价上涨，日用生活必需品价格比一九三七年的所谓“七二五”标准价格，一般地上涨了三乃至四倍。伪总务厅企划局和伪经济部一方面为压低物价，定出“公定价格”和“配给价格”，可是仅有价格，绝对买不到东西。一方面加强“吸收游动资金”，向各城市和农村摊派了约十六亿元的储蓄，加重广大阶层人民的负担。并由伪兴农银行发行了所谓“裕民储蓄券”，分十元、五元两种，由伪中央银行发行了所谓“爱国储蓄票”，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种，两共累积发出了约五亿元。这些券、票都按户摊派，特别是所谓“爱国储蓄票”，凡购买物品一元就得自担一角，也就等于物价上涨了十分之一。

一九四三年伪中央银行规定的储蓄总数是十六亿元，向各大会社和各省市分摊，到同年秋，因为各省伪中央银行分行未能收到预定的储蓄数目，必须在各大城市召开“劝募储蓄会”，要求本行和伪经济部派人出席。上奉天是伪中央银行副总裁徐绍卿去的，吉林是伪兴业银行理事孙澂去的，我出席了哈尔滨市伪中央银行分行召开的劝募储蓄会。会场在大和旅馆。列席的有哈尔滨市长袁庆濂、哈尔滨市商会长唐某和各大商号经理等约三四十人。我在会场上说明了储蓄的意义，多储蓄一分钱就是为伪国家增强一分力量，就等于多买一粒子弹，帮助所谓“大东亚圣战”。我就这样强迫商民担负储蓄，因之，给哈市中小商号增加了负担，造成不能营业，我是应负责任的。

同年又增加了捐税。这是由伪经济部税务司和伪总务厅主计

处、地方处等计划的，经我提出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以敕令公布施行的“改正税法”，增添了营业所得税、游兴税、通行税等新税目，和加重了盐税、烟酒税等税率，在伪政府公报上有记载。一九四三年的税收是九亿元，一九四四年就增至十一亿元。同时地方的附加捐，也随之增加，并新添门户税等。这种加重人民的负担，陷人民于贫困，我是有责任的。

在一九四三年对外贸易。伪满和德国的贸易额数约二千余万元，预定是以东北产的大豆、豆油等换取德国的机器，其中可能有武器等物，因为运输上已发生限制，未能全数成交。同年对意大利的贸易额数也约二千万元，这是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于东京和意大利经济使节团签订的所谓“日满意贸易协定”，也是以东北的大豆等换取意大利的汽车和军用物品。这种贸易，都是以农民的血汗去助长德意法西斯的势力，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三年夏，华北伪政权王荫泰来伪满，要求伪政府再拨给粮食三十万吨。因为在同年伪满已经拨给华北粮谷三十万吨，以此交换华北的棉花和棉布等物，还不够用，所以前来要求增加。对于这个要求，听说由伪兴农部又拨给高粱、苞米、谷子等十余万吨，并由同年供给日寇关东军的粮谷数量七十万吨内借出十万吨高粱，共粮谷二十余万吨，交给华北伪政权，以此换回来的东西是焦子和煤炭等物。以农民的血汗换取作为生产军火武器用的焦子，去滋长日寇的势力，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三年春，我曾参加了同年由伪国务院召开的伪省长会议，出席的伪省长是伪奉天省长徐绍卿、伪吉林省长金名世、伪黑龙江省长申振先、伪滨江省长王子衡、伪锦州省长王瑞华，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等。在这次会议上，我说明了伪经济部关于收购粮谷时配给农民棉布、线和棉花等物资准备的情况，并要求各省负

担储蓄的总数目约十六亿元等问题。结果是,在粮谷交易场上,以廉价收买了农民的粮谷,高价配给他们必需物资,同年还叫他们储蓄,这就是把农民辛苦的果实换给几尺布,有的因交储蓄连布也得不到,白辛苦了一年。这种伪省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我同伪省长等商量怎样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陷害人民于饥寒贫困的一种会议。由于这样的会议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我是应负责任的。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我出席了所谓"日满经济委员会",是在日满军人会馆举行的,委员长是日寇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出席的委员:日寇方面是关东局总长三浦、驻满大使馆参事官谷正之、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伪满方面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外交部大臣李绍庚、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和临时委员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出席的干事有伪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长古海忠之、伪经济部次长青木实和其他三四名日人。由笠原说,一九四三年供给日寇的物资情况很好,希望对明年日寇向伪满要求的物资加以供给,现在已由干事会作有草案(指每个委员桌上放的两本用铅字油印的小册子),等到作好成案,再送到各委员处签字。由武部表示了努力供给,并赞成笠原的提议,未到半点钟就散会了。在一九四四年春于伪国务院会议席上由伪总务厅翻译中岛比多吉拿来张纸,上有武部的签名,我也在这个纸上签了名。就是我赞同把东北的物资供给日寇作侵略使用。

一九四四年根据经济委员会日寇的要求,伪满产业开发的计划,伪经济部更加强生产和消费的统制。钢铁生产量约达到一百八十万吨,鞍山虽被轰炸,遭到打击,也未减少数量。煤的生产量仍保持有二千七百万吨的数量,同年还以粮谷五十万吨,换取华北产的煤约一百五十余万吨和其他棉布、棉花、棉线等物品。对日寇供给物资的数量,比一九四三年都有增加,仅铣铁供给日寇就是一

百三十余万吨，增加了一二十万吨的数量。

总之，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伪经济部为供给日寇需要物资而增加生产，特别是钢、铁、煤、石油等的生产。对于各特殊会社和各大会社，增强它们的经营力量，同时，成立各种组合来统制消费，由会社一直到组合结成严密的产业统制网。又以伪中央银行、伪兴业银行、伪商工金融合作社、伪兴农金库结成有力的金融统制机构。滥发伪币做为生产资金，用苛税、储蓄等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遭受饥寒贫困，无法过活。这样陷害人民，拿东北的物资供给日寇去屠杀人民，我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委员长是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委员有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稻垣征夫（伪兴农部次长）、卢元善（伪文教部大臣）、于静远（伪民生部大臣）、关屋悌藏（伪民生部次长）、甘粕正彦（满映会社理事长）等。还有小尾参谋（关东军第四课长）常出席指导。每月第三星期五在伪协和会本部长室内开会一次，主要是对每年所谓“全联协议会”未能解决的问题，由本部作出解决的办法，征求各委员的意见，有意见随便发言，不发言亦可，委员会不作最后的决定。或对于全联已决的问题的处理情况，由伪协和会内担者作报告。我虽未提过意见（可查看委员会记录，这个记录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内），可是，曾多次出席。在我当委员的期间伪协和会所做的迫害人民事情，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三年临时兼伪文教审议会委员。会长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副会长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委员长是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干事长是伪文教部次长田中义男。会议是由会长召开的，在伪国务院总务厅会议室内举行的。出席的是正副会长和委员长、干事长，委员中有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伪兴

农部大臣黄富俊、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等和各部伪次长、大同学院长、伪建国大学副总长尾高龟藏、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王道书院日高、齐齐哈尔国高学校长田树棠、吉林师道大学校长张文明，以及其他日人神尾一春等约五十余名。由委员长卢元善说明开会目的是审议文教方针，应根据伪“国本奠定诏书”，以“惟神之道”教育国民必须奉祀“天照大神”。当场有二三日人作了简单的质问和补充后，由武部六藏提议，把这个文教方针的制订和实施，交伪文教部负责办理，各委员我也在内均无异议，遂散会。这就是把日寇的祖先，拿到伪满来奉祀，还作为文教方针，永久来麻痹人民，使脱离祖国而归顺日寇的统治。以后伪文教部在长春南岭设立伪“文教练成所”，教育小学教员，就是根据这个审议会而实行的。我参加这种审议会，未做任何表示，就是同意，以“惟神之道”教育人民，我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我代表伪政府慰问军警的罪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赴东安省虎头，一九四三年春赴绥芬河，一九四四年二月赴牡丹江和虎头慰问各该地的日满军警和陆军病院。到日寇军都是祝“皇军武运长久”，为“日满保卫边疆”，到病院都是祝“早日痊愈东山再起”，到伪满军警和病院，也是感谢他们“为国宣劳”和祝他们“愈后再为国家出力”等，千篇一律的献媚言词。这就是我对于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群凶手们和自残骨肉的败类们，还鼓励他们再去杀人，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于每年十二月间出席所谓“御前会议”。在一九四三年的会议，是在伪宫内府勤民楼内伪皇帝溥仪临场的座前举行的。出席的是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参议蔡运升、张焕相、扎噶尔、清原范益（是李范益改姓，朝鲜籍）等，伪国务院方面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武部

六藏、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等。会议案件是由伪国务院提交伪参议府的一九四四年度收入和支出总预算约三十六七亿元，内容是各部院局所管的预算和第一、第二准备金数目，经武部六藏作了总括的说明后，由我说明了伪经济部所管的收入总数在一九四四年能达到十一亿元左右。当时蔡运升有些质问，由武部六藏作了解答，最后经臧式毅问各参议无异议，这就算是通过了咨询的手续。这样的"御前会议"我共参加了五次（早在一九三六年任伪文教部大臣时，曾参加过一次）。这次决定的巨大预算数目，在收入方面是由于强征捐税和使用各种掠夺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残酷地剥削下来的，造成他们饥寒贫困无法生活。在支出方面大部分是投入重工业的生产，炼钢、炼铁制造杀人武器，和作为吸收农民生产使用，造成以农民的血汗，助长日寇侵略的势力，这种帮助敌人危害人民我是有责任的。

在伪外交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伪外交部大臣。伪外交部的机构是由伪大臣、次长（下村祯二）、官房和政务司、调查司以及各科组成的。

在同年十二月底，以兼"日满开拓委员会"委员资格出席该委员会，是在伪新京日满军人会馆，由委员长日寇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召开的。出席委员是关东局总长、驻满大使馆参事官、满铁总裁大村卓一、满拓公社理事长二宫重治，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临时委员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干事有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伪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等。由于这个委员会承认日寇移民，就是帮助日寇推行开拓政策，造成中国农民多年开垦的土地被收用，房屋被毁坏，流离失所，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临时兼特派赴日慰问大使张景惠的首席随员。赴日同去的随员是伪总务厅次长王贤沣、伪宫内府近侍处长毓崇、伪国务总理秘书官松本益雄共五名。由伪新京到东京来回都是乘飞机(中途在米子飞机场休息),到东京住在麻布区贵宾馆内,第二天由张景惠到宫内向裕仁递了溥仪的亲书。去的使命是伪满送给日寇大米(是三十万吨)和盐。次日正午在内阁总理官邸出席铃木的招待宴会,在席上张景惠答词中表示了伪满物资丰富,有实力支持日寇作战,伪满的事情,请放心交给我等语。在宴会后,张景惠、松本益雄同铃木、东条英机秘谈约半小时,我和王贤沣等在其他室内等候,这是当时的情形。这次还拜了日寇的"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我在日本人民厌战的时候,去给侵略者送物资,是一种鼓励和延长日寇侵略的行动,也就是一种反人民的行动,承认有罪。

一九四五年我在伪外交部时,记得曾没收了英国的亚西亚煤油公司和美国的美孚行煤油公司的财产,并没收了在沈阳的启东烟公司("九一八"前叫英美烟公司)等,归伪总务厅掌管。

同年五月四日因德、意降服,伪满把在伪新京的德意两驻伪满公使馆给封锁了。〔下略〕 119—2—1147,1,5

谷次亨笔供

(1954年12月4日)

姓名:谷次亨。年龄:五十七岁(一八九八年夏历十月十五日)。种族:汉族。姓别:男。原籍:辽宁省新金县普兰店街。

简历:

一九二三年三月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研究南满铁路会社内容(特请政府许可二年期限),于当年本月考入了该社大连本社地方部地方课充当科员,于当年十月被转任为该社的长春附属地地方事务所地方课课员,于一九二四年十月转任该社的营口附属地地方事务所服务,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辞职。

在当年当月被任命为东三省盐运使公署东文秘书兼外私科长,由一九二八年九月调任奉天盐务缉私局长,由一九二九年九月调任奉天省东丰县税捐局长,一九三一年二月被调任为本溪湖煤铁公司首席秘书,九·一八事变后,被任为代理总办,于当年十月退出。

我任本溪湖煤铁公司代理总办的罪行:

我为保持我个人的生命安全,而把祖国的该矿权及一切附属财产全部让给日寇,而退出的。这就是我贪生怕死,铸成百身莫赎罪恶的开始,我应负丧失国权重大的罪责。

我入伪满洲国充当伪官吏的经过:

由于我曾在南满铁路作过事,并在盐务机关服务时由于职务

上的关系，与该社的高级职员结成来往，例如：该社的地方部长田边敏行、地方课长井下美多雄、铁道部次长宇佐美莞尔、总务部庶务科长石本贯太郎、营口地方事务所长太田雅夫等人。九·一八事变后，前记宇佐美莞尔任了奉天地方事务所长，石本贯太郎任该所次长，太田雅夫任了奉天日寇的教育专门学校长。由于这些人的吹嘘，认为我是个老实可靠可以利用的汉奸，促使了驻奉天的日寇宪兵队长二宫少将，于伪政权成立后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派其副官将我送到长春伪国务院，任了伪总务厅人事处事务调查科长。

我在伪满洲国的简历：

一九三二年五月任伪总务厅人事处事务调查科长，当年八月转任伪文教部事务嘱托，一九三四年伪民政部警务司外事科长，一九三五年转任本司保安科长，一九三七年调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当年七月调任伪总务厅次长，一九四一年一月任伪民生部大臣，一九四二年十月转任伪交通部大臣直至伪满垮台。

一、伪调查科长时代的罪行：

我初任的伪总务厅人事处事务调查科长的任务，是为供给施政的参考搜集各部、局的事务数字，以便制定各种统计为专责。

外事科长的任务，是对于从前住居在东北的外国人，他们在东北或向东北以外的地方去旅行或迁居时所需要的护照，根据他们的申请，向伪外交部替为请求发给护照等事务。

保安科长的任务，是分交通、风纪、保安三项，都是按着前中华民国旧法令处理一切的。但这三个科长时代，都是为了侵略者，处理了一切的事务。也就是帮助了侵略者，使他们对这方面免除后顾的忧虑，助长了鬼子们的侵略力量。特别是对特务科执掌的法令起草条文中，不许满洲人民有民族的意识表现和秘密结社、出版自由等。该法令的草案，在警务司科长审议会议时，我未发出一言

的反对话，而都是通过了。

二、伪安东省教育厅长时代的罪行：

帮助侵略者策划的罪行：由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当年七月间，我被任命在伪安东省教育厅长任内，当时的伪安东省十一县的情况，正是教育界大屠杀后的第三个月（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商务会长孙某（忘其名）和各县的中、小学校长，或教职员共五十八名被枪毙，其外各县出身的教职员和工商业者三百余名被判罪），因此，全省人心恐慌已达极点，不但全省九千余名教职员中辞去了过半数，而在经济方面，安东市约有五万元资本以上的和外县各城市有两万元以上的工商业家，早已暗暗的搬走或分散，只剩招牌还挂着，并留几个人看着门的情况。因此，安东市人口由十九万激减到十七万以下，市公署工商业的税收减收了往年的半额，各县城市的萧条日形凋零。伪安东省是中国人民抗日军的根据地，也是伪满国西南的门户，它的繁荣和萧条是于伪满国直接间接有莫大的影响。因此，最关心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特来安东视察地方情况，当时他问我振兴安东省的方策，应当如何办理呢？

我的策划：我对他建议说，领导社会发展的是知识分子，以故须把已辞职的知识分子教职员们加以保障，使其全部复职，免除投奔别的方面（指抗日军方面），如有可疑行为，必须按着司法手续办理。

对振兴各城市的策划：须撤免安东商务会吉田顾问（该顾问不但时常动用商务会的积金，而且时常向工商业者敲诈，又向外县各商务会推荐他的心腹人，与他同样向各工商业者设词借钱，如果不借，即捏造思想不良被抓挨毙，安东孙商务会长就是因为制止吉田顾问的不法行为，而被捏造为反满抗日思想者，丧失了生命），以使

各城市工商业者安心营业，如有不法行为，必须按着司法手续办理，以此办法想像可能恢服〔复〕旧有的情况。当时植田对我说，我就下命令告诉宪兵和警察方面，今后不许擅自逮捕教员和工商业者，并就命令吉田顾问辞职离开安东，外县的吉田心腹者亦一并使他们离开各县，以便使工商业者安心营业，关于教员复职事情希望你努力罢。

经过三个月后，十一县的教职员们完全复了职，市面也逐渐的热闹起来了，到当年年底听说安东市人口已突破了十九万以上，市公署的工商业税收亦已超过往年以上。

罪行的说明：当时伪安东省十一县中的抚松、蒙江、长白、临江、辑安、宽甸、桓仁各县，据说是中国人民抗日军的根据地，正是等着伪满国的施政不得人心时期而向都市进展的时代，由于我的策划，安东省得了复原，阻碍了人民抗日军的进展，而帮助了侵略者巩固了侵略地位。

三、伪总务厅次长时代的罪行（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末）。

（一）关于慰问在进攻中国的日本军队之罪行。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占领了北京、天津、张家口、大同、保定时，我率领了“协和会”的日寇松本总务科长、伪奉天省民生厅长王允卿、伪兴安东省民生厅长吴〇〇、伪海拉尔市长李相臣、伪三江省汤原县长孙〇〇、伪通化省“协和会”代表杨〇〇、伪黑河省商务会长孙〇〇，和奉天市“国防妇女会”代表王宜君、吉林市“国防妇女会”代表王秀英、哈尔滨市“国防妇女会”代表王玉梅、伪新京市“国防妇女会”代表马〇〇等十余人一同前往，向天津驻屯的日寇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驻北京的日寇司令官山下奉文少将、驻张家口的后宫淳师团长、驻大同的铃木旅团长、驻保定的和田联队长

等致敬，并祝他们“武运长久”的献词。这种利敌叛国的可耻行为，对杀害我们祖国同胞的敌人不但不去怀恨仇视他，却排除万难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于不顾，而一味恭顺地买求日寇的欢心，这种反祖国反人民的叛逆罪行，是今天祖国人民所决不能容许的。

(二)关于通过所谓“军机保密法”之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日寇进攻华北的同时，在伪满开始了向日本履行基地的物资供给，同时为保持伪满国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军事施设的秘密，而在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了所谓“军机保密法”。因此在厂矿工作的劳工们，由本法公布后失踪的或被鬼子们打死的不时发现着，例如，在一九四二年春我到奉天视察时，由奉天四先建筑公司经理张保先向我私谈：奉天飞机制造厂工人，由于伙伴互相私谈每天的生产率，因而失踪了十五六名。又在一九四三年秋我到大连视查大连车辆制造工厂时，该厂的工头于芳年晚间见我，谈到该厂工人时常被鬼子们扯走而失踪了的已有二三十名，也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在他们被扯走之前，只不过是工人们互相在一起彼此谈过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已，抛下家中老幼无人照顾，实在可怜。我听后回想到这是我通过的“军机保密法”在作崇〔祟〕，特别是在伪国境地带从事建设军事工程的中国劳工，工事完成后，就成千上万的一帮帮的就地被枪决了。这都是“军机保密法”产生的结果，我是应负严重的罪责。

(三)关于赴北京聘请伪建国大学教授之罪行。

我以伪总务厅次长的地位，当了所谓建国大学创办委员会的委员(委员长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及委员七名，中国人有当时的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和我)。这个大学本是以日本人学生为主体的，因而教授们除一两名教中国语言的讲师外都是日寇。不懂日文的中国教授是插不进去的。而我在一九三七年冬，特到北京

去聘请了美国留学生出身的鲍明钤、苏益信(原是北京辅仁大学教授)二位政治、经济学博士来作该大学的教授。我这个行为在表面上来看,只不过为该大学增加了两位中国人教授而已,但在国际上来讲,因该二位博士,不但在美国就是在世界学者中也是相当有名的人物。他二人只所以能来伪满任伪大学的教授,是因为我欺骗他们说,这是一个真正造就伪满人才的最高学府,来证明这个大学是专为研究学问而不是过问其他事情的。其实则完全不然,正是因为打着这个最高学府的招牌,请来这样的人,是为了掩蔽日寇侵略万恶的罪行,欺骗世界广大人民的视听,表示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的这种作为,正是给日寇为虎作伥的举动,是真正的日寇帮凶者,我是应负这个罪责的。

(四)关于欺骗所谓建国大学学生的罪行〔略〕。

(五)关于决定统治经济方针,实行了"七·二五"评价的罪行。

自一九三七年由于日寇进攻华北,三八年又进攻华中,以伪满为履行供给军需一切物资的基地,开始了有我参加的所谓总务厅次长会议决定的,以同年的"七·二五"日的一切物价的指数为标准(事后价格永不许变更),以该决定的价格收买了东北人民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给了日寇,仅在伪满国内就有日寇陆军大仓库五百多处,其中全是掠夺东北人民的物资。因而产生了中国人民工商业者纷纷倒闭,到一九四四年底,长春市仅四千余户工商业中就倒闭了一成五,奉天市一万四千余户的工商业只剩了四千余户,物价高涨到平均一百二十倍以上,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日益走向破产。我是应负严重的罪责。

(六)关于增加日本人官吏而实行了"文官"考试令之罪行。

为达成这个目的,由一九三八年秋经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议决的,所谓"文官"考试令,"采用考试"、"适格考试"、"登格

考试”的三种方式。所谓“采用考试”,由伪满国内和在日本国内专门、高等、大学毕业的“日满”学生,希望当伪满官吏者,一律必须受“采用考试”。及格这个考试的十名中总有七名以上是日寇。所谓“适格考试”,例如由股长提升科长时,也是由十名中七名以上是日寇。所谓“登格考试”,例如由科员提升股长时,也是七三比例。

因为考试科目中必须用日本语文作解答,这对满系说来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相反地日寇受考试的就不须用中国语文作解答,因此,他们及格的就要特别多。日寇就是利用这种手段限制采用满系官吏,而增加日寇直接地统治。

据当时伪总务厅人事处人事科长日寇木田清曾对我报告说,全伪满所有的官吏数目约四万余名(伪委任官以上者日系占八九千人,此外委任官待遇的吏员约有五千人)。由于我通过了这种可耻的会议,更加强了日寇直接地统治压迫,我是负有罪责的。

(七)关于催促伪县长推进所谓“国策”的罪行。

我为伪满贯彻各种“国策”,在一九三八年春召开的全伪满县长会议上,向伪县长强调了对“政府”已经公布的“国策”和“法令”必须竭力推行,以期达到“国策”实现的目的。由于我的这个催促,使县长们执行“国策”和“法令”时,不顾地方人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如何,只为贯彻所谓“国策”而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例如,由一九三九年实行的“粮谷出荷”时,县长本知道农民的收获不多,而对过量的要求“出荷”时,应当向上级为农民说明实收的情况,以免农民生活陷于困窘。但相反地县长不但不给农民作这种打算,却为征收“出荷”人员作了援助。例如龙江省林甸县日寇人员征收“出荷”时,以为农民有粮隐藏不出,就发火烧草垛、烧房子、打死农民等情,而县长不但不为阻止,却取以旁观态度。这都是由于我催促县长履行“国策”而使人民遭受到的残酷痛苦的恶果。

(八)关于以“全国联合协议大会”的“副议长”名义欺骗人民之罪行。

我在一九三八年度的伪满“全国联合协议大会”时，被任命为“副议长”帮助了日寇富田议长(伪兴业银行总裁)，向出席的“人民”代表们强调了对伪政府所提出的各种法令说明时，必须以协力的态度表示赞成，并对已通过的各种法令以忠实的态度去履行。由于我的这种强调，使出席的代表们听后不敢率真的向“大会”报告人民生活真正困苦不堪的情形，会后他们回去也都泯灭了应有责任心，而一味地遵照会议通过的“法令”和“政策”而努力，因此使日寇愈发地任意施行其各种压制政策。例如，在一九三九年春伪安东省决定的，由安东市到岫岩县之间修筑了一条汽车路，规定在农闲期利用农民力量来进行修建，但该县的“人民”代表协议员们，不顾农忙时期就开始了动工，使农民因而减收了三分之一的收获量。

(九)关于所谓慰问日满军警之罪行〔略〕

(十)关于通过所谓“总动员法”的罪行。

于一九三八年公布了“总动员法”，施行特殊技能等的登录和一切物资的检查保管，以备日寇对于伪满人力物力的随时征用。因而由一九四四年在铁岭县龙首山附近修建日寇陆军地下大仓库时征用了农民的大车六千余辆，而人马的死亡率约为十分之一点五。又于一九四五年春在通化县第二区为修建日寇陆军山洞仓库，又征用了约七千余辆的大车，而人马的死亡率约在十分之二以上。这都是由于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的该法而给同胞造成的严重灾害，我应负相当的罪责。

(十一)关于为使东北人民信奉日本“天照大神”，制定了“建国神庙法”的罪行。

为使东北人民信奉日本"天照大神"，于一九三九年春在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了"建国神庙法"，使东北人民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并为此建设了所谓"建国神庙"，用此使东北人民倾信日本的"神祐"，来麻痹东北人民对祖国爱国的思想意识。为达成这个目的，特命令了全伪满公私机关，特别是各种学校都安置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龛，每年施行春秋两季的祭祀，并定每月十五日举行朗诵"奉祀文"。这种欺人自欺的作为，不知麻痹了多少有热血的青年去顺从附和日寇的蹂躏。这是与我的罪责所分不开的。

(十二)关于使伪满供给日寇侵略战争所缺乏粮食而制定了"粮谷统制法"之罪行。

为使达成"粮谷统制法"的目的，于一九三九年有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了该法。依据本法，由一九三九年规定的"出荷量"为五百万吨，从一九四〇年起供给日寇粮谷是二百二十万吨，出荷量和供给日寇粮量是逐年的增加着，到一九四五年出荷量增至九百万吨，供给量增至七百万吨，其余配给伪都市、矿、厂方面的食用。由于供给量数的逐年增加，强迫农民增加出荷量，因而造成了农民的破产，食粮不足，食不饱，以致饿死的农民不下九万余人。在受配给的劳工方面，因食不饱，还必须继续长时间的劳作，而产生的死亡率占全东北劳工死亡率的百分之六七。在受配给的儿童方面，因食不饱而发育不良的儿童约有十二万以上。这都是由于我为援助日寇而给同胞增加的灾难，我是应负罪责的。

(十二、乙)以鸦片断禁政策欺骗中国人民的罪行。

鬼子们为毒害中国人民，并由此而要获得镇压东北人民的经费和军费资金，特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了"鸦片麻药断禁法"，实行了所谓一举三得的"鸦片断禁

政策”。我当了断禁委员会附属干事会的干事，又因我略通日本语文，又担当了干事长，为贯彻这个政策，率领伪总务厅“日、满”系六名参事官，到各省市向直接与人民接触的地方官吏作了如下的讲演（大意）：

“鸦片断禁政策是为中国人民的健康而实行的政策，以十年为逐渐断禁的方针，十年后，在满洲国内没有一个吸烟的人，这纯是为中国人民着想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行者，是断禁委员会委员长星野直树总务长官，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参加是办不到的，也就是有日本人参加的满洲国，才能为中国人想出这个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应当感激政府的厚意，希望直接与人民接触的地方官吏各位了解政府为中国人民除毒的苦心，向人民说明，感谢政府，遵守规章为盼。”

罪行的说明：伪满国成立已有六七年的过程，对鬼子们所作过的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和手段，我是很知道的，但我为取得鬼子们的欢心，号召中国人民感激日本人造成的满洲国，因而造成了由于鸦片中毒的死亡者即东北每年不下一万四五千人（蒙古地区在内），并削弱了同胞的体力、民族意识的斗志与灭种，更在中国华北方面是不知要有多少。相反的，为日寇增加了每年不下一亿四五千万元的镇压东北中国人民的经费，特别是以东北的产烟（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收购），密输到华北，每年以不下三亿数千万元的卖钱，为日寇收购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日寇用这些物资作出军火屠杀中国人民。这都是由于我的走狗行为而给同胞增加的灾难，我是应负毒杀同胞的罪责。

（十三）关于为贯彻“开拓政策”欺骗中国人民的罪行。

在一九三七年，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日寇驻满关东军司令官兼大使植田谦吉，在长春签订了“满拓公社协定”，其后伪产业部即

在部内成立“开拓总局”，专办日寇向伪满移民事务。据该局长日寇结城清太郎所报告：“依据本协定，予定以二十年为期，向伪满移民二十万户(一百万人口)”。伪产业部以部令于一九三九年公布了“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这个要纲在日寇东京经“日满”双方协定时，我是满国的代表而参加的)。该要纲中虽原规定购买用地为沙碱二荒等地，但在收买的一千七百万垧土地中，仅有二荒地五百万垧。一千二百万垧是以时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强迫剥夺中国人民的良田，因而产生了(由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底)流离失所者约六万余人，其中两万是死亡者。我是应负欺骗同胞的严重的罪责。

(十四)关于为供给日寇军需物资通过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钢铁类统制法”的罪行。

为供给日寇军需物资，借口以资金不足二百万元以上的重要产业者一律统制，故于一九三九年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因而煤、盐等产业遭受了摧毁，由一九四〇年起每年剥削去的炼铁用煤六十万吨及大量的工业用盐供给了日寇军需物资。

于同年又公布了“钢铁类统制法”。依据本法而将民用的钢铁转入军需，以致农民的犁锄生产工具等虽用高价购买亦大感困难。故由一九四一年起供给了日寇每年钢铁三十万吨，铁矿石一百万吨。由于该二法的公布，以致在本企业方面坑害了东北中国民族工业，陷入破产和倒闭。这都是由于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而产生灾难，我是应负罪责的。

(十五)关于制定所谓“国兵法”的罪行。

于一九三九年以兵役为人民应尽的义务和提高伪军素质为名，而公布了“国兵法”。自一九三九年开始检查，迄一九四五年止，计入队兵不足十万，但从不合格中取得的劳工(所谓国兵漏)则

不下四五十万，说明了该法的实质：一方面是为获得东北青年充当炮灰；另一方面是为剥削青年的劳力为主要目的。该法成立时，我当了起草委员会的干事，并又经我参加的伪总务厅次长会议而通过的。我是应负严重的罪责。

（十六）关于为繁荣"国境"地带日寇住民而施行了所谓"北边振兴政策"之罪行。

在一九四〇年春为实行本政策，于长春市日寇大和旅馆的大食堂里召集了创办会议（我以伪总务厅次长名义参加的），通过该会议决定了由珲春县起到漠河县间长二百四十余公里，宽平均八十余公里，所谓"北边国境地带"内居住的日寇，为他们建设各种文化设备，以两亿元预算三年完成的计划，由当年冬季施行开工。为此在这个地带里多年居住的中国人民，被日寇强迫惨无人道的驱逐出去了。例如，仅以珲春至绥阳县之间地带内所居住的约四千余户中国人民，就是在三冬严寒的天气里被驱逐出去的，因此，在途中被冻死的老年人、幼童约有六百余名，冻伤者有六千余人，在其余的地方更不知要有多少。我是应负严重的罪责。

（十七）关于所谓"国势调查"的罪行。

日寇唯恐东北人民，特别是来自华北和山东方面暂时居住的工商业者（包括他们的家族，但是春来冬去的劳工不在其内，照一九四〇年的统计这样的人约有三百余万）和关里不断地来往，因而对祖国增加了依存的念头，并不断的将东北的经济力量移到关里，相反地对伪满减去了忠实的思想和经济的力量。为纠正这种偏向，在伪总务厅设置了"临时国势调查事务局"，我被任命为兼该局局长。规定了以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夜十二点正为开始调查的时期，各地以当时被调查的地点，作为原籍地，不许变更，即作为"满洲国"的人民，不许和关里有来往（这是表面不发表的主要内容）。

因此，阻碍了同胞的爱国思想意识并将这些人的财产固定于伪满，以便使日寇随时任意剥削，为日寇加强了侵略力量。这是我为日寇实行这个政策作了首脑的帮凶行为，我是应负所得的罪行。

（十八）关于通过“兴农合作社法”而欺骗了中国人民的罪行。

于一九四〇年公布了“兴农合作社法”。该法的表面是以农民为会员组织团体机关，以便对于农事有所改良。但其贷款既不及时，且以高利贷与非会员者，更对于农民用具无论需要与否竟统一摊派。内中主要干部多是无赖出身的日本人，利用合作社的资金以最低的价格由日本输入了大批的橡胶、袜子等物，强迫以高价配给会员，并不断地勒索着农民会员，因而伪满农民加入合作社不但不获到利益，反而受着意外的损失，故纷纷的怀着退出该社的意志。我为使农民不退出会员，曾在伪延吉和吉林两省联合协议大会上，对农民的代表发表过压制农民不许可脱离会员的演说，尤其是经过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的本法，我更应负严重的罪责。

（十九）关于出席日本大阪“厚生大会”的罪行。

一九四〇年日寇政府主办的在大阪市举行的“厚生大会”，受日寇政府邀请的国家都有出席人员。意大利是厚生大会总裁羊谷荷尔事务总长（忘其名），德国厚生大会总裁伯爵黑布黑漆及事务总长，菲律宾内务部总长兼厚生大会总裁医学博士（忘其名），伪满是我领着三百名人员参加的，还有“临时政府”“建设总署督办”殷同，“维新政府”的俞教育部次长，还有泰国的代表（不详其名）。参加本大会的各国代表们，都表示了庆祝大会的成功并期待对世界厚生事业上有所贡献。庆祝典礼完后，即被向导参观了大阪市内所有近代化工厂，如田中车辆制造工厂、大日本纺纱工厂、东洋纺纱工厂和他们的工人宿舍及俱乐部等，同时又经向导游览了各名胜地，俟后受了日寇财阀三井、住友的数次招待，备极优厚。这是

日寇特意显示它经济发展上的"雄厚"力量，给意、德"轴心"国的代表们看，好使他们更信赖日本。另一方面通过菲律宾、泰国的代表宣传日本的发展力量，和使他们认识到各附属国，如"伪满"、"临时"、"维新"各伪政府对日本信赖与团结的情况，借使英、美、法等国来承认这些附庸的"政权"，以便减少日本在国际上的敌对国家。由此来看，我参加了这个"大会"，正是给他们充门面而增加了它的国际威力，欺骗世界人民大众的丑恶罪行。

（二十）关于参加庆祝日本建国二千六百年竞技大会的罪行。

伪满对日本建国二千六百年的庆祝竞技大会表示衷心的庆祝，特由全伪满各省县选拔出优秀的青年运动员四百余名，派我为庆祝团长率领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底赴日。此外还有"维新政府"伪外交部褚逆民谊率领一百余名青年运动员，"临时政府"派王逆阴泰率领六十名青年运动员，此外尚有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各国的代表都向日寇祝贺本大会的成功和"国运的隆昌"，为"建设东亚共荣圈"希望日本"指导"一切等等无耻谰调的献词。会后由该大会的总裁秩父宫招待了各国代表的宴会，驻东京的各国大使也都出席了这个宴会。这个会的目的，主要就是日寇为了在东亚指挥这些附庸国家，随其摆布，而显示给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看它雄厚的威力，不要它们和它作对。所以我率领了这许多人去，正是给日寇"站堂助威"、"拿旗摇喊"的可耻行为罢了。这种利敌判国的罪行，是被全中国人民所唾弃而遗臭万年的。

四、伪民生部大臣时代的罪行（自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十月）：

（一）关于赴华北各地去感谢日寇给抓劳工的罪行。

伪满于一九四一年以后，由于对来自华北的劳工们，不许可向原籍汇款，以致除经驻华北的日本军队抓来的劳工之外，是不愿来

伪满的。我到华北、济南方面的任务，就是为对那些给抓劳工的日本军队的头子们去表示谢意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前往北京向日寇驻北京的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和驻济南的日寇军司令官上桥中将，及驻青岛的日寇海军司令官佐藤中将(由青岛向东北装运劳工是属于日寇海军管辖)等表示了谢意。我的这个行为，就是等于我直接屠杀自己的同胞一样，并且使这些被丧了命的家族们断绝了生活的来源，也就是等于我杀害了他的家族的两重恶果，是我的严重罪行。

(二)关于供出东北农民充当劳工的罪行。

由一九四一年以后，因华北劳工不愿来，而产生了各矿、厂的劳工不足，以致生产量降低。因此，在一九四一年春由伪民生部发出指令，伪安东、通化两省供出劳工前后有十八万余，当年秋又指令伪吉林、间岛两省共出了约二十余万，一九四二年春又由伪奉天、锦州、四平等省又供出了二十余万。这是当时的劳务司长田村仙定向我报告的情况。因此产生了强迫的摊派，无劳动力的民户本当不供出，也被迫花钱雇人供出了，甚至一家只有一个劳动力的也被迫供出了，因而一家的生活陷于破产，这种惨状到处都有，实事俱在。这都是由于我为日寇们增加侵略军需物资生产，而发出的指令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我是应负严重的罪责。

(三)关于实施“劳务管理新体制实行要纲”欺骗人民的罪行。

由一九四一年以后，因华北劳工不愿来，加上东北农民劳工供出的不踊跃，以致劳力不足，生产减低，因而想出的并经我认可的就是这个欺骗人民招牌的要纲。该要纲的内容是对使用劳工雇用者，如因其保安设备不良或过度劳役，因而发生死亡或重伤时，对劳工使用者以体刑处分之。为欺骗东北人民，我在一九四一年度的伪全国联合协议大会上说明了该要纲的内容，使参加大会的代

表们无反对的通过了，即于当年的秋公布了。但在一九四二年春，本溪湖煤矿因保安设备不良，两个钟头就窒息了八百余名(还有二百尸体认不出姓名的)工人，尔后当年秋西安煤矿又因同样的原因继续的发生了数百名劳工的惨案事件。但对发生惨案的责任者我并未指示任何的处分，因而该矿长们仍然留在原职，而这些死亡数目不过是表面现出来的数目，暗被消灭的死亡数目更不知有多少。

(四)关于以伪满国“联合协议大会”的议长名义欺骗广大人民的罪行。

伪满国成立时，对世界的声明：满洲国的产生和它的政策，是根据东北人民的意志，人民意志的代表机关就是协和会，这就是所谓政治的母体机构，满洲国政府所要施行的政治方针，必须通过这个协和会会议后，才能施行。这就是日寇对外的欺瞒声明。故每年举办的全伪满国联合协议大会时，是日寇最关心的一个行事。伪满国所有的一切侵略政策，都是依据这个欺瞒方式而产生的，特别是由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为拢络东北人民给他服务，另一方面，为减少世界对他的敌对，所以对“联合协议大会”的操纵者即当该议长的人物是异常重视的。于一九四二年举行的全伪满国“联合协议大会”时我被任命了该议长，但我明知道本大会的本质和用意，而我为保持我个人的地位与利益，为它作了欺骗广大人民的工作，以为伪满国的“全国联合协议大会”是人民的参政的大会，不是日本人独断专行的政策，从而使世界人民对于鬼子们减少了仇恨思想，巩固了鬼子们侵略地位。

(五)关于为伪满建设哈尔滨、长春间铁路复线的罪行。

伪满因为日寇计划进攻苏联，同时为增加输送力量，将哈长间的铁路单线再加上一条作为复线(二百四十余公里)，以便大量地向北满输送军需物资。为此在一九四二年春动员了该沿线的各县

市的青年,所谓"青年勤劳奉仕队"一万余名,不出七八个月即建成通车了,为日寇增加了哈长间的"倍的"输送力量,给中国沿线的农民损失了铁路作用地约有二万二千余垧(但荒地、碱地、洼地不计在内)。据劳务司长田村仙定向我报告共伤亡了六、七十名。我为建设这条铁路,在施工前特别举行了"开工典礼"(在哈尔滨市),当时我向被动员的青年"勤劳奉仕队"队员们说"建设这条铁路是为建设高度国防建设的基础,要排除万难,在既定期间内完成。这是我以伪民生部大臣的地位,所犯的一个严重罪行。

(六)关于"查阅青年团"训练的罪行。

伪满"协和会"为增加战时都市的保安人员,施行了都市青年训练,以备不时之用(所谓都市青年,内中包含中学的学生)。我于一九四二年九月间以伪民生部和"协和会中央委员"的资格,检阅了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的青年训练状况。哈尔滨市是由伪市长袁庆濂〔清〕主持的,有八千余名被训练的青年;齐齐哈尔是由伪市长张国栋主持的,有六千余名被训练的青年。这些青年被训练后,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便可即时担任起该两市的治安任务。〔中略〕

五、伪交通部大臣时代的罪行(由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垮台):

(一)关于补修、扩大"国境国道"而伤害劳工的罪行。

伪交通部为"国境"地带日寇驻屯军运输军需物资的便利起见,由珲春县到漠河县间建设了宽两丈五,长两千四百余公里的所谓"国境国道"。特别是由于我到伪交通部以后(一九四二年十月),把这个道路逐渐扩大补修,把原路由两丈五扩大到三丈多,将五分之三的距离供给日本军用,改称为"特殊道路"。这个道路每年补修与扩充(到一九四四年底)使用八万乃至十万的劳工,它的死亡率是一成至一成五的情况。这是当时的伪交通部道路总局长

日寇町田〇〇向我报告的。

(二)关于建设兴凯湖堤防而伤害了劳工的罪行。

伪交通部为保持日寇驻密山县一带的军营和军用仓库不受兴凯湖洪水的灾害,而建设了一百五十余公里的防水堤(由密山县东刺刺咀子起到兴凯湖间宽三丈、高八尺、长一百五十余公里,六千万元预算,三年完成计划),由一九四一年起工,我到伪交通部第二年的时候,该工程将完成六十公里。仅这六十公里,因工人宿在野外席棚里,并因天气过寒,在全劳工中的两千余名,仅不过十一个月就死亡了二百九十余名。这个情况是伪交通部驻密山土木工程处长日寇伊藤右卫门对我报告的。

(三)关于为东辽河、郭尔罗斯前旗治水工程伤害劳工的罪行。

伪满为日寇移民用地,强行收买了沿着东辽河两岸的熟田约四万垧,和郭尔罗斯前旗沿着第二松花江两岸的熟田约六万垧改为水田,并建设大贮水堤坝。为达成此项目的,由一九四三年一月开工(郭尔罗斯前旗工程是一九四四年四月开工),这两方面所需的劳工约四万余名。当东辽河开工时,我曾参加了,并且向约二千余名的劳工们做了以下的讲话:“这个工程为供给日本移民用地而举行的,为缓和日本的吃粮不足而建兴的,是急上加急的工程,希望各位排除万难,到‘三九’以前,要把基本工程完成,这就是对‘日满’‘一心一德’的关系也算尽了友谊。”据当时伪交通部理水司长日寇寺井〇〇向我报告,这四万工人几乎有一成五的死亡。这都是我为日寇的利益而牺牲劳工同胞生命的罪行。

(四)关于为加强检查信件,窃听电话之罪行。

伪满为使日寇完成太平洋战争,唯恐东北人民和在东北居住的外国人泄露伪满的情况,和与有伪满不利的通信和电话的传递,伪交通部特指令各邮政和电话机关添设了通达欧文语言和中文语

言的日本人,检查中外人民的往来信件和窃听向各地的通话。这种检查信件的事项,已经由伪满成立不久即暗中施行。对外国人的信件检查和窃听通话,是由我到伪交通部以后,即一九四三年春实行的。这就是我利用通信机关给日寇侵略者贡献情报的一种严重地犯罪行为。

(五)关于没收中外国人的短波收音机之罪行。

日寇见于太平洋战争逐渐败北,深恐它的附庸国家人民听到了真相,特由伪交通部由一九四三年秋指令"邮便总局",对于有收音机的一律暂时代为保管(实际就是没收)。据当时的伪交通部次长日寇田仓八郎的报告,没收全东北中外国人民的收音机已有两千六百余台。这又是我为日寇欺瞒中外国人民,掩蔽它战争败北真相的罪恶行为。

(六)关于为日寇实行了"爱国邮政储金"之罪行。

伪满为日寇聚集太平洋战争的军费,对东北人民规定了以"爱国"名义,负担了储金义务,由一九四三年起十六亿,一九四四年三十亿,一九四五年六十亿。在这个数目中伪交通部应担负五分之一,共约十六亿。除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垮台未达到定额之外,前二年度完全达到定额。为完成这个任务,对中国人民储金的方法,完全是采取强迫式的摊派,因而使人民的生活陷于异常的困窘。例如,一九四五年五月,我为视查东边道"国道"途经桓仁县于家屯(出铅矿的地方)休息时,据于屯长向我说:"我们为缴'爱国储金',不但把吃粮卖了,因凑不足,还把衣服被物卖了,实在是害人不轻。"这是为获得日寇对我的好感,强迫他们缴纳了"爱国储金",我是不能辞其罪责的。

(七)关于建设军用道路,所谓哈大道路而伤害劳工的罪行。

伪交通部为援助日寇军事输送力量,由一九四三年秋开工的

所谓哈大道路，是由大连到哈尔滨长一千公里，宽七丈的军用道路。这个工事因为紧急的关系(是以三十亿预算三年完成计划)，动员了三十余万劳工。这些劳工的宿舍，虽然是住在临近村落的席棚里，并且由哈尔滨以南天气比较暖，但因为卫生设备不足，十个钟头以上的劳作，又加配给的粮不充足，以致伤亡率也几乎一成。这是一九四四年秋当时伪交通部道路总局长日寇町田向我报告的。

(八)关于为协定所谓“东亚共荣圈”航空区域的罪行。

在一九四三年冬，据当时的伪交通部航空司长日寇深川○○向我秘密报告：“在日本东京陆军航空本部规定的东亚共荣圈航空区域，日本国内为航空本部枢轴地，‘满洲国’为航空第一部，华北、蒙疆为航空第二部，华中为航空第三部，华南为航空第四部，以新加坡为中心南洋一带为航空第五部。这个协定‘满洲国’是交通部大臣名义(谷次亨)暗暗规定的，是属于秘密规定。”当时我只以听之而已，并未向日寇当局表现出任何抗议的态度，这就是证明了我只要能保持住个人的利益和地位，叫我做什么都干。

(九)关于为建设日寇军用飞机场之罪行。

伪交通部为日寇在东北建设了许多军用飞机场，特别是我到伪交通部以后(自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底)，约增加了二百多处(共有四百余处，地点机密不得详细)。这是根据当时的伪交通部航空司长日寇内海○○的报告。并说一处就得占用民地三百垧以上，等于无偿占用的，并需用劳工每处平均一千余名，四个月才能完成，这都是征用民工不花钱的。我到任后增加这二百处就占用了民地六万垧以上，使用民工劳力就是二十余万。

(十)关于为巩固和扩大东边道和热河省的所谓“国道”而伤害劳工的罪行。

伪交通部成立以来,就尽全力建设由临江县起沿着鸭绿江岸直到安东县的所谓“东边道国道”。这个道路鬼子们称它为东边道“讨伐道路”(为讨伐中国抗日联军而言)。同时在热河省由承德到古北口间建设的所谓“讨伐基干道路”(指对讨伐八路军而言)。特别由我到伪交通部后,为巩固和扩大这两处道路,实行动员了民工每年平均不下六七万(东边道五万,热河约两万)。〔中略〕

(十一)关于为成立“小运送股份公司”而欺骗中国人小运送业者的罪行。

伪交通部借口以全东北各城市的中国人民经营的所谓“小运送业者”(这个每年运送费约五亿元),缺乏集体组织和命令系统,因而影响了火车的装运,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为理由,成立了一个中央、市、县三级组织和命令系统的所谓“满洲小运送股份公司”,为达成这个目的,限制了中国人民经营的运送业者。我为使这个垄断组织达到目的,一九四四年冬季,在该公司成立典礼时,作了如下的报告:政府为了有系统的组织和有系统的管理,成立了“满洲小运送股份公司”,以前所有的运送业者,一律改为本公司的构成会员,决不使失业,并且希望特别协力为盼。但在该公司成立后,对中国人民运送业者,以不够会员的条件为理由,除了极少数的几家之外,全部夺取了他们的营业权利,不但未赔偿任何的损失,却以最低的价格强迫将他们的车马和其它的工具全部收买去了。我本应该主张不使失业不收买他们的车马和工具,但又恐伤害日本人的感情,为保持我个人的利益,而使全东北产生了三万户的失业者。这是我为日本人成立垄断企业,而使中国人民失了业,并被掠夺去了畜力物力等财产。我是应负所有的罪责。〔下略〕

119—2—1150—1—5 号

金名世笔供

（1957年1月22日）

一九二〇年七月由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法科毕业。

一九二〇年九月任黑河镇守使署中校军法官，掌管军事裁判事务，连任二年。

一九二二年九月调任延吉镇守使署中校军法官，掌管军事裁判事务，连任一年五个月。

一九二四年一月调任吉长镇守使署中校军法官，掌管军事裁判事务，连任二年。同年九月奉直战争，镇守使带队开赴前线，奉令代理吉长镇守使，以〔一〕共八个月。

一九二六年一月任滨江镇守使署上校参谋长，连任五年三个月。在参谋长职中，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苏战役，兼任吉林军前敌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六个月；一九三〇年一月兼任接运事务局长驻绥芬河，办理苏联政府送还被俘虏陆海军人接收运送事务，共六个月办理完毕。

一九三一年三月任吉林省汪清县长，兼任汪清清乡局长，兼任百草沟商埠局长。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机要秘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任哈尔滨电业局总办。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任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长，叙简任

二等，给年俸一万三千元。兼任吉林全省保卫团管理处总办，七个月该管理处取消。兼任吉林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以后改为吉林省警察官训练所。兼任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委员。兼任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伪满政府改正官等俸给，叙简任二等，给一级俸，每月八百元。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任伪三江省开设筹备处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任伪三江省长，叙简任一等，给二级俸，每月九百二十元。兼任伪协和会三江省事务局长。兼任伪三江省治安维持委员会顾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调任热河省长，叙简任一等，给一级俸，每月一千元。一九三九年兼任伪协和会热河省本部长。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调任伪新京特别市长，叙简任一等，给一级俸。兼任伪协和会首都本部长。兼任伪协和会首都青少年统监。兼任伪新京特别市兴农合作社长。兼任伪新京防卫委员会参与。兼任伪日满开拓委员会临时委员。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特任伪吉林省长。兼任伪协和会吉林省本部长。兼任伪吉林防卫委员会参与。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特任伪民生部大臣。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伪满政府中央机构改革，废止民生部。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特任伪厚生部大臣。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伪满政府设置鸦片断禁协会，兼任该协会总裁，迄八月十五日伪满崩溃。

参加汉奸熙洽所组织的伪吉林政权：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占领沈阳，二十二日占领吉林，三十日汉奸熙洽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通知各县归他管理。我于十月二十日接到熙洽电报，言说有要事相商，令我到省，将县长职

务交于科长代理。我于同月二十四日到吉林与熙洽见面，他述说不得已组织伪政权的经过，希望我帮忙，并说已委任我为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机要秘书，汪清县长另派他人，要求我赴哈尔滨与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两人联络，并希望丁超拥护吉林伪政权。经我答应，乃到哈尔滨与张景惠、丁超联络，这两个人对于熙洽均表示谅解，我乃回吉林报告。随之由丁超领衔五名将官给熙洽去电拥护吉林伪政权。这是我参加吉林伪政权走上背叛祖国反人民道路的第一步。至我同熙洽的关系，同是爱新觉罗氏族，还是朋友。在吉林任秘书不到两个月，于十二月二十日熙洽以伪吉林省长官名义委任我为哈尔滨电业局总办，于是我到哈尔滨电业局任职共十个月。

在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长任内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伪满政府任我为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长，当即到伪警务厅任事，因之也就知道在这个时候，治安权限完全操于日本宪兵手里。在长春设有宪警统制委员会，掌握治安最高权限。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在吉林省则有吉林省警务顾问，是由日寇驻吉林宪兵队长少佐儿岛正范兼任，每日到伪警务厅办事，以后换为宪兵少佐林清。我在伪警务厅以共两年零一月，所办的事务，以我今日的眼光来看，都是压迫人民和危害人民的，略举我的罪行说明于次。

第一、是帮助日寇收缴民枪。日寇认为东北人民自卫的枪械是抵抗的力量，故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伪民政部命令吉林省公署在六个月内把人民所有的枪械调查登记，不论在旧政权时代有无枪照，均要附带枪械所有人的像片声请登记，由各县警务局发给枪照。伪吉林省公署遵照这个命令，在六个月内就办理完毕。于当年十月底，伪民政部召集各省警务厅长会议，我带领秘书和伪警务

厅警务科长日寇林源之助等到长春出席，这个会议是在伪民政部里举行的。在开会伊始，伪民政部次长葆康代表伪总长臧式毅致训辞后，就退席了。当由伪警务司长日寇长尾吉五郎发表收缴各省民枪的演说，并说日寇割得台湾时收缴民枪七十万支以上，合并朝鲜收缴民枪一百万支以上，硬说东北人民自卫的枪械，比当年的台湾朝鲜不止数倍，认为各省的民枪不止登记的数目，指示各省务要全部缴出。继由各省报告调查经过情形，最后由伪警务司说明缴枪各种有关文件。在这个会议后约有一个月，伪民政部就发令收缴民枪和公布藏匿枪械治罪办法。伪吉林省公署接到这项命令后，即由我以伪警务厅长的名义，召集各县伪警务局长到省会议，发表伪政府收缴民枪，责成他们妥切办理，指示伪民政部所规定收缴民枪各种文件，命令各伪警务局长回县后开始执行。在这个时期，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命令伪警务厅对各县所收缴的民枪，是凡有日本军驻在县份，直接径交日本军部队；其没有驻军县份，北部地区径解哈尔滨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南部地区解交于伪警务厅。吉林省收缴民枪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办理完了，共收各色种类不同大小枪枝约二十八九万支。这是我在伪警务厅长任中执行伪政府命令，帮助日寇收缴民枪，消除人民抵抗力量的罪行。

其次，是改革警务机构。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季，伪民政部训令改革警务机构，当经由我把吉林省公安局一律改组为各县警务局，其内部办事规程，分为警务、特务、保安、司法、卫生各股，旧公安局所属的公安分局也一律改为警察署。这个改组是加强压迫人民的工具，以便容易管理人民迫害人民。这是在我的任内执行的，我是绝对负这个责任。

其次，是帮助日寇训练伪警察官吏。在一九三三年春季，伪民政部委任我以伪警务厅长的名义兼任伪吉林警察官训练厅长，由

此我开始训练伪警察官吏。对于吉林省所管辖的各警察厅各县警务局，命令选拔巡官以上的警察官吏送省训练，训练期间为六个月，每期训练二百人，六个月毕业后，仍回原送机关服务，以后遇有缺出尽先升用。在我的任内，以〔一〕共训练三期是六百人。至于对警长警士的训练，则置重点县警察训练所，附近的县份选送警长警士送于重点县训练所受训，训练的期间以先是三个月，以后改为一个月，不久停止重点县警察训练所，由各县直接训练。这些伪警察官吏经过受训，如同得到保障，回到现地骑在人民的头上来做压迫人民的事情，更是肆无忌惮的。这完全是替日寇造就忠诚的走狗，强化压迫人民的工具，这是我危害人民不能逃避的罪行。

其次，是不敢纠正日寇警务指导官的罪恶。自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伪民政部警务司就向吉林省配置日寇警务指导官，对于大的县份是配置四五名，小的县份则配置二三名不等，以共先后配置约有一百五六十名。这项警务指导官，多半是退伍宪兵和浪人，素质异常恶劣，到达各县后无恶不做，压迫我们同胞的事情，残害我们同胞的事情，是不知有多少的。这项警务指导官当时统属于警务顾问，他们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的事情，当然是密报于这个罪大恶极的警务顾问，得到他的许可。但当时我是拥有伪厅长的名义，而对于这项警务指导官的罪恶，不敢纠正，不敢过问，只知保持个人的地位，对于同胞的受害，演成漠不关心的状态，在今天说来真是人民的罪人，故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我到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长任的时候，伪满成立未久，地方秩序尚未稳定。我到差后，即执行伪满政府以确立治安为第一要义的政策，遂于一九三三年开始修筑各县警备道路和架设各县警备电话。当时各县的警备道路干线均是互相衔接，以共总延长里数约有两千六百公里。架设警备电话所需

的电线、电瓶、铁钩、电杆各种材料，都是由伪民政部警务司配达到省，再由伪警务厅发交各县架设。当时架设警备电话有一部分是借用电报局电杆挂线的，但多半系用专杆挂线的。电话线总延长里数也是约有两千六百多公里。在修筑警备道路和架设警备电话的过程中，因为办理缓慢，曾招来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长日寇陆军大佐加纳丰寿的指责。至于修筑这种警备道路的主要目的，是为便于当时日伪军队出动讨伐的使用；警备电话的架设，是为建立情报网，以便遇有警报，则讨伐部队就可迅速出发。在修筑这项警备道路时，大部分都是占用人民的土地，以共占用多少今已记忆不清。关于这件事情虽然是由伪民政厅所主办，但据我所知道的，当时所占用的土地，并未付给什么代价，尤其关于这项警备道路的修建，完全是强迫当县的人民所修筑的。就是各县的警备道路，都是征用该道路的附近村民来修筑的。对于架设警备电话，关于搬运电杆和挖坑埋杆各项工作，也都是无偿的强迫当地方人民来作的。这是我在伪警务厅长任时，为确立治安，实行修筑警备道路和架设警备电话，占用人民土地和强迫人民从事无义务之事的罪恶事实，我是绝对负这个责任。

其次，我在伪警务厅长任中，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季，伪警务厅特务科曾在吉林省城逮捕伪造货币案件约四五人，当经送交吉林地方检察厅。又和龙县伪警务局曾逮捕共产党员两名，送交法院。又在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两年内，永吉县警察曾先后逮捕爱国抗日部队二十八名，由当时该县伪参事官日寇三宅秀也按惩治盗匪法和叛徒法分别杀害。像各县警察逮捕这类抗日部队人员送交法院或被杀害，我今虽然记忆不清，不能一一说出，是愧对人民的，但是估量最少总能有一百人。当时我是吉林省伪警察的最高长官，对于部下这种滔天罪行，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我到伪警务厅长任时，吉林省就有伪清乡委员会的机关，复由伪吉林省长熙洽名义委任我兼充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约有六七个月。这个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是专办招抚的事务。后于一九三三年夏季，因为日寇陆军第十师团由日本开来伪满，驻扎吉林省境内，由该师团成立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乃取消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在我兼任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是由伪吉林省长熙洽任委员长，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任副委员长。委员的组成，有驻吉林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兼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顾问陆军中佐大迫通贞、特务机关附兼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顾问陆军大尉滨田弘、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吴元敏、伪吉林省警务顾问宪兵少佐儿岛正范和伪吉林省公署总务厅长三浦碌郎、伪民政厅长李铭书、伪教育厅长荣孟枚、伪实业厅长孙辅忱等。在我兼任委员的时期，现在所能想起的事情共有三件，分别说明于次。

一、在我乍到差的时候，伪清乡委员会已经招抚在磐石一带的当年所谓土匪殿臣。关于这个招抚的事情，是由日寇吉林特务机关附兼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顾问滨田弘所负责主办，由滨田找人向殿臣说降。经接洽妥当后，听说滨田弘派伪警备司令部顾问名叫小越带领伪军前去包围点编，致使殿臣发生疑惧，带领一部分部下突围引避走去，当时只招降殿臣部下刘东坡带领四五百人投降，由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正规伪军，并任刘东坡为中校，以后任上校团长。当时对于招降费用，是由清乡委员会所负担，大约是二十万元。

一、一九三三年春季，伪清乡委员会发给日本军在绥芬河招降关庆禄所部的安居证。关于关庆禄的招降并未经过伪吉林清乡委员会，是由日寇第二师团部队直接招降的，听说关庆禄投降的当时

他所部的部队，是一部分由日本军改编为铁路作业队，一部分要求回家安度，当由招降的日本军通过吉林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知会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要求发给安居执照，当由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发给安居执照以共三千份。

一、在一九三三年春季，伪吉林省清乡委员会决定招抚荣廷所统带的德惠县大排民团。对于这件招降的事情，是由吉林省警务顾问宪兵少佐儿岛正范带领翻译许贵符（大连人）和伪警务厅日系伪官吏数名，前往当时的德惠县城查看这项大排民团后，回省报告清乡委员会，遂由清乡委员会开会决定对于大排民团实行给资遣散，对于荣廷等酌派为伪警察官吏。当命荣廷来省，经荣廷带同他的部下队长十余人到省，当即告知解决办法，并由伪清乡委员会发给现款十六万元，同时由我派伪警务厅督察官马季援（绥中县人）、事务官日寇船津源市、股长日寇吉原贤伦等六七人，随同荣廷到德惠县点名放饷和偿还地方所垫款项后，即把这项大排民团全部解散。对于荣廷由伪吉林省长熙洽委为伪双城警务局长，他的部下队长王某（忘其名字）委为伪苇河警察大队长，李某（忘其名字）委为伪珠河县警察大队长。〔中略〕

其次，我在伪警务厅长任时，由一九三三年的夏季起，曾兼任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日本军的治安工作机关，委员长是日寇第十师团参谋长陆军大佐加纳丰寿，委员会设于该师团司令部内。委员的组成，就我所知道，在吉林方面有驻吉林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陆军中佐大迫通贞、驻吉林省日本宪兵队长兼吉林省警务顾问儿岛正范、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顾问滨田弘、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吴元敏、伪吉林省公署总务厅长三浦碌郎、伪民政厅长李铭书、伪教育厅长荣孟枚、伪实业厅长孙辅忱。在哈尔滨方面有哈尔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附，哈尔滨日本宪兵队

长和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长金荣桂。当时伪吉林省长熙洽、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都是该委员会的顾问名义。这个委员会每月约开会一次，以后约两个月开会一次。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哈尔滨，有时在吉林。这个委员会所办的事务，据当时所知道的，就是消除人民的力量和解散旧政权所残留的武装团体。对于收缴东北的民枪，在表面上是由伪民政部发令实行，而其实际当伪民政部发令收缴后，则伪治安维持委员会就对各县所收缴的枪支，命令解交驻在的日本军。在旧政权时代东北农村都有人民自卫团的组织，这是保卫乡里守望相助的意思，而该委员会认为是人民一种团结力量，命令伪吉林省公署下令各县一律解散。又对吉林省旧政权所遗留下来各县保卫队全省约有三万人，是县费自办的，这个委员会认为是很大的武装力量，于是命令伪吉林省公署完全解散。又如解散汉奸熙洽的警卫队三千人等。这是就外表知道该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危害人民的工作是不知有多少的。有如在一九三四年该委员会实行民匪分离政策，对于永吉、磐石、舒兰、额穆、桦甸、敦化等县建设集团部落以共一百七十一处。在这个时候，据我所知道的，伪民政部对吉林省尚无建设集团部落的命令，而日本军治安工作机关——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就开始实行这个危害人民的办法。在治安维持委员会建设集团部落的主要目的，一面是把山岳地带居住的人民强制归并到新指定的集团部落地点，使被归并的人民自己建造家屋，集体而居，以便伪满政府易于监督管理，使他们作伪满的顺民，消除反满抗日的行为；一面是与当时日寇认为贼匪的抗日部队断绝关系，以孤立爱国抗日部队的活动。至于这种集团部落的建设对于人民的危害更是重大的，第一、在被指集团的山居人民，如果不愿到指定的集团部落时，就认为是反满抗日，有立被处治杀害的危险；第二，遵命集团的则

又丧失旧日的家园土地，造成破产的状况，加上新的集团部落是集体而居，卫生条件最为恶劣，而集团部落附近的土地不够耕种，因之造成疾病贫困死亡的事情是不知有多少的。当时我是兼任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对于这个重大危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我是有责任的，故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我在伪警务厅长任时，吉林省各县继续旧政权的组织，都有保卫队，大县多者约有四百人，小的县份则是二百人、一百人不等，是由县费自办的，归各县长直接指挥监督，担当本县的剿捕工作，由吉林全省保卫团管理处统辖，当时我以伪警务厅长兼任该管理处总办约有七个月。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伪吉林省治安维持委员会认为各县的保卫队是很大的武装团体，命由伪吉林省公署裁撤解散。在保卫队解散后，我即本照伪民政部警务司的规定，编制各县警察队，当时大致各县是一百人，最多的约一百五十人，最小的县是五十人，仍由各县长直接指挥监督，担任本县的治安讨伐。所有以前的保卫队和以后的警察队，当时在名义上所谓保卫治安，而其实际是日寇的工具，也是危害人民的敌人。当年所说剿办土匪和与抗日部队作战，我今虽然是记不清楚共有多少次数和伤亡若干人，但是我是他们的最高统辖者，对于这项事情，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我在伪警务厅长任中，在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两年，吉林省日伪军队的讨伐以共是一千余次，丧亡爱国抗日部队约有二百多人。当时日本军驻吉林的司令官是旅团长少将中村馨，伪满警备军是归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所管。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日本军讨伐部队有区处警察和警察队的权限，也就是日本军讨伐部队到达被讨伐的各县时有指挥命令警察队的权力，因为当时的这种规定，所以我所管的各县警察队协力日伪军的讨伐是不知

有多少次的。对于各县警察队协力日本军讨伐的事情，我是绝对负责。

其次，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到伪警务厅长任时，吉林省的治安情况，像旧东北军冯占海所部的抗日部队，在我未到任以前，已于该年的夏季由吉林省境内撤退开往热河，在扶余县的李海青所带领的抗日部队，已由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带队逼入于黑龙江省境内。当时吉林省境内尚存的抗日力量，在磐石、桦甸、敦化一带有殿臣号称有两千人，在九台、吉林、蛟河一带则有三江好，号称有三千人。对于这两项抗日力量，当时认为是抢夺土匪，而没有政治思想。在依兰地区则有丁超、李杜所统率的旧东北军，改称自卫军。在一九三三年的秋季，丁超带领部队在宝清投降日本军，于是自卫军解体，依兰地区各县由伪吉林省长熙洽派伪官吏接收。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因日寇陆军第十师团联队长饭冢在依兰、桦川、勃利一带强行收缴人民地照，致激起土龙山事件，谢文东把日寇饭冢等数十名狙击枪杀后，带领人民数百人起义，造成新的反满抗日力量。这是我在伪吉林警务厅长任内吉林省治安的大概情形。当时伪吉林省长熙洽的政策是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中略〕伪吉林省长熙洽就派伪民政厅长李铭书到桦川县、佳木斯作宣抚工作，并由伪警务顾问儿岛正范到哈尔滨与第十师团联络取消强制缴照，和到佳木斯与李铭书联络，对于谢文东则由第十师团进行讨伐，撵进山里，当时我曾以伪厅长的名义命令依兰地区各县的警察队堵击和协力讨伐。以上所述各节，是我在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长任内打击抗日团体的力量，是罪有应得的，故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在伪三江省长任内的罪行：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伪满政府为实行日本帝国主义的进

一步侵略政策，乃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把旧日的东北四省改为十省，我被任为伪三江省长。在伪三江省开厅办事以后，当前首要的问题就是确立治安，于是我以伪省长的名义，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季命令各县重新修整各县的警备道路桥梁以及扩充各县的警备通信，使各区警察署都能与伪县公署直接通话。在修整这项警备道路的时候，完全是强迫警备道路附近的住民来修整的，也就是白白奴役人民来做的。人民所受的危害，不但自己自备干粮供出自己的劳动力，并且遭受警察的督促打骂凌辱的事情，更是不知有多少的。至于修整这项警备道路桥梁的惟一目的，就是专为供给日伪军队讨伐出动所使用的，在根本说来，是从反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尤其当时为确立治安起见，除修整警备道路和扩充警备通信外，并在一九三六年实行伪民政部所制定的保甲条例。关于这件事情，是由伪警务厅所主办，由该厅派伪官吏到县监视执行，先由几县办起，然后再推行各县。当时的大致情形，就是按照保甲牌的制度，保有保长，甲有甲长，牌有牌长，层层节制，补助警察机关办理行政事务，受伪警察署长的监督指挥。对于人民实行十家联保的办法，就是十家互相保证没有反满抗日行为和各种犯罪的事情，遇有行迹可疑的人员有报告的责任，倘有犯罪的情事知情不举，则十家连坐。当时实行这种保甲条例的目的，第一、使各县的户口能以澄清；第二、使爱国抗日部队的人员不能在城镇乡村活动；第三、使当时所认为的歹人匪贼无处容身。这是日寇所自许为正本清源的办法，反之正是当时人民遭受痛苦最深的事情。保甲条例实行后，发生的取缔案件，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八十八件之多，被逮捕的人送交法院惩办的约有数百人。这是三江开省后，由我命令各县修整警备道路扩充警备通信和实行保甲法，给人民带来重大危害的犯罪事实，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在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间，伪警务厅长日寇对马百之向我报告，言说现由伪三江省治安维持委员会决定，对于本省实行建设集团部落，全省各县以共是七十二处，分为两个年度来建设，就是由一九三六年春季开始到一九三七年秋后完成。当时我曾问他，对于建设这种集团部落，在被集团的人民是否有这个力量。他说对于经费一节是由伪民政部发给补助费，关于所需木料资材是由治安维持委员会负责，被集团的人只出建筑家屋的劳动力。我又问他，新的集团部落附近的土地能否够种，对于被集团的人民耕种有无困难。他说对于这些问题，在治安维持委员会均有讨论考虑，都有办法，是不成问题的。在他报告以后的不久，复有伪总务厅长樋口光雄也曾向我解释建设集团部落的问题。遂于翌年的春天乃按照伪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决定计划，分别在各县开始建设。这是我开始建设三江省集团部落的大概情形。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主要目的，就是实行伪满政府所规定的也就是关东军所规定的民匪分离政策。当时伪满政府和关东军都认为三江省治安不良，内有掠夺的土匪和有政治思想的爱国抗日部队，所以建设集团部落，把山岳地带散居的人民强迫归并到新的集团部落，以便易于监督管理，消除民族压迫抗拒的斗志，好作伪满的忠诚顺民，也就是作日寇的奴隶；另一方面，是使爱国抗日部队失去与人民的联络，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接济，使它陷于孤立难存的地位；对于掠夺的土匪，在集团部落以后，更是欲抢而不可得，自然消灭解体。

建设集团部落给人民所带来的重大危害：第一，在建设集团部落的当时，被强迫集团的人民如果反抗集团时，即认为反满抗日，遭受杀害的事情是会有的；第二，强制人民搬到新指定的集团部落，把房屋烧掉的事情也是有的；第三，遵命集团的人立即丧失旧有的家园土地，造成破产的状况，而新的集团部落附近土地不够耕

种，在被集团的人民是自然演成贫困不堪的境遇，更加上新的集团部落是集体共居，卫生环境最为恶劣，容易发生疾病，在这种贫病交迫的生活状况下，走向死亡的道路更是势所必然的。现在知道三江省共建集团部落是八十三处，照我当年所知道的增加了十一处，被集团的人民以共约近五万人，死于这种贫病交迫之下的是不知有若干人。

其次，在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抗日军赵尚志将军带领部队进入通河县城，约有半日，上足给养，当即撤退。在抗日军进城的时候，伪县长王知津把该县的警察队调进县署保护，没有抵抗，驻在该县的日寇军队约有二十余名，当抗日军进城后，也是把守营房未敢作战。这个事件出了以后，佳木斯日寇军队司令部认为伪县长王知津有勾通抗日军的情事，遂命由佳木斯日寇宪兵队到通河逮捕该伪县长，羁押于佳木斯日寇宪兵队本部，百般拷问，约近两个月，该伪县长坚不承认有勾通的情事，因无确证，遂由我向日寇宪兵队出具保结，保证其今后的行动，由我的秘书官宋毅到宪兵队本部把他领出，经我以伪省长的名义报告伪国务院以行政处分惩戒免官了事。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时，伪总务厅长樋口光雄只说宪兵队逮捕王知津的事情，并未提及逮捕伪警察官和伪警察等二十四人，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当时逮捕这么多的人，并且遭受日寇杀害，这是我在伪省长任内不能庇护伪警察官吏爱国行为的罪恶事实，我是绝对负责。

其次，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伪三江省公署成立的时候，驻在三江省的日寇军队是一个联队，等于中国的一个团。联队长名叫田村元一，驻在佳木斯。伪满军队是三个旅，归依兰地区警备司令李毓九所管辖，当时是由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所领导，以后哈尔滨第四军管区成立，则归该军管区领导。李毓九兼任第二十

二旅旅长，驻依兰。在一九三五年秋季依兰警备司令部迁于佳木斯，改为三江地区警备司令部，第二十三旅旅长崔文林驻于富锦，刘维汉旅(忘记队号)驻莲江口。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日寇田村联队开拔回国，则由日寇骑兵旅团接替，旅团长少将名叫镰田，驻于佳木斯，以后旅团长换为石田保秀。在一九三六年图佳铁路通车，日寇又添设第四独立守备队，该队司令官名叫小林角太郎，驻于林口(当时是勃利县的一个区)。迫一九三七年五月，就是我离任的前月，日寇骑兵旅团开走，则开来日寇松井师团驻于佳木斯，他的部队纷纷向各县进驻，传说要实行大讨伐，在六月底我就离任。这是我在伪三江省长任内，日寇逐年增加兵力和伪满部队驻在的大概情形。当时对于治安讨伐的责任，是由这些日伪军所负担，至于我所管的各县警察队，当时大县是一百名，小县是五十名，平时是由当县的县长直接指挥监督，担负本县内的治安讨伐任务，遇到日本军的讨伐，则听日寇讨伐部队的区处。现在知道，我在伪三江省长任内，在一九三五年即伪满康德二年，日伪军警就有一千六百回的讨伐，在一九三六年也是一千余次，延数的兵力出动有五万多人，伤亡爱国抗日部队约有一千数百人。对于这种摧毁爱国抗日部队的罪行，我是有重大责任，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在伪热河省长任内的罪行：

我在伪热河省长任内，适值伪满政府强化鸦片毒害政策，指定热河省为鸦片栽培地域，当时我即执行伪满政府榨取鸦片的政策，对于热河鸦片行政部门大加整备。在伪省公署内添置烟政科，归伪民生厅主管，在各县旗添置烟政股，掌管种烟收烟的事务，并在种烟的各县旗成立鸦片生产组合，办理鸦片生产和集体缴烟的业务。在一九三八年伪满政府指定热河省栽种鸦片面积是三十六万亩土地。伪省公署接到这项指定后，当由省政会议决定，除指定西

部国境线兴隆、滦平、丰宁三县暂不栽种外，其他各县旗一律栽种，并将三十六万亩土地的数字分配于各县旗，于是乃强迫人民种烟。在种烟的人民并须事前缴纳栽培鸦片特税每亩地五元。当时是按土地的等级定出烟的多寡，大致是上则地每亩地应交烟十五两，中则地每亩地应交烟十二两，下则地每亩地应交烟八两。到每年割烟的时候，由伪经济部临时指定收买价格，也就是拿着最低的价钱，把种烟人民所辛苦生产的鸦片全部强行收买。在一九三八年的临时指定收买价格，是特等每两八元，一等每两六元，二等每两四元，三等每两二元。在种烟的人民所得的低微代价，是不能够维持足够的温饱，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两句话可以包括的，就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这是当年的实际情景。在一九三八年当割烟的时候，因为霪雨成灾，造成减收，该年的全省总收获量是三百四十万两。在一九三九年的总收获量是四百四五十万两。这是我在伪热河省长任内执行伪满政府政策，帮助日寇榨取鸦片危害人民的事实，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季，伪热河省警务厅长日寇村井矢之助，拿着图表向我报告，言说伪满政府为加强热河西部国境防务，现由奉天、吉林、滨江三省派来增援警察部队共两千名，现已由他把这项增援警察部队配置于西部国境线，并说在西部国境线连同旧有的一共建立一百个哨所，都配有轻机关枪，今后对于热河省治安，可保无虞等语。当时我是完全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的，听到他的这种报告，反而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地认为热河地方治安得到确保。今日回想，这种加强国境防备，正是危害威胁我们爱国抗日部队进入热河的活动。这是我在伪热河省长任内，加强西部国境线的防备，危害威胁八路军的罪恶事实，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我在伪热河省长任时，在一九三八年伪满政府治安部命

令收缴热河省各县旗人民的洋炮。查这项洋炮，是在一九三三年迄一九三四年的春天，伪满政府民政部命令收缴各省民枪时，留给人民自卫的，刻因日寇发作芦沟桥事件，故意挑衅作为借口，实行侵略中国内地，惟恐东北人民乘机起义，认为这种洋炮散在人民的手里，也是一种反抗的武装力量，遂由伪警务司以治安部的名义，命令各省实行收缴，消除人民的抵抗实力。我接到这项命令后，当即命由伪警务厅负责督饬各县旗实行收缴，当经各县旗先后共收缴洋炮约有八万余支，均经伪警务厅解交伪治安部警务司。在各县旗收缴这项洋炮的时候，对于有洋炮的人民实行搜翻打骂凌辱的事件也是很多的。

其次，我在伪热河省长任时，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季，某日的上午九时，伪省公署民生厅长高乃济到我的办公室，很惊慌地说，伪省公署民生厅社会科长张实，属官王群等三人，在昨夜不知因为何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我当时立即令我的秘书官姚书田找伪省次长三重野胜到我的办公室询问逮捕的事情。经他说这个逮捕事件，不是本省所办的，可问警务厅长能稍知详细一些，他说完当即走去。我乃命姚书田找来伪警务厅长村井矢之助，据他说这是伪满政府司法部和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命令伪锦州高等检查厅会同日本宪兵队所主办，是检举抗日铁血团，这个事件出在本省，省长是有重大责任的，不要向外打听，这不是本省所办的等语。约过三四日后，当即知道承德商工会长高玉轩和其他机关职员，以及各县旗各阶层人民，约共逮捕八十余人，以后听说约有三百多人，这就是锦、热两省西南大检举事件。约有半个月伪社会科长张实因受刑讯的关系，发生厌世的思想，在伪承德地方检查厅监房自缢身死，并咬破中指，在墙上写一很大的冤字，并用血圈上。由伪检察厅通知伪省公署，由我派伪民生厅长高乃济到该检察厅，把张实尸

体领出，送交于张家，由伪省公署代为操办丧事三日。对于这个危害人民的西南大检举事件，由伪锦州高等检察厅派察检官在承德地方检查厅拷讯约有半年，以后将被逮捕的人全部解送于锦州高等检察厅，对于审判处理的结果，并未发表。这是我在伪热河省长任内，本省发生大检举事件，而我并没有争取拯救人民的实际行动。〔中略〕

其次，我在伪热河省长任内，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零年五月止，因为日伪军队的讨伐，共伤亡俘虏当时所谓敌人约有五六千人。关于热河日伪军队讨伐的事情，在我到任的时候，我记得驻热河日寇西南防卫司令官是中将山田，以后更换为中将滨本，是后是少将福本，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是邢士廉，以后更换是应振复，当年对于热河西部国境线的讨伐事情，都是由日伪军方直接计划实行。日寇的讨伐部队到县时有区处警察的权限，也就是有命令指挥警察的权力，所以我所管的各县警察对于日寇讨伐部队的协力，自然也是很多的，对于这种协力讨伐的责任，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在伪新京特别市长任内的罪行：

我在伪新京特别市长任内，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和一九四一年六月，曾两次发生鼠疫。日寇关东军司令部认为宽城子区军用路以东地方，是鼠疫菌潜伏的地带，遂命令伪新京特别市把该处居民约有四万人，完全迁出，所有各种矮小房屋建筑物都要烧毁，另行整理地形。当时伪新京特别市公署接到这项命令后，即由我召开市谘议会决定在长春东车站以北约有数里的田地中，建立东荣新区，把军用路以东的居民，大部分迁移于此，另一小部分迁移于宋家洼子和二道河子两地方。当即成立官民评价委员会，当时对于房屋建筑物附着物各种赔偿费用以及迁移等费，都是定的很低。

伪副市长日寇大迫幸男再三对我强调迁于东荣新区的人民，因为由伪市公署发给地皮和配给建筑材料，重新建筑家屋，故对各项赔偿费用，不能定的过高，因他这种坚持主张，我也就未能按照人民的利益出发强为要求提高，致使当时的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害。

其次，一九四〇年是伪满政府公布国兵法实行征兵的第一个年，按国兵法的规定，我任伪新京特别市长，就是新京特别市的征兵官，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是伪军方面的征兵官。我为执行国兵法，在这年的八月某日开始实行征兵。〔中略〕当征兵开始的头一天，我同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均出席参加开始式典，并致训词。式典完了，即开始身体检查工作。〔中略〕受检查的壮丁六、七百人，大致是三个人合格一人，也就是约有二百三、四十人被强迫充当伪国兵。〔中略〕

其次，我在伪新京特别市长任时，曾执行伪满政府所公布的粮谷统制法。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季，对于市民实行粮谷配给制度，按照户籍在家人口的实数发给粮谷配给通账。在开始实行的时候，对于大人的配给量，是每人每月配给粮食十五公斤，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则按大人量减量配给，其详细数量现已记忆不清。因为实行粮谷配给，对于中国人在根本上就没有吃大米的资格。迨一九四二年伪满政府把榨取东北粮谷的总数量提走大部分，运往日本、朝鲜、当时的关东州和华北以及现地关东军的军用，致造成粮谷的不够，对于都市的配给量实行减量，把原来的十五公斤改为九公斤，配给各种杂谷，并有时配给豆饼和橡子面，致使市民损害健康，发生饥饿疾病各种现象，造成市民的重大损害。

其次，我在伪市长任内，执行伪满政府以榨取为目的的统制经济低物价政策，实行生产统制，消费统制、物价统制各种法令。在这种危害人民的统制经济执行的结果，在伪新京特别市方面，首先

是工商业的萧条倒闭,因为工业的生产品,被伪满政府以低价强行收买,致使不能继续维持。在商业方面,因为实行统制,无有买卖可做,当时倒闭的工商业大约有四分之一。而在市民方面,因为统制经济实行配给制度,但在事实上只有配给之名,而无配给之实,实质上市民领不到生活必需品,因之演成物价升腾,暗行飞涨,造成市民的生活困难,吃不饱穿不上的状况。这是我在伪新京特别市长任内,因为执行伪政府法令所造成的结果,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我任伪新京特别市长的时候,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准备对美、英开战,需要大批金钱,是以伪满政府由这年起大肆吸收游资,雷厉风行作榨取的储蓄工作。在伪新京特别市这年所负担的储蓄金额,我的记忆大约是一亿元,在一九四二年大约是两亿元。关于这两年储蓄的办法,大致对于工商业方面,是由伪特别市公署召集地方银行业者和工商业者开会,在伪经济部派员临席之下,用劝诱和摊派双管齐下的方法,实行强制储蓄的卑劣手段。对于市民的储蓄,也是由邻组长用劝募和分配的办法来进行的。当时伪新京特别市的经济状况是不景气的,自从伪政府实行经济统制后,民族工业方面得不到生产原料,已成半停业的状态;商业方面无货可卖,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工商业方面是极端困疲的。至于市民更是穿不暖吃不饱的,谈不到有游资储蓄了,而我当时执行伪政府的聚敛政策,强迫市民大量储蓄,致使市民遭受重大的困难,我是罪有应得的,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一九四一年日寇对美、英开战后,痛感铜铁不足,在一九四二年伪满政府开始强迫人民献纳金属,以应付战争的急需。当时伪新京特别市公署接到伪政府的命令和号召后,当即召开长春、宽城子、和顺、大同、顺天、敷岛、东光、东荣各区献纳金属会议,按

伪政府所规定的范围，号召市民献纳铜铁，并指定各区的交纳地点。当时伪政府所规定的范围，是凡机关、学校、商店、住民所有的铜铁栏杆、院杖、门、窗、牌、匾、门窗的铜铁拉手、划棍、各种铜器以及铜佛等等都得献纳。尤其当时伪皇帝溥仪，并为之首倡，把伪宫内府的铜铁金属直接献纳于关东军司令部。所以伪新京特别市对于金属的献纳是雷厉风行的，可以说是达到搜罗殆尽的程度。当时搜罗的总数量，现已忘记不详，但是估量总可有七、八百吨。〔中略〕

其次，我在伪市长任内，在一九四一年供出劳工约一千五百人，在一九四二年供出劳工约两千四、五百人，都是到北满当时日寇所谓北边振兴工作。按照当时供出劳工的规定，劳工的工作期间是四个月，但是当地使用劳工的日寇军方或包工业者，每每藉口工程只剩尾巴，强行延期，致使供出的劳工都是多作一两个月。更因当时的劳作都是重劳动，而待遇又是极苛薄的，以及医疗的不够和没有，故供出的劳工每年的死亡率，约有百分之七。又我在伪市长任时，对于农村地区的粮谷供出，在一九四一年是一千二百吨，在一九四二年是一千五百吨。每年到要粮的时候，是不顾虑农民的粮食是否够吃，只是要完成伪满政府所榨取的要求量，也就是尽先交纳按所耕土地应摊的责任量，致造成农村地区人民的饥饿穷困。〔中略〕

其次，我在伪新京特别市长任时，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某日，接得日满开拓委员会的信一件，言说委嘱我为该委员会的临时委员，内订第二日上午十点钟在日满军人会馆开委员会例年报告会，要求出席。当时我因未曾听说过日满开拓委员会的机关，因向副市长日寇关屋悌藏询问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据该日寇关屋悌藏说，这个委员会是领导日满开拓事业的最高机关，委员长是关东军参谋

长，历任新京特别市长都是临时委员。我于第二日上午十时即到日满军人会馆出席，首由委员长关东军参谋长吉本政一致辞，约有十几分钟，即由干事长作报告，干事长是伪开拓总局长稻垣征夫。当时日本方面的委员，是驻伪满日本大使馆参事官三浦武美、关东局总长三浦、满拓公社总裁二宫重治、兴业银行总裁冈田进、临时委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大村卓一。伪满方面的委员，是伪总务万长官武部六藏、伪兴农部大臣于静远、伪经济部大臣蔡运升、伪外务局长官韦焕章、临时委员是我。〔中略〕此是我第一次参加日满开拓委员会例年报告会的事实。又在一九四二年，我现在记不准确月日，接得该委员会通知，仍是在日满军人会馆开委员会例年报告会。这次开会委员长是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太郎，日满双方委员仍旧，干事长仍是伪开拓总局长稻垣征夫。〔中略〕

查日满开拓委员会是办理日寇开拓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一九三八年伪满政府开拓总局成立后，以最低的价格除收买池沼地原野地大块土地外，并强行收买大片熟地，撵走原住人民，造成东北千百万人民的破产流离失所，走向贫困死亡的道路。这个委员会是危害东北人民的主要机关，而我以伪新京特别市长的职务兼任该委员会的临时委员，并且出席过两次例年报告会，通过该年度的工作计划，我是责任重大的，罪有应得的，故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在伪吉林省长任内的罪行：

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上旬，我任伪吉林省长。在这个时候，正是日寇榨取东北农产物最甚的时期。伪满政府认为吉林省是谷仓地带，吉林省出粮的好坏是与伪满全局有重大影响。于是我就本照伪满政府的榨取政策，在每年的春季召开市县旗长会议一次，提倡努力增产出粮报国的口号，号召各市县旗

长对于农民讲求大量生产，多施肥料，多次锄草，多收粮食，以便日寇的掠夺榨取。并且根据伪满政府的命令在伪省公署内经常设有粮谷搜荷督励本部，到每年要粮的时候，就编成四个粮谷出荷督励班，由各伪厅长担任班长，分赴所担当的地区督促本地区的各县早期出粮。而在各县更有本县的粮谷搜荷督励本部，到粮谷出荷的时候，编班到村直接督促农民向兴农合作社的粮谷交易市场交粮。在一九四二年十月我到伪省长任的时候，正是粮谷出荷开始的时期，伪吉林省次长饭泽重一向我报告，言说伪省公署已编成四个要粮督励班，正在各地区工作中，要求我赴各县作到任的初度巡视，兼对粮谷出荷加以激励。当时我就照他的要求，以两个月的时间，先后到各县视查。每到一县都召集当县的伪官公吏对他们讲话，责成他们务须要完成该年伪满政府所榨取的要求量，以及到粮谷交易市场查看验等过秤出粮的各种情况，有时更厚颜无耻地向出粮的农民讲话，说些要努力增产，出粮报国，帮助日本完遂圣战的话，也就是变相的让农民们作日寇的忠诚奴隶。我在吉林两年零两个月，赶上三个年度要粮的时候，就是在一九四二年完成伪满政府的榨取要求量是一百六十万吨；一九四三年完成伪满政府所榨取要求量是一百七十万吨；一九四四年是一百八十万吨。在一九四三年伪满政府因为这年是雨旸时若，年景丰收，认为农民尚有余粮可以榨取，于是在各省粮谷出荷完了之际，又定出报恩出荷的名目，全伪满规定是五十万吨，并由伪满政府唆使各县日寇副县长假造农民自动的意思，于是吉林省的日寇副县长唆使各县的伪协和会假造民意，硬说是年成丰收，农民手中尚有余粮，愿意出粮报恩，在吉林省则又出了十万吨粮谷，致使农民所辛苦生产的粮食而拱手交付于日寇。至于每年要粮的时候，当年的政策并不考虑农民的粮食是否够食，而尽先出所耕土地担当的责任量，因之也就造成

农民的饥饿穷困和痛苦。由一九四三年起伪满政府加强各种榨取，规定对农民的强迫储蓄，在粮谷出荷时按照卖粮所得百分之二十储蓄，由兴农合作社在粮价中扣下，吉林省农民的这项储蓄大约是三千万元左右。〔中略〕

其次，我在伪吉林省长任时，在一九四三年春季，我曾帮助伪满政府强行收买郭尔罗斯前旗土地。查郭尔罗斯前旗共有土地二十三万垧，人口约十六万人。伪满政府此次强行收买的土地是十八万垧，只剩地势较高的岗地五万垧未被收买，留给该旗的蒙古人作为牧畜耕作之用。在伪满政府强行收买这项大片土地时，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曾在报纸上发表买地用途，言说伪满政府收买郭尔罗斯前旗土地，是为引用松花江水冲涮地面碱性，然后造成水田作为开拓用地，将来移来大量日本开拓民等等。当因这种目的，故当土地收买后，除把该旗的蒙古人约有五万多人，预定迁于该旗未被收买的岗地区域外，其他原住民约有十万人，完全撵走。当时伪满政府对于强买土地评定地价各种事务，是由伪开拓总局直接办理，对于被撵走的原住人民命由吉林省处理。在伪吉林省公署接到这项命令后，当即由我召开省政会议，决定把这项被撵走的人民临时安置于前郭旗的邻县农安县，并派伪开拓厅长华荣栋带领工作人员分赴前郭旗和农安县现地办理这项工作。先后分批临时安置于农安县的各区，统共约九万多人，在被撵走的人民约有五千多人因为自己另有投靠，故当时未到农安。

又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季，我曾帮助伪满政府强行收买通阳县赫尔苏村土地一万垧，怀德县沿东辽河北岸土地两万余垧。关于强收买这两处土地的用途，伪满政府计划在赫尔苏地方建筑东辽河水库，水库下游两岸开辟水田，作为开拓用地，预定移来日寇的开拓民。所买赫尔苏土地一万垧，是为作水库用地，也就是水没

地。对于水库用地，还强买四平省梨树县土地许多垧。在强行收买这两处土地时，对于收买和评定地价等事仍是由伪开拓总局直接办理。对于赫尔苏水没地被撵走的人民约有一万人，怀德县沿东辽河北岸被撵走的人民约两万人，当由伪吉林省公署与通阳、怀德两县协议，分别安置于各该县的其他各区村。并在强买这两处的土地时，伪吉林省次长日寇饭泽重一，要求我到现地作宣抚讲话，我曾携同伪民生厅长路之淦到通阳县赫尔苏和怀德县的公主岭，对被收买土地的人民作宣抚讲话，劝解他们要谅解政府和认识国策等等。

当伪满政府强行收买以上三处土地时，在伪开拓总局所发给的地价，较诸当时的市价相差悬殊，对于赔偿费用和迁移费等，都是定的极低，更是有名无实，所给无几。〔中略〕

其次，我在伪吉林省长任时，执行伪满政府的命令，曾供出国民勤劳奉公队为日寇作奴隶。所谓国民勤劳奉公队，就是自一九四〇年伪满实行征兵起，凡征兵适龄青年在征兵检查时不合格者，不负兵役义务，而根据国民勤劳奉公法都有服国民勤劳奉公的义务，由伪国民勤劳奉公局按需要的多寡，定编队的多少。在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两年吉林省的国民勤劳奉公队是七万人。当一九四三年伪满政府强行收买郭尔罗斯前旗土地十八万垧为日寇开拓民开辟水田的同时，伪满政府命令吉林、龙江两省出动国民勤劳奉公队担负这项造田工事，我的记忆在一九四三年吉林省出动国民勤劳奉公队是四万人，在一九四四年仍是四万人。听说龙江省在这两年中每年是三万人。对于这项国民勤劳奉公队的征集出动是由我来发令执行的，并当一九四三年吉林市和吉林县国民勤劳奉公队出发的时候，曾在吉林神社附近的广场举行分列式，由我检阅后前往郭尔罗斯前旗。更在同年的五月伪国务院曾在郭尔罗斯前旗

现地举行盛大的开工式典，当时到现地出席的有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各部伪大臣以及中央各机关会社的首脑约共百余人，我也是出席参加的一人。

又在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伪满政府实行修筑哈大道路，命令吉林省出动国民勤劳奉公队，每年都是约近三万人，交于国民勤劳奉公局。关于哈大道路是由怀德县起至长春，再由长春利用到吉林的国道至吉林，通过吉林松花江大桥出吉林县境至舒兰县白旗堡村，由此直北至榆树县城，再由榆树县城北至牛心山，过拉林河入滨江省。当年修筑哈大道路吉林段的路基工程，除吉林省供出国民勤劳奉公队约近三万人外，其他各省参加的勤奉队和劳工也有很大的人数，但确实的数目我是不知详细。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当哈大道路吉林段由怀德县开始修路的时候，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伪国民勤劳奉公局长日寇半田敏治等多人，曾到现地视察。我带同伪民生厅长路之淦先期到怀德县等候，陪同视察。当视察完了后，在公主岭市公署休息的时候，由我报告吉林省国民勤劳奉公队在怀德县修路的人数，由伪国民勤劳奉公局长日寇半田敏治报告勤奉队的工作情况，最后由伪交通部日寇司长说明哈大道路的概况。〔中略〕

其次，是我在吉林省长任时，伪满政府认为吉林省是生产粮谷的主要省份，故对劳工的供出比较减轻，在一九四三年吉林省供出的劳工大约是三万二三千人，在一九四四年大约是四万四五千人。这项劳工的供出，是由我以伪省长的名义支配各县命令出动的。当时所去的地方，大致分为去到矿山挖煤开矿、工厂劳作、治水、修筑道路，砍伐森林等重劳动。当因劳动是很重的，而待遇是太苛的，加之医药的欠缺，因之造成劳工发生疾病死亡的事情是不知有

多少的，每年供出劳工死亡的详细数字现已记忆不清，但是我曾记得当时所供出劳工死亡最突出的是一九四三年榆树县去黑河的劳工，据说因为劳作条件太坏，一千人竟死亡了二百多人。这是我在伪吉林省长任中，执行伪满政府征要劳工命令，供出劳工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罪恶事实，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中略〕

其次，我在伪吉林省长任时，对于日寇开拓政策危害人民的罪行，有如以上所述的，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帮助伪满政府强行收买郭尔罗斯前旗土地十八万垧，在一九四四年春季强行收买通阳县赫尔苏水没地一万垧，怀德县沿东辽河北岸土地两万余垧，都是作日寇开拓用地，预定移来日寇开拓民，撵走原住人民约共十三万人，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除此以外，在我未到任以前，吉林省的日寇开拓团，就我所知道的是有两处：一处是舒兰县的水曲柳，一处是桦甸县八道河子。关于八道河子开拓团，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曾视察开拓团，在这个开拓团有日寇开拓民约近二百户，有七百多人，有小学校一处，有小规模医院一所，据当时伪桦甸县长赵振邦说，桦甸县共有土地二十万垧，除桦树林子区的土地未被收买外，其余十四万垧土地都被强行收买。因为日寇对美英开战，开拓民来不了，所以只成立八道河子开拓团。我在这个开拓团视察时，曾对日寇开拓民讲话，大致说他们由日本来到现地，对于山川气候想有不合适的地方，要他们忍耐，更说他们担负开拓任务，对于日满两国的共同开发共存共荣是有重大关系的，和勉励他们要努力与现地民族协和等等。〔中略〕

在地方各伪职中推行奴化教育的罪行：

我在伪热河省长任时，在一九三八年伪满政府实行奴化教育的新学制，我当时按新学制的规定，把旧日的完全小学改为国民学

校，初级四年，优级二年，取消旧日的男女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六年制，改为男女国民高等学校四年，把旧日的完全师范学校改为师道学校。这个奴化教育新学制，并规定伪满洲国的国语是日本语。教育方针是注重实务教育。综合说来，学生在学的年限是缩短了，所学的课程是浅易了，另外又新加了劳作教育。它的根本目的是不让后代青年得到高深的知识，只是造就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我当时本照这种奴化教育的精神，把国民学校完全注重日本语，开始造就奴化的根基，把国民高等学校多半改为农科，以符合实务教育的方针，以及开始实行学生的劳作教育。当时在热河省城有男女师道学校各一处，男女国民高等学校各一处，在喀喇沁有师道学校一处，在赤峰、围场、凌源、隆化各地都有国民高等学校一处，至于国民学校是凡大的村镇都有一处或两处。在实行奴化教育新学制后，凡中小学校都得添设日本人副校长和教师。但因当时日寇来伪满的教师不敷分配，在热河省只中等学校添置日本人副校长和日本人教师，小学方面，在我的任中尚未添置。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我转任伪新京特别市长，在伪新京特别市主管教育的机关是行政处教育科。当我到任后，伪教育科长陈伟儒向我报告，在伪新京特别市有男子师道学校一处，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三处，一高是工科，二高是文科，三高是农科，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两处。小学共有多少处，我现已忘记。以大经路国民学校和南岭国民学校的学生为最多。当时伪新京市的中学校都配有日本人副校长，每个中等学校都有四、五名日本人教师，尤其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是日本人校长，该校的日本人教职员特别的多，大经路国民学校的校长也是日本人，其他国民学校也有日本人副校长和教师。在我到任的这年六月，伪皇帝溥仪赴日本请来天照大神，于七月十五日造成伪建国神庙，正式供奉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

建国元神。溥仪并于七月十五日发布“国本奠定诏书”说:奠国本于惟神之道,张国纲于忠孝之教,以愚弄人民崇祖报本作日寇的万世奴隶,对于奴化教育从此更是加深一层。于是我执行伪民生部的命令,使伪新京特别市的中小学校都共俸天照大神的神龛于各学校的礼堂内,命令学生每天早晨到校时,都要向神龛行最敬礼,以及早操时都要向东方遥拜,以养成奴化思想的巩固,消灭民族压迫反抗的意志,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至于对学生的奴役劳作,使中等学校学生除在寒暑假期到工厂会社劳作外,平时还有临时的劳作,中等学校女学生到日寇部队和陆军病院洗衣服成为经常的劳作。〔中略〕

在伪民生部大臣任内的罪行:

我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任伪民生部大臣,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曾提出国民勤劳奉公法的修正法案,这个修正法案是把国民勤劳奉公队服役的年限加长加重,就是把原来服一年义务,每年服役四个月,三年服役完了,修正为服役三年,每年服役六个月,六年服役完了,并把国民勤劳奉公队服役年龄展长到二十八岁。关于这个法案修正的过程,主谋者是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由他命令伪总务厅法制处长伊藤博和伪民生部次长关屋悌藏所起草,起草以后由火曜会的次长会议通过,于同年的二月上旬,提出伪国务院会议,由我以主管部大臣说明修正法案的理由,经众无异议,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提出表决一致通过,复于同月二十二日举行伪参议府御前会议,仍由我向伪皇帝溥仪说明修正法案理由,并答辩伪参议丁超和井上忠也两人的质疑,其余各参议没有意见,由伪议长臧式毅提出表决,经全体一致通过,以后发表勅令公布执行。对于这个修正国民勤劳奉公法,在完成这个法律的程序,得到公布实行,我是有重大责任,故对奴役东北青年的罪行,我是绝对

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在伪厚生部大臣任内的罪行：

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伪满政府中央机构改革，废止民生部成立厚生部，由我任伪厚生部大臣。在伪厚生部是掌管厚生、保健、禁烟三个行政部门。在一九四五年伪满对于鸦片的栽培，在热河省大约是三十六万亩，在奉天省是一千五百陌，每陌等于十三亩，吉林省是一千五百陌，四平省是一千陌。关于奉天、吉林、四平三省鸦片的栽培，是采取集团栽培办法，所谓集团栽培者，就是由各该省指定一个县的某地方来栽种鸦片，成立鸦片生产组合，不许分散各县栽种，这是为便于监督管理，容易集货，防止鸦片私自流出的毒辣办法。对于这年鸦片的栽种，是由我以伪厚生部大臣的名义命令各省所执行的，这是我执行鸦片毒害东北人民的罪行，我是绝对负责，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其次，在三月十二日伪厚生部成立的时候，同时成立伪鸦片断禁协会，由我以伪厚生部大臣的名义兼任该协会总裁，复由伪满政府任刘绍裔为理事长。这个协会成立的主要使命，在表面上是根据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所公布的鸦片断禁法，专办对于已登录的鸦片瘾者按照年龄分期戒烟的事务，而其实际是为榨取鸦片瘾者的劳动力。在一九三九年伪禁烟总局成立的时候，实行鸦片瘾者的登录，当时登录的鸦片瘾者是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到一九四五年时现存的鸦片瘾者总数是五十万人。更〔便〕据一九四四年伪禁烟总局的调查，全伪满的鸦片潜伏瘾者，就是没有登录证而私吸鸦片的人，约有一百二十万。在伪满末年劳役繁多人力不足，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认为鸦片瘾者人数庞大是劳动力的潜在力量，乃想出榨取鸦片瘾者劳动力的办法，于是公布鸦片断禁法，设置鸦片断禁协会。实行榨取鸦片瘾者的劳动力。一面把荒闭数

年的康生院以共一百八十处，由伪国务院拨归该协会重新整备经营，作为戒烟场所；一面由伪厚生部次长日寇关屋悌藏筹划鸦片潜伏瘾者的实行登录，并由伪厚生部与日本大阪制药会社订立合同，代为制造戒烟药“东光剂”，在一九四五年是二十万人用份，订在十月末交货，以待戒烟药制造出来运到，康生院整备妥当，便实行分期戒烟，把瘾者烟瘾戒除，就编成康生队到各厂矿担当劳役，作日寇的奴隶。这种危害人民的勾当，正在进行中，所幸抗战成功，苏联进军，东北解放。

总之伪满政府所实行的法律和所有的行政部门，都是本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的，都是危害东北人民的。就鸦片断禁法来说，一面是榨取鸦片瘾者的劳动力，一面是保留一部分瘾者，作为借口，继续栽培大量鸦片，作为对外贩毒暴利的财源，由此一端也就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手段是何等毒辣残酷的。在伪满的最后，由我来掌管这个鸦片毒害人民的行政部门，并且已经着手榨取鸦片瘾者的劳动力，在我个人并在伪热河省长任内强化种烟收烟的机构，榨取种烟人民的鸦片，致使种烟人民的生活困难，我个人认为自已罪恶是深重的，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119—2—1111，1，5

黄富俊笔供

（1954年6月30日）

姓名：黄富俊。别名：润轩。性别：男。年龄：六十五岁。族别：汉。原籍：沈阳市南郊石庙子屯。奉天法政学校校外生三年卒业。

经历：一九〇八年四月入奉天度支司当书记生。一九一四年八月任奉天省财政厅（度支司改称）总务科正司书。一九一六年三月任奉天省财政厅制用科科员。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奉天省财政厅制用科预算股长。一九二一年九月任察哈尔省财政厅征榷科科长兼察哈尔兴业银行坐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任奉天陆军粮秣厂第一科科长。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兼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军需处第一科科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任镇威军总兵站处兵站监兼陆军粮秣厂总务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任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公署顾问兼道胜银行清理员。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伪满成立，经民政部次长葆康（他是我在陆军粮秣厂时旧长官）推荐，我同意，任民政部地方司长，抱着利己的思想，甘心背叛祖国，作了敌人的工具。

一九三三年二月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主持，我同行政科长白恒兴参加下，制订临时县官制，同年八日在部内开会，由次长葆康主席，各司长科长参加通过，用部令在政府公报发表。这种县官制主要点是县长以下设日人参事官（后改副县长），大县的警务

科长、实业科长改任日本人，行政财务科加派日人事务官。由此县政完全掌握在日寇手中，使他们能够顺利的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危害人民。我参加并通过这种官制，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赴西丰县参加军警慰灵祭。这个慰灵祭是奉天警备司令部和奉天省公署共同主办的，同去的有司令部参谋长曹秉森、省署民政厅长赵鹏第。这些军警都是被抗日军打死的，他们帮助敌人自残骨肉，死是罪有应得，我去参加祭奠他们，就是违反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参加部内制订改省和省官制案会议。由总长臧式毅主席，出席的次长葆康、总务司长竹内德亥、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民政部嘱托金井章二，并有关司长科长等，审议通过，由部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同月二十日由溥仪名义公布。这项改革案，是由金井章二与竹内德亥共同主持制订的。对省的名称我也表示过意见。内容：省区改变是把东北四省改为十省，蒙旗区域改设兴安四省，目的是为加强对人民的统制。省官制是在省长下设日本人次长，各厅增添日本人科长，警务厅长一律改任日本人，加强日寇掌握省政权利，以便督饬各县去宰割人民。我参加意见并通过执行这种制度，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五年七月，代表民政部大臣吕荣寰到勃利县林口去慰问小林师团长。这是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教我去的。同去的有总务司事务官西尾、秘书官张乐山。带去慰问品伪满国币一千元、酒十瓶。先到勃利县住一宿，第二天同勃利县于县长到林口小林师团司令部。这个师团任务是担当勃利县、桦川县一带治安，并保护图门到佳木斯铁路线。勃利县曾遭受过抗日军攻击，经他手把地方治安恢复，部里认为他有功，所以派我代表大臣去慰问。我见着他说勃利县秩序恢复，地方行政能够着手建设，皆是他的功劳，满洲

官民同深感谢等等的恭维话。晚间并在旅馆设宴招待他并他的师部参谋副官等二十余人。日本军在伪满都是染满屠杀中国爱国青年和无辜人民血的人，我去慰问他，就是益行助长他们的凶暴的气焰，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五年九月赴日本考察地方街村建设制度，目的是为伪满建立街村制度作参考。这是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教我去的。同去的有地方司事务官西本属官、张乐山秘书官和安东省民政厅长许贵恒，并他的秘书翻译（名忘记）。到东京内务省见内务大臣后藤文雄，由他派事务官津田领我到京都、大阪、奈良、爱知县、新泻县各都市参观，并到爱知县、新泻县三个乡村去视察。听到村长说明日本地方行政建设的沿革并现在町村制度的实况，知道他们的町村体制有“村会”，担当的事务是行政财政教育交通卫生，“农会”担当生产，“组合”担当经济、生产共同贩卖、消费共同购买等等。我在日本考察了二十多天，当时的感想看到他的都市工商业的繁荣，交通便利，就认为他是有伟大的实力。听到村长说明他们乡村机构的组织，认为都与农民有利，由此发生羡慕，亲日崇日，看不起中国有前途。〔中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奉天参加县长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奉天省长葆康召开的，目的是为加强一般行政。主持会议的省长葆康，出席的省次长竹内德亥、民政厅长刘负初、警务实业各厅长、各县长等三十多人。我向各县长讲话，说什么现在地方行政已入轨道，不像从前军阀时代杂乱无章，这是由于盟邦仗义援助和政府办事都有法令，才有今天的成绩，满洲国前途是有发展的，今后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本照省方的指示，根据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督励人民进行建设，使地方一切行政更进一步的得到发展。伪满法令无一件不是压迫人民的，日寇对东北只有掠夺，那里来的帮助，我向各

县长讲出这样话，就是勉励他们推行敌人政策，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参加部内审查街村制度会议，由总务司长清水良策主持，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土木司长王庆璋、卫生司长张铭俊，并各司有关科长等十余人出席通过，于同月二十日用部令公布，一九三六年一月实行(登政府公报)。这项制度是由地方司事务官津田制订(他是日本内务省事务官，担任指导町村行政，由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把他调到地方司专办这项工作)，经我同意。制度内容主要点，是在县的城市和集镇设街(从前县城下层行政直接归县办，不另设机构)，一般村屯设村(屯的单位仍存在)，街长村长由县委派，街村同属于县管辖，街村育成期限定为五年。从前南满(辽宁旧省区)系实行村镇制度，北满(吉黑旧省区)系实行保甲制度，这两种制度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皆属人民自治团体，为农村服务。新制度实行后，街村长由县委派，街村事务由县直接监督指导，完全失去自治意味。自一九三八年实行统制经济，各县就把街村组织提前强化，把收买粮谷统制物资等等事务均责成街村担任，从此街村就变成监视农民的机构，为敌人作工具。我任地方司长掌管地方行政，这项危害人民的制度经我同意由我执行，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任安东伪省长。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到安东省视察，他的来意主要是宣传统制经济，在协和会召集各机关首脑和市民开会讲演，出席的有东边实业银行董事长范先和等四百多人。他说日本军在中国内地作战，业经取得空前的胜利，现在中国蒋政权逃往重庆，武汉指日即能攻下，北边国防有皇军驻守是能保障安全，苏联虽有相当的实力，但他决不敢向日本轻于起衅，这一

点请大家安心。满洲官民应本着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努力从事生产，支援前方。现在政府准备实行统制经济，目的是为开发产业，保证人民生活安定，希望大家要与政府协力。最后由我代表作答辞，硬说安东全省官民对于皇军的英勇早有信赖，同时也知道支援皇军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后一定要遵照政府策划，完成我们尽负的任务等等的恭顺话。日寇侵略中国，把东北作他们军需基地，统制经济就是实行掠夺，我竟向他说出这样违反人民的话，甘心作汉奸，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七月产业部在安东设立统制柞蚕会社和烟草组合，派粮政司长吕作新，同总务厅主计处科长饭泽、柞蚕会社理事长鸠山、组合长(名忘记)到省开会，出席的省次长别宫，警务厅长连修，实业厅长范垂绅等十余人，决定收买价格蚕千粒一元六角到两元，烟草每公斤四角到五角(比时价少三分之一)，柞蚕全数作军用，烟草一部分交日本军，一部留伪满自用。我通过决议，由省令县执行，并以我的名义出布告，通知农民以后对于柞蚕烟草完全由会社组合照公定价格收购，禁止自由买卖。柞蚕烟草为安东特殊生产，每年总值在千万元以上，对农民经济占很大的比重。实行统制后，一九三八年柞蚕共由会社收买十亿余万粒，烟草一千一百公斤，总值六百余万元，农民损失四百余万元。这是我执行敌人政策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九月，国务院总务厅在安东设立鸭绿江满鲜水利发电会社，在宽甸县水丰河口修筑水利发电站。会社是由满鲜合办，资金两亿元两方分担，朝鲜出资的是日人野口，目的是为敌人在南满开发产业供给电力。同月十日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派主计处长松田令辅，同会社理事长野口，理事陈某(名不详)到省开会，由省次长别宫主席，警务厅长明山，实业厅长钱鲁民等二十余人参

加，我亦出席。由松田令辅说明会社在宽甸建筑发电站，计划收买水没地六万余垧，地价荒地每垧二元，熟地每垧由三十元到六十元，房价每间由二十元到四十元。政府在滨江省五常县预备出荒地，被收买土地的农民有愿迁往的，车费由政府担任，每户拨荒地三垧到五垧，每垧收价三元，当场通过，由省急令宽甸县协助会社执行。这时宽甸县长是由副县长山名光治代理，对于收买土地事务完全由他承办，收买土地不到三个月办完，被收土地的农民有五千余户，迁往五常县的仅有八百余户，其余均分散各奔他乡，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全部迁移完竣。筑堤工程由宽甸县代募劳工三千人，说每天给工资五角，都被包工扣去，人民未得着。宽甸县长董幼安向我说，他到宽甸县后，有由五常县回来的农民说，到五常县去的人因县方所拨土地均系山荒，预备建筑的木材不够，自动迁走者有二百余户，到后因受冻饿死亡的有三四十人。在收买土地时农民被警察逼迫交照，自尽的有十余人，这是我执行敌人政策，使人民遭受危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赴宽甸县视察集团部落，同去的有官房总务科小牧事务官，秘书官张乐山。这个部落共有土平房二十余蹚，每蹚十余间，我进入屋内看到妇女均穿着破烂单衣裳，小孩仅肚子上围着一条布，炕上有炕席，有被褥的很少，房沿和梁头上挂有少数苞米穗，并未看见别的吃粮，在室内并看见有两个新死的人尚未移出，这样凄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据部落内的村长背地向我说，这个部落住的人都是三年前从百里外山狱地区被日军烧了房子财物单人被撵出来的，原有二千人现在只剩一千四百五六十人，死了一大半。我问他怎么看不见壮年男人？他说都出外作工，不能常回来。我回省向次长别宫说，集团部落的人民因为无地种，无吃无穿多半饿死，现在治安恢复，应当让他们各回原地。他说这个部落

系由日本守备队管，他们认为东边山林地区治安尚未彻底肃清，不能即时疏散。宽甸县共有这样的集团部落五个，我是省长，对于目睹垂死的人民不营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四月，伪满政府在安东省安东县大东沟修筑大东港，目的为对日输出商品。同月二十日交通部派坂上技监同国道局长直木伦太郎到安东省开会，出席的省次长堀内一雄、实业厅长钱鲁民、交通科长田中等十余人。我参加，由坂上技监说明筑港计划，规定八年完成，第一期建设工程并收买土地一万垧，委托安东省承办。地价规定苇塘每垧三元，熟地每垧一百二十元，房价由四十元到六十元，比时价少半数以上。当场通过。收买土地由省令安东县执行，收买苇塘地七千垧，熟地三千多垧，撵走六个村庄的人民一千多人。事后听安东县长宫文超说，农民受警察催逼都含着眼泪交出地照，有迁到最近村屯的，也有远走他乡的，五家子屯并有自尽的一个人。这项工程共用劳工一千五百多人，均由安东县征发。工程一直继续到“八一五”。这是我通过执行，人民遭受的灾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在安东伪省长任内，警察实行法西斯手段镇压人民，更着重知识分子。检查邮件，在娱乐场所如饭馆澡堂电影院舞场等地方均雇用“腿子”监视人民的行动，遇有言行不慎，即由警察检举，诬以反满抗日罪名，用非刑拷问，这是到处普遍的事。安东人民在这样残暴镇压下，屈死的不知有多少人。安东县长宫文超说，他县内特务警察夜间审讯思想犯，非刑毒打，哀号的声音惊动附近邻家，成宿不能睡觉。〔中略〕我当伪省长，对警察这样危害人民，我知道不能制止，我对今天安东人民揭露出来的被害真象，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任龙江伪省长。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赴阿尔山慰问西山部队（他是龙江省防卫司令官，诺门坎战争调到前线），同去的有总务科小林事务官、秘书官张乐山、外属官一人（名忘记），带去的慰问品伪满币（数不详）、酒五瓶。见着西山说他保卫国境击退敌人有功劳，龙江全省人民一同感谢，我代表来慰问等等恭维话。又到前方九一八高地去慰问森田部队。诺门坎战争是日寇妄想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张势力惹起来的战斗，两个多月日本军和参加的伪满军，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沉重打击下，受到大量地伤亡，因此被迫停战。龙江人民是反对这种战争的，我代表去慰问是违反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到龙江省开会。省次长多田骏、警务厅长神子敏、实业厅长申振先和各科长出席，我参加。由结城清太郎说明开拓总局根据日满开拓计划，拟收买龙江南部泰来、镇东、白城、洮南、安广、大赉、开通、瞻榆、醴泉九县土地四百余万垧，作日本移民用。荒地每垧一元到两元，熟地每垧二十元到四十元，要求省方协助，当场通过，由省通令各县执行。收买的办法，由开拓总局派员拿着地图到县召集各村长按照地图所划的收买区域（说是买荒地，可是内中亦加杂一部分熟地）和规定的价格，责成各村长通知各地主限期交照领价，不交照的即发动警察催逼。在这样情况下三个月买完四百万垧的土地。这是等于强抢，土地是农民的生命，被日寇用如此的廉价夺去，该有怎样痛心。所收熟地开拓民未到以前开拓局租给农民种，每年每垧收租五斗到八斗，四百万垧土地按二成熟地约计有熟地八十万垧，每垧平均按年照七斗计租（每斗四十二斤），一年农民就得拿出租粮二亿三千五百二十万斤。我执行敌人开拓计划，使龙江人民遭受这种损害，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〇年八月下旬讷河县抗日军入县城，省方接到报告，即由警务厅长神子敏计划调龙江县警察队五十名随同日本守备队赴讷河应援，他们到讷河县城时抗日军早已向北安省撤退，警察队追到省境未遇即返回龙江，事后张县长来省报告说县署寄押有抗日行动的两个人(名不详)。抗日军进城包围县署(有七八十人)，打死日本警察三人，副县长逃跑，进监狱把这两个人救出，并缴去警察大小枪三十多支，在县城有三个钟头，即由北门向北安省方面退走，商民毫无损害。警务厅调警察队赴讷河县应援是经我同意，我就是打击抗日军，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〇年十月召开各县长会议，目的是为收买粮谷。出席的省次长山菅、实业厅长陈万铠、警务厅长神子敏、民生厅长吴奎昌、各关系科长等二十余人，我任主席，向各县长讲话，说去年龙江收买粮谷因为着手晚，仅收十余万吨，本年政府规定责任量五十八万吨，这个数字在春天已向各县分配，现在新粮不久上市，应提前着手收买，务望大家努力完成责任量。随后即讨论关于收买粮谷进行事务，如收买日期，督催方法和规定农村送粮先后程序等等，决定出划一办法。于十月中旬开始收买，十二月上旬我到泰来、洮南、白城三县交易场去视察，并对送粮的农民讲话，催他们把应交的粮谷赶紧送到交易场。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收买的粮谷未完成责任量，省次长下命令叫各县组织搜查班带警察下乡搜翻，同月林甸县副县长中岛到乡村搜查粮谷时，用木捧打农民头部，受重伤昏倒在地(村名人名忘记)，并令警察烧了他的住房两间和柴草垛。各县农民经此搜逼，多有把吃粮和种子拿出交纳，因此发生饥馑，有吃草根树皮的，有饿死的。安广县长刘元盛、白城县长刘鸿谟都说过县内有饿死的人，这是收买粮谷造成的恶果。到二月底收买结束，完成五十八万吨责任量。农产公社理事长结城清太郎到龙江

省公署交我一万元秘密费，说是政府奖励收买粮谷的，我收下分给民生厅长、实业厅长和各县长八千五百元（每人有八百元有五百元的），自己留下一千五百元，日本人亦有同样的奖励。我帮助敌人把农民血汗换得的粮谷抢夺到手，使人民遭到严重的灾难，自己反受政府的奖赏，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一月兼任龙江省红十字社支部长，接总社通知在龙江修医院，令我筹款，在省公署内召集市内有力商民张秀峰、刘维汉四十余人，募集现款三万八千元，以后医院修成，院长、医生、看护皆是日本人，专给日本人治病，一般市民无入院的权利。这是我帮助日寇榨取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三月兼任兴农合作社龙江省联合会会长。兴农合作社的任务，名为发展农村生产，为农民服务，实际它是政府统制农村产业剥削农民的机构。自一九三八年实行收买粮谷，合作社的职权愈加强化，对农村的迫害更加严重，农民都称它是倾农合作社。例如收买粮谷，各县合作社在县城和交通便利地方设立交易市场，农民交粮由它验等过称，它可随意压等压秤，并多打粮样子，作为自己收入；农民应领的生活必需品，如棉花、布匹、食盐、豆油等等，由它配给，它可任意克扣，私卖出去作为自己的收入；到乡村催交粮谷任意毒打农民，秋成的时候对缺粮的人家限制吃青粮；春天农民种地，某种粮谷种多少须由它指定，不准农民自由变更。白城县长刘鸿谟同该县合作社理事（日人，名不详）下乡催粮谷，见农民吃干饭，当时他就把饭盆摔于地上，并把农民骂了一顿。泰来县吴家村村民劈一筐青苞米，被合作社理事看见，罚他跪在地头，他回到县城即要求副县长下令禁止农民吃青粮，这是泰来县林县长向我说的。以上种种危害人民的行动，我兼任会长不能制止，我就是支持他们的行动，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安广县荒地沟视察开辟稻田工程,同去的秘书官张乐山、安广县长刘元盛。这项稻田是开拓总局委托省办的(土地是开拓局于一九三九年收买的),面积约五千垧,工程由大北公司包办(日本人),需用劳工五百多人,由安广、白城两县征发。我到工地见劳工均有饥色,问他们都说吃不饱,我回到白城县问县长刘鸿谟,他说这批劳工给养系由省指定,由本县照重劳动每人每月配给食粮二十五公斤足够吃,工人受饥饿,这一定是包工作的毛病。回省后问开拓科长小林(这项工程是他主办),他竟不承认大北公司有克扣工人给养的事,反说工人撒谎。日寇在东北各机关主管土木工程的人和包工业者,都是土木系出身,彼此联成一气,上下其手,偷工减料,克扣给养,是到处普遍的事。劳工是我下令征发,工人遭受的痛苦,是我亲眼目睹,我对包工业者剥削行为,不能制止,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七月经济部产业部准许林兼商店在龙江省大赉县设立水产会社,统制月亮泡鱼产。林兼商店是日本私人出资经营的,他在伪满各地收买水产物,专供给关东军,经济部产业部准许他在大赉县设会社,是由关东军授意,并省次长山菅支持他才取得独占权。月亮泡有渔民二百多户,大赉县城有经营渔业的鱼栈二十多家,每年生产总值在三百万元以上。会社成立后,规定鱼价每公斤由一角到三角,渔民打出来鱼不能自由贩卖,须照定价由会社收买,鱼栈的财产全部被会社由廉价收买去。这都是由省令县执行的。事后听大赉县长边树范说,水产会社成立不到一年,月亮泡的渔民因会社规定的鱼价太少不够开销,就有半数以上停业。会社拿廉价买进来的鱼,以三倍的高价在都市出卖,榨取人民取得高额的重利。这是我执行敌人政策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底我在龙江伪省长任内，征发劳工第一年七万五千人，第二年八万人，第三年九万人，皆是由我根据政府命令通知各市县摊派。这些劳工多数分配在兴安岭阿尔山林场、鹤立岗、穆棱煤矿作重劳动，死亡率在百分之五以上；一部分修建齐齐哈尔市到昂昂溪军用道路，龙江县三间房到昂昂溪一带军用仓库和堆积场，镇东、白城两县飞机场等工作，死亡率在百分之二。这是我执行敌人奴役政策，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任龙江伪省长时，龙江省鸦片瘾者登录共有六万多人（前二年瘾者登录数与此无大出入），这些瘾者需用的鸦片均由省民生厅向禁烟总局领取，分交市县供给瘾者吸食。人民染成这种毒品嗜好，有倾家破产的，有死亡的。这是我执行鸦片政策产生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任伪满兴农部大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滨江龙江两省视察收买粮谷状况，滨江省长王子衡召集各县长来省，我向他们讲话，说现在省县主要工作是收买粮谷，这是因为皇军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于军需支援是我们政府应负的责任，今年滨江全省出荷量中央规定一百万吨，现在收买的数字相差尚远，大家要努力，必须照责任量完成任务。到龙江省我也向龙江省长申振先和各县长讲过这样的话（龙江出荷量六十六万吨）。到收买结束时，滨江龙江两省均照规定数收足，人民遭受掠夺，是我督催所起的作用，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出席日满开拓委员会会议，主席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委员日本大使馆谷正之、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外交大臣李绍庚、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开拓总局长五十子，我也是委员。会议内容是审议日本开拓移民事务进行的计划。会议开始先由开拓总局长五十子报告本年度开拓事业实行的结果，以

后说明下年度拟定的开拓事务和移民人数、安置地点、资材准备、经费数目等等计划。他说完计划后，并未讨论，即由主席笠原幸雄站起来说，日本开拓民到满洲所作的事业有成绩，开拓局所定的明年度开拓计划很好，希望当局要切实执行，大家如无意见即表决(由此证明日方事前一定经过审议)。接着大家均同意，通过这项计划案。第二天开拓总局送一百元钱，说是车马费，我想这是酬劳。

日寇向东北移民，表面上说成是帮助满洲开发产业，实际是实现帝国主义多年拟定的大陆政策，先从北满着手，就是想以日本人从事北满国防阻挡苏联。这种移民政策，一九三七年冬即由关东军定出计划，在伪满设立开拓总局，任结城清太郎为局长，专办开拓移民事务。同 时成立日满开拓委员会，作为审议开拓事务的机关。开拓总局于一九三八年秋，即在北满三江、北安、龙江、吉林各省七十多个县，着手收买土地，继续到一九四〇年春，共收买土地三千万垧，约占收买区总面积四分之三，说是买荒地，实际加杂着一成到二成的熟地荒地。定价每垧由一元到两元，熟地每垧由二十元到四十元。收买的办法是发动警察强迫人民缴照。一九三九年七月，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同关东军的参谋和知鹰二，拿着关东军计划案到日本东京，与日本拓务大臣小矶国昭，和陆军大臣、农林大臣参加下决定出移民计划，开始实行移民。计划的内容主要规定二十年移民五百万，所用的经费由日满分担，移民实施的结果：

1.截至“八一五”共移来日本开拓民十万人，撵走东北农民一百五六十万人，让出熟地百万垧。因日本拓务省每年计划的移民的人数不能全来，东北农民所让出的熟地他们不能全种，竟至撩荒七八十万垧。

2.日本开拓民到东北多数变了质，依靠着政府补助费(每户五

百元)过优裕的生活,不尽力劳动,所种的土地草苗一起长,到秋天把熟地变成了荒地。到第二年甚至有把他种荒的地,强向附近的东北农民换种,东北的农民牲畜农具,他们可以随便使用,秋天苞米他们可随便劈着吃,因此有力的农家多数搬走,无力者只好停着干受气,这都是日寇移民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我在兴农部共出席开拓会议三次,通过每年开拓计划,人民所受的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一月兴农部订增产棉花法案,由农政司司长吕作新制定,由部送总务厅审查,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于同月二十日由溥仪公布。增产计划一九四三年规定产棉三十万担(以前二十万担),一九四四年产棉四十五万担,一九四五年产棉六十万担。增产目的供军用。这项增产的计划兴农部责成棉花会社承办。东北产棉的区域,只有奉天省辽阳、海城、盖平,锦州省兴城、绥中、黑山、盘山、台安、义县、北镇十余县。会社为强制农民种棉,派出社员四百多人分住乡村担当监督指导种棉的工作,农民对于社员需要杀猪供应,担负了很大的费用。到了秋成的时候,棉农完不成责任量,受会社的逼迫,甚至有把自己被褥里的棉花拿出缴纳。收买棉价每斤由三角到五角,比时价差十倍以上,农民因为棉价低,所得的代价不够买吃粮。这都是我于同年十一月到义县视察制棉工厂,听关县长(名忘记)向我说的。增产的计划是由我执行,人民遭受的损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二〔一〕月兴农部订开辟稻田法令案〔战时农产物增产方针要纲〕(是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教作的),法案由兴农部农政司技正牧野根据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所定开辟稻田计划制订,由部送总务厅审查,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于同月二十二日由溥仪公布。法令案的内容是在吉林省郭尔罗斯前旗,四平

省双辽、梨树两县，滨江省松花江沿岸开辟稻田，面积约三十万垧，资金两亿元，日满分担，工程定为三年完成，产出大米每年约计一千万担(日本担)，专输供日本(这是日寇进行侵略战争人的伤亡过重影响农村生产，想用东北的人力地力为它造水田充实军用)。开辟稻田的工作是由兴农部责成开拓总局承办。法令公布后开拓总局即根据计划在郭前旗收买土地十八万垧，双辽、梨树两县收买土地六万垧，滨江省松花江沿岸收买土地六万垧。地价荒地每垧两元，熟地每垧三十元到六十元(比时价差三分之二)，于同年五月由吉林、四平两省动员劳工十一万人，开始在郭前旗、双辽、梨树两县着手修筑水库和沟渠工程。关于收买土地和征发劳工均由兴农部令吉林、四平、滨江省协助执行。一九四四年五月郭前旗水库和沟渠的工程完成一部，举行插秧式典，我参加，同去的国务总理张景惠、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开拓总局长五十子等四十余名。在工地参加式典有村长四十多人，工人代表二百多人。我向他们说：政府为供给“亲邦”大米才在这个地方开辟稻田，这项工程是艰巨的，是紧急的，诸位能够协力政府完成了工程一大部，这是值得感谢，今后希望更进一步的努力，把全部工程在三年内提前完成。这是我昧着良心向人民讲的话。在宴会时听村长说：郭前旗从去年修水库和沟渠占用的乡村，已经撵走了五千多户住民，我们的土地都是被收买，开拓总局尚让我们种，每年每垧要五斗到八斗的地租，将来水田造成日本人来到，我们也都得被撵走。开拓总局共买土地三十余万垧，每垧若按七斗租粮计算(每斗四十二斤)，每年人民就得拿出租粮八千八百二十万斤。这都是我执行敌人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三月，兴农部召开各省实业开拓厅长会议，出席的奉天省实业厅长张铭义、滨江开拓厅长王式文、龙江省实业厅长陈

万凯、吉林省开拓厅长邱任元和其他各省实业开拓厅长，部内有关系的各司长科长五十余人。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农业增产问题、畜业增产问题、开拓民辅导问题、增产补助费使用问题等等。会议由次长稻垣征夫主席，开始由我致辞说：今年政府宣布的收买粮谷和一切军用物资比较上年均有大量的增加，现在皇军进行大东亚战争，支援物资是我们官民应负的责任，希望各位要本着这次会议的结果，督励人民尽力从事生产，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敌人讲求增产并不是为东北人民谋利益，而是要用东北人民的力量为他们生产，为他们充实军用，我让各厅长去督励人民生产，就是促使他们去奴役剥削人民，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三年五月到吉林省怀德县东辽河北岸参加建国神庙祭田插秧的式典，这项祭田是由一九四二年春由兴农部直接主办的，面积三千垧，生产的大米专为祭祀建国神庙天照大神之用。同去的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农政司长吕作新、粮政司长田中信一、参事官山名光治、和各司科长等二十余人，并有耕种稻田的日本开拓民百余名。举行式典时，我也光着脚在水田内插秧十余株，完成式典后，并作简单的会食。这是我信仰天照大神，推行敌人用神道迷惑东北人民的政策，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九月下旬参加天照大神尝新祭，这是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主办的，地址在宫内祭祀府的礼堂。举行式典时由我奉献新谷(大米)，并念祭词。说什么今年满洲各地五谷丰收，皆是天照大神的保佑，特献新谷答谢神庥等等荒唐无稽的话。粮谷丰收是出于农民的力量，我竟说成是天照大神保佑，这是我帮助敌人欺骗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一月兴农部同经济部定兴农金库法案。法案是由文书科长小泉会同经济部金融司共同制定的，由部交总务厅审查，

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于二月上旬由溥仪公布。法令案内容规定兴农金库的资本一亿元，由中央银行出资，业务专办农村存放款，监督的机关〈是〉兴农部、经济部。法令公布后以中央银行理事笠井任理事长，邱任元任副理事长(他是原任吉林省开拓厅长)。兴农金库表面说成是调剂农村金融，实际是榨取人民。政府规定农民储蓄每年两亿元，由它委托兴农合作社由农民出卖粮谷和农产物时代扣，规定年息三厘，其实农民未得着。它把收进来的存款，在春耕的时候以月息六厘到七厘的高利贷给农民。一九四四春到一九四五年夏，一年中共贷给农民的借款四亿多元，就榨取了两千多万元的利润。这是我执行敌人掠夺政策，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二月底赴日本报告供出粮谷数目，这是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找我到总务厅告诉我的，说是关东军授意，详情让我问次长。我回到部里找次长稻垣征夫，他说：大臣辛苦一趟吧，事情是因为政府今年预定拨给日本的粮谷三百六十万吨，陆军省因为不够，又想增加五十万吨，现在筹划出来三十万吨，业经关东军向日本陆军省接洽好，大臣去向东条国务总理一报告就行，一切事都由粮政司长田中信一准备好，他随大臣去，另外并带事务官一人，属官一人和秘书官尚希文。我到东京住帝国旅馆，第二天三月一日同粮政司长田中信一，秘书官尚希文到总理官邸见着东条英机，并有书记长官星野直树在坐。我把伪满对日供出的粮谷数目向他说明后，他拿出手账把总数记入，即说很好，随后说我有事午间再谈吧，并让我明天进宫去见裕仁。午间在官邸招待我们同去的五个人，陪席的有内阁书记长官星野直树和各省大臣。席间东条向我说：日本人民现在均节衣缩食，协力大东亚战争，满洲农民拿出这些粮谷支援日本，生活不免有困难，这是无可如何，大家应当忍耐

过这个时期就好了。我当时即附合他的心意，硬说：东北农民生活尚能维持，他们都认识援助皇军进行大东亚战争是满洲人民应尽的责任，我敢保证本年供出的粮谷数目，定能足数交纳，请阁下放心。我说出这样违反人民的话，就是表示甘心作敌人的忠实的奴仆。宴会完了并在官邸院内同东条和出席的各首脑共同照像。午后宫内翻译官林出到旅馆向我说明见裕仁的仪式，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同伪驻日大使王允卿进宫见裕仁，由林出作翻译，向他报告了对日供出粮谷数目，他点点头说：你是坐飞机来的很安全吧，你可在东京多住几天。我回到旅馆，田中信一即交给我广播稿子，让我明天十点钟到东京放送局向日本全国广播，我看译成中文的稿，主要也是说明满洲对日输出各种粮谷数目，并由我保证在本年内均能照数运交日本。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日本人民现在物资缺乏，均盼望由满洲来粮愈多愈好，大臣向他们广播，他们就安心了。到放送局广播时由我先唸的中文，后由秘书官尚希文念的日文。第四天即离东京到福冈，因等候飞机又住了三天才返回长春。这时候日本实行严格物资统制，人民生活亦感不安，表示出厌战情绪。关东军让我去报告去广播，就是利用伪满的汉奸来安慰本国的人民，我执行军阀的命令，不独违反东北人民，同时亦欺骗了日本人民，我应负责任。

〔中略〕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赴安东营口视察制造木船，这项木船是由兴农部委托安东制材会社承办(关东军派员监视)，木船的用途是向日本输送粮谷(这是日寇轮船被炸想用木船代替)。原定计划共造两千只，每只载重量二百吨到四百吨，到“八一五”共造成二百多只。安东造船厂使用造船的工人有一千多人，是由奉天、安东两省征发。这时候日本运输力已到山穷水尽，在大连、朝鲜口岸堆积

粮谷很多,就是运不出去。我去督催工人为他们造木船,就是帮助敌人强夺东北人民的物资,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我在兴农部伪大臣任内,每年收买粮谷数目:一九四二年七百二十万吨,一九四三年原定七百五十万吨,实收七百八十万吨(有报恩出荷三十万吨),一九四四年八百五十万吨,一九四五年责任量九百二十万吨,"八一五"日寇降服未收买。

每年输出粮谷数目:一九四二年输出日本二百六十万吨,输出朝鲜三十五万吨,输出关东州七万吨,输出华北汪政权三十万吨。一九四三年输出日本三百二十万吨,输出朝鲜三十五万吨,输出关东州七万吨,输出华北汪政权四十万吨。一九四四年输出日本三百九十万吨,输出朝鲜三十万吨,输出关东州七万吨,输出华北汪政权四十万吨。上项输出的粮谷均由农产公社承办。输出朝鲜的粮谷,是由日本直接换大米。输出关东州的粮谷,是由农产公社换回芝麻花生榨油供给日本。输出汪政权的粮谷是由政府换回棉花、棉布、煤。棉花、棉布一部拨交关东军,一部留伪满自用,煤全数运日本。

每年国内配给粮谷数目:一九四二年劳工配给量轻劳动每人每月二十公斤,重劳动二十五公斤,一般市民十七公斤。一九四三年劳工配给量轻劳动每人每月减为十八公斤,重劳动二十五公斤,一般市民减为十五公斤。一九四四年劳工配给量轻劳动每人每月十八公斤,重劳动二十五公斤,一般市民减为十二公斤,并掺一成橡子面。三江省、东满总省有时仅配给九公斤。一九四五年各项配给没有变动,继续到"八一五"。

每年收买军用出产物资数目:一九四二年皮革牛羊皮狗皮七千吨,猪皮五十万张,兔皮一百万张,各种毛类二万五千吨,油类三

万吨，动物油五百吨。一九四三年皮革牛羊皮狗皮七千五百吨，猪皮五十二万张，兔皮一百二十万张，各种毛类两万七千吨，油类三万二千吨，动物油五百二十吨。一九四四年皮革牛羊皮狗皮八千吨，猪皮五十二万张，兔皮一百五十万张，各种毛类三万吨，油类三万五千吨，动物油五百二十吨。一九四五年皮革牛羊皮狗皮九千吨，猪皮五十五万张，兔皮一百八十万张，各种毛类三万二千吨，油类三万八千吨，动物油五百五十吨。“八一五”日寇降服，实收不到半数。上项畜产物资的收买配给是由畜产会社承办，每年除猪皮兔皮留出一部配给伪满军，油类留出一万吨归伪满自用，其余尽数拨给关东军。

兴农部每年收买粮谷和军用畜产物资数目以及对外输出和国内配给数量，均系根据政府物动计划实行(物动计划是由总务厅企划局长官掌管，由关东军和总务长官，企划局长、各部次长共同参加制订。中国人不能参加)。数字虽不是由我规定，但对每年粮谷出荷责任量和收买军用畜产物资数目以及粮谷配给量，均由我在省长会议上发表，并由我督饬各省去执行。农民生产的粮谷和畜产物，因为政府每年规定的责任量逐年增加，在警察搜逼下尽数拿出来，自己吃草根树皮，多数遭受死亡。都市人民因粮谷配给量每年削减，最后且掺加橡子面，每天受饥饿，有力的变产买食粮，被警察看见就是经济犯，受惩罚。无力的有饿死的，有流浪街头被警察抓去做劳工，也是走进死路。这都是我执行敌人掠夺政策，把人民血汗换得的果实抢来交给敌人去打祖国人民造成的恶果，我应负重大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我在兴农部伪大臣任内，对砍伐森林每年征发劳工和马匹数目：一九四二年劳工二十二万人，马六万匹。一九四三年劳工二十六万人，马七万匹。一九

四四年劳工三十万人，马八万匹。一九四五年夏季采伐征发劳工六万人。这些劳工受砍伐业者虐待，死亡率在百分之五以上。我有一个亲戚吕正琨住沈阳市效〔郊〕外杨官屯，一九四四年冬被警察抓去在阿尔山林场作劳工，不到三个月吐血死亡。他的同屯有被征发在阿尔山林场作劳工的人(名忘记)回来说，阿尔山林场作工的有三千人，他在阿尔山林场工作不到一年，看见山坡上新坟堆就有一百五、六十个。这是我执行敌人奴役政策给人民带来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兴农部任伪大臣时，每年二月底赴各地去慰问日满军警，这是国务院总务厅主办。一九四三年我担任的地区是牡丹江省东宁和三江省，同去的有总务厅会计科长广濑、主计处事务官一人、属官一人和秘书官尚希文。带去的慰问品有伪币(由日人经管数不详)和日本酒。〔中略〕一九四四年担当的地区滨江省、黑河省，一九四五年担当的地区奉天、锦州、热河三个省。日本军在东北都是屠杀中国人民的魔手，伪满军警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我去慰问，也是为敌人服务助长他们去迫害人民，我应负责任。〔下略〕

119—2—1155，1，5

黄富俊补充笔供

（1954年7月1日）

〔上略〕

二、补充向人民认罪

一九四四年五月，兴农部制定满洲农地开发公社法。这项法案是由农政司制定，由部送总务厅审核，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于同月底经溥仪公布。法案内容是把伪满从前的土地开发会社扩大改变成公社，目的就是为扩充稻田耕作面积为日寇生产军用大米。自公社成立，即由总务厅策划，把开拓总局在郭尔罗斯前旗和东辽河等地营造的稻田区域连同日满两亿元的出资，拨交公社经营，同时并计划由三江省的富锦、东安省的密山、宝清等县，抢夺东北人民的撩荒地作为开辟稻田。我提出并通过这种法令，就是帮助敌人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五月，兴农部颁布农地利用促进规程。这项规程是由农政司制订。内容主要是督励农民开垦荒地，凡会社团体以及农村现有的播种土地以后不准再有撩荒，已撩荒之土地应由市县督促业主开垦，并由政府给予补助金和物资的帮助，如果自己不能开垦，市县得将这项土地酌交旁人开垦，目的就为求增产。但是这种增产并不是为农民谋利益，相反的而是榨取农民的劳力，为满足敌人的需要。一九四四年春，我为督励增产，曾到三江、北安两省去考察准备春耕状况，听到市县长对准备开垦荒地补助资金和

其他需用的物资计划的报告后，我也勉励他们要督促农民尽力完成国家付与的增产任务。实际说来，撩荒地在政府逼迫下倒是开垦了一部分，可是因为人力畜力不足，不能按时铲蹚，秋后打下来的粮食将将够出荷，农民辛苦了一年自己毫无所得。这就是我颁布这项规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六月兴农部制订家畜出产物统制法。这项法令是由畜产司订立，由部交总务厅审核，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于同月底经溥仪公布。内容是扩大畜产统制法的范围，把各种家畜如鸡、鸭、鹅的肉类、毛类、蛋类均加入统制，同时并把畜产会社改为畜产公社。农畜生产为农民主要的副业，在经济上占很大的比重，自此严格统制后，农民一切畜产物均被会社用廉价抢夺去充军用，甚至一只鸡和几个鸡蛋人民要互相买卖被警察看见都是经济犯，须受严重的惩罚。这是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八月兴农部制订农产物管理法。这项法案是由粮政司订立，由部送总务厅审核，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经溥仪公布。内容是把粮谷统制法的范围愈加扩大，同时并把粮谷会社改为农产公社，目的就是加强统制。在已往粮谷统制时期，仅限于都市禁止买卖，乡村中农民需用的粮食有无之间尚可自由流通，自农产管理法实行后，即对农民自用的粮谷，非经兴农部大臣许可，也一律禁止买卖，违者即是经济犯，要受警察严重的惩罚，这就杜绝乡村一部分的农民生活的通路。敌人施行这样的严格统制，就是为尽力抢夺东北的农产物支持大东亚最后的侵略。一九四四年规定的粮谷出荷责任量八百五十万吨，比较上年增加七十万吨，这项增加量就是为供给日寇，为要达成这一目的，才用增产的办法，加强统制的办法，来达成他们的需要量。一九四四年十

月，根据这种法令开始收买粮谷，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结束，虽完成了八百五十万吨庞大的数字，但在农民方面因受逼迫拿出吃粮，遭到生活上的痛苦比上年更为严重。这是我执行敌人掠夺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五月兴农部训令各省责成各高小学校学生实施狗毛、牛马毛供出运动，同时文教部亦有同样的训令。训令规定学生每人要供出各种毛类半斤，由协和会担当收集督催任务，所得价格作为献纳飞机。各种畜毛已在统制范围，畜产会社早已着手收买，现在进行这种运动就是强制摊派，加重人民负担，充分表示敌人在东北搜刮军需物资千方百计无微不至。我执行敌人掠夺政策，危害人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八月兴农部训令各省责成各级学校学生供出军需兔皮百万张，同时文教部亦有同样的训令。这种政令由协和会担当推行，所得价款作为献纳飞机。在同年初冬的时候，各地方协和会即动员青少年团学生赴野外实行打兔子的工作。我家的学生黄魁元在长春工业大学，就有三四个星期赴野外去打兔子，据他说协和会有规定，如果打不着兔子，将来即须用钱买兔子交纳。这是我执行敌人搜集军需政策，使青年学生荒废了学业，增加人民的负担，我应负责任。

119—2—1155，1，6

于镜涛笔供

（1954年8月30日）

于镜涛，年五十七岁，原籍吉林省长春县。

一 详细履历：

一九二〇年春哈尔滨吉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同年春在哈尔滨临时警察局充见习巡官。同年秋充哈尔滨顾乡屯街警察所分所长。

一九二一年一月充中东铁路哈尔滨车站路警第一段副段长。

一九二二年二月充中东铁路路警第四段段长(驻一面坡)。

一九二三年五月充中东铁路路警第六段段长(驻长春宽城子)。

一九二五年九月充中东铁路路警处副处长。

一九二六年三月兼东省特别区警官高等学校教务长。

一九三一年十月兼东省特别区伪警备总队长。

一九三三年春东省特别区伪警备队改编为伪满游动警察队仍兼队长。

一九三五年春游动警察队解散，中东铁路路警处副处长解职。同年十一月当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当伪满首都警察总监。

一九四〇年五月当伪滨江省长兼协和会省本部长、兴农合作社会长、满洲赤十字社支部长、满洲军人后援会支部长。

一九四三年五月当伪奉天省长兼协和会省本部长、兴农合作社会长、满洲赤十字社支部长、满洲军人后援会支部长。

一九四五年三月当伪满勤劳部大臣兼勤劳奉公队总司令。同年八月光复以后当长春市长，八月三十日被俘。

二　罪恶事实：

1.我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和在伪警备队总队长职务内罪恶事实：

(1)九·一八当时，张景惠得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许可回到哈尔滨，用行政长官名义召集各机关的首脑和地方法团及士绅会议，我也参加这个会议。当时议决成立哈尔滨特别区治安维持会，推张当会长，会内事务由行政长官公署人员兼办。在十月末，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要求张表明态度。张又召集各机关的首脑会议，张主张与日本合作，脱离南京政府，我和大伙都同意，张就给南京政府去电脱离关系。他又为镇压人民和保护他自己与日侨的安全，向日方要求了武器，成立了三千余名的警备队，我就当了这个总队长，来实行镇压人民，走上了叛祖国反人民的道路。

(2)伪哈尔滨警备队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成立的。因为我兼东省特别区高等警官学校教务长，就由学校的教职员和学员警察编成警备队的干部和下级干部，警备队的兵就由当地招募。警备队的组织最高是总队部，以下设四个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手枪队。第一大队长王家瑞，第二大队长王丕承，第三大队长叶国超，第四大队长宁福绥，骑兵大队长徐琦，手枪队长金广江(内有迫击炮一个连，有四门迫击炮)。以后第三大队长换孙广仁，第四大队长换张世庭。于一九三四年春改编为游动警察队，仅留三百余名，我仍兼队长，调驻东宁县，担任国境封锁任务，监视中苏两国国

境人民的行动，禁止互相往来。在改编后，伪民政部派我到日本视察，所到的地方是东京、大阪、神户、横须贺、日光等处，并参加了日本天长节观兵式。我看到日本的强大，军威壮盛，甘心作他的忠实走狗。一九三五年春游动警察队解散，我也去职。

(3)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警备队总队部的秘书周维斌，大队长叶国超、宁福绥，中队长关禄和其他多人要起义抗日，我以时机未到静待机会来涣散他们的抗日热情，并调动他们的位置，来保全我这总队长地位。

(4)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张景惠乘马占山抗战不利，抢夺黑龙江地盘，发生了意见。由我从中疏通，保证张得黑龙江后，对于各机关原来人员一概不动，保存他的实力，马才肯退到海伦。我即派警备队第二大队长王丕承，率领部队先往占领该地，以后我随张景惠前往齐齐哈尔成立伪省政权，张兼省长，由英顺代理，住了一宿即回哈尔滨。

(5)一九三二年一月，马占山与张景惠在松浦镇呼海铁路局内会面，由我担任他们中间的联络，张以黑龙江省长职位和保全他的实力为条件，引诱马占山与日本合作，并进一步地与奉天臧式毅、吉林熙洽在奉天会议解决东北问题，出卖祖国。

(6)一九三三年春，我派第三大队长孙广仁率领部队到宾县帮助日寇中村旅团打赵尚志抗日军，事后在宾县南门里烧毁民房十余所，杀死人民二三十名。抗日军退走，孙广仁的警备大队就留在宾县，镇压人民。

2.我在伪哈尔滨警察厅长职务内罪恶事实：

(1)一九三六年春，由于哈尔滨伪警察厅所属各伪警察署，日本人指导官的职责没有明确的规定，互相争权，警务科长薄井就立案将各伪警察署指导官都改为各系主任，并将日本人警尉改为外

勤监督，呈请伪警务司批准后，我就推行这个机构改革，加强日本人的权威，把伪警察署的警务系、特务系、刑事系等重要职务，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外勤监督也有了直接指挥伪警对人民的残害权力。在这改编以后，日本人就任意摧残人民了。

(2)一九三六年，哈尔滨市发生了口琴社、电业局和中东铁路电务段的大检举。这种思想案的发生是震动一时的安东教育大惨案的余波。在安东惨案发生后，各地伪警都受到密令，对于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严密的监视。在哈尔滨市首先是口琴社引起伪警的注意，道里警察署发现口琴社时常有很多的青年，其中有机关职员、道里高中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伪军教导队的翻译以及电车卖票员等在此集会，学习音乐。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会，道里警察署认为有思想问题，逮捕了二十余人。在严刑拷讯下，由电车卖票员就牵联到电业局，逮捕技工职员达一百余人之多。由于电业局与中东铁路电务段有相当的联系，或系同学，或系朋友，遂牵连到电务段。又由电务段牵连三十六棚的铁路工厂职工，两处逮捕的有七八十人。逮捕三十六棚铁路工厂的职工，就牵连到该工厂的副厂长胡则寅。到年末此案结束时，听说口琴社有二十余人，电业局和铁路职工有五十余人送到哈尔滨检察厅法办。这是我帮助日寇镇压人民，给这些人带来这样的灾害。

(3)一九三六年春，我命刑事科长荒井计划立案，成立一个防犯协会，使大商号等有钱的人当委员出经费，把所有的地痞流氓都当会员，只要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就报告伪警去抓。据荒井对我说，这个会起的作用很大，在两年过程中，被检举送交哈尔滨检察厅的约有一百人之多；在两年中由荒井保举的有功会员给了三次奖状，鼓励他们加强危害人民。

(4)一九三六年，我令部下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赵一曼两次捕

获。头一次在南岗电车站被南岗警察署捕获，加以严刑讯问，因受伤甚重，送到市立医院疗治，赵得看守的伪警和护士的同情，一同逃到阿城县境，被汽车夫泄漏消息，南岗伪警察署又派伪警跟踪捕获，送交哈尔滨检察厅处理。

(5)在每年新旧年最后一日的晚间，令各伪警察署出动大搜查，检查贫困人民居住区，抓捕职业不明的或认为思想不良的人。两年有三百多人，经刑事科讯问后，除一部分释放外，送交检察厅的每年都有四十人左右。

(6)每年年终都有表彰会，对于伪警方面最残害人民的人都给以奖励，鼓励他们加强残害人民。开表彰会时，把各伪警察署署长汇报的最凶恶的和所谓成绩优良的人，按其残害程度分别给予精勤状和奖金奖状，说他们能克尽厥职，成绩优良，应予褒奖。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奖金最多是三十元。每次也有几人得奖金者，有特殊功劳者，报伪警务司存记，遇机提升。在定期叙勋时，我把成绩优良的，也就是残害人民最凶狠的报伪警务司转请伪中央给予勋记章。在一九三六年荒井等得到大典记念章和访日纪念章，当伪警务司发下时，我召集受领者亲自授予，荒井等也都得过奖状。

3.我当伪满首都警察总监职务内罪恶事实：

(1)一九三八年秋，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的孙警尉，在天宝、鸿兴等金店搜集情报，在柜伙中说出私运黄金的事情，就报告特务科长安井，又由伪副总监田村仙定报告伪总务厅，十月十日伪总务厅就命首都警察厅设检举黄金联络部，发动全伪满的黄金大检举。在当日早七时成立了联络部，我任部长，副总监田村仙定任副部长，执行伪总务厅命令，传达伪满各地一齐开始检举，并在火车上由警护队同时搜查旅客。在长春市由特务科长安井主持此事，由早七时开始到九时结束，没收长春市各金店的黄金五千余两，送交

伪总务厅，同时将传达开始和结束时间报告伪总务厅，就将联络部结束。至于各地搜查情况由各地直接报告。被检举的天宝金店等十余家的经理和柜伙二三十人送交检察厅办理。听说仅天宝金店一家就被罚三十万元，经理被判处徒刑二年。长春市金店和首饰店完全关闭，造成失业人数有五六百人之多。全东北这种营业都被一网打尽，更造成严重失业现象。

(2)一九三九年春，我得到电会社的通知，说是牡丹公园的电话线被人切断。当时就令各署严密搜查，由卖破烂的小摊上得到线索，说他的破电线是由穷小孩手中买的。于是各伪警署就将界内贫苦小孩二百余名一齐逮捕，经各署严刑拷讯，因无证据，陆续释放。但因刑讯的结果，听说二道河子地方的小孩有因伤致死的，或手脚残废的。

(3)溥仪每次出门，都在前几天就命各伪警署大肆搜查，每次检举的由几十人到百人左右，经特务科严刑讯问后，除一部分保释外，有四十余人以思想不良送交检察厅处理。

(4)在每年年末，长春全市也有同样大搜查，三年内共有三百余人被捕，除不起诉的外，有四十多人送检察厅。

(5)在每年年末也有表彰会，表彰那些穷凶极恶的害民贼，给以褒奖。对黄金案的大检举，特别举行了表彰式，由伪警务司发给奖章，得到奖章的有特务科长安井和其科附警正(日本人，名已忘)、司法科长中岛等，其余参加者都给精勤状，约有数十人。以外得奖金者有七八人，奖金最多为一百元。孙警尉是此案特殊功劳者，进级警佐。

4.我当伪满滨江省长职务内罪恶事实：

(1)一九四〇年十月，以防水害为名，发行了滨江省防水公债二千万元。我担任对于中国人的一千五百万元的募集，对日、鲜、

俄方面的五百万元，由伪次长源田松三负责。成立了募债委员会，由地方劣绅和资本家傅润成、王丹石等充当委员长和委员。债款数目分配办法：在各县按土地分摊五百万元，每垧地就摊两三元之多。在哈尔滨市担负的一千万元，由商民按产业等级分别担负，致使小商业倒闭和农民破产的很多。我不但完成了这个任务，由于我的努力还超过了五百万元。为这个超数使之合法，在一九四〇年又请求伪国务院公布了滨江省地方第二次防水公债五百万元的募集，完结此案。这样的巨额款项都加在全省人民的肩上，名义上是为人民防治水灾，实际上不但要人民出钱，还要强占人民土地，强征人民劳役，改造水田，为日本开拓团建设基础。为办理此事，在一九四一年春于哈尔滨市成立伪滨江省治水开发局，局长系日本人（名已忘），局内设技术、土木、河川三科，科下设调查、制图、施工、车辆等股，共有八九十人。经技术人员勘测了在省境内的松花江流域，决定在肇源县境内修筑数十里江堤，于一九四一年秋开始动工，预计改造水田三四百垧，动员了人工数千名。由于材料的不足，到一九四三年夏我离开滨江省时尚未完工。在木兰、巴彦两县，于一九四一年同时各发动了二千余名人工修筑江堤，由于江水泛滥，到一九四二年又补修多处。在木兰改造水田约六七百垧，巴彦有四百余垧，并且将来还可延长和展宽。在五常县凌河岸的水田改造，是五常县伪副县长角张繁计划的，面积约有二三百垧。在一九四二年秋，角张繁为了把这些水田取直和展宽，又强占人民土地七十多垧，使二十余户农民失去了全家生活所依靠的土地。这些失地的农民曾举代表五、六人到哈尔滨伪省署请愿，我亲见这些代表，答应他们叫县长和副县长合理处理，并且我当时找来卢县长和角张繁说明此事，他们也答应了不让人民吃亏。以后我听说仍然是强制没收，供给朝鲜人占用。在修堤改造水田的地方，都是强

征人工,强占人民土地。这几县人民不但担负了公债的重担,还失去了土地和增加了苦重的劳役。这个二千五百万元公债,除伪滨江省留用五百万元,其余都送交伪总务厅作军费用。留下的五百万元也没有做有利人民利益的事,只供日寇分肥而已,而外县人民连这个债券也没有得到。这都是我帮助日寇压榨人民财富和推行开拓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害。

(2)一九四〇年秋,由于我推行收买土地、粮谷出荷、劳工供出,给人民造成莫大痛苦。当日本人强占肇源县沿江渔户的财产时,我又藉执行治安维持法的法令,帮助日本人把渔户办罪,引起了该县广大人民的仇恨。在抗日领袖徐泽民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运动,救了渔民,于是触怒了伪满的首恶武部六藏,他以治安肃正为名,派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办理这个事件,在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和伪高等法院,抽调伪检察官、伪审判官多人,指挥伪滨江省警务厅长秋吉抽调伪警一百余名,内由哈尔滨伪警察厅抽调二十人,其余是由各县抽调,一同到肇源现地组成临时法厅多所,大肆搜捕无辜人民,并扩大到肇州、肇东两县。肇州法庭设在一个大车店内,肇东设在天丰东油房和昌武街道德会旁一个大商号内。在肇源被投在江里淹死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肇州被害的有三四十人,肇东有四、五十人。对于被捕的人严刑拷问,就地执行死刑,处置以后报告伪最高检察厅、伪最高法院和伪司法部。三肇人民被牵连者有数百名之多。徐泽民被捕,就由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讯问后,由伪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就在哈尔滨执行。判处徒刑的,都在哈尔滨监狱执行。

(3)一九四三年春,伪滨江省的人民在开拓、粮谷、劳工等政策的重压下,已到水尽山穷的地步,食穿俱无,春天依靠树叶为生,冬天妇女小孩坐在草囤里不能出门。而我执行日寇政策仍然毫不放

松，并且还怕人民反抗，帮着发动“巴木东”事件。这是继“三肇”事件之后，以治安肃正为名，有计划的血腥镇压人民。在伪次长中岛的领导下，伪警务厅长富田主持此事。在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三县被检举的爱国人士有校长、学生、街村屯长和伪官吏，如巴彦县兴隆镇伪警察署长蔡某等，以后逐渐扩大到伪龙江省的绥化、铁骊两县。先后罗织到六百余人之多，送交检察厅起诉的有四百来人。

(4)伪滨江省粮谷出荷数量，在一九四一年是二百三四十万垧土地出荷九十万吨，以后又增加了十二万吨，逐年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万吨。我为完成任务督率部下到各县强迫出荷，把农民食粮籽种都逼尽了，还令村中农民互相帮助，土地好的产粮多的帮助贫困户交粮。一九四二年秋在阿城县就是这么办的。双城县长王季璋对于出荷粮交纳不出的农户，亲自用木棒毒打，我还奖励他，逼得农民无法生活。在延寿、东兴、木兰、三肇各县的人民，在春季都是依靠树皮、树叶、青草等生活。我为完成任务，每年都是这样办的。在每年伪省长会议完了，武部六藏还给各伪省长出荷酬劳金三两千元不等。

(5)伪滨江省的劳工供出，每年各县供出人数是五万余人，派在鹤岗、密山炭矿挖煤，和在北安、孙吴、爱珲一带为日本军修军用道路。说是半年一换，实际上调换是不可能的，新的虽然派去，旧的也不能换回。待遇极为苛刻，作工时间总在十二小时以上，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给治，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亲自看到在孙吴的逊河作工的郭后旗的劳工，死亡就在三分之一以上，并且还有患重病的和继续不断死亡的。我虽然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惨状，还是继续进行供出劳工。

(6)一九四二年春，我从双城、宾县抽调不合伪国兵检查标准

的，满十九岁的青年共四千余名，交给伪协和会事务长半田敏治组成勤劳奉公队，完成哈长复线的修建工程。由于这一做法的成功，以后伪满中央就设立勤劳奉公局，办理全东北的不合伪国兵的青年担负勤劳奉公的任务。随后又颁布勤劳奉公法，使东北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充当劳工，都是由我造成的。

5.我当伪奉天省长职务内罪恶事实：

(1)奉天省粮谷出荷数量是六十万吨，除交伪中央三十万吨外，其余三十万吨作奉天省工人食粮，以后又追加七八万吨。奉天土地瘠薄，又加辽河、浑河年年为害，农民负担比较更重。一九四三年秋，在辽中、兴京的农民有因交不出出荷粮谷弃家逃走的。我为完成任务，督率部下，强逼农民出荷。

(2)我在伪奉天省长职务内一个主要的任务，是支持日寇军需物资生产。奉天省和奉天市是日寇最重要的军需物资和军需生产区，要完成日寇的军需，就得削减奉天人民的民需生产。奉天省除供应日寇粮食、肉类、蔬菜等外，还有橡胶制品，如军用胶鞋、雨衣等，和降落伞、毛织品和布疋，军用船艇。日本九一八部队是制造枪炮子弹、军用服装和毛革制品的，满洲飞机株式会社生产飞机。这些都是规模极大的工厂，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极大，省方、市方都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工厂总是一天天扩大，人力物力的需要也不断增加，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得强征工人和削减市民的配给，致使市民领不到规定的配给数量，使市民生活更加困难。至于县街的配给就更没有保障。由于煤炭大都供给工厂，人民的燃料更加缺乏。人民为了生活，不得不从黑市上高价购买粮食和燃料，无力购买的就得忍饥挨饿。

(3)奉天省的劳工供出每年是四万人，勤劳奉公队是三万人。分配在抚顺、阜新、鞍山、大连造船所、营口造船所、辽河和奉天市

铁西各工厂等处作工。待遇极为苛刻，由于饥寒过劳疾病死亡率在三分之一以上。这是我在一九四四年春曾到大连造船所、营口造船所及营口改造水田和铁西工厂等处视察的时候所见到的劳工状况。而我每年还是强迫各市县供出来完成我的任务。在伪省长会议时我还建议实行剥削劳工的把头制。

(4)我由伪省长兼伪协和会省本部长，曾参加过伪省协和会的省联合协议会，当过议长，帮助推行伪中央政府的害民政策，如宣传国兵法、国防献金、金属献纳以及各种摊派等。

6.我当伪满勤劳部大臣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1)伪满勤劳部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成立的，这是日寇强化劳工政策，要把东北人民完全劳工化，以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效。因为我曾使用不合伪国兵标准的青年充当勤劳奉公队员，收到相当的成效，所以就叫我当这个勤劳部首任大臣。勤劳部是由官房和劳务、整备两司组成。官房分文书、会计两科和参事官室。劳务司分劳务、计划、矿山和工厂四科。整备司则由管理、训练、备品、卫生四科所组成。省和县都有劳务科，科设动员、勤奉两股。

勤劳奉公队的组织有总司令部，设在伪勤劳部内，我兼伪总司令。伪副司令二人，一由伪勤劳部次长兼任，一系专任，是安某。以下有统务一人，由日本人木副充当。再下有处，分总务、卫生两处。总务处长为曹肇元，处以下有动员等科。卫生处尚未成立。伪勤劳部和伪勤劳奉公队总司令部两部共有职员二百余人。省、市、县长兼省司令、市司令和县司令，省次长、副市长和副县长兼各该队副司令。各厂矿勤劳奉公队由厂长、矿长和劳务科长兼队长、分队长或队附。这是伪勤劳部的系统。

(2)一九四五年三月曾修改过一九四二年所公布的“国民手账法”，修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奴役人民的权限，特别对违反此

法令的人，由六个月徒刑改为一年，罚金由五百元改为一千元。又为达到压榨人民的目的，还用部令公布制定了“国民手账施行规则”、“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国民勤劳奉公队协力规则”等法规。这些法规都是我任伪满勤劳部大臣兼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期间制定的。

(3)一九四五年三月为训练勤劳奉公队的干部，还颁布过专为训练技术和管理劳工的干部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在大屯设立勤奉队训练所，训练在职的干部和养成大批新的干部，预定在三年内训练勤劳奉公队员一百万人。凡在职的劳务管理和技术管理的干部分批入所训练，还拟抽调各地勤劳奉公队优秀队员，经过训练充当新的干部。但这个训练所正在修建中，尚未开始训练。

(4)我到伪勤劳部后，就确定劳工供出人数比一九四四年预定数增加七万人，第一期已有两万人出动。正在各矿山、工厂、修路、开发水田等处劳动的勤劳奉公队队员约有二十万左右，都是不合伪国兵条件的青年。本年度预定全伪满劳工供出约一百八十万人，第一批供出劳工十余万人已经陆续出动，在现地工作的约有一百万人左右。

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我曾到密山炭矿视察工人采煤状况，六月间又到鹤岗炭矿视察。在炭矿看到劳工的惨状，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和苞米面，量还不足，衣不蔽体，赤着双足在水里工作，每天都是十几小时。据久在鹤岗炭矿工作的杜把头说，工人太苦了，日本人对工人非打即骂，或有因病动作迟缓的，日本监工的就往死里打，有病也不给治，直到工人们累死病死为止，所以死的人太多了。这种劳工的惨状，是我耳闻目睹的。

7.我在伪长春市长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张景惠离开长春往通化，当时命我当长

春伪市长，到“八一五”光复，由吕荣寰出头组织了一个东北维持会，用广播令各地方伪官吏负责维持各地方秩序。十九日张景惠回长春，吕荣寰所组织的维持会就由张景惠担任会长，吕荣寰、臧式毅、蔡运升和我为副会长。张景惠与吕荣寰用广播向重庆政府请求接收。

在吕荣寰组织东北维持会的同时，以王荆山为首的地方法团和地方士绅召开临时会议，议决推举我当长春市长。当日同王荆山向全市广播，令各安生业，并向重庆政府去电报，请求早日派人接收，长春市的善后暂时由我办理等语。

我接市长后，就把长春市各伪机关一律接收，收容伪官吏八十余人，有已经分配职务的，有的仍支原薪等候任用。把长春市伪警察厅改为公安局，派赵万斌为局长，负责维持治安。康德新闻社改为东北日报社，派原编辑于莲客〔容〕为社长。市政府派崔正儒为财务处长，曹肇元为总务处长，王某为交通处长。其余的也都拟定，尚未发表。并把原长春市所属各机关也都指定负责人。市政府一切事务由总务处长曹肇元负责办理。我接市长仅半个月就被俘了。

在当时伪市署存款约有两千余万元伪币，我就分给了伪市政府内新派的处长级的〈每〉人五六十万元，或二三十万元不等。我自己拿四百余万元，存在玉茗魁商号。并给伪警卫队团长樵铭远伪币一百万元，伪宪兵总团司令官刘尚华五万元，约他们与我合作，共同维持地方秩序。

119—2，1151，1，第6号

张焕相[1] 笔供

(1954年9月15日)

一八八〇年夏历三月二十二日生于抚顺县营盘村新屯。

一八八五年夏历正月起在家请先生教读。

一九〇六年入振武学校,一九〇八年七月毕业。

一九〇八年十月入近卫师团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

一九〇九年十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一九一一年五月优等毕业归国,同年七月派充陆军第二混成协差遣员,到差无事,归里轮班训练乡团,共五百人。

一九一二年二月族弟张榕被张作霖派人诱杀,因我有革命嫌疑,全家避往东京。同年六月赵尔巽电召回国,七月委我为东三省军事筹备处总务科二等科员,八月又改充编制科二等科员,十月派我以奉天都督府中校参谋资格代表赵尔巽参加武昌国庆典礼,同月改编为预警科长,十一月张锡銮充任东三省镇安上将军,委我充任上将军行署中校参谋,补授陆军步兵中校,兼预警课课长,并筹

① 张焕相,1880年生,辽宁抚顺县人。1911年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东三省军事筹备处科员、科长,步兵上校,少将咨议,渔业局局长,黑龙江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黑龙江国防筹备处处长,陆军第十九混成旅旅长,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长绥司令,俄侨工厂总办,东省特别区地亩局局长,滨江镇守使,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陆军中将,军令厅厅长代行东北航空正司令,河北绥靖公署上将军事委员等职。1937年1月充任伪满国务院嘱托、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企划部长、司法部大臣、参议府参议。

划蒙边防务。

一九一三年夏以预警课长资格，兼有筹划边防功，补授陆军步兵上校，仍在原职充差，派我收复本溪。

一九一四年一月中央以收复本溪功特授陆军少将，改委军事顾问。

同年夏，随张锡銮访问大连。秋，张锡銮调任两湖巡阅使，我跟从入关，张锡銮未能赴任，我到陆军部报到，总长王士珍令我稍候，即行安置，我归家筹措旅费。

一九一五年春任盛武将军行署顾问，考察吏治。同年夏委任奉天全省渔业商船保护总局局长，检查没收日人私盐及举办各事务，因功，中央授予四等嘉禾章。

一九一七年冬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署参谋长，平定江省军潮，剿抚蒙匪七千余人，阵获日寇大尉入江种矩一名，搜出满蒙计划书，因功授予二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

一九一八年春兼充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一带临时警备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满洲里，解除谢米诺夫军械，慰劳红军战士，优礼红军总司令。日寇由满洲里出兵，乘势报复，互相枪杀各三人，我总部不为所动，得免丧权辱国，中央两次传令嘉奖。兼任江省国防筹办处处长，并兼省公署参议。

一九一九年中央录满洲里警备功，特交国务院存记，储为国用，特授勋五位。

同年八月鲍贵卿令我领第十九混成旅进入吉林，任命我第十九混成旅旅长，兼充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行总司令，兼哈长司令。

一九二〇年春依据中东铁路合同大纲实行护路，遣送旧俄军。

一九二一年兼长绥司令。

一九二二年兼俄侨工厂总办，兼滨江镇守使，兼戒严司令。

一九二三年改第十九混成旅为第十八混成旅，归张作霖直辖，任我兼旅长兼地亩管理局局长。

一九二四年地亩管理事件，得到谅解。

一九二五年兼戒严总司令，停车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一九二六年张作相对张作霖密告我阴谋独立，解除我一切军职，我仅特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地亩管理局局长，兼高等警官学校校长，兼俄侨工厂总办，禁止了行使日寇金票。

一九二七年整理了市政、教育管理权，平定了教育风潮。〔中略〕

同年授一等文虎章、一等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

一九二八年冬改任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

一九二九年夏检阅锦热一带军队，兼任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

一九三〇年春改任东北航空军司令部代行政司令。

一九三一年九月会同兵工厂总办米春霖、捷克工厂代表赴北京，“九一八”事变，滞留北京，此后经历详于笔供自述罪状内。

家庭成份：地主。个人成份：官吏。

笔供自述的一切罪状

一九三一年九月八日，因为东北航空军司令部与捷克工厂代表商定了制造飞机合同，并且拟将把飞机工厂附设在兵工厂内，遂会同兵工厂总办米春霖、捷克工厂代表同车往北京见张学良，商量领款、设厂，不但得不到决议，反而每天领我往南苑参观英、美、法等国各种飞机表演技能，互相比较，“九一八”事变突发，因而滞留北京。〔中略〕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在北京的东北第一级各人员，齐集协和

医院的客室内，在张学良主持下，研求东北的对策。我说东北是我们的家，我们应当认为这个事件是地方临时发生的事件，从速由我们想法解决，不可把事件扩大，推到中央主张，演成国际问题。张学良、王树翰、王树常、陈兴亚、邢士廉等均主张不负责任，把事件推给中央方面，问题越扩大越好，这是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所坚持的对策。

张学良仍令我担任代行东北航空军令部正司令，设司令部，收容东北航空各人员。经三月之久，航空员报到者十分之九以上，职员如数到齐，买好。临动身的头一天，接到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的任命状，当时全家庆幸，我不顾全家的愿望，给何应钦去信，将委任状封还，毅然决然上船回东北。

当下船早晨，托船长发电致伪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并求他转达郑孝胥。去电内容是，全家归返故乡，安居乐业，遇有机缘，再行赴京领教。

下船时，被日寇便衣宪兵领到大连大和旅馆住，加以监视。〔中略〕

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夏历五月五日)的事。

到大连第三天，未接受日寇宪兵队长晚间约会，全家族赴沈阳。在沈阳站，被同车的便衣宪兵一名及站上宪兵等把全家族送至大东边门外兵工厂路南宪兵分队部。队长准尉阶级，将我及家族等拘留在楼上小屋内。到第三天，日寇沈阳宪兵队长增田少佐前来谈话一次。我妻次日回新屯家。当天回来，她说有一宪兵军曹(中士)跟同往返，乡里人对她极亲热，对于拘留也颇关心。第六天分队长来说，想要回家须得关东军谅解，我遂电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小矶。电文内容是：来时未行接洽，致生误会，请谅解。当晚遂有日寇便衣宪兵一名与我同往长春，次早下车，即往宪兵司令部，

待至傍晚，原同来的便衣宪兵同我到日升栈，明早送至伪满军政部，由王静修伪次长代理伪军政部总长见我，说开军法会审，我不接受，经过许久，他又说：军法会审不开了，得在誓约书上签字，我看誓约书是印成的，第一条，誓为满洲国人民，忠于满洲国，服从满洲国一切法令；第二条，所有一切财产开单呈报，任凭满洲国政府处理。我遂在誓约书上署了名。这是我投降日寇的罪行，造成了铁案。

当午王静修同我见伪军政部最高顾问日寇多田俊少将，他说很欢迎我回来，后又送我到日寇关东军司令部，通过冈村副参谋长见到小矶参谋长，他留我在长春住几天。我说急欲回家，他也没强留，我遂于午后回沈阳住一夜，即归新屯家，到营盘站有日寇守备队四名押送，到家有伪满警察四人常住。

这是我由大连到沈阳转长春，经过两星期，造成背叛祖国投降日寇的滔天罪行。在成立誓约书后，才得到放归乡里，开始了田家生活。〔中略〕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伪满洲国改行帝制，溥仪即伪皇帝位，沈海路局号召沿路村民举出代表，赴京参加大典，人数越多越好。营盘全村共举代表十数人前往参加（我没去），往返路费七百余元均是我备，因为未经过地方的政军警许可，竟谓是我的独断专行，事后受到一次调查，确有路局的号召，幸未造成侵越职权的问题。

我的用意，我是在伪大同二年夏回来的，当时伪满是执政制度，突然改为帝制，日寇对于我的态度与行动一定暗中注意，我遂力行拥护和响应路局的号召，表示欢欣鼓舞，可以消除日寇的疑虑。又于元宵节集合各村屯太平歌庆贺，自我备给赠款和食品，每年成为惯例。

这是我对于伪满改变帝制作初步的安排，造成了拥护帝制出

卖民族平等自由，推行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同年，我得到“帝出乎震”纪念章。

一九三四年夏，东北抗日部队进入营盘村一次，因距离省县城市太近，交通便利，当日即行撤去东边，新屯人民都眼看部队渡河。

抚顺县伪官吏来营盘村会议，提倡废除新屯，归并于营盘街里，或高丽营子村内。参加会议各人均未表示同意，遂未实行。驻抚顺县城日寇守备队长相原少佐来营盘两次，均到家视察，清原县日寇守备队长中岛大尉来我家访问，拿去我的小萤石一块，所有招待费均我自备。〔中略〕

伪军政部发还我一切财产，仍归自行管理的文件。

抚顺县伪协和会聘我为县协和会顾问，曾到会列席一次，恰遇韦焕章代表伪奉天省长出席，日期忘记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抚顺县日寇惣路守备队长领队到新屯，声言从新屯以东实行归屯，凡在山沟分散居住的各户均得焚毁，驱逐归入大堡。新屯上沟十余户再三请求，始行宽限三日，允许自行迁移，他带兵东去，对于山沟散户孤家任意焚烧，我帮助上沟各户筹备地址、人力、车工、材料，迅速搬移修盖，以免日寇借口。

这是我对于屯人施以小惠，实际推行日寇归屯的扰害农村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伪宫内府侍从武官金卓少将路过营盘，到家访问吃午饭，他说有起用当军政大臣消息，这是里边的意思。我说军政讲阶级服从，须是满洲国陆军上将资格，还得掌握实权，不然的话，像拿着半截刀一样，能当什么。他是同区下章党村人，所以我不客气的说，饭后他辞去，嗣后无消息。

同年八月左右，接到伪军政部大臣于琛澂来信说，他不日出京，视察沈海路沿线军队，顺便要到我家访问。嗣后，他到南杂木

站,由营盘站转来电话说,因为行车关系,希望在营盘站见面。我回话说,我现在有点小病,步行上营盘站时间上恐来不及。就这样彼此未能见面。

这是我自高声价的恶习。

同年十月,张景惠巡视地方情况路过营盘站,抚顺县伪县长赵仲达从营盘站来电话,令我到站迎接。我说,离站八里远的村民,可以不必到站。他说,你不是普通的村民,经过辩论和别人的劝告,终于决心出迎,与张景惠相见,他邀我同车到长春,我因为来时仓卒,没有准备,遂在前甸子车站下车,待换东去车归家。当下车时张景惠坚决的阻拦,约定了来信即去,再三嘱咐,始允下车。〔中略〕

同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六日,得到了张景惠邀我到长春的信,全家如得了生路,并且去掉了全村的灾害一样。我如期到长春(即十日晚)有伪简任秘书官吕宜文、伪荐任秘书官日寇松本益雄在站招待,住松屋旅馆。十一日午间,张景惠在伪中央银行俱乐部设席招待,向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的少佐参谋介绍,我答以在朝在野同是做满洲国人民的事业,为政府服务等语。

这是我被日寇阴险手段吓倒,顾惜生命,表示甘心为日寇做走狗的可耻可鄙的罪行。自我在家中务农时,抚顺县伪警察局日寇指导官借口搜索民枪,用伪币三百元买收我最精良的猎枪两挺。我又应抚顺县伪公署号召,以村民资格,参加在伪县署举行的建国庆祝会一次。

一九三七年一月,伪满国务院委任我为伪国务院嘱托,简任待遇,月薪每月伪币五百元。指定在伪总理的伪秘书官室办公,没有指定担任何项职务。

同年二月,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日寇陆军少将佐佐木到一往

东边一带,抚慰归并村屯受到灾害的农民,到处由我说些你们的灾害都是匪人造成的,现在匪患肃清,你们可以安居乐业,得到太平日子过,政府很是关心你们,派我来看看你们,并且转达政府意思,一定要妥善的救济你们,安置你们,你们要听信我的话,并把我的话转告给别人等语。给小孩每人一角钱。同佐佐木到一所讲话的地方有通化、临江、抚松、长白等县。又同在通化的东边筹办处处长吕宜文到柳河县视察,当日回通化。又在吕宜文所召集的东边一带各伪县长会议出席讲话一次,也是和对于难民所说的话内容相同。

我曾见到通化县城周围聚集无家可归的灾民不下四五千人,冻饥困苦,目不忍睹,如统计东边各县受难村民,当不下数十万人,我并不能拍拍良心,回到伪国务院向当权者激烈为灾民请命,作彻底善后办法,仅作出几条建议,敷衍了事。

我对于东边视察情形所作的建议:一、由辑安通北鲜建筑江桥,以便东北与朝鲜人、物的交通,打破鸭绿江的界限。二、难民自有土地者,可以帮助安家集居,加强保卫力量,以防匪患;无土地者或愿往吉、江开垦者,可以资助旅费及安家费,拨给荒地,各户集团居住,遂其志愿,一劳永逸;东边一带剩余土地,可以许给北鲜人民耕种,与本国人一样担负捐税,北鲜余下的土地,可由无地日人耕种。如此移动,天时上、地利上、习惯及认识上,不至于有很大的差别改变,较为相当。三、东边一带矿产丰富,山林出产亦多,对于矿产应极力开采,对于林产应注意经营,作为工业农业发展地区。四、加强警察实力,掌握人民动态,保持地方治安。五、整顿交通,对于乡间道路应更加认真修理,以便各县村的交通。六、通化是东边重要地点,应于通化设省公署,改任东边办事处长为省长,执行以上的政策。七、在东边一带治安未恢复期间,应在通化省城驻屯

相当兵力，以安人心。以上是建议的要点，词句和次序不能一样，然大意如此。

再建议由国境通北鲜修一条铁路，但关于路线通过地方及连结地点，我忘记了，所以没能具体写。可以就我以上的建议，见到我自以为是，与人不同的恶质。

同年春，我代表张景惠赴大连，参加南满铁路局成立三十五周年纪会礼式致祝词，由大村副总裁主持，没有深远的意义，对我没注意到相当待遇，忘记了在往朝鲜的前后。

同年三月，张景惠访问日寇朝鲜总督南次郎，有伪国务院总务次长日寇神吉常吉、宫胁伪情报处长、松本益雄伪秘书官、平山伪庶务科长和我充当随员，外有新闻记者。到汉城住京城大和旅馆。我想决不是普通访问，必有机密重要的商谈，张景惠与日寇神吉常吉和宫胁处长三人行动诡秘，可以肯定他们有重要事件，在宴会席上讲话不过强调说进一步加强满鲜的亲密，没有什么具体的话。经过三天即离汉城，当南次郎到旅馆送张景惠时，在楼上与张景惠谈话后，同张景惠到楼下大厅向全体随员周旋，他才认识了我。南次郎惊讶的说，你并不老，早就知道你的姓名，在哈尔滨参观文庙时，说是你修的，真是针对赤化的政策，是东北的遗贤，我主张找你出来，他们说你不肯，这回好了，你可以帮助总理做事，你们不是老朋友吗。我才知道找我出来与他有关系。

〔中略〕

四月间，由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与，改充伪中央本部委员，这都是伪总理室荐任秘书官日寇松本益雄拿报纸给我看的。不久，又改充伪中央本部企划部部长，于我到伪部当天，派我往黑龙江省出席伪省协和会本部会议，代表伪中央本部长致训词，尚未准备妥当，伪国务院秘书处长日寇松木侠来通知我不许远行，等待特任

式，在两日后，五月一日举行。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特任我伪司法部大臣，当日到伪部接事，与冯涵清在大厅彼此讲了交接的话，事毕，我就以统治者故态，高坐在伪司法部，开始运动了杀害人民的工具。我略举在伪司法部所做的罪行：

一、司法行政上法令的运动。推行了前颁的伪叛徒惩治法等法令，惨害了上千上万的爱国志士、革命分子。推行了产业统治法，断送工业原料及经营产物实权。改修了商工公会组织法，集中工商产品，使日寇在垄断贸易措施上，得到有利条件。

发令施行了文官令，可以随日寇的爱憎，任意升降赏罚。日寇的人事部门掌握这个制约人才的武器。发令行使了治安维持法，使广泛人民不得自由，并可借端搜集工农劳动分子，发往工地，迫使惨苦工作。发令行使了婚姻法，发挥宗法余毒，巩固不自由订婚制度，以致男女不平衡的发展，妇女多被歧视，女子未能脱掉枷锁。发令行使了经济维持法，使日寇掌握了全东北的金融命脉。发令行使了征兵法，搜集全东北适龄青年，准备供给日寇侵略战争的炮灰。发令行使了刑事法、刑事诉讼法，包括各种命案的判决，也就是完备了各种杀人的工具，可以作日寇侵略政策上扫除障碍万能的利器。发令行使了监狱法，主张发展工作生产，严肃管理，加深了人民的灾害。发令行使了国境保安法，封锁了国境出入，边界居民失掉自由，遭到灾害，加强了当地伪警察的残暴。以上是我推行和发令行使害民利敌的伪法令罪行之一端。

二、执法的推动。每年召开一次伪司法会议，指示施行法令的方针，防赤化，正思想，查间谍，检举经济犯等等，列在经常重要工作，逐次严厉。至于其他各犯，法令俱在，不许少宽，因而受害者年年增加，在我任内不下数万人。

每次视察法院、检察厅，训诫各职员认真执法，务求各法令均能在现时情势要求下，适当的发生效用。

到处视察监狱，训诫各职员务要遵守监狱法，争取好成绩，按照犯人案情不同的本质，加以严正管理。

伪司法部以前有法政学校，以后有中央职员训练所，充实各院、厅职员力量，发挥运用法令的机能。伪司法行政权，即是促使法界人员积极性，实现伪法令活动与作用的原素。以上是我推动执法机构，造成殃民的罪行。

三、政权的行使。创立法院巡回裁判制和调停制，到处扰民。可见伪法令的威胁压迫无微不至。增设监狱，分类作工，务求自给自足，不顾疾苦冻饥。

这是我布满陷阱，民不聊生的罪行。

四、举出杀人实例，不拘何类案情，在何级法院判死刑者，均呈报伪大臣批阅。

例如三肇事件，是从一九四〇年十月起着手检举，一九四一年二月结束，一九四一年四月我根据汇报发出布告，处死刑者七十多人，共受到刑事处分者不下一百七十多人。

又如热河大检举案件，受到刑事处分者竟有九百人之多，其他类似三肇及热河事件，同样的根据汇报发出布告，当是不可胜数，约计被害的爱国志士、革命部队以及良善人民，当不下数万人。这是我杀人的实例。

五、职外活动，每年慰问军警和病院，奖励了杀害人民的凶手，慰问张鼓峰，鼓舞了日寇战争。

代表东北人民参加日寇建国二千六百年祭典，侮辱了我中国民族独立传统的精神。任伪大臣数月后，修筑新屯神社，表示亲日。当年冬又往日本视察，晋谒日寇裕仁，实现来朝体制，甘居附

庸国地位，这是我放弃本职，做日寇所不能做的可耻罪行。

一九四二年秋，调任伪参议府参议，我又以五年半伪大臣资格，进入伪法令议决的机关。检举我在伪参议任内所做的罪行：

一、伪法令的决议：议决了总动员法，搜集全东北人力物力、生命财产，扫数贡献于日寇利用；议决了人口疏散的措施，用意减少城内物品支配，肃清必要注意的知识分子和搜捕无业者，供作苦力使用；议决了思想矫正法，用意在摧残一般有志青年，使他甘受奴化教育，借口思想不良，集中于矫正院，任意残害，并可用劳动改造名义，发往工地劳动，以补助劳力不足；议决了七·一五停价令，使存品价格，因通货膨涨，商家存货多者受到莫大的损失，更便利日寇用低价掠夺一切商品和资料；议决了勤奉法，包括各机关人员勤劳奉仕，并扩大学生勤劳的年限；设立勤劳部，专管劳动力征发和分配，作日寇搜索劳力的工具。

这是我议决主要伪法令，举出东北的所有力量，支持日寇垂死挣扎的罪行。

二、职外的活动

一九四二年秋，日寇大东亚同盟总裁大岛直在东京召开大东亚同盟大会，应邀者有伪满洲国、华北伪政权、华南伪政权、蒙古伪政权。我代表伪满政府参加会议的讲席和听众会场的讲话各一次，宣传伪满建设的伟大成就，更进一步力求各友邦团结一致，坚固大东亚核心，完成大东亚圣战。支持了日寇侵略东亚，奴化民族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冬，汪逆政权宣传部长林逆柏生召开日满华联欢讲演，由伪协和会指定我为讲师在南京讲演，派王子衡在上海、曲秉善在苏州，皆以讲师资格讲演。〔中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红军与我们人民军联合作战进入东北，伪满

政府迁避临江、通化一带，于镜涛等在长春留守。“八一五”日寇无条件降伏，伪满灭亡。张景惠要求回到长春，召集各伪特任官组织自治维持会，自任为委员长，各现任伪大臣为常务委员，执行其原有职权，其余各伪特任官都为当然委员，并以日寇武部六藏为最高顾问，王贤湋、古海忠之由他安排，指定刘德权为秘书，当即分电各地方成立委员会，并电报中央。我当场注意他们说，一切行动须请红军司令部许可，他们不理，我从此以后再没参加。

〔下略〕

119—2—1154—1—5

于芷山口供记录[1]

（1949年9月23、29日）

九月二十三日口供记录

问：姓名、年龄、籍贯？

答：于芷山，号于澜波，现年七一岁，辽宁台安人。

问：出身和家庭成份？

答：家庭系地主。

〔中略〕

问：何时入伍当兵？

答：二十五岁（光绪二十七、八年）入伍当兵，在张作相哨官头棚。三十三岁当哨长，后当连长，河防营营长，后于民〈国〉九年当护路团长，十一年参加奉直战当四旅一团团长。十三年四月当二十七师第五旅旅长，又参加第二次奉直战。十三年奉直战后改为独立第八旅旅长，后于十四年开入关内打冯玉祥。郭松龄事变后当第八师师长。十六年充三十军军长打阎锡山。十七年开回东北到东边道当镇守使，军队交出，仅余两个团到九·一八时。

问：九·一八时你作些什么？

---

① 此件无写作时间。但根据材料，于芷山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被我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同年九月间曾对其进行审讯，一九五一年五月因病死亡。据此，此材料可能写于一九四九年九月间。

答:〔一九三一年〕五月间曾与日本发生过数次外交交涉。九·一八时在东边十县成立保安司令部,发表声明,凡入我区者予以抵抗。在九·一八时曾接到八九封电报,令不抵抗,都是副司令[①] 转中央的电报。在东边住一年,十月后臧式毅、张景惠、张海鹏给我来信,说不表明态度则解决我。我乃派李裕屏中校参谋去北平见副司令,叫我不要抵抗,潜伏,每两月作一次报告。后编为沈阳第一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一年任职。十月到长春见军政部长张景惠,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到长春当治安部长,二十六年三月一日退职。在此期间曾叫治安部科长石维东计划爆炸奉天兵工仓库及长春汽油库,曾派田守园到老北风义勇军处联络,把林邑清及十二个日本人在盘山三道沟击毙。曾去电报告副司令给二万元。后在参议府当上将参议,到二十七年四月辞职,住在长春,三十四年回家。光复后由沟帮子到锦州,遇吴处长,继张作相向杜聿明说保出来,来沈阳后去北平。

问:曾参加过什么迷信团体没有?

答:曾参加过红万字会,当过会长。

问:你有那些财产?

答:在长春顺治街 63 号有小楼一幢,在海龙三〔山〕城镇有房屋百余间,大连南山后峰顶有一座楼,沈阳西关月窗胡同有房产,在八分局后死胡同有一个小楼、一所平房是用的自己儿子的名字。

〔下略〕

九月二十九日口供记录

问:何时与本庄繁打的交道?

答: 二十年腊月二十几, 本庄繁去飞机送通讯筒, 内容“对

---

① 指张学良。——编者注。

贵保安团赞成，决不进兵，希你负〈保〉护日本侨民之责。”第二日，本庄繁派代表和本来，条件是沈海路通车、兵引渡、枪交还。然后派阎家梅[①]驻安东特派员由沈阳到东边道，又将阎派到沈阳，又去电报给关东军，说“可以引渡”。腊月二十几我由山城镇来到沈阳，由本庄繁请一次客，臧式毅请一次客。本庄繁说，关东军是要撤兵的，只是找人找不到，没有人谈条件。第二天又回山城镇。

问:何时到沈阳就任伪职,沈阳第一警备司令部是如何编制的?

答:二十一年十一月来沈阳,到奉天当第一警备司令,管辖凤凰城、通化、海龙三城警备司令,有日本顾问间野,各地区派六七个人。凤凰城地区司令赫慕侠当司令(原是于珍的部下,十七年以后是我的部下),他的顾问叫小野,××等组织三个讨伐队,讨伐过邓铁梅等部,邓即由赫慕侠〈部〉郑营长所杀。通化司令廖弼臣,有五六个日本人,顾问武田,讨伐过王凤阁、王殿扬等游击部队。海龙地区是董国华当司令,有三个日本人,日本顾问,曾经零星讨伐过。三个司令都是我的部下。在沈阳归我管的还有靖安军,司令和田,兵是中国人。王殿忠讨伐队一千余人,李寿山一千余人,也均派往各地讨伐。

问:何时把你升职的?

答: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升为军政部大臣。

参加过协和〈会〉的高级会议。二十四年到黑龙江、热河、吉林、黑河视察，同去的有参谋司长王立三(号紫祐)〔王之佑〕,另有两个副官。到各地宣传王道。

---

① 于芷山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交待材料，此人为严家梅，任于之外交处长。

问:何年到伪参议府?

答:二十六年调参议府当参议。

119—2,1144,1,第5号

阎传绂笔供

（1954年8月16日）

第一，学历、经历

阎传绂，男。字纫韬；号稻农。民族：满族。六十一岁（一八九四年七月四日生）旅大市金县城内阎家街九百一十九号地。长春市金辉胡同一一三号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得经济学士称号。

学　历：

一九〇一年，入家塾读书；一九〇五年十月，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肄业；一九一一年三月，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毕业；一九一一年四月，入日本宫城县立仙台第一中学校肄业；一九一六年三月，入日本宫城县立仙台第一中学校毕业；一九一七年九月，入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第一部德法科肄业；一九二〇年六月，入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第一部德法科毕业；一九二〇年九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肄业；一九二三年四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一九二三年四月，得经济学士称号。

经　历：

一九二三年五月，应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采用任庶务部调查课职员；一九二四年六月，选任为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一九二五年四月，转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兴业部农务课委为嘱托；一

九二八年十一月,官选为大连市会议员;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任伪奉天省政府谘议;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任伪奉天市长兼伪奉天商埠局总办;一九三五年五月,任伪满滨江省长兼伪满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三六年三月,北满特别区官制废止同时,伪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官职消灭;一九三七年七月,任伪满吉林省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任伪满司法部大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伪满政府消灭同时,伪司法部大臣官职消灭。

第二,于日寇经济侵略机关满铁会社供职时的诸罪行

一、庶务部调查课供职时的罪行

于一九二三年我在日寇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毕业的时候,完全羡慕资本主义的好处,趁满铁会社采取职员的机会,遂应了它的采用,作了满铁的职员,派入了庶务部调查课。先在该课资料系后到产业系,办理了一些日寇以经济侵略东北的论文资料,因此,增加了它的实力。我又为在满铁会社中国人的唯一社员,当了日寇敬重中国人的招牌,助长了它的统治中国人职员的政策等。这是我背叛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甘心作洋奴,厚颜无耻地为它服务的罪行。

二、兴业部农务课供职时的罪行

我在一九二五年春转入满铁会社的兴业部农务课,竟把我改为嘱托。我在该课为它作《奉天省的财政制度和土地制度》一书,是以日文作成的,财政制度是说税收种类和沿革,土地制度是说土地的种类和沿革,为此增加了在满铁供职日寇以经济侵略中国东北的知识。例如日寇后来在买收土地、移民开垦上有所资助等等,我是有罪行的。

第三,当伪奉天市长等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任伪奉天省政府谘议、伪奉天市长兼伪商埠局总办的罪行

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有日寇大连民政署长辛岛知己(同我知交)、日寇金州民政署长增田道义(同我知交)等,为我介绍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我到奉天后见了满铁职员在关东军特务部供职的松岛鉴(农务课长)和松本侠(大学时代的同窗)等,他们为〈我〉介绍了本庄繁、坂垣征四郎。我又见了伪奉天省公署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同时为大连市会议员),他同关东军又有接洽。因我当过大连市会议员,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满铁作事清廉自持,在大连居住,亲于日寇,奉天市未有适任人材,并且我的生命财产在日寇的手里的关系上,先任我为奉天省政府的咨议,继任为伪奉天市长兼伪商埠局总办,从此为日寇作了帮凶。这是我背叛祖国和危害人民初步的罪行。

二、因我前任出卖商埠土地,我迫使住户搬家,不给安置的罪行

于一九三二年初由于前任伪奉天市长赵欣伯,卖了奉天商埠局土地约一百亩与日寇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建立了游乐地区,由该所发价,令住户百余户搬家。其卖价五万元归市政公署收入,住户百余户搬家后的安置,我竟未能办理。所以,我有罪行。

三、计划设立奉天铁西工业区的罪行

于一九三四年在我创立的大奉天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计划下,为建设奉天的工业都市,在奉天的铁道西沈阳县管下揽军屯、于洪屯地方,设立工业区,共用五百五十万坪合五百一十天地。这些土地除日寇已买得以外,大部分是中国人的土地,后来移交于伪奉天工业区土地会社管理。该会社虽同伪市政公署脱离了关系,然根据我的计划,该会社强制的使二屯住户数百户搬家,迁移了坟墓,使住户流离失所。在工业区成立后,工厂渐次开设,使数多劳工在日寇残苦条件下劳作,为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是我的罪行。

四、迫使市民捐助与日寇防空献金的罪行

于一九三五年春，我接受在奉天日寇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命令，为奉天防空设备，遂同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伪奉天省长葆康、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四人出名发起捐助，令市民纳出伪国币四十万元，作为日寇在奉天省的防卫军防空设施的用途。在我任内，虽未开始捐助，但方针已定下了。这是我为日寇防空的设备，榨取了中国人民的财货，增加了日寇防卫军的力量，并巩固了它的在东北统治伪满的地位，所以，我有罪行。

五、许可设立官烟馆的罪行

于一九三三年根据伪满政府的命令，我在奉天市内许可设立官烟馆五十余处，阿片由伪财政部专卖总署发给，而有私吸鸦片的严罚，这是鸦片专卖的前提，并且在官烟馆内设置由警察厅许可营业的女招待，以助吸烟者的余兴，能多卖鸦片。为我设立官烟馆，一方面使中国市民的吸烟者增加，毒害了多数的市民；一方面增加了日寇的收入和促进了日寇实行鸦片专卖的政策等，我有罪行。

六、兼任伪大奉天都市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伪自来水筹备处长的罪行

于一九三四年我兼任伪奉天都市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设立了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收容一百万以上的人口的大奉天工业都市的计划，又创办了奉天市自来水道，自己兼任了筹备处长。这些都是我为日寇助长了都市建设的实力，所以，我有罪行。

七、同强盗头子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共同放送的罪行

于一九三三年春同强盗头子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共同放送日寇本国说："承日寇的援助，建立了国家，各种行政都上了轨道，政治、治安都是良好，现在正在建设王道乐土的时期，将来是有希望的。"这是我替日寇宣传伪满国基的巩固，可以作它侵略中国

的基地，又是为它宣传关东军在伪满的功绩，令日寇本国人民支援关东军，间接使中国人知道伪满是中国人一手造成的谬论。这是我为日寇献媚，宣传它是真正建设王道乐土的事实。日寇又将这个用日语的放送的言辞，灌了留声片子，好作它的宣传等，有了助长日寇的凶焰的结果，我有罪行。

〔中略〕

第四，当伪滨江省长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为治安肃清工作慰问军警的罪行

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我转任为伪滨江省长，到任后首先为治安肃清工作，到各县慰问军警和视察各县的行政，到了珠河、苇河、宁安、穆稜、虎林、密山、东宁、阿城等县慰问日寇军队说："承友邦仗义援助，才有今日，今后尚希援助协力。"等话。到县训示鼓励他们忠于职守，同县里各界人士会见，加以慰抚，在同年末终了。当时有以赵尚志将军为首的抗日军和抗日联军约二万人，在苇河、珠河、巴彦、木兰等县活动，我指示各县继续进行讨伐，以保护所谓"人民生命财产"。为此增加了日寇讨伐的实行等处，我有罪行。

二、治安肃清工作的罪行

我任伪滨江省长，因地方治安不好，省内有警察一万二千人，有自治警六万人，以此维持地方治安；又继续收民间利用的枪。在我到任以前，已收了全省的枪约二十二万余挺，于一九三五年又收了枪与洋炮共有二万二千四百六十六挺。

于一九三五、三六两年间，全省十三县共设成了八百四十二个集团部落，共并了三万三千余户，内拆毁和补修部落房屋有百分之七十，烧毁了有百分之三十。

于珠河、苇河、延寿、巴彦、木兰各县修筑了二百五十公里警备道路。

一九三六年于延寿、巴彦、宾各县内，三江省的方正与延寿间，间岛省的旺清与宁安二县间，设有警备电话共三百六十公里，而滨江省内的有二百七十公里，这费用约有七万元，由架设各县的地方费负担，属于三江、间岛两省的归两省的架设县负担。

于一九三六年伪满新设的省、市都有地方治安维持会，因此，滨江省设立治安维持会，由伪省长我担任委员长，干事长由伪总务厅长或警务厅长担任。

我时常派警务厅督察官到治安不良各县，巡阅讨伐状况。

滨江省治安维持会办理民匪分离，森林区域决定和许可采伐等确保治安等事，每年由伪满政府拨来费用三十七万五千元。

在我的任内，讨伐的交战八九一回，捕了抗日军、抗日联军九百余人，牺牲了二千六百余人，归顺了二千五百余人。又因治安不好，各县栽植了矮庄稼十万余垧。

以上在我的滨江省长任内，为维持地方治安，为人民损失了莫大的财富，剥削了人民的劳力，丢失了人民的土地，牺牲了数千抗日军、抗日联军。为他们造成如此惨重的结果，我有重大的罪行。

三、放纵警察、特务、翻译等危害人民的罪行

在我的任内，于阿城、木兰、珠河、苇河各县的伪警察官，以通敌嫌疑捉捕人民，竟有杀害的。尤其是有阿城县日寇警察官西村某吃被杀人的脑髓等惨事。这种种恶劣事件，每年或多或少有之，并且省内各县的翻译、特务和日寇宪兵队特务等，屡有任意行为，或掠夺人民的财货，或强奸妇女，或任意杀害人民等事件。在任内二年间，他们检举了一千〇三十一名，牺牲了九十八名。因为我要肃清治安，才惹起日寇警察官、特务、翻译等作出惨无人道的行为，无耻的兽行，发了大财。他们虽有这样恶劣的行动，我不但不能惩治他们，犹默行置之不问，等于放纵他们作这样恶劣行为一样，证

明了我拥护日寇的侵略政策，给他作帮凶，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身为伪省长，是应有重大的罪行的。

四、强制农民栽种工业原料等的罪行

于一九三六年为遂行国策，在呼兰县强制农民栽植亚麻和甜萝卜约一万垧，在阿城县强制农民栽植忽布数千垧，都由我命令县里，强制卖给会社，以作工厂的原料，使农民既不得耕种，又不得相当的代价，竟使他们贫困，遭到了莫大的痛苦，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因此，又增加了日寇军事侵略的力量，所以，我有罪行。

五、为日寇移民收买人民土地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日寇决定由它的本国向伪满大量的移民，第一期预定移来五百万人，而在滨江省伪开拓会社指示要买密山县的土地。所以，我令密山县强制以贱价收买了一大批土地（总数不详），其收买土地的价钱，在市价的十分之二三左右。

我又在哈尔滨附近强制买收了土地一千垧，作为日寇天理教徒耕种的村落。天理教徒有五百人，共一百余户。

因这种的买收土地，使被买收的农民流离失所。对于流离失散的人民无有安置，竟置之不问，甘心为日寇作帮凶，强买土地，因此，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有罪行。

六、木兰县的讨伐击毙、击伤抗日军、抗日联军和人民的罪行

于一九三六年夏，日寇防卫军指挥它的陆军、江上军，配备了伪第四军管区军队，伪江上军和滨江省警察等，讨伐木兰县的抗日军和抗日联军。其结果，击毙和击伤和无辜的人民甚多（总数不知），为此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结果，我为省长，有重大的罪行。

七、视察北满特别区行政分处的罪行

于一九三五年冬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我以伪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资格，视察了牡丹江、一面坡、穆稜、绥芬河、札兰屯、海拉尔、满洲

里、昂昂溪等特别区的行政分处,鼓励职员要忠于职守,同时接见了特别区内的各界人士,都加以慰抚,这是我替日寇绥抚特别区人民和鼓励职员,以巩固伪满的行政基础,好作它的侵略基地等,所以,我有罪行。

第五,当伪吉林省长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芦沟桥事变援助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我转任为伪吉林省长,这时芦沟桥事变起,日寇进军华北,当时伪满政府召集全国伪省长会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训示:伪满全国要援助日寇,侵略中国。各伪省长都要即日归任,不得擅离职守,令省内各市县旗一律遵照,不许微有摇动。当时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手下的参谋某说:"关东军进兵内蒙古,乞援助。"等。会议在一小时内闭会,我即日归任,训示职员,传达伪政府命令,并各市县旗一律遵照。这是我为执行国策,同祖国敌对,以巩固日寇军事侵略的罪行。

二、太原陷落祝贺日寇胜利的罪行

于一九三八年夏太原陷落,吉林省由吉林市主办开庆祝大会,我代表大会全体人员,在防卫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面前读了他们占领中国的领土是可庆的祝辞,是我帮助他们侵略中国的表现,又是我以他们战胜中国为可庆贺的表现,又是同中国敌对的表现,所以我有罪行。

三、为治安肃清工作危害人民的罪行

我于一九三七年转任伪吉林省长后,为治安肃清工作收了全省的洋炮等十九万余挺。于一九三八、三九、四〇年三年间,由讨伐的结果,致抗日军、抗日联军死亡了四三六名,伤残了四三七名,捕了一三三名。这都是我为日寇作帮凶,危害了人民,使之他们受了危险的生活,又给抗日军、抗日联军带来如此惨重的结果,所以,

我有重大的罪行。

四、为日寇移民强制收买土地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为日寇移民，我替日寇开拓会社为开拓团强制的买收了桦甸县土地二十万垧，其价钱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又买了舒兰全县土地五分之一。又买了永吉县土地一部分，都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又帮助日寇移民团，令卖地的地主变为他的地户。以上是经我手替日寇强迫收买人民的土地，使省民遭到严重的损失，有的流离失所，有的使他们充当奴隶，以供其剥削。这由我为执行国策一手造成的罪行。

五、出荷粮谷使农民迫于饥寒的罪行

于一九三九年伪政府为应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要求，令全国粮谷出荷。吉林省当年摊派的粮谷一百二十万吨。我虽令各市县旗交纳，当年未能完纳，所差数万吨停止不纳。一九四〇年摊派了出荷粮谷一百三十万吨，我督催农民交纳完了。一九四一年摊派了出荷粮谷一百四十万吨，我又督催交纳完了。而交粮的农民，因食粮不足，多有吃豆饼、橡子面的。他们既遭受省县旗职员严苛的督催和打骂，又遭兴农合作社人员的逼迫和榨取，因此陷于贫困，遂饥寒交迫，有继之而死亡的。吉林省的农民，演成如此的结果，都是我为遂行伪满的国策，帮助日寇和巩固自己地位，一手造成的罪行。

六、为野副大讨伐致危害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吉林省内有以杨靖宇将军、李司令、崔贤、双胜各首领为首的抗日军和抗日联军二千余人。于防卫军野副昌德指挥统率下，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率领伪军队归他指挥；伪通化省长张书翰、伪间岛省长清原范益命令他们省的警务厅长率领警察归他指挥；吉林省我令警务厅长村井

矢之助率领桦甸、敦化二县的警察和游击队约一千人配合日寇军队内归他指挥。这些伪军队、伪警察、伪游击队在讨伐时都归野副昌德统一指挥、讨伐抗日军、抗日联军于通化省的抚松、濛江两县,吉林省的桦甸、敦化两县,间岛省的延吉县黄松甸子、明月沟等处。结果呢?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殉节于通化省濛江县境内,双胜首领阵亡于吉林省境内,致抗日联军和居民死伤总数约三千人。而在吉林省内征收马匹、车辆、人丁,又以通敌嫌疑杀伤多数桦甸、敦化二县的人民。其讨伐是由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五月终止的。抗日的力量受了这样严重的摧残,抗日联军受到这样严重的伤亡,地方人民受到这样惨重的结果,这许多罪恶的造成,我也帮助日寇尽了绝大的力量,所以,我有重大的罪行。

七、征取国兵的罪行

于一九三九年伪满实施征取国兵制度,令各省省长、各军管区司令官为征兵官。吉林省以伪省长我和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后任的王济众为征兵官,于一九三九、四〇、四一三年间征取了国兵约三千人。将三年间选剩的二十岁青年数万人(数目不详)充当国兵漏,作为勤劳的奉公队充当劳工的用途。我为征兵关系,除已选上国兵之外,将剩下的青年充作劳工之用,误其本来的职务,或有流离失所,或有死亡的,为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我有罪行。

八、征用劳工的罪行

于一九四一年冬伪满各地厂矿和边境地带,因由山东、河北各省招募来的劳工不敷所用,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局制定了劳工新体制实施要纲,在国内各省招募劳工。一九四二年临时决定全国要六十余万人。而在吉林省内,我令将几次所拨的劳工,由各市、县、旗分别摊派,我又令省、市、县、旗警察临时捉捕以补不足,前后送于劳工协会的共有六万余人。劳工协会都送到伪满各地

厂、矿和国境地带劳作。因使用条件残苛，衣食不得饱暖，或因疾病屡有死亡的，吉林省所发出的劳工的死亡和不能归还的数目，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又组织了勤劳奉仕队数千名，到伪满各地勤劳奉仕，例如一九四二年春由吉林省伪劳务科长李某带领五百人，在长春哈尔滨间敷设铁道路线等，其中也有死亡的。在吉林省内，迫使人民充当劳工，因各种恶劣条件，致有如此多数死亡和不能归还的，为人民造成莫大的痛苦，都是我为日寇作帮凶得来的结果，我有重大的罪行。

九、为振兴工业强制收买土地的罪行

伪满各地建设轻重工业，因此，各地收买土地，而吉林省于一九三七年冬开始建设永吉县小丰满的水电站，为此我买收永吉、桦甸、额穆三县的土地十万五千垧，地价低于市价(比率忘记)。于一九三八年在永吉县龙潭山下为建设电气化学工业会社，在永吉县的九站为建设人造石油会社，又为运输舒兰的煤炭建设吉舒铁路用地等，收买了土地估计有十万垧，都是低于市价收买的。因此，被收买土地的农民陷于贫困，竟流离失所，也有因此而死亡的。这都是我为日寇作帮凶，贪恋地位，造成人民莫大的痛苦，是我的罪恶。

十、鸦片断禁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伪满政府实行鸦片断禁，在伪满各地开设官烟馆，令瘾者领取吸烟证，在官烟馆吸烟外，不许私自吸烟，设有罚则。而全国瘾者约六十万人，共需鸦片五百万两。因此，我令吉林省各市县旗开设官烟馆千余家，令瘾者领烟证吸烟，全省瘾者计有四万余人。当时伪满在热河种鸦片，每年出四百万两，除制药用一百万两外，余三百万两不敷所用，尚缺二百万两，都高价私买由旅大、朝鲜和伪满各地私种的鸦片，因此，受到罚的也很多。吉林省

各市县旗所分配的鸦片不敷所用，并且管鸦片的和官烟馆作弊将鸦片掺假者不能顶瘾，又不得不以高价私买，因此，多有受到罚则。而有吸烟证的瘾者外，又有瘾者多数出现，如此在一九四一年又令瘾者再登录，吉林省再登录的瘾者，又增加了数千人，他们都因鸦片不足，私买高价鸦片，因此，又多有受到罚则的。像这样不合情理的事情，屡次出现，瘾者等多有陷于贫困流离失所的。省内设立禁烟者的康生病院，这个康生院之设，虽说是为瘾者禁烟，却是有名无实，不是彻底为瘾者禁烟，都是挂羊头幌子卖狗肉的办法。我为执行伪政府鸦片断禁政策，实际上是替日寇执行着毒害中国人民的政策，因此，毒害了吉林省的数万人民，我实在有重大的罪行。

十一、援助日寇太平洋战争的罪行

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于同月十一日，伪皇帝宣诏，以总力援助日寇战争。我奉伪政府命令，在吉林省令全省市县旗以总力援助日寇战争。伪总务厅设立物动计划，开始增加搜集粮谷，强迫人民储蓄。一九四二年秋我出吉林省时，将出荷的粮谷增加到一百六十万吨，又开始令人民买取公债票等。人民因出荷粮谷弄得饥寒交迫，甚至有死亡的，又因强派公债，弄得变卖财产。这是我执行国策，将全省人民财产献给日寇了。所以，我有重大的罪行。

十二、执行配给制度的罪行

于一九三九年伪满全国开始实行配给制度，我在吉林省准照国策实施这个制度，粮谷每月每人配给三十斤，都限于粗粮高粱苞米橡子面等，白面每人每月配给极少数量。六十岁以上的减食五分之一，小人平均少四分之一。粳米的配给，只限于日寇和南方人有食用习惯的食用，烟、酒、煤炭、鱼、肉、罐头、水果等都有统制。因此，省民日用生活品有不足者，得以高价私买，有荡尽财产者，有

因营养不良而得疾病的。我因遂行伪国策，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所以，我有罪行。

十三、当伪协和会吉林省本部长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日寇三宅光治委嘱我为吉林伪协和会本部长，直到一九四二年秋在职五年有余，每年率同伪吉林省副本部长日寇三谷清（后任植田贡太郎、五十子卷三、饭泽等）和伪吉林省协和会本部事务局长日寇蛸井某（后任户仓胜人）等，执行伪吉林省协和会本部事务，其职务是二位一体制，由民间团体方面援助伪吉林省公署执行国策来残害人民的。例如粮谷出荷、鸦片断禁、收买土地和考察省民的思想等（协和会员直接参加人民团体内考察言语、行动），因省本部的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所以，我有罪行。

十四、灌片子和讲演来宣传吉林省行政的罪行

于一九三八年春伪政府在伪国务院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召开全国伪省长会议时，我出席会议，当时我在伪总务厅弘报处录音灌片子，在这个片子里头，是为日寇宣传吉林省的各般行政良好，成绩昭著，将来能成王道乐土。其内容简说是："吉林在伪满成立以前，旧军伐时代，治安不好，遍地土匪横行，可是现在呢，连抗日军也都完全消灭了；吉林省是伪满谷仓地带，连年丰收，并且土地业已改良；目下为振兴工业，在永吉县小丰满建设六十万基罗瓦特的水电站成功之后，电量能供东北满工业之用，周围能开广大良田，周围又能造成数万垧的森林地带，湖内能繁殖无尽藏的鱼类，以供食用；省内教育普及，文盲顿减；并且风俗朴厚，人心向善；将来能成王道乐土等语。"这个录音片子，拿到伪满各地和中国各地宣传，以图人民的深信。又于一九四二年春在伪省长会议时，在长春放送过，其内容是"吉林省行政进行顺利"等。这是我帮助日寇

宣传伪满将来能成王道乐土和吉林省行政良好，以欺骗中国人民，而遂日寇侵略政策，所以，我有罪行。

十五、其他在伪吉林省长任内诸兼职的罪行

我在兼任伪协和会吉林本部长外，尚兼任伪满红十字会吉林支部长，伪兴农合作社吉林省本部理事长，伪协和会吉林省青年训练处长，日寇防卫军会议的参与等，这些兼职，都为这个伪省长的关系上兼任的，这又都是为日寇作帮凶执行危害人民的国策所得来的结果，为此又助长了日寇经济政策的实力，所以，我有危害人民的罪行。

第六，当伪司法部大臣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参加伪国务会议的罪行

于一九四二年九月末转任为伪司法部大臣，从此，每星期三开国务会议一次。国务会议以伪国务总理大臣为议长，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各部大臣、伪兴安局总裁巴某为组成员开会。在这个会议议决由各部局送交的法令等，凡在此通过的法令，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改警护队为警护军、审查每年的预算等。由各样法令的颁布，危害了人民，为全东北的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有连带的责任，就是我的罪行。

二、当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的罪行

于一九四二年冬在伪司法部大臣任内，由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委嘱为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有重要会议时参加会议。这个会议，以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为议长，伪大臣一部分、日寇各部次长一部分、其他伪官吏、民间团体首脑、知识份子等为组成员，于必要时开会，是实行二位一体制，援助伪政府实行国策来残害人民的。例如粮谷出荷等。为这个会议议决的执行，危害了人民，为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是我的罪行。

三、制定法令上的罪行

(一)设置矫正辅导院、制定思想矫正法令、保安矫正法令

关东军司令官效其本国的集中营办法,欲在伪满实施集中营组织,于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企划局长古海忠之,伪法制处长宫本等相联系,伪司法部次长前野茂同伪刑事司长太田耐造相联系,双方合意,决定于设置矫正辅导院、制定思想矫正法令、保安矫正法令,于司法矫正美名下,实行集中营组织。例如矫正辅导院令第一条规定:"矫正辅导院以使拘置人,体得建国精神,振作勤劳的气风,精励作业,炼磨其心身,急速变为健全国民为目的。"这个条文,明明是美名的掩饰。

于一九四三年四月遂由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耐造起草设置矫正辅导院、制定思想矫正法令、保安矫正法令的草案,送交伪总务厅法制处长日寇宫本处修改、增补,法制处又同伪企划局相接洽,将原草案修正后,送交前野茂,由前野茂提案,送交伪次长会议通过后,由武部六藏将决定案送交前野茂,这次由伪司法部大臣我提案,送交伪国务会议通过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上奏伪皇帝溥仪,溥仪将原案谘询参议府,由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召集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总务长官开参议府会议,伪国务总理大臣令伪司法部大臣我和关系司法人员出席会议,在会议席上说明原案,将这个原案通过后,由臧式毅上奏伪皇帝溥仪,溥仪对于这个原案并未降下削改、增补或废止的旨意,遂以敕令裁可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副署公布。

伪司法部行刑司遵照这个法令,在沈阳、哈尔滨两处设立各一个辅导院,于同年九月十八日待以敕令公布后,由检察厅同警察厅相联系,准备送付矫正的人。待同年十二月一日矫正辅导院以部令公布后,开始矫正,继续在伪满各地开设辅导院实施矫正。其开

设辅导院的总数和收容人数不详，但设立当时全伪满预定收容十万人。

为设置辅导院委嘱警察送付矫正人的关系上，为警察造成勒索贿赂蹂躏人权的机会；又因院内待遇不好，被付矫正的人士有衣食不得饱暖，卫生不讲，心绪不佳等情形，所以，多有得疾病的；又因为政府御用厂矿和关东军的要求，强负过重的劳作。例如一九四五年春哈尔滨辅导院临时提了一千人送往鞍山工厂劳作等。又如以上各种恶劣条件，有希图自杀和铤而走险希图逃跑作乾坤一掷的行动的，因此，又遭受到重罚和毒打。例如院令第二十二条规定："收容者有自杀之虞者和逃走、暴行及其他有紊乱纪律行为之虞者，得使用械具。"同第二十三条规定："械具为下列各种：一、捕绳，二、联锁，三、手铵，四、防声具，五、保护衣"；同第二十四条规定："械具因必要，不妨并用"等，都是重罚的规定。为此种种不幸出现，致使死亡率增加。于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到伪通化省视察的时候，伪通化矫正辅导院收容的五百人中死亡了二百余人，这是惨重的一例，至于全国辅导院平均死亡率虽不得详知，但能有相当以上的人数。因此，人民畏这个苛政如蝎蛇，多有以为一付矫正就不能庆生还的。这些法令的执行，为人民加上如是惨重的结果，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总是我提案这些法令来为日寇作帮凶，危害人民的重大罪行。

（二）审判所谓"经济犯罪"改三级审为二级审

于一九三六年实行经济统制以来，在法院审判所谓"经济犯罪"用三级审（区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处理的案件，年年增加，审判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审判官都嫌手续复杂，不能应付危害人民的国策，要求司法部予以简单能迅速处理的法令。于一九四三年末一年间"经济犯罪"有三万余件，因此，伪司法部刑事司同伪

法制处,企划局讨论的结果,决定将三级审改为二级审(区法院、高等法院)法令。于是乎于一九四四年春由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耐造起草起,送交伪总务厅法制处、企划局修改后,由前野茂提案伪次长会议通过后,伪司法部大臣我提案伪国务会议通过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上奏伪皇帝溥仪,溥仪咨询伪参议府,由伪参议府会议通过后,由伪议长臧式毅复奏伪皇帝以敕令裁可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司法部大臣我副署公布后,由伪司法部大臣移牒法院,检察厅遵照这个法令执行。法院以二级审审判所谓"经济犯罪"时,手续大减,能简单手续,迅速地处理案件。因此,所谓"经济犯罪",由检察厅和警察任意检举又形增加,于一九四四年末一年间有三万余件,在监狱的人和其他犯罪人共同计之,约有四万五千人。

在监狱的所谓"经济犯罪人"因待遇不好,衣食不得饱暖,卫生不讲,心绪不佳等恶劣条件,多有得疾病的;又应监狱内的过重的劳作,如监狱规定在监内的劳作,在五、六、七、八等月是十二小时,在四、九月是十一小时,还有在这个以上的时候,又应〔因〕伪满御用厂矿和关东军的军需生产,服监狱外的过重劳作。而日寇有犯经济罪的竟逍遥法外,纵有犯经济罪的,乃置之沈阳第二监狱(专为收容日寇犯罪人宫殿式的大白楼)内。为此种种恶劣条件,"经济犯罪人"和其他被监禁人士一样,死亡率增加,于一九四五年春死亡率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人民既遭到日寇的经济统制,夺了他们的财货,又因粮谷出荷,复夺了他们的粮食,使他们都不得聊生,为生活计,不得不铤身走险,以图侥幸。又常受警察的勒索泄忿报仇等的摧残,不幸系于监狱,又因种种恶劣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死亡率等。使无辜的人民,遭到如此惨重的结果,又为他们带来如此莫大的痛苦,都是我援用这个法令的罪行。

(三)制定时局特别刑法

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首倡大东亚共荣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来,伪皇帝溥仪于同月十一日颁布了时局诏书,宣称与日寇死生与共的旨意。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为镇压其本国的反战思想和反战行动,有使全国一致转向战争的愚图,所以,于一九四三年中制定了时局特别刑法,实行有日。伪满政府决定立为镇压反满抗日,在日寇战争中图谋反战和扰乱治安,颠覆伪满国家的,必加以重刑的时局特别刑法,遂于一九四四年冬由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耐造起草,制定了凡七十余条的严重刑法。这个刑法在起草前,太田耐造同伪总务厅法制处相联系,起草后送交伪法制处伪企划局修正后,由前野茂提交伪次长会议通过后,由伪司法部大臣我提案伪国务会议通过后,由张景惠上奏伪皇帝溥仪,由溥仪谘询参议府,由此通过后,由臧式毅覆奏伪皇帝,由伪皇帝裁可,以敕令施行公布,遂由伪司法部大臣我移牒检察厅和法院,遵照此法令检举和审判。

由于这个法令的执行所处理的案件,由一九四五年一月起至六月底止,凡六个月间共有六百余件。于一九四五年春伪三江省通河县凤山镇的监狱,于付矫正的名义下,逮捕了无辜的人民二百五十人,因此激成公愤,而爱国英雄看守王金才竟义勇直前地将他们全部释放,监狱急报当地警察,而警察急剧出动围击,又急报方正、依兰各县的警察,由他们的来援,前后夹攻,击毙无辜人民百余人,捉着扔之江中的又有一百余人,其余三十余人同王金才被捕,送之佳木斯监中,后由长春最高检察厅日寇石井莞尔派了中村检察官(姓不确)来佳木斯开了特别治安法庭严讯,王金才等三十余人都当场受重刑拷打身死,其状甚惨。于同年春在哈尔滨地区兰西地方(地点不确)逮捕了反满抗日爱国人士三百余名,都是这个

法令处理的。以上二例都是这个刑法的罪恶。日寇以武力侵略了东北，增加了帝国主义的恶焰，使东北的人民不得聊生，都是气息奄奄，朝不谋夕的，又为遂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又贪得无厌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这个战争祸及了东北的人民。恐东北的人民趁此机会报仇，才有伪皇帝溥仪诏书的颁布，才有伪刑事司长的起草，才有伪次长会议的通过，才有伪国务会议的通过，才有伪皇帝以敕令的裁可，而到执行。为此又给气息奄奄的人民加上惨重的结果，又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痛苦，又为日寇帝国主义加强了侵略的力量和压制抗日爱国人民的凶焰。总是我提案这个法令的重大罪行。

(四)时局刑事手续令、时局民事特别法

于一九四四年四月由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耐造起草，制定时局刑法手续令，由伪民事司长藤泽起草制定时局民事特别法令草案成立后，送交伪法制处、企划局审核修正后，由前野茂提案伪次长会议通过后，由前野茂替我(因母亲病重，在家看病)提案伪国务会议通过后，经过一定手续，由伪皇帝以敕令裁可，于同年五月一日公布这二个法令，是在时局下要手续简单，合乎时局的要求而制定的。时局刑事手续令是开了关于时局下的刑事特例，全法令共六十余条。时局民事特别法，也如刑事手续令一样开了特例，全法令三十余条。这二个法令都是在时局下，欲以简单手续处理案件，因此，为人民带来了加重的痛苦，我有罪行。

(五)热河被害人民的特赦令

于一九四二年冬于热河日寇防卫军司令官、宪兵和警察交到承德法院所谓反满抗日和八路军合作的人民三千人，这些人都是拷打受过重伤的，有到监狱前死亡的，有到监狱后死亡的，有在戒护途中死亡的，有因疾病死亡的，有由检察官设特别治安法庭处理

的。锦州省伪高等检察厅长周某报告我说:这些人大部分是热河地方住民,由热河日寇防卫军司令官,以与八路军合作的嫌疑,令宪兵队、伪满警察捉来的,拷问后无法处理,送过来的都是垂死的人了。各地的关系机关都知道他们被冤屈遭难,欲迅速救济,而决计行施特赦,遂由伪司法部刑事司长太田耐造起草,由前野茂提案伪次长会议,由伪司法部大臣我提案伪国务会议经过一定手续,由伪皇帝溥仪以敕令裁可后,遂办理手续。这次死亡了二千五百人外,特赦了约五百人。我未能迅速救济被害的多数人民,我有罪行。

(六)全国大赦令

于一九四四年冬伪皇帝溥仪降下旨意,令举行大赦。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司法部大臣我都欲实行大赦,以救济寄监的被冤屈的人民。经武部六藏、前野茂的认可,并许可为办理手续,遂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以伪皇帝万寿节为期,由太田耐造起草,在伪法制处、企划局修正后,由前野茂提案伪次长会议通过后,由伪司法部大臣我提案伪国务会议通过后,经过一定的手续,由伪皇帝溥仪以敕令裁可后,遂开始手续的进行。这次大赦复权的有二十八万余人,减刑的有二万余人,释放的有二千余人,而对所谓"犯帝室罪"、"犯建国元神天照大神尊严罪"的和"否认国体,反满抗日罪"的等罪在不赦外,余者都有这个恩典,直到"八·一五"尚未办理完竣。对于大赦令中尚有未得复权减刑或释放者的被屈的人士,总是我有不得以全力办理的怠慢罪行。

二、援用法令上的罪行

(一)惩治叛徒法

这个法令是一九三二年以教令制定的,是日寇欲遂行伪满的统治权而实行压制和危害爱国人民的手段,从来援用它危害了无

数的爱国人士。我到伪司法部时仍然援用，如一九四二年春由日寇本国送来交与在伪满日寇宪兵队司令部的爱国青年男女学生约二十名，由最高检察厅日寇次长石井莞尔起诉，以长春高等法院一级审判决了，有判十五年徒刑的。由日寇本国送来的思想犯罪，就与伪满诉讼手续不合，判决后送来备案时，我虽未到任，但到任后犹观望置之不理，是我有为日寇作帮凶，危害爱国青年男女的罪行。又如一九四四年春伪建国大学柯教授、学生杨万玉等二十余名被逮捕，杨万玉在途中被殴身死外，余皆去向不明。同年夏法政大学爱国青年罗际春外三十余名被捕，除罗际春逃走外，余皆去向不明。同时罗际春的故乡公主岭的爱国青年二十余名，长春市民王致甡等二十余名都被捕捉，都是去向不明。这些〈都是〉石井莞尔指挥检察官逮捕的。于一九四五年春哈尔滨伪滨江省参事官陈维儒，同伪实业厅技佐于绍文外六七十名被捕，除陈维儒判十年徒刑，于绍文释放外，余都去向不明，这是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日寇次长西村检举的。又在同年春齐齐哈尔市民田树棠等十余名被捕，都是去向不明，这是齐齐哈尔高等检察厅次长日寇酒井逮捕的。余外尚有这样事件，这都是我用以前的惩治叛徒法来危害爱国青年的罪行。

(二)治安维持法令、特定治安法庭的设定

治安维持法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敕令颁布的，为制裁所谓“否认国体”等等而设定的。特别治安法庭的设定，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以敕令颁布的，是以简单手续迅速处理爱国人士的恶劣法令，从而毒害了无数的人民。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冬由热河日寇防卫军送来被拷打过重的无辜人民三千名，都是用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名义检举和起诉的，经过毒刑后，送交承德法院用特别治安法庭处理了，除以特赦令特赦五百名外，余二千五百名

有判的有未判的，都完完全全的死亡了。如又有伪满宪兵团长桥本申于一九四二年六月起至一九四四年八月止，在热河省的滦平、青龙、丰宁等县内，前后凡六次检举了热河爱国人士和无辜人民一千三百三十名，经过严刻的拷打后，认为违反治安维持法，送到承德检察厅起诉的有九百一十名，都在承德地方法院检察厅的常设特别治安法庭判决了，有处无期徒刑的、二十年有期徒刑的，十年、八年、七年等有期徒刑的。余外在常设热河特别治安法庭处理的法案，尚能有多次，因不知详情，不能枚举。承德的常设特别治安法庭，是在我的前任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时代设立的，仍然继续开庭，是由一九四二年四月起直到一九四五年伪满消灭前存在的。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开设当时，由伪司法部派了日寇参事官八田卯一郎常驻承德管理其事。如上所述通河惨案、兰西惨案，都是援用特别治安法庭和特别时局刑法合办的凶恶惨案。为援用治安维持法、用特别治安法庭处理的案件，为人民带来如此惨重的结果，又为他们带来如此莫大的痛苦，我有援用这二个凶恶法令的重大罪行。

(三)经济统制法令、鸦片断禁法令、粮谷出荷法令

于一九三六年伪经济部制定经济统制法令，于一九三七年伪民生部制定鸦片断禁法令，一九三九年伪兴农部制定粮谷统制法令，这些法令，都在伪司法部制定有各种犯罪处理的手续法，这是对各样犯罪的罚则，这些法令都是危害人民的，又是掠夺人民财货的，又是助长日寇统治伪满的恶焰的。又于一九四三年春在我的伪司法部大臣任内为补粮谷统制法令的不足，设立了一个粮谷追加法令，是为不愿出荷粮谷而行隐藏，经过发现后行以处罚的。由于这个法令的实施，帮助日寇粮谷出荷愈加顺利。由于这些法令的执行，使人民遭了涂炭，都不能聊生，不得又铤身走险，以图侥

幸,又遭到重罚,竟有陷于死亡的。在我的司法部大臣任内,为这些情形陷于监狱的,在一九四三年中约有三万数千人,其死亡率竟到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左右。为人民造成如此惨重的结果,又为人民造成如此莫大的苦痛,我有援用这些法令的处理手续法令的罪行。

(四)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司法警察职务规范

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于一九三六年和三七年两年间以敕令公布的,法院编制法、司法警察职务规范,是一九三六年以伪司法部令公布的。〔中略〕

民法全般四百余条,刑法全般二百七十余条,民事诉讼法全般四百五十余条,刑事诉讼法全般四百八十余条,司法警察职务规范全般是一百六十余条,这些法令都是危害中国勤劳大众的利益,为保障日寇资本主义的生命财产和他们特殊权益而服务的。司法警察职务规范一法,尤其凶恶,除犯帝室之罪、内乱之罪、有影响于国交之虞之犯罪等二十九项得报告检察厅外,余者司法警察都能专断处理。司法警察的刑法有二三十种,有灌咸盐水、跪锁链、用烙铁烧、用笞毒打等刑,因上刑受刑不过而身死的有之。我在伪司法部大臣任内援用这些法令危害了人民,为日寇增加了侵略东北的力量,助长了日寇残暴的凶焰,我有重大的罪行。〔中略〕

四、监狱行政上的罪行

伪满监狱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敕令成立监狱法当时,全国监狱有本监二十四个,其后又设立了分监、县监和旗监,于一九四五年伪满政府消灭当时,有本监二十四个,分监八十个,外有县监、旗监共计监狱有一百三十个,共收容了四万五千人在内。监狱于一九四三年以前归伪司法部行刑司管辖,行刑司取消后,于一九四

三年归司法矫正总局管辖。监狱内对所谓犯罪人的待遇不好,衣食不得饱暖,将饭分作五等,以模型扣成,按级分食,并且卫生不讲,室内不透阳光,消毒设备不充分的关系,多有得传染病的。又因为谋国库的收入计,使服过重的劳作,照监狱法的规定,每年在五、六、七、八等月服十二小时的劳作,尚有超过这个时刻以上的时候。不但在监狱内劳作,又应伪满政府和关东军军需生产的关系,服监外的重劳作。例在一九四三年春在鞍山制钢所有数百犯人劳作,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安东铜矿场有数百犯人劳作等。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伪矫正总局长中井久二在新闻纸上发表说:全国监狱有四万五千人,其内大部分应关东军的军需生产而劳作等。可知在监狱的所谓犯罪人大部分都服过重的劳作。在监狱的人,又常受捕绳、联锁、手铐、足镣、保护衣、防声具等戒具的惩治,有并用戒具的时候,有受笞刑的时候,因此,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和说不尽的痛苦。又因有监狱管理人同接见的人索求重贿等事,惹得接见人感到威胁。如此种种不幸,出现被监禁的人士,既忍饿受寒,身荷重病,又服过重的劳作等,致使死亡率增加,于一九四五年春死亡率由百分之二十增至二十五左右。为在监的人士造成如此惨重的结果,总是我执行危害人民的诸法令,又是我纵容伪矫正总局长、伪刑务署长及伪司法部关系人员使他们任意枉为,又是我助长了日寇经济侵略的力量,为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我有重大的罪行。

五、在伪司法部的其他诸罪行

(一)批准处死刑的罪行

我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任伪司法部大臣职务后,每年由法院送到判决处死刑的约有百余人,三年间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止共有三百人,我为维持伪满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以巩固日寇在东北的

基础，援用这个旧日刑法。

(二)国民党五月大检举的罪行

于一九四五年五月长春伪首都警察厅警察，在长春伪满各官衙中检举了四五十名，说是在长春各地的官民，因日寇太平洋战争行将败北，伪满恐有颠覆，早同中国国民党相联系，作为将来赎罪阶梯的计划，由在长春日寇宪兵队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探知，以为犯了内乱罪捉捕了四五十名。同时日寇宪兵队特务和正服宪兵佐官，到各部局威吓以图镇压和遏止。将已捕去的人在伪首都警察厅讯问的结果，将一部分释放外，余者认为违反了治安维持法，送交伪最高检察厅日寇次长石井莞尔处起诉。石井莞尔将他们送交长春监狱看押，开始搜查，到“八·一五”当时尚未有结果，后来由监狱释放时释放了。因我为日寇作帮凶，援助它的太平洋战争，而危害了伪满各官衙的伪官吏和人民，所以，我有罪行。

(三)纵容伪矫正总局长中井久二和奉天伪第一刑务署长将死亡犯罪人送付医科大学等处解剖的罪行

于一九四三年、四四年中，伪奉天第一刑务署将处死的和因病死亡的人约有三四十名的尸体，送与南满医科大学、奉天南满医院和赤十字社医院等处付诸解剖，是一个越法行为。照伪满的监狱规则，将监狱犯人的尸体，应即交与其家族或亲戚收领，无有亲人的，应交其故旧领收，虽无有家族、亲戚、故旧的应为埋藏，经过一年后，方许合葬。虽有于特别情形下可以付诸解剖的一条，但死亡人生前有不肯付诸解剖的意志的，也不能付诸解剖，况这些死亡人大部分都有家族，他们竟自越乎狱规，送付解剖了。他们是有不守法规任意枉为的行为，在我的司法部大臣任内，竟有此事，是我有纵容伪矫正总局长中井久二和伪第一刑务署长任意枉为的罪行。

(四)纵容伪检察官等收集司法保护事业基金的罪行

于一九四三年春伪最高检察厅长徐维新，同次长日寇石井莞尔、伪高等检察厅长程明义、日寇次长石井等数名发起，为日寇作帮凶，吸收伪满各地的游资的目的，在司法保护的名义下，动员各地检察官，在伪满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各大都市劝捐，于一九四四年冬，全款募集告成，共得国币四百万元，存放于长春，声称将来作司法保护事业。在同年冬开司法保护基金成立大会，在会议席上，感谢应募的人士，我竟出席这个成立大会。

(五)设立保护监察所危害爱国青年的罪行

于一九四三年在司法矫正总局成立前后，本之思想矫正法令，在长春设立了两个保护监察所，以考察有思想而未有动作的爱国青年，已有思想犯罪而归家庭保护的，也归这里考察和监视。这两个设立以后，在各地保护监察所的设立和行动情形，虽不得详知，但是为镇压和威吓爱国青年男女的关系上，使多少青年男女受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增加了日寇侵略东北的实力，巩固了日寇的军事基地，总是这个法令提案人我是有罪行的。

〔中略〕

(七)纵容日寇辻朔郎、中井久二乘机危害伪满各监狱爱国青年的罪行

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同日寇宣战后，伪满政府开防卫会议，决定同日寇军共同作战，开始防空，于十日受到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的命令，令溥仪、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吉兴、张文铸、邢士廉、阮振铎、于静远、卢元善及我到伪通化省临江县大栗子沟办理政务，令于镜涛、金名世、黄富俊、谷次亨等留在长春代理伪政府办理政务。我因有病和家族关系未能同行，在长春家中潜伏未出。于十三日武部六藏同关东军参谋同谋令总务厅伪秘书官周开亭来催促我同夜非赴通化溥仪处不可，可以携带家族，同时长春的

各伪大臣也都得赴通化。于是我决计将家族一部分留在长春，一部分带往通化，于十三日夜未要来火车，于十四日朝已知道不用前往通化，十五日日寇无条件降伏。我由十日直到十七日未到伪司法部上班，其间辻朔郎对监狱被监禁的人已有了措施。在长春监狱于十四日下午三点提出爱国青年六十七名解往吉林，欲在途中杀害，令看守川村某等戒护，行在长春公路时被军官学校学生等杀死看守川村某，余者看守逃走，将爱国青年全部放了。在牡丹江也于十四、五等日提出爱国青年若干名，全部杀害。又在哈尔滨滨洲线上的泰康监狱杀死爱国青年若干名，内有一名逃走。当时在其他各地监狱也能有这样情形。这都是我在兵荒马乱之中，未能监察他们，纵容他们得了机会，设法来危害爱国青年，以图减少抗日力量，我有罪行。

〔中略〕

（九）参加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罪行

于八·一五后二日在十七日参加了以吕荣寰为首的地方治安维持会，每日议论接收各部局官职，并维持长春各地秩序的事情，于十九日伪皇帝溥仪在伪通化省临江县大栗子沟，于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等待立下，下诏退皇帝位，伪满政权消灭，伪政权官职同时消灭，在伪通化省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等即日出发，归还长春，伪皇帝溥仪于二十日飞向奉天。在二十一日成立了全国治安维持会，这个委员会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各伪大臣伪参议及官民重要人员三十余名参加会议。在委员会的会议当中，市政府宣言，要接收各部局，令都让出，而治安委员会议决，为维持现状计，都要照常上班，以准备接交，我曾到伪司法部上班过一次，同各职员见面后，旋都散去。这时伪次长辻朔郎被苏联军捉去未得回来，于二十五六日方得归来，于二十九日为

伪检察官、伪审判官等要求退职金，我见了辻朔郎一次于其家中，当时他在家中开会，有司法关系的日寇数人，内有中井久二。于同月三十日我与张景惠及各伪大臣等约二十来名被捕赴苏联，在王爷庙四日，于九月二日送归长春，在原来的三浦总局长住宅住了四日后，九月六日苏联军用飞机将张景惠以下我等送到赤塔溥仪处去了。

〔下略〕

119—2—1149,1,5

卢元善笔供

(1954年5月14日)

姓名:卢元善。别名:仲三。性别:男。民族:汉。年龄:六十七岁。原籍:金县城内旗仓街一九四号。现住所:长春市吉林路北胡同一四一号。〔中略〕

经历:

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日生。一八九六年入汉文私塾。一九〇六年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日本立的小学校)。一九〇九年入日本仙台农业学校(日本官费),一九一二年三月卒业。一九一二年六月充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教员,一九一九年兼任过山城镇裕华电气公司董事半年。一九二〇年秋任四洮铁路局课员。一九二二年四月任金州农业学堂教员,一九二七年兼任过金福铁路公司监察三年间。一九三二年一月任黑龙江公署秘书。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任伪满军政部上校秘书官。一九三二年八月任伪黑龙江省实业厅长。一九三七年五月任伪龙江省民生厅长。一九三八年八月任伪专卖总局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伪三江省长,兼任协和会三江省本部长、兴农合作社联合会会长、红十字社三江省支部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任伪总务厅次长。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到"八一五",一九四三年秋兼任过一年间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开始到伪满当差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在故乡金州农业学堂当教员，通信与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学生、当时的黑龙江省实业厅长韩云阶（韩云阶是与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劝降马占山到沈阳与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开建国会议的人），求他为我在马占山部下谋求一职。韩回信叫我到黑龙江，引我见马占山，马占山委任我黑龙江省公署秘书。三月五日，省公署命令我到长春预备马占山到长春的住处，我七日到长春时，长春警察厅已竟早给预备好，在大马路边业银行。三月九日午前，马占山同韩云阶带同张益三、张文铸、贾金铭到长春。午后三时马占山到长春车站迎溥仪。溥仪到后，马占山随溥仪到国务院（旧长春道尹公署），溥仪就执政位，马占山任军政部总长，每日到国务院开国务会议。十二日有黑河兵变消息，马占山回黑龙江。临行前委任我为军政部秘书官，张益三为军需司长，贾金铭军政部办事，张文铸随他回黑龙江。我从此当了伪满军政部秘书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任伪满军政部上校秘书官任内的罪行：

一、伪军政部组织：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马占山由黑龙江省派来军政部次长王静修外四十余人到长春，组织军政部。三月二十三日国务院秘书处告诉王静修，军政部的事〈由〉驻长春关东军参谋和知鹰二管。王静修同我往见和知，和知写介绍名片，告诉教往沈阳关东军司令部见参谋石原莞尔。王静修遂同我、张益三、满丰昌、李联众到沈阳日寇关东军司令部见石原莞尔，石原引导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本庄说："要组织军政部，维持地方治安。"王静修答应从命。本庄遂交给石原，教石原指示一切。石原介绍小松某参谋大尉、住谷悌主计，说从今天研究条例。当时小松、住谷引导王静修

同我等五人，到沈阳大南门里边业银行，小松拿出伪满陆军条例的稿子，逐条讨论研究。我当翻译，继续研究警备司令部条例，临时给与条例。到四月十五日，由关东军派来佐久间亮三中佐、佐藤俊人大尉、冈田菊三郎大尉、住谷悌主计，成立顾问部于张学良住宅，同时成立军政部于边业银行旧址。王静修是军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张益三是军需司长，郭恩霖是参谋司长(暂时未到任)，以外课股若干。这时奉天警备司令官是于芷山，吉林警备司令官是吉兴，黑龙江警备司令官是程志远，洮辽警备司令官是张海鹏。五月由部规定奉天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七十万元，吉林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五十万元，黑龙江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五十万元，洮辽警备司令部每月军费二十万元。当时抗日军，奉天省东有唐聚五、邓铁梅，西有老北风，吉林省有王德林，黑龙江有马占山(四月起义)、李海青、天照应、邓文、霍刚、才鸿猷、冯占海等。顾问部作攻击抗日军的计划，由我拿到军政部交给次长王静修，王静修电令各警备司令部执行。六月一日最高顾问多田骏来，更加紧攻击计划。我关于军政部组织，又在顾问部与军政部之间连络一切，攻击抗日军的电报，都通过我的手。背叛祖国，帮助日寇打击抗日军，我有重大的罪。

二、攻击抗日军的结果：

1.一九三二年四月，黑龙江警备司令部回电说：旅长涂全胜迎击李海青于肇东，李海青退吉林界，涂手部负伤。

2.一九三二年四月，军政部接到黑龙江警备司令部来电，知道李海青退到吉林界，由军政部次长王静修名义，经我手打电〈报〉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堵击于农安，打死五十多人，俘虏四十多人，李海青向松花江北逃走。

3.一九三二年七月，日寇满州《日日新闻》发表马占山战死于

海伦东方安古镇。当时黑龙江警备司令部虽没有报告,以后得知〈是〉黑龙江警备司令部派张文铸为第一支队长,帮助日寇松木十四师团堵击的结果。

4.一九三二年八月,抗日军王殿臣(当时名就叫殿臣二字)在长春南占据双阳县。以军政部次长王静修的名义,经我手电令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讨伐后,殿臣撤退到吉林南磐石县烟筒山一带。吉兴继续讨伐,于一九三三年把殿臣与他的部下二百多人打死。

以上的结果,我有责任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任黑龙江省实业厅长任内的罪行:

一、夺鹤立岗煤矿权:一九三三年秋由实业部召我到哈尔滨,开鹤立岗煤矿公司股东总会,当时实业部总长张燕卿、总务司长高桥康顺,派矿业科长高木佐吉与铃木谦则二人,到哈尔滨会场。股东到会的五十余人,有增韫、孙广庭〈等〉有名人在场。高木主持开会,宣告矿业今后归国家直接经营,不准私人有采矿权,旧黑龙江省所许可的矿照作为无效。我也支持实业部的方针,劝股东等放弃权利,对股东说,这是国家发展煤矿的大方针,私人不得抗违的话。增韫等虽露出不愿意的言辞,说出国家剥削民间权利太甚的话,终至看到不能免实业部强行取消矿权的事,遂不得已承认无条件取消了。股本五十万元完全损失。矿权是旧黑龙江省许可的,我是实业厅长,我帮助实业部夺矿权,我有责任。

二、强制收买克山农事试验场用地。日寇在"九一八"以前,满铁即在南满熊岳城立农事试验场,以作果树、水稻的种植试验,在中满公主岭立农事试验场,作大豆、牧羊的研究,目的是为侵略满洲的准备。伪满成立,伸手北满的机会到来。一九三三年冬,实业部定在克山立农事试验场,派实业部事务官佐佐龟太到黑龙江省实业厅来见我,教我以我的名义买克山西门外的土地二百垧,并拿

来预先以书信调查克山土地的时价，克山县参事官日寇樱井正尚的回答，为每垧地四十元钱。我同佐佐龟太到克山见陈毅县长，商议买地的事，陈说“九一八”以前，值三百元一垧，现在没有价钱，他遂召集目的地内的农户五十家的主人到县署来，告诉他们实业部要设立农事试验场，要买他们的地。农民一齐给我跪下，说不愿意卖。我说经县参事官调查，已经通知实业部，这个地时价四十元钱一垧，我给你们商议六十元钱一垧，承认卖了罢；农事试验场成立，将来于你们有好处，你们卖了这个地，可以在略远的地方买地，好享受农事试验场的好处。陈县长亦帮助劝。农民不得已遂都承认卖了。实在是五十家的人，以五分之一的地价出卖自己的土地，结果都流离失所。我只顾为上司立功，不问卖地家的死生存亡，实为无良心的人，并为以后日寇低价掠夺土地打下例子。地既买成，一九三五年春克山农事试验场开始试验，以公主岭农事试验场技师村越信夫为场长，作小麦大豆等作物的试验，专研究温度、雨量、土壤、肥料，特别对于改良小麦的品种最为注意，所谓抗病的“克华”种，就是这个试验场作出来的。并每年出版试验成绩刊物，拿到日本国宣传，以供日本来的开拓移民作参考。这个试验场设在克山的目的，是因为北满土地宽阔，并为产小麦地带；克山为北满的中心，移民发展容易。我给它买地，使人民遭受灾难，我有重大责任。

三、夺采金权。一九三四年春，伪满实业部公布采金会社法。根据这个法成立采金会社，并派山田昊、孙午莲到黑河，出布告说，“沿黑龙江产金地带，都由皇帝陛下给采金会社了”。教各金厂交矿照与采金会社。逢源金厂及其它小金厂都没出头反抗，惟兴安金厂主徐程九抗违。山田昊由黑河来实业厅，求我给他劝说兴安金厂，并托采金会社社长草间秀雄的友人省总务厅长永井四郎对我说，教我从中调解。于是我对兴安金厂主徐程九说，这是国家的

大方针，不能抗违，省有的佛山县观都金矿局都得交给采金会社，你若是有损失，我可说由采金会社赔偿你五百万元钱，徐程九不得已承认交照弃权。省旧有的观都金矿局虽已停办，把金矿局在佛山县的房屋及采金船一个都交给采金会社了，于是各金厂都无条件交照弃权，各厂共约受二百万元损失。采金会社继续奴役采金工人，沿黑龙江大小金厂五十余处，有约三万工人，后因待遇不合适，失业的约一万五千人，这些工人都是鸦片瘾者，渐趋死亡。

四、出席农学大会。一九三四年春，实业部农矿司长松岛鉴以电报召我到长春，告诉我由实业部派我到东京出席农学大会，并嘱我在大会听农学研究外，可作特别演说。同去的有土们岭林业试验场长高化南、卧虎屯牧羊场长萧维新。到东京由驹场农科大学教授农学博士那须皓接待我们。在开会式时，我特别演说黑龙江省情况，说明黑龙江省土地肥沃、面积广大，气候虽冬天长夏天短，而夏天早刻日出，晚刻日没，日照时间长，对农产物发育有良好的条件，因开化晚，人烟稀少，希望人口众多的日本人多来开垦等话。〔中略〕。第二年一九三五年春夏，那须皓与山田惠一先后到黑龙江省实业厅来旅行调查，我一一招待他们，考查黑龙江省土质、雨量、农作物种类等，都到过克山，因此这些博士等证实我在农学大会上说的话，渐次起了宣传作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伪满民政部设拓务司和日满拓殖会社、鲜满拓殖会社等，开始收买土地，一九三七年拓务司移交产业部改为开拓总局，以后日满鲜满两会社合并为满拓公社。开拓总局在北满开始大量收买土地，到一九三八年共收买三千万垧，包括熟地一百万垧，因此把原住民撵走了约一百万人，其中旧黑龙省的包括三江省四百五十万垧，龙江省八百万垧，黑河省一百万垧，北安省三百万垧，滨江省二百万垧，约全数三分之二。如此大量掠夺土地，是与我在农学大会上的演说

有关联的，又使人民一百万人遭受到流离失所的灾难，我的责任重大。

又因出席农学大会演说，促进了开拓移民的实行。一九三四年冬，住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长兼军政部顾问后宫铁男，在依兰县土龙山，一张照一元钱没收土地，保长谢文东反抗，连其母亲孙子以外五十多人均被屠杀，即所谓“土龙山事件”。从此武装移民开始。把土龙山附近永丰镇改为弥荣村，湖南营改为千振村，每村有五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为开拓移民最早的两个村，这个土龙山事件，追本溯源我有责任。

五、夺森林采伐权。一九三四年秋，由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总务司长高桥康顺，依据同年伪实业部公布的林野管理法，命令黑龙江省将伪实业厅所管的林野档案移交实业部，关于森林事务统归伪实业部直辖，对于原来在旧时代由黑龙省实业厅所许可的私人采伐林照一律取消，并对于已砍伐的木材不准移动等等。当时伪省公署实业厅以我的名义贴出布告：今后林野事务归实业部直辖，旧日许可的林照，增福、李子初等八十家的森林采伐权一律取消，已砍伐的木材不准移动。一方面通知森林地区的通河、汤原各县；一方面把旧有档案，由伪实业厅派农务科技正牧野克己，送交伪新京实业部。因此森林砍伐户增福、李子初等八十家所受的损失甚大。原来各户所投的资本是每户二十万元，以后每年按二成递次扩张，若按五年计算，在第五年上就有四十一万四千余元，八十家共为三千三百余万元，再加上已砍伐的木材，每户多有价值十万元的木材都被没收，连同以上的资本共为四千一百余万元。这就是我为日寇掠夺人民的森林采伐权，使人民遭受莫大的损失，我是有重大责任的。

六、共同贩卖会。一九三四年春，因一九三三年秋大豆价格特

别低落，日寇国际运输公司和伪满大兴公司，以为奇货可居，到实业厅建议办共同贩卖会，由它两家收买大豆，先给半价，预定四元八角一百斤，每吨九十六元，共三百车合九千吨。两个月后，涨到六元钱一百斤，每吨榨取一百二十元，九千吨共榨取二十一万元。帮助日寇榨取人民，我有责任。

七、计器公司。一九三五年春，实业部召集改十省后的实业厅长会议，在会议席上发表改革度量衡。度的尺，改为一公尺的三分之一为一尺；量的斗改为旧斗（旧秤四十二斤）的半斗为一斗，斗为圆形；衡的秤，改为十进法，十两为一斤（两比旧两大一点，十两比旧秤十四两相同）。与东北农民都认为不便，特别是斗改为圆形，农民使惯带梁的方斗，当时奉天实业厅长曹承宗为首，十省的实业厅长，都建议说圆形斗与农民不便。到底没能变更，仅得暂作方形斗代用。根据这次会议，实业部设立计器公司，以高桥文夫为社长，把伪满尺秤斗归计器公司一手制造贩买，在大连设立制造计器工厂。从此计器公司专买尺秤斗，政府出令逼人民不准用旧尺秤斗，历书宣传新尺秤斗，其目的是统一全伪满度量衡，使日寇侵入移民得到方便。

八、马炭疽注射。一九三五年夏，龙江省甘南县发生马炭疽病传染，死马二百余头。日寇驻军十四师团兽医部长小野纪道、实业厅畜产股长木下进到甘南防疫注射，我当时很为感激，以后觉悟日寇为他自己的军马怕受传染才作这个行动。因为这个注射农民不胜其扰，有农民剥死马的皮受警察殴打的。我帮助日寇防疫，使人民遭受骚扰，我有责任。

九、日满青年会。一九三五年夏，龙江省协和会事务长井东信夫，发起立日满青年会，推我当青年会长。会的工作每日早晨六时召集市内学生于龙沙公园，第一，国旗揭扬。先行日寇国旗揭扬，

唱日寇国歌，后行伪满国旗揭扬，唱伪满国歌；第二，宫城遥拜（日寇天皇）；第三，皇居遥拜（伪满皇帝）；第四，行访日回銮纪念的建国体操两回；第五，国旗降下，先行日寇国旗降下，后行伪满国旗降下；第六，解散。在这个行动〈时〉，协和会内宪兵密探佐佐木准与教育厅内的宪兵密探内田阳，都到场侦探教员学生的言语行动。又作日语讲习会。我倡率青年学生实行一德一心、民族协和、日寇的政策，并给日寇宪兵密探造成侦探教员学生行动的机会，遂演成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教育厅检举案，我亦有一部分责任。

附录：教育厅检举案

一九三六年三月中旬，由日寇齐齐哈尔宪兵队（队长中田敏雄），开始检举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视学厉通维、郑炳寰以外各学校体操教员数名，第三中学校长王某，市公署职员刘松山，民报社长王某，社员刘大川等三十余人，说是与哈尔滨来的金巴来联络，有反满抗日的嫌疑，严刑拷问，使他们咬教育厅长王宾章。三月十九日，把王宾章逮捕，用“镇静袋”的酷刑拷问，到底没有口供。于二十日晚间，诬王乘出去小便之际逃跑，把王击毙，其他采取第三军管区军法裁判的形式，判姜赓年、金巴来、民报社长王某外二名死刑，处枪毙，其他厉通维等二十余人判十年十五年不等的徒刑，押在伪满第三军管区陆军监狱。

一九三七年五月任龙江省民生厅长任内的罪行：

一、出卖齐昂铁路。一九三七年夏，经我手把齐昂铁路出卖与日寇铁路总局。齐昂铁路，是在前清末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为八旗生计，召集旗人出银子三十万两，为三十万个股，由齐齐哈尔到昂昂溪修轻便铁路四十公里。伪满建国，把洮昂线接到昂昂溪，齐昂铁路事业被夺。又由齐齐哈尔通昂昂溪修平行的公路，使齐昂铁路陷于不能维持。由齐昂铁路局长孙伯威、副局长叶某，到民

生厅商议办法，召集股东会议，议决由我和股东代表关小权，到伪满交通部要求办法。交通部长主张出卖与铁路总局，股东代表关小权承认了。以后由交通部通知以十三万元国币出卖齐昂铁路全部财产，因齐昂铁路年久，股票多散失，登记的股票，只有十三万股，遂由民生厅行政科监视，分给每一股一元钱了事。因当时的股东没有争讲的能力，我又怂恿他们出卖，遂把股本三十万两银子，时价六十万元（银子时价每两国币两元）的铁路，十三万元就出卖掉了。仅表面数字如此，实在使股东的路权损失不可估计，又把主权出卖与敌人，我是有责任的。

二、帮助日寇买学校用地。"九一八"后，日寇到齐齐哈尔，即强占齐齐哈尔市永安街奉天会馆，改建日寇小学校。一九三七年伪满地籍整理局，认为日寇小学校产权不确立，日寇居留民会长东某，到民生厅求我为他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奉天会馆的，原有房子十余间被拆毁，地约六千平方公尺，当时价值五万元钱。我用厅长的背景，使奉天会馆的代表刘德权以五千元钱就卖掉了。这是我为日寇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损失。

三、开卖吗啡。一九三七年夏，民生部禁烟科长近森某到龙江省公署，在省会议室召省次长神尾弌春、总务科长今吉均、警务厅长栗山茂二等，宣布伪满禁烟法。根据禁烟法规定立戒烟所，并配给吗啡，使吗啡瘾者登录，以便给瘾者戒除。说的话是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开卖吗啡。制造吗啡瘾者，与鸦片同样剥削毒害人民。齐齐哈尔市鸦片瘾者约四千人，有八成倾家败产的。无能力吸鸦片的人，就变成吗啡瘾者，不可救药，死而后已。我执行这个政策，我有责任。

四、新学制实施。一九三七年夏，伪民生部颁布新学制。新学制施行所谓实务教育，国民学校四年毕业，优级国民学校二年毕

业，使学生没有预备升学的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四年毕业，都设专科。齐齐哈尔市三个国民高等学校，一个是农科，一个是工科，一个是商科。其他如洮南、克山国民高等学校都改为农科。没有专科教员，各学校都以实习为名，不上功课，从事劳动，学生文化程度自然低下，完全是奴化教育。又宣布日语为国语，使学生彻底〈接受〉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教育。所以新学制就是教育驯服为日寇奴隶的人。我是民生厅长，实施这个新学制我有重大责任。

五、庆祝祖国败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场镇被日寇攻陷，龙江省公署次长尾弌春与总务科今吉均等，发起召集市民及学生在省公署前开庆祝大会。我是民生厅长，参加这个会，并对市民学生说话一次。我说话的大意是"新闻记载南京有三大，大楼房、大汽车、大马路，蒋介石不顾民间生活，自己阔绰，应该打败，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享安全生活，应该庆祝"的谰言。祖国人民流血战争，我恬不知耻，和日寇一同庆祝，今天对人民认罪。

一九三八年八月任专卖总局长任内的罪行：

一、专卖聚敛侵略资金。我任专卖总局长，副总局长山梨武夫，庶务科长村田某，烟政科长天野作藏，食盐科长高谷太二郎，火柴科长谢生霖，燃料科长平林并木。专卖品目是鸦片、食盐、火柴、石油、酒精五种。当时伪满总收入为三亿元，内国税一亿元，关税一亿元，专卖益金一亿元。我负伪满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鸦片收入为一半，约五千万元；食盐为三千四百万元；火柴六百万元；石油五百万元；酒精五百万元。这年由主计处要求增加五百万元，从鸦片加价。除鸦片在鸦片政策详述外，食盐收买价格，每一百斤仅一分钱，专卖价格每一百斤六元，每年每人配给二十斤，全伪满得吃盐的人口照三千万人，共为六亿斤，就是三十万吨。产盐地区为锦州、营口、复县、庄河四处，每处有约二千盐业工人。火柴、酒精、

石油内容不详。如此聚敛侵略用的资金，剥削人民，我负重大责任。

二、执行鸦片政策。伪满从一九三二年冬就大开多年的烟禁，公然贩卖鸦片以为财源。一九三七年夏，公布禁烟法，立禁烟委员会，规定十年断禁，实在是虚伪政策，变新花招，大卖特卖。我到专卖总局执行这个政策，今把一九三八年的鸦片专卖状况述于下：

1.鸦片的收买数量：伪满热河种鸦片五十四万亩，一亩规定收买十五两，共为八百万两，实在每年收买数量，不能达到标准量。一九三八年实在收买为六百五十万两，由朝鲜买二百万两，经三井洋行由伊朗买二百万两，由山西买来一百三十万两，共为一千一百八十万两。

2.鸦片的配给量：全伪满登录瘾者六十万，每人每年配给二十两，掺料子的鸦片需一千二百万两，内纯鸦片九百六十万两；二成料子二百四十万两，净余纯鸦片二百二十万两，为制吗啡用二百万两，其余二十万两为预备用，流于秘密贩买（如警察、特务、日寇宪兵队、特务机关都有私烟馆）。

3.阿〔鸦〕片的收买价格：热河农民的六百五十万两，每两二元钱，为一千三百万元；其他的五百三十万两，买价一两四元钱（大连三井运来的伊朗鸦片一两三元八角），为二千一百二十万元；料子每两价格五分钱，二百四十万两，为十二万元。以上共为三千四百三十二万元。

4.鸦片的专卖价格：配给瘾者价格每两八元钱，一千二百万两共为九千六百万元，去收买价格与料子价格三千四百三十二万元，净纯益金六千一百六十八万元。以上是表面上的利益，至于二百万两纯鸦片制造吗啡约六十七万两，每两四十元（伪满配给价）计算为二千六百八十万元，剩余的二十万两纯鸦片，加上料子二成，

私卖为配给价格一倍，为三百八十四万元以上，共为九千二百三十二万元，完全是剥削农民及瘾者的利益。

5.奉天专卖工厂：一九三八年秋，烟政科长天野作藏，引导我到奉天专卖工厂视察。厂内一个工厂密制吗啡，本年原料纯鸦片二百万两，生产率三分之一的吗啡，制成约六十七万两。当时全伪满吗啡瘾者二万人，每人每年配给约九两(每日一瓦)共为十八万两，剩余的吗啡移动均属秘密，推想为日寇军用或流入华北。又一个工厂密制料子，用多数大型蒸汽双底锅，日夜不停，以豆麦面粉掺上吗啡的渣滓做成像烟土一样包装起来，拿到制烟份工厂。制烟份工厂用机械把纯烟土切去二成，掺上料子二成，用机器混合后，作烟份小包，一个烟份约二分烟。这个工厂用工人约二千人，都是中国人，妇女极多。吗啡料子工厂技师、工人都是日本人。这个工厂还不足用，已竟预备增筑一倍，地基已经打成，预定筑成后作料子，把鸦片内掺加料子三成以上，吗啡也多制造，又计划烟份改作烟膏，增加收入。以上都是在我任内通过的计划。

6.热河收买鸦片的情形：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热河专卖署不直接收买农民的鸦片，组织了一个包收鸦片的公司，叫“大满号”。以外专卖署设缉私队，防止鸦片密输出，从一九三六年取消“大满号”，热河专卖署直接收买，有缉私队约五百人，并联合省县协助监督逼迫收买。对烟农规定的一亩地收十五两，达不到量时，受缉私队或县警察逼迫殴打，村屯长负连带责任，挨打的亦不少。这都是我给人民制造的苦痛。

7.我执行鸦片政策人民所受的灾难：伪满起初开卖鸦片时，设零卖所，无吸烟证可以随便出入吸饮，且设女招待引诱良民，卖粮的农民多被坑陷。把瘾者造成以后，每年每人配给量二十两，不够过瘾就私买鸦片，价格〈高出〉一倍以上。据民生厅调查，鸦片瘾者

十分之八倾家败产，最后堕落于扎吗啡，至于死亡而后已。人民陷入瘾者，他本身已成废人，连累其家，倾家败产，国家的单位家庭败亡，国家必至灭亡。前清鸦片战争，正是英帝国主义以鸦片灭亡我祖国的前例。日本武部、古海等，复蹈前辙，是灭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滔天罪行。我是中国人，忠实为日寇执行这个鸦片政策，毒害祖国人民，我比武部、古海罪加一等。人民既陷入瘾者，终至扎吗啡，卖妻卖子，是人道所不容。报载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四千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九百人。我执行这个政策，是违犯人道的罪行。

8.伪满在热河种鸦片的理由：伪满自一九三四年在热河种鸦片，别省不许种，其用意所在：(1)热河土地瘠薄，不生产粮谷与工业用农产品，使专种鸦片，留他省为日寇的食粮与工业用农产品的基地。(2)汤玉麟时代农民有种鸦片的经验。(3)热河为伪满西南国境，使种鸦片，不生产粮食，断绝抗日军的粮道，如此使热河人民不能得到足够的吃粮。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三江省长任内的罪行：

兼任协和会三江省本部长、兴农合作社联合会长，红十字社三江省支部长。

一、特务警察坑陷良民。一九三九年三月我到三江省，当时的警务厅长岛崎庸一就告诉我，佳木斯市内特务警察开私烟馆五家，教我不要管，并说特务机关与宪兵队都有几家私烟馆。以后我看佳木斯新闻载有出会局的赌博，我问岛崎，岛崎答也是特务方面作的。我知道的有复兴旅馆、大和旅馆，随便出入吸烟、开赌，坑陷良民。特务的目的是设陷井，以鸦片赌博为钓饵，以所得的钱雇间谍搜集情报。特务的胡作匪为，我不能制止，我有责任。

二、建筑东宫纪念馆。一九三九年春我到佳木斯时，就参加日

寇特务机关长兼伪满军顾问北部某主办的在公园内建筑东宫铁男的东宫纪念馆的地镇祭(开工典礼),三江省公署协助一切,到秋天建筑完成,落成典礼时,我亦参加。纪念馆有东宫的坐铜像,公园亦改名为东宫公园。东宫铁男为一九三四年武装移民,掠夺土地,制造土龙山事件的凶首,日寇称他为“开拓之父”,一九三七年日寇攻击祖国抗州湾上岸为先锋,被击毙。我参加为他修纪念馆,帮助日寇宣传移民侵略政策,我有责任。

三、日满开拓会议。一九三九年夏,被开拓总局召,出席东京日本拓务省所召集的日满开拓会议,我带开拓科长武光晃到东京。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给我的任务,是在开拓会议席上要求急速大量移民,不然预备大量的土地都撩荒了的话。开会的那天,出席的有日本拓务大臣小矶国昭主持,关东军第四课长片仓衷、农务大臣石黑正笃、开拓主张者加藤完治、日满开拓委员会委员稻垣征夫等。伪满出席的,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与我。开会的目的,是执行一九三六年八月日寇广田内阁在东京决定发表的开拓计划。这个计划是二十个年移民百万户五百万人,分四期移民,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为第一期十万户,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年为第二期二十万户,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为第三期三十万户,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为第四期四十万户。这次会议是关于进行方法的会议,会议通过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其内容如下:

1.满拓鲜拓之统合;

2.青年义勇队训练本部之结成;

3.义勇队响导训练所、鲜系义勇队干部训练所之设置;

4.为开拓团及训练所指导员的训练养成设开拓团指导员训练所,强化基干开拓民训练所;

5.为开拓团一切事项的综合科学的研究新设开拓研究所;

6. 为开拓地医疗的万全养成开拓医，设立佳木斯医科大学，哈尔滨、齐齐哈尔、龙井开拓医学院。

第一条，就是为自由移民于一九三六年设立的满洲拓植会社与满鲜拓植会社合并，一切开拓移民今后归开拓总局统一管理。第二、第三、第四条都是为训练开拓移民的素质。第五条为开拓的科学研究。第六条为开拓的医疗施设。在会议上，并规定经费由日满两国负担，移民在日本起身以前，召募训练经费日本负担，到满洲现地安居照料经费由伪满负担。当年十二月日满两国把这个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发表了。根据这个要纲，一九四〇年四月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本部设立了，六月满洲拓植会社与满鲜拓植会社正式合并为满拓公社了，同月开拓研究所设立了，佳木斯医科大学及其他医学院着手设立了。又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公布开拓团法，六月公布开拓协同组合法，十一月公布开拓农场法，从此开拓移民以法律固定下来。我参加这个会议，通过这个基本要纲，使日寇开拓政策加紧进行，人民遭受灾祸，我的罪恶重大。

四、执行开拓政策。省内有开拓厅，厅长是濑下清明、开拓科长武光晃，主管区划移民地区，指挥移民先遣队，建筑移民住宅等。建设科长金山某，主管由省县修往开拓地区的道路。农务科长山田熏，主管指导耕种方法及作物种类。畜产科长押谷七郎，主管对开拓民用的马匹及养猪、羊、鸡等。日寇移民团到来时，开拓科给各团组织共励组合，共同制造大酱、酱油、酒等，又组织消费组合，共同购买日用品、布疋等。并根据基本要纲，帮助设立医科大学，专收开拓民子弟，卒业后为巡回公医。又设大学附属医院，专收容开拓民患者。开拓厅每年开一次开拓团长会议，询问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无困难，为之解决。协和会省本部联合协议会时，使移民团作为代表，领导原住民。在佳木斯后宫公园的后宫纪念馆内设

移民宿舍，为移民到佳木斯时无偿住宿。

以上是我直接执行开拓政策的实施。其他关于开拓我所支持的数件列于下：

1. 青年义勇队。三江省开拓移民团，有青年义勇队训练所一个团，在依兰县东南千振开拓团南方，名叫“桃山青年义勇队训练所”，义勇队员约一千名左右，一九四一年夏我去看过一次，团长宗光彦对我说：“青年义勇队训练的目的，第一是国防上有关系；第二是训练出来的队员，渐次分散到开拓移民团内作中坚分子。”我对他们讲话一次，鼓励他们。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没有家族，全副武装。这种青年义勇队，我知道的三江省外，铁骊县有一个大训练所，嫩江县伊拉哈有一个大训练所，哈尔滨郊外有一个大训练所，都是在北满。听说全伪满已到的青年义勇队约一万五千人。他的企图，据宗光彦说的意思，就是训练出来的队员分散到开拓移民团领导各移民团，随时武装，待国防上有事时好用。就是准备对待苏联，以巩固它的大陆侵略政策。

2. “湿地干拓”。一九四一年春，土地开发会社社长梅野实到佳木斯，计划在鹤立县梧桐河支流、富锦县安邦河流域进行“湿地干拓”工作，为开拓移民用。经省开拓厅极力援助，到一九四二年鹤立县已完成水田八万陌。对修水库、道路，日寇包工使用由外省来的劳工三千人，听说吃不饱穿不暖，在水地工作，推想死亡率百分之五，一年死一百五十人，二年共死三百人。为日寇造开拓用地，使人民受危害，我有责任。

3. 压迫朝鲜民族。一九四二年夏，协和会开省联合协议会，有朝鲜人代表提出“原住民”作何解释。因为他们来住的年限早。我竟答“三江省没有原住民，原住民是赫哲人，其余的都是移民，汉民族来到三江省的老人，不过四五十年”的话。这就是拥护日本移

民,压制其他民族。

4.三江省移民政策对人民的危害。(1)收买土地时荒地一垧一元钱,买熟地三江省给时价的半价,佳木斯市外一百元钱一垧的地给半价五十元。(2)熟地被收买,移民到来,就得流离失所。(3)由省县道路修到开拓区的开拓道路,都是命令县出民工修的,对开拓民的便宜,奴役人民。(4)移民到来,由开拓总局每人给垫办费五百元,借给五百元(五年代还)。彼等多不劳动,暗中把地租出,享地主的权利,既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复看佃户把地种熟,把地夺回,另换荒地。(5)雇佣民工,给公定价格,每天一元钱(时价每天工钱五元到十元),不够吃食。(6)夏锄期间,千振移民团有到人民地内抓正劳动的人为他作工;不愿作的人,他告警察,诬为思想不良,被警察殴打(桦川县长林喜岳对我说的)。(7)人民习惯不论谁的草地都可随便放牲口,移民到来,他的草地内见牲口就抓了没收。

以上日寇为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九一八"后即公开地实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开拓移民,是强盗式侵略,先把土地占领,后把人民驱逐,弱肉强食,反宾为主。我自始至终帮助,拥护敌人这个政策,现在想想真是无心肝的人了,应负重大责任。

五、执行北边振兴计划。一九三九年秋,我由东京开拓会议回佳木斯,日寇三江省次长增田增太郎告诉我,中央规定在三江省实施北边振兴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的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企划处长古海忠之计划的。由一九四〇年起,每年给三江省一千万元,共三千万元,三个年完成,为特别会计,委托省开拓厅建设科实施,实施工作责任者,是建设科长金山某。工作项目是修警备道路,省与县间、县与县间共约三千里长;架设电报线与电话线,也共约三千里长;在约一千里长的国境上,修约二十里一个监视哨岗楼,共

五十个岗楼;修筑国境警察队厅舍、宿舍各十二处。这个计划,美其名叫“北边振兴”,用日寇包工,动用省内供出的劳工三万人,车马四百辆。劳工是各村屯摊派的,在其中以大、中、小队长管理之,倘反抗摊派,县就动用警察抓打,强迫就劳工。若中途逃跑亦用警察抓住,打后仍被强迫回队就劳工。因吃不饱穿不暖,按照一九四二年临时劳工的例推算,死亡率在百分之三,每年九百人,三年间共二千七百人。车马损伤在百分之五,共约六十辆。北边振兴的目的,很明显是准备进军用的设备,于人民毫无关系。且在诺门汗事件之后显然是预备进军苏联的。我执行完成这个计划,使人民受重大的灾难,我有重大的责任。

六、东亚教育大会。一九四〇年夏,由伪满中央民生部嘱我到日寇东京参加东亚教育大会。东亚教育大会是日寇“帝国教育会”会长永田秀次郎召开的,伪满参加的人我以外有民生部事务官日寇神是俊,率领全伪满中等学校教员四十余人;华北伪政权代表孙某外二十人;南京伪政权教育部次长戴英夫外二十人。在会上我曾发言说东亚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关系。开会完毕,率教员等参观文化施设、理化学研究所、音乐美术学校等。开会前曾率领教员等参拜日寇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归途参拜伊势神宫及橿原神宫。

七、经济统制。(1)一九四〇年秋加强经济统制,设立经济警察。佳木斯发给市民每月每人配给粮谷十三公斤,各家搜查一次,有存粮谷的家,粮谷多少都得记录,由配给量里扣除,严令今后私买粮谷为经济犯人。警察声明,今后不许吃大米白面,今后若有大米白面,亦为经济犯,受相当的处分。一九四一年以后配给粮谷减至十一公斤。(2)一九四一年夏,执行经济部七·二五令,统制现存的棉丝布,以公定价格出卖,若抬高价,就为经济犯,商家以高价买

来的货，都得受损失出卖，因此商家再不能得到货物的来源，人民得不到物资。我执行上司的命令，使商家破产，公利源百货商场为此赔三十万倒闭。这都是我给人民的痛苦，我有责任。

八、“粮谷出荷”。三江省农民“粮谷出荷”，一九四〇年责任“出荷”量为三十万吨，因为多年治安关系，日寇开拓买地关系，人民多逃亡，土地多撩荒，加上自一九四〇年二年间年年雨量太多，收成不好，到底不能拿出那么多的数量，因此不能完成任务，一九四〇年没完成一半的数十五万吨。一九四一年“出荷”责任量仍为三十万吨，从秋天就命令全省公署职员警察下乡催促“出荷”，我十二月初亲自到汤原县下耿贵屯外三处召集村屯长，说明粮谷不许私自买卖，都得卖给国家。省次长日寇畑勇三郎、民生厅长高元良，同伴到桦川县下村屯催促“出荷”，宣告吃粮种子都得先拿出来“出荷”，自己的吃粮种子后来再说。结果汤原县仅逼出来五六百吨，各县逼出来共有三千吨。因此方正县有因无法“出荷”吊死一人(县报告)，如富锦县长张廷陛报告，富锦县农民秋天打完场就没有粮吃，吃草根菜叶、哈蚂等。桦川县湖南营屯长报告，农民一天只吃一顿饭，吃的是糠等，农民都面黄饥瘦必至饿死。据以上情形推想，一九四〇年因“出荷”须死五万人，一九四一年就能死七万人。

九、赵尚志被害。一九四一年春，赵尚志在鹤立县被害。警务厅长田中要次召鹤立县长马某来领赏金。马某对我说赵尚志遇害的经过：鹤立县密探发见赵尚志同四五人入境，派密探刘景山接近赵尚志，伪装当年赵尚志抗日时的部下，赵尚志不疑，使刘随从，并给刘一杆枪。一日晚，刘引导赵尚志等袭击警察派出所，将近派出所时，刘突然开枪，把赵尚志及王某打倒，赵尚志同伴姜某当即开枪，把刘景山当场打死，把重要的东西与大枪拿去逃走。派出所的

警察听枪声到现场，当时王某已死，赵尚志还没死，手拿手枪说："我是赵尚志，你们去请功罢。"把枪擦下后，听警察里有说日本话的，赵尚志又说："我早知有狗子，我早把他打死了。"马县长又说：赵尚志第二天八点钟死了，衣兜里有刻赵尚志名戳一个，炸弹十枚。鹤立县找刘景山家属，要给他抚恤金，到底没找着。马领赏回去，不数日赵尚志与王某的尸体运来，找赵尚志原来部下的营长李华堂来证明，我也在场。李华堂看见赵尚志的尸体，大叫一声："司令，你到底这么样了么！"掉了几个眼泪。李华堂指出赵尚志左眼有伤痕，证明的确是赵尚志。我问赵尚志的岁数，李答三十一岁。赵尚志与王某都穿日寇兵的黄呢子军服。后田中把赵尚志的头锯下来，装木匣子里送长春治安部。我的部下把赵尚志害死，又以我的名义赏害赵尚志的县长马某，所以赵尚志被害，是我的责任。

十、鸦片瘾者再登录。一九四一年春，伪满中央民生部禁烟总局来命令，鸦片瘾者再登录。一九三七年伪满鸦片十年断禁时，登录瘾者全伪满六十万人，若真断禁，就无再登录的必要。这次命令再登录，明明是制造瘾者，贩卖鸦片的主义。佳木斯原有瘾者三千人，再登录的结果添了三分之一，到四千五百人。执行这个政策毒害人民，我负责任。

十一、为日寇军需买肉鱼。(1)收买猪肉。一九四一年秋，省次长畑勇三郎与畜产科长押谷七郎，通过我为日军买猪肉两万斤。每斤猪肉时价一元钱，照公定价格一斤五角强制收买，共约二百头猪，由佳木斯市桦川县、富锦县、依兰县担任供出，使人民损失一万元。(2)收买鱼。一九四一年秋，日寇关东军的"御用商人"林兼商店，得省的许可，到抚远买大木〈马〉哈鱼，抚远副县长兼警察队长太田昌雄，强制渔民把六元一尾的大木〈马〉哈鱼一元一尾卖给林兼商店，渔民因有警察的逼迫，不敢抗违，竟照太田所定的价钱卖

了,共二十万尾,使人民损失一百万元。使渔民受大量的损失,我负责任。

十二、征兵检查。一九四〇年四月,伪满实行国兵法,我是省征兵官。省民生厅设兵事科,调查壮丁的年龄、家庭成分、文化程度,并为征兵检查的一切预备。三江省一百三十万人口,壮丁约一万人,检查的结果,每年约一千人合格者。一九四一年我到佳木斯市与桦川县共同检查场看一次,合格者二百人。一九四二年春,我到鹤立县征兵检查场看一次,合格者五十人。我执行征兵检查官的任务,为日寇增加后备力量。

十三、设孤儿院。一九四一年春,协和会嘱托日寇重冈正树在佳木斯市设孤儿院,起名叫"立正孤儿院",已经收了二十几名孤儿。我当时为他捐钱,又支持他唱义务戏,卖红票捐款两万元。他在佳木斯市西侧盖房子二十间,教孤儿练习种庄稼。以后才知道他立孤儿院的目的,是教养为日寇开拓移民使用的奴隶。我支持这个伪善的人,我有责任。

十四、临时劳工供出。一九四二年夏,日军在依兰、汤原境内修军用飞机场,日寇陆军大佐太田勤到省公署见我与省次长栗山茂二,要求供出劳工三千人,我与栗山答应他了。遂定由佳木斯市出劳工一千名。其他二千名摊派各县供出,约定每人每日给粮食一公斤,菜钱两角、胶皮鞋一双,三个月完工。劳工供出一月后,我到现场依兰县二道河子、三道岗两处视察一次,有日寇包工在场监督,粮食不给足数,菜钱完全没给,食盐、胶皮鞋也没给。三道岗的劳工是富锦县供出的,三百余人,都赤脚在碎石子上劳作,把足指扎破流血的人大半,队长把劳工集聚一处,我与他们讲话,都一齐给我跪下,哀求给胶皮鞋。队长对我说:"吃食不够,菜不但没有,连盐都不给吃,劳工足破流血,困苦万状,且住在席棚里,不能遮

寒,现在三百人就跑了三十多人了。"〔中略〕三个月后完工时,死亡率约百分之三,三千人能死亡一百人。为日寇修军用飞机场,使人民遭受痛苦,我负重大的责任。〔中略〕

十六、佳木斯检举案。一九四二年十月,佳木斯铁道警护队长牛方一角,因有由山东来的尹某到兴山镇,被铁道警护队逮捕,说他有八路军的嫌疑,拷打追问他认识的人,渐渐株连到佳木斯福祥泰主人徐绍禹、同义合主人张秉权,把他二人逮捕,在警护队吊打,用火钎子各烙两胁〔肋〕,徐绍禹不能忍,承认是八路。张秉权在旁看徐受酷刑难堪,没打就承认是八路,说在福顺泰主人商务会长曲恩远家开会等话。因此佳木斯市商务会长曲恩远、副会长张元度等都逃往哈尔滨。此外共逮捕二百多人。〔中略〕在狱约半年,死过某外三人。三江省出这样的大检举案,使人民受痛苦,我有责任。

十七、协和会。一九三九年春我到三江省即兼协和会三江省本部长,到一九四二年十月离三江省为止。所作的工作,在省内各学校执行青少年训练,训练与日寇一德一心,尊重唯神之道,每日在学校朝会时,遥拜建国神庙,遥拜宫城(日寇天皇),遥拜皇居(伪满皇帝),使青少年彻底驯服日寇。其次是青年训练,各县立青年训练所训练国民学校毕业未升学的青年。训练期间两个月或三个月,训练成为村屯的中坚分子,遂行国策作人民的领导。又其次组织义勇奉公队,在地方担任警备传令、防空演习或监视粮谷移动等事。每年春季领导各县村屯协和分会选出分会代表,到县本部开县联合协议会,使代表的思想统一,赞助遂行国策。由县联合协议会选出代表,到省联合协议会。我是省本部长,开会时取代表的讨论形式代表人民的意志,赞成国策,再选省代表出席全国联合协议会。凡危害人民的粮谷"出荷"政策,劳工政策都伪造民意,说人民

自愿。我执行这种欺骗人民的协和会政策，负重大的责任。

十八、兴农合作社连合会：一九四〇年春，兴农合作社中央会派来理事日寇原宗吾，强化各县兴农合作社。在省立连合会，我担任连合会长的名义，在各村屯组织兴农会。所作的工作，是收买“出荷”的粮谷，代农民买农具，春天代办春耕贷款给农民，秋天在粮谷“出荷”时本利扣去，就是剥削机关，强迫农民买不适用的农具，富锦买的犁仗，不能使用，都挂在墙上；镰刀亦都掉牙，不能用，甚至农民不希望的东西摊派逼买，如汤原农民不要麻袋、扫帚，运来麻袋、扫帚若干，逼农民买，所以农民都叫“倾农合作社”。我担任连合会长，作倾农的事，我负责任。

十九、三江省红十字社支部：一九四〇年春，我被伪满红十字社嘱为三江省红十字社支部长，有主事加藤某，每年劝人民捐款。其捐法是捐二十五元(零捐每年纳三元十年纳完)的，给正社员章，捐二百元的，给特别社员章，捐一千元的，给有功章。一九四〇年在佳木斯捐三万元，一九四一年捐约四万元，一九四二年捐七万五千元。以博爱为名，实在是增加日寇侵略的力量。以我的名义，帮助日寇榨取人民的钱财，我有责任。

二〇、省长会议。(1)一九三九年秋，由伪国务院召集省长会议，当时主持的以张景惠名义开会，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各部伪大臣列席，其外有关东军第四课长黑川某，伪满军最高顾问松井太久郎。开会时，照例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训示外，各部大臣指示各部的施政方针，以后各省长报告各省的情况。两日间会议完了。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件，是张景惠和星野的训示中，有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满洲国负粮食基地的责任等话。产业部大臣吕荣寰指示，从今年起粮谷统制，公定价格收买，大豆价格为每百斤七元钱，其余粮谷以大豆为标准定高低。乡村农民的

粮食，同村内可以有无相通，不准向外村买卖。都市配给粮食，每人每月十七公斤。各省长唯唯听命。省长报告都是敷衍了事，没有甚么特殊的事。惟安东省长丁超，为水丰电水没地，争论给民地价钱太低，愿出老命与政府争，当时也未得确答。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负粮食基地的责任，省农务科定佳木斯市配给粮食每人每月为十五公斤。日寇对祖国侵略，我为日寇供给粮食，把每人每月应该配给十七公斤的粮食改为十五公斤，对人民惭愧无地。(2)一九四〇年秋省长会议的召集与前相同。总务长官换武部六藏，产业部改为兴农部，换于静远为兴农部大臣，吕荣寰为民生部大臣，经济部大臣韩云阶退职，换蔡运升，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黑川某，伪满高级顾问花谷正在场。开会时，照例张景惠、武部训示外，各部大臣指示各部的施政方针。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件，是张景惠、武部的训示中，强调伪满皇帝建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告全人民应致崇敬，并对东亚新秩序全人民应负粮食基地的责任等话。治安部大臣于琛澂指示国兵法实施的事。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指示粮谷“出荷”要格外努力。经济部大臣蔡运升指示经济统制今年加严。省长报告又是敷衍了事。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奉行惟谨，建神龛于省长办公厅，每节率职员必拜，每朝率职员遥拜建国神庙，协力征兵检查，粮谷“出荷”特别努力，把市民每人每月配给粮食降为十三公斤，经济统制又加紧一步。(3)一九四一年秋，省长会议的召集与前相同。关东军第四课长换小尾某，民生部大臣换谷次亨。开会时张景惠与武部的训示与去年相同的意思。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是民生部大臣谷次亨指示劳工法，对全东北二十三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征发二十四个月以上的劳动。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指示今年早期“出荷”，须加紧负粮食基地的任务。经济部大臣蔡运升指示要实行经济部

的七·二五令。各省长报告，又是敷衍了事。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预备实行劳工法，奴役省内人民，对粮谷“出荷”，省职员总动员下乡催促“出荷”，我亲到汤原县乡下催逼“出荷”，今年又把市民每人每月配给的粮谷量降为十一公斤。(4)一九四二年夏，省长会议召开，亦与前相同。参加的人亦与去年相同。开会时张景惠、武部的训示，强调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皇军的胜利，我们奉行时局诏书“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帮之战”的圣旨，把全国的一草一木都得供给皇军等话。兴农部大臣于静远指示建设大东亚共荣国，我国负粮食基地的责任如何重大。民生部大臣谷次亨强调现时劳工的重要，劳务管理的重要。经济部大臣蔡运升指示，加紧经济统制。各省报告依然敷衍了事。我接受会议的结果，回省只是加紧经济统制，使商家的存货照七·二五令的公定价格出卖，粮谷“出荷”加紧预备工作，劳工亦努力供出，以前没出过劳工的佳木斯市，修飞机场亦供出一千人。〔中略〕

一九四二年九月任总务厅次长任内的罪行：

一、建国大纲。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任总务厅次长时，古海忠之交给我建国大纲的稿本教我看，问我有没有意见。我看完了，我说没有意见，遂于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公布了。这个建国大纲，内容是开发产业，发展交通，普及教育等，就是日寇侵略东北的方针，我通过了，我有责任。

二、国民训。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总务厅小会议室，开国民训最后决定的审议会，武部六藏主持，参加的二十余人，中国人我以外，协和会参加的是曲秉善。国民训的稿是五项，第一项“国民须知满州建国由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建国元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当时武部提议“建国元神”不如明显改为“天照大神”，我无异议通过了。第三项文中有“以礼让为旨”的句，我建议“旨”字中国

话不好讲，应改为“先”字，众无异议，遂通过了。国民训于十二月八日以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名义公布了，国民训是给人民加上重大的束缚，一有不慎，即能招来思想犯的危险，我参加审议，我有责任。

三、火曜会议。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火曜会议之成员，武部六藏为主席，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参谋，伪满军顾问部高级顾问加藤大佐，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松木侠、卢元善，治安部次长涩谷三郎，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交通部次长田仓某，司法部次长前野茂，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外交部次长三浦某，经济部次长青木实，兴安局参与官河内某。各部提案者，说明提案的理由，经参加者审议，武部六藏裁决，即通过。通过这个决议以后，国务院会议及参议府会议均属形式。这个会议就是伪满的立法机关，这个会通过谁也不能更改。这个会议的召开，武部六藏以外，谁也不能召开。我当总务厅次长，参加这个会通过的重要案件如下：

1.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提出国民勤劳奉公案及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内容是二十岁以上的壮丁征兵检查不合格者，所谓“国兵漏”服劳工义务三年，一年间六个月，六年完毕。会议通过后，得全伪满三十万人的壮丁劳工，无代价〈受〉奴役到各厂矿就劳。

2.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参谋提出建议，要求粮谷“出荷”在原八百万吨基础上增加二成。武部以下各次长都没有言语，他特别对我说“日本每家都有出征的，与日本一德一心的满洲国人，多出二成粮谷，不算甚么要”。我说“若有粮，可以出”。以后没有兴农部提案实行。到一九四三年增加“报恩出荷”三十万吨。小尾的话，虽没当时见诸实行，但是我赞成他的意见，就是危害人民的行动。

3.经济部次长青木实提出税法修正案，内容是烟酒税加一倍以上，食盐专买每担加价两元。新设通行税（火车、船票加税）、游兴税等，地方税实施户别捐。如此加重人民负担，从此人民经济力日趋薄弱。

4.武部六藏提出实行制国民手账，使各个人花钱领手账一本，注明本人的姓名、年龄、职业，若无手账的人，警察抓住，不但没有领粮谷配给的资格，而且送去作劳工。实施的结果，被抓的人吗啡瘾者很多，待遇极坏，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三年抓了三万人，就能死一万五千人。

5.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提出增产棉花案，内容是原来伪满产棉花二十万担，从今年增产三十万担，一九四四年增产到四十五万担，一九四五年增产到六十万担为止。实施的结果，农民种棉花由棉花会社指定，会社经常有人住在农村监督指导，农民要担负很大的供应，秋后棉农生产完不成责任时，会社逼迫，甚至有把自己的被褥棉花拆出交给的。棉价每斤平均定价四角，种棉的农民卖了棉花，不够买吃粮的，这是给人民的灾难。

6.治安部次长涩谷三郎提出设立警务总局要纲，内容是把治安部内的警务司废止，新设立警务总局，为总务厅直辖机关。实施的结果，加强警察，警察担任地方治安，如热河的省长、次长、警务厅长等，都调换由警务出身的姜全我、岸谷隆一郎、皆川富之亟担任。增加警察两万人，作肃清工作。一九四三年协助特务宪兵队检举热河光头山附近各县爱国人民一千五百人，其他如哈尔滨，一九四四年春检举五十人，勃利一九四四年夏检举二十人，同江一九四四年冬检举七十余名，通河一九四五年春检举二百人，长春一九四五年夏检举二十人。都是强化警察的结果。

7.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提出设立文教部要纲，内容是把民生

部内的教育司废止，新设立文教部，部内设官房（庶务、会计、人事三科）、教育司、教学司、礼教司、监察部、编审部等。

以上是我参加火曜会议通过的残害人民重要案件，我负重大责任。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任内的罪行，兼任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

一、文教部设立的意义与经过：一九四〇年秋，武部六藏任伪总务长官，就注意统制人民思想，先作国歌（一九四二年建国十周年时）"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使人民歌诵日寇的"神光""皇猷"。又作国民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公布）"满洲建国，由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使人民时常读诵。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为加强奴化教育，把民生部内教育司扩大为文教部，对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归统一方针之下，以便奴化人民思想，以供驱使。任我为伪大臣，由日寇文部省派来有殖民主义教育经验家田中义男为伪次长，执行这个奴化教育政策。

二、文教部机构：大臣、次长、官房（庶务科长三轮健儿，后换斋藤某，会计科长田中某、人事科长佐藤某）、教育司长木田清，后换津末圭二、教学司长佐枝常一，后换小野正康、礼教司长耿熙旭、学生勤劳奉公司长崔正儒、监察部长饭冢富太郎、编审部长寺田重喜郎，以外科股若干。

三、文教方针：仿照日寇的天皇制教育，伪满是以伪皇帝制教育。聘请日本神学专家小野正康为教学司长。设立文教审议会，审议文教方针，以取人民的信用。文教审议会是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会长，我是副会长，聘请所谓当时名流及教育家，如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建国大学副长尾高龟藏、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各部大臣、王道书院长日高丙子郎、四平省长曲秉善、吉林师道

学校长张文明、齐齐哈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长田树棠等。审议文教部提出的文教方针原稿，共开会两次，议决以国本奠定诏书“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培国本于惟神之道，振国纲于忠孝之教。”为根本的惟神之道为文教方针。

四、实施方法：

甲、对社会人民：

第一，绞杀人民的思想言论：

1.出版统制委员会：总务厅弘报处立出版统制委员会，凡有欲出版的刊物，不经出版统制委员会检查，不得出版。

2.思想矫正法：我的学生清原县行政科长阎传贤之子，喜好作小说、著作名叫《陆藏》于一九四四年夏突然被盖平县警察逮捕，说要送思想矫正局。

3.治安维持法：这个法自第一条到第九条凡有反满抗日思想行动都处以死刑，即轻微犯的，亦治以相当的罪。一九四一年铁岭市长徐渐九，召集市立学校校长、教员，讲惟神之道，开会完了，晚间宴会后，徐与少数教员闲谈，某校长问徐市长“惟神之道是怎么回事”，徐答“就是老张家的神拿到老李家来供了”。这个话被特务听去，把徐和教员等都逮捕去，拘留十余日，徐承认他说这个话了，结果徐渐九被判处徒刑七年。

4.文教部设宗务官王承杰、伊藤某，调查宗教，把佛教、道教置于神道之下，其他视为邪教，逐渐取缔。如红万字会、五教道德院、同善社、万善会、一贯道、九宫道等，都在取缔之例。一九四四年秋，把德都县五大莲池万善会的铜神像二百余个（每个约五百斤）献纳为日寇军用，就是借取缔邪教而实行的。

5.中国人崇信的孔教，极力辟除，现在存在的祀孔典礼，到一

定时期即将废止。

6.汉字限制使用，强化日语为国语政策，制定略字，如日本字母一样。一九四四年敕令语学检定规则，立语学检定试验委员会，委员长是我担任的，委员是各官厅精通日语的中国人或精通华语的日本人充当，如总务厅秘书官中岛比多吉、事务官仓冈某、庶务科长王维常、练成科长傅士俊、文教部教学官马龙骥等，都是委员，每年对检定志愿的公务员施行检定试验一次，分为特、一、二、三等，被检定试验合格的人，特等每月加津贴三十元，一等二十元，二等十元，三等五元。这是限制汉字，强化日语为国语的实施。

第二，灌输奴化文教方针思想：

1.使官厅协和会朝会或开会时唱国歌，读国民训，读国本奠定诏书，宣传惟神之道，各官厅或建小庙，或设神龛，使人每过必拜。

2.文教部礼教司社会科，召集过两次宗教教化团体会议、佛教总会长如光、道教总会长房理家以外，红卍字会、道德会、五台山慈善会等，开会时宣布伪满国是惟神之道，各宗教教化团体无论自己的教义如何，都得唱国歌，读国民训，崇敬惟神之道。

3.准备修建国神庙于净月潭的宽大地方，使人民参拜信仰神道，将来改革人民风俗习惯，如结婚采取日寇的神前结婚方式，并发行神符，使人民拿到家里供奉。

4.文教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公布社会教育基本大纲，使家庭与社会广范围的联系，宣传惟神之道，进一步实行一德一心的社会教育。其实施方策概如下：

(1)设日满文化协会，会长是荣厚，每月发刊杂志，供给日本、伪满人民阅读，介绍人情风俗，灌输神道思想。

(2)满洲文艺协会，会长是赵鹏第，调查改革戏剧与歌曲，由中国旧剧渗透神道。

(3)满洲映画协会,理事长是甘粕正彦,检查剪裁外来的影片,制造伪满影片。

(4)文教部嘱托考古家神尾弌春,考察东北古都遗址,高句丽丸都辑安、渤海国上京东京城、辽的上京林东、金的上京阿城等,预备出小册子,伪造满洲与中国分离的证据。

(5)文教部嘱托三宅俊成考察古物保存,调查辑安的高句丽古坟、辽阳汉古坟、热河八大庙及其他古碑古塔等,热河故宫康熙时代的铜亭子,献纳与日寇军用,就是他干的。

(6)文教部嘱托泷川政次郎博士拟建设大的图书馆,现有的沈阳图书馆、吉林图书馆、齐齐哈尔图书馆,预备整理扩充,特别对日本出版的日文书,预定大量输入。

(7)文教部嘱托藤山一雄、远藤博士,新创建大规模的博物馆。现有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博物馆亦扩充,使有带日本彩色的设备。

(8)文教部礼教司社会科每年开书画展览会,由日本聘请画家山口逢春当审查员,募集书、画、雕、塑四种,分等给奖。所书的字都是颂扬日寇"神道"或"皇军胜利"的词句,画的画,也是有日本风味的得奖。

(9)预备设立音乐学校,输入日本的歌舞。

(10)文教部礼教司研究礼法,对人民的冠、婚、丧、祭,预备制定统一的礼法,使人民遵从。

乙、对学校学生:

第一,绞杀教员学生的思想言论。

1.文教部内编审部编纂教科书,国外的教科书、参考书,使学生不得入目。并改编教科书,使合乎神道教育。因为以前的教科书是在有建国神庙以前编审的,这次改编新教科书,对日寇"皇室"伪满"帝室"关系特别注重,教授要目已竟作成。

2.强化大学机构,限制留学生到外国。伪满建国当初,在日本留学生有二千人,到一九四四年仅余四百人上下,北京留学生当伪满初期有一千人,一九四四年不过三百人。最后准备禁止留学,怕学生受思想的传染。一九四二年日本留学生十数名,被日寇东京警视厅检举,送回伪满,有阮振铎之女,曹秉森之子,李叔平之子。李叔平之子被判处徒刑七年,"八一五"仍在狱中。

3.文教部有监察部,专监察全伪满的教员学生思想。一九四四年春,齐齐哈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长田树棠外二十名被逮捕。一九四四年春,四平市师道学校学生,为邮局邮来反满抗日传单隐匿,被逮捕学生及卒业生傅家屯小学校教员杜某二十余名。一九四五年夏,长春警察逮捕法政大学学生二十余人,有文教部职员二名在内。前文教部及民生部教育司都有监察部的设置。

第二,对教员学生灌输文教方针的思想。

1.使各学校院内建设小型庙,供天照大神,使教员学生每过必拜,每日朝会唱国歌、读国民训,学校行典礼时,读国本奠定诏书。

2.一九四五年春,立文教审议练成所,所长小野正康兼任。按期召集全伪满国民学校及国民高等学校教职员到所受训练,每期两个月(按照教员等文化程度可延期四个月)五十人,专训练惟神之道。

3.精神教育。

(1)根据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銮训民诏,"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应与其臣民一德一心",使学生与日本一德一心,民族协和。

(2)根据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五日的国本奠定诏书,"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培国本于惟神之道,振国纲于忠孝之教",彻底服从惟神之道。

(3)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时局诏书"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使学生对日寇劳而无怨。

(4)根据一九四二年建国十周年的诏书"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使学生称日本为亲邦,驯服地永远孝敬日本。

4.劳作教育。

(1)军事训练:实行使学生当炮灰的预备。文教部一九四四年春,嘱托日寇伊藤大佐,专门监督各大学中等学校军事训练,使各学校配属军官的训练科目强化。一九四四年秋,曾召集各大学学生两万人作大演习一次,实行野营、阅兵、分列式,文教部作出战时体制教育。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进军东北,建国大学副长尾高龟藏逼学生往磐石县作通化的防御线,佳木斯医科大学学生被调到牡丹江待机,都是实例。卒业生每年充当国兵的约有三万人。

(2)勤劳奉公:一九四四年冬,公布学生勤劳奉公法,部内设学生勤劳奉公司,司长是崔正儒。使大学学生两万人,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十六万人,共十八万人到各厂矿作劳工,每年四个月为一期,三个年完了。国民学校学生约一百万人(全学生的半数)在地方各省市机关酌量勤劳奉仕。文教部发布学生勤劳奉仕规程,指示勤劳奉仕范围与管理方法,实施的结果,各厂矿没有安全设备,没有卫生设备(连口罩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到西安煤矿,看学生在坑内钻岩石层,黄土扑面,学生都面黄饥瘦。这个矿因坑木不足,不能按规矩安坑木,隔一安一,可能有冒顶的危险。当时西安县长对我说,西安煤矿地盘土松,常出危险事故,平均一吨煤死一个人。到阜新煤矿坑内,看学生在煤层中钻煤,煤尘四起,呼吸困难。在辽阳制麻袋厂,看学生在尘埃中劳作。在辽阳制火药厂,看学生有中毒的现象,头痛的很多。在抚顺看制铝板工厂,学生作力量不能作的劳作,累的严重。所以学生勤劳奉公疾病死亡率至少

在百分之零点五。国民学校学生，在地方勤劳奉仕，采山葡萄叶、捕兔等，爬山越岭把衣裳鞋戳破，手足受破伤的很多。

五、日满华协和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我以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福冈，参加日寇大政翼赞会召开的日满华协和会议。同往的有伪满政府代表古海忠之、协和会员唐树尧。在博多旅馆开会。日寇大政翼赞会代表宫田光治外三四名，南京伪大民会代表南京市长周学昌外二名，北京伪新民会代表喻某外一名参加。开会由宫田光治主持，宫田说“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是日满华三国共同的责任”的话。我说“东亚唇齿相关，辅车相依，满洲国是粮食基地，愿负责任”的话。当晚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古海忠之对新闻记者发表“没有满洲国供给粮食，大东亚共荣圈就不能建设”的话。

六、国务院会议：我由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八一五”每星期三参加国务院会议。这个会议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其次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外各部伪大臣参加。今把我所参加通过的重大案件述于下：

1.思想矫正法：一九四三年四月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提出思想矫正法案，设立矫正局，附设辅导院，目的是检举所谓“浮浪子”及“劳动避忌容疑者”。在矫正局权限下，检举送辅导院强制劳动。这个法案通过后，在长春设立矫正总局，局长是中井久二，各都市有分局，设立辅导院六处，在西安、本溪、抚顺、鞍山、鹤冈、鸡西各地。一九四四年春，辅导院建成，一齐检举行路的人或坐火车旅行的人，逮捕后不通知其家属，迳行送矫正局，再送辅导院，强使作劳工，待遇恶劣，吃食太少。民生部参事官王贵昌曾去看过一次，看见吃的是米汤一样的稀粥，有一人领到一碗稀粥，又希望添一点，惹起配给人发怒，把他的碗打掉地下，全不给了，那个人只得叫苦

挨饿。如此食量少，加上重劳役，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每个辅导院能收容三千人，六处共约二万人，就得死一万人。我通过这个惨无人道的法案，我罪恶重大。

2. 扩大种鸦片区域：一九四三年四月，武部六藏提出扩大种鸦片区域，热河而外奉天、吉林、四平三省，立生产鸦片组合，强租民地，由生产鸦片组合中央会管理。实施的结果，中央会理事长是海村园次郎，在乡下挂生产鸦片组合的牌子，三个省十五个组合，一个组合租三千亩土地，共四万五千亩。被夺土地的人民约三千人，都得失业(每人十五亩地)，奴役人民，常工亦约三千人，临时工须四万五千人。听说沈阳东杨官屯生产鸦片组合种二十垧地(每垧六亩)鸦片，动员全屯六十家妇女学生为它们收割鸦片，说是勤劳奉仕，大量生产鸦片。

3. 土地造成：一九四三年夏，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提出土地造成案，在郭前旗、东辽河预定收买三十万垧土地造成水田，生产稻米一千万石，供日寇国里食粮。实施的结果，土地已买成，地价是三十元到六十元钱一垧。听说郭前旗作水库，使人民流离失所五千余户。为供给敌人食粮，使人民遭受灾难，通过这个的我有责任。

4. 摊派储蓄：一九四三年秋，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提出储蓄，定为本年储蓄额十六亿。通过后施行的结果，农村被摊派二亿元，中央银行出四厘公债券，兴业银行出储蓄公债券，公务员的年末赏金都被给债券一半，各家由邻组每月摊派一元钱一张的小储蓄券，我家一个月被摊派十五元。听说扶余县各国民学校由教员摊派给学生，使学生用钱买小储蓄券。这个小储蓄券不能使用，凑多数，到兴业银行换储蓄债券。一九四四年提出的储蓄额为三十亿，农村被摊派四亿元。小额储蓄券范围更广。如此聚敛人民资金，我

支持通过这个案，我有责任。

5.勤劳部：一九四五年春总务厅武部提出官制修正，民生部废止，国民勤劳奉公局扩大为勤劳部。这个勤劳部的设立，是加强劳工的管理。根据以前的劳工法，自十八岁以上到四十五岁的摊派劳工，约一百五十万人。国民勤劳奉公法的壮丁劳工三十万人，勤劳奉公的学生十八万人，都归勤劳部支配。使摊派网密，不使逃脱，不使窝工。除学生由一九四五年开始实行外，其他都是由一九四二年继续执行的。由于各厂矿没安全设备，没有卫生设备，吃不饱，穿不暖，鸡西煤矿一九四四年因发生斑疹伤寒，一时就听说死五百人，宁安县长刘长贵往鸡西慰问自己县出的劳工，被传染身死。锦西县人王克镇对我说“锦西县今年(一九四四年)出劳工二千人，到牙克石(大兴安岭海拉尔间)作日军阵地工事，没回来一半，出劳工的家，劳工走的时候，就烧纸送了”。勤劳部成立也不能改善劳工生活，伪大臣于镜涛由鹤冈拿来劳工吃食的样子发霉的苞米面子，不是人能吃的东西，所以劳工的死亡率至少在百分之五。

6.禁烟协会：一九四五年春与民生部废止同时，禁烟总局废止，立禁烟协会，理事长植村某，副理事长刘绍衣，是半官半私的组织。为便宜鸦片的处分，这时热河省产仍为八百万两，兴安西省开鲁与奉天、吉林、四平三省所产的鸦片约一百万两，由朝鲜买二百万两，共为一千一百万两，掺上料子五成，为二千二百万两。鸦片瘾者八十万，照原配给量每人每年配给二十两，为一千六百万两，尚余六百万两，或去华北，或去上海，都由禁烟协会处分。伪满以禁烟的烟幕，既流毒于东北，又改换机构的招牌，流毒于中国中原。我支持通过这个提案，我有重大的责任。

〔下略〕

119—2—1153，1，5

罗振邦笔供

(1954年10月27日)

我一八九五年六月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个人成分伪官吏。同年冬我父母带我迁移到海龙县,一九〇四年入私塾读书,一九〇八年入海龙县立小学校,一九一一年入海龙县中学校,一九一五年毕业,同年七月任海龙县朝阳镇小学校教员。一九一七年由海龙县考送日本留学,同年四月到日本东京,入东亚预备学校。一九一八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学五年,一九二三年三月毕业。

回国后,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任奉天省视学,同年九月调任奉天市政公所教育课长,一九二七年三月任东三省交涉总署政务处长,同年十月调任沈海铁路局总务处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调任吉林省交涉署第二科长,一九三〇年九月任吉长铁路局秘书兼稽核课长。"九一八"事变被日寇强迫离职。

事变当时我在北京,为了敦图铁路连轨问题,我随郭浚忱吉长铁路局长到北京向张学良请示办法,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所谓敦图铁路连轨问题,是日本在一九三〇年向吉林省督军张作相要求,把吉敦铁路(吉林—敦化)延长到朝鲜国境,和图们车站接轨连运。如果实现,日本如发动对东北侵略军事行动时候,就添了一条军事运输线路,并且是距离东三省北部最近的路线,特别有战略上的价值,在平时又是南满铁路的培养线。张作相当时

推说须向奉天张学良请示，吉林省不能自己作主。而张学良又推说，关于外交问题统由中央办理，自己不能主张。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并无结果。这时日本又想出利诱的办法，向张作相提出交换条件，说如果允许连轨，日本愿将过去的吉长、吉敦、四洮各路的日本借款的利息减低。这时吉林督军张作相就亲自到奉天和张学良研究办法，认为日本既然提出交换条件，就不应一味拒绝，无妨允许加以讨论研究，然后再请中央决定。遂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令吉长吉敦铁路局长郭浚忱、吉海铁路局总办李铭书、四洮铁路局长何某、洮昂铁路局长万国宾等为委员，在奉天东北交通委员会指导下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日本的提案，并作出对案。同时日本方面也派满铁的河村理事为代表驻奉天，准备随时和委员会联络。委员会设在奉天京奉铁路车站楼上，每星期开会一次，共开会十余次，遂做成三条对案：(一)吉长、吉敦、四洮各铁路的借款利息减低为三厘；(二)过去由满铁包修的吉敦铁路工程不合格的地方，应由满铁给重新翻修；(三)敦图路借款利息定为千分之三，由该路营业盈余逐年偿还。在同年八月末，郭局长携带这个对案到北京，向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和张学良报告，我也随行。到北京后一直候等了二十余日也没见到张学良，遂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在廿三日郭局长叫我回长春路局看看情形，把他在长春交通银行的存款给他汇往北京，并叫他的家眷也去北京。我在九月廿五日到长春，听局内职员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本宪兵到铁路局，把所有中国人的成员一律驱逐出路局，并宣布以后中国人成员不用再到路局办公，从此吉长、吉敦两铁路就完全被日寇占领了。以后我接到郭局长由北京来信，告诉我暂时不必再去北京，到奉天吉长铁路局办公处暂住，调查事变后的情形，随时写信报告给他。那时候奉天由日寇土肥原贤二任市长，由日本特务

机关的指使下,袁金凯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于冲汉成立了自治指导部,由这两个机关暂时代行省政;日本宪兵在城里设立了分队,把奉天省的军政要人都逮捕监禁,奉天市完全成了日本军的占领区。在十月上旬,治安维持会任丁鉴修为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总办,他叫我当保安维持会总务处长。到局后遂召集沈海铁路局所有职员回局办公,遂在十一月初恢复了沈吉的通车。但不久就由满铁派来顾问十余人,局长室各处都设顾问一二人,一切局务都得经顾问同意才能进行,因此一般局员都非常灰心,我也因为和顾问意见不合,遂在十二月中旬托病辞职,我到沈海路当处长,是由丁鉴修委派的,而丁鉴修是治安维持会任命的,也就是日寇委派的,所以我当处长就是投降日寇,恢复交通就是为了日寇侵略东北的方便,这都是我的罪恶。

我和丁鉴修的关系:丁鉴修曾在奉天省当过科长,以后任弓长岭铁矿总办,交涉署长是督办,我在东三省交涉署当处长时候,他常到署里来,所以成了朋友。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伪立法院长赵欣伯为了成立立法院,求我帮忙替他监督修理房屋置买家俱,约一月余,待四月间伪立法院宣布成立时候,他想叫我当纪录处长,我当时嫌位置小没就,但是我帮他成立伪立法院,也就是参加了建立伪组织的工作,投降日寇,这就是我的罪恶。

我和赵欣伯的关系:在一九二七年赵欣伯任奉天省公署的顾问,当时奉天省拟收回日本的治外法权,叫赵欣伯负责和日本接洽,赵欣伯遂设立了一个法学研究会,他自己任会长,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由法学研究会邀请日本法学家来奉天讲演,在筹备讲演会时候,赵欣伯请求奉天交涉署派人协助办理,当时奉天交涉署高署长遂派我去帮忙,因此我和赵欣伯认识,

遂成了朋友。

我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由长春去吉林见熙洽，当时他就委我为吉林省公署秘书处长，主要的事务是给他当翻译，从此以后就正式参加了伪组织，作了伪官吏，成了背叛祖国出卖人民利益的汉奸，侵略者日寇帮凶和爪牙了。

那时候熙洽兼任伪财政部总长，每星期到长春住三四日，我也随同到长春办公。当时伪财政部里职员和熙洽接洽公事时候也由我作翻译，我遂和伪总务司长星野直树、税务司长源田松三等认识，这就是我又参加了种种残酷剥削东北人民的财政政策的推行，这也是我的罪恶。

我和熙洽的关系：我在一九二八年曾任吉林交涉署第二科长，那时候熙洽任吉林督军署参谋长，时常见面，因而认识。因为阶级的关系，虽然不算朋友，可是彼此很熟，所以我才在一九三二年到吉林去见他，他知道我的日语好一点，所以就委我为吉林省公署秘书处长，给他当日文翻译。

在一九三四年(伪康德元年)一月，伪满改称帝国，溥仪改称伪皇帝后，为了向日本裕仁天皇表示谢意，遂派郑孝胥、熙洽为赴日修聘特使，星野直树为首席随员，郑禹、赵汝梅和我为随员，古海忠之为庶务。在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长春出发，四月三日到达日本东京，正式访问为一星期，首先谒见了日本天皇和皇后，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访问了各部大臣、贵族院院长近卫文麿、参谋总长蜩院宫、秩父宫、军令部长伏见宫等人。在正式访问完了以后，熙洽在东京又住了十天，对日本的政府当局又作了一次私人的访问。他首先拜访了总理大臣斋藤子爵，见面时除了照例寒暄外，熙洽说伪满虽然建国不过三年，由于日本的大力援助，地方治安已经恢复，国家的基础已日趋稳固，财政根基业已确立，东北的人心也

都拥护伪皇帝溥仪。满洲国现有陆军三十万，如果日本政府对装备武器能够给以援助，他愿意指挥这些军队进攻华北，先占领北京，然后就把溥仪迁到北京，以北京为伪满首都，然后再以北京为根据地进攻黄河以北，再逐渐进入华南而统一中国，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一切都和日本合作，所有日本的人口问题、工业原料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现在伪满的军界首领也和他有同样的愿望等等。熙洽说完了这段话以后，斋藤总理大臣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不过满洲建国不过三年，内部还没有十分稳固，向华北进出时期尚早，再过一二年看情形再说好了。其次他拜访植田谦吉参谋副长，所谈也和向斋藤说的一样。但是植田对他的意见根本没有答复，也没有任何表示，只谈了一些敷衍的话。其次熙洽又拜访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他谈话的内容也都一样。荒木答复说，我希望阁下认清满洲国是由中日人民共同建立的新国家，并不是满清的复辟，你方才所说的意见是很好的，不过进出华北是与日本国策有关系的重大问题，不是我个人能随便答复的，等将来详细研究研究再谈好啦。其次又拜访了近卫文麿公爵，谈话的内容也和以上一样。近卫文麿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不过满洲国如果向华北进展，是个重大的问题，与国际有关系的，不是简单的问题，等将来看一看国际的情形再说罢。其次他又拜访了内务大臣平治骐三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真崎大将、芳泽大使等，都只作了一些普通的应酬谈话，对于以上的问题根本没谈。在回伪满的途中又访问了朝鲜总督宇垣诚一，熙洽又把他的向华北进出的意见向宇垣谈了一遍，当时宇垣认为熙洽这个计划很好，表示很赞成，并且说他几天就要回东京，有机会他一定和政府当局详细研究研究，结果如何以后以书信连络(但日后宇垣并没有给熙洽来信)。四月遂回归长春。关于熙洽这种行为，完全是勾引日寇颠覆祖国，出卖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阴

谋，幸而日寇没有同意熙洽这个建议，倘若当时同意，不但华北三千万人民早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就得遭到日寇的铁蹄蹂躏，日寇的侵略战火早就漫延到全中国也未可知，至少卢沟桥事变也是由于熙洽这个提议给播下了种子。我当时完全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给他当翻译，帮助他卖国，所以我认为我也是和熙洽一样，犯了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重罪，实在是重大的罪行，死有余辜，我真诚地向人民低头认罪。

熙洽由日本回来后，因为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尤其是荒木贞夫明白地告诉他说伪满不是满清的复辟，他就非常失望，因此他就处处表示消极，而日寇关东军方面对熙洽这种复辟思想加以攻击，就在同年十二月把他调任伪宫内府大臣，限制他的政治活动，吉林省长由秘书长李铭书接任，我被提升为吉林省实业厅长。伪吉林省实业厅原来有总务、农务、矿务、商工四科，由伪康德二年一月改为两科，取消了总务、矿务两科，只有农务、商工两科。农务科主管全省农业行政，并直接管理吉林省城农业试验场、各县的农业试验场以及庶务文书的事务。商工科掌管全省商工行政及各县商务会工务会的事务，并直接管理省立实业工厂（内分木工、地毯、吕宋烟三科）、省立旗务工厂（内分木工、铁工两科），所有林矿行政都收归实业部直接办理了。

在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吉林省实行省政三年计划，关于实业方面采取了大力发展政策：

（一）由各县农务会组织农业复兴委员会，复兴地方农业，并奖励开垦二荒地；

（二）实行农民春耕贷款，接济贫困农民，春借秋还利息六厘；

（三）奖励多种大豆，品种以小金黄和大白眉为主；

（四）令各县农业试验场试验推广改良大豆和水稻的品种；

（五）实行工商贷款，以帮助地方商工业的复兴；

（六）定每年农历清明为植树节，由地方首长率领各机关团体学校在都市附近的荒山实行植树造林，同时并奖励农村造林。

在一九三五年（伪康德二年）实行义仓积谷，每垧地积谷五升，留作荒年备荒，并奉伪实业部令对于农村状况实行普遍的调查。

在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十月，由伪实业部召集各省实业厅长开会，讨论实行统一度量衡的问题，叫各省大力推行新衡器。

关于开拓问题，在一九三二年（伪大同二年）由日寇东宫铁男大尉提倡在三江省佳木斯设立了弥荣村，由日本移来农民二百户，主要为在乡军人，把许多中国农民变成了日寇的雇佣劳动工人，强夺了他们的土地。在一九三五年伪实业部令吉林省代满拓购买移民后备地。指定区域为依兰、勃利、宝清、东宁、密山等县，如密山县、宝清县，凡县城周围五华里以内的土地不收外，一切土地不论生熟地都一律收购。更在一九三六年又把县城附近残留的土地也一律收买。共收买荒地熟地二百五十余万垧，收买价格，熟地每垧为两元伪币，荒地为一元伪币，也就是说一垧土地还不值一斗大米的价钱，这完全是强抢的盗匪行为，因此就使得几百万中国农民倾家败产，流离失所。此外还在黑龙江省的北安、海伦、克山、拜泉等县收买数百万垧，届止到一九四五年，由满洲拓殖会社收买的移民后备地，共为三百八十万公顷（每公顷十五市亩），相当于日本全国可耕地半数以上，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届止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共移来武装移民十万零五千人，移来的日本人都在国内训练一年，还有少年义勇队，在国内经过了三年的军事训练。所以日寇的移民，是采用寓兵于农的侵略政策。

在伪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为了建筑小丰满水力发电站，伪实业部指令吉林省公署代为征购土地，当时省公署令实业厅主办，

共收买民地一万数千垧。但这是地照上的垧数，而实在的土地至少有十万垧以上，因为吉林的土地在地照上的记载纳税亩数很小，而实在的土地面积比地照上所载的亩数甚至多十数倍以上。当时每垧土地收购价格为一百五十元伪币，也就是当时的最高市价，但是地价按地照上所载的亩数发放，因此每垧地的实价就不到十分之一了，农民的损失实在非常巨大，多数农民所领到的地价还不够搬家的费用，也就是使二千余户的农民立刻限〔陷〕于破产的穷境。为了救济每户又发给搬家费一百元，除了地主富农有投奔的自由搬走外，大部的贫农由吉林省集体送往江北富锦、同江等县垦荒。〔中略〕这就是我推行日寇侵略罪行应当向人民认罪。

在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一月，我奉省令到额穆、敦化两县对日寇讨伐时受害最重的乡村实行宣抚慰问，我欺骗地向当地的人民群众说，日寇的讨伐是为了使他们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包庇日寇的鬼话。然后每村送给几袋食盐和几箱火柴，以麻痹他们对日寇的仇恨心理。这完全是失掉中国人的立场，替日寇作伪宣传，欺骗中国人民的可耻罪行。

在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四月，我曾到朝鲜的咸镜北道农村视察，发现朝鲜总督府为了救济贫困农户，每户许可种鸦片一百坪（六平方尺为一坪），所生产的鸦片，除了由官方收买一定数量外，余者都由走私运入伪满的延边各地，每年约计三四百万两，来毒害我东北的人民。

总之，我在伪吉林实业厅长任内的一切行为，都是推行日寇对东北人民惨酷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结果给吉林省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我应当负一切责任，向人民低头认罪。

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七月，我由吉林省实业厅长调任为伪经济部商务司长。当时的经济部的伪大臣是韩云阶，金融司长

青木实、税务司长山梨武夫。商务司内分三科。商事科长高桥、调查科长徐水德、贸易科长隐岐猛男。

在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七月,由商事科起草了暴利取缔令。制定这个法令的原因,是为了卢沟事变发生后,日本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对外贸易的输出大量削减,因而伪满的各种物价一齐暴涨。同时伪满也为了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正在计划实行贸易统制。根据当时的情形,认为如果贸易统制办法一旦实行,伪满的物价将会更行高涨。这个法令在同年八月颁布实行。根据这个法令对于商人惜售、提高物价、偷作暗行黑市的不正行为严加取缔,轻者处以罚金,重者处二年以下的徒刑。由于这个法令实行,给东北商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灾难,这是我的严重罪行,我应当负责向人民认罪。

在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十月,由商务司贸易科起草了贸易统制法,目的是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也就是给日后实行配给制打下了基础。经过各种手续,在同年十二月颁布实行。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所有贸易商应按输入商品种类成立组合,所有同业者都可参加为组合员,必要时经济部大臣还可以指定组合员,由组合根据组合员的请求并参考过去商品输入的数量制定输入计划书,然后呈请经济部许可方准输入或输出。例如棉布、棉纱、五金、机器、化学药品、日用杂货等各种物品的输入,和大豆、豆油、豆饼、煤、铁、盐特产等的输出,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一般商人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的输入或输出了。再物质的统制,主要是由于物质的不足,所以某种商品一经宣布统制,市场上的物价就立刻暴涨,商人发生惜售的情绪,市场上就发生脱销的现象,同时就出现暗行黑市,所以由于这个法令的实行,不但给东北商工业者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灾难,更支援了日寇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战争,危害了

全中国人民，我的罪行非常严重，我应负完全责任。

一九三七年十月（伪康德四年），颁布了商工公会法，把全伪满的各省市的商务会，工务会和日本的商工会议所合并，另组织满日商工业者的共同的商工公会，正会长如果是中国人，副会长就是日本人，如果会长是日本人，副会长就是中国人，而事实上会内实权完全交由日本人包办，中国人的会长不过担一个空名，也就是事实上把中国商工业者的命运交给日本人掌管，给中国人的工商业者带来了萧条和倒闭，给工人店员带来了失业的灾难。这也就严重地危害了东北商工业者的利益，我应当负责，向人民低头认罪。

一九三八年（伪康德五年）三月，由商务司贸易科主办，在日本九州的吴市开一次满洲国物产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的目的，一方是为了向九州地方的日本人介绍夸耀它侵略东三省的成绩；一方是为了鼓动九州地方的人民向满洲移民。会期为一个月，展览品大部由各省征集，一部由满铁借用，各种图表则由贸科自制，内部分为农产品、特产品、矿产品、工业产品、林业、畜产、水产等部类。在开会前我也到吴市招待九州地方的工商业者和行政当局各一次，住三天回长春。

伪满对外输出贸易主要是农产品，以大豆为大宗，每年输出约二百万吨，此外还有豆油、豆饼若干。大豆输出一部往中国的华北、华南，换回棉花、棉纱、棉布、杂货和面粉等物品。一部输往日本，豆油、豆饼也输往日本换回机器、五金和杂货、棉纱、布。一大部分输往欧洲德国，替日寇换回飞机零件或飞机的制造图案和各种特许发明权及机器等物品。德国对于大豆利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由豆油中可以提炼汽油，制造润滑油、甘油、人造羊毛、人造象牙、人造丝、电木等数十种的物品，榨油后的豆粕制成豆粉掺入面粉内制面包，不但增加营养，还能增强人体的抗寒力。当我在意大

利会晤德国大使时候，在谈话中他还说满洲的大豆对德国的战争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外每年向日本输出食盐一百余万吨，作为制造工业上的酸类原料，人造肥料的原料，毒瓦斯的原料。每年向朝鲜输出小米三四十万吨，作为朝鲜农民的食粮，好把他们生产出来的大米运往日本，作为日本人的食粮。由于以上这些物品的输出，不但影响了东北人民的食粮，还直接间接支援了日寇的侵略我国的战争和德国的欧洲侵略战争。这也是我的严重罪行，我应负责向人民认罪。

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八月，我调任为伪专卖总局长。当时伪满的专卖品为鸦片、食盐、石油、酒精、火柴五种。鸦片专卖是日寇侵略东北最阴险、最狠毒的毒化政策，它不但吸去了东北人民的无数的鲜血，并且毒杀了无数东北的人民。自从一九三三年（伪大同二年）实行这个毒化政策以后，每年毒品鸦片的专卖数量急骤地增加，吸毒的人数也逐年增加，据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实行了鸦片瘾者的登记，结果知道全伪满的鸦片瘾者为六十一万人。当我到任时，据天野管烟科长的报告说，根据专卖总局的调查，每百人中约有瘾者四人，全伪满的鸦片瘾者当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将来还计划作第二次瘾者调查。一九三九年鸦片的专卖数量仍按瘾者六十万预算，每人每年消费鸦片量按二十两计算，每年鸦片专卖的总数量为一千二百万两。至于鸦片的来源，由热河省生产八百万两（兴安西省靠近热河地方也种植少数），由朝鲜输入二百万两，通过日商三井洋行由伊朗输入二百万两。专卖鸦片的纯度为百分之八十，掺入料子二成（百分之二十），料子系用大豆制造，零卖的熟膏还掺入糖膏百分之五。因此每年鸦片实在的专卖数量，约为一千六百余万两。鸦片的收买价格为伪币一元，料子每两成本为伪币五分，而专卖价格每两平均六元，每年鸦片专卖纯利为五

千数百万元。由于专卖鸦片数量预算过低,就给鸦片走私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据当时的估计,每年由走私运入东北的鸦片也不下一千万两左右,而私运鸦片来源主要是北部朝鲜。所以每年东北人民损失在鸦片上的金钱不下两万万元。

热河省每年种植鸦片(包括兴安北省的一部)为五十三万余亩,每亩缴纳生鸦片十五两,倘有农民缴不足法定数量时候,就由专卖署的缉私科人员会同当地的警察实行到各农民家宅搜翻,倘若收翻不着,就用严刑拷问,不论男女一样吊打。有钱的农民为了避免酷刑,就用高价买来缴纳,而贫农小户就得等候受刑,甚至出卖牲畜、农具、土地、房产来缴纳鸦片。当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热河省专卖署视察时候,中国人职员偷向我报告说,同年夏季因为缉私把乡下农民妇女吊打流产的就有三人之多。由于实行这一毒化政策的结果,不但把几百万东北人民变成了鸦片瘾者,使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寄生虫,还使多少青年男女堕落腐化,贻误了他们的前途,更残酷的是使多少人倾家败产妻离子散,甚至流为乞丐盗贼,每年冬季各都市都有多少鸦片吗啡瘾者倒毙街头。这该是多么阴险狠毒灭绝人道违背国际公法的吸血杀人政策呀!我任伪专卖总局长就是日寇实行毒化政策的帮凶,所以我应当负责向人民认罪。

专卖品除鸦片外还有食盐,每年收入纯利为三千四百万元,石油纯利为五百万元,酒精五百万元,火柴六百万元,每年专卖总收入纯利一亿元。按国际通例专卖品都限于奢侈品,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独伪满的专卖政策完全属于殖民地榨取性质的,它的剥削范围非常广阔,剥削手段非常残酷,使东北三千五百万的人民没有一人例外,都遭受到这种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同时对各种专卖品收买价格又定的极低,例如食盐每担(百市斤)的收价只为一分

钱,这又残酷地剥削了生产者工人。这就是使东北人民不得不过那种吃不饱穿不暖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这一切也都是我所犯的严重罪行,我愿负完全责任。

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十二月,由伪专卖总局立案公布了小麦粉专卖法,实行了面粉专卖制。每年专卖予定额为八百万袋,伪满自产四百五十万袋,由上海输入三百五十万袋,每年可收纯利一千余万元。这个专卖目的,完全是为了收入,这就又给东北人民带来了负担,使他们生活益趋贫穷。

一九四〇年(伪康德七年)四月,我被任为驻意大利兼西班牙的公使,在同年六月由日本神户乘诹访丸赴罗马。当船抵上海时候,意大利宣布参加欧战,地中海封锁,船不能直航欧洲,我随由上海下船返回长春。又在同年十二月,经由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出国,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到达罗马,在二月四日向意王埃马努埃尔呈递国书就职。因为那时候正是大战最紧张的时期,意大利集中了一切力量于战争,所谓对外的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等一切外交事务已完全停止,因此我在职期间,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缔结过任何条约或协定,每年除彼此国庆节日互相开几次酒会公式酬应外,没有任何问题去交涉。当时伪公使馆的唯一重要任务就是替日寇作伪宣传,以掩饰它在伪满的侵略罪行,所以每当和枢轴各国公使要人晤谈时候,有机会就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铁路被破坏守备队被攻击所引起的,伪满建国是东北三千万人民的总意,日本关东军只做正义的援助,伪满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内政方面不受日寇任何干涉,在伪满的日本人都是伪满的国籍,满日人民一律平等,以及伪满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物产如何丰富,土地如何广大等鬼话,替日寇掩盖它在东北屠杀、焚烧、奸淫、抢掠的种种血腥罪行,不叫他在国际舆论上暴露。现在回想起来这该是多么卑鄙、多

么可耻的行为,犯了严重的叛国利敌的罪行,我应当向人民低头认罪,甘愿领受严重的惩罚。

伪驻意使馆规模很小,只有参事官一人日寇三城晁雄,一等秘书官一人系贺长造,日寇主事二人山下一诚、宫本喜造,中国主事二人曹鸿志、刘梦陶,外有意大利嘱托雇员三人。对国内通信由意大利电报局用密码拍发,自己没有电台的设备。

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末,意大利因为战争的失败,英美已在西西利岛登陆,遂在八月三十日发生政变,莫索里尼政权被巴豆留推倒,在九月八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在九月九日带领全部馆员乘汽车由罗马逃出,到意大利北部维尼斯德军占领区避难。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奉伪满政府命归国,在六月三十日由德国柏林乘车,经奥地利、保加利亚、土耳其、苏联西伯利亚在十月一日回归长春,遂解除意大利公使职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伪康德十一年)我被任为伪邮政总局长,因病请假疗养,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始到差。伪满邮政除在新京设邮政总局外,在新京、奉天、锦州、哈尔滨、牡丹江设五个邮政管理局,管理局以下设一、二、三等邮政局。当时因为时局关系,在各城市的一等邮政局内都设有邮件检察室,对于一切信件实行抽察,开封检查内容,这就妨碍了人民通信的自由,更不知有多少爱国分子被逮捕。这也是我的罪恶,愿负完全责任。

〔下略〕　　　　　　　　　　119—2—1159,1,5

齐知政笔供

（1954年10月23日）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沙河子村，家庭成分：地主阶级；个人成分：官僚资产阶级。

一九〇二年在家念私塾。

一九〇五年入开原县立文庙小学校。

一九一一年入奉天陆军小学堂。

一九一四年入北京陆军预备学校。

一九一六年入保定军官候补生队。

一九一七年春入日本步兵第五十五联队为候补生。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一九一九年七月毕业回国。

一九一九年八月陆军部委托为北京边防军（参战军）教导团上尉助教，未到差。

一九一九年八月北京边防军步兵第六旅委任为第十二团第十一连长，因教导团上尉助教未到差的原因，被撤职。

一九一九年秋任黑龙江督军署上尉参谋。

一九一九年秋调任奉天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

一九二〇年夏调任奉天东三省巡阅使署上校参谋。

一九二一年夏兼任蒙疆经略使署上校参谋。

一九二二年春兼任奉天镇威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随军入关

与直隶军作战。

一九二二年秋参加奉直停战签字。

一九二三年春调任黑龙江呼伦镇守使署上校参谋长，兼任哈满护路军司令部参谋长，兼任黑龙江步兵第二十一旅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冬调任吉林督军署上校参谋。

一九二五年春任吉林步兵九十三团长，因铲烟不利〔力〕去职。

一九二五年任直隶督军署少将参谋处长。

一九二五年秋参加李景林军和冯玉祥军作战，在天津附近李景林军失败，我随同退回济南。

一九二六年春任直鲁联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向天津反攻，李景林再为直隶督军，中央授我陆军少将，给三等文虎章。

一九二六年冬任吉林督军署少将参谋处长。

一九二七年中央授中将衔。

一九二八年春东三省军撤退，我回吉林督军署参谋处长职。

一九二八年秋任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总办。

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长春视察军队，我代表吉林督军张作相，会同督军署日本顾问林大八到长春表示欢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约数小时，驻在长春南岭兵营的吉林省陆军第十五师部队，被日寇军多门师团的长谷部旅团围攻，在九·一九早晨，我奉吉林代理督军熙洽命令，随同督军署日本顾问大迫通贞少佐到长春视察，看见日本军正在围攻兵营，甚为激烈，我当晚回吉林报告熙洽。当天驻在吉林省城内的吉林军队，因为听说长春驻军被围攻事，都撤离省城，居民都惶恐不安。我奉熙洽命把我担任的军官教练处改编为吉林省城警备司令部，任我为司令，部内有参谋、副官、军需、军法、秘书、督察等科室，并指挥吉

林警察厅、水上警察局、警察队和残余的三四十名宪兵。在此期间，警察厅曾逮捕现赃抢匪一名张某，由本部司法科判处枪决，呈报吉林代理督军批准执行。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熙洽派督军署中将参议安玉珍，去吉长铁路途中迎接日军多门师团入吉林，当即占领各机关和兵营，缴收武器和车马，军官教练处共缴出步枪一百二十余支、小山炮一门，迫击炮一门和车马等。过几天后，在熙洽会见多门师团长后，自己就宣言脱离中央独立。自己就当了吉林省军政长官。设有军政厅，厅长郭恩霖，统辖吉林省军政大权。

同月熙洽派我秘密去哈尔滨，我面见滨江镇守使丁超和吉林警务处长王之佑，传达了熙洽的命令，叫他们静观情势，不要轻举妄动。

一九三一年底，吉长镇守使李桂林率军避难磐石县，此时改编吉长镇守使为吉长警备司令，派我接替，因为李桂林不愿交出，并且我也不愿干，就作罢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奉熙洽命，偕同日寇大迫通贞、甘粕正彦去哈尔滨接特别区警察管理处长金荣桂的后任，当时因为丁超、李杜起义攻入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张景惠派丁超、李杜部下旅长王瑞华接任警察管理处长，于是张景惠派我为副处长，我未就，我仍回吉林戒严司令原职。

一九三二年春，关东军兵事部中佐部员野副昌德到吉林视察，住在大迫通贞家里，因为我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他是中尉区队长，所以打电话叫我去见面，当时勉励我几句话。

一九三二年伪满建国后，五月吉兴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官，撤销省城警备司令部，把所有职员二十余人改编为吉林省警备司令部所属的特务部，我改任伪司令部的少将部附兼特务部长。特务部

分三科，有总务、情报、宣传，搜集省城附近吉林旧有军队、抗日军的行动和企图，搜集过张作舟旅所有二千二百余名的武装部队，冯占海团所有二千余名的武装部队，宫长海所部六七百人，殿臣所部三四百人，金日成所部二三百人，杨靖宇所部二三百人等的情报，由特务部呈报省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并派宣传员到省城附近宣传伪国政德。约在十月特务部解散，我也就辞了少将部附，在家赋闲。

我退职后，有一天日本宪兵队长儿玉〇〇找我去一次，谈过一回话，也就是调查我的行为，当时的翻译是日寇井波清太，他知道我有一支围枪，所以当我面念秧问我谁有围枪他想借用，我就把我的围枪送给他了。

〔中略〕

一九三三年三月，任辽源专卖署长，副署长酒井，有庶务科专管文书、会计、人事等事项，有贩卖科专管鸦片、石油、火柴、酒精、食盐等专卖品，有缉私科专管专卖品违反取缔等事项。外有专卖局和分局四五处，管辖区域十几个县，共有小卖所二十余处。我在职约一年的期间，共卖出鸦片十万两。毒害人民约万人，其中约有十分之一的青年男女被专卖染上了烟瘾。缉私科有缉私人员十余名，取缔专卖品等私贩、私运、私种、私吸等违反案件，重者送警察〈局〉处理，这一年间共逮捕十余件。这就危害了人民，推行了毒化政策，为侵略者搜刮了财富，使人民遭到了贫困痛苦，这就是我的罪行。

一九三四年三月调任伪龙江专卖署长，署内编制同辽源署。我在职约二年，共卖出鸦片三十万两，毒害人民约一万五千人。管辖区域十余县，共有小卖所三十余处，缉私人员十余人，取缔违反案件四十余件。

在此期间，我接到吉林警备司令部保荐的叙勋五位景云章。

在此期间，副署长井上和记是退伍的经理中尉，他也是龙江日本在乡军人分会的经理(会计)。有一天他向我说，在乡军人会缺几百元钱托我给设法，我就向龙江省的各机关伪官吏募集了三百元钱，以后日本在乡军人总会发给我一份感谢状。

在此期间，日军人野副昌德介绍他的同学伪军政部顾问中野英光中佐和我认识。有一天龙江省警备司令部顾问那须中佐(特务机关长)找我去，问我愿不愿意恢复军籍，我因为有眼病和神经痛的关系，当即婉言谢绝，以后我才知道是中野英光说的。

一九三五年，我出席过专卖总局召开的专卖署长会议，指示加强专卖品的推销和缉私的彻底执行。

一九三六年三月，调任伪锦州专卖署长，编制同龙江专卖署，多一个盐务科专管食盐的收购和贩卖。我在职二年的期间，共卖出鸦片六十万两，毒害人民约两万人。管辖区域有锦西、兴城、义县等十余县，外有专卖局和分局五六处，共有小卖所四十余处，缉私人员约十人，取缔违反案件三十余件。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曾参加专卖总局召集的专卖人员赴日视察团，我担任团长，龙江专卖副署长柴田日人担任副团长，有吉林专卖署长洪维世等十余人，视察约一个月，受到与伪有关的盐商的招待。

〔中略〕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伪满鸦片专卖量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两，因此为推销就增加小卖所，所以锦州专卖署小卖所此时增至四十余处，并召集专卖局和分局长会议，指示推销的办法，以完成危害人民的毒化政策，达成搜刮人民财富的责任。

在此期间，我有一支无有枪证的小手枪，我送给锦州专卖署副

署长日寇大森荣。

一九三八年春，调任伪新京专卖署长，此时面粉也列入专卖品内。我在职二年期间，共出卖鸦片约八十余万两，毒害人民三万余人。管辖区有扶余、农安、怀德等十余县，外有专卖局和分局五、六处。缉私人员约二十余人，取缔专卖违反案件四十余件，共有小卖所五十余处。

在此期间，晋级勋四位景云章。

〔中略〕

一九四〇年夏，升任简任二等，调任伪经济部首席参事官，在职二十余日。

一九四〇年六月，调任伪间岛省参事官兼民生厅长，兼国势调查部长。

间岛省有省长日人神吉、次长鲜人刘鸿询、参事官二人，有官房、民生厅、警务厅、实业厅。民生厅有社会科掌管社会事业、宗教、卫生、慈善、义仓积谷等事项，有教育科掌管文化教育等事项。间岛省共有小学校约二十所，学生两千余人，共有中学三所，师范学校一所，学生约八百人。

一九四〇年秋，间岛省成立东部讨伐队，司令官日寇野副昌德率日军七、八百人，会同当地军警对抗日军金日成部队实行讨伐。

间岛省公署为了对于讨伐过的地区进行宣抚工作，安定人心起见，由省次长领导宣抚工作班，我也随同到汪清、和龙两县进行二日的宣抚工作。

我曾随同省长视察过珲春县马滴嗒。

一九四一年春，我奉省长命同警务厅保安科长刘志格，率同延吉街商务会长某和龙井街商务会长韩云升，携约值二三千元的慰问品到延吉街慰问野副部队，并由慰问品中送给野副少将豹皮两

张。

〔中略〕

一九四一年六月，调转为新京特别市所属首都警察厅总监。伪首都警察厅的组织有副总监一人，有警务科专管人事、文书、经理等事项；有警防科专管警备、警护等事项；有司法科专管刑事、搜查等事项；有特务科专管检阅、思想取缔、外侨等事项；有建筑科专管建筑许可和取缔等事项；有经济保安科专管经济统制违反取缔等事项；有卫生科专管公共卫生、防疫等事项；有保安科专管交通取缔、保安等事项；有兵事室专管日人兵事事项；有督察室专管警察风纪、勤务的取缔等事项；有新京地方警察学校（副总监兼校长），专管训练、教育警士和警长，厅内共十一个单位，其中只有保安科长是中国人。

外有警察署九个、有消防署（外分署一个）、敷岛署、长通署、大同署、顺天署、安民署、东荣署、宽城署、和顺署，外有警察警备队约三百人。

伪首都警察厅共有伪警察二千余人。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防空法令，强化防空设备，厉行防空演习，扰民伤财。例如有商人刘某因出卖防空纸违反统制价格，特务科警尉张富龄向刘某勒索钱财并奸淫其妻子，并将刘某逮捕起来。虽然以后刘某告发，张富龄被检察厅逮捕，但又由日寇宪兵司令部第二课长要出来了。这就是我执行防空法令所给都市人民的危害，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总动员法。在我指挥下加强对都市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和征用，使人民受到日寇的无情掠夺，使人民生命财产受了损害，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思想矫正法。在我指挥下，把市民加上一

个不良的名义就逮捕起来，送法院、检察厅进行思想矫正，或送往厂矿工程地带实行劳役。因此使市民遭到生命和自由的危害，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劳工法。在我指挥下，帮助市区机关征出劳工，使被摊派的劳工受到妻离子散的灾难。我在职期间，共征出劳工四千余人，送往厂矿或国防工程地服劳役，因待遇恶劣，死亡率约在百分之十。这就是我危害人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国兵法。在我指挥下，帮助市区机关召集适龄壮丁，每年约二千余人。我叫他们给日寇当炮灰，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粮谷出荷法令。在我指挥下，帮助市区机关征出荷粮，供给侵略者作侵略资源，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有因交不上而被拘留者。这就是我的罪行。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每年实行二三次都市大检举。我在职期间共检举千余人，有的送伪检察厅，有的当时释放。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四年间共检举刑事案件送伪检察厅的约三百件四百余人。其中有日寇警尉神崎被杀害事件，逮捕嫌疑犯二十余人；又一次日警尉被害事件，在大屯、范家屯附近逮捕嫌疑犯六七人；又一次日寇女子被杀害事件，逮捕了伪汪政权大使馆员。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四年间共检举特务案件送伪检察厅的约二十件四百人。其中有英美系出身医生被逮捕事件，内有复明眼科医院王骏夫妇；有逮捕建国大学生赵宏事件；有国民党二三十人被逮捕事件，内有罗大愚、石坚、王洪文、陈符珵等；有逮捕王树声事件；有一二·三〇事件，逮捕学生和爱国人士约六、七十人。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四年间共检举经济统制违反案件送伪检察厅的约五百件六百余人。其中有天德信纸商违反统治价格和炮铺(爆竹)违反统制价格事件。

在此期间，首都警察厅在我指挥下，在每次伪皇帝出门以前，就在所经由道路的附近实行大清查，有认为行迹可疑者就逮捕，因此严重的危害了市民。

以上所检举的案件，都是我指挥着两千余名伪警察，执行着侵略者的政策，使市民遭到生命财产的灾难，这就是我的罪行。

〔中略〕

在此期间，我推行了协和会首都本部所实行的金属回收运动。在一九四三年共回收铜约五十吨、铁约一百吨。还有黄、白金回收，因公定价格不及私价的十分之一(每两私价约万元)，因此收不到，以后由警务总局在长春三、四马路设有用鸦片交换黄、白金的办法。

〔下略〕

119—2—1160，1，5

齐知政补充笔述节录

（1957年4月10日）

关于伪满鸦片毒害政策的执行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满政府成立之后，伪财政部所属有专卖总局专卖鸦片。在专卖总局之下，设有执行这个鸦片专卖政策的专卖署。专卖署共有十三个，吉林、奉天、龙江三个专卖署是最先设立的。其后陆续设有热河、营口、新京、安东、锦州、辽源、延吉、佳木斯、哈尔滨、通化等专卖署。专卖署有中国人署长、日本人副署长，分担全署专卖事务。专卖品是由专卖总局计划分配给各专卖署推销，按专卖法实行。我在全伪满三分之一的土地上洒遍了鸦片恶毒，榨取人民的财富，甚于洪水猛兽，使人民贫困死亡。

一九三三年秋，我当辽源专卖署长，有日寇副署长一人，署内共分三科，外有专卖局和专卖分局四、五处，管辖的区域约有十余县。

庶务科掌管金钱出纳、人事、庶务、文书等事宜，科长是中国人。

贩卖科掌管鸦片和石油的贩卖，年销鸦片约有二十多万两，科长是日本人。

缉私科掌管专卖品的取缔，取缔私买、私卖、私抽、私运、私种。共有缉私人员三十余人，分配在署内和外局。鉴定人二人。缉私员有缉私员证。缉私的案件，轻者没收东西，重者送检察厅法办。

因为严格的缉私,缉私员到处翻箱倒箧,打人骂人,还常有伤害的事件。我记得在通辽时,缉私员因为搜翻鸦片,以致把孕妇闹的坠胎。

关于鸦片的贩卖情形,是由鸦片批发人分配于所管辖的区域内。鸦片批发人在奉天、吉林、龙江三省的专卖署内有。龙江批发人是赵子哲,奉天批发人是高钧阁,吉林不详。批发人的人选是伪财政部指定的。批发人经手分配鸦片于所属各零卖所。零卖所的设立,是由当地机关——县和专卖署协商呈报省,由省指定的,零卖所直接把鸦片供给吸食者。当时专卖署对于瘾者的吸食证是来者不拒随便发,到一九四〇年禁烟总局成立后,吸食证才取消了。

一九三四年冬,调任龙江专卖署长,组织上和辽源相同,只是增加了食盐一项专卖品。管辖区域约有二十多县,北到黑河西到满洲里,外有专卖局六七个,年销鸦片约有三十多万两。专卖署管下有石油组合,是龙江街上日商店主担任组合长。

一九三六年夏,调任锦州专卖署长,组织上和其他专卖署相同,只是多一个盐务科掌管盐滩生产和调配等工作,科长是日本人。并陆续增加了酒精、洋火的专卖。在我到锦州后曾经增设了几处零卖所,按上面所说的手续办的。

一九三八年春,调任伪新京专卖署长,除与锦州专卖署的组织相同外,又添一项面粉的专卖品。

我对于推销毒品鸦片,尽力地督饬部下,名为救济瘾者实则是制造瘾者。就是毒害人民削弱身体消灭种族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我执行的,是我督帅全署人员对人民必需品加强统制,严格地执行到处搜刮,使东北人民倾家荡产饿死街头。成千累万不可估计的人命都是我的罪行,我负完全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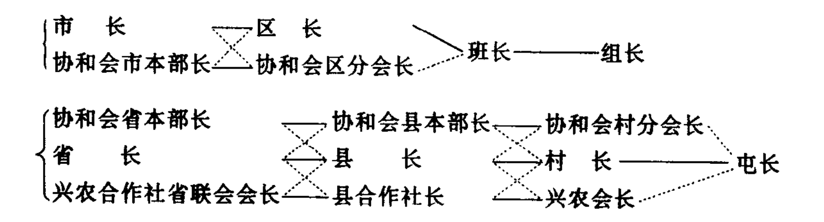
119—2—1160,1,40

王子衡笔供

(1954年5月18日)

一　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任伪滨江省长时期，兼任征兵官。两年间每年把适合伪“国兵”年龄的青年六万多人，送到征兵检查所检查。合格者约六千多人，实际采用入伍的约二千多人。这就是说每年迫使二千多名可爱的青年去作日寇的帮凶，反过来杀害我们的同胞，痛感责任的严重。

二　一九四二年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部长时期，曾强化“邻保组织”，就是实行所谓“二位一体”制或“三位一体”制，加强组长的权力，传达上级的指示，报告邻组活动的情况。例如：配给物资、供出劳工、捐献财物、防空防火的演习等等，都须邻组充分活动，才能达到目的。所谓“二位一体”或“三位一体”制的组织如下：



119—2,1112,2,第18号

王子衡笔供

(1954年6月26日)

姓名:王子衡。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民族:汉。出身:伪官吏。文化程度:大学。家庭成份:地主。籍贯:旅顺三涧堡韩家屯。现住所:哈尔滨市南岗辽阳街十四号。

个人简历

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二年在原籍私塾读书。

一九一三年入旅顺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

一九一九年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一九二二年毕业。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担任大连关东报编辑长。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担任奉天省公署秘书。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担任北京政府实业部签事。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三月担任奉天省公署咨议。

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十月担任大连关东报主笔。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二月担任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秘书。

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一九三二年五月担任伪满监察院监察官。

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后兼任该总务厅人事处给与科长,不久转任调查科长。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专任伪国务院总务厅秘

书官。

一九三八年七月转任伪满黑河省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转任伪满产业部畜产司长。

一九四〇年五月转任伪满兴农部农政司长，后转任农产司长。

一九四一年六月转任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部长。

一九四三年六月转任伪满滨江省长。

我的罪行：

一九二二年冬季在学校毕业后回大连无事可作，又因当时大连只有一家汉文《泰东报》，中国商民常常受它的压迫，希望另有一家汉文报。因此，我和邱子厚各出资五千元，创办《关东报》。但以关东厅不许可中国人有报纸的发行权，不得已由邱子厚的日本人朋友都甲文雄出名，领得《关东报》的发行权。邱子厚为社长，都甲文雄（曾任北京顺天时报编辑）为顾问，我为编辑长。一九二四年夏季，邱子厚把他的股东权利卖给都甲文雄，由此都甲为社长。纪事和言论，主要是转载中国和日本各地的通讯和书报的材料，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宣传工具，我应负责任。

一九二四年八月，奉天省长王永江（我的同乡）用我为奉天省公署秘书，担任调查日本在东北特别是关于南满铁道会社在东北的产业经济情况，作为王永江的参考资料。

一九二七年七月，韩麟春（奉军第四方面军团长）推荐我为北京政府（张作霖时代）实业部签事，担任工商情况的调查统计事务。但是依仗奉天军阀的势力，不常到班，也不办事，每月白领一百元薪俸。真是可耻可恨。

一九二九年一月，王明宇（当时沈海铁路总办）推荐我为奉天省公署咨议。这是闲散差事，上级省长、厅长如无咨询，便无事作

(旧时代这种情形很多),偶有咨询,也是关于日本南满铁路会社在东北的经济情况事情。每月白拿一百元薪金。

一九三一年四月,回大连担任《关东报》主笔,编辑稿件和社论时评,都是为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服务。某日据日本通讯报道,苏联发表"苏联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即将完成……",我曾作一短评,大意是:"苏联自建国以来实行锁国主义,外国人既不容易旅行苏联,苏联人民更不能任意出国门一步,苏联的实际情况,外人无从得悉,故人称之为'谜'国。今日苏联虽然发表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这并不等于说它的经济基础已经稳固,因为它的工业产品颇为粗糙,农业生产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得提高,较之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人民生活的水平相差甚远……。"这是歪曲苏联的真实,阻碍人民学习苏联,走向进步,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一月中旬阚朝玺(当时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副委员长)推荐我为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秘书,担任翻译日本语文。我首先把我的弟王秉铎介绍为该部职员,后为调查科长。而王秉铎又介绍吕作新、张贤才等六人为该部职员,开始到奉天各县进行宣传自治工作。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该部为伪造民意,促进伪满建国计,召集"促进建国奉天地方代表大会",各地方和各机关代表五百多人,其他奉天省公署和自治指导部臧式毅、于静远、中野虎逸、中西敏雄(自治指导部顾问)等职员五百多人,共一千多人。部长于冲汉演说大意:"东北恶军阀,飞扬跋扈,横行多年,人民叫苦已非一日。今日日本军打倒恶军阀,拯民于水火,我们应当早日完成自治,建设理想乐土,与日本各民族共享和平幸福。希望诸位加倍努力向前迈进……。"我给他翻日语。继由中日代表二人(忘其名)演说赞成。会议三小时散会

游行示威。我编译一些宣传标语，例如："打倒恶军阀，铲除恶势力"，"实行自治建设理想乐土"，"日本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帮手"。这是参加和支持伪满的建国运动，我应负伪满建国创始人的责任。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冲汉（伪监察院长）推荐我为伪监察院监察官，担任监察伪满官吏的违法行为的职务。曾翻译中国南京政府监察院的制度和规章，并检举伪满黑龙江省长韩云阶的贪污罪行，后被撤职。

一九三二年六月转任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后兼任总务厅人事处给与科长，不久转任该处的调查科长，担任翻译日本语文和伪国务总理的报告和演说词；搜集中国北京、南京各政府的关于人事、给与、考试各种制度，制定伪官吏考科表的格式（内分姓名、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务能力、服务态度、成绩表现等项），分发各伪政府机关，由各机关考科的责任者（人事科长、次长或相当于人事科长、次长的职务）按照考科表内的项目分别填写完毕，送到伪总务厅人事处调查科整理保管。例如各级伪政府机关，按期呈请为某某伪官吏升等升级的理由，与原先送来的考科表的内容所书太不符合时，伪人事处长或函询原送来呈请升等升级的机关，或派人前去调查真相。一九三五年六月，我曾被派赴奉天省公署，调查该省署特别呈请提升曹承宗（当时为该公署的荐任阶级科长）为简任阶级的实业厅长的理由。据该省公署人事科长竹内（忘其名）和次长竹内德亥二人说："曹承宗能力很高，作事积极，为其他科长所不及，故应提前拔升……。"我即归任报告伪人事处长（皆川丰治）。我曾兼任（临时）伪官吏考试委员三次，考试中等、专门、大学毕业学生，考入大同学院（伪官吏养成所），六个月毕业后，任伪官吏。因而造成了无数的汉奸走狗，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三年春季，日寇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征询我对于

日本统治满洲的意见，我以书面答复，大意："日本军驱除恶军阀，在东北建设理想的满洲国，这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事情，应当基于满洲建国宣言的精神，进而作到中日合作，完成兴亚大业，是所大愿……。"颇得石原莞尔的赞许。后来得任为伪满黑河省长，伪滨江省长，也是出于石原的言助所致。

一九三八年二月，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为毒害中国人，施行扩张鸦片政策，设一鸦片断禁委员会（星野为委员长），委任我为干事（谷次亨为干事长，曲秉善、雍善耆等六七名为干事），担任鸦片断禁法的起草。内容："断禁鸦片期限为十年，吸烟者均须登录，规定热河省为种植鸦片地区……。"这草案经过断禁委员会的审定，火曜会（伪满各部次长会议）的审议，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和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签字，提交伪国务会议通过和参议府的决议后，公布实行。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登录吸烟者表面上为一百万人，实际当为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乃至三百万人。直到"八·一五"仍然没有减少。按每人每日吸烟一份，每份以六角计算，伪政府每年吸取三百万人的鸦片费为六亿四千四百万元的巨额。按百分之七十利润计算，每年收入鸦片纯益为四亿四千零八十万元。而吸烟者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即每年死亡者当为九万多人。热河省的种烟农民尤为痛苦万分。伪政府规定每垧地征收烟土十五两，年景稍差即难如数交出，警察等借端搜查毒打严罚，加上生活穷困，死亡日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七月转任伪满黑河省长，八月初旬带同该省公署的民生科长张国治，警务科长冈野（忘其名）视察省内十一县的情况，对各县公署职员说话内容主要为：好好地保卫地方治安，注意对岸苏联的动静。就是说好好地压迫人民，敌视苏联。同年九月初旬，归来后即赴新京（长春），向伪总理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星野

直树报告。十月为驻黑河日寇军供出薪木两千万斤，由各县人民摊派供出，每斤定价一角，时价二角，人民共损失二百多万元。黑河街由伪省警务科长冈野许可设赌局两处，每处每年纳赌税五万元共为十万元。每处赌局每月有赌者百八左右。劳动人民终年血汗的结晶，都被榨取净尽。仅我所知，因赤贫自杀者即有四人，危害严重可以想见。这年十一月间，伪民生科长张国治到黑河山里慰问日寇军长野（少将）部队，归来后他对我说：有一中国人对我（张）说，十一月初，长野部队把做完军事工事的中国人劳工三百多人集体屠杀后，全部尸体烧毁消灭。这种惨案，我虽然事前没有与闻其事，但是，我为伪省长，与日寇站在同一个利害立场，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伪产业部畜产司长任期，为供给日寇军需，统制畜产品，呈请伪产业部大臣命令各省供出牛皮两万张，每张定价一百元到二百元，而时价为二百到四百元，平均每张损失一百五十元，共损失三百多万元。猪皮五万张，每张定价三十元到五十元，而时价六十元到一百元，平均每张损失八十元，共损失四百多万元。羊毛类二千吨，定价时价都忘记，损失多少亦无法估计。收买时动用警察，发现存有皮革不卖者，即诬为经济犯。营口市某皮革商存有牛皮十张，被发现罚款两万元。因此当时皮革业者存货净尽，纷纷倒闭，安东皮革业者原有十家，后来仅余两家。手工业失业工人三百多人。强收羊毛时，特别是蒙古人民损失最大，织地毯的工人亦都失业。这些事件都是摧残民族企业，使之破产，迫使手工业者和工人生活陷于绝对贫困，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依据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的指示，为日寇供给军需，呈请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命令各省在一九四〇年度供出猪肉五万吨，每斤定价一元，而时价二元，每斤损失一元，每吨损

失二千元,五万吨共损失一亿多元。当时伪满人口四千多万,即每年每人增加负担二元五角多。加速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穷困,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〇年冬季,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郎,为以低价收好粮,命令我拟定收买粮谷规程的草案,我即令伪兴农部农政司总务长富田政雄等起草一个"兴农合作社交易场检查所规程",内容是:"凡出荷的粮谷,均须经过交易场检查后才能买卖,各种粮谷都分成一、二、三等和等外四级,每等粮谷都按它含水分多少和夹杂物轻重有无为标准。……"这草案由我盖印后,经过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郎和伪大臣于静远签字后,提交各部次长的"火曜会",由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提出国务院会议通过,最后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签字,伪兴农部大臣于静远副署公布施行。一九四〇年一月施行这个规程后,农民出荷粮谷受尽检查员的勒索刁难,不行贿赂,明明一等粮被检查为二等,二等被检查为三等,三等被检查为等外。农民稍有质问,非打即骂,往往一天两天不能验上,离家又远,只得人、马、车、粮住在店里,等候二三日后,仍须承认贬等,或行贿赂,才能把粮卖出。检定等级后又被买称员压低分量,明明一百斤,变成九十斤、八十斤。交上贿赂,明明八十斤、九十斤,变成一百斤。这个恶劣规程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无法估计的,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七月,兴农合作社中央会,为加强压迫农民,充实伪合作社的阵容,由该会理事长松岛鉴主持下召开理事会。我以兼任该会参与的资格出席理事会。通过兴农合作社的预算案和设立兴农合作社职员训练所的决定。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在长春、奉天、吉林、哈尔滨和龙江五处设立职员训练所,每期三个月,每年训练职员六千多人,三年间共训练二万人左右。这些人在农民出荷粮谷时,压等压称,强索贿赂。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季,肇

东县太平村交易场检查员二人，即勒索贿赂二万多元。在发给粮价时任意苛扣蓄金额数，在蓄金收据上扣的数目多，写的数目少。春耕贷款时，强要贿赂或手续费。不行贿时，贫困者得不到贷款，行贿时富裕者也得到贷款。在配给物资时，如棉布、棉花、棉线、石油、豆油、火柴、盐等，任意减量减斤，甚至干脆地说现在东西没到，或说到的不多，暂时不配给。扣下的物品他们共谋高价私卖，合伙分肥。横行无忌，欺压农民，农民受到的损失和危害，真是数不清说不清的。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三月，由于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郎指示，我为日寇增产棉花，加强军需，规定棉花种植面积由十六万垧增至二十万垧。由伪兴农部大臣于静远命令奉天、锦州各省进行种植，由棉花会社供给棉农钱款、种籽，派人指导种植方法。秋季又派人下乡收棉花，住在农民家里，每饭须有酒肉，或有供给鸦片者。但是每垧地在比较丰收年月可产棉花二百斤到三百斤，每斤籽棉收买价格为二角到四角，平均三角，而时价每斤为四角到八角，平均为六角。就是每垧地种棉农民平均损失一百二十五元，二十万垧共损失二千五百万元。歉收年月损失更重。无论丰收歉收，均须如数交出，因而造成棉花会社员勒索敲诈的机会，稍不顺意即报告警察，翻箱倒柜，各处搜查，或把棉农关押起来，打骂处罚。有把破被的旧棉花交出，又被诬为私藏新棉，拿出旧棉代替，仍受处罚。一九四三年黑山县赵召五妻，因棉花产量不好，交不出棉花，被警察关押三天。辽中县棉农李贵交不出棉花，畏罪逃避数月误了春耕，一九四四年秋季仍须如数补出。这是规定强制种棉，定价低给农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秋季我任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部长时期，该会中央本部三宅光治为推行伪满的出荷粮谷、供出劳工等恶政，在该

会会馆召开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我为书记长，帮助议长（三宅光治）进行议案的讨论采决。出席代表五百多人，伪政府各机关人员五百多人共一千多人。各地方代表提出的议案主要是粮谷出荷数量大，农民担负重；粮谷价格低，农民损失大；劳工供出多、农村劳力缺；工业品（如农具、农药、肥料和其它生活品）价格高，农民购买力弱；税捐繁重，农民负担不起等等。伪政府方面主要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次长古海忠之、伪经济部次长青木（忘其名）、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忘其名）等分别回答。他们诡辩地说："满洲国是有名的产粮丰富的国家，政府要求出荷的数量，都是估计农民的力量可能负担的。例如每年都有私粮私运出国，可见粮食并不缺乏。粮价如提高，其他物价也必随之高涨，结果损失仍须由大多数的农民负担，不如不提价，多劳动，多生产，是农民增加收入最好的方法。劳工供出虽然为数不少，农村还有剩余的劳动力。例如满洲妇女不好劳动，动员妇女下地生产，是最好的办法。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等满洲国多半不能生产，须由日本供给。而日本工人都是多劳动多生产，享受很低，有些工业产品价格日本高于满洲。至于税捐的收入，都是国家必需的支出，并没有浪费。特别是'大东亚战争'以来，种种需要在在孔亟，希望各位代表传知人民，善体这些意旨，忍耐一时，多多供出人力、物力、财力，援助圣战，早日获取胜利，共享幸福……。"代表中有赞成伪政府的答辩说："政府说的都是实情，现在皇军在前线天天流血，我们在后方应当天天流汗，援助圣战早日完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样大帽子一扣，加上伪议长警告式的领导，各代表只得通过伪政府的答辩。会议完毕后，我把伪政府上述各种诡辩的说法重复一遍，在广播台上向人民广播。这种欺人骗局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秋季，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命令我代

表协和会，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华北新民会全体联合协议会。这会由伪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主持下进行会议。我代表协和会读祝词，大意："我满洲国与华北的人民，原是同族，协和会的主旨和新民会的主旨本是一体，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那方面来讲，都应当和衷共济，互相援助，携手团结，共同向建设兴亚大业的前途迈进，这是我们的任务……。"住北京三日后归来，向三宅光治报告。散布毒素，惑人听闻，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夏季，日寇关东防卫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为加强防卫力量，在长春召集防卫委员会，我以兼任防卫委员会委员的关系出席会议。出席委员五十多名。议案是：因为时局紧张，加强防卫力量。决议：准备在战争开始时，以人力、物力援助防卫军，平时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三小时散会，我与协和会总务部菅原三郎（他也是防卫委员）共同报告三宅光治。以三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协和会本部，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与邻组的活动。动员男女青壮人民，努力演习。每月举行防空演习一二次，施行灯火管制。每次演习，即长春住户露灯光者都有十几人被警察拘押打骂。同时邻组获得情报，即须报告上级分会或省市本部。因此，一九四二年冬季某日，协和会中央本部调查部长坂田修一，在部科长汇报上发表，据首都（长春市）本部报告，长通路郭老西（外号，忘其本名）因为私行贩运大米，被发现罚款两万元。又一九四三年春季，坂田修一发表，据首都本部报告，长春建国大学中国人学生四名，因为思想关系被捕。在加强防卫的运动中，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增加无数的负担与打击，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六月，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答访南京伪汪政府，我以随员资格一同到南京。当时东亚联盟本部，召集南京各机关代表百余名开一座谈会。由伪汪政府宣传部长林伯生主持下进行谈

论。我代表协和会说明协和会的组织与任务，大意："协和会是我国的国家机关，也是一个政治的教化团体。以民族协和的精神，宣德达情的任务，立在人民与政府的中间，推行理想政治，和政府表里一体，建设我国，颇得民众的信任，实一理想的政治组织，可资仿效……。"在南京住五日，与张景惠同道归来报告三宅光治。

一九四二年秋，伪协和会召集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的目的、过程、结果和我在这会议上的活动与任务，都与一九四一年度秋季会议的情况相同。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伪满举行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纪念。南京、北京、蒙疆各地伪政府都派遣代表团到长春祝贺。协和会把各代表团中的青年代表百余名，组织一个临时的联合青年团，三宅光治派甘粕正彦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在协和会馆开一个座谈会。我说话大意："青年是国家的柱石，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因此责任很大。现在'大东亚战争'日本军战败美英，着着胜利，这不仅是日军的光荣，也是亚洲各国共同的庆事。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援助日军早日完成圣战，这是责无旁贷的……。"信口开河，毒害青年的思想意识，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旬，上海举行庆祝日寇发动的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周年纪念。三宅光治派我代表协和会到上海讲演。庆祝大会场在跑马场，到会两万多人，由上海市长陈公博主持下进行开会。我演说大意："英美两国侵略亚洲百余年，亚洲各国人民饱受它们的屠杀奴役的痛苦。今日日本军战胜美英，驱除它们在东亚的势力，实是普天同庆的事情，我们应当竭力援助日军，彻底消灭英美的力量，恢复我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当前唯一的任务……。"大吹大擂，欺骗同胞，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秋季，出席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召集的伪省长会

议，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令伪滨江省本年度为日寇出荷粮谷一百零六万吨（是年末有报恩出荷四万吨合计为一百十万吨）。会议完毕后，由武部六藏手里领到奖励金三千元。归任后一星期，召集伪滨江省一市十七县的县长会议，说明伪滨江省担负的粮谷出荷数量，指示各县长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任务。各县长都已承认。会议后省方由伪民生、警务、开拓各厅和协和会抽调人员二十多名，组成两个出荷督励班，开拓、民生二厅长为班长。各县也都组织督励班两个或三个，每班也是十人左右。全省共有五百多人，协同各村屯长下乡催粮，遇到农民不愿出荷或出荷不足，即行搜查，不问食粮种籽有无办法，都须拿出。轻则辱骂，重则殴打，以至由警察逮捕关押。无粮者只得私买粮谷出荷，被警察发现，还认为是经济犯加以处罚。双城县长王奉璋（外号王大马棒），常常用木棒殴打农民，他说农民不打不出粮，非打不可。阿城县副县长岸次郎（日寇）打人出名，平常见街上行人不给他敬礼时，便行殴打或罚站。出荷粮谷，更是他施行淫威的好机会。因此伪滨江省出荷粮谷完成任务，都是由于打骂催逼出来的，因而农民家家穷困，人人饥寒。一九四四年一月木兰县某村农民某（忘其姓名）出荷不足，被警察关押数日，放出后又以食粮已无，生活困穷，服鸦片自杀。出荷粮谷，为日寇增强兵力，给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秋季，出席伪省长会议，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示伪滨江省出荷粮谷一百三十万吨，领得奖励金五千元。归任后召集伪县长会议，布置方法和农民受到的灾难与一九四三年度出荷的情况相同，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执行伪满民生部大臣于静远的命令，每年由伪滨江省供出劳工六万人，勤劳奉公队六万人，二年间共为二十四万人。指令各市、县长负责供出，由

各村屯长协同警察按户数人口分派，不服从分派者，即由警察逮捕，打骂关押，不配给石油、豆油、食盐等必须物品，结果仍得去劳动。一九四四年春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肇州、珠河、苇河、延寿四县，有农民四名避免劳动，逃匿数月，归家后误了他们自己的春耕，别人代种，除偿还别人的工资外，还须拿出二百元作为罚款，无钱者秋季用粮偿付，并不配给石油、盐等物资。出去劳动者被分派在阜新、鹤岗等矿山工厂和牡丹江省的日寇军事工地，都是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九、十小时的残酷劳动，衣服破烂不能蔽体，饭食粗恶，分量不够，住的破漏席棚，不蔽雨雪风霜，常常受着万恶的监工把头的毒打恶骂，身瘦如柴，有病无医药，任其痛苦死亡。据伪滨江省民生厅长刘泽汉到牡丹江省军事工地慰问劳工归来报告：眼见劳工被打和工人病死在席棚外，还没掩埋，病者十二人呻吟无药。伪开拓厅长王绍先到阜新矿山慰问劳工，见到病者十几人卧在露天的破席棚里，没有医药。有一劳工死卧在矿井外边。劳工的惨状可以想见。因此，根据伪滨江省公署动员科的报告，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供出劳工和勤劳奉公队的死亡率，都为百分之五左右。就是我任伪滨江省长二年间，供出的劳工、勤奉队二十四万人中，死亡者当为一万二千人以上，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我为推行伪满的鸦片政策，执行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的命令，在哈尔滨市和伪滨江省十七县设有鸦片小卖所五十多处，吸烟者二十多万人。按每人每年吸烟三百六十个、每个六角计算，每年鸦片消耗当为四千三百二十万元，二年间为八千六百四十万元，以百分之七十利润计算，二年间获得的纯益为六千零四十八万元。根据伪滨江省公署保健科的报告，吸烟者中的破产者为百分之十，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就是二十万人，二年间破产者有四万多人，死亡者为一万二千

多人。这一毒恶政策危害同胞的健康，加深同胞的贫穷与死亡，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执行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的命令，由伪滨江省给日寇供出猪十万头，鸡蛋二千万个，青菜(萝卜、白菜)地豆子共三千二百万斤，由我命令伪滨江省各县长负责供出。猪和青菜按土地分摊，鸡蛋按人口分摊。但猪以每头一百三十斤为标准定价为二百元，而时价为三百元，即每头农民损失一百多元，十万头共损失一千多万元。鸡蛋每个定价一角，而时价为二角，二千万个，农民共损失二百多万元。青菜地豆每斤平均定价一角，而时价平均二角，农民共损失三百二十万元。贫困农民无力供出者，只得高利借钱购买或由富农代为供出，秋季还粮。迫使农民加速穷困与破产，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执行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命令，为日寇增强兵力，在伪滨江省各市县捐献飞机七十架。每架以十五万元计算，价值一千多万元。以协和会运动的形式，在农村按土地摊派，每垧地三元。伪滨江省共有土地二百四十万垧，共捐出七百二十多万元，由哈尔滨市商人住户捐出三百多万元，共为一千多万元。在捐献的过程中，警察、区长、村屯长和协和会职员等，常常用强迫性的劝说，才达到捐献的目的。危害人民，吸取血汗，为日寇加强军事力量，反过来屠杀我同胞，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秋季和一九四四年秋季，执行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命令，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召开伪滨江省协和会联合协议会。两次会议代表都为一百余名，伪政府各机关官吏职员百余名，共二百多人。主要目的是推行出荷粮谷政策。我以伪滨江省长兼任伪协和会省本部长的资格，报告省政和协和会运

动的方针。大意是:"我们滨江省为北满的中心,也是全满的粮谷仓库,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都很重要。今年政府命令本省出荷粮谷一百多万吨,数量虽不算小,人民确有这个力量。希望各代表充分讨论,达成协议。回到乡下,好好地对农民传达政府的意旨和协和会运动的方针,完成政府的要求,也就是等于援助皇军早日完成大东亚圣战,共享太平的幸福……。"各代表的提案主要是:粮价低,出荷多,物价贵,配给少,供出劳工多,农村劳力缺等等。而我和伪次长田村敏雄的回答,也如上述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在伪协和会中央联合协议会说的那一套欺骗人民的话。各代表只得赞成伪政府的方针,承认回乡劝说农民,努力出荷粮谷,供出劳工。强制人民,推行恶政,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冬季,执行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的命令和开拓总局长五十子(忘其名)的通知,在伪滨江省五常县买地三百多垧,在呼兰县买地四百多垧,在木兰县买地二百多垧,共买地一千垧。每垧买价二百元,而时价三百元,每垧损失一百元,一千垧共损失十万元。由各县长召集有关的各村屯长会议结果,通知被买土地的地主,拿着地照到县公署交照或换照,发给土地的卖价。不肯卖者即由村屯长警察等,一面劝说,一面威吓,强迫地主到县公署打手印,承认出卖。因而失去土地者约有二百户,生活趋于贫困。但是收买土地,并没有造成水田,日寇的侵略战争着着失败,人的资源极感缺乏,所谓开拓民一个也没有来到。把强买的土地转租给原地主耕种,每垧地收取地租五六成,一千垧地共收租二千多石即五百多吨。以每吨粮谷时价二百元计算,五百吨为十万多元,即二百失地的农户每户每年损失五百多元。就此一点,足见开拓政策危害农民的严重。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春季,执行伪满经济部大臣的命令,在哈尔滨市收

买旧铁和机器类援助日寇，增强它的军事力量。当时我和伪次长田村敏雄商议后，协同哈尔滨市长袁庆清和工商会长张廷阁，研究收买方法，决定由张廷阁委派商人徐廷九、马子宽（还有二人忘其姓名）等四人为收买代理人，并由张廷阁召集商人百余名说明收买的价格和方法。我曾说："现在战争着着胜利，军事需要也因之在在孔亟，政府命令在本市收买旧铁和放置不用的机器类，价格相当公道。希望商家住户如有存置不用的旧铁和机器，争先出卖，既可获得积压的资金，又可援助圣战早日胜利，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我并常常到收买本部鼓励催促收买代理人快快收买。结果收买旧铁六万吨，每吨买价五百元，而时价六百元，每吨损失一百元，共损失六百多万元。收买机器类价值一千五百万元，商民损失约二百多万元。因此哈尔滨市商人多年积存的铁材和机器类一扫净光。摧残民族工业，破坏生产，加强了日寇屠杀同胞的力量，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夏季，伪滨江省公署参事官陈伟儒，突然被伪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长关振升逮捕起来。当时我要求伪省公署警务厅长富田正雄把陈伟儒放出来，他说："陈伟儒是反满抗日分子，人证（陈伟儒的学生某先已被捕）、物证都很完全，他本人也承认不讳，无法释放……。"与陈伟儒被捕相前后，还有十几名爱国人民被捕。后来移交给哈尔滨高等法院，又由高等法院移送营口矫正院。陈伟儒等的被捕事前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既是伪省长，就是等于我的命令逮捕他们一样。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秋季，伪滨江省地区防卫军司令官宇部（少将，忘其名）为加强防卫，在"大哈尔滨旅馆"会议室召集防卫委员会。我以兼任防卫委员会的参与资格出席该会，通过该会决议的战时援助防卫军以人力和物力，和平时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两件议案。

会议三小时散会，我即命令伪滨江省各市县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每月演习一二次，每次因露灯光被警察打骂、关押、处罚者都有十几人。某日我视察防火演习，在哈尔滨市新城大街，眼见演习员一人由梯子上失足落地，负伤很重。其他防空防火用具的置购，人民负担都很重。劳民伤财，损伤身体，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冬季，哈尔滨市警察局警尉黄某（忘其名），在他的朋友家里吃了一个罐头，因而被追问这个罐头的来源（罐头是当时的统制品），事件愈追愈扩大，造成一大经济犯案件，株连一千多人，罚款四百多万元，狱中因刑致死者二人，因受刑后放出成残废者二人，被罚为劳工因而死亡者六人。这一案件为当时日本宪兵队、哈尔滨法院、警察局共同办理的。当时我不知道，事后由伪秘书官赵剑虹对我说的，被害者的姓名都已忘记。但是，这是我执行伪满经济统治法令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春季，我以兼任伪滨江省防空本部长的资格，检阅防卫设备的力量。由哈尔滨市各机关、学校、团体组成防空防火队伍共五千多名，分别行列，肩荷或手携防空防火用具，通过伪滨江省公署的门前，受我的检阅，并举行种种演习，游行示威。惊民动众，徒增骚扰，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春季，我以伪协和会省本部长的资格，视察协和会哈尔滨青年职员训练所。我说话大意："民族协和是本会运动的目标，也是我满洲国穷极的目的。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特别是青年诸位的唯一任务。希望诸位善体我国的建国精神，好好学习，毕业后为民族协和与我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该所每期收五十人，训练六个月，我在任二年间，造成了二百多名的汉奸，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夏季，我以王道书院哈尔滨分院长的资格，到该分

院视察一次。王道书院本院设在长春,郑孝胥捐资创立的。郑孝胥死后,蔡运升(伪参议府参议)继为院长,于一九四二年在哈尔滨设分院办夜学,招收学生百余名,每人每月收学费两元,每夜授课三小时,分为汉文(主要的是孔孟的封建学说)、日语、简单薄记法三科目。但以经费不足,每年由伪省公署补足两千元,并由哈尔滨商人方面捐助一万元作为经费。当时我讲话一小时,大意:“王道、皇道、神道原是一道,是我们亚洲民族共有的道德基础,也就是我国的建国精神。孔子孟子,祖述显彰这个学说于古者,我们应发扬光大它的精神于今世。古今相应,继承道统,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信口胡说,误煞青年,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在长春伪总理官邸召集临时伪省长会议,在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武部说:“为加强日本军防卫的力量计,各省在必要时,须于各城市的周围修筑防卫工事。至于何地当修,何时起修,如何修法,除参看另发的图表外,归任后与该地日本防卫军当局接洽联络,便知详细……。”日寇关东军参谋次长池田(中将,忘其名)亦到场,略说:“时局虽然紧张,日本皇军确有胜利的把握,并且和苏联的条约有效期间还有一年,想苏联不会有何举动……。”会议一天,我即拿着防御工事图表归任,与伪滨江省次长田村敏雄研究后,由田村与伪滨江地区防卫司令官宇部(少将)接洽,他说时机一到,即行通知动工。因此于八月十日,宇部通知伪省公署在哈尔滨市南方修筑防御工事。我即命令哈尔滨市公署和各机关、学校、居民组织劳动队,到现场工作。除防卫军司令部和哈尔滨市公署供给一部分工具外,一般市民均须各自携带工具一件,防空防火用的火铁筒也可以利用。全市共组成劳动队二万多人。不愿出动者,即被逮捕关押起来,因此警察局道外拘留所拘押人民三百多人,道里拘

留所拘押二百多人，共五百人左右。到八月十二日，日寇防卫军司令官宇部突然下令停工，才停止防御工事，拘押的五百多人于十四日也都完全释放。这是日寇已知大势已去，即将宣布无条件降伏，所以下令停工。而我直至日寇崩溃的末日，仍然强制人民为日寇修筑工事，汉奸忠心，如此耿耿，危害人民，应负责任。

〔下略〕

119—2—1112，1，5

曲秉善笔供

（1954年8月21日）

一九二六年四月到一九三〇年三月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毕业。

一九三〇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当满洲医科大学精神病教室医员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当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指导课主事。

一九三二年四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当伪满民政部总务司文书科长。

一九三五年四月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当伪满民政部总务司资料科长兼伪满协和会委员。

一九三六年四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当伪满黑河省民政厅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同年九月当伪满内务局监督处参事官兼第二科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当伪满经济部参事官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

一九三八年二月兼禁烟促进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实践部长，兼伪满国防妇女会理事，兼民生振兴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〇年一月兼庆祝日本二千六百年委员会委员，同年五

月到七月兼伪满宫内府嘱托。

一九四〇年七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兼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国兵事务局局长。

一九四〇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兼长春地方法院调停委员。

一九四一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当伪满民生部厚生司长，兼伪满赤十字社参与，兼伪满军人后援会参与，兼伪满官吏消费组合理事，兼亲属法草案审议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一年九月兼伪满文官考试委员会委员，同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兼恩赐财团普仁资金委员。

一九四二年一月兼伪满庆祝建国十周年委员会委员当食馔部长。

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当伪满四平省长，兼伪满协和会四平省本部长，兼伪满赤十字社支部长，兼伪满军人后援会支部长。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在四平被苏军逮捕。〔中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在满洲医科大学精神病教室当医员补，为了当官发财的个人利益而忘掉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经同教室的日本人医员畑崎俊雄介绍给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顾问中野琥逸，而当了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指导课主事，开始走上了叛逆祖国违反人民的道路。

在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指导课主事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在当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指导课主事职务内，受指导课长日寇牧野克己的命令，翻译来往文件，协力日寇指导各地方，以假自治名义组织的伪县公署统治人民。这是我协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一九三二年一月在东北军退出辽西后，我奉总务课长结城清太郎转达部长于冲汉的命令，到辽西方面，同连络课长笠木良明、日寇四本、益田、汉奸傅乐三等到北镇县与当地的汉奸夏松生县长、郎玺琳、朱子和、彭化邦、柏农会长等勾结，以实行假地方自治为欺骗招牌，组成了叛祖国反人民的伪县公署。在伪县公署成立时，有三百多人参加，日寇笠木良明通过我的翻译，他讲话说，过去东北军阀在东北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现在日本军已经将东北军阀打走，实行地方自治，施行人民要求的善政，希望北镇县全县人民都要协力县公署办理县政。在县共住了五天，四本和益田都留在北镇县当了县的指导人。又同指导课长日寇牧野克己到盘山县，与当地的汉奸李县长、杨商务会长勾结，约定由他们在盘山县成立伪县公署，日后由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派日寇到县做指导人。在盘山县共住了两天。还同日寇神棒到大虎山与台安县的汉奸方向学勾结，约定由方向学在台安组织伪县公署，他当伪县长，神棒去做指导人。这是我给日本帝国主义在各地与汉奸勾结，设立叛祖国反人民的伪县公署，建立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基础。

一九三二年二月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举办建国促进大会，由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哈尔滨特区等地方迫来人民千余人到沈阳参加。目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拿假借民意的建国促进大会给他预定建立伪满做掩盖，以欺瞒人民，欺瞒世界。这个建国促进大会是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决定举办的，由连络课计划主办，部内的日寇和汉奸都参加这个工作。我在准备期内给翻译了标语和传单。标语的内容是，脱离东北军阀，脱离中国，建立独立国家，建设王道乐土、实行民意的善政。传单内容是，东北旧军阀过去在东北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现已被日本军打走，因而要求建立独立的王道国家，实行民意的善政。在开会时期内，我

在大西关旅馆招待从辽西方面来的三百多人。在开大会时我在会场上当进行系。会场是在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礼堂,有一千多人参加,大会的代表〈主席〉团有二十多人,由各地方的代表和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顾问于静远组成,大会由于静远主持开会,调查科长王叙玉在侧面指导进行。在会上有张海鹏讲话,大意是述说过去东北军阀的不好,极应赶快成立新国家,以合民意的要求。各代表的决议是脱离东北军阀,脱离中国,要求赶快建立独立的新国家。最后呼建国促进大会万岁而闭会。大会后举行游行,除了参加大会的一千多人外,还有一千多名学生参加游行,我参加了这个游行。游行的路线从大西关到日〈本〉关东军前,由锦西代表将大会的决议文交与日本军人。锦西代表说,这是我们的决议,希望你们给帮忙。日本军人说,他们尽力帮忙,这都是我给翻译的。以后游行到商埠地找张景惠组织的建国委员会没有找着,回到伪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前而解散了。这是我参加举办的建国促进大会,给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做掩盖,欺瞒人民,欺瞒世界,协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

在伪满民政部总务司文书科长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我在长春参加伪民政部的设立筹备事务十余日。四月伪民政部成立后,我起草伪民政部的办理文书规程,办理文书的收发保管、翻译、缮写,经常给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日寇解释文书,在部内会议上当翻译,在部内进行各司间的文书连络事务。在我当伪文书科长期内,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从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同年九月是日寇中野琥逸,从一九三二年十月是日寇竹内德亥,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是日寇清水良策。这是我协力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日寇,操纵血腥统治人民的伪民政部行政。

一九三二年夏天国际联盟来到伪满调查时,我给日寇总务司

长中野琥逸翻译,给伪民政部次长葆康预备答国际调查团的日文稿子一件,内容大意是,伪满的建立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三千万民意,经日本军的援助而建立的。伪满的一切行政都是由自己做主,日本人是来援助帮忙的。在同年秋天伪总务司长竹内德亥时,我在收文中发现有从地方寄来的给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意见书,内容大意是,伪满是根据东北民意而成立的独立国家,不能再归回中国的意见。像这样的意见书有二十多件,都经我给伪满外交部转去了。这是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欺骗,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

一九三四年伪满实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制变为十省制,我受伪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的命令,担当划分奉、吉、黑三省公署所有文书的工作。我从一九三三年冬天就着手计划进行整理与划分,约费一年的时间,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实行十省制时,完成了文书的划分工作。伪满从四省制度为十省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行政机关对人民的统治力。它的计划起草与实施是在伪民政部内以伪奉天省总务厅长金井章次、伪总务司长竹内德亥、伪地方司长黄富俊为中心进行的,是以溥仪敕令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公布的。这是我参加伪满实施十省制工作,强化了地方行政机关对人民的统治。

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兼伪满防空协会委员。〔中略〕伪满防空协会的会长是臧式毅兼任,专任主事是日寇高木枝一,目的是为了普及防空常识与防空器材。各大都市都设有支部。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同伪满民政部大臣臧式毅到日本,协力他的访日。臧式毅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对日本表示感谢使他当伪满大臣,并表示他做忠实汉奸的决心。随臧式毅去的有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清水良策、土木司长王庆璋、科长都甲文雄等九人。我同臧

式毅到了东京、热海、京都、伊势、奈良、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在东京对日皇裕仁和裕仁的家族都记了帐,拜访了日本首相、内相后藤、本庄繁、东京府知事、东京市长牛岛。在广岛拜访了小矶国昭。臧式毅在东京单独会见了日皇裕仁。臧式毅在各处的发言都是经我给翻译的。大意都是,表示感谢日本对伪满的援助和对他个人的关怀,他决心贯彻日满合作的精神,尽力建设伪满。约一个月的时间臧式毅等都回伪满了。我一个人留在日本,视察日本地方行政两个月,并收集日本的地方行政资料和乡村行政资料。我先到日本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听高须教授对我介绍日本农村的农政问题,农村的行政、生产组合、消费组合、购买组合、贩卖组合、乡藏等问题。高须还领我到宇都宫附近枥木县鬼怒川农村看农村的实态。高须教授是由汉奸郑禹去信给介绍的。我同臧式毅在东京时清水良策曾将我介绍给日本内务省,在我到各地去视察和收集资料时给我以方便。我经日本内务省的介绍先后到了东京市、横滨市、仙台市、青森县、札幌、旭川等处去视察。我在东京市看了市的社会事业、卫生施设、上下水道、公园、坟地等共视察了五天,在横滨市视察了两天,看了与东京市同样的各种施设。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底到日本的东北北海道去视察,在仙台市住了四天,看了市的卫生、社会事业、上下水道、公园等施设。在青森县住了三天,看了乡藏的施设并听了各乡乡藏运用的情况。在札幌主要看了牛酪组合、工艺所、屠宰场、农业试验场,并到旭川看了农具制造厂,共住了五天。我在各处都收集了许多关于日本地方行政和农村行政的资料。三月末回到伪满后,对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报告了我的视察情况并夸奖了日本农村的先进。将资料交资料科保管,以备各司科应用。这些资料成了伪民政部计划起草实施街村制的基本资料。〔中略〕

在伪满黑河省民政厅长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在黑河街师范学校举办了黑河全省教员讲习会，参加者五十多人。日期十天。目的是为了使伪满的奴化教育彻底在黑河省内实施，奴化学生。讲习内容，主要是给教员们灌注伪满建国精神以作他们奴化学生的工具。经我的请求，由伪文教部派来属官丁莘白和日寇久保田二人当讲师，丁莘白担任讲伪满建国精神、伪满教育的目的和根本方针。他讲的大意是，伪满是以建设王道乐土为目标的独立国家，与日本人一德一心，伪满的发展都是由于日本的援助。伪满教育的目的是以培养伪满的忠良国民为目的。伪满的教育根本方针是以实务教育为根本方针，对学生不是偏重于课堂上的学科，还必须使学生劳作。日寇久保田对教员教伪满建国体操。伪民政厅教育科长陈伟儒给教员们讲教学法和关于事务连络。我在讲习会将要终了时，对教员们讲话。大意是，命令各教员要把此次讲习的内容彻底灌注给学生，奴化学生，使学生都成为伪满的忠良国民，并要对学生彻底实行伪满的实务教育方针，使学生一方面上课，一方面做劳作，协力修道拔草。教员们回到学校后，都彻底实行了我的指示，加强对学生的奴化与奴役。这是我给日本帝国主义在黑河省内贯彻实施了奴化教育，并给黑河省推行奴化教育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以伪黑河省民政厅长资格到长春参加伪满文教部召开的审议伪满新学制草案的会议。新学制草案是伪文教部教育司起草的，主要是将伪满沿用中国的三三学制，改为小学教育国民初级四年，优级二年，中学教育四年。大学教育三年。把各级的教育都孤立起来，使之不相衔接，中学仅限于农科商科工科，大学仅限于医科、法科、农科、工科，并着重实务教育，贯彻劳作。目的是降低伪满的教育水准加强对学生的奴化奴役。会议通

过了这个草案,在一九三七年春天用溥仪敕令公布了伪满的新学制,而普遍实施了。新学制草案审议会是由伪文教部大臣阮振铎主持开会,参加审议的是各省的教育厅长,因为黑河省没有教育厅,所以我以民政厅长名义参加,也有中央各部的一部分人参加,共四十多人。这是我参加审议通过伪满新学制,加强对学生的奴化与奴役。

一九三六年十月,由我计划,经伪文教部许可,在黑河街设立了男女中学校各一处。经费由〈中〉央拨给。当时这两个学校都有一百多名学生。对这些学生彻底实行了伪满的实务教育方针,使学生一面上课,一面做劳作,协力修道拔草。以后这两个学校都发展到四班,学生数都发展到三百多人。〔中略〕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因为内务局监督处预定在当年的冬天对龙江省公署施行地方行政财政的监察指导,遂到龙江省公署使其进行准备,并督励其彻底施行街村制。〔中略〕

在伪满经济部参事官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伪满经济部参事官职务内担当给伪经济部大臣韩云阶备用他名义与所属各机关来往的文件。这是我协力伪满的经济行政。

一九三八年二月兼伪满禁烟促进委员会委员,参加制订了禁烟法。这个禁烟法是由伪满总务厅参事官雍善耆起草的。目的是以鸦片十年断禁政策作烟幕来强化伪满的鸦片毒害政策。禁烟促进委员会是以伪总务厅总务长官星野植树为中心各部大臣次长等组成的。禁烟法在禁烟促进委员会通过决定后,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名义,在伪满政府公报上公布了。我并通过伪协和会的地方组织给宣传鸦片十年断禁政策来欺骗人民。在禁烟法公布后,伪满政府就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加强鸦片毒害政策。设立禁

烟总局，停止由专卖总署贩卖鸦片，改由禁烟总局贩卖，将私营的鸦片零卖所改为市、县公营的管烟所，扩大种烟区，扩大销售鸦片，使鸦片中毒者遂〔逐〕日增加。据一九四一年伪满政府发表的鸦片瘾者登录人数有一百万，而实际鸦片瘾者超过这个数字的好几倍。伪满政府从鸦片毒害政策每年收入的纯益，在一九三九年是五亿元，以后每年都有巨额的增加。

在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实践部长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在伪协和会实践部长职务内，办理了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的三次全国联合协议会。全国联合协议会是在每年九月或十月举行。目的是以宣德达情为幌子，推行伪满各种反人民政策，要胁参加的协和会员代表，回到地方广泛普遍宣传协行推行实施。会期是五天。参加的协议员有伪协和会的参与委员、各部大臣、次长和地方的协和会员代表，共约四百人。议长一九三八年是冯涵清、一九三九年是丁鉴修、一九四〇年是谷次亨。我在协议会上当书记长，并随时将协议会的准备情况、进行情况和结果广播给全伪满。议案每年都有二十到三十多件，这三年间的主要议案有：禁烟问题、斡旋购买马匹农具问题、兴农合作社问题、废除粮栈问题、交易场问题、粮谷出荷问题、开拓问题、学校问题、劳工汇款问题等。这些议案都没有得到解决。通过伪满各院部在协议会上说明施政方针和解答问题。这三年间向地方协和会员代表推行宣传了鸦片毒害政策、开拓政策、粮谷出荷、兴农合作社、新学制、劳工政策、产业开发等各种反人民的政策，并在一九四〇年协议会的分科会上决定有日本开拓民不出荷的决议。我还在这三年中参加了三江省、北安省、龙江省、牡丹江省、通化省、吉林省、热河省、安东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的省联合协议会，和蛟河县、辽阳县的县联合协议会。在各地

的协议会都代读了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的训词,大意是联合协议会是宣德达情的机关,地方协议员的任务就是要在协议会上反映地方情况,回到地方去要宣传政府的各种政策,协力实施。这是我以联合协议会为欺骗工具,给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宣传各种危害人民反人民的政策。〔中略〕

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我当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实践部长职务内,彻底实现了二位一体制,就是伪省长都兼伪协和会的省本部长,伪市、县长都兼伪协和会的市县本部长,街村长、区长都兼协和会的分会长,在都市里町会长都兼协和会的班长,邻组长都是协和会的组长,在农村里屯长都兼协和会的班长。在各协和会分会里都没有专任的书记,书记由市县本部指派或由分会自体采用,并使协和会的组织普遍于全伪满各农村各都市里,彻底实现了伪满协和会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组织,这大大增强了伪满协和会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的机能。协和会的末梢组织不仅成为对人民宣传和推行伪满各种危害人民反人民政策的强大力量,也是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活动的一个重大打击。〔中略〕

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在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实践部长职务内兼伪满国防妇女会理事。伪满国防妇女会是伪协和会的外廓团体,是由协和会中央本部辅导部负有辅导责任。国防妇女会是在一九三四年仿照日本的国防妇人会而组成的。国防妇女会的会长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老婆徐芷卿,副会长是伪满总务厅总务长官星野植树的老婆。各省都设有支部,支部长都由伪省长的老婆担任,副支部长由伪省次长的老婆担任。会员是以各都市内已结婚的妇女为目标。可是中国妇女都不出头参加,只有少数汉奸的老婆出头参加活动,长春当时只有四十多人经常参加。她们的活动是每月到车站去迎送日本法西斯军死亡的

遗骨,慰问伪满军队,和在每月八日在街头上募集国防献金。募集的方法是用废布做成小花,对于献纳小额献金者都给一个小花。我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在国防妇女会的支部长会议上,宣传讲过伪协和会,要求她们协力协和会活动。

一九四〇年四月经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我同伪满皇帝溥仪去日本,以庆祝日本二千六百年为假借名义,搬取日本的天照大神。目的是拿日本天照大神做侵略工具,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实践日本惟神之道,与日本一德一心,听从和协力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五月我被任命为伪满宫内府嘱托(这是因为伪协和会实践部长不是官吏,是人民团体,没有资格跟溥仪去),随溥仪去日本搬取日本天照大神。同去的有熙洽、张海鹏、韦焕璋、星野植树、崔正儒、木田清、荒井、吉冈参谋等三十多人。从大连坐日本军舰到日本。我在日本东京随溥仪见过日皇裕仁,受到裕仁的招待,还受过日本首相米内的招待。我在东京曾向伪满广播溥仪在日本受日本皇室和日本人民欢迎的情况。大意是,溥仪到日本东京时日皇裕仁亲到车站欢迎握手为礼。溥仪住在赤坂离宫,日本大正的老婆特别关怀溥仪,特遣侍女侍候溥仪,每天给溥仪送点心吃,日本的臣民也都热诚沿途迎送溥仪,这是使伪满人民非常感谢的,所以,伪满人民必须与日本人民一德一心,以报答日本人民。在东京住了五天到京都,在京都我参拜了伊势神宫。在京都住了三天,就又坐日本军舰返回伪满。溥仪把取来的天照大神带到伪宫里供奉。随着就在溥仪住处的傍后边盖了一个木头小庙。供奉天照大神,名之曰建国神庙。伪满政府先后用溥仪敕令公布祭祀府官制和对建国神庙的不敬罪,设立祭祀府,任命桥本虎之助为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为祭祀府副总裁,和神官多人,掌管建国神庙的祭祀事项。溥仪在七月十五日发出国本奠定诏书,对全伪满

各机关人员、官吏、军人都发给建国神庙纪念章。国本奠定诏书里说，伪满的发展都是由于日本天皇的保佑，天照大神的神庥。又说国本奠于唯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都。教导人民都须致崇敬于天照大神，与日本人民一德一心，实践唯神之道。对于建国神庙的祭祀，每年七月十五日都举行大祭，在长春的简任官以上都必须去参加，对之行九十度的鞠躬礼。我曾参加过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祭。平时每月都有小祭，由祭祀府神官和溥仪供奉。从建国神庙建立后，全伪满各地的各机关、各学校、各兵营都修了大小不同的小庙供奉天照大神。〔中略〕

一九四〇年七月我兼伪满协和会内国兵事务局局长。这是因为伪满在同年六月用溥仪敕令公布了国兵法，开始实施征兵制度。凡满十九岁的青年都要受国兵检查，从合格者中决定入伍。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为了协力伪满政府对人民宣传国兵法，麻醉青年当国兵和对各伪省公署办理国兵事务人员进行普及和指导如何办理国兵事务，特设一临时性的国兵事务局(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取消了)，设有专人到各省公署对办理国兵事务人员进行宣传国兵法，普及办理国兵事务，指导其编造壮丁名簿和办理军人援护事宜。并使协和会各地方组织对人民大肆宣传伪满国兵法，麻醉青年只有好人才当兵，当国兵是光荣的，是伪满皇帝的军队，是保卫伪满的干城。在编造壮丁名簿上，我听国兵事务局的日寇斋藤对我说，龙江省和通化省内，曾发生有虚报年龄者和冒名顶替者，都经县方查出，令其更正，并使警察对之加以惩戒。一九四〇年国兵适龄的壮丁检查，是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开始施行的。当时伪满挑选了二万多人入伍。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代表伪满协和会到北京参加新民会的协议会。伪新民会的协议会是在怀仁堂开的，参加的有北京各伪机

关人员和华北各地方新民会员代表，共二百多人。协议会开了四天。主要协议的议题，是关于农村的合作社问题，农村打井灌溉问题等。协议会由伪新民会部长宋介主持开会。我在伪新民会协议会开会的第一天，代表伪满协和会致祝词。大意说，伪满协和会是伪满政府的精神母体，伪满的联合协议会是伪满的宣德达情机关，伪满由于协和会而飞跃发展。新民会是伪华北各机关的精神母体，新民会的协议会是华北人民的宣德达情机关，华北由于新民会而突飞猛进。新民会与协和会的性质和任务完全相同，并且华北与伪满在地理上、经济上大有密切关系，希望今后新民会和协和会更进一步地密切连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共同奋斗。祝新民会的发展和协和会的成功。这是我对华北人民宣传伪满协和会，代表伪满协和会与伪新民会勾结，协力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伪满民生部厚生司长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受伪民生部大臣谷次亨的命令，办理设立恩赐财团普仁资金。在同年十一月恩赐财团普仁资金成立后，我兼恩赐财团普仁资金的委员。恩赐财团普仁资金是拿溥仪发下的办理社会事业用的一百万元作基金成立的，每年将利息的一部作为奖励伪满办理社会事业的资金。目的是为了宣传伪满皇帝溥仪仁慈，使人民对他尽忠诚，并从全满募集奉赞金扩充财团，决定从全伪满募集八百万元奉赞金，规定各省和长春市的负担募集金额，用伪民生部大臣谷次亨名义命令各省和长春市募集奉赞金。我在同年秋天对四平省干部、市县长二十多人，宣传过恩赐财团普仁资金成立的经过，要求他们协力募集奉赞金。〔中略〕

一九四一年九月兼伪满文官考试文委会委员，我同伪总务厅人事处长星子、王富海等五人到朝鲜京城、日本东京、仙台各帝国大学考取当地希望到伪满当伪官吏的日本学生。各地受考试的日

本学生都有一百多人，考试内容是口头试问对于伪满的认识和本人的抱负，共决定录取二百多人。我还在一九三九年秋天一九四〇年秋天参加过伪总务厅人事处对伪满文官从委任官升格荐任官的口头试问。每次受试问的有四百多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合格升为荐任官。口头试问的内容是，一般业务、伪满建国精神、协和会、日本的国际形势。担当试问者有人事处的参事官、各部的指派人员共十余人，分班采点决定合格与否。这是我替日本帝国主义选拔屠杀中国人民的侩子手，和替日本帝国主义选拔忠实汉奸帮凶侵略中国的人才。〔中略〕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我到伪国务院总务厅参加审议通过国民训草案。国民训草案是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命令伪总务厅日本人起草的。目的是，以伪满建国十周年为机，进一步奴化人民麻醉人民，使人民都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溥仪。参加审议的是以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为中心，各部次长、协和会总务部长、伪总务厅次长卢元善和我共二十多人。国民训草案共分五条，第一条，国民须知，满洲建国由于唯神之道，致崇敬于建国元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第三条，以礼让为旨。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的内容我忘了，大意是与日本一德一心，灌注封建道德，麻醉人民、奴化人民的内容。审议中武部六藏主张把第一条的建国元神改为天照大神，卢元善主张把第三条以礼让为旨改为以礼让为先。我都表示了赞成，并通过了其他各条。这个国民训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名义在伪满政府公报上公布了。在国民训公布后，伪满各机关有的在每天早会时或者在每月八日，全体伪职员合唸这个国民训，各学校也讲解这个国民训，使学生背诵，加强奴化和麻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受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

命令,以伪满协和会派遣讲演人名义,到南京参加伪汪精卫东亚联盟举办的日本太平洋侵略战争周年纪念。一同去的有伪满参议府参议张焕相、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部长王子衡。目的是伪满协和会与伪汪精卫东亚联盟约定,在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侵略战争周年纪念时,互相交派讲演人,对人民宣传日本太平洋侵略战争胜利,强调协力战争。我到南京后,决定我在苏州讲演。十二月八日午后二时,当地伪东亚联盟举办了日本太平洋侵略战争周年纪念集会,会场在苏州体育场,参加的有伪省政府主席李士群和其他人员与五万多人民。我就在这个会上讲演了。〔中略〕

在伪满四平省长职务内的罪恶事实:

关于粮谷出荷。我在伪四平省长职务内,在一九四三年完成了八十万吨出荷量和报恩出荷五万吨,一九四四年完成了九十万吨出荷量,一九四五年预定出荷量是一百万吨,因日本投降了没有出荷。对于出荷,我采取的办法:每年三月在我参加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召开的伪省长会议后,将出荷量交给省实业厅的主管参事官,分配省内各县的出荷量,召开省内各伪县长会议,命令各县在春季分给县内农民的出荷量,督励农民增产。在省内各县召开增产粮谷指示出荷量的街村长会议时,我与省次长关口保、角田忠夫分别到县参加会议。我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参加过东丰县的粮谷增产街村长会议,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参加过昌图县、双辽县的粮谷增产会议。在会议上我指示各街村长,必须在春季将出荷量分给农民,使农民按照县指定的数量种类去增产,不许撂荒土地,并监督其增产。在每年十月将要开始出荷前,召开省内伪县长会议,我指示各伪县长必须用一切方法完成出荷量,以协助日本太平洋侵略战争。在出荷期,将省公署主要人员实业厅长、警务厅长、民生厅长、关系参事官、科长,兴协和会事务长、科长,兴农合作社干部、

中央银行干部组成两班，每班二十多人，我与伪省次长各领一班，分别到各县去督励出荷。每到一县则召集伪县公署职员、协和会职员、兴农合作社职员对他们讲话。并给伪县长出荷酬劳金五百元，鼓励他努力督促出荷。还招待县内各机关首脑部吃饭，要求他们协力粮谷出荷。在一九四四年春天，用我的名义做成五百多张出荷成绩优良奖状和做花瓶五百多个，分给各县发给办理出荷成绩好的街村长和出荷成绩好的农民，以作鼓励。各县在出荷期内，都将县公署一部分伪职员、协和会一部分伪职员三十多人或五十多人，分为七八班深入县内各村屯督励农民出荷，他们都住在村屯里，迫使农民日夜赶紧打粮，监视装车送粮，用尽一切打骂搜查关押手段，威胁农民出荷。梨树县协和会还采取了白旗出荷青年行动队的办法，迫使农民出荷，将各村屯内受过协和会青年训练的青年，组织出荷青年行动队，使他们无偿地在村屯为督促农民彻夜打粮，监视装车，由他们把出荷的大车集在一起，插上出荷的白旗，领率到交易场出荷。交易场的出荷粮谷收买价格，高粱每百公斤七元八角，大豆每百公斤十二元，较私价低十倍或二十倍以上，农民遭受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农民遭受打骂是普遍经常现象。昌图县的副县长佐藤，对于县内出荷较慢的农民，迫使其摘下帽子，脱下鞋子，罚其站在雪地上受冻，一直到农民承认赶快出荷为止。出荷后农民手里就没有余粮了，在青黄不接时期，农民用野菜充饥。用高价购买私粮，因而犯经济被关押在警察拘留所或监狱者每月各县平均有二百多人。我因为出荷有功，在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伪省长会议时，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给我二千元出荷酬劳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伪省长会议时，武部六藏给我三千元出荷酬劳金。这是我迫使人民粮谷出荷，给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粮谷，使广大农民遭受灾难。

关于供出劳工，动员勤劳奉公队员，征用大车。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当伪四平省长职务内，每年都命令各市县供出四万多人劳工。供出劳工的办法，各市县根据我的指示的人数、作工地点，命令各街村区，按有劳动力的户口逐户指派出人，如本人不能自己去，则必须花八百元或一千多元雇人替去，如若拒绝不去或逃躲，则由警察加以处罚，迫使其就劳。这四万多人就劳地点，大多数是到黑河地方山神府给日本军修军用道路、飞机场、兵舍等，一部分在西安炭矿做工，一小部分在省内修东辽河的堰堤，给日本开拓民造水田农地，和在省外给日本企业做工。这些劳动人民不论是在那处做工，都是每天只吃六百瓦粗粮或橡子面，没有菜，睡在席棚里，没有衣服穿，夏天赤身露体，冬天用破麻袋、破洋灰袋裹体，每天在严厉的监督下，做着十二小时以上的沉重不堪的劳动，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每年根据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金名世、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的命令，使各市县按照国兵漏名簿，动员勤劳奉公队，每年动员勤劳奉公队员四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平省内修堰堤，给日本开拓民造水田农地，一九四三年在梨树县内修哈大道路三百人，在辽阳修防水工程三百人。一九四四年在大连造洋灰船和在鞍山工厂做工五百人。一九四五年在海龙县修道五百人。勤劳奉工队在各处做工，每天只吃六百瓦粗粮或发霉的苞米面，没有菜，睡在席棚里，每天做工十二小时以上，挖土量三立方米以上的工作。患病率百分之二以上，死亡率百分一以上。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省内梨树县受我的命令，平均每月征用一百辆大车，每年征用大车六百辆（按六个月计算的），三年间共征用了一千八百辆大车，每辆大车平均马按三匹计算，则马为五千四百匹。车马的损失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关于开拓。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当伪四平省长后继续进行了一九四二年经伪满总务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命令决定的四平省开拓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以东辽河治水为招牌，在梨树县东辽河赫尔苏修堰堤一个，在其下游东辽河的沿岸造水田农地，从日本移入开拓民。关于水没地的买收，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上旬，由前伪四平省长徐家桓收买完了，共收买了约二万垧。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到四平当伪省长后，就着手在四平省公署内设立一个外局——东辽河开发局，局长由伪省次长关口保兼任，开始决定先在二龙山、老公林子等三处造水田农地五万垧，全部经费都由伪满国库负担，为九千万元伪币。每年都动员约四万人勤劳奉公队和二千多劳工。这些勤劳奉公队、劳工们，每天只吃六百瓦粗粮或发霉的苞米面，没有菜吃，睡在席棚里潮湿的土炕上，每天工作时间十二小时以上，每天的挖土量在三立方米以上。因为他们都吃不饱，他们的家人都远道跋涉来给他们送吃的。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的患病率是百分之二以上，死亡率是百分之一以上。赫尔苏的堰堤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完成了，五万垧的水田农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将要完成。四平省内共有十二个日本开拓团，有日本开拓民一万一千户，分散在东丰县的莲河、开源县、昌图县牤牛蛸，双辽县的双山等处。这些日本开拓团都是在我到四平当伪省长以前入植的。这是我给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开拓政策，使中国人民遭受掠夺、危害、损失、奴役、疾病和死亡。

关于储蓄。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三年间，每年都受伪满经济部大臣阮振铎的储蓄命令，我都完成五千多万元的储蓄额。对于储蓄额的负担办法是，由省内各银行、各机关、各会社、各工商业、邮政局和各市县住户负担。我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同四平市中央银行行长日寇、省公署实业厅长王保粹到开原县、昌

图县督励储蓄，我出名招待县内各机关的首脑部与工商业的代表，对他们讲话，要求他们协力储蓄。对于农民储蓄，我命令省内各县在出荷时，按粮价的百分之二十，迫使农民在领到粮价后，立时储蓄，不储蓄者，就不配给物资。在各交易场里都设有办理储蓄的专责人。一九四三年完成农民储蓄一千八百万元，一九四四年农民储蓄二千万元。四平市协和会市本部，从一九四三年开始，通过市内邻组，每月按每户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五，迫使其购买必胜储蓄票，这个金额，每月为七千元，每年为八万四千元。这是我强迫人民储蓄，掠夺人民财富，协力日本太平洋侵略战争，协力侵略中国。

给日本帝国主义献纳飞机、献纳金属钢铁。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当伪四平省长兼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长后，命令省内协和会各本部继续进行献纳飞机、献纳金属钢铁运动、八钱献金运动，和四平市协和会市本部的资源爱护、废品收回运动，并命令省内各学校继续使学生每月献纳飞机献金。献纳飞机运动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一九四二年协和会普遍展开的运动。一九四三年秋天，昌图县协和会县本部主办、由全县人民摊派，给日本关东军献纳了一架飞机。一九四四年秋天，开原县协和会县本部主办、由全县人民摊派，给日本关东军献纳了飞机两架。飞机每架二十万元。八钱献金运动，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从一九四二年四平省协和会、各市县本部都展开了这个运动，办法是，由各市县内的协和会分会，在每月八日使分会内的人民献纳八分钱以上的献金，将钱集在一起，经由各市县协和会本部交给四平省协和会省本部，由省本部给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这个八钱献金运动，在一九四三年一年间，四平市迫使人民献纳了一万六千元，将各县的八钱献金额与四平市同额计算，则共为十六万元，三年间四平全省共迫使人民献纳了四十八万元，在一九四五年春天给日本关东军

献纳了两架飞机。资源爱护、废品收回运动。这是四平市协和会市本部,在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从一九四二年展开的。目的是将收集的废品变卖,将钱作为给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献金。办法是,由市内邻组从各户随时收集碎玻璃、瓶子、废布、纸盒子、金属废品等集在一起变卖,将钱作为飞机献金。学生献纳飞机献金运动是在一九四二年伪民生部教育司命令全伪满各学校展开的运动。目的是给日本关东军献纳飞机,协助日本侵略战争。办法是,由各学校教员对学生宣传日本侵略战争,使学生协助日本侵略战争,每月献纳飞机献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已经凑成了金额四十万元,经我在五月给日本关东军献纳了飞机两架。献纳金属铜铁运动,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一九四二年伪协和会在全伪满普遍展开的运动。目的是将收集的金属铜铁运往日本,供给日本制造武器,协助日本侵略战争。办法是,由各市县协和会本部对人民普遍宣传献纳金属协助日本侵略战争的意义,由邻组或分会逐户迫使献纳铜铁。在四平市内各户都将门窗上的铜铁、箱柜上铜铁启下来献纳了,有的将佛像或牌匾都献纳了。四平市收了三十吨铜铁,这些铜铁都由日满商事运往日本去了。我在当伪四平省长职务内,共给日本关东军献纳了飞机七架,每架二十万元,共计一百四十万元,共给日本送去了二百一十吨铜铁。这是我掠夺人民的财富金属物资,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给日本关东军供出各种物资。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每年都根据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的命令,命令省内市县迫使人民给日本关东军供出各种物资,有各种皮革、兔皮、猪皮,各种毛类、油类、动物油、肉类、鸡蛋、干菜、山葡萄、猪内脏器等。办法是,除了山葡萄是由产山葡萄的海龙县采集外,其余物资都是由县分给各街村的负担量。全省每年各种物资的供出量是:一九四

三年，肉类三千二百吨，各种皮革八百二十吨，兔皮十二万张，猪皮五万二千张，各种毛类二千八百吨，各种油类三千二百吨，动物油五十二吨。一九四四年，肉类三千五百吨，各种皮革八百八十吨，兔皮十五万张、猪皮五万五千张、各种毛类二千八百吨、各种油类三千五百吨、动物油五十五吨。一九四五年，肉类三千八百吨、各种皮革九百吨、兔皮十五万张、猪皮五万五千张、各种毛类二千八百吨、各种油类三千八百吨、动物油五十五吨。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听海龙县伪县长窦毓清对我说，海龙县为了采山葡萄，每日全县动员一千多小学生上山，小学生们终日爬山越岭，衣服被树枝划破，鞋子被石头磨坏，每天有五六十学生被蜂蜇虫蛟中毒，面手红肿、吐泻、摔伤。采来山葡萄后，还加入石灰给熬成块，在熬山葡萄时，有一人站在锅台上搅拌，滑掉锅里而被烫死。这些供出物资都是由各县的兴农合作社收集转交日本关东军。

对于四平市和各县县城的残酷配给。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当伪四平省长职务内，根据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为中心的物动委员会的指示，对于四平省四平市人民和各县县城人民，在一九四三年每月每人配给十一公斤粗粮或橡子面，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又根据指示减为九公斤，每隔三四个月配给一次豆油，每次每人的配给量都在一斤以内，每年配给两次粗盐，此外什么东西也不配给，就连灯油、煤都不配给，过年过节向来没有配给过肉和面。人民配给的食粮不够吃，每天拿土豆子当饭吃，或者迫不得已花大价钱，比配给价格高出十倍或二十倍以上的价格买私粮吃，因而犯经济犯，被处罚关押在拘留所或监狱里的，每月平均各市县都有二百多人。一般人民在当时都是营养不良，夜间不能点灯，冬天不能取暖，穿的都是破烂不堪的麻袋更生布。这是我推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残酷配给制，来危害中

国人民。

推行鸦片毒害政策。一九四三年四月受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的命令,我在四平省梨树县种一百亩菜园子地的罂粟,在开原县种一百五十亩菜园子地的罂粟,生产鸦片。在梨树县成立了一个鸦片生产组合,在开原成立了两个鸦片生产组合。每亩地生产二百两鸦片,共生产五万两。在我当伪四平省长职务内,三年间共生产了十五万两鸦片。这些鸦片都由鸦片生产组合替禁烟局收买。禁烟总局收买后制成烟膏,配给各管烟所贩卖或向华北华中输出。收买价格每两由八元到十元,比私价低十倍或数十倍以上。四平省有鸦片瘾者十万人,这是一九四一年登录的数字,实际则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对登录瘾者,平均每日每人配给三个烟份,每个烟份约二分多,平均每人每年二十两,共二百万两,三年间共六百万两鸦片。烟份每个的配给价格是五角,加上储蓄共为一元五角,每人按三个烟份计算,每天需四元五角,一年则需一千六百四十二元五角,十万人每年需一亿六千四百二十五万元,三年则共是四亿九千二百七十五万元。禁烟总局每月将四平省需要的鸦片量经过省公署配给省内各市县管烟所售卖,四平省内四平市、各县都设有五处到十多处的管烟所,全四平省共约有一百处管烟所。每个管烟所内平均有市县公署委派的公吏十人,全省共有一千人。这一千人都是伪警察的触角,给伪警察作特务工作。管烟所人员经常把烟份流出私卖,每个烟份能获得十倍或数十倍的利益,还有私设野妓招引吸客,获取私利,扩大瘾者,使鸦片瘾者逐日增加。鸦片中毒者中,有由于受经济的限制或取得鸦片的困难,不能用吸食的办法解瘾,遂用最危害身体的办法,向血管内注射鸦片水。鸦片中毒者中,估计有二分一以上破产,家破人亡,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中略〕

执行国兵检查。我在当伪满四平省长职务内，根据一九四〇年六月以溥仪敕令公布的国兵法，我执行了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中途停止的国兵检查。国兵检查是在每年七、八、九月中举行。我在每年将要开始国兵检查前，与军管区征兵官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关某联名在四平省公署召开四平市征兵官和各县征兵官会议，指示各市县征兵官准备进行国兵检查。各市县的国兵检查场里，负担检查的人除了市县征兵官外，都是伪军管区委派的伪满军官和军管区临时征兵军官，配有伪满宪兵。在国兵检查期内，各县的街村长、四平市的区长，都受县市征兵官的命令，将街村内区内满十九岁的青年，对照壮丁名簿，集合在一起，由他负责引率到国兵检查场去受检查。由市县征兵官和军管区临时征兵官共同决定合检与否。国兵检查后按入伍的需要数，从合格者中按市县区村街抽签决定，中签者于次年三四月入伍。其余受检查而未入伍的青年，都是勤劳奉公队员，必须服每年四个月连续三年的劳役。四平省每年受国兵检查的青年是三万人，其中有三千人入伍。我在国兵检查期内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都以省地方征兵官资格到四平市国兵检查场去视察。〔中略〕

推行奴化教育。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当伪四平省长后，命令省内各学校都要供奉天照大神，领取时局诏书，每天早晨都要对建国神庙、日本皇宫、伪满帝宫遥拜，每月八日对学生宣读时局诏书，使学生说日本话，学日本语，在建国精神课程里，给学讲解伪满建国宣言、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国民训、唯神之道、时局诏书等，麻醉学生忘掉祖国，作伪满的忠良国民。又为了使学生实践伪满的实务教育根本方针，使学生每天一方面上课学习，一方面服劳作，协力修道、拔草、打扫日本神社。开原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使女学生种水田。还使学生继续每月献纳飞机献金，到一九四五年

春天已经凑成了两架飞机的金额四十万元，在五月经我给日本关东军献纳了两架飞机。四平省内共有学校三千六百校，受奴化教育的学生共十八万人。〔中略〕四平省内各县协和会本部都各设有青年训练所一处，由伪县长兼青年训练所的所长，设有专任日寇主事负责办理。青年训练所是以爱国爱乡爱土为号召训练县内从十六岁到十九岁的青年，分为第一期训练第二期训练第三期训练，每期都是四个月，训练内容是伪满建国精神、协和会、内外常识、农业技术、军事训练等，每年训练一次或两次，每班人数由三十人到五十人。省内各县平均都有九百多人受过青年训练，全省共有九千多人受过青年训练。受过青年训练的青年都成为录取国兵的唯一对象，各县协和会经常奴役这些青年，使其在村屯内宣传粮谷增产出荷储蓄等。梨树县协和会从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在出荷期内，将县内受过青年训练的青年组成白旗出荷青年行动队，迫使在村屯内督励监视出荷。这是我给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化教育，奴化青年、麻醉青年、奴役青年、掠夺青年、迫使青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做叛逆祖国反人民的汉奸。

修哈大道路。一九四三年五月根据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的命令，命令梨树县没收县内杨木林子附近十里长二十七丈宽哈大道路用的土地。共没收了四千八百六十平方丈土地，动员三百名勤劳奉公队员从事修道。这段哈大道路在同年十月完成了。这是我掠夺人民土地，奴役青年给日本帝国主义修输送军队物资的哈大道路。

〔下略〕

119—2—1157，1，5

王贤沣[1] 笔供

（1954年5月8日）

在伪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年)，我参加了伪组织，当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在这个时候，安东省各县，大部是边区，有土匪也有抗日部队，打击日寇的侵略力量。所以日寇军队会同伪军警，以日军为主体到各县讨伐。在讨伐中，对于山区里的零星住户，或是小的村屯，认为有被胡匪利用或居住可能的，就当时命令进行并村，也叫集团部落。这种并村，据说只给一二天的期限，到期就把房子烧掉，一般农民有的观望不动的，甚至不等迁移，就把衣物、家具、粮食等都烧掉了，人民的损失是不可统计的。在县里实行并村后，因为村名有变更或是有取消的村屯，及其原因，要报省备案存查，归行政科主管。

在伪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秋，民政部又颁布了村行政大纲，为了强化地方行政，行政科本着这个村行政大纲，用省长的名义通令各县，指示各县要强化村公所的组织。各县本着这个指示，实行整顿村公所，同时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帮助警察清查户口，加强对人民的管制，帮助警察镇压人民。我在伪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年)，曾到过凤城、庄河、临江、长白、宽甸等县视察，由县的行政科长陪同我，到县城附近的村公所视察，看看村公所的组织，并没

---

① 王贤沣曾任伪满奉天市市长、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等职。——编者注。

有讲话，也就是问问村长，有多少住户和义仓积谷如何？我看到有的村公所是旧有的，又经修理整顿，有的是并村后修的大围子，大门像一个小堡垒。在宽甸县有一个这样的村子，据县行政科长邵立秀说，有的耕地离村子太远，因为当天去作不了多少活天就黑了，老百姓没有法就不去耕耘了，因此就撂荒了。这就是并村给人民带来的灾害之一点。我听到后，回县和县长说，县长说是由日军的指定，期限非常短促，当时就要烧房子，谁也没法更改，县里只有帮助解决耕地的问题而已。我再看看保甲的编制，每个村公所约有二十个保甲，那时还未有枪，只作警戒联络的工作。这就给人民添了负担，多造成一些不生产的游民，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的。又实行义仓积谷，每天地按收获量征收百分之一的谷子，归村公所收管，报县，由县报省，作为准备荒年救济用的，但是实际上并未救济人民，徒使人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我为了支持日寇的讨伐，推行了危害人民的并村政策，不但使多少农民流离失所，而且打击了抗日联军的抗日力量。又推行了义仓积谷政策，给人民加重了负担，带来了贫困，所以我的罪恶是严重的。

在伪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由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调任新京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没有一定的职责分担，是辅佐人事处长的。在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春，由人事处规划科长松崎立案人事制度，提出处内科长会议。我也参加这个会议。经过处内会议通过这个草案后，又经人事处长源田松三通过法制处，企划处的审核，以后提出次长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正式通过公布的，这就是伪满的文官令，主要的是将旧有的官等俸级加以改正。还有新实行的是考试制度。高等文官有考试，分登格考试，适格考试，采用考试。委任文官也有考试，就是说凡是当伪满的官公吏，不能随便采用，必须经过考试。考试的标准，

又采取会日本话和日本留学生为主。还有语学考试，中国人会日本语的官公吏，经过语学考试后，有语学津贴的奖励，因此，限制了中国人的伪官吏，好多增添日本人的伪官吏，也加强了奴化教育的推行。中国人只要想当伪官吏，就必须学日本话。

在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秋和伪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秋，我曾两次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到日本去考试日本留学生和日本学生，为期约一个月，去了旅途，共计约有二十天的考试。每年录取约百名左右，内中日本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考试委员五个人，实行采用考试的口头试问，共同记分，总评分后，由委员长取决。在伪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春，在新京人事处实行过一次高等文官登格考试，我又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考试伪满现职官吏，就是晋级的考试，为期约一个月，受考试的人约四百余名。

因为文官令的实行，我曾代表人事处长用中国话在广播中广播，大意是人事制度的官等俸级改定的要点，和考试制度的实行，为了适材适所赏罚分明之意。但是这个文官令的实质，是限制了中国人，放宽了日本人。比如说，日满人同等的官等，但是日寇的俸级高，日寇还有国外津贴和官舍的待遇等优越条件，因此，日寇伪官吏的气焰也就越发炽盛，对中国人就越加轻视，在职责上也就越发专横。对于中国人职员的采用，完全以日语的程度为标准，遂就无形中推进他们的奴化政策，麻痹了多少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甘心到伪满来为日寇作忠诚的爪牙，去残害东北人民，贻误了他们的前途。现在回想起来，真对不起东北的青年，所以我要负应得的罪恶。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由人事处参事官调任哈尔滨警察厅长。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一天，在我吃午饭后，到两点钟时才上班，听说省公署找开会，我就到省公署。

在省长办公室有省长于镜涛、次长源田松三、警务厅长秋吉、警察厅副厅长园田、省长秘书官徐克城、外有警务厅的日寇二人。我到的晚，已经开始了。我听省警务厅长秋吉说，三肇地区有反满抗日分子徐〇〇的活动，杀了肇东县的日寇指导官，现在省要组织讨伐队去讨伐，要从警察厅抽调出二十个人参加讨伐队去现地，担任搜查的工作。会到这，警务厅长命令我和副厅长退席，回来准备人，由司法科和警察署司法系抽调二十个人，由警察厅司法科搜查股长叶永年带领，去省警务厅参加讨伐队。我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转奉天市警察局长，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春，哈尔滨松江警察署长胡友邦转奉天市警察局城内警察署长，我又听他说，哈尔滨警察局去三肇地区的二十个人，在阳历年底快过年啦才回来，在当地抓了六七十人，把徐某以下约十余人带到哈尔滨交法院了。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约在八月间，哈尔滨警察厅接到省警务厅的命令，调警察警备队五十名到呼兰县去，是为了兰西县有匪情，到呼兰县去作警备应援，约过五六天，无事回哈尔滨。关于三肇事件，我派二十个人参加了讨伐，这不但是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起义热忱，还摧残了人民的抗日力量，给三肇的人民不知制造了多少痛苦和灾难，所以我应当负责，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我由哈尔滨警察厅长调任奉天市警察局长。这时候，正是伪满实行经济统制配给的开始，因为警察负着经济统制配给的违反取缔的责任，所以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二月，警察局添设经济保安科，专负责经济违反事件的取缔，也就是说监视着人民，统治着人民，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上不得自由，吃点大米白面就犯罪，买点布作衣服也犯罪，甚至买一包火柴也犯罪，人民都过着贫苦的和犯罪的生活，因此就使

多少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奉天市在我的指挥下,执行了这个法令,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一年间,共检举经济违反案件交检察厅处理的约有五六百件,此外未交检察厅就当时解决的,也不下数千件。

奉天市为了都市治安的维持,在清查户口之外,还实行临时的街头大检举,有时在早晨,也有时在晚上,全市同时在各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凡是认为形迹可疑,流浪无定所或无职业的人,就当时抓起来送交检察厅处理,这种检举也有时受检察厅的委托和命令进行的。奉天市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共实行了四次全市大检举,每次约检举百八十人不等,这一年间共计约检举四五百人。危害了人民的自由,稳定了侵略政权。

奉天市的劳工供出,本是由市区机关来执行,因人民不愿意给侵略者奴役,就有躲避逃亡的事情。而市区机关又要达成这个任务,所以为了劳工的征出就不顾人民的痛苦,就利用警察的力量来达成这个任务。也有时因为正式征用的人数不足,或有逃亡时,警察就临时在街上随便抓人来凑数,甚至伪公务人员也被抓去。我在国务院人事处时,有一个姓牟的职员,在上班时就是这样被抓去的,送到警察署后才放回来,这是多么残酷的压迫和奴役。

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日寇的侵略战争走向垂死挣扎的阶段,所以对于伪满的各都市,实行防空大演习的训练。这时对于人民的防空设备稍有不周全,警察就吹毛求疵的刁难,使人民耗费有用的金钱,去买防空设备,劳民伤财,招扰人民,弄的鸡犬不宁。这种防空设备并不是为人民的安全,而是为侵略政权的稳固,使人民受更多的奴役压迫和掠夺。

我在这一年多的时期,为了推行经济取缔法令,把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民,当作了取缔的对象,公家不配给而人民为了求生存,买

一点食粮或衣服,如被发现就算犯罪,轻者拷打,重则送检察厅处徒刑。此外,抓劳工,督促防空,在街检查行人,处处是和人民作对,所以人民把警察看作是最可恶的敌人,无不恨入骨髓,而我正是这些吃人恶魔的指挥者,想人民对我更加仇恨,所以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不可被饶恕的,我应当负一切责任。

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三月,我由警察局长调任奉天市长,我执行了统制配给政策,凡是建筑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了配给。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七月,又实行了七·二五停价令,将没有刊入经济配给中的物品,又实行了停价,不准涨落,这种经济配给名曰配给,实质〔际〕上是一年也配给不到一件更生布的衣料,修理房屋买不着砖灰,房漏衣破,过着非人的生活。配给的粮食又是粗粮和不能吃的坏玉米面和豆饼面,每月大人配给量是十三公斤,十六岁以下的配给量是八公斤,十二岁以下的配给量是四公斤,不够吃就得私买,私买就犯法,就被警察检举。而我们所有的粮食,大部被日寇运回国去,支持侵略中国的战争,就逼得人民挨饿犯罪。像这样的暴政,真是在今天的地球上找不到第二份的。

奉天市又在奉天省的命令下征出劳工,每年约实行四次的劳工征出。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每次征出的劳工数约三四百人,一年共计约一千五六百人。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每次征出的劳工数约四、五百人,一年共计约二千人。这些征出的劳工,有的交给抚顺、阜新矿山;有的去修军用道路或国防工程,如哈大道路等,使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这些被征出的劳工,大半受到日寇的种种虐待和酷役,以致大部伤病死亡,能够健康回来的是非常的少数。

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执行了征兵法的征兵检

查，市长是征兵官，军管区兵事处长是副征兵官，检查的期间约五十天，适龄的壮丁约五千余人，检查合格伪满国兵的人数约七百余人。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八月，又执行了征兵检查，情形与去年大致相同，合格人数约七百余人。征兵检查是青壮年最厌恶的，因为一般青年不甘心当日寇的炮灰。伪满国兵，所以在强制的征兵检查下，就发生了躲避隐瞒的事情，构成了犯罪。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征兵检查时，大西区有一个泰山玉商店的少东家石某，因为躲避国兵，造假文件，被军事处发现，由征兵官检举交军法处办理，这给奉天市青年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伪满又实行了勤劳奉仕法，凡是经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壮丁，就报给省，省再转给民生部勤奉局，由勤奉局来统一分配，实行一年的勤劳奉仕的劳役。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奉天市的适令〔龄〕壮丁约五千人，去国兵合格的约七百余人，余下的再去十分之一多的疾病残废者，约有三千五百余人要去作勤劳奉仕的劳役。这就是日寇奴役东北青年的法令，使青年受了惨重的奴役压迫，而这些服勤劳奉仕劳役的人，大部是参加修国道，军用路和军事工程等。这种劳役的结果，也是因为待遇恶劣，多半伤病死亡，据传说，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伪满又公布了总动员法，经济部特派一个参事官驻在奉天省公署，实行非常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动员。本着总动员法的物动计划，奉天市执行了对私人工厂和五金行所存储的材料和设备等，实行登记，限制买卖使用，自己若想动用就必须呈请许可，经这位参事官许可后才能动用。并且征用了一部分电动机，于是怨声载道，人民虽然不平不满，但也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秋，奉天市本着奉天省的命令，实

行交通部都邑计划司指示的都市人口疏散的临时措施。就是说，在空袭下，凡是被疏散的住户，如果受损害时，政府负赔偿损失的责任；若是在被指定的疏散户自己不迁移，在空袭下的损害，政府不负赔偿的责任。奉天市召开了区长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中国人居住区，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故土难离，暂不实行。铁西工业区，要实行工人住宅的疏散，向郊区疏散，并限制各工厂今后的建筑；日本人居住区大和区，在有空袭时，要部分的向南湖一带疏散，并在南湖一带准备简易住宅，同时警察局发建筑许可时，执行疏散的建筑计划。在伪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年）春，在美机空袭奉天市时起，铁西区工人住宅，部分的开始向郊区作临时的迁移，住户有被空袭的，临时迁到南湖一带。在大东区满飞〈机厂〉附近的中国人住户，有部分的被强迫迁移的，人民受到相当的损害，这也是日寇给带来的灾难。

奉天市也执行粮谷出荷的法令，奉天市郊区所有的耕地，全有出荷，将人民的劳动收获强征给日寇，使人民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受饥寒之苦，该是多么可恶。每年奉天郊区耕地的出荷量，约在二千石粮之谱。

奉天市长兼协和会奉天市本部长，因此，我也推行了伪满的假民意机关协和会的宣德达情政策，麻醉迷惑了奉天市人民，使奉天市人民在日满协和的伪口号下，好服服贴贴的受日寇的奴役掠夺。当时的奉天市人民称协和会为“蝎虎会”，就是说协和会厉害的意思。并且又组织了协和义勇奉公队，强索民夫，组织训练，在有防空演习时，帮助警察维持秩序，也就是在非常时期，帮助警察来替侵略者镇压人民。奉天市人民不愿意当义勇奉公队员，当时就用强征的手段来执行，人民对于协和会是非常怨恨，把它叫做“蝎虎会”。

我在奉天市长任内，虽然不过二年多的时间，可是替日寇推行了种种危害人民的法令，尤其是配给经济统制法、劳工法、总动员法，使人民得不到衣服、食粮，甚至吃橡子面，把许多青壮年送给日寇作劳役，结果是死伤病残在一半以上。又为了支援日寇的侵略战争，征用了多少民间的物资。所有这些危害人民的利益，残害人民生命的事情，我都应当负责，所以我认为我的罪恶是巨大的、严重的。

在伪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年)九月，我由奉天市长调任新京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我分担着官房、地方处、统计处、人事处的事务。在伪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次长会议席上，由企划局副局长高仓和勤奉局长半田，说明成立勤劳部的组织法案，就是将民生部所属的劳务司和勤奉局，合并为一个独立机构勤劳部，并说明了在勤劳部成立后的初步动员计划。勤劳奉仕人员约为三十万，征出劳工数约为百万。又提出了勤奉法的修正，将勤奉法中的原规定的一年服役期限分三年服役完了，修正为三年期限分六年服役完了。就是说，这一个机构的成立，把全东北人民的青壮年变成日寇的奴隶。我参加次长会议通过这一组织法和修正法案，这就不知使多少人民被奴役，甚至被残酷的虐待或杀害。

在伪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年)四月，因为美机空袭日本，使日本受到了惨重的破坏，伪满是日寇的儿子国，为了表示孝心，伪满特派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为慰问使节，到日本去慰问，我也是随员之一，并送给日本粮食二百万吨〔三十万吨〕，食盐七十万担，这就将东北人民不够吃的粮食和贵重的食盐，又剥削了一大部献给日寇，支持了日寇的侵略战争，使人民遭受更严重的粮荒，增加了敌人的侵略力量，损失了同胞的财富。

在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年)六月，因为日寇的侵略战争节节

失败，伪满对于人民的压迫也就越发的残酷加重起来，又加上美机空袭东北，于是各工厂矿山的工人惶恐不安，人心动摇。日寇就想出了用中国人到各厂矿宣抚麻痹的办法，所以特组织伪满的厂矿监察宣抚使，到各厂矿进行监察宣抚。在名义上是监察厂矿对于工人的生活待遇的改善和合理的使用劳动力，对工人的宣抚是举行工人座谈会，而实质上是宣抚工人好好工作，老老实实的受奴役，服服贴贴的为了侵略者的侵略政策而去牺牲自己。监察宣抚使是韩云阶（伪满电业会社长），随行者约十余人，我也是随行之一。曾到过奉天、鞍山、抚顺、阜新等地，约一个半月的时间，至光复前才回长春。这种到处替日寇宣传，让人民甘心去替日寇作无谓的牺牲，该是多么卑鄙可耻的事，就是到今天，那些工人如果想起来当时的监察宣抚，还不知怎样骂和恨呢。

〔下略〕

119—2—1156，1，7

袁庆清笔供

(1957年4月8日)

我充任伪满官吏十四年间,帮助日寇推行了危害东北人民的奴役、奴化、欺骗、掠夺、剥削、榨取以及麻痹、镇压等等侵略政策,造下了许多严重罪行。兹仅自九·一八事变起逐期逐项认罪如下: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略〕

充任伪满参议府秘书官期间。

我经由伪满参议府议长张景惠的推荐,于伪满大同元年六月充任伪满参议府秘书官。伪满参议府的职权是备溥仪的咨询机关,专门审议由伪满国务院国务会议所通过的重要人事与重要法令,是推动伪满重要政令的主要机关,也就是帮助日寇侵略政策的御用机构。而我参加了这样组织,成为我充任伪满十四年官吏的惟一罪恶开端。这就是我的严重罪行。

我充任伪满参议府秘书官共二年零六个月。在职期间,共缮写议案一百五十余件,其中如伪满政府组织法、伪帝位继承法、惩治叛徒法、新省制划分、新军管区划分、俸给令、重要人事任免、年度预算、官吏惩处等等案件。关于伪满政府组织、伪帝位继承、镇压爱国分子、改革省制、划分军区以巩固伪满统治地位与核准庞大地掠夺性的预算。我缮写案件有协助日寇侵略政策的行为。因为我办事勤谨恭顺,得日满人长官的相当信任,与伪议长张景惠的推

荐及凭借自己老人的余荫(时家父袁金铠充任该府参议),所以由伪满参议府秘书官进叙荐任二等,擢升伪满参议府理事官,调转伪满吉林省公署理事官(此二差并未就职),又调充伪满间岛省公署教育厅长。这都说明我忘了祖国、忘了人民、恋恋禄位、甘为伪满的汉奸与日寇的走狗。这是我的大罪之一。

充任伪满间岛省公署教育厅长与民生厅长期间。

我于伪满康德元年十二月充任伪满间岛省教育厅长。间岛是一个民族复杂、情形特殊的地区,教育设施尤为落后。我到任时全省中等学校只六处,小学只一百五十余处。经由伪满康德二年秋季日寇的在满治外法权撤废,始又收回鲜人私立学校一百三十余处(这也是日寇的一种欺骗政策),共计全省有学校二百八十余处。我在任时间岛省入学儿童仅及学龄儿童百分之三十,考升中等学校者仅及高等小学毕业生百分之三十,这就是学龄儿童及高等小学毕业生失学者均占百分之七十。由于我推行了日寇的奴化教育,全省中学生仅八百人,即有实习用地六十垧,村屯小学借用公地六十垧,这就严重妨碍了学生的身体发育及受课时间与职教员的准备教课时间,以致学生的文化水平与体育水平空前降低。不得不停留在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水平上。这就是我充任伪满间岛省教育厅长与民生厅长(民生厅长也职掌教育),帮助日寇施行奴化教育的恶果。这是我严重罪行之一。

我于伪满康德三年秋季参加了伪满全国教育厅长会议,专为讨论伪满奴化教育的实施要纲。该要纲是旨在缩短伪满学生的求学年限,及厉行劳作教育,为奴化教育奠定了基础,结果全案通过,于伪满康德四年即付诸实施。从此东北第二代国民的青年学生与职教员,即终年辛劳地去从事奴化教育,把劳作成绩置在首位,劳作不好,不能升学。劳作要好,学业身体必受影响。这就使学生无

升学能力与良好身体(特殊者在外),而停留在殖民地教育水平上。这是日寇统治伪满的一大毒辣政策。而我参加会议,赞成通过,这也是我的一大罪行。〔中略〕

充任伪满安东省公署民生厅长期间。

我于伪满康德五年八月调转伪满安东省民生厅长,在九月间即发生凤城县劳工死亡事件。因凤城县于头年供出劳工一百六十多人赴虎林国境地带修筑军用道路,因日寇工组待遇不良,因而死亡八十多名,竟占百数之四十。虽发觉后交涉赔偿,送还遗骨,可是这种危害劳动人民生命的罪行,我是有相当罪恶的。我在任二年间,通过全省各市县共供出劳工四千五百人(其中有由安东市警察局抓取四次共三百人)。其工作地点:如大东港建设、水丰洞、鸭绿江水电堤堰工程、抚顺炭矿、北边修筑国防道路及国道、省道等等,均为苛重劳役。加以日寇工组待遇恶劣,饥寒毒打,伤病死亡。所以在日寇惨无人道的待遇下,劳工死亡率竟达百分之四十,死亡劳工共为一千八百人。这种危害安东省劳动人民生命的暴行,是日寇奴役东北人民、灭绝人性的罪恶,而我奉行了这样政策,帮同日寇,造成了滔天罪行。这是我大罪之一。〔中略〕

我在任时伪满安东省的教育状况是,全省有中等学校十处,小学八百余处。中学竟有农科八处(其中有由我改组农科者一处)。中等学生一千二百人,即有实习用地一百垧。乡村小学借用公地八十垧,作为实习用地。因之各校师生莫不汲汲于劳作教育,所以全省教育水平与学生体育水平空前降低,而经费支绌,职教员薪水特别低廉,不够生活费用,纷纷转业,师资缺乏,更感万分困难。全省失学儿童达百分之七十。高等小学毕业生不得升学者占百分之七十五。我帮助日寇推进奴化教育,使安东省教育破产,文化落后。这是我的很大罪行。

我在任时兼任凤城师范所附设的全省教员训练所长。每月前往讲话一次。常向学员们称赞日寇的教学方法,应当竭力效法,努力劳作教育。可纠正我们以前学非所用的毛病。你们要率先垂范,好回校起推动作用。要谨言慎行,避免无谓的牺牲。这种灌输奴化教育、阻碍进步思想的言论,严重危害到安东省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这是我大罪之一。〔中略〕

充任伪满祭祀府奉祀官期间。

我于伪满康德七年八月转任伪满祭祀府简任奉祀官,并兼任伪建国忠灵庙庙监。奉祀官的职务是:从事祭典、轮班宿值及引导参拜人员。我在职时共参加大祭四次(如两庙镇座祭等)、中祭(如新尝祭等)八次、月例祭四十八次。其中伪建国忠灵庙的月例祭曾由我主祭过十次。曾引导过参拜者十次,参拜人数为三十人。曾记得一九四二年春季伪内蒙古自治政府德王来满参拜神庙时,即系由我引导。我虽未接受日寇桥本虎之助的命令,对日寇神道奴化政策作文字的宣传,可是在职期间也奉命唯谨,不敢草率从事。所以日寇认为对它的政策尚有奔走趋跄之劳,而转任我为伪满林野局副局长。

伪满康德九年八月我奉伪满祭祀府命,参加奉天伪满第一军管区部队长及处长级的神道讲习会。我在会上讲演,曾说日本是一个神国,日寇裕仁是个现人神,所以他们得到神的庇荫,而国势日强,永受神庥。日满一德一心,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信奉元神,这一定能得到神的庇护的。又于伪满康德八年夏,我奉命向府内日满职员讲演中国古代祭法(曾引祭孔为例)一次。关于这两次讲演,前一次向伪满军官灌输日寇奴化神道思想,以巩固他们帮助日寇的信心。后一次讲演使日寇增长了神道的学识,为沟通中日祭法供给资料。这都是我帮助日寇神道奴化政策的大罪。

伪满康德九年秋，我奉命至西科后旗参加日寇中村大尉的纪念碑除幕式。这也是我的罪恶活动。

总之，由于溥仪的访日迎神以及颁布伪国本奠定诏书，竟称日寇为亲邦，是已确定了伪满对日寇的殖民地性质。溥仪已自降为儿皇帝，奉事外神，认贼作祖，这是对于东北人民的绝大污辱。而我身充简任奉祀官，觍颜从事，袍笏登场，奉事外神，忘其祖国，忘其人民，是无国家思想，无民族观念的充分表现。这是我大罪之一。

充任伪满林野局及马政局副局长期间。

伪满康德九年十月，我调任伪满林野局副局长，在任五个月。该局共伐采木材二百万立方米。该局统制林产物(如木耳、元蘑、榛子、松子、皮张、狩猎等)甚为严格，因而杜绝了山野人民的生活出路。而太平洋战争起，日寇添造木制机船(在大连、安东两处设立造船厂)，以增强南洋的运输。又增设巴尔普会社两处，这都严重影响到木材的多量采伐。我帮助日寇掠夺了东北的宝贵森林资源，为祖国人民造成了莫大损害。这也是我的严重罪行。〔中略〕

伪满康德十年四月，我调转伪满马政局副局长。该局主管改良马种，掌管马籍、防治马疫及补充日寇军马、移殖军用废马以辅助开拓团，举行赛马以榨取民财。在我任内，该局共为日寇补充军马八千匹，为在满日寇开拓团移殖日本军用废马七千匹以备农耕，由马事公会赛马收入项下共榨取东北人民金钱四亿元。人民因为受了日寇的欺骗赌博性的榨取，以致倾家败产，甚至有自杀者(如伪满康德十年秋奉天赛马即有因输钱太多自缢身死者二人)。〔中略〕

充任伪满哈尔滨市长期间。

我于伪满康德十一年十二月转任伪满哈尔滨市长。当时市署

的编制规定是，市长有监督警政之责，以及兼任协和会市本部长，也就是集市政、警政及协和会的责任于一身，即所谓三位一体的制度。我就任市长也就负了这样责任。伪满哈尔滨市为国际都市，而伪满末年时局紧张，日寇为垂死挣扎，施行血腥镇压，并加倍掠夺奴役广大市民。而我帮助日寇推行了各种侵略政策，以致造成了许多严重罪行。兹逐项分别认罪如下。

一、市政：

劳工供出：在我任内市署共供出劳工四千人，死亡率达百分之四十，即死亡了劳动人民一千六百人。在伪满康德十二年夏，道外码头卸煤工人王某因不堪其小队长张某的勒索虐待，愤而投江身死。又于伪满康德十二年夏，我赴滴道煤矿慰问哈尔滨所供出的康生院劳工计八十人即死亡了三十人。哈尔滨市供出劳工的工作场所，如牡丹江森林采伐及滴道煤矿等处工作。劳役苛重，兼以日寇工组惨无人道的待遇，饥寒毒打，伤病死亡，所以死亡率特别之高。我推行了日寇这样血腥奴役东北人民的政策，为哈尔滨市民造下了莫大灾难，这是我大罪之一。

粮谷配给：我在任时市公署继续推行了粮谷配给制度。市民因配给不足，营养不良，因病而死，因饿而死者，足有一千人。如道外南八道街工人王某家有大人两口小孩三口，因配给不足，小孩两名竟致饿死。东北为著名谷仓，人民从未遭遇饥馑，而日寇掠夺粮谷，助长侵略，竟置东北人民于死地。我个人觍颜领受简任官的待遇，准日本人配给，置市民的生死于不顾。帮助日寇施行了这样的残酷暴政，危害了许多市民的生命安全。这是我大罪之二。

经济统制：我在任时市公署继续推行了经济统制。通过各项组合（如粮谷、蔬菜、兽肉、水产、薪炭、棉布等组合），帮助日寇掠夺了市民的一切生活物资，共值两千五百万元。这就使哈尔滨更陷

于民穷财尽，而市民披麻袋、吃橡子面、瘦骨支离、菜色鹑衣者更触目皆是。我身充市长，帮助日寇施行了这样毒辣侵略政策，威胁了整个市民的生活问题。这是我大罪之三。而实业处长村田清、畜产股长黑田均利用统制经济掠夺百万元，这也是我的罪行。

鸦片零卖：在我任内市公署继续推行了日寇的鸦片零卖政策。在鸦片零卖项下即收入三百六十万元。市立共有零卖所六处，登录瘾者有七千人，九个月内共死亡七百人。如在伪满康德十二年一至二月，道外警察署即掩埋麻药吸食路毙者一百人。日寇为助长侵略战争，搜括金钱，惨无人道的施行了这样对东北人民灭种弱种及麻痹身心的毒恶政策。而我帮助施行，危害了许多市民的生命财产。这是我大罪之四。

勤劳奉公：我在任时于伪满康德十二年春赴万家窝棚视察勤劳奉公队。该队任务专为水田造成，共四百人，因劳役苛重，结果死了十五人。日人吃大米，满人吃高粱米，而驱使东北的有用青年为他们造成水田。这种日寇奴役人民，灭绝人道的政策，而我也继续推行，危害到市民的宝贵生命。这是我大罪之五。

区村制度：区村制度邻组编制，无非增加人民负担以及钳制人民的一切言动。所谓卫生检查、防空演习、物资搜集、物资配给及必胜储蓄债券摊销，无不经过区村邻组，以作彻底的实施，以致妇孺不安、老幼烦扰。我在任时继续推行了这样扰民害民的政策。这是我大罪之六。

奴化教育：我在任时市立共有小学十五处，学生九千人。学龄儿童失学者占百分之五十。因为实行了奴化教育与勤劳奉仕(如忠灵塔、神社、苗圃的除草奉仕，以及搜集物资、募集国防献金等)，影响到学生的教育水平与身体发育。这是我大罪之七。

卫生保健：我在任时全市共有市立病院两处。南岗病院设备

较好。而专为日寇及满人资产阶级服务，以致普通市民虽病重请求住院，多被拒绝。如南岗市民王某因病重请求住院未果，以致身死。因同类情事而致死者，竟有六人。市内卫生机构本应为市民服务，而日寇漠视市民疾苦，毫不关心。而我继续推行了这样的卫生工作，危害到市民的健康生命。这是我大罪之八。

煤荒、菜荒：我到任之初于伪满康德十一年冬，市内即发生严重的煤荒。原因是由于前任市长未能事先很好准备充足的冬季配给煤炭，而我又缺乏临时紧急措施，以致市民是冬大感寒冻的威胁，道里道外暖气设备很多冻坏，贫苦市民更感万分困难。再于伪满康德十二年夏因受经济统制影响，市内又发生菜荒现象，配给不足，市民只可恃菜为生，菜源断绝，生活即陷于绝路。可是我既不能补救于后，又不能防范于先。使广大市民陷于饥寒困苦之中。这是我大罪之九。

交通不良：市内交通会社系归市署监督，车辆太少，市民乘者拥挤不堪。车长对待市民也多恶劣作风。我到任后并未有何改进，为市民解决困难。这是我大罪之十。

水道恶劣：市内水道设备异常简陋，年久失修，以致管道常坏，为市民增加了许多困难。我到任后未能有何改修，为市民保健很好的着想。这是我大罪之十一。

马车组合：市署运输科辖有马车组合，即统制全市车辆（大板车与花轱辘车），垄断市内一切运输。因为办理不善，以致市民感觉困难。我到任后仍继续推行了这样政策，为市民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我大罪之十二。

清扫不洁：市署清扫科辖有清扫大队，每月向市民征收卫生捐，专负清扫街道及搬出粪便责任。而设备简陋，人员车辆均感不足，常致垃圾成山，粪便堆积，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环境卫生。而我

到任后并未有何改善,漠视市民的疾苦。这是我大罪之十三。

收买用地:我在任时于伪满康德十二年春,奉日寇关东军部命令,为大同酒精公司收买扩充用地。计收买民房五百五十间,菜地一百五十垧。虽系有价买收,而估价低廉,以致市民损失一百五十万元。这是我帮助日寇准备战略物资的政策,危害到市民的财产。这是我大罪之十四。

防空演习:我到任后因时局紧张,于伪满康德十二年春、夏两季举行了两次防空演习。我担任全市防空演习的总指挥,劳民伤财是一扰民之举。如道里石头道街市民于芳因为防空设备被警察刁难,被罚金五百元,即其一例。这是我大罪之十五。

其他如由该市资产阶级等合组的哈尔滨出入口贸易公司,勾结日寇军部,请求许可贩运关内外的物资(如药材、花椒、红枣、元蘑、木耳等),牟取暴利。我在任时不应听其继续营业,剥削其他商民。如在伪满康德十二年夏由市署主催成立哈尔滨兴业钢铁会社,这是利用哈尔滨交通会社电车修理厂的基础,再加日寇资本,以便扩充,变更产权,危害到市民的公有财产。如同期日寇藤原银次郎到哈视察(系日寇特命的经济检察使)时,市公署不应供给其许多调查资料,以助长日寇侵略势力。如伪满康德十二年春我为奖励各区长办事勤谨,以我名义亲书各赏匾额一方,以鼓励他们更好的为日寇侵略政策服务。这都是我的罪行。

我在任内继续推行了一切苛捐杂税(如商业营业税、土地房产买卖税、户别捐、各种所得税、饮食税、游兴税、地皮捐、地租(系收买都市计划用地而未利用者)、房租(系地皮已满年限而收回者,如市署用房即系不到年限而强收者),共收捐税四千五百万元。又献纳金属共五十吨、猫皮六百张、旧纤维五吨、推销必胜储蓄债券二百万元、国防献金五十万元。这都是我搜括市民的巨额血汗金钱

物资，以帮助日寇的侵略政策。这是我的严重罪行。

我在任时全市年度预算为七千万元。这就是每年从市民身上抽取了七千万元的血汗金钱。而对于市民的一切切身问题：如教育、卫生、交通、运输、水道、清扫等是漠不关心，以致严重危害到市民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这就是我的严重罪行。

二、警政：

伪满的警察是日寇统治伪满、法西斯血腥镇压东北人民的工具，哈尔滨市警察局也当然不能例外。而由于伪满末年思想矫正法及保安法的实施，更助长了他们的凶焰。我有监督警政之责，当然要负完全责任。谨分别认罪如下。

两次检举：我到任不久，于伪满康德十一年冬，市警察局特务科即发动定期大检举，逮捕官吏、教员、商人等一百余人，结果判处死刑者二十人，徒刑者十五人，余均释放。又因日苏废除互不侵犯条约，时局紧迫，日寇为暴压民心计，于伪满康德十二年五月，又由日寇宪兵队发动指挥该局特务科，又发动临时大检举，又逮捕官吏、教员及商人等各阶层人士共计一百五十人(内有吉林伪满第二军管区军法官张凌岐在内)，直至“八一五”尚未审理完结，不胜毒刑而死者有十二人，其余得以幸免。这种日寇血腥暴压，利用伪满警察惨无人道的去屠杀爱国青年。这是我大罪之一。

抓取浮浪：我在任时，该局在伪满康德十二年春曾两次为哈尔滨辅导院抓取浮浪者三百人。该院送出劳工一百五十人，结果死亡三十人。这种残害市民的罪行，是我的大罪之二。

敲诈市民：我在任时，于伪满康德十二年春，有道外警察署警察徐某向同记商场以“七二五”定价强买长绒礼帽三十顶，以致该商号损失了两千七百元。如同期有道外警察署警察李某，以违犯经济，诈取道外九道街商民王某五万元。及伪满康德十二年夏因

哈市警察的加严封锁哈市四周经济网，以致造成哈市严重莱荒的现象。再同期有道外警察署警察王某，因借钱不遂，以违犯保安法为名，逮捕了道外南八道街市民李某。这都说明了该局警察利用经济统制与保安法，去危害了市民。这是我大罪之三。

检察卫生：市内警察每年春秋两季检察市民卫生，任意刁难，凶恶万分。如伪满康德十二年春季检察卫生时，道里石头道街市民于升，因为警察刁难，以致毒打成伤，医治数月始愈。这种警察残虐市民的行为，是我的大罪之四。

总之，哈尔滨市警察为暴压市民，效忠日寇，利用市民思想不稳，反满抗日，违反经济，触犯保安，户籍不清，言行可疑等等名义，即强加罪名，任意逮捕残害。通过赊买、白吃、敲诈、勒索等等恶行，更行加倍掠夺剥削。计在我任内哈尔滨警察掠夺市民物资财富共有一千五百万元，两次大检举及零星案件，共虐杀市民一百名之多。我身充市长，有监督警政之责，而任令这些凶狠的豺狼，为虎作伥，毒害了许多市民。这就是我的严重罪行。

三、协和会：

伪满的协和会，即是日寇阴毒的侵略政策，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同为日寇的侵略政策服务。他的终极目的即等于朝鲜的一进会，为未来日满合并准备了必要条件。而我以市长兼充哈尔滨市本部长，帮助日寇推行了这样欺骗、麻痹广大市民的政策。这就是我的大罪。谨分别认罪如下。

供给情报：伪满哈尔滨协和会市本部内设有情报班，系考察对于推行日寇侵略政策一般市民的反映实况，与日寇宪兵队及市警察局采取紧密联系。这是与哈尔滨市两次大检举案是分不开的。这是我大罪之一。

青年训练：市本部设有青年训练所一处，分期训练有文化的青

年，作为协和会的末梢神经，以充任区村干部与勤劳奉仕、义勇奉公的指导者。我在任时共训练两期（每期三月）共八十名。我于伪满康德十二年夏曾参加该所毕业典礼，并致训词说：要将所学尽量发挥，领导区村政治与勤劳奉仕、义勇奉公为国家供献最大力量。这种加强训练协和会的干部人员为日寇侵略政策服务。这是我大罪之二。

义勇奉公：我以市本部长兼充哈尔滨市义勇奉公队总队长，下设大队长六名（系由副区长兼任），每队为一百五十名，共有队员九百名。该队的职责是辅助警察分担防卫、防空时担任防火、消毒，平时则协助警察取缔经济犯及防谍、防盗。换言之也就是警察的腿子，与警察狼狈为奸，危害市民。如伪满康德十二年春有义勇奉公队员张义曾与道里警察署警察王某以经济犯为名，合谋诈取道里石头道街的市民李某五百元钱，即其一例。我担任总队长，不能监督队员，使他们得以危害市民。这就是我大罪之三。

委员人选：市本部聘任日满地方有力人士为委员约二十余名。品类庞杂，多为土豪劣绅。如马延喜以市本部委员勾结日寇关东军部，扩充其大同酒精公司用地，为市民造成了一百五十万元的巨大损失。如徐鹏志以委员身分，勾结日寇军部，在哈市、黑河、天津遍设制粉、制油、制酒工厂，以为日寇侵略政策服务。如姚锡九为哈市著名劣绅，也参加了委员。如伪满康德十二年春道外南十道街有协和会会员李某，挟嫌向道外警署检举其邻人赵某有经济犯嫌疑，被判徒刑两月。这都说明市本部是利用满人少数恶劣分子，以欺骗压制多数良善市民。这是我大罪之四。

委员会议：我在任时曾参加在南岗国防会馆由市本部所召开的委员会议，前后计五次。我担任主席，每次议案均讨论金属献纳、勤劳奉仕，搜集物资、修理水道、增加学校班级与推销必胜储蓄

债券，后均实现。共计献纳金属十吨，旧纤维五吨，推销必胜储蓄债券五十万元(均在总数之内)。我主持会务，帮助日寇进行一切侵略掠夺行为。这是我大罪之五。

〔下略〕

119—2—1158,1,5

王庆璋笔供

(1954年6月26日)

(一)姓名:王庆璋,别名:中玉,宗禹。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生。原籍:辽东省新宾县旺清门街。文化程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毕业。

被捕时的伪职务:伪满驻泰国公使。

(二)出身历史: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生于辽东省新宾县旺清门街。一九〇三年入当街私塾读书。于一九〇六年我十二岁时,有日寇井岛岩太率部侵占我家乡,暇时他常对我们小学生夸耀其本国的"文明",我因羡慕而在心目中扎下了"崇日""亲日"的根;他也很爱我,当其撤退时,我便抛下了生身的父母而随日寇井岛去日本了。一九〇七年随其到他家四国善通寺町,井岛送我插班到当地寻常小学校四年级。这时我由称井岛为"大人"而变作"父亲"了,所以他拿我和他的子女一样的看待。一九〇八年四月升级到寻常高等小学校。一九〇九年随井岛转去大阪,入偕行社附属小学校,一九一一年四月一日考入大阪府立天王寺中学校,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于该校毕业,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为求得中国政府的官费待遇考进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由该校毕业,校方介绍到板桥火药厂实习一年。一九二一年四月回国。当年六月经王树常的介绍,任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充当日语翻译,名目是办事员,阶级是少校,并兼任哈长

司令部和镇守使署的日语翻译(因张焕相兼任这些职务,我是给他当差,所以我也兼任这些翻译,还能多赚一些薪水)。一九二二年我听说杨宇霆在奉天当总参议,我趁机去找他,他说你是学工业的学非所用,叫我到兵工厂找督办韩麟春,我听了他的话,当年九月就进到兵工厂——火药厂当了副技师。一九二三年升任该厂技师,一九二四年担任该厂代理厂长,一九二六年转任兵工厂兵工学校的教育长,一九二七年因张作霖在北京就职大元帅,兵工厂全体职员由督办杨宇霆保荐"实官",给我以炮兵上校。一九二九年三月转兵工厂——铸造厂技师。一九三〇年春由黄显声的要求,兼任了辽宁省警务处技正、省会公安局秘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了奉天自卫警察局,我任副局长。一九三二年二月任伪奉天省咨议。同年三月九日任伪民政部理事官,一九三四年春任伪民政部土木司长,这主要是随从伪上司臧式毅的升转而升转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由伪满政府调转令的公布任命我为伪奉天市长,兼协和会市副本部长、商埠局总办、地籍整理局奉天支局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又奉令转伪产业部建设司长。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奉命被派为伪满赴欧经济使节团团员。一九三九年一月末任命为伪总务厅参事官。同年二月二十二日伪国务院命令我任伪满驻上海通商代表。一九四一年十月末命我任伪满特命全权代表臧式毅去南京"三国宣言"签字的随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伪满驻南京汪逆大使馆成立,即将上海伪通商代表部改为伪总领事馆,我任总领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奉调回伪满,任伪邮政总局长——伪交通部外局。一九四四年十月伪满特命我任驻泰国全权公使(因交通关系未能赴任,日寇无条件降服伪满倒台)。

(三)九·一八前我与亲日分子杨宇霆等及有关日寇之间的关系:

甲、一九〇八年我在日本四国善通寺小学中考得了第一名,被附近在部队中见习的同乡韩麟春、张恕所悉,经他们又转告在东京留学的同乡张钺、杨宇霆等,他们曾来信鼓励我继续努力上进。一九一〇年夏我在大阪求学时,有张钺、杨宇霆、于珍、王树常毕业回国,路经大阪下车找我,他们看我不错,要和我换帖,于是我们彼此便成了"兰友"。他们几人回国后,据我所知,一九二一年张钺死于黑龙江;一九二二年杨宇霆当了张作霖的总参议;一九二六年于珍当了第十军团长;一九三〇年王树常当了河北省主席。我由日返国后是由黑龙江吴督军的参谋长王树常介绍我当的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的少校日语翻译,又经总参议杨宇霆的推荐当了兵工厂——火药厂的副技师、技师兼代理厂长。

乙、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用电话召我陪他去大连,住于大和旅馆,早八时许乘汽车去旅顺见到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杨与他的谈话是由我给当的翻译。除了一番客套,杨就说出了他来的目的:因为现在郭松龄反叛,在滦州率部下宣扬实行"清军策",由西向东进发,张作霖的队伍都在西面被郭截住过不来,并且他已经掌握了多数,目下奉天已陷于非常危急状态,希望请求司令官加以援助。白川听后答应说可以向他们的陆军省请示予以援助,制止郭的军队前进是容易的;但是张作霖已往对我们所谈判的问题,大都是说后不算,我们这次若帮助张平定了郭的倒戈后,也希望他应当好好考虑以往未解决的问题,那末对这件事以后的如何措施,我们再联络罢。杨答应说一切以后可以照办,但求司令官紧急地给想办法吧! 我们说明了是住在大和旅馆后就告辞回去了。到旅馆一看适有兵工厂工务处长后任座办的王荫泰已由奉天赶到在等候。杨一见甚为高兴,即马上命我回奉天,说他办事比我有把握不需要我了。后来日寇果然以南满铁

路横的两侧各以三十里为限，不准郭的军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不久即失败了。

丙、一九二六年春杨宇霆因感谢日寇对平郭的援助，又要我陪他到日本总领事馆，见到日寇总领事吉田茂。杨向吉田致意说，去年对平定郭的倒戈反叛，幸蒙贵军多方面的援助，得以完满结束，今我特来向贵国政府表示感谢。吉田也客套了几句，遂举杯向杨表示庆贺这件事情的成功。也是我给杨当的翻译。杨宇霆是中国人民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于以上勾结日寇镇压自己的同胞，我是一个直接参加者。从我们的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我是他忠实的党羽。

丁、一九二二年五月末，有前在吉林的高士宾绕道从海参崴登陆，他想吉林独立，把他的旧部下卢永贵（这时卢是张焕相所派横道河子一带的山林游击队支队长）拉拢过去，卢叛了张，还把张所属的第一团团长鄂双全扣留起来。高的部队已进驻到海林站，这时哈尔滨陷入危急。为的向奉天报告迅速，张焕相派我去借用日寇特务机关长滨面少将的军用电报与奉天求援，结果奉天派兵来援助，使敌方失败而告结束。因此张焕相说过要提升我为外交科长，这只不过是口头说过，但未成事实。

戊、〈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认识，是由民国十二年我在兵工厂当技师时，他当军阀张作霖的军事顾问，阶级是中佐，我在杨宇霆家与他见的面认识的。为了向他“奔弄”特到他家去“串门”，因话而谈起我过去是在井岛岩太家受教育而长大的，同时他也知道我和杨的关系，所以就有点小来往，常在一起吃点饭，并且我还送过他我家乡永陵的特产骰木包做成的小炕桌。我与他交往的目的，是想借重他在张作霖面前给我多加美言，好更顺利的往上爬。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我才能去找

他帮我成立自卫警察局的忙。〔中略〕

(四)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社会罪恶活动:

甲、我在九·一八事变后即成立奉天自卫警察局的目的和主要原因,是看着当时奉天市面非常紊乱,无人管理,并想到我与日寇本庄繁有旧认识,可以趁此机会向上爬,所以在九·一九午后四时许谒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我向他献策说,你对奉天城是要完整的呢?还是叫它破乱不堪?现在若不急速恢复治安,对日本军是不利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他听后问明我的见解和办法,很满意地把我介绍给他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我说出了组织奉天自卫警察局的理由和重要性后,他也很赞成,要我去找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商量进行。果然经过三天后在原沈阳县公署内成立了奉天自卫警察局,以原县长李毅为局长,原省会公安局督察长李峰和我为副局长。在自卫警察局的领导下,恢复了十四个警察署。同时我又向日寇三谷清要求出来了三千支步枪,每支附带子弹一百粒,由日寇宪兵分队派人来召集了十四个警察署长,按名册发放的。于是就让警察去给日寇维持交通与治安站岗的工作,这样就镇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干了不久,就感到困难越来越多,一切摸不着头脑,粮饷都成问题,觉得非常厌烦。又想到黄显声临走时对我的嘱咐,要我得机会抛下去找他,会给我有安置想办法的。同时我脑子里还认为军阀尚有雄厚的势力,可能得机会恢复东北。于是我下定决心于十月十八日携领家小偷偷地弃职跑到北京,并将黄所留给我的五万天津字大洋一并带去付他。这时见黄也无事赋闲,住了一些日子丝毫没有办法,于是我又去天津投奔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仍无适当事情可做。正在我为难的时候,又听到老上司臧式毅被放出,仍就任奉天省长。回想在北京见到张学良龟缩不振,只图个人的安逸,

不顾百姓的灾难和疾苦，又觉得这种腐朽的军阀势力远不及日寇，遂滋长了卖国思想，于是又领着妻、子仍返回东北。路经大连被日寇特务小尾所盘，并亲押送到奉天把我交到关东军司令部，本庄、板垣一见我大加叱责。我向他们赔罪说：我虽然成立了自卫警察局，又蒙贵军发给了枪支弹药，但我苦的是粮饷无有着落，困难日见增多，我本是外行，又不好意思再来添麻烦，所以才潜逃去天津找王树常的，不但未找到事，而且因看不惯他们的军阀腐败作风，万不及"皇军"的威武，现在又听说我的旧上司臧式毅出来当省长，我愿帮助他替贵军服务。日寇本庄说：臧是经他的许可才放出来的，你不想想王树常是谁的人，你是杨宇霆一派的人，张学良是最反对的，他不会让王树常容纳你的，我若不看你是由井岛中佐抚养的，非处置你不可，现在既然知道是错误，以后决不可三心二意，要好好地干下去。从此以后，我给日寇当了真正地忠实走狗，走向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罪恶道路上了。

（五）我在上海时与日寇宪兵、特务之勾结和在社会上的罪恶活动：

甲、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伪满发表我为伪满驻"维新政府"上海通商代表。临行前我请示伪总务厅长官日寇星野直树的指示，他告诉我主要的任务是和"维新政府"敦睦邦交，要常和"梁鸿志委员长"多加联系，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商务贸易方面的处理，可由副代表中根不羁雄负责办理。因而我还在长春临行前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此次政府派我任上海的通商代表，我要尽力为'满洲国'与'维新政府'之间的友好结合加强并巩固起来，在经济交流互相协助的原则下，使'日满华'的共同繁荣而奋斗。"等的无耻谰言。

我于三月十一日由长春出发，三月二十二日到了上海。即去

拜访了日寇宪兵司令官三浦三郎。因为我任奉天市长时，他是奉天宪兵队长，这时又恰好在上海相遇，故比较亲近，常有往来。因当时上海处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虹口一带更为日寇猖獗的地方，无论何人都常受野兽们的侮辱与检查，所以我向三浦要求一种特殊证明，行动可以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他给我想了一个办法弄了一个宪兵司令部嘱托的名义(是一种将校阶级的证明，与一般嘱托不同，说他本身穿便衣外出时也携带这种证明，这可表明我俩人的关系)的通行证，因而我们的关系就显得更密切了，可以说，我们无话不唠，我就觉得更神气的全心全意站在敌人方面的立场上了。

乙、一九四〇年春，日寇三浦三郎对我说他们捕获了一名国民党“蓝衣社”在上海活动的一个头脑，叫熊剑东，是少将，经他们的一再审讯，矢口不言，但求我们杀他，不许对他进行侮辱；很自然毫无惧色。我爱他是一个硬骨头，可以设法利用他，所以不想杀他。求我帮他进行说服，我们商议的办法是，叫他的副官穿便衣领他出去游玩，下馆子，约会一定的地方，要我和他见面谈谈。于四月初旬在虹口的“六三”日寇料理馆吃晚饭，我与熊初次见面，随便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就散了，这是我与他的初次认识。隔了四天我们仍在此地二次见面，我除了问他三浦对他怎样外，并将三浦爱他的才干人格和不肯轻易处置他的话都告诉了他。他问我和三浦的认识和相处有多久了等类的话，我也照实的告诉了他，并对他夸耀三浦的为人，他在犹豫中就又散了。第三次的见面是在“六三花园”的料理店里(约又隔了三天)，熊见我就说对他本身的事情，屡次麻烦我很感谢，近半个多月以来的考察，和三浦及副官冈村对他的优待看来，证明你对我所说的话是有理的，所以我一定相信你。我就这样地替日寇把他说服而拉进了汉奸的队伍里了。不久三浦即将他特意送去日本见学了三个月，仍回到上海，真的听从日本帝

国主义的使用了。这是我帮助日寇的罪恶行动,不知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

丙、一九四一年春,日寇驻上海宪兵司令官三浦三郎的部下林〇〇少佐特务科长,于五月间要我给他找一个情报员,我遂找金鼎勋,给找了一个叫李海涛的,会说很好的英语,还懂一些日本话,是上海某大学毕业的,专门给日寇收集英、美方面的情报,每月给他经费四千元日本军币。迨日寇与英美开仗后,我在金家听说李将英租界英美商家与官方所积存的二千五百多桶(每桶五十加伦)汽油报告日寇加以没收,另外还有许多布匹等物。还听金谈到李还收买给英美打字人员的底稿墨纸以供给日寇作情报的罪恶活动。

丁、一九四一年三月有日寇上海南市宪兵分队长中井〇〇大尉,因想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特意开设了赌场。表面上还得请求中国公安局长卢英的许可,特求我向卢英斡旋,经卢答应许可后,我更求金鼎勋介绍了一个买卖人李纯义,另外并找了一些富有赌场经验的人,共开设了四处赌场,内中并设立了烟馆,供来赌者吸用,所得的利润由我们几人分享。迄年末陈逆公博任上海市长后,将全市所有赌场完全取消时,我共分得了利润七十余万元(汪逆所发之汇兑券)。

次年夏,因上海原有戏院多已停止,李纯义为了想发大财,又与我核计以各出四十万汇兑券的资金,在上海福煦路开了一个演话剧的丽华大戏院,以我妻侄敖景新和李纯义为经理。为了维持营业的顺利起见,又经我联系日寇宪兵分队长中井〇〇大尉帮忙,和他规定了以下的诺约:一、戏院的营业由他负责帮助维持;二、必须得演有关利于日寇方面的话剧;三、所得利润彼分享二成。未得出结果我即被召回伪满。

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我由上海转回长春任伪邮政总局

长。一九四三年秋日寇三浦二郎也转来长春任宪兵司令官，我与他仍是常有来往。〔中略〕

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伪满驻上海总领事馆设立后内部组织为：总务科，由日寇千叶领事担任会计、文书、外交、人事、庶务。工商科，由日寇宫崎领事和田中副领事（是伪经济部所派）担任贸易，搜集关于上海方面的经济情报（如物价波动涨落和钱法变动的情况等）。涉外科由日寇小川领事主管（伪警务司所派）特务、情报。所属还有伪司法部派的一名领事（日寇，忘其名），还有伪外交部所派的日寇伊藤博领事，专担任与伪汪政府的日寇顾问影佐彼此交换两国伪政府的情报消息。据我所知在此科内设备了两个通秘密情报的信件箱，由日寇小川领事向伪外交部主管情报者日寇大江参事官轮流传递，设有两把特别钥匙由他俩各掌握一把，由上海用船捎到大连，再经伪满外交部驻大连办事处接到后再由火车投递伪外交部。传递之情报对象，可以分作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伪警务司、司法部派来的人，所搜集的材料如英、美方面对国民党之援助，是采取的什么方式，并经由什么地方而把军火物资运来的。再如秘密调查由伪满所逃亡到上海的爱国分子的动态，阻碍并切断他们的爱国思想与联系。至于在经济方面照以上工商科进行的事务而已。再对上海蓝衣社的地下工作者，每天杀掉了多少日寇和汉奸，在日寇宪兵队中得到或在报上看到与听到，都即时向伪外交部汇报，例如上海伪市长傅小安的被杀，一般的只提人数不用提名姓，情报工作就是这样的。

（六）伪通商代表任内的罪恶活动与工作任务：

甲、一九三九年四月末，我担任伪通商代表后首次去南京谒见梁逆鸿志委员长，见面时陪同在座的有日寇最高顾问原田熊吉中将（曾任关东军第四科长，故认识），伪外交部长廉隅。我陈述了自

己的使命，愿与“贵国”进行经济合作等类话后，梁除了表示欢迎，曾着伪外交部设宴招待了我。同年九月中旬我又由上海去南京，二次见到梁逆鸿志，我告诉他曾于七月十八日回了趟国，我“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星野“长官”命我向“委员长”致意问好；同时我亦将“梁委员长”对我国的厚意报告给“政府”。梁听后颇觉满意。以后我们又随便谈了一些两国关于经济交流，彼此应当进行努力帮助的事情。最高顾问日寇原田雄吉又向梁谈到我们在满洲的认识；并告诉说我与总参谋长板垣也很熟，梁听后更越发地高看我了。

我两次去南京都去访问了日寇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这次我在南京为联络感情，特设宴招待了日伪主要的人物，出席的有：日寇板垣总参谋长、顾问原田熊吉、梁逆鸿志以下的各院、部负责人，是在南京“东亚俱乐部”招待的。我曾致词说：“在总司令官和总参谋长的指导之下，维新政府与满洲国之间的友谊合作愈益密切和巩固，经济的交流，在梁委员长的关心协力下日趋繁荣，我代表政府特致衷心的感谢。”梁亦站起表示了以上的决心和答谢。一九四〇年三月中旬我正想去见梁谈谈一年的经过，先由上海打电话联络时，他由电话中回答说于某日他宴请总参谋长板垣，约我届时出席。宴会设在他的私宅，出席的有日寇板垣、原田、梁、廉隅、陈群（伪内务部长）和我共六人。这次并无特别事情，所谈也不过都是替日寇夸耀阿谀奉迎的一类话。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维新政府”成立二周年纪念，我特赶到参加庆祝，并于“维新政府”大礼堂前和“维新政府”的要人及日寇外交官员、日寇顾问等一起摄影留念，参加者约有一百多人。

乙、我任伪满驻上海通商代表的主要任务是，用东北人民辛劳种植出来的大豆、豆油、豆饼及造纸原料巴鲁普去换取华中大批的面粉、棉花、皮革，以作为日寇侵略用的物资，通过日寇三井洋行所

代购的数目按年分分记如下：

一九三九年：面粉五十万袋，棉花三十万担，皮革二十万——三十万平方米。

一九四〇年：面粉五十万袋，棉花三十万担，皮革二十万——三十万平方米。

一九四一年：面粉五十万袋，棉花二十万担，皮革二十万平方米。

一九四二年：面粉三十万袋，棉花十万担，皮革十万平方米。

合计：面粉一百八十万袋，棉花九十万担，皮革约八十万平方米。

另外还给“满映会社”在上海代购电影原片三十余万元（件数不详）。这是我帮助日寇的侵略，剥削东北人民，榨取华中人民的物资，充分说明了我叛国利敌的铁证。

丙、一九四一年十月末，日伪满派以臧式毅为首的全权代表，到南京签订“三国宣言”。内容是：“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国互惠。”我奉命是这个卖国“宣言”的伪满代表的随员。出席签字的是：日寇驻伪汪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汪逆精卫、汉奸臧式毅。于十月三十日签字于南京。

丁、一九四二年夏，在上海闲居的日寇阿比留（彼曾任伪满司法部总务司长，故认识），因上海米价昂贵，曾向我商量由芜湖运米的办法（当时芜湖米每担价为三十元，而上海则已达到一百五十元）。我乃找金鼎勋研究办法，金乃与芜湖有关方面联络后，又通过阿比留与日军方面作出了如下的议定：日寇与金之间的联系，我负完全责任；购买和运米有关中国方面的一切事务由金鼎勋负责；江上的通行与保护则由日军方面负责。以由芜湖运来的米作价为四十五元，供给日寇收买总量的半数，余半数则自由处理。我们由

芜湖共收买了一百四十万担米,供给了日军七十万担,使日寇增加了杀害中国人民的足够给养。余七十万担自由处理了,我即分得了纯利润一百余万元(汇兑券)。这是我依赖日寇,严重地榨取剥削中国人民,使无辜的百姓受饥挨饿,这是不能容忍的严重罪行。还未等全部结束上述勾结行动,我即奉调回伪满了。

(七)我所参加并进行活动过的反动会门:

甲、我在伪奉天市长任内,曾加入了"万国道德会",特去鼓励过听众们说:道德会是劝人向善,人是会有"因果报应"的,所以必须得要尊崇至上的"仁义道德"。讲这些封建的迷信余毒,其主要的宗旨则是宣扬旧道德的观念,要人人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腐败礼教,去诚心诚意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大家推我为该会的名誉会长(总会的地址是设在长春,会长是汉奸冯涵清,以下各省、市、县均设有"道德分会",会员共有一百余万人)。这种会门还欺骗世人,要加入的会员们进行"立业",实行非法的剥削行动。我对这种做法不但赞成而且还表扬它,可见我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

乙、与"道德会"同样地还有一个反动的"万国红卍字会",我也在当时参加了。这个会门更是一个欺人自欺罪魁聚首的地方,会员多数都是一些沾有血腥气味的反动军阀、封建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供奉着"先天老祖",来忏悔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其加入的宗旨就是假借拿出一小部分榨取人民的膏血,来办"社会的慈善事业",买收穷苦的人民对他们抱好感,而不怀恨他们。我参加这个反动会门,主要是我迷恋"扶乩"的迷信举动,因而我也成了该会的一名会长。伪满红卍字会的总会长是大汉奸张海鹏。各大都会也都设有红卍字会,会员据说十六万——二十万。〔中略〕

(八)我在伪职务上的各个岗位上帮助日寇所做下的罪恶:

甲、一九三五年日寇关东军为了更进一步地侵略我国与亚洲，而新开辟了新的工业基地，选择在奉天铁西区的于洪屯、揽军屯。为了收买附近一带中国农民的土地，特设立了“土地会社”（社长是日寇关东军所派的梅津理），伪市公署协助进行收买与计划的工作。仅据我所知第一批就收买了五千余亩的农田（按照一般市价每亩一百余元），以这五千余亩作为中心，由伪市公署工务处负责施行测量、计划、拉出街道的形象，再由“土地会社”把土地按号发放给各大企业，开始建筑生产，到我离任伪市长时已有一百二十余家的大企业开始生产（工人约有十四、五万人）。在每一个企业开始生产的典礼仪式上，我都被邀参加，并讲过鼓励他们一些赞美的话，吹捧他们在建设与生产上的迅速等无耻谰调（这些企业大部是掌握在日寇四大财阀的手中）。

乙、一九三四年四月间，我在伪土木司长任内，为了帮助日寇进行侵略，伪民政部命令伪土木司长，在我东北实行建设“国道计划”，〈即〉所谓“特殊道路”——军事道路。我特派陆路科长日寇近藤安吉担当计划起草的责任，将初步草案送交给了“国道局”（该局是一九三五年三月成立的）。我是应负这个计划草案的严重后果的罪责。

丙、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伪产业部建设司长任内，伪次长岸信介为了在东北建设重工业的大企业，需要大量的电力，特在日本聘来了电气专家阿部〇〇来伪满，首先去东满检查并测量了镜泊湖，说可以建设两万启罗的水力发电站。当年冬伪建设司增添了一个本田〇〇建设工程师，我利用封冻时期派他带领二十余人进行测量绘图，次年春又经阿部亲去检查后施工，开工时顾去建设工人不到百人，附近没有农民和耕田，为修水沟安钢管子仅挖荒地宽三四尺长三百余米的工程，就在这个地方建设的发电所，但在我任内并

未完成此项工程。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电气专家又测量了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工程(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系由伪满产业部次长日寇岸信介出首与朝鲜兴南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日寇财阀野口〇〇协商,以各出资金五千万而进行建设的),以后这项工程由伪产业部包给了日寇"高冈组"进行施工完竣的,后来伪满把镜泊湖与水丰发电站完全交给了"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负责完成的。我在伪满建设司长任内,对这两项工程的后果,应负帮助日寇奠定基础的罪责。

丁、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任伪奉天市长后,即进行组织协和会各分会的工作,其组织人如下:奉天市协和会伪市本部长日寇谷田〇〇(退役中将)、副本部长由我兼任。协和会事务局(奉天)局长日寇某(忘其名)共同协商,在奉天成立了三十二个协和会分会,会员是由各机关、团体的人员,共征得会员计有三万名以上。协和会主要的使命就是愚弄中国人民的思想,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欺骗蒙蔽的手段,例如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宣德达情"、"完成全国总动员"等,来抹煞中华民族应有自尊心的罪恶活动机关。

同时在各协和会分会领导下,组成同样罪恶的国防妇女会,动员各分会汉奸会员家族共约六百余名(我妻任市国防妇女会长),任务是迎接"出征"与伤兵,缝制"慰问袋"等,以鼓舞日寇的侵略的士气。

同时有伪协和会事务局组织科长日寇织田〇〇与我商量,由伪协和会的名义招收了三百名青年(都是强迫商店摊派的青年店员),让我以市副本部长和伪市长的职务,来帮助他进行的。目的:就是训练这些青年以军事教育,利用他们作为培养后一批更多青年的基础——替日寇做走狗的骨干。我曾向他们讲过鼓励的话,

大致说：协和会召集训练你们的目的，是为了你们的身神健全，必要时帮助“市署”维持社会的治安工作，要体会“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积极地向“友邦”日本学习等无耻谰调。他们在行动方面如：市在防空演习时，派他们到各协和会分会进行指导市民的工作。每批训练期间为一年。头批完了又征收了第二批的三百名，每星期军事训练三次(一、三、五)，训练完了各回其本柜。这就是后来伪满组织“义勇奉公队”的前身。这是我帮助日寇奴化中国有为的青年，不可饶恕的罪恶。

一九三六年五月，日寇关东军为了试行灯火管制，特先在奉天市进行重点试验，由日寇驻奉天守备队司令部进行指导检查，由日寇司令官三毛一夫中将为统监，以协和会各分会为主体，我为市防护团副团长并兼第三区防护分团长。预习和正式共进行了五天，逼市民都得赶制“防空帘”，浪费了大量的民财，用上述所训练之青年，帮助进行检查工作，使全市民都陷入惶惶不安，人人都切齿痛恨。我是应负罪责的。

戊、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伪满派赴欧“经济使节团”，团长韩云阶率领一行“日满”人员共二十四名，我任团员。去欧洲的目的，是为了答谢德、意、波、西班牙四国承认伪满，并巩固日、德、意三国的轴心强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以及与伪满的修好关系，替日寇装饰门面，表现伪满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企图借此去游说各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伪满。此次曾见到了法西斯的罪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都说明了我是如何忠实地给日寇当走狗，去出卖中国人民的意志，和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严重罪行。

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伪满政府公布了“临时邮件管理法”。该案于本年四月由伪邮政总局邮务处邮务科起草做出的，经我盖章呈请伪交通部提到国务院通过实行的。又由我的名义命令全伪

满各地邮政局遵照奉行。内容:主要是在邮件、小包中实行严格地检查,若发现有对人民提供有关于日寇不利的邮件,一律没收(主要是由伪满向外国寄的邮件,包括华北、华中、华南的都在内)。实行的后果,例如:前英国驻奉天总领事馆的秘书罗巴·黑哈,花特别邮费往上海寄的邮件而中途遗失了,本人虽曾向伪满外交部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未得任何结果,这不过是千百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罢了。因而向国外发的挂号信,顿减少有一半,普通国外的信件也减少了三成以上。这不但危害了国际文化交流,还严重地侵犯了国际邮政协定。检查信件的经过,是由日寇宪兵队派人到各地邮政局进行检查,认为有可疑的信件他们就带回去,再经详密地检查,有关的即行没收,无关紧要的仍交还邮局发出,不准邮局人过问,因而数目不得其详。

在这个命令发表的同时,在伪邮政总局所监督的"电信电话会社"所属的"电电管理局"对人民听取短波的取缔,也是十分严重的。假借临时保管的名义予以没收,共没收短波收音机有二千六百多台;日寇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又指示该机关窃听中外国人电话通话,中外国人所遭受地无故危害,也是不计其数的,这也是日寇的军事秘密,别人不得而知的。我是帮助日寇执行了这一祸害人民的举动,我是应负罪责的。

庚、我在伪邮政总局长任内,曾强迫人民摊派"爱国储金",根据伪满政府所公布之全部数字所占为:一九四三年十六亿,伪邮政总局摊三亿;一九四四年三十亿,伪邮政总局摊六亿,二年在我任内共逼迫人民达成了九亿储金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伪交通部要求日寇递信省代为培养邮务人材,并由伪邮政总局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二十人送去日本递信省受训,三年毕业后回伪满在邮务部门中工作。在我任内仍是照常

进行,这是为了在邮务方面全心全意为日寇服务的罪恶表现。

(九)伪奉天市长任内的罪恶:

甲、一九三六年春对奉天商埠地旧政权时代所放出的地号除已建筑外,尚有土地二千五百多号空地皮(规定地号有一、二、三、四、五号地不等,每号是一亩三分多地),日寇市参事官山口重次利用财务处长张谅的名义全部予以没收。以后市民及有关方面(包括外国人有地皮也被没收的在内)向伪市公署提出抗议。因此我出首召开了"土地没收调停委员会",约请了伪省长葆康、省次长日寇竹内德亥、警务厅长日寇三谷清、满铁地方事务所长日寇关屋悌藏、总领事日寇宇佐美、宪兵队长加藤伯次郎、特务机关长三浦〇〇少将,会址于特务机关内,推选日寇三浦机关长为本会的委员长。由我说明了这种没收的做法不合理,所以引起了广大市民多方面的反对,请大家提出意见和办法。这时日寇竹内、关屋等多数人认为日寇山口的做法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三浦则宣布说:他认为没有调停的必要了,请市长要具体地考虑,待做出案后,我们下次再开会决定。下星期这些人仍在原地会议,得出的办法是:有地照人仍在东北居住者给换新照不没收;人未在东北又无地照者全没收。照这个办法共没收了四百余件约一千余亩。在此期间日寇山口重次暗在马路湾设立了一个"三友公司"(在调停会后我即听伪市公署职员说山口利用这个公司暗中收买地皮),专门买收以前被列为"没收"的地照,从中大肆取利。他父亲在热河开设金矿赔了十六万,都是由他从剥削的利润中弥补的(我是听奉天同善堂副堂长日寇谷竹次郎对我说的,原是山口的好友)。前有押在"满洲中央银行奉天支行"中的一份地照,无有地主列入被没收之列,日寇行长向我说求"市公署"给想法,别让我们银行受损失,我花了一千二百元买收了这张四号地(计五亩多),后于一九四一年我托人

卖了两万五千元。还有在三经路有韩麟春的地四亩多被没收，我在“市公署”花了一千四百元买收过来，后与华北其家兄联系，要我给代卖了二千八百多元，我如数给他家寄去了。对于以上所采取“没收”的步骤和措施，使市民受到莫大损失，我是应负罪责的。

乙、一九三六年夏帮助日寇关东军粮秣厂完成了三千五百余万元的收粮任务，是通过我召集商务会长方旭东向粮商一百四十余家所代购的，这是我给日寇准备下了大量侵略用的物资——食粮，使中国人民忍饥挨饿，我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者。

丙、一九三六年春伪市公署买收了日寇“大仓组”破旧的电车约三四十辆，花了三十余万元，由大东城门外到大东边门里，又修了一段电车轨道，专为日寇军械厂职工上下班便利而建修的，因而拆掉了路北买卖铺子一百来户共九百余间。对受损失户的处置是：由市协议会选出评议员七人，负责按户损失的大小给以赔偿，拆后能利用的给的少，地皮不能利用的则给的多，并按房屋好坏而评给以“合理”的价格。逼迫市民这样的拆房屋让地皮，使他们非常的不满和仇视，我是应负其罪责的。

丁、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将上一年度奉天市的预算二百七十万的税额增收到五百余万元，即是说把市税由国税比例的二成五提高到五成，比上年度增加了一倍。一九三七年仍照此数，但另外又增加了特别预算，向伪中央银行借得市债四百余万元来帮助日寇建设统治奴化中国人民的机关——“市署”“学校”。这种苛捐杂税，更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

（十）我历次访日的罪恶活动：

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末，我跟随伪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当随员（我任伪土木司长）去日本答谢日寇对伪满“建国”的“援助”。主要的访问了日寇冈田启介首相、林铣十郎陆相、后藤文夫内相，以及

参拜了"大正天皇"的多摩陵、伊势神宫等。所到过的地方:名古屋、大阪、奈良、京都等地。这是汉奸们认贼为父丧权辱国的罪恶的实际表现。

乙、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我以伪奉天市长的资格,带领市庶务股长日寇桥本〇〇、秘书郭意诚等五个人去日本视察和见学。先到东京陆军省报到,向陆军次官(忘其名)致敬,访问了东京市役市所大久保市长,见学了东京市的各种设施,如地下水道、粪便、垃圾的处理。又去大阪、名古屋、京都、九州的博多等市。大阪的坂间市长特别招待我们,我对他们发表了特别感激的话,我当时说大阪是"造就"我的第二故乡,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绝对抱着"日满一德一心"的信念,来互助合作等的无耻谰调。

丙、一九四三年三月初旬,我以伪邮政总局长的资格,率领电务处长日寇松冈敏雄、庶务科长日寇冈田〇〇等五人去日本递信省,答谢它对伪满成立邮政十周年的帮助和支持。曾见到日寇递信省大臣绪方〇〇、次官手岛〇〇。并在伪大使馆宴请他们,我的致词除了向他们表示致敬,还特别感谢他们为我们历年所培养的邮务专门人材,还希望他们继续给予我们以帮助。这是我最后的一次访日的罪恶行动。

〔下略〕

119—2—1137,1,5号

徐良儒笔供

(1954年8月23日)

姓名:徐良儒。别号:聘珊。一八八二年夏历八月初十日生。种族:汉族。性别:男。原籍:辽宁省辽阳县小北河村。〔中略〕

简历:一九〇一年任奉天提法司总务科一等科员兼统计处专办及典狱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转任营口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一九一五年派去湖南第一高等审判分厅监督审判官(适云南军起义北伐,去的任所已被云南军所占,途中即返回去的任所是湖南省辰沅道沅陵县)。

一九一六年任奉天高等检察厅检察官。

一九一七年任海龙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一九一九年任吉林省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一九二二年任长春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直至伪满成立。

一九三二年一—六月任伪长春地方检察厅长。

一九三二年秋任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长。

一九三三年一月任伪最高法院审判官。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任伪延吉地方检察厅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任伪安东地方检察厅长。

一九三九年夏任伪新京最高检察厅检察官、〔特任官〕,直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中略〕

“九·一八事变”后，靠近长城线各处人民蜂起抗日。有原高级参谋林增植于一九三二年率领队员在绥中县虹螺岘一带，当日本侵略军进入热河时，林出日寇之意料，袭击日寇左侧背，使敌人受到相当损失。最后一役林亦负伤，在绥中僻静乡村中疗养，被伪警查获，由绥中送至奉天高等检察厅侦查完毕向同级法院起诉，判林徒刑十年，因不服上诉伪最高法院，一九三三年十月由我承办此案，依伪法判处林增植死刑。

一九三一年夏有张国权、张我华二人，受天津共产党党部命令来奉天工作。在山海关买车票时，由衣袋掏钱不慎将党的纪章带出坠落地上，被便衣警瞥见，逮捕二张。经由绥中县送交奉天高等检察厅侦查，二张供认奉命来奉工作等情不讳，向同级法院起诉，二张各被判徒刑十年，不服又向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声明上诉，未及裁判，适有“九·一八”事变。迨至伪满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我任伪最高法院审判官时，承办此案，依伪法更为判决，处张国权、张我华以无期徒刑。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国共产党烟台支部担心在日寇高压下的鞍山厂矿工人，遭受到的欺凌迫害情况如何？特派出党员高明远投入该厂矿充当工人，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事实证明，日寇欺凌工人的手段，就是剥削工人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力，逼工人拿义务储金收入所得税等等名义，来榨取工人所得的工资。高明远为了反对这一残酷的压榨，团结工人，首先结识了性情爽直的第一熔矿炉“大把头”刘黑塔、第二熔矿炉“大把头”路万春，又团结了制钢厂的张“大把头”，他们计议，先与资方日寇要求发给工人延长工作钟点的工资，头次要求日寇答应每次延长工时都给两角钱，以后又要求非增至一元不可，要不然工人因不够吃用，都要辞工不干了，日寇见话头很硬，无可奈何的又应允了，工人莫不高兴，都非常感激高、

刘、路、张四人。他们认为屡求顺遂，拟作更进一步的要求日寇返还他们的义务储金等等，“把头”三人遂又去见日寇说明来意，日寇用电话召来日警将“把头”三人及高明远一并捕获，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聚众罢工，遂将他们解送奉天高等检察厅侦讯完毕，照政治犯向同级法院起诉，判处高明远徒刑十年，刘、路、张三人各八年。四人不服又起上诉，迨至伪满成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任最高法院审判官，承办此案，咨询同级检察官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上诉人的上诉无理由可采，应依法律的变更，原判无维持的余地，我遂破毁原判决，改处高明远徒刑十二年，刘黑塔、路万春、张大把头各徒刑十年。

一九三一年春有热河省承德市初中学生巩吾圉与王子正二人撒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被警逮捕送至军署，军阀头子汤玉麟素恶“打倒军阀”这个口号，下令要枪决二生，巩父系军署副官，闻耗立求钱副官长与周参谋长给说情求饶，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本欲交军法制裁，因求情的关系，遂送交到承德检察厅惩处。因巩、王二生年幼无知，从轻处理，各判徒刑三年半。巩因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东北分院，未及判决，“九·一八”事变。迨至一九三三年春，我任伪最高法院审判官，承办此案，依伪法改处巩吾圉徒刑六年。

一九三二年久在海城以西台安以东地方作抗日活动之救国军至同年秋被日寇击散，队员田长胜在海城车站被逮，送至伪奉天最高检察厅向伪同级法院起诉，判处徒刑八年，田不服上诉伪最高法院，我是该院审判官，承办此案，认定上诉无理由，遂将该案驳回上诉。

一九三四年春我任最高法院审判官时，吉林省育文中学学生赵国璧、孙效祖二人在吉林车站散布反满抗日传单，经伪宪兵逮捕

送交伪吉林高等检察厅侦讯后诉经同级法院，将赵、孙二人各判徒刑十年，因不服上告伪最高法院，经我承办，认定上告无理，依伪法驳回上诉。

一九三四年春，有奉军连长（旧东北时代的）魏国忠，因愤恨日寇占领东北，辞职回到故乡新民县，聚集亲友，告以拟组织抗日救国军，当场赞同者百余人，愿自备枪械者五十余人，约定五日后在城北五里台子成立抗日救国军团部。魏国忠次日赴奉天东关某宅，借到匣枪两支，雇车回家行至马三家子以西，被查道警撞遇，搜出匣枪，将魏逮捕，送交伪奉天高等检察厅侦讯，向伪同级法院起诉，判处魏国忠以无期徒刑。魏不服向伪最高法院上诉，经我承办此案（我为该院审判官），向伪同级检察官咨询意见，回答说上诉人的上诉无理由，我遂驳回上诉。

一九三四年秋，老少沟伪护路警察将破坏路轨颠覆客车的抗日救国军队长佟四海侦获，解送伪滨江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侦讯结果，佟四海供认抗日救国，破坏铁路，供认不讳。起诉于同级法院，判处佟四海死刑，佟不服上诉于伪最高法院。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在该院任审判官，承办此案，同级检察官答覆我的咨询，说明原判合法，遂为驳回上诉。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因事去奉天住于福顺栈，有黄炎兴、高御风二人来访。我一时认不出他们来，本人自称与我长子徐树勋在吉林法政学校的同学，他俩曾于民国十七年冬因反对教师罢课而被校长开除，曾由我与树勋援助他们复校等情，我才恍然想起。我遂请他俩在馆子吃饭，谈起东北事变后的情形，他们说东北的学生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在北京大部都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也谈到他俩本身的问题，结果他俩是任北京高等院庭书记官，也都加入了共产党。正谈到这的时候，忽然闯进来了日伪警察二人，说我们是“共

产党在这开会”，不分皂白地将我们带至警察署，黄、高二人被灌凉水逼出了实话。我说明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官并未入过党，日警狠狠地揍我两拳头说：未入过共产党，为什么和他们在一起开会。押了一宿，次日解交至伪奉天高等检察厅，庭吏们都认识我，日寇检察官问我与黄、高二人的关系，我儿子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明我和他俩认识的过程后，并告诉他我儿子于民国十八年就死了，他并非党员。他又要我作证黄、高二人是共产党员，起初我说对他们不大详细，无法作证，但经不住日寇的威胁，我承认了他俩在馆子对我所说的话。日寇说：没有你的事了，回去罢。因此，我回到长春后，又被日寇次长井野大为申斥一顿，自觉在奉天这次的丢人现眼有损司法尊严，甘愿引咎辞职，但未得照准。由此，坐卧不安，夜里失眠，遂请假疗养。迨上班后始听说黄炎兴、高御风二人各被判处徒刑十年。自感这是由我作证的恶果，无论在道德上和良心上对他们说来，我是应负残害进步青年的罪责。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任伪最高法院审判官时，有冯磨者，系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曾充当彼时伊兰镇守使李杜、滨江镇守使丁超抗日时部下某连少士，后因失败零散，作小买卖营生，因向伪伊兰警士王某索取烟卷账，王怀恨在心，遂以他反满抗日为名而被逮捕，由伪伊兰警察厅送交伪吉林高等检察厅伊兰第一分厅，经侦查冯唐供认随李杜抗日情事不讳，向同级法院起诉，从轻判处徒刑八年。一九三六年三月，因冯唐不服上诉伪最高法院，经我承办此案，咨询同级检察官的意见，得到答复原判合法，我遂驳回上诉。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我就任伪延吉地方检察厅长，与同级法院长杨继桐同车赴任，到延吉先住在一小旅馆，院内东厢房住一崔姓朝鲜人，常过来和我们谈天，逐渐熟识。他自称是一个共产党员，住不久就搬走了。后来伪延吉地方检察厅次长兼同级法院次

长日寇泽木国卫到任后谈起话来，他说延吉地区的朝鲜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我就忠实地将上述所知崔某是共产党员的经过告诉了他，日寇泽木即指令日警查传，结果在珲春街将崔某逮捕，交至延吉地方检察厅，经日寇泽木侦讯后起诉，判处崔某徒刑十二年，这是我对他的举发和加害的。

一九三六年，我任伪延吉地方检察厅长时，和龙县日警报告逮捕共产党员朴忠孝，因其在四乡募捐数百元，骚扰地面，经我转报伪高等检察厅日寇川又次长（他是专取缔"思想"犯的指挥者），回电命我就地向同级法院起诉，结果判处朴忠孝徒刑十年。

一九三六年，我任伪延吉地方检察厅长时，有安图县区检察厅（是伪延吉地方检察厅的属厅），向我报告其境内捕获共产党员朝鲜族闵永贵强占中国人张思禄的土地十二垧，因而将其二人送来延吉，经审讯闵承认是共产党员，并非是依仗党员而去强占民田，因为这是日寇拨给他的，还有字据为凭。但我仍以共产党员犯罪，向伪吉林高等检察厅报告，日寇川又次长又命我向伪同级法院起诉，结果判处闵永贵徒刑十年。

一九三六年，我任伪延吉地方检察厅长不久，奉天宪兵队查获共产党工作员徐育华，供出我是他的叔父。伪最高检察厅次长日寇柴硕文以电话约我至奉天会见，到后要我去宪兵队相认，一见果然他是我侄徐育华。日寇柴硕文问我怎么办，我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卒将徐育华交伪奉天高等检察厅，向伪同级法院起诉，判处徒刑十五年。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伪安东地方检察厅长任内，有庄河县警察捕获抗日救国军队员于明，该军因被日寇打散，他想乘船逃回山东，不幸被逮。伪奉天高等检查厅日寇川又次长（该由吉林已转到奉天）令我就地侦查，经侦讯，于明供认前情不讳，诉经伪安东高等

审判分庭，判处于明徒刑十五年。

一九三九年，有鞍山冶矿炉工人张又骞、班继超、崔福三人（毕业于辽阳公学堂），因仇恨日寇与伪满傀儡政权，不谋而合的兴起反满抗日的志愿，实行团结工人，与日寇对抗。张唯恐自力单薄，无济于事，拟欲与潜伏在千山里的抗日救国军联络，方策万全。凑巧崔福知道他的学友罗子陵在该军充当庶务，愿去与该军联络。结果，相约于六月十五日以举火为号，里应外合，炸毁冶矿炉，夺取日警枪支，大举抗日活动。崔福回鞍山之次日，已被日警所注意，问崔这几天到哪儿去来，崔回答迟钝，现出惊慌样子，日警在其衣袋里搜出罢工传单，遂将崔、张、班三人逮捕，送交伪奉天高等检察厅，经日寇川又次长侦讯明了。适我由伪安东地方检察厅转任伪最高检察厅检察官，途经奉天，日寇川又次长说你来得正好，有鞍山这个反满抗日的案子，你替我再问问起诉，要从重求刑。他又说我已向最高检查厅柴次长给你请了十日假，在此专办此案，已得照准。我即听他的指挥，侦查完了，向伪奉天同级法院起诉，结果判处崔福、张又骞、班继超的死刑。

一九三九年夏，北票煤矿工人李成仁夙具抗日救国的心情，常与工人谈起日寇反客为主，压迫中国人民太甚，我等贫苦工人，每月所赚的有限工资，还要用种种名义进行剥削，我想大家要想多得工资，就得团结起来与之抗争，非用罢工的手段不能达到目的。于是大家都听信他的话，推他领导，聚集了三四百人，向矿方要求增加工资，矿方不允，李遂率众罢工。当地伪警镇压无效，分别看管，向伪锦州高等检察厅报告，检察官闻讯来到现场，采纳矿方和伪军警的“复工者不问，执迷者严惩”的意见，结果工人被逼都照常复工。唯李成仁始终坚持非达到要求的目的决不复工，并讽刺日寇使用军警压力强迫工人复工那是非法的。检察官侦查终结，认李

以抗日的宗旨完遂其罢工争执的目的，即按“叛徒法”向伪同级高等法院起诉判处死刑。李不服向伪最高法院上告，该院于一九四〇年春检同原卷向伪同级检察厅咨询意见，经我答复其咨询说，原判认定之事实，所采之证据及判处罪刑适用之法条均无不合，上告论旨无何理由可采。伪最高法院遂为驳回上告之判决。

一九三九年，有奉天铁西区日寇汽车（载重车）制造工厂工人陈信、李绍唐、刘兴汉，为了团结工人与日寇实行斗争，开始邀集同志七人，开抗日预备会。由陈信说明开会宗旨，大家赞成，即以技术改善会为名，进行抗日的办法。施行未及三月，已有十几个单位工厂成立技术改善会。陈信为安慰乃父的期待，写信报告工作成绩。信妻无意中将信等谋划，告知李绍唐妻。李妻不赞成其夫所为，雇代书写信劝其丈夫要好好工作，不要与日本人作对。李回信叫她少管闲事。李妻大怒，又雇代书写信镇吓其夫：你如果不听话，一味和日本人闹意见，我就要向法院告你。代书写完念给她听时，凑巧这时伪奉天高等检察厅日寇翻译和贾（炳青）检察官路过听到，遂将李妻带去讯问，李妻承认给其男人写信属实。贾遂将讯问的这件事报告伪奉天高等检察厅长徐维新，徐说这娘儿们一定有外道，想陷害本夫。遂通知日寇川又次长用电话叫铁西警察署把载重汽车制造工厂工人李绍唐逮捕送厅，贾检察官受命讯问，李初否认反对日本人和罢工等情形，李妻说你还等我给你抖露出来吗？李至此不敢再辩，卒将如何团结工人，准备抗日等等行为，合盘供出。又命再去捉陈信、刘兴汉时，回报业已逃走，不知去向。贾检察官认李绍唐犯罪供证确凿，向伪同级法院起诉，被判处无期徒刑，李不服向伪最高法院上告，于一九四〇年一月该院向伪同级检察官咨询意见，我以上告无理由答复该院，遂为驳回上告之判决。

一九四一年秋，弓长岭铁矿工人赵洛二，因不堪日寇压迫，常露出不平不满的言词。赵之言论早为日寇所注意。这天赵上早班时，途中被日警逮去，送交伪奉天高等检察厅侦讯后，诉经伪同级法院，判处徒刑十五年。赵不服上告于伪最高法院，该院于同年十一月检同原卷，向伪同级检察厅咨询意见，经我答复其咨询说：原判决认定之事实、所采之证据、适用法律处刑均无违误，上告论旨不能谓为理由，该院遂驳回上告之判决。

一九四一年夏，滨江市某银行于某日上午闯进三匪。酿成事件以后，该管伪警察署日寇山下警尉急于破案邀功，即将面生可疑的王殿才、田福至、刘老三捉获，严刑教供。三人挺刑不过，听其所教，如何持枪闯入某银行，打伤事主，匪亦一名受伤，未及抢钱，即行逃走等情，由该日寇做成"听取书"送交滨江伪地方检察厅。经检察官侦讯三人的供述，与在伪警察署所供相同。起诉后的刘老三虽在伪地方法院揭破日寇匪刑逼认，强抢伤人，并说倘要改嘴翻供，一定重办等语相抗辩，但彼时王、田二人犹慑于日寇的镇吓，对于该院的讯问，仍照警、检原词复供一番。因此，第一审法院遂认刘老三的抗辩是故意胡狡，勿足采信，即判处王、田、刘三人的死刑。三人不服，控诉于伪滨江高等法院，该院更进一步反认刘、田、王等的罪行证据确凿，驳回控诉。三人仍不服，又向伪最高法院声明上告，该院检同卷宗，向我咨询意见。我当时若仔细看看卷宗内的笔录，就能发现历审未经注意的三点：一、送案时并无枪支作证；二、三人中谁受枪伤未经验明；三、刘老三既经一再抗辩无罪，应向王、田二人质讯。我要提出这样的意见，郑重地答复该院，相信一定能够触动承办本案的审判官，会深刻地认识到原判事实未臻明了，非撤销原判，发回更审，无以资补救。我乃计不出此，竟蹈一、二两审的覆辙，认该三人自白犯罪不讳答复该院，以致伪最高法院

驳回上告之判决。

上述案件判决以后，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又有真赃实犯的娄金堂、张老五、孙德财（孙德财脖子上有贯通伤痕，在娄金堂指明地点起获手枪一支）判处死刑的案件，向伪最高法院上告，这时我才知道第一回判处死刑的王殿才、田福至、刘老三等不是胡匪，而是好人。

一九四二年秋，山东沿海抗日救国军派刘兴华为鸭绿江右岸之抗日救国军支队长。刘乘船来至安东，住在天兴栈内，准备布置实施抗日活动，被伪警探侦实，予以逮捕。送经伪安东地方检察厅解交伪奉天高等检察厅侦讯，刘供认不讳，因而诉经伪同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刘不服上告于伪最高法院，该院于同年末检同原卷，咨询伪同级检察厅对于该案的意见。经我答复该院：原判决认定事实、所凭证据及判处罪行适用法条均无不合。伪最高法院因上告无理由，遂驳回上告之判决。

一九四三年秋，在锦州被伪警捕获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在锦西境内抗日救国军王队长部下充当过队员的单东山，送交伪锦州高等检察厅侦查完了，向伪同级法院起诉，判处徒刑十年。单不服上告伪最高法院，该院年末检同原卷，咨询伪同级检察厅对于该案的意见，经我答复该院，原判合法，应予维持，结果伪最高法院，遂为驳回原案之判决。

〔下略〕

119—2—1138，1，5

吉兴笔供

(1954年12月5日)

姓名:吉兴。年龄:七十五岁。籍贯:辽宁省沈阳市人。文化程度: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个人出身:军人。民族:满族。

学历〔略〕

简历:

一九一一年,在陆军第二十镇充见习军官(二十镇在辽宁省新民县)。

一九一二年,任陆军炮兵中尉,及见习军官,并兼任维城高等小学校校长(地址沈阳)。

一九一三年,充奉天都督府军政厅编制科一等科员,代理科长,补陆军炮兵上尉,当年进升炮兵少校。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改充奉天镇安上将军公署军务课一等课员,补陆军炮兵中校。

一九一六年,由军务课一等课员调充安东鸭、浑两江水上警察总局局长。

一九一七年,转任奉军湘东司令部中校参谋,兼二十七师参谋长,补陆军炮兵上校(湘东司令部在长沙)。

一九一八年,转任驻北京奉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仍兼二十七师参谋长。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任黑龙江省陆军炮兵团团长。

一九二一年，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补陆军少将。

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一年，任吉林步兵第十三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于一九二八年补陆军中将。

一九三二年(夏)，任伪满政府吉林省警备司令官。

一九三四年，任吉林第二军管区司令官，补陆军上将。

一九四一年(春)，任伪皇帝侍从武官长。

一九四三年，伪政府赐伪将军称号。

一九四四年六月，任伪尚书府大臣。

一九四五年八月，被苏联军在长春俘虏。

犯罪事实：

(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了东北，我投降当大汉奸的开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时我在吉林省间岛当镇守使，兼步兵第十三旅旅长。我完全是自私自利思想，不顾人民，不顾祖国，为保全自己生命，不肯牺牲，带领部下投降了日寇。当日寇军占领吉林省时候，我就决心投降，召集团长朱榕、王树棠、梁泮三人，对他们说明东北的局势和日寇的势力强大，提出投降的意见，征求他们的同意。唯有朱榕团长表示反对，我就一面威吓，一面劝诱，朱榕说镇守使愿意投降，我不投降，并要求三个月后辞职。我当即允许了。王、梁两团长没有什么表示，我就宣布投降，听从吉林省伪军政长官熙洽的命令办事，同时欢迎日寇特务机关派来一个日寇宪兵植野大尉在司令部当军事顾问，我就同他一起效忠日寇，压迫人民。本来间岛各县军警民团都有爱国抗日思想，不甘心受日寇的压迫，就有陆续拉出来抗日的，到十月初旬，延吉县的人民自卫团就拉走作抗日行动，于十一月我的部下第八团第三营长王德林

带他的全营士兵拉走，在宁安县镜泊湖一带实行抗日。继其后者有十三旅炮兵连全部士兵拉出，到山里宣称抗日，我与日寇顾问协谋派队讨伐，把这个炮兵连全部追回，用镇压手段，将带头起义的头目士兵枪杀一名。为了消除反抗，将该炮兵连全部士兵遣散，以示镇压人民大众之意。

我身负保土卫民重大责任的地方长官，在日寇强占东北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但未能带领军民大众一致抗日，反效忠日寇，镇压抗日的军警民团活动，影响了抗日的情绪，压住了人民爱国的气氛，自己不爱国，不许人民爱国。因我有自私自利可耻的落后思想，投降日寇根本错误行为，以上就是我开始走上了当汉奸的道路。

(二)我怎样爬上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和军管区司令官的地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我由延吉到吉林市与大汉奸熙洽合谋，把持吉林省伪政权和建立伪满洲国，捧溥仪来东北当伪满元首的情形。熙洽对我说，日寇要建立伪满政府，把溥仪请到东北，捧他当伪满元首，我们执掌吉林全省政权，帮日寇建设伪满洲国，你意见如何？我因与溥仪有同宗族的关系，当时极力表示赞同，但是有些危险的顾虑，一则我们没有力量；二则国际上的关系和边防上的关系；三则东北民意当然反对，恐怕是危险。熙洽说，有日军的保镖，毫无顾虑，东北的财富充足，筹款练兵也无问题。我即表示同意帮凶日寇，建设伪满。因当那时王德林营由延吉县明月沟带全营士兵起义拉走，我回延吉派队讨伐一次，未见功效，停止讨伐。我把延吉警备司令职务交给朱榕接办，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到吉林开始活动，见日军多门二郎师团长和大迫通贞顾问，又到长春见日寇本庄繁司令官，表示诚意欢迎溥仪来东北，就得到日寇的欢

心。可是我到吉林的时候，伪满建国和伪政府机构组织已经完了，所以我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作，溥仪已于三月九日就伪执政位，伪政府已经任命我为吉林全省警备司令官。未到任以前，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初旬，就有抗日军李海清带一万多人围攻农安县，同时长春也危急。我指挥彭金山骑兵旅、王之安骑兵旅、刘玉昆骑兵一个团，协同日寇军一个大队，讨伐李海清，解除农安的围，追击到扶余县。把李海清抗日军打散后，回到吉林市接警备司令官职务，一面积极入手招练新军，一面讨伐王殿臣抗日军(讨伐经过另写)。司令部兵饷每月五十万元，由伪军政部领发。吉林编成教导队一个队，以朱榕为队长，任永和一个步兵旅，郭宝山一个骑兵旅，金恩奎一个步兵旅，刘玉昆一个骑兵旅。一九三三年酝酿改执政为伪皇帝的运动，我曾参加活动，捧溥仪接伪皇帝位。我也曾参加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仪伪皇帝登基典礼，论功行赏，因我帮凶日寇，忠心伪满，由中将进级为上将。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因各省划军管区，把旧有的伪司令部(伪警备司令部)改为军管区司令部，伪警备司令官改为军管区司令官，我仍继续当伪吉林第二军区司令官。

(三)我在吉林省伪警备司令官和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任内讨伐抗日军的事实。

(甲)一九三二年三月讨伐抗日军李海清。抗日军李海清带部下号称一万多人，从黑龙江省起义，围攻农安县，同时邻近的长春也危急，我指挥骑兵两个旅的兵力，把他击退，解除了农安的被围，打死抗日军二十余人，李海清退向扶余县。我又带骑兵两个旅和一个团(原驻在农安街里被围的)追击到扶余县界长春岭打一仗，抗日军死二十余人，被俘四五十余人(把这些人补充为伪兵了)。李海清退向江北去了，尚有五百多人，占据扶余县街，我又率队对此围攻，打死抗日军七八个人，抗日军退向肇东县去了，结束了战

事。这个讨伐，抗日军受损失一百多人。

（乙）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于琛澂帮凶日寇军讨伐吉林自卫军。讨伐自卫军丁超、李杜，于一九三二年春由哈尔滨出发，于琛澂带三个旅随同日寇军后，分两路向方正县前进，日寇军饭冢、弘前两联队，一路是弘前联队，由珠河奔方正，另一路是饭冢联队，由宾 县奔方正，在大勒勒密与丁超部下旅长孙殿甲接仗，把孙殿甲打退，结果吉林自卫军损失二百余人。

一九三二年冬，于琛澂部下李毓九带骑步兵四个团，帮凶日寇军饭冢联队作为一支队，在七星泡打了一仗，丁超部下损失很大，于十月丁超退守宝清县。十一月伪军追到宝清打一仗，丁超没有抵抗就退走了，向挠利沟子途经义合号被伪军卡住，不能前进，又退回宝清，在山林里抗守，这时伪军帮凶日寇军围攻，丁超不能抵御，缴械投降。丁超在未投降前，我曾去信诱降，信中大意说皇军势力强大，不可抵御，劝其投降，并保证投降后，绝无生命危险等语。按此信不但能威胁了抗日军，而且能使抗日军力量逐渐瓦解，对打击抗日军的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

（丙）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夏，讨伐抗日军王殿臣的事件。

在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吉林，当时王殿臣起义，作反满抗日活动，出没于永吉、盘石间，以永吉县界烟筒山为中心，围攻吉林市和袭击吉奉铁路火车，驾走伪军旅长朱力孚，威胁伪军，声势浩大。我率第二教导队骑步兵一千五百多人，并联合日寇军中村馨共约三千多人，讨伐王殿臣所部五六百人，结果王部共死伤二百多人。我并用金钱诱买王殿臣部，使其倒戈投降，结果他部下刘东坡投降，编为伪满军团长。又用诡计和金钱收买王部下，设计打死王殿臣，投降未归，遂完全消灭了王殿臣这支抗日军的力量。

（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讨伐抗日军三江好的事件。

三江好抗日军所部约二百多人,在吉林市东北方尤家屯一带作抗日活动,我派教导队长朱榕带步骑兵约一个团的兵力讨伐,没有接仗。三江好抗日军向北退去,伪军追击十余日,到舒兰县界小城子向北方退去,化整为零,潜逃入山,朱队长带队回营。

(戊)讨伐红枪会的抗日军事件。

一九三四年夏,红枪会抗日军约三百多人(头目不详),在舒兰县一带活动,驻在该地的伪满军被围十余日,并击毙伪军四十多人。我即派伪军攻击增援,将该红枪会的抗日军完全消灭。

注:驻在舒兰县有伪军刘宝麟旅长的一部分,约有一营兵力及炮兵连连长罗绵带四五十名士兵亦驻在该地。我所派的增援伪军,为赵广礼团长带二营兵力前去解围救援,并掳获红缨枪四五十根。

(己)讨伐抗日军赵尚志事件。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间,赵尚志将军率部王荫武、李华堂、刘景山,在延寿、苇河、珠河、方正、穆稜各县与一面坡一带和牡丹江沿岸作抗日活动,声势浩大。我即派伪滨江地区司令官李文炳及团长邓云章,于一九三三年秋冬之间率军讨伐。在牙不利后堵与赵将军部下接仗三四次,其中一次抗日军牺牲三人,另一次伪军被袭击,伤亡各十余人。又在一面坡与赵尚志部下作战,击毙抗日军二十多名,伪军无伤亡。在这次大讨伐时,强迫山里采伐木业的工人停工,并驱逐居民出山,不听命令的就要枪杀,烧毁民房山寨,断绝了粮道,断绝了接济,使抗日军无法生存,迫使赵将军率部向汤源、依兰拉走。总之,对抗日军民实行三光政策,人民的严重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庚)一九三四年讨伐罗子沟抗日联军事件。

一九三四年抗日联军×××将军的部下,联合王德林部下孔

宪荣及吴傻子(名已忘,绰号傻子),共有兵力六七百人,围攻间岛省的汪清县罗子沟村。该地驻军为伪团长梁泮部下的第二营闻长仁连长和迫击炮连长缪延光,共有兵力二百多人,被抗日联军围攻三昼夜,并对伪军叫喊投降,因伪军不明大义,不肯投降,仍作顽强的死守。当这个时候,我命令梁团第一营长吴连明带一营兵力(四百多人)驰往救援解围,并与罗子沟闻缪两连长内外夹击,抗日联军伤亡约一百多人而退。因闻缪两连长死守罗子沟有功,特提升闻连长为营长,缪连长传令嘉奖,以资鼓励。我并亲往罗子沟视察,鼓励士气。并说你们作战有功,望以后加倍努力,坚守阵地,效忠伪国等语,并犒赏伪军士兵,给以猪肉及奖金一千元。

(辛)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吉林地区秋季大讨伐。

这个讨伐计划受伪军政部命令,第二军管区编成讨伐军,由我命令吉林地区伪司令官吴元敏为讨伐司令官。

一、伪军兵力配备:编成伪军七个旅,日寇军一个大队,共约一万四千人。

步兵第九旅长任永和一个旅,驻桦甸、盘石;步兵第八旅旅长兼司令官吴元敏,驻长春、九台;骑兵旅长尹保衡,驻桦甸、敦化;第二教导队驻吉林、德惠、舒兰;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驻额穆、敦化;黑龙江的骑兵第一旅长王克艭,驻榆树;日寇军驻吉林舒兰、敦化、蛟河沿铁路线。

二、讨伐区域:永吉、敦化、桦甸、盘石、长春、九台、舒兰、德惠、额穆、榆树各县。

三、讨伐对象:抗日联军×××将军、××、李司令、王团长、窜山红约共一千二百人。

四、抗日联军损失:五百多人,杀伤人民一千五百多,烧山寨四、五十处。

五、讨伐情况：第五教导队步兵团第二营与×××将军在莺家沟接火一次，损失数目不详。步兵团在烧锅屯一带打一仗，抗联损失十余人。步兵二联在烧锅屯附近接火一次，抗联损失二人。骑兵连在清沟子打死抗日联军二人。骑兵第一旅第二团在榆树县工棚子与抗联接火，抗联损失十余人。驻敦化步兵团在寒葱沟打死抗日联军十余人。驻十团在寒葱沟杀烧人民一百多人。抗日联军袭击敦化官地南山头，打死日寇八、九个人，卡车三、四辆，抗联损失四、五人。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带部下五百多人，在哈尔巴岭山洞袭击火车，打死日寇很多，抗联损失四人。一九三五年夏秋间，抗日军三江好带二百多人袭击九台县土门岭铁路，伪军协助日寇军，把三江好打退，抗日军损失二三十人。

(壬)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敦化县大蒲柴河大讨伐。

一九三六年秋，抗日联军在敦化和桦甸县一带，以大蒲柴河为中心作抗日活动，气势很盛。我与日寇主任顾问三毛逸计划大讨伐，在敦化县设司令部临时指挥所。

一、伪军兵力配备：约五千人。这兵力是因讨伐日期很长，讨伐队伍前后陆续调换，合计起来参加的人数。

步兵团长郑镒一个团，驻大蒲柴河；教导队骑兵一个团。团长杨子新，驻马号一带；骑兵第十团，团长为日系军官日野武雄，驻寒葱沟；步兵一个团，驻桦甸县。

二、讨伐区域：敦化、桦甸、安图各县。

三、讨伐对象：杨靖宇将军部下五、六百人。

四、抗日联军损失：三百五十多人，人民死伤约三千人，烧山寨约五十多处。

五、打仗情况：在大蒲柴河，日寇教官石川中佐指挥伪军步兵团，打死抗日军十余人，继续追击前进，日寇石川被抗日军打死。

在马号山里，教导队骑兵团与抗日军接火，抗日军阵亡二十多人。在这个讨伐期间，伪军对抗日民众，烧毁房屋，抢掠财物，凡居民对抗日军抱有好感的，就要遭到杀戮。用最残暴的手段，对付热爱祖国的抗日居民，用断绝粮道，断绝交通，使抗日军无法生存，不得不分散成小股，向抚松县、濛江县方面退去。

(癸)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我派队参加了日寇野副昌德指挥的大讨伐。

这个大讨伐，区域很广，兵力很多，完全由日寇关东军命令日寇吉长防卫司令官野副昌德为专任讨伐司令官。在吉林市设讨伐司令部(司令部设在日寇军守备院内)，所有司令部的幕僚完全日寇人员，参谋长是日寇顾问北部邦雄。司令官野副昌德握有指挥全伪满军警大权，参加讨伐的伪满军警团队，全是由日寇野副昌德向各省和各军管区调集来的。第二军管区我派出参加的驻敦化旅长刘尚华，步兵一个旅，驻桦甸骑兵旅长尹宝衡一个旅，完全交由日寇野副昌德指挥，所有军队行动，打仗一切均须听从日寇命令。我在讨伐紧要时期，曾亲自到敦化、桦甸两县督饬过伪部队一次，叫他们努力讨伐。这次讨伐的详情如下：

一、讨伐兵力：共约两万人。

伪满军队吉林第二军管区两个旅，通化第八军管区两个旅，牡丹江第六军管区两个旅，奉天第一军管区一个旅，警察大队的增援队，通化省、间岛省、吉林省、热河省、牡丹江省、滨江省的警察大队，每个大队的编制人数五百人以上。

日寇军守备队三大队约三千人。

二、讨伐区域：奉天省、通化省、间岛省、吉林省及有关抗日联军活动的各县。

三、讨伐对象：抗日联军杨将军靖宇，×××将军、××、李司

令等共约二千人。

四、抗日联军损失：杨将军牺牲，陈汉章牺牲，部下死亡五六百人，杀伤人民约三千二百人。烧毁民房五六十处。

五、肃正工作班：这个班完全是日寇。日寇顾问、日寇宪兵和警察特务所组成的，专以杀戮我爱国的善良人民，平均每天十个八个不等。这个肃正工作班是最凶暴残酷成性的杀戮，完全失去了人性的行为。

六、讨伐的方法：秋季讨伐开始前，将所有的农作物完全割倒，在山林地区用重兵包围，扼守据点，山林地带，不准人民出入，断绝了交通粮道，实行三光政策。

七、讨伐军队的行动：山林局部作战的方式，把伪军警编成小组部队，团、营、连单位归日寇军官指挥。例如伪军一连归日寇小队长指挥，伪军一营归日寇中队长指挥，伪军一团归日寇大队长指挥，进山分路讨伐，在山里常遭抗日军夹击，以致小部队不敢入山。

八、打仗情况：桦甸骑兵旅在红石砬子一带打仗，抗日军死伤十余人。敦化刘尚华旅步兵团在寒葱岭一带接火一次，抗日联军损失十余人。在额穆索山里接火，抗联损失陈汉章部下一百多人。又搜查一个山寨子，抗日军饿死的二十八九个人。这是吉林部队打仗情形，其他省伪军打仗情况，因完全由日寇调动指挥，所以我详情不知道了。

九、组织敢死队：我所组织的敢死队游击，兵员二百名，派教导队附关启宇带领。这个敢死队不作旁事，专为讨伐杨靖宇将军而组织的。该敢死队于一九三九年冬季出发，临行时我曾对该队士兵说，如能将杨靖宇打死，必有重赏。结果没有收效，该队于一九四〇年春回营。

十、消耗物资：在这个大讨伐期间，消耗东北物资财富不下三、

四百万元，人民惨遭三光政策的损失，无法计算了。

（子）一九三九年夏派兵参加诺门汗战争事件。

在诺门汗战争时，吉林第二军管区派炮兵一个连的兵力协助日寇参加作战，由日寇藤村顾问率领指挥，又派参谋长吴元敏到诺门汗战地慰问。据吴元敏回来说，炮兵连据守处在山头上，作为日寇军阵地的右翼，在山上做成防御的工事。作战的时候，看不见敌人，常有蒙古飞机监视水源，并散发宣传标语传单，内容是不打中国人。并说最感困难的是饮水问题，白天士兵得不到水喝，因水源地被蒙古军封锁，到夜间才由水源地取得饮水等语。吴元敏慰问完毕回来时，在路途中曾遭到飞机开枪射击，但未击中。我派去的这一连兵到诺门汗战争完了回归吉林。

（四）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〇年当伪军管区司令官（讨伐事件除外）的各项活动。

一、王德林反正抗日事件。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我的部下王德林营长带全营士兵拉出去抗日。该营四个连分四处驻扎，驻延吉县界明月沟，连长吴傻子（名字忘记了，绰号傻子），驻哈尔巴岭（连长姓名已忘），驻二道沟（连长姓名已忘），驻三道沟连长孔宪荣。因为日寇要修敦图铁路（敦化至图们）路线，勘查队到明月沟并未通知当地军警，日寇工作人员直行上山，用望远镜四面了望。驻明月沟一连的士兵早有准备打日本鬼的意识，这时看见日寇上山的举动，该连士兵二三十名开枪射击，打死日寇二名。我得知该事件发生后，即派参谋长吴元敏到现场调查。同时日寇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和我通电话厉声责问出事真相，我告诉他现在正在派员调查。据吴元敏调查回来说，因日寇擅入我军防线窥探，所以开枪射击，打死日寇二名。经交涉结果，被打死的每人给以抚恤金三千元，作为了事。以后因我

严责王德林带兵不严，他怕受法办，且该营士兵平日都有抗日的爱国思想，遂于十一月间拉出，向宁安县镜泊湖一带实行抗日。在该营路过官地村时，我用电话与王德林通话，劝其归回，又派梁泮团长单人追随，劝他们归回，都没有收到效果。所以我派朱榕团长带兵两营前往讨伐，到达石门子，所有的士兵都不愿前进，他们的口号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这一个讨伐，遂归失败。朱团长只得率队回归珲春原驻地。自后王德林带部下常在东宁、绥芬、一面坡一带与赵尚志将军联合抗日，到一九三五年王德林由苏联境转道上海去了。

二、第十三旅独立炮兵连拉走反正事件。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朝鲜宪兵司令官日寇岩佐少将，为了调查明月沟军队打死日寇事件，到延吉与我会面，他要看延吉驻在伪军的实际情况，我就把延吉县街驻的团部和步兵第二营机关枪一连炮兵一连告诉他了。他又要到营房里去查看，我也许可了。我命令第二营长郭瀛接待他，给他看看士兵。岩佐少将同日寇顾问植野大尉由梁团长带领到第二营视察完毕，日寇岩佐少将宿于延吉旅馆。是夜通宵狂风大雪，于夜半十二时，炮兵连士兵带枪械起义，全连向老头沟北方山里拉去。我即一面查问炮兵连崔连长（该连拉走的时候，崔连长住在家中，没有同士兵一同拉走），答称不知，一面通知岩佐少将，告以炮兵连拉走的事情，叫他注意戒备，免遭危险。到天明八时，该连来电话向我要求发饷，并把大炮送去，我虚言允许，稳住了他们。即派第一营长吴连明带全营兵力讨伐，把炮兵连包围缴械，就地把带头的军士枪毙一名，把其余士兵带回，发饷遣散了事。以上经过情形，就是我自己不抗日不爱国，还不许部下抗日爱国的正义行动，也就是我效忠日寇来屠杀正义的爱国士兵的明证。

三、我向日寇献媚，提供整顿伪军和讨伐抗日军的建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间，我对日寇提供两个建议，一个是整顿伪满军队的办法，一个是讨伐抗日军的办法。我和参谋长吴元敏同日寇顾问大迫通贞开坐谈会，大迫通贞向我说，要整顿伪满旧军队，另练新军队，用什么办法？我建议，必须征兵，按照日本有经验的征兵法，代替募兵制度，征集民间体质良好的青年服兵役，把旧有招募的腐败士兵陆续淘汰。至于军官必须设立军事专门学校，造就专门人材，充作军官，把旧有腐败军官按停年办法免官，陆续裁汰，以免叛乱，如果照这样办，那么几年以后就变成整个的新军了。当时日寇大迫通贞很是赞许。同时大迫又说要讨伐抗日军得怎么办呢？我又建议，断绝粮道的办法，因为抗日军是利用山林地带活动，要把他们围困在山林里断绝了交通，日久无粮，不打自散。当时他也很同意。不久以后，都一一付之实施，颁布了国兵法，实行了断绝粮道法。这是我无耻的献媚日寇，断送了不知有多少祖国的青年和人民的生命，充当日寇的炮灰。在断绝粮道的办法上，不知饿死了多少爱国抗日志士，并引起了三光政策，损害了祖国人民无数的生命财产。

四、陈烈武反正抗日，我利诱他投降伪满。

为了讨伐丁超、李杜，我命令第七团团长王树棠率两营兵力，第二营长李秉辰，第三营长赵德懋，由敦化出发到吉林，配属于于琛澄(讨伐司令)讨伐军内。当士兵由敦化县上火车时，抗不上车，拒绝出发。我以欺骗的言语说："到吉林驻防，不是打仗。"这样才登车出发。到达吉林后，于琛澄提升王树棠团长为第六旅旅长，团长缺由李青山接充。这两个营随讨伐队出发，于一九三二年春攻打哈尔滨，被丁超、李杜打退了。第二营长李秉辰带一个营退驻榆树县，第三营长赵德懋带一个营退驻五常县。当这个时候，日寇军

到来,哈尔滨的丁超、李杜就向方正县退走。于琛澄又重整队伍,协同日寇军随后追击,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于琛澄命令第六旅长王树棠带一个旅和李秉辰、赵德懋这两个营出发讨伐,但两营官兵拒不出发,声明要回吉林。在这个时候,我正在扶余县讨伐李海清。第三营长赵德懋由五常县到扶余县见我,说明士兵拒不出发情形,愿意回吉林原防,否则就要拉走,不听命令啦。我告诉他说:这两营士兵,已编入讨伐队,归于琛澄指挥,我无权调动等语。赵营长仍回五常县。在这个时候,第三营的第九连连长郝秀峰,十连连长周怀隆就起义向山里拉走。这两个营所剩下的六个连,在双城(地名)附近由第十一连连长陈烈武率领也起义了。这年秋季,我叫王树棠(这时王树棠不当旅长啦,因讨伐失败被于琛澄免职,回至我处充当部附,因这两营士兵原是他的部下,能听他的话)去劝诱陈烈武带兵投降归伪满,能升官。结果陈烈武起义的七个连,投降伪满,只有周怀隆一个连没有投降。这时我把陈烈武升为骑兵第十一团团长,驻防敦化县官地。以上经过的事实,就是我用卑鄙手段,欺骗诱惑正义的爱国士兵,不能作反满抗日的行动,减少了抗日军的力量,增强了敌寇的力量。

五、赴日参观陆军秋季大演习事件。

一九三四年秋,受伪军政部命令赴日本观操(定期为一个月),我为参观团团长,带伪军官共三十人,由日寇最高顾问板垣征四郎、顾问北部邦雄率领。从大连出发,到马关下船,经过广岛,受日寇小矶师团长宴会后,直达东京。先拜明治神官,后到天皇宫门签名,写御机嫌。又拜会陆军省大臣林铣十郎、次官桥本虎之助后,再到富山县,参观演习。一星期后,参观完毕回东京。这次演习用各兵种和机械化部队,共约五万人,分南北两军对抗演习,三个战斗动作,一个开始遭遇战,一个北军防御战,一个南军攻击战。在

演习时我曾经由无线电广播一次，宣传日本武力强大的状况，兵强将勇，军容严肃，战术精巧，演习成绩良好，证明日本的军事教育完善，说了许多的奉承语。在演习地谒见裕仁一次，演习完了有观兵式，有天皇御宴，又有陆军省的招待宴，宴会完毕，回到东京，起程回东北。路过伊势神宫拜天照大神，又在大阪参观炮兵工厂以及轻工业工厂，同时有厂长招待宴，在宴会席上我曾演说一些日满亲善、日满不可分的拍马可耻的言语。参观一星期后，由大阪起程到朝鲜见宇垣总督，在宴会席上，他说伪满必须用日寇办事，才是正确的等语。由朝鲜回伪新京见伪军政部大臣张景惠，结束了参观任务，并令各参观人员回原防地，把这次参观的经过情形向人民宣传日寇武力的强大，以威吓人民大众。

六、派伪军保护修筑铁路事件。

一九三二年春，我派驻延吉县伪军第十三旅步兵团梁泮团长的第二营全营士兵保护修筑敦图铁路，保护期间约三个月。该路自哈巴岭至图们江，接通朝鲜的一段路线。因这条路线两侧常有抗日军活动，阻碍了修路工作，所以我派兵保护，使筑路工作早日完速，以利敌寇的军事运输。

七、杀害抗日军爱国义士八个人的事件。

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永吉县烟筒山村，捕获王殿臣部下五个人（姓名忘记了），内有一名绰号蓝大烟。又在一九三三年春，由永吉县烟筒山村捕获王殿臣部下三个人（姓名忘记了），前后共两次计八名。我将这八名抗日爱国义士，都先后送交军法处李保谦审讯，供认不讳，确是王殿臣部下的抗日爱国义士，因在讨伐期间，用镇压手段都处以死刑（没有用军法会审的手续）。以上八名抗日爱国义士，虽非我亲自杀害，但由我送交军法处，致使八名抗日爱国义士由我而牺牲，我应负杀人的罪责。

八、参加伪皇帝溥仪观兵式典礼。

一九三四年三月。溥仪当伪皇帝，特为表示皇帝尊荣，在他登基后作一次大典观兵式。这个观兵式所用的伪军，是调集伪满全国军队步骑炮各兵种共约八千人，以伪警备司令官于芷山为诸兵种指挥官，在伪新京郊外行观兵典礼，我率领吉林第二教导队步骑炮全部参加了典礼。

九、参加伪满军秋操事件。

一九三四年九月，伪满军秋季大演习。因伪满建国已有三年，曾经训练了十几万伪军，特为夸张军容，对反满抗日军表示军威起见，仿照日寇军国主义的办法举行伪军大演习。所有演习措施如下：(一)部属的组织：伪军政部大臣张景惠为统裁官，日寇顾问为裁判官，邢士廉为北军指挥官，应振复为南军指挥官，各带五千人；(二)演习地域在长春以南大屯村至孟家屯村一带；(三)演习作战科目，南北两军在大屯村附近作遭遇战，北军退却，南军追击，到孟家屯村附近阜丰山作防御战，南军作攻击战。经过三天演习完了。我派第二教导队全队参加了这个大演习。

十、参加日寇防空演习事件。

一九三五年春，日寇军驻吉林市守备司令部，在吉林市作防空演习，我率领驻吉林市伪军全体人员参加了防空演习。白天作的科目，防火、消毒、防毒、避难等动作，夜间演习全市闭灯，日寇飞机由长春到吉林上空，假设空击动作，结果飞机掉落，摔死了日寇三四人，闹了一夜，市民不得安宁。

十一、对伪皇帝报告军情事件。

自一九三四年起，每年年初各军管区伪司令官对伪皇帝溥仪奏报军情。我当吉林第二军管区伪司令官任内，历年所奏报的军事情形如下：

1. 准备奏折一件，这个奏稿，必须先由伪军政大臣和日寇顾问认可后才能上奏。

2. 奏报事项：本军管区境内治安肃清情况，本年内讨伐的行动，本军管区伪军改编和教育状况，都是官样文章。例如关于讨伐事项，我派队参加日寇野副昌德的大讨伐，只说地方治安好啦，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至于杀人民抢财物烧民房的三光政策一概不提。关于教育伪军事项，只说伪军军风纪良好，至于士兵欺压老百姓的事情一概不提。我是以说假话报喜不报忧的态度上奏的。关于改编军队的事项，我上奏的如下：第二军管区伪军每年裁减军队。从一九三四年起有八个旅，到一九四一年我转任的时候，第二军管区只剩伪军步兵第二旅长刘尚华，驻敦化；骑兵第二旅长金毅，驻盘石；步兵十二团长刘树勋，驻桦甸；教导队队长张印符，驻吉林市；高射炮队和陆军医院驻吉林市。

3. 上奏典礼完毕，溥仪赐宴，各伪大臣陪宴。又有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宴请，和伪国务总理宴请。在各宴会席上必有训词，内容是各军管区司令官，在本岗位上一年内的劳苦功高，继续努力的一些奖励语。我们答词，大意是努力保卫国家，效忠伪满一些奉承语。

以上就是我上奏军情的经过情形，也就是效忠日寇作了奴才走狗的明证。

十二、我参加军管区司令官会议的事件。

每年年初召开军管区司令官会议，会议开始时，主席宣读训词。这个会议是伪军政部大臣和日寇最高顾问为主席，召集各军管区伪司令官和各军事学校校长。对伪军政部大臣报告各人工作岗位上去年一年内完成的任务。例如讨伐的情况，管辖区域内抗日军的情况，军队改编的情况，每人限十分钟报告完毕，将报告文

件呈交伪军政部大臣。其他例如要求改善军队待遇事项,在会议席上是不能决定的。这个会议参加的人员,除各军管区司令官和各军事学校校长以外,有军政部的伪参谋司长和伪军需司长,以及伪大臣的幕僚等,日寇最高顾问以下的各顾问。会议限一天完了,会议完毕,由伪军政部大臣设宴招待,席间伪军政部大臣致训词,所说的多是些奖励过去的成绩,督饬以后的努力。以上就是会议的经过情形。

十三、我派队保卫伪皇帝溥仪巡视各省事件。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溥仪巡视各省共有七八次,在他巡视经过道路,必须有军队保护,我以第二军管区司令官的身分,率队随行保护。一九三四年溥仪巡视奉天省,一九三五年秋哈尔滨江上军观舰式,一九三八年锦州巡视,一九三九年春赴牡丹江巡视,一九四〇年夏赴吉林视察小丰满水电站,一九四一年夏赴齐齐哈尔,一九四三年赴安东,并到水丰水电站。在他巡视地区的铁路两侧,都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他经过的路途,人民必须回避,断绝了交通。在他所到的地方,真是劳民伤财,鸡犬不宁。而一般警察特务,借保护皇帝之名向人民敲诈勒索,稍不随其意,就把人民关押,多的时候竟有一二千人,甚至有两三个月被关押而不放的,所以人民怨声载道,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这是我出动军队保护伪皇帝巡视的经过情形。

十四、我代理特命检阅使的事件。

一九三五年春,伪皇帝溥仪特派伪军政部大臣张景惠为特命检阅使,预定检阅军区的范围是第一军管区、第二军管区、卫队旅和军政部。在检阅任务未完了的时候,张景惠升任伪国务总理,溥仪就临时派我代理特命检阅使。我就任之后检阅了军政部和卫队旅。经过了一个星期,检阅完了,发表讲评稿(该稿是日寇顾问拟

的)，并由我复奏伪皇帝，这就完成了代理特命检阅使的任务。

十五、我在吉林军管区伪司令官任内行征兵检查事件。

一九三八年伪满颁布国兵法后，我在吉林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任内，于一九三九年秋行一次征兵检查。共检查了身体合格的青年约一千二百人，以六百人补充第二军管区队伍的兵额，其余检查合格的青年，拨归第六、第七军管区队伍的兵额。这许多检查合格的青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入营服兵役。我把这六百人编一个营和一个连，名叫新兵营，驻在敦化县；一个连驻在明月沟(系朝鲜少数民族)，实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教育完了后，把新兵编入第二教导队，在新兵入营式的时候，我曾对新兵讲话，大意是说服兵役是青年人最光荣的事情，你们都是伪满优秀的青年，应当忠君爱国，用心学习军事技术，服从官长命令等语。也曾把新兵入营式，摄入影片，名叫“壮志烛天”送到各大市镇巡回出演。到一九四〇年秋，又举行征兵检查，所检查的合格人员数额与一九三九年相同，到一九四一年，我调任侍从武官长，所以没有参加新兵入营式。以上就是我对青年施行了奴化的教育，麻痹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充当日寇的炮灰，也就是我无耻的作了日寇的帮凶。〔中略〕

(二十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由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大藏(日寇)召开重臣会议宣告伪皇帝溥仪退位的经过情形。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飞机空袭伪新京，九日我才得知苏联与日寇开战。到十一日日寇吉冈安直对我宣布伪满政府准备迁移，溥仪以下各伪大臣以及重要人员一同搬往临江县大栗子沟。同时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示意说：日寇军对苏联军准备抵抗，作战计划，是利用山地作持久战，伪皇帝溥仪以下各伪大臣必须搬到大栗子沟协同日寇军抵抗苏军。我是唯命是从，按照日寇

的指示，我于八月十三日随同溥仪出发，十四日到达大栗子沟。随行的有伪总理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宫内府伪大臣熙洽，伪侍从武官长张文铸等(还有阮振铎等四、五人随行，在半途中在通化下车)，随行的还有侍候伪皇帝溥仪的御用挂日寇吉冈安直，伪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伪宫内府次长荒井静雄等，同往大栗子沟，听候日寇的命令。但日寇崩溃，无条件投降，这个重要的喜讯，吉冈和山田等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始终秘而不宣，所以我始终不知道，脑中还存在着帮凶的思想，真是可耻、可笑、可恨。十九日日寇伪国务长官武部六藏，由伪新京乘飞机到大栗子沟，召开重臣会议，参加的有大汉奸张景惠、熙洽、吉兴、张文铸和日寇吉冈安直、桥本虎之助、荒井静雄等人。武部六藏当即宣布日寇在“八一五”已经无条件降服，伪满洲国当然不能存在，伪皇帝溥仪应当宣告退位。当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宣读一遍，各伪大臣均无异议。从此伪皇帝溥仪就以张景惠署名的诏书宣告退位了。同时日寇武部六藏又宣布把溥仪和他亲属用飞机送到日本，并已准备伪币两亿元汇到日本，充足溥仪逃亡的生活费，预定于二十日乘飞机起程往日本。会议完毕，大汉奸张景惠、熙洽、吉兴和日寇桥本虎之助见溥仪，奏报重臣会议的经过情形，对溥仪行告别礼，我于十九晚乘车回长春，至八月三十一日被苏联军俘虏。

〔下略〕

119—2—1148—1—5

王之佑笔供

(1954年5月7日)

伪满军事机构和部队的系统、编制及兵种、兵力的分配情况：

在旧东北政权时期士兵人的来源，都是在自愿而有保证人的原则下由招募而来的，所以伪满初期(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仍是沿用这个办法的。中间时期(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兵员的补充曾一度采用寓征于募的办法，其方法也是以自愿而有保证为原则，由东北各市、县、旗里采选土著的合格壮丁，先向各教导队及兴安部队中补充兵额，其后认为试行有效，所有伪军各部队中缺额时，即用此法向附近市、县、旗公署要兵，就成为强迫、勒索的扰民害民苛政。有些地方人民因此遭到骚扰和损害，到一九四〇年因为要实行征兵制，这个苛政停止了。一九四〇年四月颁布国兵法，是为征兵制的开始，当年秋季征兵检查，由一九四一年春第一期国兵入队，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共五次国兵入队，把旧日的募兵全部替净。伪满兵员嗣后全都来源于此，并有两期的退伍征兵回到民间，依法是预备召集的，但未召集也没〔设〕有在乡军人会的组织，这种损害人民罪行的苛政，是给人民尤其是优秀青年加在身上了，这是伪满末期。

至于兵种与编制，在旧东北军中是分国防军与省防军。国防军编制每旅皆为三团制，步兵旅人数九千余；骑兵旅人马数约三千；炮兵每团均是野炮两营，山炮一营，每营炮十二门，人员四百

余；工程辎重均以营为单位，人员略等于炮兵，器材只有少数通信、架桥材料及大车，汽车尚很少。而省防军编制与兵种，因乎地方情形，则不统一，每旅三团、两团不定，多系混成旅，步兵团全员约在一千八百至两千人，骑兵团人马约在六七百，炮兵更少，炮的种类也极残旧（例如俄国炮、沪造山炮），军马还存在大半的种马制。再有海军则是以江亨为主力的江防舰队，司令以下官兵也是随同江亨来的，总员数不到一千人。伪满成立，部队编制大概是沿用旧东北军省防编制（即步兵团全员两千名上下，骑兵团全员六七百名，炮兵没有足制的团，没有新式的炮），但又因在"九·一八"之后，日本浪人和蒙奸、汉奸、招集许多胡匪，人马、兵器，就更为复杂，直到末日的"八·一五"，仍然不是一律的。然而镇压人民，打击抗日力量，援助日寇侵略等等罪行，则是无有例外的。

再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乎使用伪满军的目的，对于伪满军的兵种、兵力以及配与的兵器，也有时期上的变化，例如，在一九三六年末以前的阶段，是日寇利用伪满军镇压东北人民、打击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组织力量的时期，所以步、骑兵较多，马匹也比较充足的时期。其后，因为所谓讨伐的任务逐渐减少，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更企图用这部伪军来帮助日寇向中、苏和蒙古入侵，就把人、马的数目稍减，步、骑部队的武器稍为加强（如轻机、掷弹筒的补充），以期把伪满军使用在侵略的目的上，即所谓精军时期。在这个时候将海军名义取销，改为江上军，与陆军合流，以便统一指挥，所以就引起了华北出兵和诺门汗战事等极大罪行。自一九四一年国兵入队时起，日寇在伪满又由侵略步骤渐入防卫阶段，以关东防卫军司令官的组织（在长春设关东防卫军司令部，山下奉文第一任司令官），统辖伪满军，除以一部分伪满军在热河省内外专任打击八路军外，其余的兵额用以扩充高射炮队、自动车队、辎重队和大部分的工兵

部队,并把铁路警护军并入伪满军内,成为伪满军最后时期的情况。

伪满军概分为中央直辖和军管区隶属两部分,初、中时期,主要力量是在各军管区,中央直辖者较少。其后一九三六年设宪兵司令部,一九四〇年设禁卫队司令部,飞行队司令部,一九四三年设高射炮队司令部,以及一九四四年抽调的部队编成铁石、铁心、铁血等直辖部队,中央直辖部队较多了。而各军管区的数目也逐渐增多,于是隶属的部队也逐渐减少。但因乎各军管区需要兵力的情况,所隶属的兵种兵力,也有不同。例如伪第五军管区,是对抗八路军的地区,步、骑兵力就特别较多;伪第一军管区是壮丁最多的区域,又是工、矿区域,因而工兵最多。以上各种情形,在以下列表说明中可以看出。

(一)伪满初期(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成立,在伪中央机构里设总管军事的军政部,马占山任总长,同年七月在长春完全编成(次长王静修,参谋司长郭恩霖,军需司长张益三)。同年九月,张景惠接任总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大臣,一九三五年五月,于芷山接任大臣(由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这是军政中央机构。谨将到一九三六年末的系统、编制、兵力表列于后。

(甲)军政部中央直辖部队:

一、禁卫步兵团。团部在宫内府西院,当时团长任广福,步兵两营,兵员约千人。

二、骑兵第一旅。旅部长春南岭,当时旅长王克镇,骑兵三个团,兵员约二千人。

三、宪兵司令部。司令部在长春,当时司令官应振复,统辖新京宪兵队、第一宪兵队、第二宪兵队、第三宪兵队、第四宪兵队、第

五宪兵队及兴安东、西、南、北宪兵队和其它(人数不详)。

四、靖安军。司令部驻锦州,当时司令藤井重郎,所属步兵两团、骑兵一团、炮兵一团(两营)及通信队,总兵员约六千人。

五、第一独立自动车队。队驻沈阳,当时队长梁濑〇〇(编制、人数不详)。

六、中央直辖各厂:被服本厂(沈阳)、兵器本厂(沈阳)、军需处(长春)、卫生材料厂(沈阳)、通信器材厂(沈阳)。

七、中央直辖各学校:陆军训练处(沈阳)、宪兵训练处(吉林)、军用通信本处(沈阳、信鸽通信在长春)、军医学校(哈尔滨)、兽医学校(长春)、兴安军官学校(王爷庙)。

(乙)各军管区隶属部队:

一、第一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沈阳),当时司令官于琛澄,所属奉天地区司令官廖弼宸(奉天地区),安东地区司令官张益三(安东、通化地区)。

第一教导队:少将队长吕衡,步兵一团,骑兵一团,总兵员约二千五百人。

第一混成旅:旅长先王殿忠后张益三兼。步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总兵员约二千五百人,以下各旅略同。

第二混成旅:旅长高明,兵力同上。

第三混成旅:旅长李寿山,兵力同上。

第四混成旅:旅长阎家梅,兵力同上。

第五混成旅:旅长寥弼宸兼,兵力同上。

第六混成旅:旅长董国华,兵力同上。

骑兵第三旅:旅长赵秋航,骑兵三个团,总共二千人。

第一通信队:兵力百人。

奉天军乐队:五十人。

奉天军政部病院(一等)。

通化军政部病院(二等)。

二、第二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吉林),当时司令官吉兴,所属新京地区司令官邢士廉、吉林地区司令官王遇甲,间岛地区司令官金恩奎。

第二教导队。

该军管区兵力及队号不详,想吉兴可能详细。

吉林军政部病院。

三、第三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齐齐哈尔),当时司令官张文铸、所属黑河地区司令官贾金铭、滨北地区司令官赵振邦(?)。

第三教导队:队长石兰斌,步兵一团、骑兵一团(多机、迫连)、炮兵一队(野、山炮各一连),总兵员约三千人。

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赵振邦,步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总兵员约二千八百人。

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贾金铭,兵力同上。

第十四混成旅:旅长刘维翰,兵力同上。

骑兵第五旅:旅长张泰达,骑兵两个团,总兵员约一千四百人。

第三通信队:一百人。

齐齐哈尔军乐队:五十人。

齐齐哈尔军政部病院(二等)。

四、第四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哈尔滨),当时司令官郭恩霖,所辖滨江地区(滨江省)、三江地区(三江省)。

第四教导队。李文龙当时曾任教导队长又参谋长,对该区兵力、队号能详知。

五、第五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承德)、当时司令官王静修,所辖承德地区司令官王永清(热河省),锦州地区司令官田德胜(锦

州省)。

第五教导队。富璇善曾任参谋处长又教导骑五团长,对该区兵力能详知。

六、兴安东警备司令部:司令部(扎兰屯),当时司令官绰罗巴图尔,区域兴安东省。

骑兵第一团。

骑兵第二团。

博克图军政部病院及通信队。

七、兴安西警备司令部:司令部(林西),当时司令官郭宝山,区域兴安西省。

骑兵第三团。

骑兵第四团。

林西军政部病院。

通信队。

八、兴安南警备司令部:司令部(通辽),当时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区域兴安南省。

骑兵第五团。

骑兵第六团。

通辽军政部病院。

通信队。

蒙古少年队。

九、兴安北警备司令部:司令部(海拉尔),当时司令官乌尔金,区域兴安北省。

骑兵第七团。

骑兵第八团。

海拉尔军政部病院。

通信队。

(丙)江防舰队隶属部队:

一、江防舰队司令部:司令部(哈尔滨),当时司令官尹祚乾,区域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黑龙江。

当时编制:兵力不详,赵竞昌可能知道。

(二)伪满中期(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

一九三七年,伪军政部大臣于芷山,本年秋初改为治安部,于芷山仍任大臣,裁撤满系次长(李盛唐出任陆军训练处长),以日本警官薄田美朝任次长,将民政部的警务司并入治安部,伪满军警统一在一个中央机构里,以示日寇利用伪满军警来强化镇压工作,于是治安部内编制由参谋司、军政司、警务司及大臣官房而组成。关于警察事务不详。关于军的事务,这年一月开设第六军管区司令部于牡丹江市,初任司令官王殿忠(一九三七——一九三八),管区为牡丹江省,兵力由二、四两军管区转调的。又发表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的命令,统辖兴安东、西、南、北四警备司令官及部队。由伪一、二两军管区首先编练第一、第二两高射炮队。同年初夏将伪四军管区司令官郭恩霖调部,于琛澄转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官,更兼任三江省长,这就显示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利用伪满的军警统一,强化在伪满的镇压人民、打击反满抗日力量的毒辣手段。伪一军管区司令官以王静修转任,伪五军管区司令官以邢士廉升任。同年七月,日寇入侵华北,又使用热河支队(由靖安军第五教导队合编而成)及石兰部队(第三教导队)帮助日寇进入华北,更由伪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同张宗援(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率领伪军一部(约七、八百人)潜入山东东部,招结匪人,祸乱中国,这又显示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汉奸、伪军,加强侵略中国的毒辣手段。一九三八年又派甘支队(以甘珠尔扎布为长的蒙古骑兵)进入华

北，和于琛澄为指挥的三江地区大讨伐，一九三九年夏的诺门汗战争，同年秋吉林通化地区的讨伐，以及伪七军管区、伪八军管区、伪九军管区、伪十军管区和禁卫队司令部、飞行队司令部的添设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施行的。并开设了陆军军官学校。谨将到一九四〇年末的系统、编制、兵力表列于后。

（甲）治安部中央直辖部队：一九三九年三月，于琛澄任治安部大臣，五月吴元敏任参谋司长，一九四〇年八月吴元敏任第八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任参谋司长。

一、禁卫队司令部：一九四〇年开设，司令部在长春，初任司令官王克镇。所辖部队：禁卫步兵团及骑兵队、炮兵队，总兵员约一千二百人。

二、宪兵总团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改称，司令部在长春，当时司令官杨镇凯，所辖部队新京宪兵团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各宪兵团。人数和其它不详。

三、飞行队司令部：一九四〇年开设，由野口〇〇创立的，所属部队：第一飞行队、第二飞行队、第三飞行队及材料场，共飞行连五、整备连五，总兵员约一千人（每连飞机共约十五架）。

四、靖安第一师：靖安军改称，当时师长美崎丈平，驻富锦，兵力同前，六千人。

五、兴安第二师：是在一九三九年诺门汗战后改编的，郭文林充任过师长，兵力是步兵一团、骑兵两团、炮兵一团（野、山炮各两连），一九四〇年四月由城户常规接充师长后直隶中央。

六、第一独立自动车队：队长梁濑，部队同前。

七、中央直辖各厂：被服本厂（沈阳）、卫生材料厂（沈阳）、通信材料厂（沈阳）、军需处（长春），兵器本厂（沈阳）。

八、中央直辖各学校：陆军军官学校（长春）、陆军训练学校（沈

阳)、兴安陆军学校，附少年科、教导团(王爷庙)、宪兵训练处(吉林)、军用通信本处(沈阳)、军医学校(哈尔滨)、兽医学校(长春)。

(乙)各军管区隶属部队：各军管区的地区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撤销的。

一、第一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沈阳)、司令官王殿忠(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管区由一九三九年为奉天、锦州、四平三省。隶属部队在一九四〇年：

第一教导队。

第一高射炮队，一九三七年开始成立，初任队长是日系某某，内分高射炮兵两营，照空兵一营。吕梦龄曾充队长，内容能详悉。

步兵第五团。

第一通信队。

奉天治安部病院(一等)。

锦州治安部病院(二等)。

二、第二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吉林)，司令官吉兴，管区为吉林、间岛两省。

该管区部队，吉兴能详知。

三、第三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齐齐哈尔)，司令官王之佑，管区为龙江、黑河、北安三省。当时隶属部队：

第三教导队：队长于治功，步兵一团、骑兵一团、炮兵一队(野炮一连、山炮一连、野山炮各四门)，总兵员三千人。

第一独立旅：旅长关成山，步兵一团，骑兵一团、总兵员二千六百人。

步兵第四旅：旅长王作震，步兵十七团，步兵二十四团、总兵员三千六百人。

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胡文藻，步兵十九团、骑兵二十一团，总兵

员二千六百人。

第三通信队：兵员一百人。

齐齐哈尔军乐队：兵员五十人。

齐齐哈尔治安部病院(二等)。

海伦治安部病院(三等)。

四、第四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哈尔滨)，当时司令官邢士廉，管区为滨江省。

吕梦龄当时任司令部高级副官，对该管区兵力可能详悉。

五、第五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承德)，当时司令官应振复，管区为热河省。

富璇善一九三九年才离开承德，可能知道该管区兵力大部。

六、第六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牡丹江市)，当时司令官张益三，管区为牡丹江、东安两省。

赵秋航当时任第六教导队长，对该管区兵力可能详知。

七、第七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佳木斯)，当时司令官张文铸，管区为三江省。一九三九年五月新设，由四军管区分出大部兵力及三江省区而成的。

周大鲁一九四〇年才离开佳木斯，可能知道该管区兵力的大部。

八、第八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通化)，当时司令官吴元敏，管区为安东、通化两省。一九三九年五月新设，由一军管区分出大部兵力，初任司令官王之佑。

第八教导队：队长周大鲁，步兵一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连。总兵员二千七百人。

步兵第一旅：旅长李裕平。

步兵第二旅：旅长高明。

该两步兵旅是于一九四〇年初夏由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混成旅改编而成的。每旅两个步兵团,每团约一千八百人。两旅总兵员约七千三百人。

第八通信队:一百人。

通化治安部病院(二等)。

九、第九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通辽),当时司令官郭文林,管区兴安南、西两省。一九四〇年四月新设的。

骑兵第三、四团。

通辽治安部病院(二等)。

通信队。

通辽军乐队。

十、第十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海拉尔),当时司令官乌尔金,管区兴安北、东两省。一九四〇年四月新设的。

骑兵第一团。

骑兵第七团。

骑兵第八团。

通信队。

海拉尔治安部病院(一等)。

(丙)江防舰队隶属部队:

江防舰队改为江上军的经过,赵竞昌能知道,我不明了。

(三)伪满末期(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一年是伪满国兵入队的头一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太平洋战争作垂死挣扎的穷凶极恶罪行的开端。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首先开设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山下奉文任关东防卫军司令官,指使在伪满各地方的日寇防卫军来区处伪满军,作他们侵略罪行的助手。伪治安部大臣于琛澄,依照最高顾问竹下

义晴的指示，一方面宣传神道教育，以麻痹伪满军中的思想，又一方面，把江防海军改为江上陆军，以便统一指挥，缩减步、骑兵，加强飞行队、高射炮队、自动车队，最后普遍的改编工兵队和辎重队。一九四一年冬，在东安省密山县增设了第十一军管区。一九四二年在沈阳开设了自动车学校和飞行队学校。一九四二年九月邢士廉接充伪治安部大臣后，次年又在沈阳新设高射炮队司令部，在通辽添设了独立飞行连，并把伪八军管区移驻北安，用以强固日寇在孙吴阵地的后方。同时派遣伪一、二、三、四、六军管区的步兵，增援伪五军管区，用以打击抗日的八路军。更于一九四四年合并了铁路警护军，编成“铁石”、“铁心”、“铁血”部队，派赴蓟东。这些罪行都是在这个时期里施行的。谨将在伪满最后的情况列表于后：

(甲)军事部中央直辖部队。一九四二年九月上旬，伪一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接任治安部大臣，一九四三年夏改军事部，将警务司分出。

一、禁卫队司令部：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司令官张名久，驻所与兵力同前。

二、宪兵总团司令部：当时司令官刘尚华，统辖新京宪兵团及由第一到第十一各宪兵团，其它不详。

三、飞行队司令部：当时司令官加藤〇〇，统辖第一(长春)、第二(沈阳)、第三(哈尔滨)三个飞行队及通辽独立飞行连。共飞行六个连，地上准备六个连。

四、高射炮队司令部：当时司令官刘牧禅，统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共五个高射炮队。

五、第一师：师长秋山〇〇，除新兵一团留在锦州，其余均在勃利县。

六、第二师：师长日人某，其部队有编入“铁心”部队的，内容不

详悉。

七、"铁石"部队为骑兵，由岩田薰率领。"铁心"、"铁血"编制不详，只知粟野重义任铁心部队长，并有第一自动车队配属在内。

八、中央直辖各厂：被服本厂、兵器本厂、卫生材料厂、兽医材料厂（于四二年成立），均在沈阳。新京军需处。

九、中央直辖各学校：高等军事学校（长春，于一九四三年成立）；陆军军官学校（长春）；兴安陆军学校（王爷庙），附少年科、教导团；陆军训练学校（沈阳），附军士教导队；自动车学校（沈阳）；飞行队学校（沈阳）；军医学校（哈尔滨）；兽医学校（长春）；宪兵训练处（吉林）；独立通信队（吉林，这是通信本处转变的）。

（乙）各军管区隶属部队：在本期里，于一九四一年冬增设第十一军管区，共为十一个军管区，内中除第五军管区外，其它各军管区作战兵力逐渐减少，到一九四四年全国大改编后，每管区只剩步兵一旅、重点器被收回一部交与关东军了。而第一军管区的步兵两团，第二军管区的步兵一个团，第三军管区的步兵第四旅，第四、第六军管区的步兵各一团，均先后奉部令增援第五军管区，开往热河了。

一、第一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沈阳），司令官邢士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九月）、王之佑（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管区一九四三年十月之前为锦州、奉天、四平三个省，一九四三年十月第八军管区转驻北安，将通化、安东两省并入一军管区，将四平省并入第二军管区，同时第八混成旅及第四工兵队，隶属一军〈管区〉，在昌图的工兵第二队，编入第二军管区。

步兵第一旅：旅长金毅，步三团、步五团，总兵员四千四百人，均在热河省。

迫击炮团：驻锦州，两个营、六个连，总兵员六百人。

第一自动车队：这是第一独立自动车队改称，于一九四五年编入第一军管区隶属。

第一辎重队：一九四五年新成立，人员约四百人。

工兵队七队：由一九四二年开始编成第一、第三、第四、……到一九四五年编成第十三工兵队，每队兵员七百人，总兵员四千九百人。

第一通信连。

第一军乐连。

奉天军事部病院（一等）。

锦州军事部病部（二等）。

二、第二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吉林），最后司令官关成山，管区吉林、四平两省。

步兵第二旅：旅长张印符，步兵两团，兵员与第一旅等，内一团在热河省。

萧玉琛是该管区参谋长，能详知兵力情况。

三，第三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齐齐哈尔），最后司令官赵秋航，管区龙江省。

步兵第四旅：旅长张金祥，步兵两团，兵员与第一旅等，全旅在热河省。

赵秋航能详悉兵力情况。

四、第四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哈尔滨），最后司令官李文龙，管区滨江省。

步兵第十七旅：旅长刘显良，步兵两团，兵员与第一旅等，内一团在热河省。

李文龙能详悉兵力情况。

五、第五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承德），最后司令官赫慕侠，

管区热河省。

该管区隶属部队是最多的，详细情形不明，佟衡可能知道。

六、第六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牡丹江市)，最后司令官贾华杰，管区东满总省的一部及间岛省。

“说明”：兴安第二师是一九三九年诺门汗战后编成的，巴特玛拉布坦任司令官，郭文林任师长时是归兴安军管区的，郭文林任司令官，城户常规任师长时，就归治安部直辖了，所以由一九四〇年我就把第二师列入中央直辖部队里。但据正珠尔扎布说，一九四四年冬，又归第九军管区隶属了。稍有出入故此说明。〔中略〕

十、第十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海拉尔)，最后司令官郭文林，管区兴安北、东两省。

骑兵第四七、四八两团，均为骑兵三连、重机一连的编制，总兵员约一千二百人。

第十炮兵营：野、山炮各一连，每连炮四门，总兵员二百人。

第十辎重队：车队两连，总兵员二百人。

第十通信队：自动车班。

海拉尔军事部病院(一等)。

十一、第十一军管区隶属部队：司令部(密山)，最后司令官郭若霖，管区东满总省一部(原东安省)。该管区一九四一年冬初设，于治功任初任司令官，管区及部队均由六军管区分出的。

步兵第〇旅：旅长杨秉武。

刘显良曾充该管区参谋长，可能详知。

(丙)江上军隶属部队：

江上军司令部：司令部(哈尔滨)，最后司令官曹秉森，管区松花江下游及乌苏里江黑龙江。

江上军舰队：司令赵竞昌，战队五个(船六十吨至三百吨)，每

队船两只,共十只,兵员共约四百人。艇队八个(六十吨以下至十吨),每队船两只,共十六只,兵员共约二百人。

陆上部队: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共十五个连,总兵员约二千人。

江上军训练处:处长吴国贵,教导团一,四连编成,总兵员五百人。附有收容二十人病院一。

(丁)铁路警护军隶属部队:这是南满铁道警察,由于伪满铁道均委托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因而普及到全铁道交通线上的组织。在未并入军事部之先,称铁路警护队,是属于铁路总局的。一九四四年虽然改称铁路警护军直辖于军事部,更在军事部里设警护司,专管其事,但指挥上则是以最高顾问为责任者。其经费仍由铁路总局担任。我所知者,铁路警护军司令部在沈阳,此外凡有铁路局的地点,都有一个旅部,大车站有团部,再下则为分团。列表如后。

一、铁路警护军司令部:(沈阳)一九四四年三月并入伪军事部时,司令官濑谷启。一九四五年由太田〇〇接替。参谋长原弘志。

铁路警护旅六个:锦州、奉天、吉林、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

铁路警护军学校:沈阳,校长有马虎雄。

关于伪满军在以上的三个时期中实际情况,仅就所知,列举如上。

总结如上所述情况,我自己感到所知的太少,更不够详细。但对自己所犯的罪恶则觉得是太多而深刻的。如在伪满初期,人们均反满抗日,军心向背不定的时候,我就替日寇宣传日满共存共荣和一德一心,引诱伪满军人来降敌从伪,以消灭反满抗日的力量。更为防止军中的反满抗日思想,曾作调查工作,与教育调查工作,

更亲自去为靖安军及赫奎武团安定军心，以帮助日寇向华北的侵略。我在伪参谋司长任内时，对一九三六年的东边道大讨伐、一九三七年的向华北出兵、一九三八年的三江地区讨伐等等重大罪行，还是立在参与辅助地位的帮凶。到一九三九年我就亲自指挥伪军，同杨靖宇将军为敌，以致他的惨死。一九四〇年日寇要裁减伪满骑兵，我就把三个骑兵团改成一个步兵团，三个混成旅改为两个步兵旅。一九四一年日寇要组织防空和运输部队，我就把伪三军的四个旅裁去两个，编练第三自动车队和第三高射炮队。一九四二年之后，日寇需要土工作业的工兵和运输用的辎重队，我就逐年扩充工兵队，到最后时期共编成七个工兵队，一个辎重队，并使用这些工兵队为日寇恢复鞍山被炸后的作业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沈阳附近的防御作业。只就以上的编练伪军，使用伪军的罪行看来，我是事事皆遵照着日寇的企图而行，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实行者，更实行了五年的征兵，普遍的给人民造成灾难。所以当把这个材料叙述完了之后，我就更觉得自己的罪行并不下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谨向人民大众面前，痛自改悔认罪。

119—2—1161，3，25

王之佑笔供

(1954年5月17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当时东北军兵力及行动概况：

一、东北军系统和任务：

东北军当时隶属于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其下有吉林副司令张作相和黑龙江副司令万福麟。统率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里的国防军，这部军队的编制较大，武装较良，平日是不担任地方治安任务的。"九·一八"当时，大部分是由张学良、万福麟率领入关了，残留的部队，如后所列。

此外有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省防军(部分兼东铁护路)，分属在各地区镇守使的隶下，分任省防。西北的蒙旗里，有少数的王(公)府卫队，也担任本旗内的剿匪任务。在王爷庙有屯垦督办邹作华隶下的屯垦军，其编制是同国防军，直接隶属于边防总司令张学良，其性质是国防、省防兼有之。

二、"九·一八"当时东北军现有的兵力分布及其行动概况：

辽宁省内：(当时部队队号忘记，故以部队长姓名标题。)

(甲)国防军及学校：

(1)张廷枢旅：步兵三个团，驻锦州地区，与日寇接战后退热河。

(2)张德荃旅：步兵三个团，驻打虎山地区，与日寇接战后退热河，一九三三年在热河陷落后去北京。

(3)骑兵三旅:这个旅的编制不明,驻通辽县,其后的行动也不明。

(4)王以哲旅:步兵三团,驻沈阳北大营,“九·一八”被日寇袭击,其后由热河退北京。

(5)周濂主办的讲武堂、汲给纲主办的学生队,共约两千人,溃散一部,其余去北京。

(乙)省防军:

(1)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他是张作霖匪系,部下四个团、一个卫队营,降日寇后任伪奉天省警备军司令官,成为伪满第一军管区伪军的兵力主要成分。

姜全我团,驻凤城、通化,“九·一八”凤城县被占领姜逃走,中校团附唐聚五,率两营在通化反于抗日,失败后去北京。

廖弼宸团,驻桓仁、临江、长白,投降后编旅长。

田德胜团,驻朝阳镇、柳河,投降后编旅长。

曹秉森骑兵团,驻西丰、东丰、西安、投降后充参谋长。

王学阳卫队营,驻山城镇,其后成为第一教导队。

(2)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他是东北有名的大胡子头,充当过二十八师旅长,倒过张作霖的戈。一九一七年帮助张勋复辟失败后,回东北,由吴俊升担保,又充任洮辽镇守使。“九· 一八”直后,日寇用他去抢黑龙江地盘,未成。一九三三年又利用他去占领热河省,任伪热河省警备军司令官,成为伪满第五军管区兵力的主要成分。当时他的隶下四个骑兵团,如后:

徐景隆团:在嫩江江桥战役炸死后由王之安接充,其后在伪满改编成旅。

鹏　飞团。

刘茂义团。

傅铭勋团：以上四团改编成一、二、三、四支队，再加：

张俊哲支队：张海鹏长子（第五支队）。

程某支队：此人我不知其来历（第六支队）。

彭金山支队：此人是吴俊升旧部（第七支队）。

王永清支队：他是四平以北出名的“天下好”匪首。共扩充为八个支队。

以上所举，是在辽宁省内当时旧东北军的实况。在“九·一八”直后，还有日寇主使招募的匪军，附列于下：

靖安军：是日寇藤井重郎、美崎丈平等在沈阳招募的匪团，当时人数不详，到一九三七年，是步兵两团、骑兵一团、炮兵一团。

王殿忠：李寿山、张宗援（伊达顺之助），他们都是张宗昌的余孽，“九·一八”当时，就招结土匪帮助日寇，伪满成立后，编成奉天省警备军的第一、第三两旅，同于芷山部合而为一了。

（丙）屯垦军：

（1）苑崇谷旅：是步、骑、炮混成部队，兵力约等于旅，日寇借以为名实行侵略的“中村大尉事件”就出于该旅，参加江桥抗战后，剩存的部队归入伪三军管区。

吉林省内：

（甲）国防军：

（1）张作舟旅：步兵三个团，任团驻长春，受日寇袭击后归入丁超部下，刘、夏两团，驻吉林，由熙洽改编为吉林第一旅（旅长刘宝麟）。

（2）苏德臣旅：步兵三个团，驻双城、老少沟、蛟河。蛟河的团一部随冯占海抗日，一部被熙洽收编，其余两团，在新任旅长赵毅率领下参加抗日，其后在一面坡失败后，赵毅出走赴北京，由陈德

才率领投降改第七旅。

(3)邢占清旅:步兵三个团,驻哈尔滨、一面坡、石头河子,全部参加抗日,最后退入苏联,转入新疆。

(4)穆纯昌炮兵团:驻长春,受日寇袭击后,大部分散了。

(5)冯占海卫队团:驻吉林,熙洽欢迎日寇入吉林时,退出省城,其后扩充成旅。在珠河抗日失败后,退入农安转去热河,归入张学良统率。

(6)常尧臣骑兵旅:三个团,驻农安各县,这是原东北骑兵十六师缩编而成的,原师长于琛澄因而辞职,该旅在先是抗日,由哈尔滨陷落后,降敌从伪。

(乙)省防军:

(1)吉长镇守使李桂林:三个团,驻长春、伊通、桦甸。长春部队在宽城子受到袭击,死营长以下数十人,盘石的宋营长抗日,其余由熙洽编为吉林第三旅,旅长马锡麟。

(2)延吉镇守使吉兴:三个团,驻珲春、延吉、敦化。除王营长德林所部抗日外,其余均降敌,吉兴继任吉林省警备军司令官,后改为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官。

(3)滨江镇守使丁超:兼东铁护路军总司令,指挥哈满、哈长、哈绥三条铁路线上的部队护路和滨江地区的治安。他的部队有三个团,均驻在铁路线上哈尔滨、阿城、横道河子。抗日后,团长白文清倒了他的戈,所以后来把张作舟旅的一团补充给他了。一九三三年春被俘投降敌伪。

(4)依兰镇守使李杜:三个团,驻依兰、富锦、虎林。全部抗日(哈尔滨作战时参加的是陈、马两团)。一九三三年春,抗日失败后,全部由虎林入苏联,再转去新疆。同时同行的,还有总指挥杨公衡率领的一部。

(5)绥宁镇守使赵芷香：三个团，驻宁安、东京城、牡丹江、绥芬河。他本人自退，团、营、连长，大部抗日，与李杜合作，最后大部也退入苏联，同去新疆；小部由熙洽收编，成为伪第六军管区兵力的一部。

(6)吉林山林警备队：统带宋○○，三个营，驻延寿、苇河、方正，是山林警察编成的，归吉林省保卫团管理处总办王之佑指挥。初而抗日，一九三二年五六月后，由于琛澄收编了，成一个旅，驻依兰。

以上列举的是在吉林省当时的旧东北军实况。“九·一八”直后，还有熙洽新成立的部队，和于琛澄招集的匪军，附列于下：

(1)由熙洽新编成的吉林伪军：

吉林第一旅：旅长刘宝麟，是张作舟的团长，他参加了攻哈尔滨，被赵毅打退了。

吉林第二旅：旅长李文炳，是熙洽好友，临时编成的，他参加攻哈尔滨，被马团打退了。

吉林第三旅：旅长马锡麟，是李桂林的团长，他也参加了攻哈尔滨，有一个团投降了冯占海。

吉长铁路守备队：司令金璧东，是一九一六年参加郭家店战役的宗社党，其部下的两个团长之一，就是李文龙。

伪执政府翊卫军：是由熙洽派遣的玉岐率领的一营，其后设个团部，团长宪原。

(2)由于琛澄召集的匪军：于琛澄因张作相改编了他的十六师长职，仇恨张作相，就与熙洽合作，召集数千土匪成为一部匪军，由熙洽委他为吉林讨匪总司令，率五个旅向哈尔滨进攻，在哈尔滨近郊失败后，又勾来了日寇。当攻击哈尔滨时，他有两个旅：

李慰久旅：

杨秉藻旅：其后成一个崔文林旅，这就是伪四、七军管区伪军的主要成分。

黑龙江省内：

（甲）国防军：

（1）程志远骑兵旅：三个团（团长：涂全胜、周作霖、朱凤阳），驻满洲里，江桥抗战时调回来的。马占山由齐齐哈尔走后，程志远接警备司令官，部下团长皆扩充成旅，是其后伪三军管区兵力主要成分。

（2）徐宝珍团：是万福麟的卫队团，参加过江桥抗战，投降后改编了。

（3）田奎生骑兵团：原驻拜泉县，参加江桥抗战、海绥抗战，马占山失败后，由石兰斌率领投降。

（乙）省防军：

（1）吴松林骑一旅：三个团，驻呼兰地区，全部参加江桥抗战，一九三二年三月随马占山降伪满，王克镇的骑兵一旅就由这旅改编的。

（2）苏炳文混一旅：步骑各一团，驻海拉尔，兼东铁护路，未降敌，抗日失败后，退入苏联，转赴新疆。

（3）张殿九混二旅：步骑各一团，驻扎兰屯，兼东铁护路。同苏炳文抗日，失败后大部退入苏联，转赴新疆，营以下有降入伪军的。

（4）马占山混三旅：步骑各一团，因马是黑河镇守使，部队就驻黑河，发表马占山任黑龙江主席后，全部来齐齐哈尔，参加江桥抗战，马占山二次抗战失败后，部队零散，由张文铸收编降伪。

“补”黑龙江国防军里，有野战炮兵一团（炮九团：团长朴大同，其编制与吉林的炮十团同，三营制），原驻泰安镇，这两团的野战炮

(四个营)均为日寇掳去,只山炮留给伪满军了。

又吉林、黑龙江国防军里,均有工兵、辎重各一营,降伪后编入那里不详。

热河省内:

热河省省主席汤玉麟,是张作霖为胡匪时代的同伙,曾充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一九一七年叛张作霖去北京参加张勋复辟,一九二五年回东北任东边镇守使,其后任热河都统(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他的部下大约有两万人(如何编制不详细),内中有林西镇守使崔兴武一个骑兵旅,投降了;李守信就是他的团长,这部伪军成为伪兴安西警备军的基础。其它热河省防军在一九三二年,在日伪进占热河省后,退到北京,归入张学良统率部下了。

总结以上,当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当时,旧东北军还残留在东北四省里,约有十五万人,只因抗战与不抵抗的思想不一致,你战我看着,你战我旁观的行动不一致,和放弃人民、保持实力的军阀余毒作祟,就被日寇各个击破,把东北四省人民和国土断送与日寇汉奸之手,当时负守土卫民责任者,应领罪咎。

“附注”:关于兴安的蒙古骑兵实况,我不明了,郭文林、甘珠尔札布想能提供一些。

119—1,486

王之佑补充笔供

（1954年7月11日）

我在“九·一八”以后降敌从伪的罪行始末：

当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十日，我国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父亲死去，前往锦县吊丧。又因我父正在病中，就向张作相请假回兴城县看望父病（胃癌，已不能食粥，只能饮牛乳和水）。九月十四、五日，携带我父诊断书及透视像片去北京协和医院，请求入院。十七日回兴城劝我父去北京动手术。正当此间，于九月十九日早，由兴城驻在陆军白团长（他是白永贞之子，张廷枢旅长的部属）向我报告，昨晚（九·一八）日寇袭占了沈阳。我就辞别父、兄，早车去锦州。当天在张作相家中举行一个会议（参加者张作相、其弟张作涛、旅长张作舟、张廷枢及吉林军署副官长宋寿山、吉林陆军训练监李振声、秘书长王宝善、团长陈德才等十余人），决定留张作涛在家葬父，张作相同我们即日由打通路线回吉林。下午约十八时许，张作相召我去他家（小凌河西小岭子村），向我说他不走了，令我带同张作舟、陈德才等共约四十人，即刻发车回吉林，并传达蒋介石、张学良的命令“不抵抗，保境安民”。我们就由锦州专车去打虎山，九月二十日到通辽，由王县长和骑兵三旅张旅长告知我们，郑家屯有日寇守备队占领。我们就改扮商民形状，买票去郑家屯，当晚改乘四洮路车去昂昂溪。我在车中见到唐某人，他说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已响应了日寇。我们怕到洮南被张海鹏扣留，改在茂林站下

车，由当地公安分局援助，雇用大车赴吉林省长岭县，于二十二日到农安县，得知长春已被日寇占领，驻守二道沟的傅营长以下官兵数十人阵亡。我们二十三日到张家湾公安分局，向德惠县李县长、永吉县王县长用电话联络，得知熙洽已于二十二日派安瑞〔玉?〕珍、张燕卿充代表，由长春把日寇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及军队（原驻辽阳）迎接入吉林。我们除各回原职责地所者外，均去哈尔滨。接续用无线电（哈尔滨、葫芦岛间）与张作相取连络，并向东北各县及驻军取连络。到十月初旬间，我们已经连络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旅长邢占清、团长赵毅、冯占海（他是张作相卫队团长，因反对熙洽降日，由吉林撤出的）和县长薛翅如（即珠河县长）、孙家乾等抗日。而熙洽则正酝酿脱离中央成立反动政府，并曾派李铭书、齐知政到哈尔滨劝说我回吉林，被我拒绝了。待到熙洽宣布成立吉林长官公署，自任长官，脱离中国的消息传到哈尔滨后，我同丁超的参谋长杨公衡由昂昂溪去锦州，与张作相等会议，决定组织吉林省政府和吉林军队的指挥措施。当时参加的人张作相、诚允（吉林省政府委员，先曾代理吉林省长）、李振声、王之佑、杨公衡、王宝善、徐〇〇（长岭县长）、张作涛等人。决定在哈尔滨成立吉林省政府，以诚允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王宝善任省委员兼建设厅长，徐〇〇任省委员兼财政厅长，孙家乾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王之佑仍任省委员兼全省警务处长、保卫团总办、清乡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务，李振声代行东北边防吉林副司令职务，丁超任东铁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即日电报北京张学良，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我在散会后，去见辽宁省政府主席米春霖（他们已在锦州组成省政府委员会，邢士廉就是委员之一），询问组织情形，当晚回兴城见到父兄，次日改装由长春回哈尔滨。诚允、李振声等到后，我们去见张景惠，说明张作相的命令。他以

哈尔滨市民安全为托词，拒绝我们在哈尔滨组织政府。我们于十月下旬得到张作相(此时他也去北京)电许，遂赴宾县组成吉林省政府。李振声在哈尔滨同丁超指挥在吉林省北部的军队，联合反熙抗日。

由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间，是马占山领导黑龙江省军队抗战期间，丁超曾以一个团兵力，援助过江桥抗战。吉林熙洽方面，于此时成立了以刘宝麟、李文炳、马锡麟为旅长的三个旅，又有由于琛澄召集匪人编成的李慰久旅和杨秉藻旅(即杨伏波)，准备与我们为敌。当一九三二年一月(阴历腊月中旬)，我接到张作相电报："因李振声血压高入院，令我到哈尔滨代理李振声。"遂由宾县回哈尔滨，曾与丁超及李杜代表马团长等会商一次饷、械的筹措事情。到腊月二十日前后，于琛澄以吉林讨匪总司令名义，给丁超快邮代电一件，内容限他三日把军队撤出哈尔滨，以备他(指于说)来接收。丁超决心拒绝，向我要求连络李杜到哈尔滨抗战。我派徐化民接李杜到宾县蜚克图，同冯占海等会议，决定进入哈尔滨，与丁超联合抗战。冯占海部队由上号方面，李杜部队由三棵树太平桥方面，立即进入哈尔滨。当日上午在张景惠家里开保境安民、抗拒日伪(指熙洽的政权)的会议。出席者张景惠、丁超、李杜、王之佑、宋文郁(前道尹)、钟毓(吉林交涉员)，以及地方绅士、张、丁的部下，共约二十余人。决定以张景惠为首联合抗日。午间得到情报，于琛澄率兵三四个旅，由阿城县境向哈尔滨前进。当时由参加会议的人公推以王之佑任前敌总指挥，指挥在哈尔滨的丁超(步兵约一团、骑兵一营、炮兵一连)，李杜(步兵四营)，邢占清(宋文俊团)、冯占海(此时约一个旅，四千人)的部队，拒止匪军。战斗一昼夜，将于琛澄匪军全部(四个旅)击退。隔一日，又由原驻双城的赵毅旅的一个团(赵原是团长，此时任旅长，中校吴〇〇任

团长)击退了增援于琛澄的刘宝麟旅。再一日,由松花江桥的守护团长陈德才报告,日寇的兵车由长春出发,部队长为长谷部(省吾?)旅团长。丁超(此时称东铁护路军总司令)、李杜(此时称吉林自卫军总司令)令我指挥赵毅旅(吴、陈两团),及马团(李杜的步兵两营)、王团(丁超的步兵两营),由哈尔滨向双城出发拒敌。陈德才团未抵抗,致日寇安然渡过松花江桥。阴历腊月二十五日晨,日寇兵车进入双城车站,赵毅指挥吴团伏击,激战一日,吴团长以下阵亡百余人(由双城商会殓葬的)。二十六日晨,赵毅向哈尔滨撤退。我在五家子与日寇遇战,二十七日我率马、王两团撤退到顾乡屯,我们在哈尔滨市郊布防,我率邢占清旅的应占斌团、李杜的陈东山团和张作舟的残余部队张广玺团(这是预备队)防守右翼(铁路至江边)。李杜率他的马泽洲团、冯占海旅,以赵毅部下为预备队防守左翼(上号左右)。丁超率他的两团(约四个营)及邢占清旅的主力防守中央(以米立斯营房为中心点)。二十八日,日寇以步炮联合兵力向顾乡屯进攻,至夜七八时撤退。二十九日,以步骑兵联合向上号攻击,以机甲与步炮兵联合向米立斯营攻击,遂到中午由中央突破。我在下午三时由顾乡屯撤去,五时许渡江,夜九时到马家船口,与丁、李相会。此次我又死亡了杨营长以下十名,伤约三十人(这是一九三一年腊月二十九的阴历岁末日)。这天夜里我们同马占山在呼兰会见,决定将第一线的任务交与他,我们在呼兰、巴彦整理部队,人马给养由他担任。次早(即阴历正月初一日),我就奉丁、李命令去巴彦收容部队,并收容宾县吉林省政府人员的撤退,四五天完毕后回呼兰县。得知马占山应张景惠的邀请,去哈尔滨与日寇讲和。又方正县来人,请去方正收容溃兵,我又被派往方正。由巴彦、木兰、通河到方正县后,就开始使用地方警察、保卫团及山林警察队(统带宋〇〇驻延寿县,三个营分驻延寿、方

正、苇河县境内，原属吉林保卫团统办直辖的）收容溃兵，计收容了冯占海旅、赵毅旅及张作舟的一部。约在二十天后，丁、李到达方正，令我率赵毅旅、邢占清旅进占珠河县及一面坡（刘宝麟旅在一面坡退出去了）。

三月中旬，熙洽派孙其昌（原吉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代表来珠河县讲和，他的说词是："熙洽等不得已而迫降，为的是人民免受兵劫。国联已派李顿为首的调查团，不久到东北调查后，一定能有法制止日本的军事侵略，那时我们听国家的处理。现在先避免吉林内部的斗争，其方法是丁、李、王退出领导抗日，把军队在北东各县驻防，一切饷械衣粮由长春总厂发给。请我们派出代表人，准备到哈尔滨与吉林军方代表会商饷械衣粮数目和防地区域。"同时并说，我们占领铁路交通线，是足以招致日寇的来夺，不如将珠河、一面坡仍交与刘宝麟旅或杨秉藻旅驻防。我们答应了，当时举出了丁超作我们的去哈代表，并约定张恕（当时东铁监事长，丁超的先期同学又是亲家）到珠河来接。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我是这样记忆的，或者稍差）夜，刘宝麟、杨秉藻由电话通知我，说"李桂林（原吉长镇守使，此时任东铁路警处长）乘专车来接代表"。我就由电话通知李杜与丁超，自己由延寿县到亮珠河公安分局与李桂林见面。丁超到后，他决定不去哈尔滨。我说"总得去个人！"他说"你去吧！"于是由电话向李杜、冯占海商量改派代表。李同意了。冯曾向我说："不要心眼太实，要加小心。"我于是担任了这个代表，将指挥部队任务交与赵毅，我就同李桂林去珠河（因自己没带人，临时把赵毅的参谋长张皋如带去了）。发车后，在中途阿城、双城县界间，看到日本兵车一列向东驶去，我就觉得不对。到哈尔滨停车见到张恕同一日人，张恕介绍"这是土肥原大佐"，于是把我引到哈尔滨日寇特务机关，土

肥原贤二向我说"阁下主持和平这是最好的。"又引我去见师团长(这个师团长大约是多门二郎，我错记为广濑寿助)，他也是说些和平好的话。我到此时，是感觉到李桂林、张恕把我出卖了，我自己的思想就走向错误的途径，铸成了祸国殃民、人民罪人的大错。于是答了言，我说："和平得没有战争，我见你们的兵车已经向珠河开去，一到车站下车，我方即可望见，前进不到二十里就可冲突，还有什么和平可能呢?"他就向〔问〕我要求避免冲突的办法。我遂就他们进占珠河、延寿、方正之线的目的，当时起草了一个给丁、李二人的电报："我现在是以调停人的资格说话，为避免立即冲突，只有向珠、延、方这条线以东撤退二十里。"又写给邢、赵二旅长的信，内中说："要避免立时冲突，就得向元宝顶子、中和镇(这两地就是珠河、方正以东二十余里)撤退。此意已用电报报告了丁、李二司令，请你们向丁、李二公请命，我不必管了，总指挥部的人，请他们自己决定行止。"这两个文件是我降敌从伪的主要罪状，我以后一切罪行都是由此演变的。今日说起，只有痛自悔恨，向全国人民认罪，请人民政府法办，作为叛国者的警诫。由日寇师团都发了这个电报，由张皋如带走了我的信件，土肥原贤二把我交与张恕，在他家居住，当晚才见着熙洽所派的代表郭恩霖(他是我后期同学，也是我在吉林的好友，他也是这个工作的主要人)，我到此时并未责他卖友，反而向他请求对于任广福(他原是李振声的参谋长，在我代理李振声职务时，就约他共同抗日的)、李博生(他是警务处督察长，在宾县省政府退走后，来延寿充副官长的)等人予以保护及收容。数日后，张恕告知我父已死，我遂在张恕家中居丧，引起我后来为伪满服务罪状。以上是我由抗日而降日的经过始末。

119—2—1161，1，5

王之佑笔供

（1954年8月8日）

王之佑，又名立三。年六十三岁。汉族，辽西省兴城县人。家庭成分地主。〔中略〕

一　个人经历：

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八日，生于兴城县清水岘屯。

一八九九年，入私塾。

一九〇三年，入高等小学。

一九〇八年，入直隶省陆军小学堂。

一九一一年，入陆军中学堂。

一九一二年，入陆军预备学校。

一九一四年，入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一六年卒业，补官陆军步兵少尉。

一九一七年二月，任直隶陆军混成第一旅第一团排长，七月升任连长（驻涿州）。

一九一八年一月，转旅司令部上尉参谋官，二月兼右翼总指挥部少校参谋官（汉口）。

一九一八年五月，任直隶陆军混成第一旅第二团教练官（湖南）。

一九二〇年九月，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参谋长（保定）。

一九二三年三月，兼炮兵二十三团长（廊坊）。

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北京将军府少将参军（北京）。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充镇威上将军公署军事顾问（沈阳）。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军务处长（沈阳）。

一九二六年九月，任步兵第一旅旅长（沈阳）。

一九二八年二月，任第六方面军团司令部参谋长，兼后方留守司令部参谋长（沈阳）。

一九二八年九月，任吉林全省警务处长兼保卫团管理处总办（吉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任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吉林全省警务处长、高等警官学校校长、吉林保卫团管理处总办、吉林省清乡局第二副局长代行局长职务（吉林）。

一九三一年十月，任吉林省政府（在宾县的临时政府）委员、兼吉林全省警务处长等职（宾县）。

一九三二年二月充东铁护路军、吉林自卫军联合军前敌总指挥（哈尔滨及延寿县）。

一九三二年五月，降敌，七至八月代理驻哈吉林军事特务部长（哈尔滨）。

一九三二年十月，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长（长春）。

一九三五年六月，任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长（长春）。

一九三六年七月，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司长兼通信本处长（长春）。

一九三七年七月，任伪满治安部参谋司司长（长春）。

一九三九年五月任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官（通化）。

一九四〇年八月，任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齐齐哈尔）。

一九四二年八月，任伪满陆军训练学校校长（沈阳）。

一九四二年九月，任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沈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在沈阳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任内，被苏军俘虏。

二　我在伪满的罪恶：

（一）我降敌从伪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夜，我在延寿县被丁超、李杜等推举充赴哈尔滨会议代表后，我就带着赵旅长的参谋张皋如专车赴哈尔滨，途中看到有日本兵车向东驶去，有向我们部队进攻态势，我思想上就存畏心。到哈尔滨下车就由日寇土肥原贤二（当时他是特务机关长）把我接去，送到第二师团司令部。经由师团长多门二郎要求我放弃抗日的威胁，我怕死了，就向他作了投降的表示——当场写出给丁超、李杜的电文，说："为谋和平之实现，须将珠河、延寿、方正之线让与日本军，把抗日军向东撤退二十里。"又当场写出给我所指挥的赵毅、邢占清二旅长的信，说："目前为避免冲突，要向珠河、延寿之线以东退出二十里。我的情况由张皋如面告，总指挥部的人请其自便。"当天我又见到熙洽代表郭恩霖（他就是预定在哈尔滨与我会议的代表），并未责备他失信负约，反而请求他收容随我的人。我这些行为就是背叛了祖国人民，放弃了自己职守，降敌从伪的罪行开始。其后我知道了我父病死消息后，又曾请求郭恩霖带我去见吉林军事顾问大迫通贞，要求许我回家葬父，经大迫向我说"你就住在哈尔滨，那儿也别去好。"我就长住在东铁监事长张恕的家里了。

（二）我代理驻哈吉林军事特务部长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吉林军令厅长兼驻哈吉林军事特务部长郭恩霖，发表改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长，去长春，就嘱咐我为他代理驻哈吉林军事特务部长职务，我担任了。这又是我为伪满服务的开始。在这里的罪行分三项：（一）收集情报、供给情报。派遣

约三十名的吉林军官，在小野、芳贺、北部三个军事顾问的领导下，分布在刘宝麟旅（当时驻榆树县与日寇联合讨伐）、陈德才旅（当时驻双城县与日寇联合讨伐）、白文清旅（当时驻哈尔滨及阿城县担任讨伐）各部队中，收集抗日军的情报，送到军事特务部，当天由联络股长于澄或第十师团司令部少佐副官（姓名记不得了），把这些情报供给日本军，作为讨伐计划指挥的资料。因此，在七、八两月中，日寇（在陶赖昭的步兵联队指挥双、榆两县讨伐）伪军在双城、榆树对于人民抗日军的战斗约二十次中，死伤抗日力量各约四十名的恶果，我应负责认罪的。（二）联系感情。我曾因刘宝麟旅的机关枪连士兵在榆树县打死日本士兵四人，日寇联队长要刘旅长缴械，否则围剿一事（日期忘了总在七八月中），接到刘宝麟的情报后，亲去师团司令部求见广濑寿助师团长，要求先派员赴现地调查，然后再定办法。广濑即派高桥参谋飞到榆树，调查完了把刘旅长带来见广濑，说明日本士兵以坏马换好马及打人等情形，得到谅解，和平完了。这个安稳了伪满的军心，仍然为日寇尽力，打击人民抗日力量的恶果，我应负责认罪的。（三）宣传工作。当时有军事顾问刘大尉常在特务部里指导制作宣传标语（大长条的分五色）、漫画（大张的可贴在室内）和传单，分发与各部队，用以宣传日、满亲密关系，夸大日满军武力，鼓舞伪吉林军的士气。这又是我对于伪军中的奴化教育罪行，我应负责认罪的。

八月下旬，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曾到哈尔滨视察，又派毛遇凤来接替，由我交代了。

（三）我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部长，在伪满军中施行宣传工作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月，我以军政部嘱托的身分来到长春，受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的命令，任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部长职务。我到任

时，宣传部有日（四人）满（十六人）系军官、文官、通译、军士、工人等二十人，在石野英男顾问指导下，进行对于全伪满军中的宣传工作。当时宣传品是标语、传单、小册子及漫画（由一九三四年又停止标语传单，改为定期刊物，初《精军周刊》，继《精军月刊》）和制作电影）。我在这个工作里，指导部内职员拟作以日满一德一心，依赖日本皇军，以皇军作榜样，以日系作领导，与皇军亲善提携……为主旨的宣传文件和收集投稿，经我核定，交由李懋勤、杉谷等编辑后，向顾问、司长、大臣提出，得到认可后交小野钊付印，依据各部队预定的分配数目邮出。更要求各部队官兵阅读、张贴和讲解，以期收得亲近日寇，拥护伪满，反对祖国和人民，和脱离旧军阀的思想效果。我自己在这时就曾写过"反对军阀统治者张学良"小册子。这些行动，就是我在全满军中作宣传的罪行。

又我在溥仪即伪满皇帝中担任宣传的罪行。一九三四年二月任我为伪满陆军少将，给予建国功劳章，这当然是我在这一年余为伪满效力的表示。同时由张景惠令我以军政部少将部附身分，代表军政部参加大典筹备处，充筹备委员，筹备要在三月溥仪即伪满洲国皇帝位的任务。我分担的事务列下：（一）拟作伪皇帝对于伪满军人的"敕谕"（内容大意是：皇帝即是陆海军大元帅，与将士有首领股肱关系，欲期使用灵活，必须绝对服从，但依日满议定书精神，朕把统帅指挥大权委托与关东军司令官了，你们要服从皇军如服从朕一样的努力，务内除反侧，外固边疆）。（二）拟作"军人誓词"（这是官兵对敕谕的答词。内容分五条，大意是：向皇帝尽忠诚；对皇军要亲善；遵守纪律；努力训练；爱国爱民）。（三）拟制大典的宣传品：内中有大字的"帝出乎震"标语和"旭日东升"的漫画，及推崇帝制的小册子（这是我写的，内容是推崇日本天皇一系，我们要日满一德一心，就要学习日本帝制）和即位大典行事中的实事

宣传等。(四)我在大典观兵式的预行演习和实施中,担任诸兵指挥官(于芷山)的参谋长。

其后,在一九三四年的"亲授军旗"(由溥仪亲授各步、骑团长以军旗,同时发给"敕谕"、"御影",回团后举行拜旗典礼,每年纪念日要举行军旗祭,要学生去参拜,向商民要钱)、"秋季大演习"(在长春近郊御览,动员万余,践踏了农作物)、一九三五年的"大典观舰式"(在哈尔滨松花江上举行)、"秋季大演习"(在长春近郊御览,动员万余人,践踏了农民农作物)中,我都领导宣传部职员办理了宣传工作。更由我主办一次"慰灵祭"(在长春大同公园由张景惠主祭,祭典历年战死的官兵徐景隆少将以下一千余人),我将这些材料编辑起来,曾刊印一本《大典画报》特刊。以上列举事实,又是我在宣传部长任内,宣传帝制的罪行。

这个期间里,我还有三件罪行:

其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末的某日,我奉参谋司长郭恩霖口头命令,随伪军政部大臣张景惠,参加在伪满国务院召开的"清乡委员会会议",委员长是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张景惠坐在干事长席,我在他左首"常任干事"席上。在各关系部的参加者四五十人的参加下,听到奉天省代表王兹栋的报告(内容很长,多未听清,大意是述说奉天省本年讨伐的经过、结果、地方治安情况,最后是使用经费的数字)完了休息,下午没去,以后我也没再参加。

其二,一九三三年四(五)月时,张景惠任讨热军总司令、率张海鹏等伪满军进攻热河,我因病中未能参加,曾派遣宣传部部员任广福等随军到锦州。

其三,赴日见学为日寇作宣传的罪行。一九三四年五月,我曾参加赴日见学团(团长应振复,共四十多人),到日本各地见学。在小野顾问、住谷顾问的领导下,参拜过明治神宫、多磨御陵、靖国神

社、昭和天皇。又见学了学校、部队、军需、造(?)兵、造船等厂和古代名胜。回来后由我汇编一本《见学记事》,内叙各人所见所闻及感想,竭力的为日寇作宣传,期望在伪满军中收到钦敬日本的效果,表示出自己甘作洋奴的奴隶性。所以我在一九三五年春得到伪满勋四位景云章的同时,又得到了日本的勋五等瑞宝章。这都是我为伪满军、伪皇帝作宣传有功的报酬,也是为日寇效力作宣传的代价,同时也就是我有罪于国人的证明,我应向人民请罪。

(四)我任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部长职务中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六月,伪军政部增设在大臣、次长的直辖下的军事调查部,任我充部长,田岛中佐充主任顾问,在长春明伦街开设。我在这个伪机构中重大罪恶如下:

其一,预备在全伪满征兵。军事调查部第一科业务是:军事调查。在科长川崎中校领导着日系科员十五人,在部内作调查准备事务完了后(预定要调查的项目如:各部队历史、系统……军官的出身、学历、经历、籍贯、派别……尤其是士兵的来源、籍贯、入伍前职业等特别注意。此外还有关于营房和军队所在地方的人口多少、文化程度、生活职业……),组成四五人编成的调查班三个,于八月开始分赴各军管区及江防舰队实行调查,经八个月之久。又调制报告书类两个月,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向军政部大臣(于芷山)提出报告。这个报告的总结就是提出建议,欲求伪满精兵,必须实行征兵。这个资料与动议当时虽被搁置,但终于一九四〇年颁布了国兵法,开始在伪满普遍的征兵。这就是我领导军事调查的恶果罪行。使在其后五个年中,强迫约二十万的东北青年去充当炮灰,并在实行征兵中给予人民的灾害,我都应负责向人民认罪的。

其二,布置在全伪满军中的思想调查。军事调查部第二科业务是:军心调查。在科长鹫崎研太领导着日系科员七人、通译一人

的工作下，首先开设一个“精军训练班”。以伪大臣（于芷山）命令，指定各团派遣日系副官和精通日语的满系尉官（共十二三人，均是与伪满高级军官有密切关系的，我记得的有与溥仪有关系的张梃，和于琛澄亲戚金某）七十多名（分期完成的，每期三个月），来长春受训练。训练实施是在我的监督和顾问指导下，由鹫崎研太亲自掌握实行的。授以军心调查的方法、重点和有系统的组织等。训练卒业后，令他们回团转向各连负责军官（日系或亲日的）传习（当他们卒业式我的训词要旨就是令他们好好传习）。这个训练终了，在伪满军中就有系统的、由连到团、由团到司令部顾问部、再到军政部顾问部的思想调查组织，官兵进退或被检举，都以这个组织的报告为根据。其恶果最大的有，一九三七年锋田顾问在三江地区举行的肃军工作，使一百三十名的官兵在军法会审的审判下，受到死（约二十人）、徒（约三十名）、免官（约三十五名）、回原职（约四十五名）的处分。这个罪行及恶果，我应负责认罪的。

其三，我在宣传工作上的罪行。军事调查部第三科（即宣传部改编的）业务是：宣传工作。由科长孙家铎以下十二人组成的。这期间的宣传品，是由《精军周刊、月刊》改进为《铁军》（汉文的由科员李懋勤与科长主编，每月一期，连以上均能得到）。《铁心》（日文的由科员长岛与顾问部主编，每月一期，只配给与日系或蒙系军官）。其宣传重点是：由伪满皇帝即位转向到回銮训民诏书，更收集战斗上、训练上的材料，军中的投稿，要人的讲演、训词，或军事科学的介绍等等。更与日本松竹电影公司定制五六部电影片（名称忘了），购买映画机分配与各军管区，向部队宣传日本的强大、大和民族的优良和日满协和的美德、轶事等。这些宣传，使伪满军中亲日思想日益浓厚，帮助日寇的侵略和镇压等恶果，我都应该负责认罪的。

(五)我任伪军政部(和治安部)参谋司长职务中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被任为军政部参谋司长、兼军用通信本处长。

参谋司:是在伪大臣(于芷山)、次长(李盛唐)的指挥下,主管"总务"、"军事"、"军衡"、"医务"、"测量"、"宪兵"、"江防"、"军法"、"调查"各课业务。依据职责,罪行是无事不是的,仅将重大罪恶序列于后:

第一、一九三六年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中的罪行:

这个罪行的计划案,是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提出的,交到参谋司,由我同军事课长刘卜忱等研究后,向次长和大臣说明,得到认可。依据计划作成命令,下达与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和其它派遣部队来增援的各司令官及部队长等遵照执行的。

计划案的内容:概要之,以肃清东边道区(当时主要地区计十四县)的抗日军,确立地方治安为目的。在本年秋季要举行一次目标指向王凤阁、×××、杨靖宇为领导的约计两万七千人的抗日军,进行讨伐。施行的毒辣手段分三项:其一,用武装力量打击抗日军。由伪大臣(于芷山)命于琛澄任讨伐总司令,设讨伐司令部于通化,指挥第一军管区部队第一(旅长李裕平)、第二(旅长高明)、第三(旅长李寿山)、第四(旅长阎家梅)、第五(旅长廖弼宸)、第六(旅长董国华)六个混成旅及骑兵第三旅(旅长赵秋航)、第一教导队(队长吕衡)和由军政部命令增援的部队(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五百),分配在五个小地区里负责讨伐。其二,使用宣抚工作班,检举地下工作者和搜集情报。由佐佐木到一亲在通化组成的讨伐指导顾问部,指挥各地区的军事顾问和旅、团里军事教官,与第一宪兵队的分队长(连长)等,用宪兵警察及特务组成的工作班,在讨伐地区里进行搜查、检举及收集情报工作。其三,使用集家并村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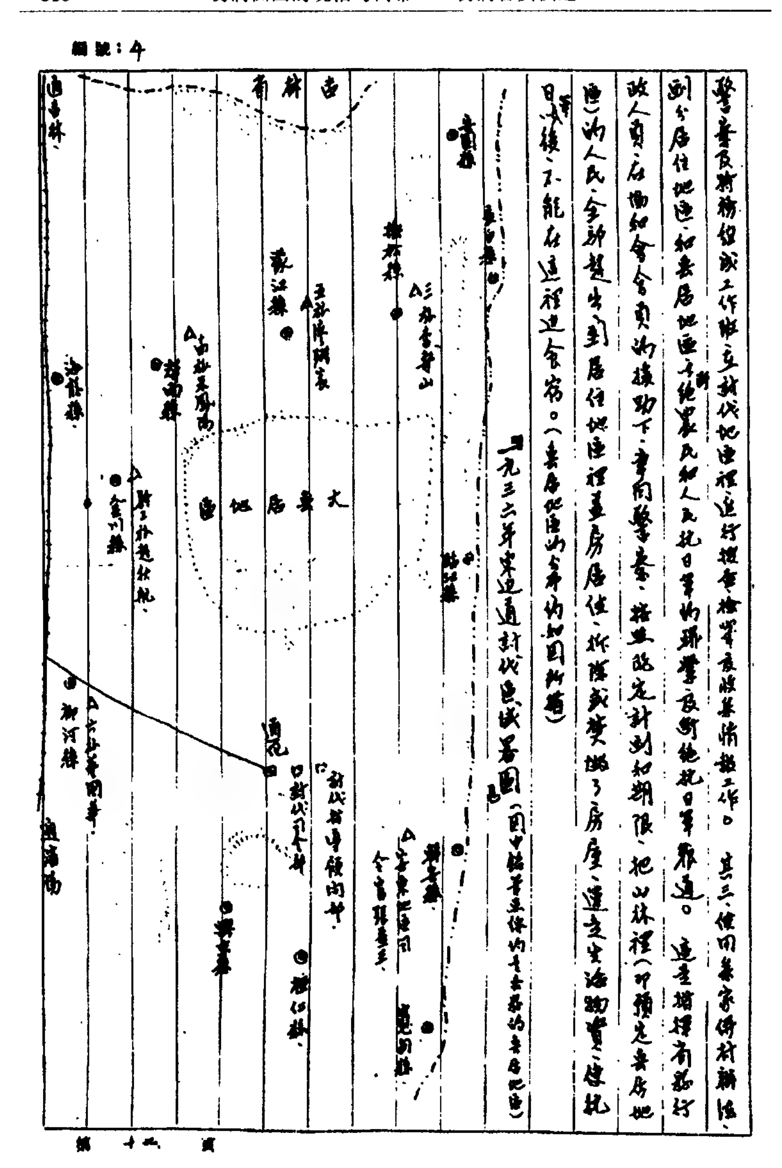
法，划分居住地区和无居地区，以断绝农民和人民抗日军的联系及断绝抗日军粮道。这是指挥省县行政人员在协和会员的援助下，率同警察按照既定计划和期限，把山林里（即预定无居地区的人民）全部赶出到居住地区里盖房居住，拆除或焚毁了房屋，运走生活物资，使抗日军以后不能在这里食宿。（无居地区的分布约如图所指）

实施的结果：当我依据计划将命令及计划案送到第一军管区，和命令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各派混成一旅兵力，第一自动车队派车队两连赴通化增援后，于九月初于琛澂赴通化开设讨伐司令部，佐佐木到一去开设讨伐指导顾问部，召集部队、顾问、教官，依据计划详加指导。在下山琢磨顾问常驻指导下进行讨伐（十月中我随同于芷山去视察一次，我当时见到的旅长如图所注），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作一结束。中经战斗约二百次，死伤抗日军应各有千人以上，焚毁的山寨约百处，搜出和缴获的物品都有，抗日军的总员数约减去一万。而地方人民（内有鲜籍）被检举杀害的约有数百。尤其是无居地区人民，失去田庐、走死流亡者，不下二万。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瘟疫流行，死亡者当有数千。这些恶果，都是这次讨伐给与的。

我应负的罪行：推行了佐佐木到一的毒辣计划，下达了讨伐计划和派兵增援命令，并曾亲去代表伪大臣慰问伪满军，鼓舞他们与抗日军、广大人民为敌。都是我的罪行，我愿在人民面前认罪。

第二、一九三七年东边道讨伐中的罪行：

这个讨伐是一九三六年的东边道讨伐继续，于一九三七年六月，由王静修继任司令官负责进行。我以伪参谋司长职责，曾核准他们的计划。依据计划，把十四旅和索支队、靖安军部队，以大臣命令遣还。又以大臣命令派遣禁卫队一个营、第二军管区的一个



编号：4

警察及特务组织工作队，在讨伐地区里进行搜查检举及收集情报工作。其三、使用集家并村办法，划分居住地区和无居地区，断绝农民和人民抗日军的联系及断绝抗日军粮道。这是由前行政人员在协和会会员的援助下，会同警察，按照既定计划和期限，把山林里（即预定无居地区）的人民，全部赶出，到居住地区里盖房居住，拆除或焚烧了房屋、遗弃生活物资，使抗日军以后，不能在这里进食宿。（无居地区的分布如图所指）

一九三六年东边道讨伐区域略图（图中标着虚线的七块的无居地区）

第十四页

旅，前往增援。

实施的结果：东边道地区抗日力量，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总人数约为一万七千人。经这一年间的打击结果，在一九三八年春，王凤阁全部瓦解了，王凤阁夫妇及女儿被害；总战斗次数约一百五十次，死伤抗日军人数约各一千名，到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日军的总人数降到一万。东边道的人口，因为讨伐、检举、集家并村和瘟疫死亡的结果，到此时约减少四万人。

第三、一九三八年东边道讨伐中的罪行：

这又是一九三七年东边道讨伐的继续。由一九三八年七月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王殿忠任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负责进行的。这期间抗日力量已经减退，所以增援部队少派了，只记得曾以伪大臣于芷山命令，派遣宪兵训练处的宪兵三百人，参加过约三四个月的讨伐。这十个月间，战斗约百次，死伤和分离的抗日军人数又约两千，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东边道抗日军的总员数剩两千七百。东边道的人口约减少了五万。

总计由一九三六年秋开始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末，共两年又八个月期间，依照日寇佐佐木到一的计划和指导，中经于琛澄、王静修、王殿忠负责指挥的三个阶段，给予抗日军的王凤阁以下六千人的死伤，减少了抗日军两万四千人的力量，覆灭了抗日军许多根据地，没收了大宗生活与战斗的物资，同时杀害了数百名的男女人民，使东边道区人口减少了五万，田庐财产不能计数。这些恶果，我由于伪参谋司长的职责，曾推行佐佐木到一的计划，核准王静修、王殿忠等计划，辅佐伪大臣于芷山下达命令，派兵援助，督促鼓励，是有重大责任的。我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我愿向人民面前请罪。

第四、一九三八年三江地区讨伐中的罪行：

这个讨伐是于一九三八年初，由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兼三江省长于琛澂计划指挥负责实行的。目标：是指向以赵尚志、夏云阶、周保中和李华堂、王荫武、谢文东等为领导的抗日军（总人数约七千）。使用兵力：在第四军管区隶属部队外（约六个混成旅：计有第四教导队、鹏飞混成旅、冯广友的混成旅及宋殿才、徐海、张魁英三个旅），由治安部命令靖安军（美崎丈平）、卓罗巴图尔率领的兴安骑兵两团，和第三军管区的高广寅骑兵团前往增援。到年末结束，中经战斗约二百次，给予抗日军的损害，死一千七百人，伤约一千人；缴获了许多武器物品。人民由于征集民夫损失了很大的劳动力，更有因检举株连遭到死亡和损失财产的。

我曾核准这个讨伐计划。依据计划，命令靖安军司令率该军于二月进驻富锦县；同时命令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派遣绰罗巴图尔率骑兵两团进驻宝清县；并命令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将高广寅骑兵团留驻汤原县，均受于琛澂指挥，援助讨伐。我这些罪行，和因此而产生的恶果，我都认识到这是有罪，应负责向人民认罪。

第五、我在派遣热河支队向华北出兵中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于七月二十日，佐佐木到一交与我向华北出兵帮助日寇侵略华北的计划和热河支队的编成案。由我向大臣于芷山说明认可，即按照计划向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和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下达命令。命令要旨：为使日寇向南口进攻容易，派遣热河支队向南口后方长城线上进攻。热河支队以靖安军全部（四个团）和第五教导队编成，支队长藤井少将，受大臣直接指挥，补给勤务由邢士廉担任。要于八月一日以前向承德集结完了（因靖安军当时驻锦州），同时也给了邢士廉的命令。

热河支队由八月九日到丰宁县黑河川，与中国军队高桂滋师

相遇，在长城线上相持。八月十五六日，中国军队先后袭击了第五教导队骑兵团(团长富璇善，在喜峰窖[①]受袭击向后方撤走了约十数里，死伤轻微)和教导部队(队长朱家训等死十数人，步兵团张营反正了)，二十一日午，藤井重郎又被打死，我奉大臣与顾问命令赴前线视察，与指导该军的顾问皆藤喜代志(他是佐佐木派遣的)商议，向美崎丈平(藤井后任，原参谋长)等作了安慰。次日又赞同了他们的进攻赤城计划。第三日带同藤井遗骨回来了。该支队于九月上旬占领了赤城，十月又进驻宣化，次年一月回防。

这个支队的派遣，是伪满军第一次进入中国，开了以后向华北进兵的先例。在战斗中是失败了，但防线上的四个村庄中是十室九空，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害。其后进入赤城、宣化，以靖安军的平夙军纪废弛情形来判断，华北人民是一定要遭到灾难的。

我在这个罪行中，推行了佐佐木到一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计划；依据大臣同意，下达了给藤井重郎和邢士廉的命令；更在这个支队失败危急的时候，亲赴前线，安慰了军心，就是鼓舞了士气；又赞助他们向长城内进兵的计划，都是我的罪行。热河人民遭到蹂躏，华北人民受到的镇压，我都应负责认罪。

第六、我在派遣石兰部队进驻北京近郊中的罪行：

这个命令下达，是在八月十五日依照伪大臣意旨，给予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的。初意是填第五教导队防务，令受邢士廉指挥的。由于指导顾问池边万三的擅专(或者有佐佐木到一给他的命令，情形不详)就把这个部队由古北口入关，到达京北怀柔县(骑兵团长刘玢驻此)和北京近郊高丽子〔营〕(部队及步兵团驻此)。虽然没有战斗和死伤，但帮助日寇镇压华北人民，是起有作

① 原文如此，地名不可考。——编者注。

用的。我应负下达命令派兵去热河，以致入关的罪行责任的（当年十一月撤回）。

第七、我在派遣甘支队入关，在密云、平谷、蓟县打击八路军中的罪行：

这个命令，是我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依照顾问部指导、大臣同意下达的。当时是命令巴特玛拉布坦编派的，由兴安南的骑兵五团和兴安东的骑兵二团临时编成，以兴安南警备司令甘珠尔扎布任支队长的。并命令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指挥的。到达承德不久，就由邢士廉把这个支队交与日寇某部队指挥了。甘珠尔扎布在日寇部队长指使下，在密云、平谷、蓟县境内，打击了抗日军、八路军（战斗次数不详），屠杀了无辜农民（在平谷县内），这些恶果，我也应负下达命令派兵责任的。

以上七项，是我在伪参谋司长职务内，下达命令，派遣军队，打击抗日力量，帮助日寇侵略华北的重大罪行。因这些罪行，使抗日军、八路军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害，我都愿负责认罪。此外，在这期间里，伪满各军管区及江防舰队都曾有自行的讨伐，我这个伪参谋司长是应连带负责的，他们给予抗日军和人民的灾害，我也应向人民认罪。

第八、在伪满向市县要壮丁补兵中的罪行：

当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军管区司令官会议时，我曾在参谋司的指示中，列入“补充兵员问题：各军管区可仿照兴安军的办法，于本年委托市、县长代募志愿当兵的壮丁，先补入各教导队，试行有效，下年再行推广。但要由军管区派医务人员在募兵官的指导下施行募兵检查，以收寓征于募之效。”这个指示的恶果，就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之间，由全伪满各市、县、旗要出约有十万青年，强迫他们去充当炮灰。更因为各市、县、旗的强迫出丁，演成摊派、雇

用(最初一丁的工价是三百元至六百元,最后增到每丁三千元,由全村摊出,交付壮丁家属),就损耗人民资财数千万。这个恶果,我应负责向人民认罪的。

第九、我在收抚赫奎武团工作中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在我由热河回长春,向伪大臣于芷山、高级顾问大迫通贞报告视察热河支队经过后,又派我同调查课长鹫崎研太去依兰,调查赫奎武团兵变情况和相机设法收抚。到依兰调查结果,得知这个兵变是与三江地区司令部主任顾问锌田的肃军工作有重大关系。我们又去佳木斯,与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主任顾问高桥大佐及三江地区司令官朱榕取联络,得知由于锌田顾问的肃军工作,已检举官兵一百多名,送到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军法处,因此引起全军人心不安的情形。于是电请大迫通贞到佳木斯会商办法(参加者:大迫通贞、高桥顾问、于琛澄、朱榕、王之佑、鹫崎研太),决定"收抚变兵"、"安抚军心"两个办法。令我同鹫崎担任收抚变兵任务,由于琛澄、高桥派人援助(安慰军心由大迫和于琛澄另派人进行)。我同鹫崎回依兰,又去方正县,在日军某旅团长派人(山本少佐)和滨江地区顾问森少佐(率孙团长的骑兵一团)及由我求的李某(方正县人,曾充过方正县保卫团总队长)和于琛澄求的徐会长(延寿县人,驼腰子商务会长)等援助之下,于十月下旬,找到了赫奎武(在延寿县境老爷岭山里),又由他派张营长与我相见,遂于十一月上旬,在我同山本少佐、森顾问、孙团长的迎接下,回到方正县(八月下旬变出时总人员约一千二百,此时约有七百),当晚由我陪他们坐船去依兰。在船中由赫奎武和杨营长向我说他们变出的原因和经过:在变出之先(大约一个月之先),杨营长曾被冈田顾问(三江地区顾问)由防地(依兰南十数里的村落)拴在马脖上带到依兰监押起来(理由说他吸鸦片卖鸦片,原因是旅里

日系教官太田大尉吸鸦片，向他要过鸦片，供应的不充足)，后经他妻子以约值三千元伪满币的首饰金钱运动，得到释放，因而痛恨怀疑。更因这时三江地区肃军，被检举的人很多，就有日本军要来缴械的传言。当变出这天夜里(十二时之前)，赫奎武先得到旅部日系副官电话，说旅部派汽车去接该团的三个日系回旅部有事，令他们准备到汽车路上等候(地点距团约六里，距依兰约三十里)，赫奎武答应了。数分钟后，杨营长给赫奎武电话，说他派的秘密报告，日本骑兵前来缴械，已过东大桥了(当时在依兰有越生骑兵联队，在依兰东南上有个大桥)，他已令全营准备拉出去，请团长速作决心，一同拉出去。机关枪连王连长在傍，就劝团长速决，他就派人把三个日系扣留了(上尉副官一、中尉一、密电员一)，赫奎武就在这种情况下决心变出的。我送他们到依兰，次日就回到哈尔滨。

我到哈尔滨，见到新任最高顾问平林盛人，由鹫崎课长作翻译，又提出两个建议：

其一，是赫奎武的兵变和三江地区的军心不安，与锋田顾问所行的肃军工作有关系，请作适当处理。其结果，不久就更换了锋田顾问，停止了肃军工作。

其二，是三江地区被检举的官兵约有一百三十人，在军法处拘押，请指导第四军管区早作解决。其结果：在一九三八年春(大约二月)在第四军法会审的审判下，处死刑的约二十名，徒刑的约三十名，以行政免官的约三十五名，认为无罪回原职的约四十五名。

总结我这个罪行里，是当日寇正在侵略华北，在伪满兵力减少的时机里，我遵照伪大臣(于芷山)和顾问(大迫通贞)的企图，在长期的工作中，把已加入反满抗日的赫奎武团收抚回来，又加入了一九三八年三江地区的讨伐，赫奎武因立功又进级少将。这个结果，就是减弱了抗日力量，加强了侵略和反人民力量，对于人民我是有

罪的。尤其是，我就在这时因反对人民帮助日伪有功，晋级伪满陆军中将。

第十、我在建议伪满成立军官学校中的罪行：

在一九三八年六七月的某日（记不清了），关东军参谋副长石原莞尔，在伪满军事顾问部里，向我询问伪满军教育情况及意见。我当时作如下解答：军队教育的好坏，以教育士兵的军官能力为转移。以我个人来说，二十年前是个好连长，今天我就不够格，就让我再入一次陆军训练处补习，也一定跟不上日本新任官的少尉。所以我主张仿照士官学校的办法，创立军官学校。再蒙古民族的文化程度较低，现在的兴安军官学校课程，学生有很多不能够彻底了解的，应当在未入本科以前，设预科补习普通科学。当时他首可，过两天约我同大迫通贞赴沈阳视察陆军训练处，同时他斥责了真井鹤吉（当时训练处的干事），当晚他向大迫通贞说，要尊重我的意见。当年兴安军官学校设立了预科。一九四〇年伪满在长春石碑岭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到一九四五年，毕业生、在校生总数达千余名。这个强迫东北优秀青年千余人，脱离学生求学业的岗位，去为日伪充当炮灰的罪行，就在我一时间的冲动性的言语上造成了（我当时发言的出发点，是因为伪满成立以来每年一期所育成的军官都是日系的）。今日想来，这不是于青年有利，反而是有害的，愿向人民认罪。

第十一、我在军用通信本处长职务中的罪行：

陆军军用通信本处，是由在长春的“鸠〔鸽〕通信训练所”、在沈阳的“无线电通信训练所”和“通信材料场”三部组成的。我初度巡视时，见到“鸠〔鸽〕通信训练所”是由井崎于菟彦所长主办的；教育的人员是由各团选派来的鸠〔鸽〕通信士兵；教育的课程，就是鸠〔鸽〕的饲养、孵育、通信训练等。毕业后就把他所训练的鸽子及用

具带回本团，作通信用。“无线电通信训练所”是由工兵顾问福岛少佐自己负责教育的，内分通信科和机关科，学生总数三十多人，二年毕业，作为伪满军中通信班台长和机关技士之用。通信材料厂是由福岛负责，指挥技士一人，担任保管、配给和修理业务。这个机关的效用，就是伪满军用通信的基础，这些通信人员的育成和他们以后在军用通信上所起的作用，我都应负责认罪的。

第十二、军事咨议院干事长问题：

伪满在一九三七年，最初任命了三个将军，即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三人，其后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又任命了吉兴、于琛澄两个将军，这是当时所称的五将军。军事咨议官是于一九三九年秋初任的，是王静修、郭恩霖。于一九四四秋，又添上乌尔金、吴元敏。他们的任务是：由一九四〇年春召开军管区司令官会议时，在会场内设有将军军事咨议官席，参加会议。一九四一年，王静修特派过特命检阅使，检阅第九军管区隶属部队。平时，除在顾问部会议所（即是每年司令官会议的地方）的大门上，有“军事咨议会议”的竖牌外，并没有其它组织机构。我记得的，在我任伪治安部参谋司长时（日期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伪满“政府公报”上发表“将军府组织条例”（或是令），内载参谋司长应兼任将军府干事长（同时有没有“军事咨议院组织条例”记不得了）。我自己曾向军事顾问部连络，向大臣于芷山请示如何组织。答示说“暂不组织”。所以我就没有组织过“将军府”或“军事咨议院”，也没有以干事长的身分在里边干过什么事。

（六）我在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官任职内的罪行：

我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被特派为第八军管区司令官，赴通化就任。这个军管区是新开设的，由第一军管区分出安东、通化两省，和混成第一旅、混成第二旅、混成第三旅及混成第五六旅各一

部(即第八教导队的前身)而编成的。第一宪兵队分出一部(约二百人)编成第八宪兵队。设司令部于通化。我于五月上旬到任后，司令部已由主任顾问立花大佐率同参谋长组成，并正编成第八教导队中(顾问部：立花主任顾问、安永顾问、石黑顾问、纲田主计顾问。司令部：参谋长赫慕侠、参谋处长陈明山、副官处长萧玉琛、军械处长张某某、军需处长冯绪功、军医处长贾树屏、军法处长陶远进、上校部附富璇善、宋道仓)。我到任后，即督促各项业务的进行，以作秋季讨伐的准备。五月下旬起，先赴沈阳，向奉天地区日寇守备队司令官申吉(这时伪一、八军管区皆受他区处)，继续赴濛江、抚松、长白、临江、辑安、柳河以及通化各地，对隶属部队初度巡视。七月初，接到日寇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命令，由七月一日起，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受他区处，这就是一九三九年通化、吉林地区联合讨伐的前夕。谨将我在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任内的重要罪行列后：

第一、派兵参加诺门汗侵略战争中的罪行：

我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旬在长白县巡视混成第二旅时，得到诺门汗战斗的消息，奉伪大臣于琛澄命令，派遣第八教导队的山炮兵(山炮八门)编入陆军训练处的炮兵队，参加诺门汗战争，由参谋长赫慕侠遵照派遣了，于当年冬季归还沈阳(最后回队一连，其一连编入训练处了)。这次出兵参加国际战争罪行中，我依据伪大臣于琛澄命令，给予第八教导队长赵振邦命令，派遣二百四十人兵力、山炮八门，在诺门汗战线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红军战斗，发生恶果(具体情形未详)我均负责认罪。

第二、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九四〇年八月，通化、吉林地区联合讨伐中的罪行：

这个讨伐，是我受任伪司令官亲自指挥伪满军来与杨靖宇、×

××将军等领导的抗日军作敌对罪行的开始，也是由我任参谋司长，由一九三六年起对东边道地区大讨伐罪行的一个结束。谨将这次罪行的具体事实列述于下：

（甲）当时抗日军的情况：当时在这个地区里的抗日军，是有以杨靖宇、×××、魏？（济）民、朴德范为领导的二千七百人兵力。

（乙）日、伪军的预期行动：七月中旬，由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部召集会议，决定本年通化、吉林地区讨伐，由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统一指挥施行。开始时期比往年较早，第八军管区部队要早期集结、准备完了。

我的措施：于七月下旬（约在二十五日）给各部队长命令，要在八月上旬按照下列位置集结完了，接受补充。

第一旅旅长李裕平，率该旅在抚松县城集结。

第二旅旅长高明，率步兵第二团在临江县城集结，令骑兵第四团集结在林子头。

第三旅旅长王士琇，率步兵第七团在金川县城集结，令骑兵第八团集结在辑安县城。

第八教导队长赵振邦率该队在通化集结。

（丙）讨伐命令下达：八月初，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部又召集会议（讨伐指导会议），立花顾问、安永顾问、参谋长赫慕侠参加的。得到讨伐指导如次：

讨伐开始：由八月中旬，自辑安、通化、柳河、金川、辉南南部开始，自南向北推进。

伪八军兵力：隶属部队全部，和增援的步兵第五团、自动车队一连。

使用手段：（一）帮助（强迫）农民秋收，严禁食粮外运；（二）搜索无居地区，覆灭山寨；（三）由宪兵警察肃清地下工作。

下达命令：八月中旬（大约十一日）依据野副昌德命令要旨，我向各部队长下命令如下：

混成第三旅骑兵第八团在团长魏传镛率领下，即日归入通化守备队大队长古见中佐的指挥下，由集结地开始行动。

第八教导队、骑兵团、步兵团，在团长李希才、朱彦儒率领下，即日归入通化守备队大队长古见中佐的指挥下，由集结地开始行动。

混成第三旅步兵第七团，在团长杨春煜率领下，即日归入山城镇守备队大队长○○大佐的指挥下，由集结地开始行动。

步兵第五团，在团长戴元率领下，即日归入山城镇守备队大队长○○大佐指挥下，担任铁路警护。

混成第一旅步兵第三团、骑兵第三团，在团长于泽浦、部凤林率领下，即日归入○○守备队大队长○○大佐的指挥下，由集结地开始行动。

混成第二旅步兵第二团、骑兵第四团，在团长李海澄、马国栋率领下，即日归入○○守备队大队长○○大佐的指挥下，由集结地开始行动。

行动的经过及恶果：伪第八军管区部队，在与日本军、警察大队的配合下行动的。骑兵第八团先搜索了辑安县七道崴子无居地区和辑安县北部无居地区，焚毁有十数个山寨，并强迫农民秋收。至十月初，到达八道江以东线上停止（在北部无居地区里，与杨靖宇部下有三次战斗，死伤数目忘了）。

第八教导队骑兵团及步兵团，开始即在通化、柳河两县境内强迫农民秋收，至十月一日以前，到达右起八道江，左至板石沟岭，及右起板石沟岭，左至凉水河子之线。无战斗。

步兵第七团两个营在金川县，一个营在辉南县，开始强迫农民

秋收,到十月初在小金川南北之线停止。

步兵第三团、骑兵第三团在抚松县南部,步兵第二团、骑兵四团在临江县西部开始强迫农民秋收。

由八月中旬至九月末一个半月中,以强迫农民秋收,把苞米之类的早熟农产物,不论生熟,一律收入到集团村落里,以警察监守,禁止外运,焚烧些山寨,战斗较少。

(丁)第二次讨伐命令下达:十月上旬各部队停止了十数天,补充粮食、民夫和调动部队,作下期行动的准备。我曾到小金川、凉水河子、四头沟子、板石沟岭、八道江,视察过步七团、八教步兵团、骑兵团,并在八道江见到骑兵团长魏传镛。看到听到这个帮助农民秋收的恶果,知道这个区域里的农民,来年开春就没食粮、地是无法耕种了。我曾下过调派部队命令:限于十月十日,骑兵第八团到达林子头、三岔子之线。骑兵第四团到达八道江、板石沟岭之线。步兵第二团到达板石沟岭、凉水河子之线。补充完了准备行动。步兵五团派兵一营进驻朝阳镇,警护交通线。

行动经过及恶果:这次是用武力的搜索和打击,目标是指向通化北、濛江南的大无居地区(纵横各百余里)。方法:是由南向北日满军警配合着推进的。东面有大部兵力堵击。于十月中旬开始,伪八军管区的骑八团、骑四团、步二团、步七团(两个营)兵力,分成若干小部队,在旅长、团长、营长或连长的率领下,由准备线上向北入山搜索,遇有抗日军即行打击,发现山寨即行焚毁。到十二月初,行动完毕。在这一个半月里,伪满军约共战斗有二十次,内中我具体记得的,有步七团(一个营)于十月下旬,在小金川东某山地里与杨靖宇部下五(六)十人交战,打死抗日军六人,伤四人。步二团长李海澄率领的一营于十月下旬,在十七道阳岔西南沟,焚毁山寨两处,死抗日军四人。又步二团的一营,于十一月初旬,在十三

道阳岔与杨靖宇部下五十人交战五小时，抗日军死五人，伤约三人。又骑四团于八月上旬，在老爷岭西麓某村庄，与杨靖宇部下六(七)十人，夜间战斗七小时，死抗日军五人，伤约五人。总计在我所记忆的四次战斗中，抗日军共死二十人，伤十二人，共三十二人，平均每战斗有八人的死伤，这样计算，在二十次中应给予抗日军死伤一百六十人的损害，并焚毁山寨约四十处，及损害若干生活、战斗物资的。在这期间里，我于十月中旬，曾随伪治安部大臣于芷山〔于琛澄〕，由通化通过临江县、抚松县、濛江县、辉南县、朝阳镇视察一次。又于十二月初，我由朝阳镇经辉南县到龙泉镇视察一次。

(戊)第三次讨伐命令下达：十二月上中旬，伪满军第八教导队由队长率领，在八道江至凉水河子线上；步兵第七团由旅长率领，在龙泉镇至辉南县线上；混成第二旅在旅长率领下，在濛江；第一混成旅在旅长率领下，在抚松；骑兵第八团在濛江县二道花园，步五团在山城镇(其一营在朝阳镇)，在以上位置休息、补充。在龙泉镇设战斗指挥所(安永顾问驻此)。

于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上旬(约一周间)，由安永顾问领导，我下命令，用火车输送，把第一、第二两混成旅，在旅长率领下进入吉林地区，在磐石县下车，开到桦甸县内。

于一月下旬某日(日期记不清了，约在腊月二十左右)，李裕平率领第一旅，在桦甸、濛江两县交界的山沟里，与杨靖宇将军的抗日军主力遭遇(约七八百人)、交战二十二小时，伪第二混成旅的一部来援，杨靖宇将军撤退。这次战斗，抗日军死四十人，伤三十人，损失武器弹药数十支、数千粒。这是这次讨伐中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抗日军最大一次的损失。

(己)杨靖宇将军的战死：一九四〇年二月某日，我在通化，接到通化省警务厅通报，通化省警察大队，在濛江县某集团部落外击

毙杨靖宇。并详述战斗，夸大战功，以期立功受奖(奖金大约是一万元伪满币)。过三四天，顾问部告知，今天晚到通化守备队大队部，欢迎古见大队长凯旋，傍日落时，我同伪通化省长张书翰等见到古见乘卡车回来，由车中携下杨靖宇将军遗首，次早古见送往吉林，交与日寇野副昌德。其后，由伪濛江县长吕书铭向我说，杨靖宇将军被难当时，只有他一人，因数日未食，在某集团部落外，求一老头买饭买鞋，后经这老头向警察报告了，他们去攻击，杨将军因而被难。

(庚)其后的处置：当杨将军被难后，通化地区告一结束，我就把第一、第二两旅留在吉林，归伪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指挥(三四月间将三个混成旅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步兵旅，即是把原三个混成旅兵力全部派出了)。把第八教导队调回通化教育、补充。我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去吉林视察和慰问伤兵一次，三月去敦化视察慰问一次，五月派参谋长赫慕侠视察一次，直至八月尚未归还。自动车队二月即遣还了。朝阳镇的一营，二月初也回山城镇集结。

(辛)我的罪行：我于一九三六年秋，即以伪参谋司长的职责参加东边道讨伐，当时推行了佐佐木到一的毒辣计划，作成和下达了伪大臣的派兵讨伐命令，更曾亲自到现地视察慰问。其后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又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两度讨伐中，我均以伪大臣命令派遣过援助讨伐的部队，因而使抗日领导者王凤阁等遭到杀害，抗日军受到巨大死伤，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总员数只剩有二千七百之数。在一九三九年，覆灭了这个人数，和杨靖宇将军的身死，我应负完全罪责的。我在这次罪行中，我所指挥的伪军共战斗约有二十三次，以我确记的四次战斗平均来统计，每次八人，应死伤抗日军一百八十四人，再加以一九四〇年一月伪第一旅与杨靖宇将军最大的一次死伤七十人，共给抗日军以死伤二

百五十四人的损失。此外，尚有三个守备大队、通化、安东两省警察大队、以及宪兵警察所掌握的检举工作，虽在三四个月的短期，抗日军死、伤当有两千人以上，更加有杨靖宇将军的身死，此次恶果，不下于以往的每年。我的罪恶之重，是自己也不能宽恕的，今日愿向人民请罪。至于人民所遭到的灾难，在这次的强迫秋收中，我是亲自看到听到当时的苦况，自愿负责认罪，以伸人民的积怨。其后伪一二两旅在吉林地区的罪行，我也应负派兵责任。

第三、我在募兵和征兵上的罪行：

我在伪八军管区司令官任内，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部队改编之前，曾派遣上校部附富璇善，在通化省内，用寓征于募办法募兵五百人，补入教导队去作伪满的炮灰。又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伪满颁布国兵法，我同伪通化省长和县长，借师道学校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在有五百人的参加下，我宣读祝词(内容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富国强兵，就实行征兵法。征兵是最好的法令，当兵是最高的荣誉，人民要拥护国兵法，援助征兵)，要求拥护国兵法。国兵法颁布后，我遵照部令，就派遣富璇善、宋道仓等去长春学习兵事业务，筹备设立兵事处，在通化设立第八军管区兵事处，以富璇善任处长。在安东设安东兵事处，以宋道仓任处长，开始准备本年征兵检查的业务和编组。到八月，我被调转第三军管区，未能完成。

第四、我在监督工程、收买民地上的罪行：

我任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当时，就受伪治安部大臣于琛澄命令，兼理通化营房建筑工程监督任务。这个工程是在通化新建第八教导队的全队营房，由治安部军政司营缮课设工程处专管其事。但关于用地一项，是第八军管区司令部依据工程处的计划图纸，向通化省公署交涉的，终于在通化江南银厂子沟购买了民地六十垧，每垧地人民约受损失一百元(平均给价一百元，当时市价约二百

元),共损失人民利益六千元。但因此人民遭到失业或迁居的,其损害比较更重。

第五、派遣军官担任青训和学校的军事训练罪行:

我到通化时,在通化的青年训练所里,已派遣军官一名担任军事训练。一九四〇年,又奉部令在安东、通化两省内,各县国民高等学校以上的学校里,均由司令官派遣有学历的军官担任军事训练,并依民生部的规定要按期查阅表报成绩。我就派遣三十余名校尉官承担这个任务,给伪满帮助日寇预备总动员创立条件。

以上五项,是我在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任内的重大罪行。我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又受到伪满勋三位景云章。这是表示我在伪参谋司长任内,命令派兵打击人民抗日反满和援助日寇侵略华北有功,正是证明今日的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罪,愿向人民认罪。

(七)我在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任职内的罪行:

我于一九四〇年八月,转任第三军管区司令官,赴齐齐哈尔就任。这个军管区是由龙江省、北安省、黑河省地区组成。军管区司令官受昂昂溪守备区司令官区处。当时管区内在齐齐哈尔有日军师团长一(国崎登)、泰安镇师团长一(未见过),北安有军长一(后宫淳),黑河省孙吴县有师团长一(姓名忘了),嫩江县有骑兵旅团长一(未见过)及飞行部队与炮兵部队等,他们专任国防,不负治安责任,所以在黑河没有伪满军。当时伪第三军管区隶属部队:步兵旅一、混成旅二,及第三教导队、通讯队、军乐队。顾问部为主任顾问寺田(九月就更换了原和三郎)、主计顾问某某(姓名忘了)。谨将我的重要罪行列后。

第一、命令派兵扫荡的罪行:

一九四〇年十月间,我根据混成十二旅长胡文藻的情报(在通北县、绥棱县北部山林里,进入赵尚志系抗日军,总计有二百人,有

久占盘踞模样），我命令步兵第四旅和混成十二旅，各派兵在一营以内的兵力，于十月初开始向该地区施行三周间的扫荡。该两旅编出两个支队，实行了十七天的扫荡，交战十次，死、伤抗日军约各十人，焚毁山寨共二十个，并毁坏烧炭炭窑四个，捕烧炭工人十名交县处理。这个命令派兵讨伐，和对于抗日军和人民的恶果，我应负责认罪的。

第二、我在一九四〇年第三军管区秋季讨伐中的罪行：

这是我到第三军管区后，根据关于王名贵所领导的抗日军情况，由司令部计划，和由我直接指挥的讨伐罪行。王名贵领导的抗日军人数不满二百，但因为都是骑兵，地势熟悉，行动敏捷，活动范围包括黑河、龙江、兴安东三个省区。我就也用骑兵。令骑兵二十团长陈明山率骑兵三百人，担任讷河县以北嫩江县地区；第三教导队骑兵团长孙强率骑兵三百人，担任讷河县以南龙江县地区；以步兵团长陈学信率兵两营进驻讷河，援助两个骑兵部队。由十一月开始活动，在嫩江县某地，陈明山部与王名贵抗日军交战一次，死伤三（四）人，王名贵即过江进入莫力达瓦旗。约在十天后，接到第十军管区通报，王名贵由札兰屯西北又向东南方向移动，我遂命令孙强过江，在甘南县境与王名贵遭遇，战斗一次，王名贵部下死伤约十数人（具体情况记不大清），孙强追击过铁道南，在阿荣旗内某小村庄（距成吉思汗站南十数里）追击，连长日系上尉某战死，乃停止追击。因此，我同主任顾问原和三郎，去札兰屯视察一次（这时陈明山部和陈学信的一营，已依据我的命令，过江到兴安东省内）。到十二月末，我命令各讨伐部队回防。这次讨伐罪行，是由我负计划、指挥全责的，抗日军死、伤十五六人和马匹物资等损害，都是我的罪行恶果，我应向人民认罪。

第三、派遣骑兵二十一团信连长率队讨伐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春(大约四月,记不大清),我接到嫩江县长电报:"王名贵等约一百五六十骑兵,由江西窜入嫩江县北部,请派兵出剿。"我当时直接命令骑兵二十一团长陈明山率兵进剿。由陈明山命令少校连长信某某(名忘了)率兵一百六十人,自讷河出发,到嫩江县北霍龙门附近与王名贵遭遇。战斗结果,抗日军死伤九人(约死五伤四),并损失了马匹枪械。追击出嫩江县界外而还。这次讨伐,是由我命令派兵,所生恶果,我应负责认罪。

第四、派遣骑兵二十一团增援第十军管区讨伐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十月,奉伪治安部大臣于琛澄命令,派遣骑兵二十一团长陈明山率全团增援第十军管区讨伐,受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乌尔金指挥。因此,我曾于十一月(陈明山团由十一月出发,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回防的)初旬,到博克图视察一次,与第十军管区参谋长女屋岩接洽(他是直接指挥讨伐者)。在这个罪行中,我负命令派兵责任,所生恶果(具体不详),我应负责认罪。

此外,在第三军管区隶属部队的驻防地区内(一九四〇年八月——四一年七月),是步兵第四旅步兵十七团驻海伦,步兵二十四团驻庆城,混成十二旅长驻北安,步兵十九团驻四站,骑兵二十二团驻通北,独立第一旅步兵团驻齐齐哈尔,骑兵二十一团驻讷河,第三教导队骑兵团驻齐齐哈尔,步兵团驻洮南。一九四一年七月——一九四二年八月,是步兵第四旅步兵十七团第三营驻海伦,步兵十七团及步兵二十四团二营驻齐齐哈尔,步兵二十四驻庆城,混成十二旅部驻北安,步兵十九团驻四站,骑兵二十一团驻讷河,第三高射炮队驻昂昂溪,第三自动车队驻三间房。由旅、团长下令讨伐的罪行,是每月皆有,平均每月给予抗日军死伤损害约二十人,两年间可能有四百多人的损害。这些恶果,由我隶下部队所造成,我均应负责认罪的(具体情况已忘记,不能一一供述)。

第五、我在第三军管区内征兵的罪行：

一九四〇年八月我到司令官任时，正在实行征兵检查中，这年省征兵官是龙江省长黄富俊、北安省长寿聿彭、黑河省长野义雄。在兵事处长张金祥、荣绍英（北安）、李威（黑河）的率领下，十四个征兵检查班，在三个省内共征取合格壮丁约四千名，于一九四一年补入伪三军管区部队中二千三百余人，其余交第七军管区补用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开始征兵之先，兵事处以司令官命令召集各征兵班的军征兵官、军医处以司令官命令召集各主任医官，到司令部开会议，司令官训示他们努力研究业务，确切实行。兵事处长、军医处长给予指示。征兵检查开始后，我曾在龙江县、白城县、绥化县视察征兵实施状况，曾见到宪兵把说“父亲有病，不能劳动，如去当兵，家中生活困难”的壮丁（在龙江）带出场外取调，和把有病壮丁抬到现场受检（在绥化）等残苛情形。这年征取壮丁仍是四千人，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补入第三军管区部队中。一九四二年征兵准备同上年。开始后，我只视察了北安、德都，即转任陆军训练学校校长，这个罪行，未能终了。

在这两年中，入队国兵因逃亡捕回经第三军法会审判处徒刑者共有三十多人，徒刑执行（齐齐哈尔陆军监狱）期满后，仍令回队服兵役，到满期退役。

以上，是我为伪满强迫八千人数的青年去为伪满充当炮灰，内中不甘服役的，更以军法镇压，都是我的罪行。因征兵而引起损害人民事故，我应负责认罪。

第六、我收买民地监造兵营的罪行：

我到任时，伪治安部军政司营缮课即设立工程处，在三间房车站傍建筑自动车队营房，伪大臣于琛澄命我监督工程。这个用地约三十垧，是由三军管区向龙江省公署交涉购买的。一九四一年

春，又向龙江省公署交涉，在昂昂溪南购买民地二十五垧，建筑第三高射炮队营房及军官住舍，这是经我派军需处长欧阳玉成向省公署办理的。在地价上人民受到损失外，在工程中和部队训练与建筑道路，人民多受到扰害，我应负责认罪的。

第七、奉祀天照大神，教育唯神之道罪行：

一九四一年二月，召开军管区司令官会议时，除例行指导事务外，有两件特殊事情：一为自本年起，日寇在伪满设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山下奉文任司令官，指挥各地区防卫司令官（即是守备队司令官改编）区处伪满军，担任镇压东北人民的任务；其二，由最高顾问竹下义晴传授"唯神之道"，令各军管区司令官布置传授"唯神之道"教育，建立神庙，奉祀天照大神。我会议回来，就对在齐齐哈尔的旅、团长、处长们，施行了"唯神之道"的教育（大意是天照大神与天皇现人神是一体；日本天皇一系奉神意统御万民；神意是使世人各得其所，八纮一宇，不分族类，满洲建国即是依赖神庥；感谢神庥，与日本一德一心，推广神意，普及世界，就是"唯神之道"）。由司令部乃至各部队里，均建神庙，奉祀天照大神。由十二月八日溥仪颁布时局诏书时起，要宣读诏书，强迫官兵尽奉公之诚，援盟邦之战。这个奴化教育，我应负责认罪的。

第八、参加防卫司令部会议和防空演习的罪行：

由于守备队司令部贱为防卫军司令部，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月，记不大清），昂昂溪地区防卫军司令部召开防卫会议，我以参与资格去参加了（同去的有主任顾问原和三郎、参谋长谷麟山，他二人是委员）。会议的结果，由防卫军司令部制订一本防卫计划，令我遵照执行（内中有关于地方治安一部，是与伪三军管区当时的兵力配备和防区任务一致的。新添的任务，只有自动车队在防卫上应受防卫司令官的调用）。再有关于齐齐哈尔市的防空警备计划。

在这年初秋(八九月间),在齐齐哈尔市内举行一次防空演习,我也以参与资格参加了(伪满军队依据防空计划,担任南大营附近的警备及各营房内的警备和灯火管制,此外没任务)。这个演习的假设空军是指的苏联,演习结果是市民遭到扰害和被打。这个仇视苏联和扰害人民的罪行,我也应负责任认罪的。

第九、我以军法会审判处军官以徒刑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冬,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长星某(名忘了),检举第三军管区司令部附刘宗岳上校(原十九团长,因改编任部附)、第二军管区司令部附孙强上校(原教导骑兵三团长,因改编任部附)、骑兵二十一团中校团附尚其悦三人,押在宪兵队多日(两个月以上),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交到第三军法会审,以思想犯(与反满抗日分子通信)判处刘宗岳徒刑七年,以烟犯(贩卖鸦片)判处尚其悦徒刑四年,孙强无罪开释。这个用军法镇压罪行,我应向人民认罪。

第十、派遣军官担任青训和学校军事训练的罪行:

这个罪行,是依照部令施行的。其作用与在通化所行的一样。但派遣军官人数约三十五名,我自己曾检阅过齐齐哈尔市青年训练所和绥化县国民高等学校,亲自训示学生要以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的精神,努力学习锻炼,以期达到举国力而援盟邦的圣战。这种奴化教育罪行,我应认罪。

第十一、派遣自动车队参加构筑阵地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七月,受到伪大臣于琛澄的电令,派遣第三自动车队二十台车,到第九军管区大石寨车站下车,受第九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指挥,参加构筑阵地运输任务。我遵令给予第三自动车队长德永恭助命令,令他派遣。他因该队成立不久,教育的程度较差,亲自率车二十一台到大石寨下车,又向南走到乌布林札拉嘎地方,帮助伪九军管区部队构筑阵地(约两千米正面),至九月末归

还。这是我派兵构筑阵地，企图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敌的罪行。

以上是我在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任内重大罪行的供述。此外，我还在一九四〇年十月，由主任顾问授给我以日本勋三等瑞宝章，表示我曾帮日寇侵略华北的罪行。又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得日寇的支那事变从军纪念章，及伪满国势调查纪念章（这是一九三九年当伪满国势调查时，我把伪八军管区的人马资财数目报出而得的）。

（八）我在伪满陆军训练学校校长期间的罪行：

我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中旬，到沈阳任陆军训练学校校长。这个学校当时有三班受补习教育军官（共一百三十人），有军士教导队一，是把伪满一千四百余军士候补者集中教育，我担负其责。九月曾参加伪满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得到纪念瓶一，这个礼遇正表示我十年间为伪满、日寇效力，而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九）我在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任内的罪行：

我于一九四二年九月转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官，这个管区是奉天、锦州、四平三省，受日寇南部地区和长春地区两个防卫司令官区处的（一九四四年受关东防卫司令官区处）。部队有混成第一旅（步兵五团在热河增援讨伐，骑兵三十九团是回族兵驻沈阳）、第一高射炮队和三个工兵队及通信连、军乐连。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将四平省划入第二军管区（驻昌图第二工兵队同时分出），将安东、通化两省编入（同时接收混成第八旅及第四工兵队）。一九四四年两个混成旅改编为步兵第一旅（旅长金毅驻锦州，步五、步三两团均在热河）。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当时兵力：步兵一旅、迫击炮一团、辎重一营、工兵七队、自动车队一（在蓟东）、通信连一、军乐连一。

谨将我的重大罪行列述于后：

第一、征兵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八至九月征兵检查，由兵事处长富璇善、四平兵事处长张贵卿、锦州兵事处长黑濑等领导下十六个征兵班，共征取合格壮丁八千七百人。一九四三年，四平兵事处长改为李熖元，征兵检查班数相同，共征合格壮丁九千三百人。一九四四年，由兵事处长宋道仓和通化兵事处长高金山、安东兵事处长李镇华、锦州兵事处长黑濑的率领下十八个征兵班，共征取合格壮丁一万零三百人。以上三年共征兵两万八千三百人，除补入本管区部队外，以大宗的青年供给伪满各军中的补用，去充炮灰，这都是我的命令和派员实行检查的罪行。在征兵中，征兵人员对于人民迫害恶果，也应由我负责。国兵入队后，因不愿充当炮灰，逃亡被捕而判以徒刑的，也应由我负责。尤其是这三年中，由第一军法会审判刑逃亡就有四十多名，在沈阳陆军监狱执行的，更是我对于青年的罪行，愿向人民认罪。一九四五年征兵已经开始，幸有苏联红军解放东北，青年得到解放，我也少负一层罪恶，这应感谢苏联红军的。

第二、派兵增援讨伐的罪行：

步兵第五团和步兵第三团，虽然是在我任司令官之先，就已派遣到热河省内增援第五军管区的讨伐，与八路军为敌。但我到任后并未将这部兵力撤回，而且曾于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亲去平泉县视察步五团，又去兴隆县视察步三团，鼓励他们与人民为敌的罪行。这就是我的罪行，我应向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认罪。

第一独立自动车队，于一九四四年冬改称第一自动车队，由伪军事部大臣命令编入第一军管区。但该队已由伪大臣邢士廉命令配属在铁石、铁心部队里（大臣直辖，赴蓟东打击八路军的部队）出发蓟东。我应负这个继续派兵责任，他们造成的罪行，我都应负责认罪。

第三、派兵援助日寇罪行：

1. 当一九四三年八月鞍山被炸之先，就有由我派遣的高射炮兵两连担任防空任务。被炸后，我应沈阳日寇特务机关长小畑元良的要求，立即派遣三个工兵队到鞍山，在小畑的指挥下，担任恢复和清扫土工作业三个月。次年又派两个工兵队担任筑路工作。使日寇的掠夺政策继续实行。

2.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防御沈阳企图与红军作战时，我又应当时特务机关长久保少将的要求，派工兵三队(第一、第十三和王镇华队)，在沈阳受日寇指挥构筑防御工事(八月十五日中止)。这又是我派兵援助日寇与苏联红军为敌的罪行。

3. 当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后，我奉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命令，凡在沈阳的军事部大臣直辖的学校、厂院和部队，均受我的指挥，而我要受强(后宫淳)兵团长指挥。又由强兵团长的命令，把陆军训练学校的军士教导队炮兵连、重机连和自动车学校的车辆等，配属在日寇的部队里，这也是我派遣部队援助日寇、抵抗红军的罪行。

第四、耗费人民资财的罪行：

1. 一九四三年，由奉天省公署、沈阳市公署寄付驻沈阳军方的国兵会馆。当时由沈阳的伪一军管区参谋长岩田薰召开国兵会馆事务会议，成立国兵会馆委员会，拟定规章，组织人员接收后，我以驻防地最高指挥官资格视察国兵会馆，才知道这两所房屋及设备共用价六十余万元，这笔钱是市公署向市民勒捐的。这个耗费资财向人民勒索的罪行，我也应负罪责。

2.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我奉到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命令向伪满中央银行沈阳支行提取伪满币七千万元，发给在第一军管区内的各军队、学校、厂、院一年以上的饷金、薪俸。我派军需处长魏

九洲及被服本厂军需高田等向沈阳支行交涉，提出现伪币三千万分发了。这是我服从乱命，耗费大宗人民资财的罪行，我应负责向人民认罪。

第五、释放国民党人，未释放共产党人的罪行：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我在沈阳各界代表召开的治安维持会议上，被推为辽宁治安维持会委员长，于十八日成立，我依照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查厅委员提出的政治犯名单，盖章释放了数十人(均是国民党籍的)，而未提到共产党籍的。这是我当时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歧视的表示。今日想来，是违背人民大众意志，有负共产党人爱国志士的罪行，应向人民和当时未被释放的共产党员请罪。

〔下略〕

119—2—1161，1，5

佟衡补充笔供

(1954年6月27日)

(一)〔略〕

(二)1931年9月,张作相在锦州为父治丧,由驻吉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省主席和副司令的职务。9月19日天尚未明,长春的日本军开始袭击南岭的兵营。当时电话尚可通。南岭的步兵团长任玉山给熙洽打电话请示办法,这时熙洽不准军队抵抗,设法逃避。于是驻南岭的步兵团和炮兵团,驻二道沟车站的步兵营,均遭受日寇的袭击,没有抵抗的向榆树县方向撤走。到天明后熙洽就派我和边防副司令公署秘书张燕卿到长春吉长镇守使署调查现地情况,这时镇守使李桂林已赴伊通,参谋长徐成名对我们报告了当时的情况,长春市内秩序由公安局维持,尚没有混乱。我就于当日晚车回吉林复命。我们绕避着日本的长春站在长春东站上车,到了车中看见了吉林教练处总办齐知政和日本顾问大迫贞男。我就问齐知政到长春来作什么?齐就指指大迫说:"老熙让我同他来接洽点事儿。"以后彼此没交谈。我回到吉林后会同张燕卿向熙洽报告。我得知本日驻吉林省城的军队已奉熙洽的命令开出,分散周围各地,以防日本军来挑衅。我当时很是疑惑,日本军怎能来挑衅呢?以后我听旁人说齐知政和大迫20日又到长春与日本方面接洽一次。21日早熙洽派中将参议安玉珍和秘书张燕卿到土门岭迎接日本军入吉林。安玉珍到土门岭会见日寇多门

二郎师团长,安等保证不抵抗欢迎日本军和平进吉林。于是多门率领军队乘车一列向吉林进发。多门到吉林后军队就驻在车站附近,熙洽只带翻译刘燏芬一人晋见了多门。及回到城内宣布多门指示,吉林省城的军队须一律缴械,不承认旧政权,须另组织政府。22日早派人到各地传达军队缴械命令,倘有抵抗者,日本军就去进击等威胁的言辞。我到乌拉街向25旅送达这命令,那时旅长张作舟赴锦州,就向团长刘宝麟、夏洪漠二人传达,他们二人虽然接受但部下不服,没敢缴收。刘团长被营长杨秉藻带到榆树县,夏团被营长赵维斌带到冯占海的地方和他一同行动。同时熙洽又派少将杨遇春到口前镇向卫队团长冯占海送达这命令,被冯占海拒绝。熙洽的缴械的计划虽没成功,但是目下他有日本军在吉林给他保镖,所以也很泰然。次日23日就宣布推翻旧东北政权,成立吉林独立政府,熙洽自居为吉林政府行政长官。派他的亲信同谋者郭恩霖当军令厅长,办理军事;孙其昌当财政厅长,办理财务;李书诚当民政厅长,办理地方的事务。于23日熙洽等就宣告伪吉林政府成立就职。熙洽独立后,派人到各地镇守使和各旅长处说明独立经过,表示他是受日本军压迫,大家应当与他合作,加入独立政府,与各方面都有好处,个人也有前途。这时就透露他要"复辟"。以后所得的反应,大概如下面

吉长镇守使李桂林和他部下各团长,拥护熙洽,加入新政府。

延吉镇守使吉兴和他部下各团长,拥护熙洽,与他合作,但暂时还畸得观望情形,以后再宣布和东北政权脱离。

滨江镇守使丁超和他部下各团长,丁超不与熙洽合作,但部下各团长白文清、关成山等接近于熙洽。

依兰镇守使李杜和他部下各团长,李杜反对熙洽,指斥他卖国。部下团长马龙图接近熙洽,当时李杜把他撤职。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无所表示，但团长张治邦坚决反对熙洽卖国行为，所以这方面军队不附和熙洽。

国防第22旅(驻哈长线)，旅长苏德臣存心观望，但团长赵毅反对熙洽，决心抗日，受部下的拥护，不久苏德臣被迫离职，由赵毅接任了旅长。

国防第26旅(驻哈绥线)，旅长邢占清不与熙洽合作，但部下各团长对邢均抱反感。以后于琛澄攻哈尔滨的时候，吉林郭恩霖策动他的参谋长盛芳厚和团长宋文俊，以熙洽的命令免邢占清旅长职，以宋文俊接旅长，邢被迫离职。不久丁超、李杜等起义，邢占清命营长王孝之驱走宋文俊，又营长于德一驱走本团团长刘汉武，又命营长应占斌驱走本团团长赵秋航。邢占清恢复了原来的旅长职位，断绝了和吉林伪政府的一切关系，军队才开进了哈尔滨，加入了丁超、李杜等和日寇作战。

国防军第25旅，原驻吉林和长春，被日寇袭击和缴械，撤至榆树县。旅长张作舟是张作相的族弟，熙洽是决不容他的，以后于琛澄也是以驱逐张作舟为借口进攻哈尔滨。他的部下团长杨秉藻率一部投降了于琛澄，其余大部分加入了冯占海军内。

国防骑兵旅驻农安、扶余、乾安一带，旅长常尧臣愿与熙洽合作，但部下不服。1932年春，黑龙江义勇军李海青到扶余，吉林骑兵旅大部分随李海青抗日行动，旅长常尧臣逃走，团长尹保衡降了熙洽。又驻乾安、伏龙泉的团长刘玉琨也降了熙洽。熙洽都把他们升任旅长，让他们招兵，由吉林给补充枪械。

卫队团原驻吉林省城，团长冯占海，在“九一八”后拒绝熙洽缴械命令，即开始行动，号召抗日，收集各地义勇军，编成宫长海、姚殿臣两旅。又吉林东北军不愿参加熙洽政府的都归到冯占海的部下。1931年冬就号召了二万多人，由吉林经舒兰，五常，向哈尔滨

移动，驻在阿城附近。

(三)1931年9月23日，熙洽叛国独立，成立伪政府后，我于25日退出吉林到哈尔滨，向锦州用电报报告张作相，并请示办法。张复电已派中将李振声到哈尔滨，详有指示。27日李振声由锦州到了哈尔滨，同行有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章启槐、王之佑等(他们都是到锦州给张作相父吊丧未能回吉)，派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副司令，诚允代理吉林省主席，丁超为东铁护路军总司令。李振声在哈尔滨设置临时办事机关。这时熙洽和哈尔滨成对立的局势，哈尔滨政府得听命北平的张学良和张作相，张学良等听命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政府从不作何指示。日寇在各方面作积极的侵攻，军事和谋略并施，相反的在哈尔滨仅保残喘的政府和军事，陷于麻痹不仁的状态。有下列的现象 。

1. 临时政府的军政首脑，还是给军阀作走狗，给他保持地盘势力，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观念。如李振声在哈尔滨半年期间还给张作相搜括军费60万元汇寄天津，使各部队假意向熙洽投降，骗取军费，以作补偿。于是军心疑惑，不能坚决抗战。

2. 中央国民政府对东北人民不负责任，吉林临时政府对中央政府不负责任。不对日寇侵略战争筹划什么应付办法，也并不作何准备的办法。当时人民为保卫自己的乡土，愿意政府领导，组织起来抗拒敌人，但是临时政府避免作这些事，中央既不作指示，作了怕惹纠纷。

3. 还是因袭不抵抗政策，如日本领事馆、日本侨民以及日军特务人员，任意活动，不加限制管制。如哈尔滨已和日寇战斗，它的领事馆还请求到第一线视察侨民状况，依样妄想行使外交压迫。

4. 临时政府从不表示自己的政策，以个人的利益作首位，勉强敷衍局面。

以上各种现象是张作相派李振声来办理军事，诚允、王之佑等来组织政府的实际情况。这些人因徇误国，也应负一部分的责任，王、李等以后又都投降了敌人，他们的严重罪行是无可分辩的。1931年冬熙洽在日寇指挥之下对旧吉林军主要是“分化”和收买离间的政策。11月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于琛澄到吉林招募剿匪军，协助熙洽攻取哈尔滨。于琛澄遍招土匪和收集自己旧部共约5000名，12月开始行动。熙洽派旅长马锡麟和杨崇武两个旅和于琛澄同行，先到榆树，收降了张作舟的团长杨秉藻，张作舟的其余部队都退至阿城加入了冯占海部队。于琛澄占领了榆树县后，仍继续前进。这时吉林郭恩霖策动第26旅的团长宋文俊撤换了旅长邢占清，并密令滨江镇守使署的团长白文清监视丁超的行动。这时在哈尔滨的政府(位置在宾县，又名宾县的吉林政府)知前方军事不利，就行解散。李振声也脱离了职务躲避家居。于琛澄又通告丁超，吉林熙洽已派他充东铁护路军总司令，派马锡麟为滨江镇守使，急速准备交代，丁超可率第18旅司令部移驻阿城。这时于琛澄认为已经无血的占领了哈尔滨。

在这时候，李杜秘密率领依兰的步骑各一团到宾县附近，与冯占海事先连络在这里会合共商办法，计议非使丁超加入不可，当夜李杜派人乘汽车到哈尔滨接王之佑来商。王到宾县与李、冯见面，同意共同起义，并由王担任劝丁超加入，丁也同意合作，但非尽速把李、冯部队开到哈尔滨不可，因于琛澄部队已离哈尔滨不远，预计明日午前就可到达。王之佑利用警察的关系，当晚秘密集合在哈尔滨的武装汽车百余辆，连夜把李杜、冯占海的步兵部队运到哈尔滨，由丁超统署了军警的警备，命邢占清撤换各团长接收第26旅后，即把军队集中到哈尔滨。同样丁超也撤换了团长白文清、关成山和刘镜清，把军队集中到哈尔滨。王之佑集结各县的保卫团，

以备兵力的补充。命起毅先设法集结兵力在双城，以作哈尔滨的掩护。部署已定，以丁超、李杜连名通电宣布熙洽的卖国，日本对他援助扰害中国，起兵讨灭熙洽、于琛澄等的叛徒，并依国军本来的任务，保卫吉林和东省铁路，如有侵犯中国领土和权利，一定要拒抗，以尽守土之责。这是在 1932 年 1 月中旬，以丁超东铁护路军总司令，李杜编成为吉林自卫军总司令，二人联名作战，编成一个联合总司令部。我参加了丁超、李杜的起义，派我为少将参议，在总司令部服务。

这时于琛澄的部队的先头已到香坊，探知哈尔滨突起变化，当日没敢前进。次日早在三棵树一带和冯占海、李杜的军队交战，到日没时，于琛澄和熙洽旅长马锡麟、杨崇武等的部队全部败溃，冯占海追击前进，在双城的赵毅也由侧面追捕，于军零散奔逃，大部分瓦解。于琛澄溃败的消息转到吉林，日寇决意用日本军进攻哈尔滨，在长春二道沟和站长要车（因那时南满铁道和北满的铁轨宽度不同），站长苏联人说按规章必须有东铁护路军总司令部运输证才能发车，站长不能违反规章。于是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就把站长就地枪决，强制发车。驻松花江的东铁护路军的团长陈德才，并没遵照命令破坏江桥阻止日军前进，他就毫无抵抗向哈尔滨撤走，所以在无拒止的状态下，日寇安然的于日没时到达双城。这时在双城的赵毅率全部追击于琛澄，已进入五常县境，知日寇前进，乃连夜撤回，所以日寇到双城车站确知城内已无中国军。当日夜半赵毅率队到双城县城外，知日寇数列车均停在双城车站，就激励部下，兵士也均愿效死，夜间 3 时开始袭击日寇的列车。赵毅的部下由团长吴起贤以下伤亡 300 多名，日寇也伤亡了 300 多名。天明时赵毅才撤走，因此迟滞了日寇的前进，它整顿了 3 天才向哈尔滨进发。这时丁超、李杜的兵力已在哈尔滨集结，命王之佑为前

敌总指挥，指挥第24旅、第26旅、第28旅所收集的部队约有步兵4团、骑兵1团约8,000名的兵力，在哈尔滨东南顾乡屯一带拒止日本军前进。日寇方面是多门师团长率领1个旅团，附属有飞机、战车等部队，前后计战斗3日，丁超、李杜等部队不支，由马家船口渡江，退至方正、延寿、珠河一带，这时冯占海也由阿城退回，命王之佑率26旅、第7旅和集合的各保卫团驻珠河、延寿附近，丁超、李杜、冯占海均驻方正及宾县一带，哈尔滨完全归入日寇和熙洽等的手中。（以上是1932年1月）

（四）日寇占领了哈尔滨后并未前进，命吉林军令厅长郭恩霖到哈尔滨进行特务工作，对丁超、李杜等部队进行谋略，一面命于琛澄整顿队伍，准备作战。1932年2月中旬，熙洽派财政厅长孙其昌来一面坡，在车上和丁超、王之佑等会谈。据他说熙洽还愿维持吉林归来的局面，日本人也无意深究，凡事皆可商量，请和各将领商议，如愿和好，可互相交换意见，派人到哈尔滨接洽，彼方也派人到此来接洽。这是熙洽瓦解对日抗战部队的谋略的第一步。因王之佑和国防军各部队驻铁道线附近，郭恩霖在哈尔滨成立对丁李等的军事特务部，派和这些方面有关系人物如李桂林、张恕、关成山、赵秋航、盛芳厚等，还有王之佑的亲信李博生（前警务处督察长）和张春龄（第22旅的参谋长）等，奉王之佑的命令也到哈尔滨和郭恩霖、张恕（东铁监事长）往来接洽。3月初旬，王之佑到方正和丁超、李杜、冯占海及各主干会议，王之佑提议前次孙其昌来谈有条件可以和对方交换意见，大家以为如何？李杜说，条件是取消吉林独立，交还中国，熙洽他能这样做吗？除此之外别无可谈，大家愿意谈可和他去谈，我算不谈。丁超的参谋长杨耀钧说："谈和"减低抗战气势，拒绝为妙。但多数主张还是设法迟缓日寇的进攻，我们在这期间好作以后准备，并派人到北平和张学良保持直接连

络,有了办法我们就行动起来。当日王之佑就回到前方延寿县。可是他是主和的,所以前方不时的和郭恩霖一派的往来,受了掀动。赵毅看这些人的行动,事不可为,脱离了职务,把部队交给团长陈德才,飞到了北平。邢占清防止部下动摇,离开了延寿城另地驻防。郭恩霖又派李桂林到一面坡来策动王之佑,王约丁超、李杜前来会商,于是丁超代表后方来见李桂林。李说如愿停战,即请派王总指挥之佑到哈尔滨相商。丁问如你们把王扣留应如何? 李作保证,王之佑也愿往,就同李桂林同车到了哈尔滨。到后送至张恕公馆内,由日本宪兵监视。王之佑由张恕保证才准他投降,他的总指挥部由参谋长任广福率领也到哈尔滨投降。以后第22旅陈德才和参谋长张春龄率部下两团也行投降,由一面坡输送到了阿城。丁超、李杜军撤到方正,又退到依兰,把方正交于冯占海拒止于琛澄。以上是王之佑的背义弃信,他的参加抗战完全是投机行为,看事不顺利就倒向于敌人方面,全然没有为祖国为人民的意识,投降就是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犯了严重的罪恶。

(五)吉长地区和滨江地区完全被日寇侵占后,1932年3月,义勇军李海青进入扶余、农安一带。旧骑兵旅长常尧臣虽然降了熙洽,但部下不服,部分的陆续加入李海清部内。5月吉林吉兴和张海鹏讨伐李海清,并把投降的团长尹保衡、刘玉琨扩编成旅,仍然留驻农安、扶余一带。

(六)1931年熙洽叛国后,延吉镇守使吉兴就诚意与熙洽合作,尤属驻敦化的团长王树棠积极给日寇作帮凶,他的营长王德林愤恨这种卖国行为,率全营起义,召号人民起来抗日,成立救国军。吉林的王树棠、吉兴等就帮助日寇讨伐王德林,并镇压人民的抗日,使王德林的救国军不能在这方面活动,乃移动到宁安、东宁方面,1932年春和李杜等联合抗战。这年吉兴升为吉林全省的伪满

的警备军司令官,团长王树棠、朱榕、梁泮均升任旅长,作了伪满的基干部队。

(七)绥宁镇守使赵芷香游移观望,不敢公然附合熙洽,也不参加丁超、李杜等的抗战。他的团长张治邦(驻绥芬河)知丁超等在哈尔滨起义,就联合在宁安附近的王德林,并使宁安保卫团总队长刘占魁等驱走赵芷香,同时收集了驻穆稜、密山各地的部队,响应丁超,李杜并编制部队。张治邦为绥宁地区前敌总指挥,王德林为副指挥,声讨日寇和逆军。1932 年 2 月丁超、李杜等由哈尔滨撤出时,李杜的旅长马则周率 2 个旅到了穆稜,与张治邦等联合,并授马则周为绥宁地区前敌副指挥。这些时期内日寇部队的先头只到海林站,并未前进。

(八)1932 年 3 月伪满政府成立,吉兴当了吉林警备军司令官,派于琛澄从延寿,李文炳(滨江镇守使)从哈尔滨攻击宾县、方正一带冯占海军队,日本军队在后方支援他们的行动。但伪满于、李等的军队均被冯占海和山林警备队击溃,不能成军,于是哈尔滨的日本军出动,这时冯占海向依兰撤退,日本军遂占领了方正,和在依兰的丁、李军队成对峙的状态。在这期间我是随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行动。

丁超、李杜等撤至依兰后,日本军除以飞机轰炸外,并未前进。于是对日寇占领的地区,采取游击队的战法,命冯占海率骑兵 5000 向哈尔滨,总司令部参谋长杨耀钧率骑兵二千向阿城,作扰乱敌人的行动,尽可能地逼进到长春威胁伪满的首都。1932 年 4 月中旬各部队由依兰先后出发,这两个部队在前方和各地义勇军联合或支援,对日寇或伪满军作战。同年 6 月日本广濑师团指挥伪满军于琛澄和江防舰队向依兰进攻,沿松花江各地先后陷于日寇手中,丁超由佳木斯撤至宝清,李杜撤至穆稜的梨树镇,指挥绥

宁地区作战。绥宁前敌总指挥张治邦因军队指挥系统庞杂，妨碍作战，乃辞去总指挥职务，把自己的军队给予旅长关庆禄，经苏联境回到中国。李杜派马则周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指挥，方才统一了指挥。由同年6月至12月日军在牡丹江，李杜军队在磨刀石各构阵地在对阵的状态。在哈绥线敌占领区有杨耀钧和李延禄部队的活动，在三江地区有陈东山、李华堂和丁超部队的活动。10月冯占海由热河方面撤至关内，脱离了东北的抗战，情势日趋穷蹙。李杜退至密山，我代理参谋长留在梨树镇指挥前方。这时丁超、李杜的军队全被压缩在东宁、穆稜、密山、勃利、宝清的一角落内。12月日寇由哈绥线和松花江的下江地区行包围的进攻，我由梨树镇后撤到了宝清，这时日寇广濑师团的饭冢支队由佳木斯及富锦二路包围宝清，在七星泡附近击破了丁超的孙殿甲旅，向宝清前进，丁超撤出宝清城，并探知由富锦前进的日军已到义和号，就把军队带到宝清北方森林地带内作拒守。此时李杜的军队已由国境线各地入苏联，日寇军队已占领了密山。日寇饭冢支队占了宝清，就派由吉林同来的丁文凯（丁超之侄）持熙洽和广濑师团长的信，劝丁超只要放下武器，一切无事。于是丁超承认军队缴械。12月23日伪满佳木斯警备司令李毓久率步骑兵各一旅也到了宝清，在日寇监视之下把丁超的两个旅和地方民团1500名均缴械就地遣散，把丁超和各高级将领、司令部人员均送佳木斯，由日本军解送到哈尔滨，经广濑师团送至长春交伪满军政部。1933年1月伪满军政部长张景惠集合丁超的部下到军政部训话，先说伪满是为善邻亲仁，保卫地方，才和日本提携，驱除军阀，建立新国，你们即已觉悟抗战之非，新国家不追既往，各人回家作安分良民。当时每人给良民证书一张，遣散回籍。我回到住所后，伪满军政部次长王静修在丁超房内和我相见，他和我说你是在日本学校毕业的，并且作过教

育的事情，现在满洲国新成立陆军训练处，想派你去当中校战术教官，你愿意给满洲国作事吗？我回答说当教官我愿意，就怕作不好。他当时把通信处记上，让我候信，不要远离。我仍回到哈尔滨暂住。3月7日接伪满军政部的通知，已发表为中央陆军训练处中校教官，我就于4月1日赴奉天到差。

以上是我投降伪满的经过。我意志不坚，中途变节，甘心给敌人服务，实在是不可宽恕的罪恶，这是我以后作出种种罪行的根源，我现在向人民认罪，我是背叛了祖国。

119—2—1170，2，16

佟衡笔供

(1954年7月18日)

佟衡,男,59岁,满族,北京市安定门内土儿胡同18号。旧官僚家庭,陆军军官学生出身。伪满军事部参谋司长,少将。

履历:1903年在家塾读书(8岁)。1909年,北京,初级陆军贵胄学堂入学(14岁),1911年12月毕业。1912年9月,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军官预备学校入学,1914年9月毕业,军官候补生,在南苑第7师入队实习。1915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入学,1916年12月毕业(21岁)。1917年,南京,中央陆军第16师见习军官,4月补炮兵第16团少尉排长。1918年9月,北京,边防军军官教导团入学,晋级中尉,12月毕业。1919年,山东济南,补边防军第2师炮兵团连长。1920年1月察哈尔多伦,补察东镇守使署上尉参谋,10月因镇守使署裁撤,退职在北京家居。1922年1月,到奉天投效奉军第27师,师长张作相委司令部上尉差遣,3月参加第一次奉直战役,在永清一带作战,6月补步兵53旅少校参谋,在九门口作战。1923年,锦州,补步兵第40团营长。1924年参加第二次奉直战役,在热河凌源及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4月,奉天,补东北军第6师中校参谋,在副军长郭松龄办公室服务,12月随军司令部开赴天津。1926年1月,郭松龄回军到滦州声讨张作霖祸国殃民,向奉天进军,补郭军第2军的作战主任参谋,2月新民会战郭松龄失败,军队被张学良收容改编,补军团司

令部额外中校参谋,6月选送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成城学校补修日语。1927年1月,日本,入东京近卫步兵第一联队实习队附勤务,10月入千叶陆军步兵学校甲种学生班。1928年4月毕业回国。6月,吉林,军务督办张作相调补吉林陆军第15师司令部上校参谋。1929年3月,吉林,补吉林陆军训练处教育部长。1931年9月18日,日军攻击长春南岭兵营,22日日军入吉林,23日驻吉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洽投降日军,宣告吉林独立。我脱出吉林到哈尔滨,奉张作相电令留哈办事。12月熙洽派于琛澄攻击哈尔滨,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声讨熙洽并阻止日本军入哈尔滨,组织吉林自卫军,我加入自卫军,充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2年1月,丁、李的军队在哈尔滨和日军作战不利,撤至方正、珠河一带。3月又撤至依兰。6月于琛澄和日军联合攻击依兰、佳木斯一带,丁超撤至宝清,李杜撤至密山,我随司令部驻梨树镇指挥前方作战,12月受日军攻击退至宝清。1933年1月,丁超在宝清受日军包围,承认缴械投降。2月随丁超被日本军送至长春交伪满军政部遣散,我被伪满军政部次长王静修留在伪满供职。4月派中央陆军训练处中校战术教官。1934年10月参加伪满在长春南岭附近举行的第一次特别大演习,充西军支队作战主任参谋。1935年10月选送入第一期专科学生入学,1936年10月毕业,仍充训练处战述教官。1937年3月选派赴日武官见学团,到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各地见学,4月回伪满。9月晋级步兵上校,补治安部军政司军衡课长。1938年7月,伪满治安部内机构改革,改名人事科长。1942年3月晋级陆军少将,补伪满第一军管区参谋长。1943年6月补伪满治安部参谋司附,派驻南京大使馆武官。1945年1月补伪满军事部参谋司长。“八一五”降服后,被苏联军捕俘,11月送至苏联哈巴罗斯克收容。

犯罪事实:

1933年4月至1937年9月在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步兵训练部战术教官任内的罪行。

一、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是对满系校级、尉级军官施行补修教育又兼养成日满两系初级干部军官候补者(日)和军官候补生(满)的教育机关。在处本部之下设有步骑炮各兵科的训练部,担任本兵科军官学生教育和满系军官候补生教育。我在步兵训练部担任第一教授班的战术学教官,在职期间共教授了第一期至第四期由上校级至上尉级(每班混合编成)的军官学生280名,第一期步兵甲种学生(准备晋级少校的上尉加以深造)80名,又教授了第二期第三期的满系步兵军官候补生120名,共480名。教育的方针除教授一般战术原则外,精神方面养成学生亲敬日本、敌视中国和苏联的心理。夸示日本军以皇室为中心,忠勇无比,中东日俄两次的战役日本军优秀强大,反而说中国和苏联军队决不能与日本军抗衡的。伪满和日本共同防卫,共同作战,是伪满军人最荣誉的任务,应用战术均以中国和苏联为交战国,以养成敌对的心理。其次教育上除使用一般战术外,又由本处研究部编译一种剿匪战术,专以反满抗日人民和抗日联军为对象所演练的攻防战斗的各种方法,特别对游击战术和“拉洼”战法着意引用各种战例,或采取学生中对抗日联军作战经验去教育大家,使伪满军队增强对抗日联军作战的力量。我执行了伪满的教育方针,目的是在给日寇作帮凶的军队去消灭人民的抗战力量和进行侵略的罪行。

二、1934年10月伪满由溥仪亲自统裁举行第一次特别大演习。东军由靖安军全部编成,西军由第三教导队和驻长春的骑兵第一旅以中将应振复为支队长的部队编成,地点在长春南岭至孟家屯之间,目的是为演练伪满军队能作较大规模的战斗动作,与日

寇协同进行侵略的战争。我在西军支队司令部担任作战主任参谋，辅佐支队长计划和指挥支队的攻防演习动作。这是我参加训练伪满军队，给日寇作帮凶，准备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这次演习出动部队的兵力为7000名，溥仪的统监部幕僚长是军政部次长郭恩霖。

三、1937年3月伪满军政部选派赴日见学武官团，中央陆军训练处指派我去参加。到日本东京后，首先赴皇宫去签名，对日寇天皇裕仁“伺候天机”，又参加裕仁的御苑观樱会，又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访问了近卫师团等。到大阪、名古屋各地参观了飞机制造厂、造船厂等。到京都参拜了桃山御陵和橿原神宫等地，4月归还伪满。到长春写了游日的感想，对日本的感激、感谢、钦佩的衷忱，交到顾问部后就回到了中央训练处，在军官集会所对全体军官80名作一小时的报告，说出本人到东京进宫“伺候天机”，又参加观樱会的荣幸，由参拜靖国神社等，感到日俄、中东两次战役的伟大意义，日本军人以皇室为中心忠勇爱国的精神。在大阪等工业地带参观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参拜京都各神宫感到日本敬先崇祖，天皇万世一系世界无比的国体。又日本各地人民对满洲国的关心，对满洲国人的亲切，充分表现了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这是我尽力给日寇作宣传，用这些毒素迷惑人心的罪行。

1937年9月至1942年7月在伪满治安部军政司人事科长任内期间。伪治安部的人事科，以前名为军衡课，1938年7月部内机构改革，方易名人事科。我在科长任内所办理的人事业务，仍继续治安部既定的人事方针，免退旧有人员，补充日系军官，培植由伪满养成的新进干部，逐渐树立伪满军新的组织系统。其次是为加强对境内反满抗日军队的讨伐，进行改编，同时增设特种部队：飞行队、高射炮队、通信队、工兵队、自动车队等，以备援助日本军

的作战,以这种目的实行了人事的强化。

一、1937年9月以前,伪满治安部已任用日系军官候补者700名,已逐次补充为上尉;满系军官候补生700名,已逐次补充为中少尉。我继任人事科长后,按人事的既定方针,尽先拔擢这些日满系新进的干部,使日系军官候补者占据了中少校的中坚层主要职位,满系军官候补生遍布各部队上尉少校级的职位,伪满军由此逐渐树立了有组织的军队系统,它的性质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军。

二、1937年9月至1942年3月,我的人事科长任内4年6个月的期间,伪满治安部共任用了日系军官候补者计900名,满系军官候补生计1200名,伪满军的人事依人事方针又进一步的强化。日系军官候补者经治安部军事顾问部向日本军募集日本国内的干部少尉候补生,然后再受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一年的军事教育,有强固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所以采用这些人作为军队的基干。满系军官候补生是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入队实习4个月,再受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一年的军事教育,在伪满教育制度下培植的青年,作为军队中满系军官基层的组织。1942年中,日系军官候补者满系军官候补生总数3500名;此外还有兴安陆军学校所养成蒙系军官候补生有400名,共3900名,已占伪满本科军官5800名中的67%。我以人事科长给伪满执行了强化人事的方针,任用了这些适合日满共同防卫上要求的新干部,去危害祖国和人民。

三、伪满治安部随新进日满系干部的任用,采取逐次淘汰旧式军官的方针。在我人事科长任内,每年受整理的军官300名至450名,由1937年9月至1942年3月共免退了伪满各阶级的军官共2000名。由整理所生的空额,上尉至中校级的军官半数以上以日系军官候补者出身者升补,中少尉级大部分以满系军官候补

生补充，目的在人事上增强日系军官的职权。还渐次补充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位，改变伪满原来军队组织系统。人事科实施整理和晋级的时候，虽按服务成绩学识能力的条件施行权衡，但必经过顾问部的考察，将官级和侍从武官的人事必经关东军的承认。人事科唯命是听，作日寇的帮凶。凡认为对伪满不忠诚不可靠的，就随整理期间被淘汰，以整肃军队的内容。我在人事科长任内，运用人事，巩固伪满的军队，帮助了日寇对伪满军事上的控制。

四、伪满上校级至中将级的日系军官约占编制定员20%。伪满军创立初期，曾招聘日本预备役将校为军事教官，以后制定了特别任用的制度，军事教官改授伪满军官阶级，列在统率系统之内，和伪满军人同等待遇。实质上是助理军事顾问执行任务，在中央机关、教育机关掌理各部门实权，规划一切事宜。我的人事科长任内更行强化了，高级日系军官的人事，任用多数的机关首脑、部队长官。1937年9月至1942年3月的期间内，日系将官主要者：军政司长真井鹤吉中将，军官学校长南云中将，训练学校长梅林太郎中将，飞行学校长野口武雄中将，江上军训练处长落合镇彦少将，宪兵训练处长田中收中将。在部队方面主要者：第六军管区司令官美崎丈平中将，靖安师长赤泽中将，兴安师长野村登龟江中将，兴安骑兵旅长石井佐吉少将等。在这些机关里，伪满军官占极少数，尤以教育机关严格的实施奴化教育，养成服从亲近日本人的思想。此外特种部队如飞行队、高射炮队、通信养成所、通信队、鸽通信队、自动车队等，为供日本军使用便利，并且目的上也是协同日军作战的，所以由部队长以下多数都是日系军官。伪满军队的性格上日益接近了殖民地化的军队。这些高级日系军官，因按各时期的需要上关系，进退的也很频繁。在我人事科长任内，由伪满军创立时开始计算，共采用了日本少将、大中少佐级将校约140名，

至1942年3月仍保持在各种职位的还约有70名。我以人事科长执行任免,任用了许多侵略积极分子,是为日寇服务,加强奴化和控制伪满的军队。

五、1939年3月伪满为强化三江、通化地区对抗日联军的讨伐,成立了第七第八两军管区。本年的人事运用也在增强第七第八军管区的讨伐力量,选择有讨伐经验、指挥能力的各级军官,目的专在消灭这两地区内抗日联军的活动,伪满准备新的开拓和开发政策。

第七军管区特派资深中将张文铸为司令官,日系赤泽少将为参谋长,部下独立旅3个,旅长邓云章、张魁英、姜鹏飞;混成旅2个,旅长周大鲁、马恩波;教导队长林宽一,均是久经讨伐,情形熟习,经验丰富,部下各级军官也是选拔精干人材,使他们担任这方面的讨伐。

第八军管区特派参谋司长王之佑中将为司令官,日本陆军大学出身的赫慕侠为参谋长,部下混成旅1个,旅长王士瑀;步兵旅2个,旅长李裕平、高明,教导队长赵振邦等,均是由第一第二两管区中选择在通化一带作战具有经验的人物,部下军官也是曾经选拔的,使他们担任这方面的讨伐。

我以人事科长执行治安部重点讨伐第七第八两军管区内抗日联军的方针,加强了这些方面的人事,危害了抗日联军的活动,我有严重的罪行。

六、1938年秋,伪满通化地区讨伐司令李寿山,司令部附少将须达顺直助和部下团长赵宝源隶下的一个步兵团士兵约1200名,全部解消伪满的军籍,军官90名也全行退职,由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协议下,把李寿山这一部队由伪满输送到冀东地区,再由华北驻屯军输送到山东青岛附近,李寿山自称绥靖军总司令,扰害胶东

一带，帮助日寇向中国进攻。1939 年团长赵宝源反正，军队受抗日军的掩护，以后加入了沈鸿烈的部队内，李寿山等逃回伪满，这阴谋以失败而告终。我以人事科长给李寿山及其部下办理退职手续，又给他们请发退职金，就是我给日寇服务危害祖国的罪行。

七、1935 年伪满军政部成立独立骑兵队，这部队是白俄部队，受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区处，由特务机关招募和训练，进行阴谋活动，专对苏联作间谍行为，或暗杀破坏等工作。队长浅野中校以下日系军官 12 名，白俄军官 6 名，白俄兵 200 名。1938 年后改称浅野部队，驻哈长线松花江站，1943 年脱离伪满军关系，改为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隶属的部队。我在人事科长任内，对浅野部队曾处理一切任免和晋级的业务，是我给日寇推行特务工作的罪行。

八、1942 年 3 月，伪满第九军管区军队改编，兴安骑兵各团所编余的蒙系兵 300 名，由王爷庙日本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接收，编成在特务机关直属下的一种特务部队，调伪满军日系矶野少校为队长，和蒙系军官上尉以下共 12 名到这个部队里服务，称名为矶野部队，驻在王爷庙。它内容是作特务的训练，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间谍的活动，遇到作战时到敌方作破坏扰乱的动作等。至本年12 月改为日本关东军直属部队，撤销了在这部队服务的伪满军官，均改为由日本军派遣，命名为“五三”部队。在金川耕作成立这部队时，伪满治安部曾指示第九军管区要一切援助，人事科也承认了金川耕作调用蒙系军官到该部队服务，是我在人事上援助日寇设立特务部队的罪行。

九、伪满洲国在 1935 年行第一次叙勋，1938 年行第二次叙勋，1941 年行第三次叙勋，1945 年行第四次叙勋。这是伪满的定期叙勋。治安部在叙勋时，所有在伪满军内的军官和军用文官均行功绩调查，各部队均成立功绩调查委员会。凡参加作战、讨伐一

切活动第一线和后方的勤务，参与计划或规划业务，不论集体行动或个人的活动，均作为勋功给景云勋章。服平时业务，参与计划规划，服务勤劳有成绩的，均作为勋劳给柱国勋章。各部队功绩调查后，均送治安部交中央功绩调查委员会审核，交人事科执行，人事科送国务院恩赏局裁定。1937 年 9 月至 1942 年 3 月我的人事科长任内，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的叙勋，共发出由勋一位至勋八位的景云章 2500 个，柱国章 1200 个，共 3700 个。

又在伪满军内制定一种武功奖章，由治安部大臣授与，以奖励在战场上有战功的人，不分军官士兵的等级，一律授奖。如冲杀多数敌人俘虏武器军用品等，以及率先夺取要地，坚强据守阵地等，均作为特殊武功发给奖章。武功奖章分三等，授与奖章时并附奖金，计一等 200 元，二等 100 元，三等 50 元。凡有功的人由部队长呈报，治安部经军事科审查，人事科裁定，治安部大臣发令。我人事科长任内，共发出一等武功奖章 16 个，二等奖章 50 个，三等奖章 140 个。

以上发给勋章奖章均经人事科办理，是我给伪满执行奖励危害祖国残害人民帮助日寇进行侵略的人，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我有严重的罪行。

1942 年 3 月至 1943 年 6 月在伪满第一军管区参谋长任内罪行。

伪满第一军管区当时管辖区域是奉天、锦州、四平 3 省，认为治安确立的地区，为工矿地带，日本作战资源的策源地。本军管区人口繁庶，应征的国兵额数约占全国征兵额 40%。在我任期内经过事实是：

一、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对本军管区的防卫，应受关东军南部防卫司令官的区处。在我参谋长任内，出席南部防卫司令官国

分少将所召集的防卫会议3次。指定伪满第一高射炮队隶归防卫军的防空队司令指挥。1942年8月在抚顺、鞍山、本溪3地各展开一连,防卫美机来侵袭。12月又撤出抚顺、本溪两地的阵地,全部炮队在奉天、鞍山两地展开,掩护上空。指定骑兵第39团隶归防卫军的地区大队指挥,担任文官屯、于洪屯一带的警备,警报时防止这一带人民暴动的发生和敌人空艇部队降落时即行阻击。指定驻奉天伪满的军事学校、工厂归第一军管区司令官区处,警报时作自体的防卫。又在1942年9月、12月参加了防卫司令部的防空演习两次,军管区的各队伍,均按指定就了配置(高射炮队除外),按防卫司令部的指定作了演习。这是我参加日寇防卫计划,驱使伪满军给日寇保卫作战资源地区的罪行。

二、1942年12月,我召集本军管区各部队长在奉天司令部内行图上战术的教育,演练在一个地区内的战时防卫动作,主要是针对热河方面人民解放军,若侵入本军管区境内时,地区队的战斗动作及搜索敌情的方法,对工业建筑物和交通线的掩护方法等。又在东陵附近作对空艇降落部队战斗的演习一次。这是我教育伪满军队,协助日寇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

三、1942年12月第一高射炮队进入阵地后,为增强阵地工事,报请治安部增加经费80万元,在文官屯增筑掩蔽舍营、战斗指挥、通信所的掩蔽部等。这是我强化伪满高射炮队的防空战力的罪行。

四、1942年8月依伪满治安部的指示,讲习唯神之道教育。在南湖开设神道讲习所,召集各部队长各处长来所修习共计10日。由治安部精军科派来科员2名,讲习日本神道的起源,并传习祭神的各仪式典礼,又到奉天神社去实习,都要庄严诚敬!又特请伪满祭祀府奉祀官袁庆清讲伪满和日寇神道上的各种关系,司法

部大臣张焕相来讲就神道上日满一德一心应有的认识等迷惑思想的理论。修习完了后,我指示各部队长把修习的要旨贯彻到部队的全体。由此后部队教育内增设了神道教育一项,并各部队内都建立了神庙,要按期按月的举行祀典。这是我给伪满推行荒谬的神道教育,以日寇的神国,天皇是现人神的毒素,迷惑部队全体思想的罪行。

五、伪满第一军管区每年8月国兵检查时共开设16个征兵检查区。本年应受检查的壮丁80000人,合格国兵的人数11,000人。我曾到奉天、锦州、兴城、沟帮子各检查现场视察,目的是在监察各征兵官有无徇私舞弊,是否按学历、家庭财产状况,身体康健程度的条件严格的检查;应征的壮丁,有无冒名顶替避忌兵役的情形;地方征兵官是否认真,各国兵事务担当人员是否确实执行任务等。看到了人民在严峻法令之下不敢逃避,各征兵官也均严格施行,也丝毫不加宽假。我视察回来向军管区司令官报告各征兵区的检查状况良好。这是我监督国兵检查,强迫人民去给伪满服兵役去作炮灰的罪行。

又于本年12月到四平兵事办事处视察国兵业务。据办事处长张贵卿报告,处员村田少校曾到梨树、怀德两县对青年训练团、协和会、县公署、区公所及各村国兵事务人员作国兵法宣传,说伪满自国兵法实施后军队中的成绩及地方协力的情形,然后又对区村办事人员教育调制壮丁名簿的方法。所以办事处的征兵事务进行的顺利,以及地方警察也均协力,所以违法逃避的事情很少发生。我当时嘉奖了他们,并设宴招待了省内国兵事务关系人员,感谢他们援助,并希望今后军政联系更加紧密。这是我给伪满忠实执行国兵法,加紧控制人民,协力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罪行。

1943年6月至1944年12月在伪满驻南京大使馆武官任内

罪行。

我于1943年6月发表驻南京伪满大使馆武官后，伪满军事部次长为真井鹤吉，他指示我：伪满和伪汪没有直接军事上的关系，武官要随大使馆行动，军事上没有具体任务，遇事可向日本驻南京派遣总军司令部连络。我在任内一切罪行的活动是如下列：

一、1943年7月25日，我由伪满出发，27日到北平，访问伪汪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和绥靖总署，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外交关系方面。又接见了伪汪方面和日本的新闻记者，我说明伪满自国兵法实施和军官学校的成立，军队素质有显著的改善，又成立了各种的特种部队，装备和训练均是按日满共同防卫的要求而组成的，现在全国都是努力协助大东亚战争，为完遂“圣战”(就是侵略战)而奋斗。这是我作为伪满代言人去表示伪满帮助日本进行侵略战争。

二、1943年8月我到任南京，由伪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引见汪逆精卫。我说奉令来驻南京，愿尽力两国的提携友好。汪说他很欢迎伪满派我来充驻南京大使馆武官。我退出后访问外交部长褚民谊，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鲍文越，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今后我的罪行活动由此开始。

三、8月3日我到任后，就访问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几太郎，目的是在求他对我指示今后的行动。松井指示要我和伪汪政府的关系人员保持满汪友好提携的交谊，并向他们介绍伪满军队发展的状况，有话可和参谋副长落合少将去谈，有事可和第一科长报导部长接洽。我就依他指示给日寇作鹰犬进行罪行的活动。

四、我把伪汪政府情况供给日寇作情报。我依松井的指示和日寇总军参谋副长落合少将进行了3次谈话。第一次在1943年8月23日，他使我在伪汪政府留意反共和平的动态和他们对日本

的态度。第二次在 11 月，我和落合说，伪汪政府是利用日本的支持进行贪污，各将领的反共是为扩充势力，占领地盘，实际是在和平政策上，并没有什么力量。落合说，他们只要能反共就是好的，日本为达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是诚心诚意援助伪汪政府，他们也是与日本合作，前途才有发展，希望我对这点上使伪汪方面的人能了解才好。我答应愿意尽力。第三次在 1944 年 8 月，日本军进入桂林之后。我会见落合，说伪汪方面的人都很盼望日本军早日攻下重庆。落合说，攻下重庆日本有足够的力量，但伪汪政府在华中和西北华北等各方面是不是要日本去尽力的援助呢？所以就得全面考虑问题，日本是愿意伪汪自己有力量的，这就是日满华(汪)的关系。谈话后我即辞出。这是我给日寇供给情报，支持他侵略中国的罪行。

五、我搜集各方面的反共情报和各地军事情报向伪满军事部作报告。我向伪满军事部提出的情报是由日寇总军报道部、伪汪军事委员会日本军事顾问部、伪满洲国通信社及我个人的观察所得。补佐官西村喜寿担任各方面的连络，搜集的业务随时报告到伪满军事部。计有：

1.1942 年日寇太行山系作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逐渐加强在山东方面活跃状况和日寇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状况。

2.1943 年以来在西安的胡宗南军，奉蒋命令以防日寇为名，逐向陕北及晋北移动，对延安取包围态势，延安方面已将刘伯承军① 由山东调回，国共冲突有暴发之势。日寇对此在战局上抱乐观。

3.1943 年秋，蒋介石方面的旧西北军将领庞炳勋、孙殿英通电反共和平，加入伪汪政府后，把军队开驻河南新乡一带，阻止了

① 当时刘伯承仍在山西。——编者注。

共产军进入豫省的西北部，又和伪汪胡毓堃在陇海线上的绥靖军联合，免除了陇海沿线各地所受共产军的威胁，情势好转。

4.1943年冬，美机袭击上海、汉口各地的情形。又美国的B29飞机着陆场的所在地及飞机性能的调查(以上由日寇总军报导部得来的)。

5. 驻北平补佐官伊贵亨转报由日寇华北驻屯军得来的第八路军的沿革及编制，各地边区地区部队和民兵编成及组织的情况。

6. 伪汪李长江的第三方面军加入反共和平时的经过，现在江北方面新四军活动状况，伪汪各地驻军的情形。

7.1943年秋庞炳勋、孙殿英等参加反共和平的经过和他的军队状况，说明以前抗战士气的消沉，现在参加了和平士气的旺盛等宣传文字。

8. 伪汪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加入反共和平当时的经过，这个军队富有地方色彩，土豪劣绅控制人民和扰害地方的各种情形。

9.1944年南京附近新四军活动状况，日本军协力伪汪警卫师讨伐的状况，人民对伪汪军队憎恶的感情。(以上由伪汪的日本军事顾问部得来)

10.1944年2月汪逆患病经过和赴日就医情形。

11.1944年10月汪逆精卫病逝后，陈逆公博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伪汪政府的情形。(以上由国通社得来)

12.1943年10月伪汪军官学校毕业由汪逆亲授毕业证书，并对学生讲述和平运动说，和平是救国，反共是救民，日本诚意与中国合作，蒋介石应速反省走和平的道路。

13. 伪汪政府各地驻军的状况，各军队旧来的系统，各将领对和平反共的态度。

14. 重庆方面军队何柱国、于学忠部的暧昧态度，时派代表往

来南京，在1944年中和伪汪及日本军连络的情形。

15.1944年10月于学忠部下卫队旅长荣子恒参加和平反共，率部归入伪汪政府，并已扩编成师，即日开赴山东作战。（以上直接观察所得情报）

六、我尽力于日满汪的提携友好，替日寇作谋略的宣传。我和伪汪政府主要人常往来的有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鲍文越，军事参议院长兼军官教育班长萧其煊，南京海军要港司令尹祚乾等常作交际上的酬应。我宣传伪满军队现在如何的发展，伪满境内治安已经确立，抗日联军受伪满军的讨伐已无法活动，迥非旧东北军时的情形可相比拟的。又说日本如何援助伪满建国建军，才能得这种成就。现在内外形势，满、汪均待日本援助，所以得互相提携友好。他们也都认为只有靠紧日本，和平运动才有出路，日满汪诚意合作是必要的。这是我对伪汪政府给日寇作谋略宣传的工作，支持它的侵略政策，危害祖国的罪行。

七、我对伪汪政府人员交换反共经验。伪汪军官教育班是它的重要军事训练机关，所受训练者都是现职的团长、营长等人。教育班内有几名教官、队长、教育主任等是伪满的退职军官，在班内主持教务，一切也都采取伪满的经验，常向我询问伪满教育近期的状况。1944年11月教育班的教育长萧其煊曾向我询问伪满教育内容，我说伪满能消灭三江、通化地区的抗日联军，都是教育的实际成效，教育不尚空谈，伪满采用剿匪战术，就是这种目的。他要求我把剿匪教程介绍给他们，我答应向伪满军事部请求。当我12月转任时，还交派补佐官西村喜寿继续给办理。这是我把反共经验介绍给伪汪方面，帮助日寇进行侵略中国的罪行。

八、我向伪汪政府人员推荐伪满退职军官，给日寇作帮凶。伪满退职军官，多被日寇利用到中国给它做帮凶，表面为介绍职业。

我在驻南京大使馆任内,曾行了多次的斡旋。因伪汪军官教育班需用人员,我把伪满退职少将纪锡海、上校姜学博介绍给萧其煊,曾派少将教官;又少校刘超充派上校教练队长。伪满第一高射炮队长退职,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文卓,由日本顾问介绍,经我向伪汪的总参谋长鲍文越斡旋,得派伪汪军事委员会军令厅长。同样曾充伪满团长退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魏传镛和于同遇,也是经我斡旋,魏传镛派伪汪陆军部军械司长,于同遇派少将军事参议。又伪满日本顾问向南京伪汪军事最高顾问柴山推荐伪满退职宪兵总团司令官王过甲中将充伪汪武汉行营的清乡局长。柴山认为也必须先在中国(伪汪)方面斡旋方为圆满。经伪满驻南京大使吕荣寰向伪汪内政部长陈群,我向伪汪总参谋长鲍文越斡旋,得以发表。这是我向伪汪政府人员推荐伪满退职军官给日寇作帮凶危害祖国的罪行。

1945 年 1 月至“8.15”在伪满军事部参谋司长任内的罪行。

一、1944 年 12 月伪满军事部为援助日寇华北驻屯军在冀东地区对人民解放军作战,编成铁石部队等,于本月中在各集结地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编成部队如下列:

铁石部队:骑兵 1 个旅,旅长岩田熏,部下第 9 军管区的兴安骑兵两个团,团长郭文通、呼克巴图尔。

铁心部队:步兵 1 个旅,旅长粟野义雄,部下第 7 军管区步兵 1 个团,团长刘德溥。第 3 军管区的骑兵队(两连编成,骑兵是以后编成的)。

通信队:本部队长岛田少校。独立通信队的有线通信 1 排(电话机 6 架),无线通信 1 连(无线电台 2)。第 9 通信队的有线通信 1 排(电话机 6 架),无线通信 1 连(无线电台 2)。

自动车队(独立自动车队的装甲自动车 10 台,载重自动车 60 台)。

独立宪兵分团(伪满首都宪兵团派出军官 4 名,宪兵 24 名)。

连络部:由军事部编成,部长南博上校,参谋副官 7 名,军需 2 名,军医 1 名。担任军事部与各部队及加藤部队长间的连络。

此外有铁路警护队 1 个旅,旅长富永少将,率铁路警护 1 个团,担任由山海关至天津间的铁路警备任务。

1945 年 1 月各部队集结完毕,即开赴冀东地区,隶归日寇华北驻屯军加藤中将指挥之下。

当时部队的配置是:

铁石部队:驻滦州,2 月移驻铁道南刘各庄,对抗日根据地作战,5 月向乐亭县前进,6 月呼克巴图尔团受解放军袭击,损伤军官兵 70 余名,该团又撤至滦州。

铁心部队:驻榛子镇,掩护唐山伪汪冀东特别区政府,在开滦地区防止解放军侵入,作游击动作,和解放军频繁接触。但两方均损伤不大,解放军死伤 20 余名,伪满刘德溥团阵亡少尉 1 名,兵 30 名。共接仗 10 余次。

两部队警备区域以平奉铁路为界限。

连络部:驻唐山,通信队、自动车队、宪兵分团均归它区处,受日寇加藤部队长命令,对各方面连络。

我于 1945 年 1 月到任后,即给铁石部队等办理输送,把军队运到冀东,交付与日寇加藤部队长。本年 3 月又由第 3 军管区编成骑兵队增加铁心部队的战力。5 月又行了弹药的补充,计步枪弹 80 万发,掷弹枪弹 8 万发,迫击炮弹 24,000 发,军用人马粮食 25,000 吨。接济军用物资,以供伪满军队进行残害人民。6 月又由伪满文化协会在哈尔滨、奉天两地募集歌手和杂技艺员男女 20

余人赴唐山、滦州、榛子镇前方各地娱乐演唱，以慰问伪满的士兵。又由伪满料理营业组合募集日本酌妇4名、伪满窑娼14名送至唐山伪满军人俱乐部内，以慰安前方战士。以上均是我支持日寇和人民解放军作战危害人民的罪行。

二、1945年4月伪满军队行编制改正，伪满军事部最高顾问受关东军的指示，由顾问部作成伪满军的编制改正案，交军事部在伪满军管区参谋长会议席上，由参谋司长发表。改编的内容是：各军管区的步兵团均缩小编制，收缴大部分重机关枪、轻机关枪、掷弹筒、迫击炮等重火器，甲种步兵团只留一部分，乙种步兵团全部缴回。骑兵除第9、第10军管区外，其余各军管区骑兵全改为步兵。炮兵除靖安师留山炮两连的1个炮兵营，和第9第10两军管区各有1个山炮两连的炮兵营外，取消所有的全部炮兵。工兵共成立31个工兵大队，但本年中只成立21个，明年全部编成。辎重兵全部共成立17个辎重大队。取消伪满部队长的通信权，电报电话都得经过各地的日本关东军代发。以上改编的部队，但驻在热河境内的暂时不行改编。其余受改编部队缴回的武器均送兵器厂保管。改编的目的，增加工兵辎重等，作为日寇服劳役的奴役部队。取消第一线作战部队的重火力。是日寇控制伪满军，奴役国兵的双重政策。由我进行军队改编，就是我给日寇执行这个政策的罪行。

三、1945年6月，参谋司长给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发和最高顾问秋山义隆联署的命令一件，命令第6、第11、第8、第3、第10军管区司令官各该军管区的部队即配属现地关东军的指挥，军管区司令官受所在地关东军最高级的长官区处。6月各军管区的部队即出动，在珲春、密山、北安、黑河、齐齐哈尔、海拉尔各地给日本军构筑阵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战争。是我给执行命令传达的罪行。

四、伪满军在热河和人民解放军作战，第5军管区内有步兵4个旅，又由第3军管区配属1个步兵旅，第1军管区步兵两个团，第2第4第6各军管区配属各步兵1个团，总兵力有5个旅又5个独立团，占伪满全兵力的半数。第5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在日寇西部防卫司令官区处之下，讨伐境内人民的抗日，防止冀东、平北、察南各地解放军的进入伪满，同时还协助日寇的华北驻屯军进入长城线内，对抗日根据地进攻，热河方面的军事行动是伪满军的主要任务。1945年5月，第5军管区司令官举行本军管区的旅长会议，我奉最高顾问秋山的指示出席这个会议，目的是在听受第一线的情况，伪满军队的情形和人民解放军活动的状况，回来报告，再准备伪满军今后对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方针。我到热河后即参加这个会议，得知在伪满热河境内的讨伐是在丰宁、古北口、青龙3个区域内，兵力的重点就在这些方面，尚能防止人民解放军的侵入，交战18次，使人民解放军伤亡30余名。又第5军管区的于泽溥旅由古北口进入密云县一带，戴元旅进入冀东地区，协助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攻，但并没有和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接触，没什么战果。会议后，我携同旅长于泽溥到密云视察，伪满军队在各地行游击，无何发现。我往返共计10天，回到伪满军事部后即向最高顾问秋山义隆报告。我的判定，现下伪满军能阻止人民解放军入境，但解放军行动日趋活泼，伪满军屡受袭击，若要进取还得增加兵力。本年军队改编，虽热河的队伍还照旧编制，但能影响今后热河作战以及伪满兵力使用的关系。秋山义隆对我的意见答复是与关东军计议后再说，并无其他表示。这是我给日寇执行残害人民消灭人民抗日军队，保卫伪满西南国境，协力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罪行。〔下略〕

119，2，1170，1，5

佟衡自述:伪满洲国军的沿革及组织概况

(1954年7月24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寇所培植的伪满洲国,它的军队大部分是由残留的旧东北军队组成,因此“九一八”前夕东北军事情况乃对于事变,对于伪满的建军也发生一些影响。概略如下列:

甲、“九一八”前东北军概略情况:

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成立政务委员会,张学良为主席。又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为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驻黑副司令,统率东北的军队。当时还是军阀割据的形势,占地盘,养私兵,名义上隶属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之下,而军政上,用人上,是各省“各自为政”,并不是统一的。各省军事概略情况是:

辽宁省: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设在辽宁,也就是辽宁驻在的军队是东北边防军的主力。

国防军有步兵旅二十个,骑兵旅四个,炮兵旅三个,兵力约二十五万;武器装备均甚充实,沈阳设有兵工厂及航空队、战车队等近代化的部队,当时为全国之冠。军队大部分由张学良率领入关作战,分驻北平附近及河南、河北一带。留在东北的有:

王以哲旅驻辽宁北大营,孙德全旅驻磐石、北镇一带,张廷枢旅驻锦州,何柱国旅驻山海关。以上四旅步兵驻北宁路沿线一带。骑兵第三旅长张树森驻通辽一带。辽宁东山咀子驻东北陆军讲武

堂和教导队等共有学生二千名,部队一千名。军事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长荣臻代理,省政由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代理。

南满铁道沿线,除辽宁、长春两地有中国的驻军在都市(不属于日本的附属地)驻守外,其他沿线各地并无中国驻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驻旅顺,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驻旅顺、海城、辽阳、铁岭各地,铁道守备队有六个大队分驻沿线,保护铁路。

辽宁省防军有两个镇守使。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驻山城镇,隶下辽宁省步兵团三个,分驻山城镇、通化、安东一带;辽宁省骑兵团一个驻西丰、东丰一带。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驻洮南,隶下辽宁省骑兵团四个,分驻洮南、洮安、突泉、瞻榆一带。这些军队担任管辖区域内的剿匪,编制比国防军缩小,武器装备均稍差。当时辽宁省境内除两镇守使管区外,各地并无何匪情。在警务处下有公安大队,每队约五百名,系武装警察,不属于军队,担任各县境内治安的维持,归各县长指挥。

吉林省:驻吉边防副司令公署设在吉林省城,隶下东北边防的国防军有步兵旅三个,骑兵旅一个,炮兵独立团一个。步兵一旅驻吉林、长春,一旅驻哈长铁路沿线,一旅驻哈绥铁路沿线。骑兵旅驻农安、扶余、伏龙泉一带。炮兵团驻长春南岭。设有训练处,为国防军的节制机关。(兵力三万人)。

省防军:全省划分五个地区,每地区设一个镇守使,隶下有吉林省防军的步兵(混成)旅一个。旅三团制,附骑、炮兵各一连,但编制较国防军缩小。旅长由镇守使自兼。(兵力二万五千人)。

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驻长春,军队配备在长春、伊通、双阳、磐石、舒兰、桦甸、濛江一带。

延吉镇守使吉兴,驻延吉,军队配备在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敦化、额穆一带。

滨江镇守使丁超，驻哈尔滨，军队配备在哈尔滨、五常、阿城、珠河、苇河一带。

依兰镇守使李杜，驻依兰，军队配备在依兰、勃利、佳木斯、富锦、饶河一带。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驻宁安，军队配备在宁安、穆棱、东宁、密山、虎林一带。

此外有吉林卫队团，驻吉林省城；吉林山林警备队三个营，驻延寿，苇河一带。

地方上的武装团体：每县有地方保卫团约五百名至一千名，归县长指挥，担任剿匪及地方治安的维持。省内设有保卫团督练处，归吉林警务处长兼任。这是地方经费，不属于军队，归吉林省主席管辖(军队兵力五千人)，全省兵力六万人。

黑龙江省：驻黑边防军副司令驻齐齐哈尔，直接统辖东北国防军步兵两个旅，骑兵一个旅，炮兵一个团。步兵和炮兵随万福麟入关作战，骑兵旅由旅长程志远率领在克山、海伦一带剿匪。(兵力二万人)。

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驻黑河，部下黑龙江混成一旅驻黑河、瑷珲一带。海拉尔警备司令兼东铁护路军哈满司令苏炳文，部下一个混成旅驻海拉尔至安达一带。哈满副司令张殿九，部下一个旅驻扎兰屯至满洲里铁路沿线一带。此外有吴松林的黑龙江步兵一旅驻望奎、拜泉一带，担任地方治安的维持。黑龙江卫队团驻齐齐哈尔附近。(兵力二万五千人)。

此外，又由军队改编七个骑兵保安大队，每个大队约等骑兵一团的兵力，由保甲总办公署统辖，归黑龙江警务处长兼任。各县有保卫团，是地方武装团体，也归警务处长管辖，均不属于军队，而隶于省主席之下。(保安大队五千人)，全省兵力五万人。

热河省:国防军只辽、吉、黑三省编制完成,用中央的队号。热河省没有国防军部队,只有热河省防军的部队,约步兵四个旅,骑兵三个旅,一九三三年热河作战由汤玉麟率领,撤退至关内遣散。

兴安屯垦军: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兴安屯恳督办公署,派邹作华为兴安屯垦督办,在兴安岭、索伦一带屯垦。屯垦军旅长苑崇谷部下步兵两个团,炮兵一个团,驻洮安、王爷庙、索伦一带。(兵力五千人)。

东铁特别区:由中东铁路的关系,划铁路沿线为特别行政区,在哈尔滨设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为保护铁路又设东铁护路军总司令部,和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均隶属于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平行的机关。当时的特别区行政长官是张景惠,护路军总司令是张作相兼任。其下设长绥司令(长春、绥芬河间),由丁超兼任,哈满司令(哈尔滨、满洲里间),由苏炳文兼任。护路的军队不另设,由吉、黑两省军队担任。

东北境内的蒙古地区:满清时代划分蒙古为内外蒙,内蒙又分为东西蒙,东蒙在东三省境内,西蒙在热、察、绥三个特区境内。一九〇二年东三省改为行省后,各蒙旗仍是各蒙古王公的领地,又如海拉尔一带不属于王公的领地,设有蒙古副都统管辖。中华民国成立后,仍沿旧制,但逐渐在蒙旗内设置县公署,各王公开放自己的领地租给汉人,于是扩大了各县的行政区域。但蒙古人聚居的区域,仍有蒙旗存在,归蒙古王公治理自己的领地,各旗设有保卫团,由二三百名至五六百名。

以上情形,东北的军事政治名为统一,实际仍保持军阀割据的形势,由军阀掌握了军政实权,军费都是由本省供出,担负力的大小定出军队的多寡,并且用人权都把持在自己的手中,不受政府的节制。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是因人设职,因人设事,所以造成不统

一，无计划，盲目的各种现象。

东北的海军：在一九一九年西伯利亚出兵时，中国海军的舰艇四艘，由苏联领内的黑龙江溯航到了松花江，一九二〇年成立吉黑江防舰队。一九二五年沈鸿烈到东北，在葫芦岛设立航警学校，训练海军学生，并由商船改造舰艇五艘，扩充了江防舰队。一九二七年渤海舰队投归东北，张作霖派沈鸿烈为海军司令，司令部设在奉天，统率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一九三〇年的江防舰队长是尹祚乾，舰队计有舰艇六艘（一九二九年中苏在国境冲突，被苏军击沉三艘）。

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的情况概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寇开始侵略的军事行动，当时东北各地的情况，分述在下面：

一、辽宁方面是：

1."九一八"夜，日冠在沈阳柳条湖使日本军破坏了南满铁道，借此挑衅，向北大营的王以哲部队进攻。王以哲旅和驻东山咀子的讲武堂等部队均向山城镇及海沦方面撤退，日本军占领了沈阳城，拘禁了省主席臧式毅，军令厅长荣臻撤退到锦州。王以哲的军队到山城镇后，即奉北平张学良命令撤到北平，十月王以哲率部入关。

2.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在山城镇集结兵力，请命撤退，后奉张学良命令暂缓。这时驻安东的团长姜全峨和日寇有勾结，被团附唐聚五驱走，把军队带到通化，纠合义勇军起来抗日，有王凤阁、邓铁梅等响应。本年东边一带就有数万义勇军。于芷山被日寇策动，接受了武器弹药金钱等的供给，就扩编了军队，讨伐唐聚五等的义勇军。日寇把辽西地区交付了于芷山。

3."九一八"后，辽东各地也起了多数的义勇军，因缺乏组织和

临近南满线,同年即渐消灭。日寇又利用张宗昌旧部王殿忠、李寿山等人纠合失意军人及残匪组织军队,并使日本浪人和田劲招募靖安游击队,利用中国人作背叛祖国的行动。

4.十月,荣臻奉张学良命令在锦州成立辽宁临时政府。十二月日本军进攻北宁线的东北军,孙德全、张廷枢、何柱国等军队向北平方面撤退,锦州临时政府取消。

二、吉林方面是:

1.一九三一年七月,驻吉边防副司令到锦州为父治丧,参谋长熙洽代理军政事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天尚未明,日本军袭击长春南岭和二道沟的兵营,二十二日日本军多门师团向吉林前进,熙洽投降,日本军遂占领了吉林。二十三日熙洽宣告脱离东北政府,吉林独立政府成立,熙洽就任军政长官。

2.驻吉林的部队张作舟旅,冯占海的卫队团,向榆树、阿城方面撤退。

3.吉长镇守使李桂林,延吉镇守使吉兴均附和熙洽,十月吉兴部下营长王德林在额穆、敦化一带起义,组织救国军,号召人民抗日。十二月受日寇、熙洽、吉兴各方面讨伐,遂转向宁安方向活动。吉林、长春附近的义勇军,因熙洽得日本军的援助不能积极行动,一九三二年渐归消灭。

4.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使熙洽援助于琛澄编制军队准备进攻哈尔滨,十二月熙洽派遣于琛澄为剿匪军总司令,旅长马锡麟为副司令,攻下榆树后,再进攻哈尔滨。

5.十二月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在哈尔滨组织吉林自卫军,声讨熙洽,阻止日本军入哈尔滨,集结了部队。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哈尔滨香坊击破了于琛澄的军队,日本军为援助吉林政府,派多门师团攻击哈尔滨。一月下旬丁、李的军队和日寇接

触，因战斗不利，向珠河、方正方向撤退。三月吉林自卫军前敌总指挥王之佑投降熙洽，丁、李等军队向依兰撤退。

6.绥宁地区的军队由团长张治邦起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加入了自卫军，与王德林的救国军联合共同抗日。

7.日本军进入哈尔滨后，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表明与日本和熙洽合作。

三、洮辽方面是：

1.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在"九一八"后受日本方面的策动，于十月中旬接受日本军供给的步枪三千枝，扩编了自己的军队，共编成了八个支队。十月下旬宣布脱离东北政府，攻取黑龙江省，军队向齐齐哈尔进发。这时黑龙江的军队已有准备，并且屯垦军苑崇谷的部队也加入作战，张海鹏的军队不能前进，黑龙江的军队已在桥附近构成了阵地。日本军为援助张海鹏，派多门师团加入作战，十一月日本军攻入齐齐哈尔，马占山的军队向海伦撤退。张海鹏军队撤回洮南。

2.一九三二年二月，张海鹏曾率两个支队在新民、法库、康平一带和义勇军长江好、天缘好等作战，消灭了这些义勇军后，派一个支队到铁岭游击，三月回到洮南。

四、黑龙江方面是：

1.一九三一年驻黑边防副司令万福麟入关作战，由参谋长谢珂代理。"九一八"后张海鹏脱离东北政府进攻黑龙江时，万福麟电令黑龙江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军政的职务。当十月中旬黑龙江省探知张海鹏有进窥的情势，就派省城的卫队团开到江桥防堵，同时调集望奎一带的吴松林旅，克山一带的程志远旅及各地的保安大队到江桥附近集结。

2.驻洮安、索伦一带的屯垦军苑崇谷旅，"九一八"后就集结了

军队,十月中旬张海鹏叛变后,把军队向黑龙江省撤退,行达江桥知黑龙江的军队已有准备,就地停止协同作战。

3.十一月中旬马占山军队由江桥撤退,日本军追击,占领了齐齐哈尔。马占山军队撤至海伦,日寇就进行停战劝降的谋略,派汉奸赵仲仁、韩云阶等和马占山接洽。一九三二年二月哈尔滨作战后,东铁特区长官张景惠,携关东军的参谋坂垣征四郎到海伦见马占山,由张保证投降条件。马占山即随张景惠到沈阳参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张景惠四人的建国会议,决定成立伪满洲国,迎溥仪到东北就位执政。这时黑龙江军队除各人去职外,大半投降。

4.在海拉尔苏炳文,扎兰屯的张殿九,军队护路的任务,对投降不作表示,军队仍在原地。

五、蒙旗方面是:

1."九一八"后,日本军派甘珠尔扎布在通辽、郑家屯、博王旗一带,纠合蒙古人包善一、韩索旺、小喇麻等素惯为匪的人约一千五百名,称为蒙古自治军,攻取通辽。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进入通辽后,被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长张树森击溃,逃散不能成军。甘珠尔札布逃回大连,包善一等逃回博王旗潜伏,同年十二月骑兵第三旅撤到山海关转至北平。

2.北满方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寇进入齐齐哈尔后,蒙人绰尔巴图尔得广濑师团的援助(绰尔巴图尔又名郭兴元),在布特哈旗及卜施一带,收集蒙旗的保卫团和惯匪约八百名编成军队,作日寇的帮凶。

3.蒙旗除以上日寇培养的武装力量外,海拉尔都统公署有蒙兵三百名。

丙、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的军事概况: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伪满洲国政府成立,为建立伪满洲国军,

设立军政部，并由关东军派出多田骏等现役将校为军事顾问，指导满军，规划军事。伪满制度草创，当时沿用东北旧制的很多。军政部长马占山仍兼黑龙江省警备司令官及省长，行政区域也同旧制，东三省各设一警备司令官为军队最高长官。在这期间，伪满洲国还没有巩固，经过几次变革，军事还没能统一。概略情况是：

一、马占山自发表为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警备司令及省长后，即派他的部下王静修、张益三等组织军政部，并以王静修以次长代理部务。马占山回到齐齐哈尔后，三月下旬即行反正，脱出齐齐哈尔回到黑河，通电宣告日寇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五月又进至海伦、绥化一带。这时黑龙江军除省城附近的军队外，在江北和东大荒（明水、泰来等县地方）的部队均响应了马占山，于是日本军对黑军又加大讨伐。伪满派程志远为警备军司令官兼省长，参谋长张文铸兼第一支队长随日本军讨伐马占山并收抚各地的军队。七月马占山失败，退至苏联境内，经欧洲返国。十一月日本军又进攻海拉尔，这时苏炳文、张殿九的部队均向苏联境内由满洲里撤退。九月伪满任命了张文铸为黑龙江警备军司令官，韩云阶为省长。这时黑龙江全境才沦陷于伪满手中。（程志远免职）

二、吉林省仍沿旧行政区域，伪满政府任吉兴为警备军司令官，熙洽为省长，于琛澄为护路军总司令，张景惠为特别区行政长官。这时也主要的是对在依兰及绥宁地区的丁超、李杜的军队作战，并行特务工作对这些部队的收抚。所以伪满军的编制和兵力均不能确定。一九三二年秋冯占海由热河撤至关内，一九三三年春李杜率军队退到苏领内。丁超投降后，吉林全境才沦陷于伪满手中。

三、辽宁省伪满改为奉天省，臧式毅为省长，于芷山为警备军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奉天，统辖全省的军队，王殿忠、李寿山等也隶

归其部下。一九三二年冬在通化的唐聚五、李春润等义勇军，受日满联合的讨伐，均渐消灭，只存有王凤阁、邓铁梅等部尚顽强抗敌。

四、伪满政府成立后，张海鹏的部队，仍独立于省警备军之外，别成立为洮辽警备军，协助奉天和吉林的军队讨伐各地的义勇军。一九三三年二月伪满侵攻热河，派张海鹏为前敌总司令，率部下五个支队和日本军共同作战。八月任命张海鹏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官，但部队是以洮辽军为基干，仍编成为八个支队。

五、伪满政府成立时即设立兴安总省，其下设立东、北、西、南四个分省。于一九三二年逐次才成立了兴安各分省的警备军。于本年六月以绰罗巴图尔的部队为基干，成立兴安东警备军，驻博克图。以海拉尔都统公署卫队营为基干，布里雅特旗长乌尔金为司令，成立兴安北警备军，驻海拉尔。又命扎赉特旗的王爷巴特玛拉布坦收集博王旗一带包善一等的残部编制军队，成立兴安南警备军，巴特玛拉布坦为司令，驻钱家店，后移至通辽街。一九三三年伪满在热河作战后，才成立了兴安西警备军，李守信为司令，驻林西。

六、伪满的海军江防舰队：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寇侵占哈尔滨后，东北江防舰队长尹祚乾投降。三月九日伪满军政部成立，改为伪满海军江防舰队，尹祚乾为司令，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军政部顾问部以伊藤海军大佐为顾问。舰队共有舰艇六艘，补充队一个，一切仍用旧制，并无变更，舰艇总吨数二千二百吨，兵员三百名。

七、伪满各警备军的编制及兵力的概要、配备的概况：

1. 于芷山的奉天省警备军，共编成步、骑、混成旅七个，教导队一个，均是两团制。炮兵大队一个，为山炮，三连。总兵力三万五千名。参谋长曹秉森，旅长田德胜、王殿忠、廖弼宸、傅布彦、李寿山、董国华、赫慕侠。教导队长吕衡。军队主力仍在通化讨伐，又

分驻奉天、安东、锦州、营口一带。

2.吉兴的吉林省警备军(连在哈尔滨方面归于琛澄指挥的军队在内),共编成步、骑、混成十五个旅,教导队一个,炮兵大队二个,编制同前。总兵力六万名。参谋长吴元敏,旅长刘宝麟、李文炳、王树棠、梁泮、任永和、王克镇、尹保衡、刘玉琨、郭宝山(以上是吉林方面),李毓久、崔文林、陈德才、白文清、柏秉藻、关琛(以上是哈尔滨方面)。一九三二年吉长、延吉地区由吉兴指挥,军队分布在吉林、长春、农安、榆树、磐石、敦化、延吉、桦甸、濛江一带。滨江、依兰地区归于于琛澄指挥,主要是对丁超、李杜等作战。军队分布在哈尔滨、双城、阿城、珠河、依兰、佳木斯、富锦一带。一九三三年丁超、李杜军消灭,绥宁地区由吉林吉兴的军队驻守,分布在宁安、梨树镇、密山一带。

3.张文铸的黑龙江省警备军,是由马占山撤退后另行编成,共混成旅五个,骑兵旅四个,教导队一个,内中尚有一部分为三团制,但大部分是两团制。炮兵大队一个。总兵力四万名。参谋长赵振邦,旅长冯广友、杨振凯、王树棠、贾金铭、刘维翰、张奎阁、涂全胜、周作霖、张泰达。教导队长李静。军队配置在龙江、安达、绥化、泰来、克山、拜泉、讷河、黑河及松花江北木兰、通河、汤原、铁骊一带。

4.张海鹏的热河省警备军,就是以前的洮辽警备军,随张海鹏移驻到热河。共编成为八个支队,每支队的兵力约等于一个旅,全数是骑兵,是三团的编制。此外有步兵独立团一,骑兵独立团一,炮兵大队二。总兵力约一万五千名。参谋长李盛唐,支队长王治安、鹏飞、刘茂义、傅铭勋、张俊哲、程惟宾、彭金山、王永清。军队配置在承德、赤峰、朝阳、围场、滦平、丰宁、平泉一带。

5.兴安分省的警备军,在司令部之下直属有骑兵两个团或三个团,此外有山炮兵一个连。每团骑兵八百名。计兴安东警备军

骑兵三个团,山炮兵一个连,驻防在博克图、布西一带。兴安北警备军骑兵三个团,山炮兵一个连,驻防在海拉尔、哈拉哈庙、黑头山一带。兴安南警备军骑兵两个团,山炮兵一个连,驻防在钱家店、开鲁一带。兴安西警备军骑兵两个团,山炮兵一个连,驻防在林西、查不干庙一带。总兵力有一万名。

6.中央直辖部队:靖安游击队是用日本人直接统率中国兵的唯一部队,当伪满政府成立后,改名为靖安军,日本人藤井重义为靖安军司令,直接隶属伪满军政部。它的部队是步兵两团,骑兵一团,炮兵一大队,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兵力总数五千名,军官多是日本人。

禁卫队是溥仪就伪满执政后编成的,宪原是禁卫步兵团长,只编成步兵一营,总兵力约六百名,也直接隶属于军政部,为中央直属部队。

当伪满政府成立的初期,驻长春的王克镇骑兵第一旅,暂时隶属中央,以后就划归第二军管区内。

此外,其中央陆军训练处隶属的教导队,有步、骑兵各一营,炮兵一连;兴安军官学校隶属的骑兵教导队,为中央直辖机关的隶属部队,总兵力有一千四百名。新京军乐队也是中央直辖部队的单位。伪满全部总兵力约十七万人。

丁、伪满军在成立军管区后的沿革概要:

一、伪满洲国成立后,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两年之中,概定了伪组织的基础。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军长久占领满洲,由溥仪手中已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三三年消灭了各地的反抗,侵占了热河,统一了全境。军队内部如编制、教育、训练等也有所改革。于是在一九三四年随伪满行政区域的改变——旧东北四省改为奉天、安东、锦州、吉林、延吉、滨江、三江、龙

江、黑河、热河等十个省，划分为五个军管区，每军管区的管辖区域是两省，军管区司令官本位是上将（中将亦可）。每省设一地区司令，是中将。军管区的部队步、骑、混成旅四至六个，炮兵大队一个，教导队一个，通信队一个，军乐队一连。在一九三四年尚未成立兴安军管区，仍是兴安东西南北四个警备军，警备军隶下有二或三个骑兵团。

步兵团是两营编成（每营步兵三连，机关枪一连）及迫击炮一连。骑兵团是骑兵三连（每连三排）、机关枪一连编成。炮兵大队由山炮三个连至四个连编成的。通信队是有线通信一排，无线通信一连，器材是电话机六架，无线电机二台。

教导队是步兵一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连编成，此外有军士教育连，军官候补生教育连。

备考：

1.一九三四年伪满军管区成立的当时，共有步兵旅九，骑兵旅十一，混成旅九，教导队五，炮兵大队五，通信队五，军乐队五。

2.兴安各省警备军共有兴安骑兵团十，山炮连四。

3.中央直辖部队有靖安军、禁卫队、独立骑兵第一旅（以后改归新京地区，旅长为王克镇），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教导队，兴安军官学校的骑兵教导团，新京军乐队。

4.全部总计旅单位三十六（靖安军、教导队在内），独立团单位十三（禁卫队、学校的教导队（团）在内），总兵力九万八千名，概数十万人。海军江防舰队仍旧。

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伪满军管区行第二次的改正。

一九三六年伪满各省的行政区域改正，就是增设了四平、牡丹江、北安三个省，伪满全部共有十三个省。因此本年军管区也有所改正。

一九三四年伪满军管区编成概况表

军管区	所在地	司令官	行政区	军地区	司令官	部队情况概要
第一军管区	奉天	于芷山	奉天省	奉天地区	廖弼宸	步兵旅二个,混成旅四个,教导队一个,主力在通化讨伐。奉天、营口、安东、山城镇各地均驻有部队。 旅长六:廖弼宸兼、王殿忠兼、赫慕侠、傅布彦、董国华、高明。教导队长吕衡。
			安东省	安东地区	王殿忠	
第二军管区	吉林	吉兴	新京	新京地区	李文炳	步兵旅三个,骑兵旅四个,教导队一个,分驻扶榆、榆树、磐石、敦化、桦甸、额穆、延吉、珲春、通辽、洮安各地。 旅长七:李文炳兼、金恩奎兼、任永和、尹保衡、刘玉琨、郭宝山、彭金山。教导队长朱榕。
			吉林省	吉林地区	吴元敏	
			延吉省	延吉地区	金恩奎	
第三军管区	齐齐哈尔	张文铸	龙江省	龙江地区	赵振邦	步兵旅二,骑兵旅二,混成旅二,分驻洮南、齐齐哈尔、泰来、望奎、克山、讷河、黑河、北安、海伦一带。教导队一,驻齐齐哈尔。 旅长六:于治功兼、贾金铭、张奎阁、冯广友、朱凤阳、杨镇凯。教导队长李静。
			黑河省	黑河地区	于治功	
第四军管区	哈尔滨	于琛澄	滨江省	滨江地区	尚志	步兵旅二,骑兵旅二,混成旅二,主力在三江地区,一部在绥宁地区,一部在滨江地区讨伐。教导队一,驻哈尔滨。 旅长六:杨秉藻、关琛、崔文林、邓云章、陈德才、钱福安。教导队长鹏飞。
			三江省	三江地区	李毓久	
第五军管区	承德	王静修	热河省	承德地区	王永清	混成旅三,骑兵旅一,分驻承德、赤峰、丰宁、朝阳、平泉、锦州、绥中一带。教导队一,驻承德、滦平。 旅长四:王永清兼、田德胜兼、张俊哲、刘文清。教导队长朱家训。
			锦州省	锦州地区	田德胜	

1.增设第六军管区。原属第四军管区的宁安、东宁、穆稜、密山、虎林各县划为第六军管区，本管区和牡丹江省区域一致，并未有其他地区，部队由第三军管区和第四军管区各抽调一旅的兵力，编成为混成旅一，教导队一。当时编成概要：

第六军管区：牡丹江，司令官王殿忠，参谋长赵振邦。混成旅一，旅长张奎阁，驻密山。教导队一，队长宋殿才，驻牡丹江、宁安。

2.成立兴安军管区。伪满政府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兴安各分省改为各兴安省。总合兴安全部区域设立兴安军管区。南警备军司令巴特玛拉布坦任命为兴安军管区司令官。编成概要：

兴安军管区，郑家屯，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参谋长由荻野上校代理。

兴安南警备军，通辽，司令巴特玛拉布坦兼。部队兴安骑兵第五团、第十团及山炮一连，驻防地通辽、开鲁、钱家店一带。

兴安西警备军，林西，司令郭宝山，部队兴安骑兵第四团、第六团及山炮一连，驻防地林西、查不干庙一带。

兴安北警备军，海拉尔，司令乌尔金，部队兴安骑兵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山炮一连，驻防地哈拉哈庙、海拉尔、黑山头。

兴安东警备军，博克图，司令绰罗巴图尔，部队兴安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山炮一连，驻防地博克图、卜施。

备考：

1.兴安军官学校在王爷庙，由兴安骑兵教导团一，学校长由巴特玛拉布坦兼。

2.成立兴安军管区时，就开始筹备成立兴安师，巴特玛拉布坦兼师长，划出骑兵第二、第四、第五团隶归兴安师。

3.一九三八年甘珠尔扎布接南警备军司令，一九三九年野村登龟江接兴安师长。

三、伪满随军管区改正,主要的变革:

伪满建军先是为收集曾为日满尽力的军队和人,一九三四年改编后,因伪满的局势已粗定,乃一面整编,一面逐渐交付伪满军以任务。这任务就是担任境内的讨伐和帮助日本进行侵略作战。首先是中央机构的机构改革。

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军政部。这时主要任务是整编军队,建立新的军队组织,以试验性的使伪满军帮助它作侵略战争,如热河出兵和甘珠部队的派遣等,但大部还在国内任讨伐。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治安部。这时治安部大臣统属伪满的军队和警察,专力从事国内讨伐,消灭人民的反抗。但一九四〇年伪满实施国兵法,是伪满军性质截然的划期,走向于日寇的殖民地军队的道路,伪满军一切建设都是它的准备过程。

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军事部。伪满成立警察总局,脱离军事部大臣的统属,是伪满军把镇压国内的任务交付于警察,主要为协力于日本军的侵略作战,以补助日寇人的资源不足。

现在把各时中央机关的首脑者列在下面:

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军政部大臣(部长)张景惠,在任三年(最初军政部长是马占山,但时期颇暂短,未计算在内)。

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军政部大臣(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在任四年(军政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改为治安部)。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治安部大臣于琛澄,在任三年六个月(治安部在一九四〇年颁布国兵法)。

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在任三年(治安部改革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撤销警务司,并入铁道警护司,铁道警护队改为铁道警护军)。

四、一九三九年伪满增设第七、第八军管区的实施和过程(第三次编制改正):

自一九三四年伪满成立军管区,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七、八军管区的增设,四年半的期间内,也有不少的改变,主要的是:

1.伪满各军管区的任务:第一军管区主力仍然是在通化讨伐,逐渐消灭了义勇军,再对抗日联军作战。第四军管区在一九三六年伪满政府派于琛澄兼三江省长驻佳木斯,率军队主力对抗日联军作战。第五军管区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并没有什么任务,同年八月由靖安军和第五教导队编成热河支队援助日本军在长城线作战,以后又进至宣化一带。第二军管区只担任本军管区境内讨伐,一九三六年以一部派到通化协助讨伐。第三军管区也没有什么繁重任务,只一九三七年十月派第三教导队长石兰斌率兵力两团进至北平附近支援日本军。新成立的第六军管区,维持境内治安外,并没有什么行动。兴安军管区一九三八年六月派出南警备司令甘珠尔扎布率骑兵三个团到冀东进攻蓟州,十一月开回通辽。

2.部队的变动:伪满军因重点讨伐,地区司令已失去了作用,所以逐次撤销了非讨伐区的地区司令部。伪满当时是募兵制,当各军管区成立后停止了招募新兵,部队生出空额,就归并部队,但仍存留原队号,所以各旅都有空额营和空额连等。一九三九年改编时才撤废了部队号,而实际兵员并没有显著的变动。

3.各军管区司令官的变动:

一九三五年三月: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任军政部大臣),于琛澄继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调出),郭恩霖以军政部次长继任。

一九三六年十月:第六军管区司令官王殿忠,新设。兴安军管

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新设。

一九三七年五月: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于琛澄调出)。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郭恩霖调部附)。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新补)。

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殿忠。第六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第一第六军管区对调)。

一九三九年三月:第四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继于琛澄,于派治安部大臣)。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应振复(继邢士廉后任)。

备考:

1.一九三九年的改编,伪满共有独立旅四,步兵旅四,骑兵旅一,混成混八。原来各军管区炮兵大队均取消,新成立高射炮队二,自动车队二,随新设军管区又成立通信队四,其余仍旧,但第三军管区炮兵队改为山炮营。

2.兴安军管区在兴安师内新成立山炮团(四个连)、迫击炮团(四个连)、骑兵第十一、第十二团。

3.新成立的高射炮队及自动车队归中央直辖。又禁卫队成立司令部,增设步兵一营、骑兵一连、炮兵一连,其余仍旧。

4.全部旅单位二十六(靖安军、教导队在内),团单位十五(兴安师各团及禁卫队计算在内),独立特种部队四,总兵力八万二千八百名。

5.这次改编,步、骑兵团均分有甲乙两种的编制。步兵甲种团三个营,一个迫击炮连。营内三个步枪连,一个机关枪连。步枪连内有一个指挥班,三个排。每排三个班,轻机班二个,掷弹枪班一个。每连人数一百八十名。机关枪连六挺编成。乙种团二个营,一个迫击炮连。营内三个步枪连,一个机关枪连。步枪连有轻机三挺,掷弹枪六只。每连人数一百三十名。机关枪连四挺编成。

一九三九年五月伪满军管区改编的情况

行政区域	军管区	司令官	驻地	部队概略情况
奉天省 锦州省 四平省	第一军管区	王殿忠	奉天	混成旅一，教导队一，驻奉天、打虎山。参谋长吕衡，旅长杨镇凯，教导队长郭若霖。
吉林省	第二军管区	吉兴	吉林	步兵旅一，骑兵旅一，教导队一，驻吉林、敦化、磐石、桦甸。参谋长贾华杰，旅长刘尚华、任永和，教导队长傅梦岩。
龙江省 北安省 黑河省	第三军管区	李文炳	齐齐哈尔	独立旅一，混成旅一，教导队一，驻齐齐哈尔、北安、讷河、洮南。参谋长谷麟山，旅长关成山、王作霖，教导队长石兰斌。
滨江省	第四军管区	邢士廉	哈尔滨	混成旅一，教导队一，驻哈尔滨、延寿。参谋长阎东侨，旅长朱凤阳，教导队长曹秉森。
热河省	第五军管区	应振复	承德	混成旅一，步兵旅一，教导队一，驻承德、隆化、朝阳、锦州。参谋长刘卜忱，旅长王克镇、冯秉忱，教导队长久保田。
牡丹江省	第六军管区	王静修	牡丹江	混成旅一，教导队一，驻牡丹江、延吉、密山、穆稜、宁安。参谋长金毅，旅长徐海，教导队长赵秋航。
三江省	第七军管区	张文铸	佳木斯	独立旅三，混成旅二，教导队一，驻桦川、依兰、勃利、宝清、饶河。参谋长赤泽少将，旅长邓云章、张魁英、姜鹏飞、周大鲁、马恩波。教导队长林宽一。
通化省 安东省	第八军管区	王之佑	通化	步兵旅二，混成旅一，教导队一，在临江、抚松地区讨伐。参谋长赫慕侠，旅长王士琇、高明、李裕平。教导队长赵振邦。
兴安东 西南北省	兴安军管区	巴特玛拉布坦	郑家屯	兴安师长野村登龟江，新成立山炮团、迫击炮团，又成立骑兵第十一、十二团，余同前。参谋长郭文林。

骑兵甲种团四个骑兵连,一个机关枪连。骑兵连内有指挥班一个,轻机六挺,掷弹枪六只。机关枪连六挺编成。每连人数一百六十名。乙种团三个骑兵连,一个机关枪连。骑兵连内轻机三挺,掷弹枪三只,机关枪连四挺编成。每连人数一百四十名。

五、一九四二年军管区编制改正的过程和实施(第四次编制改正):

伪满军为迎接实施国兵法,在一九三九年实行了军管区的改编。伪满军的任务,在军管区固然是重点讨伐,在其他方面是在完成殖民地军队的性格,所以自一九三九年后,伪满军事上的变革是:

1.添设特种部队。各特种部队都多少含有近代化的技术性,是为协力日本作战的,不论那方面:人事、统御、技术,都在日本人控制下进行。

高射炮队。自一九三七年四月就开始成立第一独立高射炮队,驻在奉天,归治安部直辖,以这个队行教育训练,作为一个培养机关。一九三九年在长春成立独立第二高射炮队。在一九四〇年后,在昂昂溪成立第三高射炮队,在哈尔滨成立第四高射炮队,在牡丹江成立第五高射炮队。在治安部参谋司设防卫科,专办理它的有关事务。

自动车队。在一九三六年就开始筹备成立独立第一自动车队,驻在奉天,归治安部直辖,主要先养成运转手技术,也是一个培养教育的机关。一九三八年在长春成立独立第二自动车队,一九四〇年后在牡丹江、昂昂溪逐次成立第三第四第五自动车队,和靖安师、兴安师的自动车队。一九四〇年成立自动车学校,专作为自动车的教育和训练。

飞行队。一九三八年开始筹备,在奉天东陵附近建筑飞行场

和营舍，并成立第一飞行队，先成立一个飞行连和一个地上整备连，先行培养训练。一九四〇年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建筑飞行场和营舍，同年八月在奉天成立了飞行学校，在哈尔滨成立第二飞行队，长春成立第三飞行队。于一九四一年改编时成立了飞行队司令部。但伪满飞行队全部是战斗机，是防御性部队，也归治安部防卫科办理一切事务。

通信队。通信每军管区和靖安、兴安两师都有一个通信连。在一九三四年伪满军政部参谋司设有通信养成所，专养成通信技士和通信兵，以后归入陆军训练学校，行一般的通信教育。

2.强化用日本人以统率伪满军的组织系统。新设的特种部队内不论部队长或执掌事务的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中央机关和学校教育机关由日本人掌握全部事务、部队由团长以下和伪满系同等数由日本人充当部队长，兴安师长、旅长都任用日本人，部队内使用日本口令、文书废止汉文，全用日文，会议、讲说使用日语，避免使用翻译。部队士兵添设学习日语日文，一九三九年后逐渐加深了奴化教育。

3.准备实施国兵法。在国兵法实施前已成立了各种部队，这些部队也需要较好素质的兵。一九三八年伪满成立了征募科，实行半征半募的办法，各军管区和部队计划需要的兵数，由地方行政派选合一定条件的壮丁充当兵役，也规定了三年退伍的办法。但这些兵是补充新设的部队和教导队的，一般部队停止募兵。其次，国兵入营前各军管区选择国兵教育队，军官军士预行训练，营长连长多数是日本人。第一次国兵入营是集合训练的。再次是整备了国兵事务的机构。一九四〇年四月治安部成立了兵事科，各军管区成立了兵事处和办事处，伪满树立了兵事制度。一九四一年七月开始征集第一次国兵入营。

4.诺门汗事件和兴安军管区的改编。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编后,于同年六月即发生诺门汗事件。主要是兴安师的溃退和第三教导队的逃散,日寇感觉它对伪满军的控制力薄弱,于是对兵员的取得要实行国兵法,同时加强军队的组织系统,成立军官学校,强化日满系的基层,对伪满军的任务和军队的统御也使在性格上有所变化。局部问题是兴安军管区的改编和变更各军管区司令官,行人事上的强化。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伪满各军管区司令官的变动(附☆记号的是在前变动或没变动的):

第一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前任的王殿忠退职,转补)。

第二军管区司令官王济众(前任的吉兴补侍从武官长,以军政司长新补)。

☆第三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李文炳退职,以朱榕补,八月朱榕病故,王之佑转任)。

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应振复(由第五军管区继邢的后任,转补)。

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吕衡(继应后任,由第一军管区参谋长转补)。

☆第六军管区司令官张益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王静修退职,继他后任)。

☆第七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未动)。

☆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吴元敏(继王之佑任,以参谋司长转补)。

第九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巴特玛拉布坦转兴安局总裁,以兴安师长升补)。

☆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乌尔金(由兴安北警备军司令改补)。

江上军司令官李文龙(由驻日大使馆武官升补,新设)。

备考:

1.兴安军管区的改编如下:第九军管区的部队,骑兵第三团、第六团(乙种),山炮兵连,通信连,第二师(骑兵第二团、第五团、第十一团(甲种),山炮兵团,步兵团(由骑兵第四团改编),通信队,自动车队,师长郭文林。第十军管区的部队,骑兵第七团、第八团,独立骑兵连(乙种),山炮兵连,通信连。以前的骑兵第一、第十、第十二团取消,第四团改为步兵团。兴安军全部尚留有骑兵七个团,一个独立连。以上系一九四〇年三月改编的。

2.江上军。由海军江防舰队改为陆军江上军,区分为第一地区队,驻富锦,所属舰艇共十四艘,巡行警戒松花江一带。第二地区队,驻虎头,所属舰艇十三艘,巡行警戒乌苏里江一带。舰艇兵员共有八百名,陆上工兵作业队共三个团,约三千名。江上军训练处一,附演习用军舰一只。江上军司令部在哈尔滨,富锦、虎头、黑河设立有办事处。

3.其他军管区部队没有变动。

本年七月又增设第十一军管区,由第七军〔管区〕调拨张魁英旅隶归所属。

第十一军管区,密山,司令官于治功,东安省境,所属混成旅一,驻勃利、密山一带。

本年七月中第一次国兵入营,各军管区均集中训练。第一期的新兵教育完了后再拨付各部队,因此于本年十月行各部队的编合,取消了军管区的教导队,撤销了空余旅号,新设工兵队,把高射炮队和自动车队配属于各军管区(本年准备,明年实施)。当时伪满军的部队:

第一军管区:混成旅一,工兵队一,高射炮队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二军管区:混成旅一,工兵队一,高射炮队一,通信队一,自

动车队一,军乐队一。

第三军管区:混成旅一,步兵旅一,高射炮队一,通信队一,自动车队一,军乐队一。

第四军管区:混成旅一,工兵队一,高射炮队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五军管区:步兵旅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六军管区:混成旅一,工兵队一,高射炮队一,通信队一,自动车队一。

第七军管区:步兵旅一,第一师(靖安师改名),通信队一。

第八军管区:混成旅一,通信队一。

第九军管区:骑兵第一旅(骑兵二团,山炮一连),第二师(兴安师改名),通信队,军乐队。

第十军管区:骑兵两团,独立骑兵连,山炮兵连,通信队。

第十一军管区:混成旅一,通信队一。

备考:

1.各军管区所属部队有师(靖安、兴安)二,混成旅七,步兵旅四,骑兵旅一,骑兵独立团二,独立连一,独立山炮连一,高射炮队五,自动车队五(第一第二两师的自动车队在内),通信队十一,军乐队六。

2.中央直属部队。禁卫队(步兵团一,骑兵连一,野炮连一),飞行队(飞行队三,附地上整备队五),江上军(地区队二,作业队三个团),宪兵总团(司令部下十一个宪兵团),独立自动车队一,军乐队一。

3.全部兵力总合为五万九千八百名,概数六万名。

六、一九四一年后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伪满军的变动情况:

1.一九四一年改编后,第七军管区相当的裁减了兵数,把编余的兵员设立两个特设队:第一特设队长邓云章少将,兵力一千五百名,归第二军管区隶属,先在敦化,后到热河讨伐,一九四二年冬开回吉林遣散。第二特设队长赫魁武少将,兵力千名,仍隶归第七军管区,于一九四二年春遣散。

2.各军管区抽派兵力赴热河讨伐。一九四一年后,通化、三江两地区由〈于〉抗日军队的撤退,伪满军的讨伐兵力移到热河方面,一九四二年秋由第二第八军管区各派一团到热河,一九四三年春第三军管区派混成第四旅长王家善和自动车六十台到热河增援第五军的讨伐。一九四四年因第八军管区转移到北安,同年秋原驻通化的混成旅全部移至热河,编入第五军管区。第一军管区的步兵一团,骑兵一团,也开驻热河。第四军管区的步兵一团,第六军管区的步兵一团,也赴热河增援讨伐。随本年的编制改正,第五军管区又增设混成旅二个。总计在热河的兵力是第五军管区步兵两旅,混成两旅;第三军管区混成一旅;其他军管区派出的独立团:第一军管区步兵一团、骑兵一团,第二、第四、第六各军管区各步兵一团。

总计兵力:步兵旅二,混成旅三,步兵独立团四、骑兵独立团一,共二万五千名。

3.一九四四年,第八军管区于本年三月由通化转移到北安,全满军队又行一次改编。(一)各军管区(除第五)各增设一个工兵队,全部共有十一个工兵队(由一九四二年逐年增设的);(二)驻通化的混成旅移驻热河,以此为基干,第五军管区又编成两个混成旅;(三)第三军管区的步兵第十二旅拨归第八军管区,在洮南又成立一个骑兵旅;(四)第一师第二师脱离军管区的隶属关系,归伪满军事部直辖;(五)一九四三年三月新设独立通信队(于一九四五年

归第二军管区隶属),本年扩编内容成立有线营一(四连)、无线营一(三连)和军士教导连一;(六)江上军撤销地区队,成立江防艇队,少将赵竞昌任司令,统率艇队二十二艘、军舰四艘,归江上军司令官直辖。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伪满各军管区司令官的变动:

一九四二年三月,第六军管区,张益三退职,以美崎丈平补(军政司长)。九月,第一军管区邢士廉任军事部大臣,以王之佑继任;第三军管区王之佑转出,以吕衡继任;第五军管区吕衡转出,吴元敏继任;第六军管区美崎丈平退职,李文龙继任;第七军管区张文铸转侍从武官长,赫慕侠继任;第八军管区吴元敏转出,王作霦继任(禁卫队司令);第九军管区郭文林转兴安学校长,甘珠尔札布继任;江上军李文龙转出,宪原继任(旅长)。

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军管区吕衡转出,赵秋航继任(禁卫队司令);第七军管区赫慕侠停职,吕衡继任。九月,第二军管区王济众转出,吴元敏继任;第四军管区应振复退职,李文龙继任;第五军管区吴元敏转出,赫慕侠继任;第六军管区李文龙转出,贾华杰继任(旅长);第十一军管区于治功退职,王济众继任。

一九四四年三月,第八军管区王作霦退职,周大鲁继任(部附);江上军宪原转军事部附,曹秉森继任(飞行司令);第十一军管区王济众退职,关成山继任(宪兵总团)。十二月,第一军管区王之佑;第二军管区吴元敏退职,关成山继任;第三军管区赵秋航;第四军管区李文龙;第五军管区赫慕侠;第六军管区贾华杰;第七军管区吕衡;第八军管区周大鲁;第九军管区甘珠尔扎布;第十军管区乌尔金转兴安校长,郭文林继任;江上军曹秉森;第十一军管区关成山转出,郭若霖继任(宪兵司令官继任)。

备考:(　)内是以前的职务。

4.一九四五年铁石部队的派遣：

一九四四年日寇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协议的结果，由伪满派出一有力部队和人民解放军作战，一九四四年末编成，一九四五年一月出发，开赴冀东一带归日寇华北驻屯军指挥，这部队主要是以日本人为部队长，不使伪满军管区司令官和满系部队长到前方视察，是在日本部队长控制下进行作战的，它的编成：

铁石部队：岩田熏为旅长，率兴安骑兵郭文通、胡克巴图尔两团驻滦州及乐亭一带。

铁心部队：粟野义雄为旅长，率第七军管区步兵刘德溥团，骑兵两连（第三军管区抽出）驻榛子镇一带。

铁血部队：铁路警护军富永旅长，率铁路警护一团，警备由山海关至天津间的铁路沿线一带。

此外由军事部编成连络部和通信队（有线两排，无线电机四台），自动车队（装甲车十辆，载重车三十辆），驻唐山，归日寇加藤部队指挥。

5.一九四四年高射炮队司令部的设立：

一九四四年三月的改编，设立高射炮队司令部，驻奉天，张大任少将为司令官，统辖伪满第一至第五高射炮队，又同年成立高角炮队。

六、一九四五年四月伪满军队的改编：

这次改编是收缴步骑兵的重火器和扩编工兵及辎重。改编一部的部队是为应时局紧迫，限制伪满军的战力，同时还利用士兵给给它服劳役的双层目的而实行的。当时各军管区的编制是：

第一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五，辎重队二，自动车队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二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五，辎重队二，自动车队一，通

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三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四,辎重队一,自动车队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山炮营一。

第四军管区:骑兵团一,步兵旅一,工兵队四,辎重队二,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五军管区:步兵旅二,混成旅二,辎重队二,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六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四,辎重队二,自动车队一,通信队一。

第七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三,辎重队一,通信队一。

第八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二,辎重队一,通信队一。

第九军管区:骑兵旅一,野炮营一,辎重营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十军管区:骑兵独立团二,野炮营一,辎重营一,通信队一,军乐队一。

第十一军管区:步兵旅一,工兵队二,辎重队一,通信队一。

第一师:步兵团二,骑兵团一,炮兵队一,工兵队一,辎重队一,自动车队一,通信队一。

第二师:骑兵团二,步兵团一,炮兵团一,自动车队,通信队。

禁卫队:步兵团一,骑兵连一,炮兵连一。

高射炮队:高射炮队五,高角炮一。

飞行队:第一飞行队(两连),第二飞行队(两连),第三飞行队(一连),兴安飞行队(两连)。每飞行连附属整备连一。共有飞行机、战斗机一百架。

独立通信队:有线营一(四连),无线营一(三连),军士教导连一。

此外，训练学校有教导队，步骑各一队，炮兵一连。陆军兴安学校有骑兵教导团一（骑兵三连，炮兵一连，机关枪一连）。

总兵力计：步兵旅九，混成旅二，骑兵旅一，步兵团三，骑兵团三，炮兵团二，炮兵营三，骑兵连一，炮兵连一，工兵队三十，辎重队十七，自动车队六，高射炮队五，高角炮队一，独立通信队一，通信队十三，飞行队四（七个连）。人员总数十二万九千名。

附记：

1.这次改编，兵力约增六万以上，预定本年国兵先增加三万名。

2.因时局紧迫，各军管区的重火器均收缴半数以上，送交兵器厂保管。

戊、伪满的中央军事机关：

伪满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政府成立，就成立了军政部，同时日本军方面也在军政部内设立顾问部，统率系统和指导系统相对的存在。当时军政部的机构是：

参谋司：

1.总务课（庶务、用度、秘书）；

2.军衡课（人事、恩赏、功绩调查）；

3.军事课（作战、编制、教育）；

4.军医课（医务、卫生）；

5.军法课（法务、审判）；

以后又增设测量课、宪兵课。

军需司：

1.兵器课（兵器、马匹）；

2.经理课（主计，需用）；

3.舰政课（江防舰队的舰政）。

宣传部:关于宣传、调查、报道事项。

一九三七年七月军政部改治安部,并入警务司,但次长是文官,专办警察事项。军事和警察虽在治安部大臣统属下,但互不得干预职务,所以事务上没有联系。军关系方面机构:

官房:大臣秘书和各方面联系的业务。

参事官室:法制事项的起草、审查,有关军的政治上对策。

参谋司:总务科(各科关于规章条例事项的立案审核,各种企划事项的审议);军事科(作战、用兵、编制);训练科(军队及学校的教育训练);调查科(调查、统计、宣传);江防科(江防舰队作战和训练业务);以后于一九四〇年又新设防卫科(主要是防空的飞行队,高射炮队事项,但一九四二年又撤销)。一九四一年调查科改精军科。

军政司:军务科(编制、预算、补充、补给、计划、宪兵事项,军纪事项);人事科(人事、恩赏、功绩、指纹);主计科(会计、预算、金钱出纳);经营科(需用、调办、建筑);兵马科(兵器、马匹、兽医);医务科(医疗、卫生);法务科(法务、审判);舰政科(见前)。以后添设兽医科,一九三九年成立征募科,一九四〇年改兵事科。

一九四三年三月治安部把警务司划出,并入了铁路警护队,使军和警分离,成立了新的军事部。机构是:取消文官的次长,新设军的次长,佐理政务和部务。

官房:秘书室、人事科、庶务科(受次长区署)。

参谋司:第一科(作战、用兵),第二科(情报、兵要地理),第三科(教育、训练),第四科(宣传、报道),第七科(飞行队所关业务)。

军政司:军务科、兵事科、主计科、经营科、医务科、兽医科、法务科。

参事官室:(同前)。

铁路警护司:第五科、第六科(铁路警护军受关东军直接指挥,伪满军事部只作事务的处理,并和伪满军方面没连系)。

119—1—486

萧玉琛笔供

(1954年9月20日)

萧玉琛:男,生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七日,四十九岁。籍贯辽宁省辽中县北长岗子屯。军人,伪满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汉族。〔中略〕

个人的略历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四年,在故乡北长岗子私塾读书。

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在故乡北长岗子屯立小学卒业。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在辽中县立高等小学卒业。

一九二一年,在辽中县立高等小学补习班肄业。

一九二二年,在辽中县立师范讲习科肄业。

一九二三年——一九二五年,在怀德县立师范学校毕业。

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辽中县长滩镇区立小学校教员。

一九二八年,东北三四方面军团模范队学兵。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夏季,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航空司令部地上勤务见习。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月,伪奉天省警备司令部上尉参谋。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八月,伪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

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月,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丙种学生受训。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专科学生受训。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伪第一军管区中校参谋。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三八年八月，驻濛江伪步兵五团中校团附。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三九年六月，伪通化地区中校参谋处长。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九四一年八月，伪第八军管区上校副官处长。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月，通化第八教导队上校定员外部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九四三年一月，伪第八军管区上校高级参谋。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月，伪吉林第二军管区司令部定员外上校部附。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月，吉林伪独立通信队长。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九四五年二月，伪军事部人事科长。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一五”，吉林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

我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三月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在于芷山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当上尉参谋，同年十一月进级少校参谋。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执行伪司令官于芷山，参谋长曹秉森、阎家梅，部附堀内一雄，参谋处长吕衡的命令，办理情报业务，由所属部队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报告来的抗日军唐聚五部队的活动情况，及在岫岩抗日军邓铁梅的活动情况，和各伪部队的移动以及警察机关来的通报，

汇集一起制成综合情报，报告军政部，通报各省伪军司令部、警察机关，下达各伪部队。

由于我这个罪行，当时对抗日军虽然没有起着所谓讨伐效果的作用，但是起着部分地限制抗日军活动作用，伪部队都住在县城和重要的村镇，以此抗日军未能如意克复有驻伪军的城镇。

一九三三年二月到八月，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受训。

一九三三年八月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依伪司令于芷山、参谋长堀内一雄、参谋处长吕衡的命令，担任部队教育业务。

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专科学生受训。

一九三五年三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依伪司令官于琛澄、王静修参谋长、吕衡参谋处长、马养贤、于澄的命令，担任部队教育业务，制定部队教育计划、部队演习计划、部队检阅计划、射击竞技会，在教育计划中指示初年兵和二、三年教育科目进度。

由于我上述罪行，增进了所属部队的军士兵的战斗能力和射击技术，他们以这个本领在镇压人民起着有效的作用。对于镇压人民我有间接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秋季，由桓仁县日寇宪兵队，诬桓仁县教育界人士以反满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和参加抗日救国会的罪名，逮捕了桓仁县教育界和少数商人计约二三十名，施以非刑拷问，逼迫他们承认所诬加之罪名，在他们被逼承认后，日寇宪兵队把这些人押送到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军法会审，令军法会审审判他们。

在审判这些善良知识分子，我被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命为临时判士，参加这次审判。

军法会审的编成：审判长王冠美，审判官日本人二名（姓名忘记），中国人二名：姚树勋少校、高少校，书记官一名（姓名忘记），翻

译官苏正心，法务顾问三浦，临时判士二名：伪中校刘仰山、萧玉琛。

某一天在南关军法会审法庭开庭审判上述案件，在开庭时由审判长王冠美宣布开庭后，日系审判官一人开始审讯，我只听和看见一个被日寇折磨把腿打断一肢的人说：我是桓仁县尖山子小学校长，诬我组织和参加抗日救国会议的罪名把我逮捕，用非刑逼我承认罪名，把我的腿已经打断了一肢。请法官好好想一想，一个人不会分成两个身，说我参加抗日救国会议那一天，恰是我正在参加县教育局教育会议那一天，我怎能够去参加抗日救国会呢？根本没有的事情，我们太冤屈了，请法官加以考虑。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审判事件的始末，同时有了说不尽的同情。基于这个心情，大胆地说了一句“是有考虑必要”的一句话。其后又听到年岁大的人说，我是开小铺的。每天卖的赚不上我家四五口人的生活费，那有力量纳救国会费，边说边叩头。以此上述两人的话记得比较清楚，其余的人都申诉苦情反驳了加与他们身上的罪名，说的什么样的话记不住了。被害的人数我也没有记清。由于法庭大小来说最大限容不下三十人大约在二十名左右，审判不到一整天把这个案件审完了。由审判长王冠美依照日寇法务顾问的指示，按照法务顾问三浦早已决定的判刑名簿，宣读了判决词。我恍惚记得判处死刑者六七人，无期徒刑者三四人，其余的是由十五年到五年各等有期徒刑，少数释放者。

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四月，受伪司令官于琛澄的命令，到通化行营司令部当连络参谋，办理情报业务。由各讨伐地区：临江、抚松、金柳、濛辉报来的情报，各伪部队所谓扫荡行动以及伪警察伪宪兵各机关通报来的情报，如抗日军司令王凤阁活动地点，崔贤活动情形等，我汇集在一起，作成综合情报，而后向伪军政部报告，通报各

伪军管区司令部、各警察机关、宪兵机关，下达所属各伪部队。

由于我这个罪行，在伪部队所谓讨伐、扫荡抗日联军起了一些作用，此间最为显著的伪第一教导队步兵团中川营山口连在临江和通化县境的老爷岭，把抗日军司令王凤阁以下五、六名及其妻、女包围攻击，逮捕了王凤阁及其妻、女，送到通化讨伐指导部而后杀害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我转到驻濛江伪步兵第五团中校团附。旅长廖弼臣，团长戴元，教官秋山少佐。此间我担任全团的教育，对于军官施行过两次战术教育，对于士兵作成教育计划，分有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和教育进度指示，两个营长监督施行，还召集过一次射击会，施行射击术的竞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某一天夜间，抗日军李毕游击队，经过了濛江西龙泉镇，我受团长戴元的命令和教官秋山的指示，率伪军约一个营的兵力，当日到达龙泉镇，此时抗日军已离去龙泉镇向南撤退。次日晨我率伪军随着南下的抗日军的踪迹施行了追击，待我率伪军到瓮圈南天门地方，天已薄暮，伪满的时间已是午后四时多，我遂下命令在这个地方露营。露营地设在一条小河的北岸，伪军正在作露营准备，警戒步哨将达小河边沿的时候，由河的南岸从树林中和西南方向我伪军射击。我当即命伪军应战。在战斗不到一小时的时候，抗日军知我伪军有警备遂撤退南下，战斗终结。战斗地域搜察，并没有发见抗日军有什么损失，我伪军也无有伤亡，入夜的关系未去追击。〔中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某一日，人数不多的抗日军，由警察的通报，谓在濛江县东北方十数华里的山地中，伪步兵第五团长戴元命第六连苏连长率该连去“讨伐”，伪六连到达该地后，遭遇了抗日军，接仗不到半小时，抗日军撤退，在战斗中苏连长中弹而死，伪军

返回濛江。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濛金辉讨伐地区司令部司令赵秋航和日寇教官计划，命令伪步兵第五团团长戴元率所属伪军一部，临时伪宪兵团团长张英权率所属伪军一部，于某天进到濛江东剁道沟地方，对抗日军崔贤司令率领的军队进行“扫荡”，在这两部分伪军到达剁道沟时，崔司令率部队已离开该地方到抚松县境内某地方，这两个〔部〕伪军虽然在“扫荡”中没有遭遇着抗日军，而他们竟将在该地的所谓山寨烧毁了一座，二日后两个〔部〕伪军各归还原驻地。

后来在二月上旬，步兵第七团团长杨春煜率所属伪军在抚松县境内“扫荡”，遭遇抗日军崔贤部队，激战多时，崔贤司令以下数名壮烈牺牲。〔中略〕

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我转到伪通化地区参谋处中校处长。伪司令董国华、参谋长驹井丰太郎、日寇顾问重广中佐。我执行他们的命令，掌管教育、情报、警备业务，监督和指示处内的参谋作制部队教育计划，收集情报、作制综合情报、作制警备命令。到通化不久，十月间，伪通化地区司令部奉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殿忠的命令进驻抚松，编成抚松讨伐司令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我是抚松讨伐司令部中校参谋处长。奉司令董国华、参谋长驹井丰太郎、日寇顾问的命令，掌管情报和警备业务，此间监督、指示参谋横尾文四郎、松岗收集情报和下达警备命令。

同时期参加过关于日寇顾问重广中佐作制的警备计划，由伪司令董国华、伪参谋长驹井丰太郎和一名顾问部附的审议会。

这个计划是关于所属伪部队：步兵五团、步兵六团、骑兵三团、骑兵九团的警备任务分担。任务分担概要如下：

步兵五团团长戴元，担任濛江县境内的警备；

步兵六团团长李裕平，担任抚松县城以西濛江县境以东地区的警备；

骑兵第三团团长部凤麟，担任抚松县南部地区的警备；

骑兵第九团团长于泽浦，担任抚松县东部到长白(安图)边境的警备。

各伪部队担任的警备区域，发现抗日军活动时，不待命令进行“扫荡”“讨伐”，必要时得不拘于担任警备任务的地区进行所谓扫荡、讨伐。

依照上述计划，伪骑兵第三团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于抚松县东南方二十余华里山地中，对不知姓名的抗日军施行过攻击，使抗日军造成死一名伤一名的重大损害。

伪骑兵三团又在一九三九年一月间(日期不太确实)对在抚松东数十华里的山地中平日军的抗日军施行过攻击，战斗约一小时，予抗日军死一俘虏一名的损害。

其他各伪部队也有数次的所谓扫荡，具体事实我记不清了。〔中略〕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依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殿忠抚松讨伐司令部取消，旧日通化地区司令部仍然归还通化，到通化以后，准备改编。三月到五月末做了准备改编业务，六月中旬进级上校，同时通化地区取消，改编为第八军管区。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四一年八月，伪第八军管区上校副官处长，执行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吴元敏，参谋长赫慕侠、山崎积的命令，掌管全伪军的人事、指纹及司令部的庶务，人事业务，办理进〔晋〕级、退职、增俸、异动、惩罚和指纹。

此期间，第八军管区部队对抗日军“讨伐”“扫荡”的罪恶行动：

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月间，伪步兵第一旅旅长李裕平、第二旅旅

长高明，依据日寇顾问安永笃次郎“讨伐”计划，由通化向北到柳河施行“扫荡”，伪第二旅在金川柳河县交界地点与抗日军某部队遭遇，给抗日军以数名的死伤。又一次仍是金川柳河交界地方和抗日军接仗，战斗情形我记不住了。

一九四〇年一月间，在日寇野副旅团长指挥下的伪第一旅骑兵三团团长部凤麟率领下，某一天在桦甸和濛江县境地方，对抗日军司令杨靖宇亲身指挥的部队施行了攻击，激战数小时，给与抗日军以严重损害，死伤约有三四十名之多，和掠夺了若干支步枪。

一九四一年八月到同年十二月，伪第八教导队定员外部附。此期间依照伪队长周大鲁的命令，担任队内的军官教育，对伪军官约十四五名施行了两次图上战术、两次现地战术科目，是攻击、防御、遭遇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伪第八军管区高级参谋。执行了司令官吴元敏、王作霖和参谋长刘尚华的命令，担任伪军的教育业务，作制教育计划，指示初年兵、二、三年兵教育科目和进度，作制部队演习计划，召集射击竞技会，制订临时检阅计划。

一九四三年二月到同年四月，伪第二军管区定员外部附。依司令官王济众、参谋长贾华杰的命令，筹备编成独立通信队，计算队营具及所要的器材。

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六月，伪独立通信队长。执行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次长真井鹤吉的命令，按编成表编成独立通信队，队本部有线营无线营共约近千名官士兵，教育他们有线和无线通信技术，虽然教育尚未完成我即离去，但对通信兵教育打下了基础。

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任伪军事部人事科长。依照大臣邢士廉、次长真井鹤吉、高级顾问元泉馨、人事顾问江岛等的命令掌管人事、恩尝、指纹业务。在人事业务中，有进〔晋〕级、

退职、增俸、惩罚、异动。在恩尝业务中，有叙勋、褒尝。在指纹业务中，管理全伪满军军官指纹及全军士兵指纹。

在一九四三年冬季，伪军事部第一科编成所谓铁石部队。去到冀东协助日寇军围剿解放区。对这个罪恶滔天的伪军，依照伪大臣邢士廉和次长高级顾问的命令，异动了一些主要干部：有岩田旅长、粟野旅长、刘德溥团长、郭文通团长、南博参谋。他们在冀东给冀东人民带来说不尽的灾难，我有间接加害冀东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五年二月到同年"八一五"任伪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辅佐司令官关成山统率教育伪军，使伪军做日寇有利的帮凶军。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参加一次伪军事部召集的各伪军管区参谋长会议，接受伪军事部大臣的指示，在会议后不久，把伪军所有的重火器，迫击炮、重机关枪、轻机关枪，缴纳于吉林军械支厂，后来听说这些武器是装备日寇军之用，日寇新装备这个军队为了对苏作战。

〔下略〕

钉　　119—2—1167—1—5

李文龙笔供

（1954年6月30日）

姓名:李文龙。别号:鸿科。年龄:六十一岁,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民族:汉族。原籍:辽西省梨树县小城子尚家屯。住所:哈尔滨西马家沟通道街九十七号。

〔中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任伪吉林铁道守备队第二队上校队长。驻长春(三个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移驻双城堡车站。五月移驻窑门车站。

一九三三年五月改编为伪满步兵第十旅第十三团上校团长,仍驻窑门车站。

一九三四年八月任伪第四军管区第四教导队长,一九三四年九月晋级伪少将,驻哈尔滨王兆屯。

一九三五年八月任伪第四军管区少将参谋长,驻哈尔滨。

一九三七年八月任伪治安部参谋司附,即派驻日本伪满大使馆武官,驻东京。

一九四一年二月晋级伪中将,任伪江上军司令官,驻哈尔滨。

一九四二年九月转任伪第六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驻牡丹江。

一九四四年四月转任第四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驻哈尔滨。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苏军逮捕。

我的罪行:

一、我是怎样走上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的道路的。一九三一年七月我因建筑公司赔累不干了。到北平去谋事,遇见以前在十六师的旧同事营长世荣庭。一次,他同我到热河督统署驻北平办事处处长金鼎臣家祝寿(在沈阳我做建筑公司经理时,世荣庭已介绍我和金相识),在他家由世和金给我介绍与牛清山(黑龙江安达县人,曾在黑龙江旧政权时当过团长,和金是义兄弟,而他们和金璧东也是朋友)认识,牛当时也正赋闲想谋事,因此和我相处得很好。"九一八"事变后,牛知道吉林已成立了伪政权,汉奸金璧东当了吉长铁路局长。这时我因在北平找事没有头绪,就预备回沈阳设法,牛听说我要回沈阳,即给了我一张名片,叫我去找金璧东谋事。牛自己则仍留在北平帮忙金鼎臣兄弟结婚。一九三二年一月,牛也回到他的原籍,在黑龙江又当了伪满的团长(世荣庭和牛清山曾在金鼎臣的父亲金寿山当统领时,同时充当他部下的营长)。

我回沈阳后,这时正是日寇搜罗帮凶。我看到别人都做了伪官,就认为也不能放过这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所以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拿着牛清山的名片到长春见着了汉奸金璧东,他当时并兼任伪吉林铁道守备司令官,因我当过团长,应许我若能招一营兵,就给护路队(等于团)队长的职位。我即到公主岭找我的亲戚怀德县保卫队队长温振远,叫他招一营兵,答应给他营长。温再通过他的弟弟温振楼及亲戚在公主岭和四平街招募,凡能招一连的就给连长,能招一排的给排长,在各店中张贴红纸条招募吉林护路队,我又从中欺骗宣传护路队不打仗,吃大米白面。这时正值事变后,工人、农民、店员失业的很多,十余天就骗募了四百余人。同时在长春也以同样方法骗募了三百余人。我在一九三二年一月正式当了伪吉林铁道守备队第二队上校队长。领得制服武器后,便积极训练新兵。

这时我为了得汉奸金璧东的欢心,巩固自己的地位,曾送给他一只赤金杯子。

伪吉林铁道守备第二队的编制是:队部,下辖三个步兵营,每营四个连,三个特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实际上没有这些武器,全拿步枪(到哈长线后,才发下两门迫击炮)。第二队共伪官兵一千六百人,均驻在长春。第三营长即是温振远,不几天由吉林派来了赵天骥当营长,温即改为伪少校队附。

二、我追赶反正部队做汉奸忠实走狗的罪行。我当伪队长不久,在一月下旬,驻长春南关第一营有两个连反正,带全副武装向东南拉走,我就带着亲手骗募的伪第三营两个连及伪营长赵天骥,伪队附温振远,跟踪追去,赶出一百多里到四家子,听说他们坐着火车往东山里去了。当夜我带去的三营第九连也全副武装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带着剩下的一连回长春。

我对这三个连的正义行动毫无认识,反无耻地去向金璧东请罪,后金告诉吉林伪长官熙洽和日寇顾问大迫通贞,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仅给我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我对金非常感激。这时又由伪铁道守备队司令部新任的教官长日寇东宫铁男大尉,送给我军刀一把,实际是鼓励我去多杀祖国同胞,我反而分外感激。这两件事表明我做了他们忠实的走狗。

三、我尽力保护日寇铁道运输线,打击抗日武装力量的罪行。同年二月,伪第二队奉命分驻哈长线护路。队本部驻在双城堡车站,带领直辖的迫、平两个特连。哈长线警备区域分三段:北段由三岔河以北至哈尔滨,由伪第一营担任,营长金毓善带两个连也驻双城堡车站。另外两个连,一驻五家子,一驻蔡家沟。中段自窑门以北至三岔河,由伪第二营担任,营长孙海山带两个连驻陶赖昭车站,另外两个连驻在松花江铁桥东西两端炮台内,松花江车站上还

驻一个机枪特连。南段由长春至窑门，由伪第三营担任，伪营长赵天骥带两个连驻窑门车站，另外两个连，一驻乌海站，一驻米沙子。

伪部队的任务是警备、保护哈长线铁路的安全，使日寇的运输线便利畅通。

这时正是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非常活跃，我昼夜不息积极来往各车站监督指挥，并督促在各站修掩体，因我布置周密，使沿线各站未受袭击。在七月，双城堡南二十余里及北十五里两处的铁路被破坏，我即各派一排步兵保护工人去修复。我的罪行是镇压阻碍人民抗日部队在铁路沿线的活动，便利日寇的运输，来对我东北掠夺侵略。

四、为日寇增添侵略势力收降五个营骑兵的罪行。吉林旧政权军队的一个机枪连排长李毓芝，在九一八事变后带着部下四十余人拉起了二百来人，住陶赖昭南二十余里村庄内。松花江街保甲长王魁拉起的二百多人住该街南十余里的屯子里。前在松花江套子里当土匪的宋(名忘记)有部下一百八十余人。李耀武是榆树县弓棚子的地主，也拉起了二百五十余人，住三岔河南村庄内。孙广兴(外号双好)本是吉林伐木工人，这时拉起有二百六七十人，住陶赖昭北一二十里村庄内。还有其他十余人当头目的(名均忘)，手下都有数十人不等，他们都互相认识，因不愿受日寇统治，都拉起一帮人在地方上活动。伪司令部常派日寇教官大川中尉来这一带指导护路事情。他每来都住陶赖昭街里日寇特务卖白面的柏谷家中。他通过柏谷把李毓芝等找到陶赖昭街上，打算以利诱手段收降。有一天，我到陶赖昭见了日寇大川，他告诉我这里有两千余人要投降，你得好好办理此事。我和他到街里店中见着了李毓芝等十余人，表示欢迎他们与日寇合作。我并保证投降后有一营人即给营长，有一连人即给连长。谈妥后，我同大川到长春见伪司令

官金璧东，金派我和大川赴吉林与熙洽连络。到吉林见熙洽后，他只应许收编一个营，我即说明收就得全收的理由，他才应许全收。我又回长春报告金璧东，他派伪少将部附杨殿云和我及大川三人回陶赖昭，收编李毓芝为第一营长，王魁为第二营长，宋为第三营长，李耀武为第四营长，孙广兴为第五营长。这时他们部下都有四百多人，故给营长。这两千多人，即编为伪吉林铁道守备队骑兵营，即由伪部附杨殿云和日寇大川带领到榆树县讨伐抗日军冯占海。

我的罪行是以伪官职诱降他们，是直接增添了日寇侵略祖国的力量，打击了抗日部队。

五、我勒索人民的罪行。一九三二年四月，我在双城堡车站驻防，这时新收降的五个伪骑兵营驻在松花江老少沟，一时给养接济不上，伪司令官金璧东命我向该地(张家湾)商会借款暂垫，先后由我出具借据，借了共有两千元。这是我依仗伪军官势力向人民强借勒索巨款的罪行。

六、我滥捕无辜，破坏人民抗日活动的罪行。我所属的伪第二营第五连驻在松花江铁桥。一天，伪部队在桥上检查出炸药十余斤，已绑在桥身铁架上。于是伪部队即在附近搜索，于距桥下约十公尺处发现形迹可疑者一人，当由伪部队加以逮捕，我立刻命令他们连人带炸药一并就近送到伪吉林铁道守备队司令部处理。

七、杀害和打击人民抗日部队的严重罪行。我所属伪部队第二营第八连驻陶赖昭车站，伪连长王某(名已忘，他是敦化县保卫队长出身)，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该连拉走了十余人，王连长即率队前往追赶，至陶赖昭东北方十余里地方时，没有追上拉走的人，却遇上了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双方就接了仗，结果人民抗日部队中有五人牺牲。王连长想借此报功赎罪，就将牺牲者的人头砍下带回

放在陶赖昭车站木栅栏下。这时正好我由双城堡车站赴长春伪司令部办事，经陶赖昭时，伪第二营长孙海山和王连长均在站台，见到了我，就向我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并领我前往观看被砍下的人头。我当时看到他们这样残忍行为，未曾表示什么态度。我至长春后向伪司令官金璧东报告，结果未对王连长处罚。

〔中略〕

十一、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率领的伪铁道守备第二队，奉令缩编为两个营及一个迫击炮连，其余伪部队均转属他处。缩编后，伪第一营营长更易为邢维顺，率所部驻吉长线下九台车站，担任下九台至长春间的警备。伪第二营营长更易为李文涛，率一个连驻哈长线松花江桥，担任松花江桥至长春间警备。队本部率伪迫击炮连和伪第二营两个连驻窑门车站。我就在这个月开始进行对伪部队的官兵实施奴化教育，除军事训练外，尤注重精神教育，灌输给他们"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同文同种"等荒谬思想。并由我每天率领着他们拜伪国旗，唱伪国歌，张贴标语。还叫他们去尽心尽力将铁路保护安全，以供日寇掠夺和侵略的便利。

〔中略〕

十三、我赴日见学，回伪满后大事宣传日寇军事威力的罪行。一九三三年十月伪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派我赴日本见学陆军秋季大演习，与我同去的有伪满各地的伪军官四十余人，由奉天伪警备司令官于芷山率领。到东京后，参拜神宫，拜裕仁的宫城，后至福井县见学陆军大演习，看见日寇天皇裕仁。以后在东京参观了帝国大学，寻常小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学校的实弹演习，户山陆军技术学校，三菱的坦克车工厂，大阪的大造兵厂，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我在日本的见学和参观历时共四十余天，我对日寇的一切，真是崇敬佩服到了极度。我由日回伪满后，又将每天见学参观

的日记，印成了三十本，题名为赴日见学日记。送给朋友李文炳等，并向伪部属的官兵大肆宣传日寇的军事威力。这是我自己死心塌地去做日寇帮凶外，还影响伪官兵也去死心塌地做日寇帮凶的罪行。

十四、一九三四年讨伐人民抗日军的罪行。一九三四年九月，我在伪第四教导队长任内，奉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命令，带领教导队的第四骑兵团去五常县境讨伐抗日部队宋德林。我到五常县城得到伪县长及伪警察报告，有抗日军四十余人，在县城东北十余里地方活动。我当即派团附日寇前林带第四骑兵团全部即时出发(这时团长尚未到)。次日在县城东北方二道河子树林里与抗日军赵尚志将军接仗，抗日军即向东南方退走了，双方并无伤亡。伪骑兵团向该方面追击，此时我带司令部移驻县城南三合屯。伪骑兵团追至向阳山，即在该地和三合屯一带搜索十余日，至十月初旬回哈尔滨原驻防地。此次讨伐历时二十余日。

十五、一九三五年讨伐人民抗日军的罪行。一九三五年二月，奉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命令，我为讨伐总司令，往五常县境讨伐抗日部队宋德林。带的兵力有伪第四教导队步兵第四团团长梁秉忠率一个营，一个迫击炮排，配属的有滨江地区步兵二十三团团长邓云章率步兵一个营。伪吉林第二教导队步兵一个营，一个迫击炮连。我先带伪教导第四团的一个营及迫击炮一个排到五常县三合屯，同时命令吉林配属的一个营及迫击炮连，在五常、舒兰交界处堵击。这时接到向阳山(在三合屯东南五十余里)伪警察报告，有抗日军宋德林带四十余人由沙河子奔来。我即派梁秉忠带伪步兵一营，迫击炮一排，奔赴向阳山。宋德林见有伪军来援，即向南方撤退。梁团即进驻向阳山。次日邓云章团长率一个营到三合屯，我即令他向沙河子方向追击抗日部队。第二天夜间追至沙

河子附近，和宋德林接仗，宋即撤往东山里去了。这次接仗的结果，是抗日部队伤亡十余人。

〔中略〕

十七、讨伐赵尚志将军的罪行。一九三五年八月我转任伪第四军管区参谋长，任务是：辅佐司令官办理司令部一切事务，与各部队的联系，拟制讨伐计划，管辖部队的教育训练。

一九三七年一月，基于哈尔滨日寇驻屯军莲沼部队的命令，伪第四军管区在滨江地区进行春季讨伐。我下达了伪司令官郭恩霖的命令，命滨江地区伪司令朱榕带领两个旅讨伐赵尚志将军。朱榕率领的伪部队驻绥化县城。讨伐经过是朱榕指挥伪混成第十八旅旅长王作振带步兵团奔巴彦、呼兰，伪骑兵团由海伦向庆城、铁骊、巴彦方向讨伐；伪步兵第十七旅旅长邓云章带伪步兵第二十三团团长孙凤翔由延寿向木兰、巴彦方向讨伐，伪二十五团团长贾祥林由一面坡、苇河、珠河向木兰、巴彦进行讨伐。在讨伐过程中并无接触，约月余结束。

敌伪军每年春秋两季多进行讨伐，这次就是春季讨伐，故抗日联军在此时便分散隐蔽于山里，没有接触，但是妨碍了抗联活动，使他们打击日寇增加了困难。伪部队并给人民带来了很大骚扰。

十八、我向人民强派勒索和骗募慰问金，支援日寇侵略军的罪行。

（一）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在哈尔滨充任伪满第四军管区参谋长，因伪司令官于琛澄兼任伪三江省长，不在哈尔滨，伪司令部的一段事务由我主持。此时正是日寇发动“七七”事变，进行侵略华北。伪司令部的日寇顾问西泽少佐，将伪滨江省长施律本请来顾问部，要哈尔滨官商各界捐款慰问侵略华北的日寇军。施赞成日寇的提议。他们就将我找至顾问部征求我的意见，我亦一口赞成。

于是我就和施省长偕同至伪司令部，由我以电话请哈市道里道外的商会负责人到伪司令部，西泽顾问亦接踵而来。商会代表询问慰问款的数目。西泽宣布全部捐额为一万元，军方负担两千元。结果征募慰问金由施省长负责办理。

（二）在此同时，有哈尔滨各伪报馆主办的为募集慰问侵略华北日寇军款项的义务戏，在新舞台演唱。那天，他们将施省长和我请去讲话，我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要求哈市人民大力支持慰问金的募集；一方面我宣传了日寇军的威力和在华北的辉煌战果。

十九、准备三江地区大讨伐的罪行。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三江地区开始大讨伐。区域包括十四个县，以佳木斯为界，分东西两区：西部地区由日寇军讨伐；东部地区由伪军讨伐。统归日寇防卫军山下奉文直接指挥。东部伪军由伪三江地区司令官朱榕指挥，率领兵力直辖的有：伪混成二十二旅，旅长鹏飞（骑一团、步两团），伪混成二十三旅，旅长崔文林（三八年八月换周大鲁）。由牡丹江伪第六军管区转入的步骑兵各一团，黑龙江增援的一个团，吉林增援的有一个伪骑兵支队（即是骑兵团）。在讨伐进行中，又有参加的伪部队：黑龙江伪步兵二十一旅，旅长冯广友，滨江地区伪步兵第十七旅，旅长邓云章，兴安东地区绰罗巴特尔伪骑兵支队（三个骑兵团）。讨伐对象是抗日联军第三军长赵尚志，第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长周宝忠〔中〕，第六军长夏云阶，第七军军长宝满，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第十军军长王荫武。讨伐期间至一九三八年九月结束，历时一年。在三江地区这十四个县遭到的大灾难是无法形容的浩劫，抗日联军和人民被屠杀及负伤者共有三万余人，烧毁扒塌房屋、征用骡马车辆不计其数。

在讨伐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由伪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命令，自牡丹江第六军管区转入第四军管区步骑兵各一团，伪步兵二十六

团，团长韩（名已忘），伪骑兵三十三团团长宫超。由我辅佐伪司令官郭恩霖下达命令，将这两团配属于佳木斯三江地区伪司令李毓九管辖。十二月因三江地区抗日联军很活跃，伪治安部又给增拨黑龙江骑兵一个团，团长高广寅及吉林一个伪骑兵支队（即是骑兵团），队长陈梦麟。这些伪部队也是由我辅佐伪司令官下达命令，将这两个增援部队改配属给三江地区伪司令部指挥。这就是我在讨伐前给三江地区配属了增援部队，为抗联和人民造成了残酷大屠杀，是我的滔天罪行。

二十、我充任伪驻日大使馆武官的任务和管理伪满留日学生的罪行。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奉令转任为伪治安部参谋司附即派驻日伪大使馆附（伪满官职名称，系附属于伪大使馆）武官，驻在东京。武官室设有辅佐官一名，由伪上校于澄充任，一九三九年八月更换为伪少校金玉琪。日系属官一名，姓田中，打字员一人（当地雇的）；伪治安部最高顾问驻东京连络人松平，每月仅由伪武官室领六十日元，无业务关系。一九三九年由伪治安部派伪上尉溥杰为武官室勤务，实际没有负责事务，是日寇最高顾问用这名义叫他在日本准备考陆军大学的功课。

武官任务是参加驻在国的一切仪式，调查驻在国的军事力量，军队、武装、武器等，是国际上公认的搜集一切有关军事情报的机关。但伪满表面算是独立国，也派大使武官，实际是日寇的殖民地国家，政治军事都在它的统治之下，不可能有军事情报的工作。

我的任务是管理伪军的留日学生。伪满留日学生的数目如下：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到任时，原有的伪满军官在日留学生陆大的赫慕侠少将等以下十人；士官学校步兵科十人，军需学校、军医学校各二人；海军学生何正卓等八名，在东京商船学校，继入横须

贺海军学校;语学学生(专学日语的伪军官)一名(一年回伪满,再送新的,至一九三九年停止)。九月由伪满送入士官学校骑兵科十名学生。以上学生都是那时伪满国籍的中国人。

一九三八年八月,陆大、士官步兵科、军需、军医等处学生毕业回伪满。九月由伪满送入士官学校三十人,军需、军医学校各两名,兽医学校一名,以上都是当时伪满籍的中国人。此外伪满日系留学生在步兵、骑兵、炮兵、技术(修理军械)、防空等五个学校各两名,一年毕业回伪满又送来新的,也是伪日系,至一九三九年停止。

一九三九年九月,军需、军医、兽医(一九三八年入学的)、士官骑兵科(一九三七年入学的)等学校及海军学校(一九三七年原有的)等留学生毕业回伪满。

一九四〇年九月士官学校的三十名(一九三八年入学的)留学生毕业回伪满。

我还参加学生的入学式、毕业式、演习及每月发给薪饷等。并且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每隔一两个月,召集全体学生会餐,藉此考察他们有无对日寇不平不满的表现,并对学生加以指导训话,大意不外所谓日满亲善,各人应努力学习军事技能,遵守学校校规,将来以做皇军的一翼等麻痹奴化他们的话,故未发现有反满抗日分子,但若发现有所谓思想不良者,我是有责任要举发的。这是我监视、奴化、指导伪军官学生,为日寇培养大批忠实帮凶的罪行。

二一、我两次参加的"日德意防共协定"纪念会与世界人民为敌的罪行。于一九三七年、三八年的十一月,我两次参加了由日寇的日德意防共协会主办的"日德意防共协定"签订纪念大会。两次的大会场地点均在东京小石川区后乐园运动场。主办该协会的首脑人都已忘记了。我记得一九三八年那次参加的有日寇陆军省陆相板垣征四郎,海军省、外务省、希特勒德国驻日大使欧托,法西斯

意大利大使及各该国的陆、海、空军武官。伪满驻日大使馆被邀参加的有伪大使阮振铎、日系参事官、秘书官、我和伪辅佐官于澄上校。其他参加者还有日本青年男女学生两千余人，每人均手执纸制日、德、意国旗。〔中略〕

二二、我在伪武官任内慰问日寇侵略祖国的伤病兵和其他活动的罪行。

(一)一九三八年五月，伪治安部最高顾问东京连络人松平(正敏?)对我说：武官到任以来，很有好评，我家在涩谷区附近，有许多出征军人，武官若能去慰问，将来能得到日本的勋章等语。我就同他到涩谷区他家附近，慰问了二十四家侵略我祖国的日寇军人家属，每家给了五日元，这是我自己的钱。一九三九年六月到北海道慰问日寇陆军病院。一九三九年八月慰问东京日寇第三陆军病院。一九四一年二月慰问九州日寇佐世保海军病院，每病院均送慰问金三十日元，是伪治安部的钱。这些病院中都是日寇侵略我祖国的伤病兵。为此曾得到日寇陆军省及海军省寄来的感谢状。

(二)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接任伪武官后，到十二月我加入了驻东京的国际武官团(伪满在这以前未参加该团)，团长是以到东京年限最多的武官担任，这时是英国少将皮克特，后换意大利及泰国武官为团长，加入的有德、意、英、美、法、罗马尼亚、波、比、泰、芬兰、土耳其、苏联等各国驻日的陆海空军武官。每年春秋两季有会餐，无其他行事。

〔中略〕

二四、伪满江上军的编制和任务。一九四一年二月，我转任伪江上军中将司令官，驻哈尔滨。任务是本管江上的治安，巩固国防，警备江防。由五月至十月在伪满国境线上的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指挥分遣舰艇炮艇来往巡视，对抗日联军和苏联监视、警备，在

松花江上是警备抗日联军的活动,保护日寇的运输。教育训练伪江上部队,每年七八月间监督舰、炮艇联合演习一次,约一个月期间。精神教育用所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同文同种”及“惟神之道”等奴役麻痹的方针,并为军法会审长官。

伪江上军的编制是伪司令部中有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管下有训练处、作业队、补给本厂及三个地区队。指挥舰艇十一艘,炮舰十六艘,共二十七艘(有一艘“利绥”不能行驶)。最大的舰艇四艘(顺天、养民、定边、亲仁),每艘重三百吨。其次的舰艇六艘(大同、利民、熙春、阳春、兴亚、兴仁),每艘重六十吨。炮艇最大的三十吨,有六艘(近江、晓江、另四艘名忘记),十五吨的炮艇有十艘(名忘记)。

训练处是练成培养伪江上军的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分轮机(操纵江舰机器)、甲板(舰上勤务)、通信(无线电、旗语),精神教育,专以惟神之道、一德一心等去奴役麻痹。分班受训练的共约五百人。处长伪日系上校落合,教官安孙子以下十数人(都是日寇的退役海军)。

作业队等于工兵业务,练习舢板船、架桥及一般步兵教练,队长由日寇伪训练处长落合兼任,共有伪军约八百余人。

补给本厂,厂长伪日系少将(名字忘记、海军出身),专修理舰、炮艇及施行冬营训练。

冬营训练是封江以后,舰、炮艇的伪官兵到本厂,施以轮机、甲板等教练。

地区队共有三个:黑龙江黑河地区队,队长日寇营野中校,有伪军约二百余人,连排编制,配备三十吨炮艇两艘。乌苏里江虎头地区队,队长刘上校(名忘记),有伪军约五十余人,配备十五吨炮艇两艘。松花江富锦地区队,队长赵竞昌,有伪军约百余人,连排

编制(?),配备舰艇六艘,炮艇八艘,三十吨、十五吨重各四艘。

地区队的任务是补给燃料,分遣江防炮艇警戒国境线,在黑河、虎头地区队队部设有瞭望楼,用望远镜对苏联监视。

伪江上军一共约有两千伪官兵。

〔中略〕

二七、一九四二年五月出船后,近江、晓江两炮艇巡逻乌苏里江,开进兴凯湖。据报告因风大炮艇越过苏联国境,立即有苏军飞机向之扫射,打死炮艇队长伪日系军官小林上尉,这两只炮艇便跑回伪满国境。此事件经日寇顾问内田实中佐指示不准发表。这是越境事件,我应负最高责任,故也是我的罪行。

二八、判处何正卓十年徒刑的罪行。何正卓曾在日本普通学校留学,在汉奸曹秉森当伪驻日武官时,经他手何又考入伪满的海军学生,被送入东京商船学校后转横须贺海军学校,于一九三九年毕业回伪满,即任伪江上军训练处教官,中尉阶级。一九四二年三月(春)一天星期日,何到我家来,说有日寇宪兵调查他。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日宪认为他是党员(他当时没有说是什么党)。我又问他是不是党员呢?他说不是。接着问我这事怎么办?我告诉他若不是就没有关系,若要是党员的话,或是自首,或是走。第二天何即失踪了。〔中略〕事隔不多日,听说何被日寇宪兵由沈阳抓回来了。两星期以后日宪认为何是反满抗日,送到伪军法处军法会审,因何在日本留学时,曾加入过国民党,又畏罪潜逃,但实际何在哈尔滨并无任何活动,我为了符合日寇宪兵队的意思,从严办理,批准盖章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判处了何正卓十年的徒刑。这是我帮助日寇镇压当时的爱国分子以巩固它的统治,判处了何正卓十年徒刑的罪行。

二九、一九四二年九月我转牡丹江第六军管区司令官。

管辖区域:牡丹江省、间岛省共九个县。任务:维持管内治安,官兵教育训练,管区征兵及军法会审长官。官兵的教育训练,使之信仰“惟神之道”及“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同防卫”等。

司令部编制:参谋处、副官处、兵器处、军需处、军医处、兽医处、军法处、兵事处。

部队:第七混成旅旅长金毅,后换谷麟山、刘玢,步兵第八团团长杨崇武,驻宁安县,骑兵第十九团团长赫福林,驻延吉。第三工兵队,队长高凌蔚,驻宁安。第五高射炮队、第六自动车队、第六通讯队,队长皆系日寇(名忘记),驻牡丹江市。特设队,相等于三个步兵连,因全用朝鲜人编成的,故叫特设队,驻间岛省明月沟。

伪第六军管区的官兵一共约有五千二百人。

三十、建立伪神庙的罪行。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在牡丹江第六军管区司令官任内,因为伪皇帝特命检阅在即,以表示忠实推行日寇的奴役训练方针,更进一步以“惟神之道”麻痹伪官兵起见,在司令部院内修建了一个建国元神小庙(即日寇天照大神),每天上班,由我率领部下先向神庙参拜,然后向东南方对日寇皇宫遥拜,最后向长春伪帝宫遥拜。在这次特命检阅毕讲评时,伪第六军管区曾得到良二等的表扬。这是我忠实执行日寇奴役东北人民政策的罪行。

三一、迫使饭馆子营业遭受损失的罪行。一九四三年五月我为使部下驯顺地听从我的命令给日寇作忠实的帮凶,曾勾结牡丹江省长日寇三谷清,强使牡丹江市和宁安县城的饭馆子对于伪国兵每星期假日在街里饭馆子吃饭时不得提高价钱,得按配给的要求。伪省长三谷清遂命令当地警察通知各饭馆遵照执行。我并以伪司令部名义通知第六宪兵团监视各饭馆执行。因饭馆营业需用的材料配给来的是不够用,大多以高价私买的,必须贵卖,才能少

有盈利，藉可维持家族生活。顾客如果按配给价，饭馆子只有赔损倒闭，因而迫使他们到了星期日不得不自动停业一天。这是我迫害人民饭馆子营业的罪行。

三二、强制征兵的罪行。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命令兵事处长唐纪荣上校召开本年度征兵准备会议，决定编成两个征兵班，每班设征兵官一名，辅佐官一名，军医官一名，军士文牍三名，并配属伪宪兵团派的宪兵两名，即派唐纪荣为牡丹江省征兵官率领一班，另一班派伪中校某(姓名忘记)为间岛省征兵官率一班，于七月间开始征兵。征兵期间我亲自到过汪清县及穆稜的八面通视察、督促，结果有东北青年一千九百人被我强征为国兵，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全部入伍。又一九四二年度由前任伪司令官日寇美崎丈平强征的一千四百伪国兵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在我任内全部入伍，由我奴化训练。这是在我任内一共强制了东北青年三千三百名来帮助日寇残杀我中国人民的罪行。

〔中略〕

三四、枪杀共产党员的罪行。于一九四三年年末由牡丹江日寇第五部队(实际就是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是日寇山下奉文)，送来一名共产党员李某人(名忘记)，乐亭县人，即以军法处长姚树勋(台安县人)为检查官，日寇军法官山崎上尉开军法会审。经会审结果，李某供认是共产党员，在伪满东部国境线上作间谍活动，被日寇逮捕。我即以军法会审长官资格批准盖章判处死刑，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执行枪决。

三五、一九四四年四月我转哈尔滨任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

军管区区域：滨江省一旗、十六县和一个市。

任务及军管区司令部的编制：同第六军管区。

所辖部队(到任当时)：混成第十七旅旅长日寇女屋(后换刘显

良)，旅部驻哈尔滨，骑兵团(团号忘记)驻珠河。步兵团二十五团团长蒙继泮，驻热河、宽城、喜峰口及其他三处，归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指挥；第四高射炮队分驻在抚顺、鞍山、本溪，归奉天高射炮队司令官张大任指挥；第六工兵队队长纪清源驻阿城，第四工兵队队长赵明达，第四自动车队队长日寇左武中校，第四通讯队队长日寇，均驻在哈尔滨香坊。各部队的总数约有八千余人。

三六、初度巡视的罪行。我任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后，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初度巡视，到抚顺、鞍山、本溪视察，鼓励第四高射炮队的防空训练及教育，给伪官兵讲话，大意说抚顺、鞍山、本溪是工厂矿山重地，正是太平洋战争紧迫之际，对防空任务要特别努力，要服从高射炮司令官的命令。又到沈阳访问了伪高射炮队司令官张大任，因他对我部下高射炮队的指导训练表示谢意。然后至热河承德访问第五军管区伪司令官赫慕侠，对他指导训练我部步兵第二十五团表示谢意，又到宽城、喜峰口及其他三处巡视警戒状况并加以鼓励，给伪官兵讲话，大意说你们是驻在国境线上，在警备上要严密注意，对面即是八路军，如有讨伐时要特别努力，服从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的指挥。巡视共十余日回哈尔滨。

三七、强征伪国兵的罪行。一九四四年六月召开了征兵准备会议，决定组成三个征兵班(同伪第六军管区征兵班编制)，我派兵事处长陈上校(名忘记)及其他二名日寇军官(姓名忘记)为征兵官，于七月开始征兵，我并亲到双城、延寿、呼兰视察，督促征兵进行状况。结果强迫了三千四百五十名东北青年给日寇作炮灰，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入队。

〔中略〕

三九、改编、增加辎重、工兵队的罪行。一九四五年二月接到伪军事部命令，伪第四军管区的混成第十七旅改编为步兵旅，旅长

刘显良，即是把驻珠河的骑兵团团长邓明俊改为步兵第二十三团（步兵二十三团仍在热河）并增添了三个工兵队和一个辎重队，每队五百人，我即把三月一日入队的伪国兵中以两千名编成了第四辎重队，第二十三工兵队驻哈尔滨香坊，第二十二工兵队驻哈市江北松浦镇，第二十一工兵队驻珠河。这时伪第四军管区的部队共约有八千人。

〔中略〕

四一、管下各部队交与日寇指挥作劳工的罪行。一九四五年七月末，接到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命令，把伪第四军管区各部队统交哈尔滨日寇防卫军司令官中村少将的指挥。我即把驻珠河、阿城的工兵队调回哈尔滨及在哈的（香坊、松浦镇等地）的各部队除通讯队、自动车队以外，约四千人统交与了日寇防卫军指挥，即在哈市四郊修军用道路和防战车壕。八月初我同日寇顾问须藤岩治去故乡屯附近视察，鼓励伪第二十一工兵队的作业，并对伪官长训话，大意说努力工作，听日寇的防卫军的指挥。

〔下略〕

119—2—1164—1—5

郭文林笔供

(1954年5月11日)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四十九岁,男,达呼尔族,内蒙古自治区呼纳盟海拉尔市西大街,家庭老官僚、军人。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中将。

详细履历:

一九一四年,入海拉尔街蒙旗两级小学校,一九二〇年毕业。一九二〇年,入海拉尔街蒙旗中学校(在学三个年)一九二二年插入齐齐哈尔中学校,一九二六年毕业。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家经理家务。一九二八年,赴日本留学预备一年四个月。一九二九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同年四月一日入日本东京市世个谷骑兵第一联队见习六个月,同年十月一日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一九三一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八月中旬回到祖国,在家闲居。九一八事变后,由同年十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伪满成立在此期间内搞蒙古自治活动。一九三二年,任骑兵上校,补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一九三三年,补禁卫步兵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入奉天伪满陆军训练处专科学生班,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毕业。一九三六年,补侍从武官。一九三八年,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一九三九年,任陆军少将。一九四〇年,补伪满第二师师长。一九四一年,补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一九四三年,补伪满陆军兴安学校校长。一九四四年,补第十军管区司令

官任陆军中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投降苏联军。（中略）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由日本回来后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间的活动。

我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由日寇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回来后无职业在家闲住。正在这时候由日寇关东军来了一个参谋森赳少佐，由于当地特务机关斋藤忠之少佐的介绍，与我在特务机关会见，他要求见贵福都统和凌陞（此人是当时的鄂勒特旅旅长，呼伦贝尔都统公署驻北京代表）。会见后要求看看当地的蒙古军队（都统公署的卫队一个营，计二百余人），他得到许可后，由我引导先到营内参观了兵营内生活情形，而后看了野外战斗教练，参观完了，他请我一同到他的住处特务机关。这时候斋藤忠之请吃饭，在吃饭喝酒闲谈之中泄漏出这样的言词，他对我说："你的前途光明，你是由日本陆军士官毕业的，受过日本的教育，一旦有事的时候可否与我联络，你可知道好机可乘，不要失去机会。"这时候我很高兴恭恭敬敬的接受了他的话，这是我登上反中国人民反祖国反中华民族道路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伪满政权成立之间的活动。

我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翻译的名义随着凌陞（此人是大活动家）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由海拉尔起程，同月的二十三日到达奉天。我到奉天后，带着森赳少佐的介绍信去见日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上尉，他很表示欢迎。对他说明来的意思，他同意与凌陞见面谈话，我得到许可后，回到旅馆（日本站万国旅社）。第二天上午同凌陞到关东军司令部见片仓参谋，由他的介绍会见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凌陞对他说明了来意和目的，目的是协助蒙古民族取得自治权和征求对蒙古问题意见如何？板垣征四郎

说:"现在不能明确地答复,但是很愿意帮助你们的活动。"谈话完后,我二人辞别,到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处同他会见,凌陞说明来意,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很表示同意。我同凌陞达成目的,于同年十一月十几日由奉天起程回到海拉尔。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海拉尔起程,十二月三日到奉天。这时候蒙古王公都聚在奉天活动(我所知道的有温亲王阳森扎布、图谢图王业王爷、诺勒尔格尔公、巴公爷等人),这时候我担任翻译连络的事务。还有阳森扎布为维持该旗的经济萧条(这时该旗因为蒙古自治军的到处吃喝而受到很严重的损害),因而由关东军和奉天市公署借用十万元(当时奉天市长是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通知凌陞借给王爷阳森扎布,但是当时阳森扎布已回旗不在奉天,这时候凌陞派我到郑家屯去报信连络。我接到凌陞的命令后,冒着危险到郑家屯报信,忠心耿耿达成任务,回到奉天受到凌陞的夸奖。

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后,为巩固其占领地位,迅速地建立忠心为日寇服务的军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上尉指示我急速回海拉尔,召集有初中程度的蒙古青年二十名,来奉天日寇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训练六个月后,作为将来在海拉尔编制军队的骨干。我接受指示后得到凌陞的同意,于十二月十日由奉天起程,同月的十三日到达海拉尔后,得到当地贵都统和当地驻军苏炳文的许可,开始宣传召集工作,很顺利的完成任务。召集了满登泰(此人已战死)、胡复光(此人战死)、富格吉苏(此人伪满军中校退职)、莫得尔图(此人八·一五当时陆军兴安学校军士候补者队队长上校)、郭通尚(此人于一九三六年判十五年押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病死)、郭文通(此人八·一五当时铁石部队的骑兵团团长少将)、拉玛松(此人伪满陆军中尉因病退职)、额仁泰(此人伪满海拉尔警察学校教官)、倭兴台(此人于一九三六年判十四年在齐齐

哈尔陆军监狱内病死)、委兴泰(此人伪满军少校退职)、喜拉布(此人八·一五当时中校)、阿钦嘎、双和尔等十三名,同月的二十一日我带领他们由海拉尔起程,于同月二十四日到奉天,当日下午送入了奉天日寇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二中队受训练(第二大队长道本中佐,第二中队长小野上尉)。他们入队后,片仓大尉指示住在奉天监督,鼓励他们的学习。于一九三二年三月间贵都统凌陞到日寇守备队视察他们受训练的情况,看了他们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训练完了后,我到奉天接他们回来。我到奉天后,到日寇第二大队,由日寇守备第二大队长道本中佐领导到关东军司令部致谢。我代表致谢词,我致谢词完后,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大将夸奖他们学习好,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努力。而后一同在日寇司令部的楼上照像,参加者本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少将、板垣征四郎、片仓衷、道本。当日晚间,由板垣征四郎在志诚饭店设宴欢送,祝贺他们前途光明。宴会终了后,当日晚车送他们回海拉尔。以上我说的铁一般的活动事实,说明了不但我已经走向反祖国反人民反中华民族的道路上,而且受日寇的驱使,拉拢善良的蒙古青年同我一道给日寇充当走狗,走向反祖国反人民反中华民族的黑暗的道路。

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凌陞接到熙洽拍来的电报,电文的内容大旨如下:有要事商议,急到吉林。凌陞接到电报后与我一同〈于〉一月九〈日从〉奉天起程,十日到达后住醉仙饭店,下午到吉林长官公署会见熙洽(当时自称吉林省长官)。熙洽说:与日寇协议为安定东北时局的结果,请溥仪出马安定东北时局。十二日回到奉天,准备到旅顺会见溥仪。于一月二十日由奉天起程,同月二十一日早到大连,当日十一时由大连到旅顺会见溥仪。这次一同到旅顺的有赵作人、张景惠、张燕卿、郭尔勒斯旗王爷,齐默特色莫丕

勒、凌陞、郭文林。这时候溥仪早已由天津来到旅顺，住在肃亲王的旧宅。张景惠等人到达后由罗振玉的引导在楼上会见溥仪，由张景惠代表表示来意：东北人恭请出马安定时局。此时溥仪答复我考虑考虑（这事已经溥仪与关东军之间商议决定，张景惠等人的这一行不过形式而已）。我等一行大功告成回到奉天，以后我随着凌陞一同回海拉尔。于同年二月二十日随同凌陞由海拉尔起程，于二十二日到长春，在此等候伪满政权的成立。三月七日溥仪到长春，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仪宣告独立，成立伪满政权（年号大同），在旧道尹公署的官厅内设立执政府。三月十五日由于凌陞的推荐，任骑兵上校补侍卫官。侍卫处处长金伯公中将、侍卫官金毅上校、宪基少将、赵砚农上校、郭文林上校。侍卫官的职务是伺候、侍卫、随从。我在侍卫官期间内的活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间溥仪出席伪满立法院成立式典时（立法院院长赵欣伯），我侍从溥仪到伪满立法院，我忠心耿耿侍卫他安全无事回府。

一九三二年六月受伪满执政府警备处长佟济煦的命令兼护军统领，护军统领的职务是担任执政府的警卫、指导、教育、训练。我到任时护军还未成立，我到任以后佟济煦（此人已死）的协力指导之下开始编制。由于佟济煦拜托我通过伪满兴安东分省长额勒春和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陞二人由该两省招募来二百余名的蒙古、达呼尔族的青年。招来后成立统领部（直属于伪满执政府警备处），统领一人郭文林、副官一人、军需一人。成立护军：第一队队长是吴天培上尉（已死），一百二十名；第二队队长李国雄上尉，一百二十名，共计二百四十名。护军的三分之二是蒙古人、达呼尔人，三分之一是宗氏。我时常对护军讲话，题目是护军的任务是重大而光荣、日满亲善、友邦日本之强大。以上是我在护军统领期间内活动的事实。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兼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团附苏正铨中校（已死）、团附万嘉熙上尉。团本部以副官处副官渡边次郎上尉、李遇文、军需处方珍需少校、佐佐木又雄，军医宪均少校。步兵一个营，营长李夔坤中校、营附玉琦中校。团长的职务是指导、教育、训练。禁卫步兵团的任务是担任执政府外的警备。

我在禁卫步兵团团长期间内的活动：一九三四年五月间到吉林见习伪满第二军管区被检阅的情况（伪满政权成立后的头一次特命检阅）。回来后督励全体军官准备被检阅。由同年五月下旬特命检〈阅〉使一行到本团检阅，课目是：阅兵、室内巡视、主要文件、书类检查（秘密文件在内）、经理、军团教育、官兵的战斗技术。一九三四年伪满成立后开始第一批功绩调查时，我是本团的调查官，调查本团军官的功绩，写本团军官的考科表，制定他们的功绩的甲、乙、丙、丁功勋等级后，报送到军政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接到治安部大臣于芷山上将的命令，入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学生班受教育。这专科学生班是培养为伪满政权忠心服务的高级军官。第一期是二十名，尹贵亨、佟衡中校、郭若霖上校，乌古廷上校（蒙系）、刘牧禅中校、张大任上校、王斌上尉、洪涛少校、史维忠上尉、阿思根上尉、李文上校、常荫东上校、萧玉琛少校、张明九上校、贾湘霖上校、栾彪中校、姜鹏飞上校、张金祥、郭文林上校（蒙系）、郑光薰少校等二十名。主要教育是补习战术、日本语，学习成绩优良者留日送入日寇陆军大学。专科学生修学期间一年，我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修业终了后，补伪满宫内府侍从武官。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补侍从武官，同月十五日到任。武官长一：张海鹏上将，武官是陆军四：于宗谦上校、连组上校、郭文林上校、曹秉森少将（首席武官）；海军一：赵竞昌上校。武官长以下五

名。副官李香洲上校(武官长的专属副官)、副官葛湘南上尉(管文牍)、军需苏正绪上尉、翻译高木雄二。

我在侍从武官期间内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差遣我到哈绥线的穆林、林口、绥河等地慰问日寇军及日寇陆军病院,并慰问驻在绥芬河国境警备队,同时视察过该队的阵地。我回来后又差遣我到日寇关东宪兵司令部去慰问(司令官东条英机中将)。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差遣我到奉天伪满陆军训练处乙种学生毕业式传给恩赐品(怀表)。三八年三月间差遣我到旅顺慰问旅顺要港司令部和日寇陆军病院,三七年一月差遣我到承德、锦州慰问日寇军队和病院。

我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官是巴特玛拉布坦中将(此人我上任时不在,他参加伪满访欧经济使节团,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九日由长春出发,经由日本赴欧。经济使团团长伪满经济大臣韩云阶,副团长甘柏,团员巴特玛拉布坦中将、宪原少将、韦焕章、王庆章,主要是访问德、意两帝国)。司令官不在期间由伪满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代行司令官的职务。伪满兴安军管区部参谋处处长东田万次郎上校、副官处处长氏原上校、军需处处长宫崎正太郎中校、军法处长色丹扎布中校、军械处长大木中校、军医处处长木下一郎中校、兽医处长广泽中校。直辖部队:伪满兴安东警备军司令官绰罗巴图尔少将(司令部驻博克图),参谋长是曾根崎清臣中校,所属部队骑兵第一团团长敖瑞平上校(此人已死),骑兵第二团长金永福中校,山炮连一。

伪满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司令部通辽)甘珠尔扎布少将,参谋长德永恭助中校。所属部队骑第三团团长仁钦宁布中校、骑兵第四团团长豪斯巴图尔中校、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

伪满兴安西警备军(司令部驻林西),司令官郭宝山少将,参谋长由中野中校代理。所属部队:骑兵第三团团长洪金祥中校,骑兵第十团团长达来扎布中校,山炮连一。

伪满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官乌尔金少将,参谋长丹巴中校,顾问寺田中佐。所属部队:骑兵第七团(驻叔特恩庙),团长郭文通中校。骑兵第八团(驻海拉尔),团长索特纳莫中校。骑兵第九团(驻黑山头),炮兵连一(驻海拉尔)。以上是伪满兴安军管区的编制。

我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到任,我任前伪满兴安军管区已经派甘珠支队和绰罗支队参加讨伐,该两支队的编成和讨伐经过如下:

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官,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接到治安部大臣于芷山上将的命令,大旨是该司令官编成甘珠支队到承德入日寇军滨田中将的指挥之下,协助日寇军讨伐,被服、粮秣、弹药的补给由伪满第五军管区担任,人员马匹的补充由伪满兴安军管区担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接到命令后编成甘珠支队,支队长甘珠尔扎布少将、参谋长后藤有马上校、顾问野田又雄上尉(此人因病入院),后任市村太郎。部队骑兵第二团团长金永福中校,骑兵第三团团长仁钦宁布中校,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尼玛部队队长尼玛少校。

绰罗支队: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官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接到伪满治安部大臣于芷山上将的命令,大旨是该司令官编成绰罗支队到三江入于琛澄中将的指挥之下,协助该地区的讨伐,除人员马匹外,被服、粮秣、弹药的补充由该讨伐队担任。(中略)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驻在伪满国境的日寇军以一排的兵力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境,袭击国境监视哨,射死十数名,挑起了诺门汗事件(诺门汗是在海拉尔的西南方,距海拉尔约一百五

十余公里),由同〈年〉六月起双方逐渐增加兵力,因此伪满治安部于琛澄上将、最高顾问平林盛人少将,命令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官编成乌尔部队,入日寇小松原中将(此人诺门汗失败回日本后自杀)指挥之下,根据日满共同防卫议定书协助日寇作战,除人员、马匹的补充外,被服、弹药、粮秣的供给由伪满治安部担任之,海拉尔和前线之间的输送由奉天伪满第一军管区梁濑部队担任之。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官接到命令后,由我编成乌尔部队,队长乌尔金少将、参谋长丹巴中校、顾〈问〉市村少佐、骑兵第二团团长敖瑞平上校、骑兵第一团团长郭美郎中校、骑兵第七团团长郭文通中校、骑兵第八团团长索特纳莫中校、独立野炮连连长宫原辰之上尉。

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接到增援兵力的伪满治安部大臣于琛澄上将和顾问平林盛人中将的命令,要旨是:伪满陆军兴安学校的干事野村登江龟少将进〔晋〕级中将,补伪满兴安师长(我由苏联回来时在苏联),以伪满兴安师的全部兵力编成野村部队,入日寇军长野二郎的指挥之下,协助日寇军的作战,弹药、粮秣的供给由治安部担任,由哈伦阿尔山到前线之间的输送由伪满第一军管区担任之。伪满兴安军管司令官接受命令之后,由我编成野村部队,队长野村登龟江中将,参谋长后藤有马上校,顾问野田又雄上尉。部队:骑兵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清雄上校、山炮团团长平川森中校、伪满陆军兴安学校骑兵教导团团长金永福中校、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中校,另由伪满兴安南警备军调骑兵第十一团团长胡福泰中校,该团驻哈伦阿尔山掩护兵站。野村部队编成后,同年七月由钱家店出发,经王爷庙、索伦到哈伦阿尔山集中,后由此向前线前进。有的部队还未到达以前,前线的部队约有一连人由骑兵第五团的连长德尔格勒少校和团附王吉乐上尉率领投降,以后前线的部队因厌战一二百成群

退出前线各奔家乡，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受害很重。为说服他们收容他们，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派伪满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少将收容，结果大部分都收容，其中有十七名是被日寇大特务金川耕作（当时伪满兴南警备军顾问）和参谋长德永恭助杀害。一九三九年九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军和日寇军开始谈判，同年九月间停战协定签字，九月二十日双方停火，日寇军和伪满军（八月间由伪满第三军管区编成石兰部队（石兰斌少将）增援前线）全部退出前线，各回到原驻地。这次短短不到三个月的作战中，日寇军死伤两万余人，伪满军死伤四五百名，结果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和痛苦。

我在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期间内的活动：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到任后正值甘珠部队讨伐期间，我担任后方勤务，补充人员马匹，搜集情报、伪满治安部与伪满兴安军管区之间的连络、到各处扩大宣传甘珠支队讨伐成绩之良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甘珠支队由华北回来时，我代表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到承德参加该支队的凯旋式。

一九三九年六月伪满兴安军参加诺门汗作战后担任后方勤务，调补补充人员马匹，到各地宣传日寇和伪满军的战果，于八月八日由郑家屯（司令部驻在地）出发经由长春到日寇陆军病院慰问野村部队的顾问野田又雄上尉（此人在诺门汗受伤），由长春出发到前线连络和慰问日寇军及伪满军。在诺门汗前线兵因厌战不愿给日寇当炮灰而由前线退下来时，我协助司令官作成了说服收容计划，结果因为用了镇压的手段收容了大多数，其中数名不从而抗拒，因此以法处分，判三年，押送到齐齐哈尔伪满陆军监狱。

诺门汗作战结束后，由我统裁以在诺门汗所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来研究对苏作战。在十二月间铁岭、开原附近施行了现地战

术,被教育者在诺门汗作战有功者和有作战经验者(各团长)。

根据伪满治安部的指示作成了警备计划,它的内容是:有紧急事件时出动部队的编制、兵力配备、车马的征发、粮秣弹药的供给。我作成这计划后在各部队实地演了数次。

一九四〇年二月间接到伪满治安部大臣于琛澄上将的改编伪满兴安军和废除伪满兴安军管区,以原有的伪满东警备军和伪满北警备军合并编成伪满第十军管区,驻海拉尔;以原有的伪满南警备军和伪满西警备军合并编成伪满第九军管区,驻通辽。接到命令后开始编制,调动人员。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中将,参谋长德永恭助上校(顾问是日寇大特务金川耕作)。所属部队骑兵第三团团长洪金祥中校(驻林西),骑兵第六团团长达来扎布中校(驻林东),炮兵连(驻林西),废止骑兵第十团,第十一团团长补伪满第九军管区部附(胡福泰)。

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乌尔金中将,参谋长女屋岩上校(日本人),顾问市村中佐。所属部队:骑兵第七团,团长郭文通上校(驻查甘鄂博);骑兵第八团,团长丹巴上校(驻海拉尔郊外);炮兵连(驻海拉尔),废止骑兵第一团;第九团,团长伪满司令部部附。

伪满兴安师改编为伪满第二师,原伪满兴安师师长野村登亀江中将退职,以原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郭文林少将补伪满第二师长,参谋长东田万次郎上校(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一九四〇年九月间东田转勤,后任参谋长久保田源次郎上校)。所属部队:骑兵第二团,团长敖瑞平上校(驻博克图,此人于一九四一年病故),以骑兵第四团改编为步兵团,团长正珠尔扎布上校(驻钱家店),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上校(驻昌图,原伪满兴南警备军),山炮团,团长平川森中校(驻钱家店),废止骑兵第十二团和迫击炮团。

我在伪满第二师长期间内的活动：

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到任后，司令部移驻郑家屯。

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国兵法颁布后，在八面城设准备国兵入营教育，由各团内选拔最优秀的和下士官的教练连，我为鼓励他们的学习，常常到该连视察。

一九四一年六月间接到伪满军事部的命令，大旨是：伪满第九军管区编成作业队到乌荣扎拉构筑阵地，一切给养及工事用材料由伪满治安部担任，到现地后受伪满治安部的指示，工事一切皆受伪满治安部高级顾问藤村谦少将的指导。我接到命令后以山炮团团长平川森中校任作业队长，编成作业队（计三、四百人），由钱家店出发到现地（乌茶扎拉嘎是在王爷庙的西南方，距王爷庙一百二十余公里，在兴安岭山脉），开始工事，同年六月中旬因为平川作业的成绩不良，命令该团全部回原防地，以步兵团团长正珠尔扎布上校任作业队队长，编成作业队（一部分留守外），接受工事任务，于一九四〇年九月间命令作业队全部回原防地。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王岗事件发生后，我接到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的指示，在参谋处由参谋一名专担任思想对策的任务（日系人），直属于顾问部。任务是调查满系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动向，直接报到顾问部。各团连是日系团附连附，专担任思想对策的任务。我接到指示后，遵照办理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任伪满兴安局总裁，长春，我的后师长是山崎积少将），参谋长向日俊雄上校，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谋处长后藤中校，副官处处长梅口太郎中校，军需处处长松本少校，军法处处长色登扎布中校，军械处长荒木中校，军医处长木下中校，兽医处处长荒木中校，军事部通辽病院院长是由军医处长木下中校兼任，陆军看守所。

我在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期间内的活动：

我参加过每年一月间在伪满军事部召开的司令官会议，在会议上报告直辖部队的教育训练、管区内治安状况、军警关系、军民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六月间受伪满军事部高级顾问竹下义晴的指示，派日系军官二名到奉天参加惟神之道讲座会受教育。我接到指示后派副官处长梅口中校和橿原中尉，他二人受十五日间的教育回来，我由各团召集了一名日系军官，在司令部由副官长指导下教育了一个月。主要教育课目是宣传惟神之道，关于惟神之道的讲话，拜神仪式礼节等课目。以后决定首先在司令部建立元神庙，逐渐在各团也建立了元神庙，每月有一次大祭（每月十五日）。以上这些活动的事实说明了我执行了日寇的以惟神之道麻痹中国人的思想来巩固其统治殖民地政权政策。

一九四二年八月间受到伪满军事部大臣于琛澄上将的命令，命令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的一部分。接到命令后在司令部内设防务委员会，委员长是我，副委员长是伪满兴安西省省长旺钦柏热列，副委员长是该省次长海村图次郎。因此我参加过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关东防卫司令部在林西所召开的防务会议。该司令部方面参加者：参谋长坂田少将，高级参谋片仓衷大佐。伪满方面参加者：伪满兴安西省省长旺钦柏热列，该省省次长海村图次郎，该省警务厅厅长植田，我同参谋长向日俊雄上校、参谋掘内少校，还有伪满兴西省各旗旗长。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了加强物动计划的施行，增筑公路架桥梁，由通辽、开鲁、林东、林西之间，由林东、白塔子之间，由林西、经棚之间，由林西、乌丹城之间的道路；加强搜收老百姓所有的武器弹药工作；加强集家工作。

一九四二年十月间在伪满兴安西省所在地开鲁，根据在林西召开的会议，召开防务委员主催的会议。伪满兴安西省方面参加者：该省省长旺钦柏热列、省次长海村图次郎、警务厅长植田，伪满第九军管区方面参加者有我同参谋长向日俊雄上校、参谋掘内少校、大冢少校。此次会议决定了由同年十二月开始筑公路架桥梁工作，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工作，最晚不过同年十二月下旬开始行动。结果强制靠近西部国境附近居住的老百姓搬家。因此老百姓不得不痛心落泪背井离乡，挑着儿女行李，流离失所，忍饥饿寒冷奔向所指定的地点，因而在半途中死亡很多。这些老百姓达到所指定地点因为无家屋可居，无奈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因饥饿寒冷，又加上那年冬季在囤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住在鲁北（伪满兴安西省扎鲁特旗旗公署所在地）一带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实在忍无可忍，请求当地的兴农合作社救济补给粮食，兴农合作社置之不理，拒绝救济，因此老百姓不得不离开此处，奔向通辽、开鲁等地，因而在途中死亡据不详细的统计有五、六十名。（中略）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我任伪满陆军兴安学校校长，学校干事石井佐吉少将（此人于一九四四年退职），顾问黑泽隆一大佐，学校副官处处长渡边正义少将，军需处处长太田少校，兵器处处长荒川少校，军医处处长斋藤少校，教育部部长干事兼任。教育部内有战术、兵器、筑城、交通各科。生徙队队长南博中校（此人于一九四四年任铁石部队高级参谋）。生徙队是以军官候补生本科三个连，二年毕业，由少年队三个年毕业后直接入本科。预科一个连，三个年毕业，由预科一个年毕业入本科。本科是每年由少年队入本科一百名，两个连共两百名。预科是各二年由中校考取（八十名），少年

队是每年由初级小学考取，年龄是十三、四岁，三个连，每连一百名，共三百名。军官候补生入少年队到任少尉六年多。此学校自成立到一九四四年，共毕业九期生共一千余名。

军士候补者队四个连，每连百余名，共四百余名，队长莫得尔图中校。军士候补者是由各部队选拔最优秀的上等兵送到军士候补者队受教育训练，修业终了后任下级干部(少士中士上士)。

少尉候补者是由各部队的下级干部之中选拔优秀者送到学校受教育训练。一年后任少尉(少尉候补者入校无定期)。

骑兵教导团团长金永福上校，五个连，其中三个连是骑兵，一个连是炮兵，一个连是机关枪，共五个连计六百余名。

我在伪满陆军兴安学校校长期间内的活动：(中略)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进级中将，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原乌尔金进级上将，任伪满军事参议兼伪满陆军兴安学校校长)，我同年同月二十九日到任，该司令部(驻海拉尔郊外)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少将，参谋处高级参谋横光中校，副官处处长南作太郎中校，军需处处长宫岛次郎中校，军法处处长山崎又雄中校，兵器处处长太田义吉中校，兽医处处长大井敏中校，军医处处长?。直辖部队通信队(有线、无线)，队长森二郎少校(驻海拉尔)，汽车班，骑兵第四十七团，团长金永福上校(驻南屯)，伪满骑兵第四十八团，团长郭美郎上校(驻南屯)，炮兵营，营长大岛少校(驻南屯)，辎重营，营长酒井川六平少校(驻海拉尔)，陆军看守所在司令部内，军事部海拉尔病院，顾问荻原长雄中佐。

我在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期间内的活动：〔中略〕

一九四五年六月间接到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上将、最高顾问秋山隆义中将的命令，命令该军管区入日寇第四军上村谦中将的指挥之下，在同月二十三日齐齐哈尔会同，参加者伪满第三军管

区司令官赵秋航中将、参谋长任广福，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周大鲁中将、参谋长赵玮少将，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中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少将。在此会同上决定了伪满第十军管区担任在海拉尔的东南方一五〇公里的兴安岭高地和海拉尔的东北方二〇公里的哈克附近构筑阵地。我回海拉尔后下命令编成作业队，以伪满骑兵第四十七团编第一作业队，队长是该团长金永福上校；以伪满骑兵第四十八团编第二作业队，队长是该团团长郭美郎上校。该两作业队到达指定地点后由七月上旬开始工事。〔中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早五时四十五分，由广播电台的播送才知道苏联宣战，这时海拉尔日寇防卫司令官派参谋到伪满军司令部，说明苏联军进军情况及兵力兵种后，命令（防卫司令官是野村登龟江少将）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率领全部兵力当日出发向兴安岭前进，到达该阵地后固守该阵地，拒止苏军之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后退（这时伪满军事部之间的通信完全被断绝）。我接受命令后紧急集合准备出动，下午五时司令部前进到南屯（在海拉尔市的东南方距海拉尔市九公里）。十日午前二时由南屯出发向西尼河前进。出发时司令部的官厅及附带的建物、仓库、官舍、病院和南屯的兵营及军官住宅全部放火。同年八月十日到达西尼河，当日晚以用汽车将有病者及打字员、看护妇送到扎兰屯，同月十一日率领伪满官兵投降苏联军。

〔下略〕

119—2—1129，1，6

郭文林补充笔供

(1954年8月9日)

我由中学毕业后无事在家闲住,于一九二七年十月间,由于当地日本料理店的介绍认识了笹目正雄(是日本的浪人)。他认识我以后劝我留日,我对他说留学是不容易,凡是出国留学的人必须请求政府许可。他说只要家长许可就可以。那末留学一切的经费怎么办呢?他答复不要顾虑。这时我接受他的意思,我未经过家长的许可,于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带同哈达、敖成亮、拉玛松、郭文通等四人偷跑到了日本。我到日本后探问笹目,我们留日期间内学费由谁来担负呢?笹目很肯定的说:全由日本的各慈善团体担负。我说我不明白,日本有什么义务担负这笔钱呢?笹目说:因为蒙古民族是最落后的、最受压迫的、最弱小的一个民族,日本对于这样的民族是要援助是要提高文化教育的,所以日本的慈善团体要担负这一笔钱。于一九二九年一月间哈达、敖成亮、拉玛松、郭文通等四人都回来再没有去,我一个人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考试合格的中国学生都交一千九百六十元(金票)的学费,发表合格的那一天,被考入的学生都到陆军省主计交学费。我送去后主计课不接受,说:你的学费不用交,是由日本慈善团体担负的。我考陆军士官学校后,笹目领我到日本教育总监部见第二部长林铣十郎和松井石根中将,领我去的意思是由于他二人的照顾得到无事考入陆军士官学校,让我感谢他们,我会见二人后致鸣谢之词。

松井石根中将说：你是伟大人物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是有传统的尚武精神，你努力学习日本武士道精神，将来为蒙古民族争光！以上所说的事给我灌输了崇日亲日的思想，这是我无民族意识的崇日、亲日的思想根原之一，因之我在伪满十四年间始终如一从头到尾给日寇充当了忠厚走狗。

119—2—1129—1

甘珠尔扎布笔供

（1954年7月31日）

姓名：甘珠尔扎布。别名：韩绍约、川岛隆良。年龄：五十二岁。民族：蒙族。文化程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个人出身：军人。家庭成份：官僚地主。原籍：辽西省彰武县大冷营子村。现住内蒙东科中旗巴彦塔拉。

简历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旧历）生于锦州省东吐默特旗玛拉嘎塔村中农家庭。同年搬到辽西省彰武县大冷营子住，以后我父亲当了彰武县区官，部下约三十名。

一九一一年入彰武县大庙私塾读汉书一年。

一九一二年夏，因我父亲巴布扎布参加外蒙古独立运动，我母亲带我由家里跑出去到浜图旗朋友家里住，从此以后，我的家和土地全部被张海鹏没收。

一九一四年夏，我由浜图旗到外蒙古父亲驻在地俄默亭槁老。

一九一五年冬，跟我父亲移住到呼伦贝尔哈拉哈河沿。

一九一六年初，我父亲加入了满清肃亲王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组织的宗社党。因此，我父亲要巩固肃亲王的信用，把我送到旅顺肃亲王家里。

一九一六年十月，入旅顺日本第二小学校三年级（半年）。

一九一七年春，入东京振武义会学日语和军事学等，准备入士

官学校(三年半)。

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入东京日本中学校三年级,一九二三年三月毕业(二年半)。

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入东京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法律科一年级,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退学(一年八个月)。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入东京步兵第一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十个月)。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中华队步兵科一年级,一九二七年七月末毕业(一年十个月)。

一九二七年八月回到旅顺家中,同年冬和肃亲王女川岛芳子结婚。

一九二八年由旅顺搬到大连圣德街居住。此期间(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一年九月)没有职业,生活由肃亲王的露天市场每月给约一百元维持。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弟正珠尔扎布由日本毕业回到大连后,同年秋我和他一同访问了住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因我弟正珠尔扎布和畑英太郎的儿子是同学),同时认识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从此以后,我又访问过板垣征四郎两三次,当时我要求希望他帮助我武器、弹药,搞内蒙古独立运动,板垣征四郎表示有好机会时给我帮助。

一九二九年冬,我到图什业土王府,住五个多月,我和图什业土王是亲戚的关系,在那里给他的蒙古兵上过军事训练。同年夏回到大连。

一九三〇年春天,蒙古人胡匪金昌(天红)由内蒙古来到大连,跟我谈过想搞蒙古独立运动,他很赞同我的意见。我告诉他回去后多收容部下,我将来到内蒙古去从事独立运动。同年夏天,蒙古

人韩色旺(达尔罕旗扎兰,部下有三十名)来到大连跟我见面,谈了蒙古独立运动,他也很赞同,他希望我一同到内蒙古去看看蒙古的情况。因此我跟他一同到博王旗包善一(博王旗统领,部下有二、三百名)家见了包善一,也谈了蒙古独立运动,他也很赞成(他和韩色旺是亲戚)。以后我到达尔罕旗韩色旺家住了十几天,回到大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充当伪内蒙古独立军总司令,不久改为伪内蒙古自治军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约八个月)。

一九三二年夏,因伪内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兴安军,我因病回到大连疗养。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充当伪满兴安局警务科事务官(共半年,驻长春)。

一九三三年三月,充任伪兴安南分省达尔罕警察局长(共三年,驻郑家屯、王爷庙)。

一九三六年三月,充任兴安南省警务厅长(共一年,驻王爷庙)。

一九三七年三月,转任兴安南省民政厅长(共一年两个月,驻王爷庙)。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转任兴安军管区少将部附(共十日,驻郑家屯)。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任兴安南地区司令(共一年,驻通辽)。

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兼任甘支队长,向热河、冀东一带讨伐抗日八路军,同年十二月末回原驻地通辽(约半年)。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任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共一年,驻通辽)。

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转任陆军兴安学校校长(共三年,驻王

爷庙)。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转任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约一年半,驻通辽)。

一九四三年十月晋级中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木里黑图站被俘。

我的主要罪行:

一、任内蒙古独立军总司令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我在郑家屯满铁公所听到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向我国东北发起侵略战争,正在攻击沈阳的消息。第二天夜,我乘火车到达沈阳,住在万国旅社。二十日听旅馆的人说,关东军已搬到沈阳。我马上找到关东军司令部会见板垣征四郎大佐(高级参谋),我请求他趁这机会,帮助我三千支步枪及弹药,和派日人专门负责帮助。板垣答应了。他说将来溥仪上东北来,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我这就开始走上了背叛人民的第一步。我回到旅馆后,即打电话招集在沈的蒙古朋友及蒙旗师范的学生,还向日本和北京的朋友打电报,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内蒙古独立运动。二十日因我没有经费,又去见了板垣大佐,请求帮助经费,但板垣只给了我五百元日币,他说经费没有,让我自己想办法。他又给我介绍了日寇航空少佐麦田某。我到麦田少佐那里借到五百元日币,我又回到大连由露天市场借来了我几个月的生活费七百多元日币,这就是那时内蒙古独立军的全部经费。过了几天,各处来的蒙古朋友有蒙旗师范学生,以哈丰阿为首的一百余人,这时包善一也在沈阳,还有由日本回来的李友桐、吴广义等,北京的韩凤麟,大连来的正珠尔扎布,由郑家屯来的萨嘎拉札布等,因蒙旗师范学生许多都年龄很小,不适合从事独立运动,这些人都给路费叫他们回家乡了。剩下有三十多名,和其他人共合有四十余名。

关于组织独立军问题，讨论结果，成立了独立军总司令部，大家举我为总司令，萨嘎拉扎布任参谋长、哈丰阿任秘书长，李友桐任宣传队长，韩凤麟任副官处长，其他处因当前尚无必要，未设立，另外剩余的人员编成学生队，吴广义任学生队长。编了内蒙古独立军军歌和蒙古独立宣言文，内容大要是：内蒙古人民要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而独立，成立独立国，恢复失地，从此后不受中华民国和一切军阀的统治等。

九月末，我们乘火车到了博王旗包善一家，这时在郑家屯的博彦满都也参加了我军，等待武器弹药。十月初，关东军给派的和田劲顾问（日本退伍中尉），带来了三千支步枪，每支枪附有二百粒子弹，四十多枚手榴弹，和两挺已破旧不能用的重机关枪。这些枪支在郑家屯南一棵树站移交给我们。我带领车马领到包善一家。这时，韩色旺和天红听到我已经带来武器弹药的消息，都到大林站，派人领去了一千多支枪和弹药。其余的分发给包善一处，保存在他家里。十月初，我率领学生队到大林站会见了韩色旺和天红。这时韩色旺已有一千余人，天红的部下有三百余人，包善一也大约有一千多人。在大林站我和韩色旺、天红、日本顾问等研究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军，由包善一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我任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当时一般人都说自治军有一万人。又决定进入通辽解决军费、军衣、军粮等问题。十月十日派了博彦满都为首的几名学生到通辽交涉，允许我军和平进驻通辽，但被驻通辽的张学良军队拒绝。我决定攻击通辽。十二日晨，包善一派来的铁管带为首的七十多名和韩色旺的第二军一千余名，我的第三军三百余名和学生队，一共一千三四百名，攻击了通辽，战斗十余小时，占领了一部分街道，但被张学良军反击，日没时退出通辽，退到钱家店，第二天又退到大林站。这次战斗的结果，第

一军铁管带以下七十余名全部战死外,我第三军和第二军没有大损失。通辽居民和张学良军的损失不明。我军进入通辽小街基和通辽街时,抢掠了商家和居民的物资财富和马匹等,还在大林站和钱家店也抢空了居民的财富,给人民很大损失,数量、价值等无法估计。从此以后,顾问和田劲等日寇跑回四平街解散,只剩韩色旺的朋友松井清助大佐一人。我们逃回大林后,讨论了将来的行动计划,并委托松井大佐,叫他跟关东军请求大炮。松井大佐赴沈阳后,从此我们三个军没有什么连络,各干各的了。我带的第三军又被通辽的自卫团袭击,逃出大林站向北进军,十月中旬到了韩色旺家附近驻屯。十月下旬松井大佐来信通知说已由关东军领来了四门重迫击炮和四挺重机关枪。由这时起松井奉关东军命令充当自治军顾问。我带领我第三军到温都尔王府附近领了一门迫击炮和一挺机关枪。这时我派正珠尔札布为后方连络员、赴沈阳。十一月上旬,我率领部队向舍伯尔吐方面前进到大林北二十八户时(全汉人部落),当地的自卫团不许我军进入村里,因此我下令攻击该村。战斗由正午开始到日没,打死了二个屯民。这时村里的地主马某等趁天黑带着家族向通辽方向逃跑。我带部队进入村庄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向北进军。到瓜毛吐时,当地的李宝魁为首的自卫团抵抗不让进屯。我命令部队攻击该屯,战斗四五小时,我们用迫击炮炸死两个自卫团员后,李宝魁投降,我军进屯住了一宿。我到温王府开会,前去领了一万八千元,又回到瓜毛吐。在这期间,第二军团长滕海山(即我秘书长哈丰阿的父亲),杀死了李宝魁,强占了李宝魁的家产和土地,还把李的妻子给了他的部下。到十一月中旬,我们攻击舍伯尔吐自卫团,战斗一小时,用迫击炮打死了屯民数名和家畜等,占领了该地,自卫团向通辽方面逃跑。十一月下旬奉松井的指示,我率领我第三军向开鲁方面前进(这时我第三军

已有一千多人，编了八个团）。到任发合时，遇到通辽自卫团百余名，我第二团三十余名袭击了这个自卫团，获得了轻迫击炮一门，自卫团的伤亡不明。十一月下旬到达通辽西茂林庙，企图向开鲁前进，我们和驻开鲁的崔兴武旅长（热河汤玉麟军）交涉，要求和平通过开鲁，他不许可，叫我军由开鲁、鲁北中间通过。因此，我在十二月末率领第三军，松井大佐率领第一军的二百余名和第二军的二百余名，共四百余名，到达了草家营子。这时松井大佐率领他的四百余名和我的大小两个迫击炮队，前往草家营子西方五六里处进行侦察工作，在那里遇到李守信（崔兴武旅驻开鲁北的团长）部队三百多人的埋伏，被猛打后，部队溃散逃回舍伯尔吐，松井大佐被打死，我的两门迫击炮也被抢去。因此我们逃回舍伯尔吐进行收容被打散的部队。这时因日寇军已占领了通辽，我决定到该处向日寇军报告情况。我率领了二十多名卫队于一九三二年正月到了通辽，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代表，说明松井战死的情况以及我军缺乏弹药的情况。关东军代表非常愤怒，他回去报告关东军后，关东军给我们命令，叫我军不要上热河去，从此关东军决定要改编自治军为伪满兴安军。因此，一九三二年夏，我们自治军除一部分解散外，一部分进入钱家店兵营，改编为伪满兴安军，我则回到大连养病。

在这八个月期间，我给达尔罕旗和通辽县人民的物资和精神上的痛苦和损失是无可估计的，尤其是汉人的痛苦更大。我为了个人名利，甘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去当侵略战争的工具，杀害了很多同胞，现在我衷心向人民认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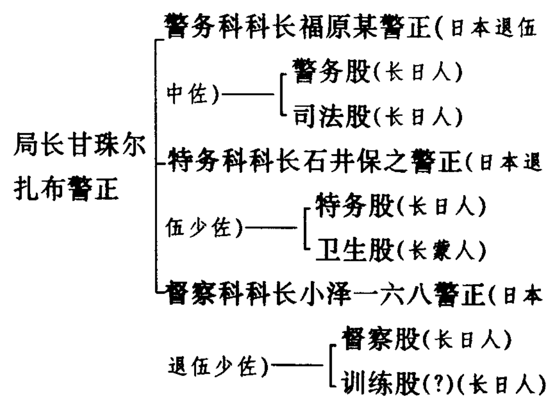
二、我任事务官期间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我接到伪满兴安局次长菊竹实藏的电报，我即由大连到长春兴安局，充任该局警务科事务官。我因为我

的地位太低，心里不满，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末，只上了两三天的班。这时兴安局总务处长白滨清澄向我说，在兴安各分省新设警察局，问我是否愿意到南分省去当警察局长。我答应在蒙古地方愿意当警察局长。一九三三年我就转任了。因此，我在兴安局事务官任期的半年内，没有什么特殊事件。

三、任兴安南分省警察局长期间罪行：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到兴安南分省（在郑家屯）充任达尔罕警察局长。到任后开始组织警察局的机构和设备，因为内蒙古过去没有警察局的组织，首先将兴安南分省警察局组织〈建立起来〉。其机构和人员是：



同年秋成立了伊胡塔警察署，署长金昌警正（前内蒙古自治军第三军副军长天红），地点在大郑线东科前旗伊胡塔站。在署长以下约有其他人员五十名，内有日寇指导官二三名，它的辖区是东科前旗和东科后旗两旗。

同年冬成立了巴彦塔拉警察署，署长色楞多尔吉警正，地点在郑家屯北东科中旗瓦房，署长以下约有人员五十名，内有日系指导

官下西警佐以外三名，辖区是东科中旗全区。

一九三四年春，成立了王爷庙警察署，署长布彦那森警正，地点在西科前旗王爷庙，署长以下约有人员五十名，内有日寇警佐指导官以外三名，辖区是西科中旗、西科前旗、西科后旗、扎赉特旗等四个旗。

一九三五年春，因王爷庙警察署担任区域过大，在西科中旗成立了图什业土警察署，署长达瓦敖斯尔警佐，署长以下约有人员三十名，内有日寇指导官两名，地点在西科中旗图什业土王府，辖区是西科中旗全境。

一九三二年夏，在当地日本军领导下，兴安南分省成立了治安维持会，负责管辖区内的治安，肃清反满抗日分子，给日寇当侵略工具。由省长任会长，省参与官(次长)、警察局长、警务科长等任委员。

一九三三年夏，奉伪国务院的命令，兴安南分省管辖区内实行民间武器回收工作。由我命令将警察局的官员组成三个工作班(班长都是日寇警察官)分派到各地区从事工作。凡散布在民间的武器，无论是步枪、手枪、洋炮，全部没收。工作班曾遇到种种困难，如游牧、打猎为生的蒙古人民，武器被没收后，生活无法维持，因此强烈的反对这个工作。到西科后旗的工作班，在某屯进行工作时，住在名叫堂郎的蒙古人家，因受到堂郎的反对，工作班的日寇工作员把堂郎用日本刀刺死了。就这样工作了很长期间，终于把管辖区内的一万七千多支枪没收完了。从此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特别是打猎为生或游牧过活的人民，每年人畜受狼害的很多，据全兴安省的情形，家畜每年损失的数目即约达一万至两万头之多。

警察配合讨伐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我充当警察局长时，管辖区内的边境，如康平、法库两县交接地区，突泉、瞻榆、开通等县的交接地区，有抗日军很多。一九三三年秋(?)由法库方面进入东科后旗的于海山为首的抗日军三百余人(曾袭击过郑家屯)，在东科后旗被日军和该旗的自卫团打击，于海山等战死二三十名，剩余的抗日军退出了我的境外。同年夏，由开通县方面进入我境内高力板附近一百多名抗日军(指挥者姓名不知)，这时驻郑家屯日寇守备队中队长江本大尉率领部下二十余名，乘两辆卡车进行讨伐，被抗日军反击，中队长以下全被击毙。抗日军向东北洮南方向退走。其他东科前旗地带也时常出现抗日军，但日寇军和伪满驻钱家店的兴安军及各旗自卫团和驻当地我的警察署联合不断的讨伐，到一九三五年时基本上治安良好。一九三五年由锦州省方向进入东科前旗的一百余名"白羊教"徒，手拿矛枪，袭击伪满行政机关。在伊胡塔的警察署奉我的命令，配合旗自卫团和伪警备军，讨伐"白羊教"徒，结果打死打伤"白羊教"徒二三十名，其余向南逃出我的管辖区。我还穿上他们的白色衣服手拿着他们的矛枪照过像。

其他我的警察实行的讨伐，我记不清楚了。

思想对策检举的情况：

我任警察局长期间，我管辖内的蒙古人，反满抗日的情况不太严重。我成立了警察署以后，积极教育我的部下，使他们变成忠诚效力日寇和伪皇帝的奴仆，培植警察的力量去镇压人民，复〔及〕时检查管辖内人民的思想动向。一九三五年秋(?)在舍伯尔吐的一个蒙古小学校教员名叫彭楚克(当在内蒙古自治军时我的同事)，因别人的告发，怕警察逮捕，逃出我管的境外。我积极执行了保甲制度，实行了每一个嘎查(等于村)或每一个屯，由屯长负责，监督本屯内的思想问题，屯里如出现反满抗日者时，采取屯长负责受惩

罚等残酷的政策。检举的细情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在〕我的任内没有很大的检举情况。

集家工作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伪满全国实行集家工作。我的管区内，蒙古人因多数畜牧为生，人家稀少，集家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未实行集家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的警察局搬到王爷庙，继续进行工作。

一九三五年秋，王爷庙警察署逮捕了名叫二郎的土匪，〈以〉拷问、毒打、灌水等残酷手段，取得了口供，经过伪司法部的批准，在王爷庙刑场枪杀了。这是我亲自下令自己参加执行的罪行。

同年冬，王爷庙署的警士东海、恩和等三人对我不满，晚间进入警察局的仓库，拿了卡宾枪和毛瑟枪共七八支逃跑。我第二天发现后，通知宪兵、教导队等，过几天在王爷庙南二十里山里找到了恩和枪杀了。东海等其他人听说跑出伪满国境。

警察厅长任期内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三月，因机构改革，达尔罕警察局改为兴安南省警务厅

警务厅长甘珠尔扎布
- 警务科科长福原警正
- 特务科科长××警正
- 保安科科长达瓦敖斯尔警正

各旗公署都设立警察署，受旗长直接指挥。从此原有的警察局直属的警察署，改变为该旗的警察署。

同年夏，成立了兴安南省警察学校（在王爷庙），我兼任校长，警务科长福原任主事，一年间共教育了两期学生共一百六十余名。教育内容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皇帝矢诚效忠，灌输奴化精神教育，对反满抗日分子的镇压取缔的方法，以及用日本语来教练学

生等，去巩固警察对人民镇压的技能。将他们教育完毕后，就送入各旗警察机构工作。这时各旗的警察分所也在各努图嘎(等于区)建立起来，对人民的镇压增强了。

以上我任警察官吏的四年间，给人民造成的种种痛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汉民族的精神上的痛苦更大。因为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影响了我的部下也对汉人有种种严重的压迫和歧视。

四、民政厅长任期内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转任兴安南省民政厅长。民政厅的组织如下：

厅长甘珠尔扎布
- 地方科科长乌力图
- 文教科科长鄂尔赫蘓
- 劝业科科长包呢雅巴斯尔

我任民政厅长后，督促各旗实行鸦片断禁法，严禁管辖内种植鸦片，违法者严办。在各旗公署设立官烟所，由官烟总署领来的烟土卖给吸烟者。有些官烟所还掺上假的土强迫人民买去吸。有些人因未领吸烟证而吸烟者，查获后即法办，因此管辖内吸阿片的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还通过地方科，对各旗的地主、富农采取保护的政策，对于贫农的生活等方面完全没有采取改善的方法。

在文教科方面，则加强各旗的奴化教育。新建或扩充了一些学校设备，好教育出更多的学生，以便给日本帝国主义忠诚服务。学校里的教育是完全给日帝和伪皇帝作忠实奴隶的教育，如日满一心一德，日本是我们的亲邦或共存共荣等欺骗麻醉的内容。还有在一些大的小学校里都有日寇教师，教给学生日语。对宗教方

面采取保护寺庙、喇嘛等方针，以便迷惑人民，使人民变得更为愚蠢，便利统治者更容易去统治人民。

劝业科方面，督促各旗种植树苗，改良农作物，改良牲畜，以便将来供给日寇作侵略战争之用。我在这一年多的期间内，因我自己吸阿片，身体健康很不好，又不熟悉这个业务，同年夏，我请假近三个月在大连养病，因此这个期间，我确实对民政厅所作的反人民的详细事情记不清楚了。

五、兴安南地区司令任期内的罪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任伪满军陆军少将，充当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附（在郑家屯），六月一日转通辽兴安南地区司令部任地区司令。六月三日，伪治安部大臣命令兴安军管区司令官编制甘支队，由我任支队长，出发到热河、冀东地区讨伐抗日八路军邓华将军和李司令的部队。甘支队的编制是：

顾问野田又雄大尉 支队长甘珠尔扎布少将 参谋长曾根崎晴臣中校	呢玛部队（长呢玛少校）约八十名，属于南地区部队 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属于南地区部队，约三百名，山炮一个排（两门炮），约三十名 兴安骑兵第二团（团长金永福中校），属于东地区司令绰罗巴特尔少将 配属宪兵约二十名。（队长石川上尉，属伪满宪兵总团）

六月十日，这些部队除骑兵第五团未来齐外，余均在热河集合完毕，直属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滨本中将指挥。十二日由承德出发，经过古北口，向兴隆县进军，途中骑兵第五团进入我的指挥下开始行动。山炮因不能行动，这一排留在后方。

十八日在古北口东南六十多里某村宿营，夜里下大雨，住北屯

的第二团步哨看见了什么，放了几枪，因此全部队认为被八路军袭击，各处将枪乱打一夜，天明才知道没有敌人，只好向上级虚报战果，将来可补充弹药。

二十一日在五指山东某村，发现了抗日军(邓华将军部队)，我率领全部队攻击，战斗数小时，打死打伤抗日军十余名，伪军未有损失。抗日军向西南退走。

二十五日在半壁山发现邓华将军的抗日军，我命令骑兵第二团攻击，该团和抗日军激烈的战斗数小时后，打死打伤抗日军五十多名，抗日军向西南退出。伪军战死团附萩原少校、青山中尉、重伤古贺中尉等。同日夜我军到佛爷来宿营。

二十六日我命令第五团先出发向遵化东三屯营方面讨伐后到遵化县城。

二十七日我率领第二团呢玛队等没受抵抗进入遵化城。该日第五团在三屯营附近发现抗日军，战斗数小时，杀伤抗日军十余名。又在平安城攻击了抗日军，杀伤抗日军四十多名，俘虏抗日军军官三名，俘虏怎样处置的，我忘记了。

二十八日命第二团、第五团每连为单位，在遵化南部分别讨伐。我因顾问病重率领呢玛队和第五团的一个连，当日到了马兰峪，第二天由承德方面派来飞机将顾问接了回去。当天晚，接到倒流水来的电话，说我留在后方的三十名山炮排的官兵，正在倒流水被抗日军包围，我派第五团的一个连去救援，至二十九日早，始将该排解围救出，抗日军的损伤不明，伪军没有损失。二十九日听到第二团一个连在石门镇西已被抗日军包围两天，虽猛烈冲锋多次，仍未能突围而出，情势颇为危急。我即派曾根崎参谋长率领士兵六十余名前去救援，但在援军到达之前，被围的那个连已被路过的日寇野地部队攻击了抗日军而解围了。这次战斗抗日军的伤亡数

我已忘记，伪军方面负伤约十名。

六月三十日我率领全部队攻击马伸桥，战斗由正午开始，日落时占领了该镇。这次战斗中抗日军死伤近二十名，向西方退走，伪军伤日系高畑中尉以下五名。

七月二日早，从马伸桥出发，上午十时到蓟州县城东，决定攻击该城。伪军因沿途马匹死亡甚多，行动不能自由，弹药又感缺乏，因此，必须占领蓟州。我下攻击命令后，战斗由正午开始，因伪军没有大炮，城墙坚固，伪军久攻不下，弹药已愈来愈不足，我乃命令第五团编一决死队，由城墙缺口处突击。这个办法果然成功，将晚时占领了县城。据守该城的抗日军七百多名，在这次战斗中被杀伤二百余名，其中遗弃尸体就有一百五十具。伪军入城后，我决定暂时驻防城内，补充人马弹药后，再决定今后的行动。当天晚和第二天曾搜查城内居民住宅，寻找隐藏的武器和地下工作者。结果在县公署缴获卡车一辆，这次缴获的武器数目已忘记了。伪军并掠夺城内人民的财富，强奸妇女，在城内东门里即有一个女人因被强奸而跳井自杀了。以后我看见过有伪军五六名，因强奸妇女而被宪兵逮捕送往后方处理的情况，由此估计，我伪军的纪律是十分不好，给人民造成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又飞机因空投弹药毁坏了城内房屋三间。

七月上旬在蓟州城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任蓟州治安队长某为维持会长。伪宪兵队长石川上尉直接领导下，肃清了抗日军的地下工作者。在这工作中，逮捕了三名抗日工作者，均被宪兵在城西用日本刀把头砍掉了。七月中旬我下命令强征了三百多民工，修理城墙约半个多月，把城墙周围宽达二三里的庄稼地都砍掉了。我又命令在城西和西南修了两处飞机场，霸占了人民的土地，上面的庄稼也都除去了。

七月中旬，我命令第二团前往城东南十余里外某一屯子讨伐抗日军，接仗结果，抗日军伤亡不明，伪军死一连长。

七月中旬奉到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滨本中将的命令，命我率领甘支队第五团和第二团前往平谷县协助日寇北支派遣军部队攻击平谷县城。日寇军由县城南、我的伪军由城北分别向城内攻击，战斗约二三小时，我军第二团先进城占领了城北部分，我带第五团也攻进了城，至此全城已被完全占领，抗日军向西方退去，人数忘记了。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抗日军约五十名，还在城东门外逮捕了抗日军干部一名，其他人员两名，都交给伪宪兵去处理了，结果不知。伪军在城内以搜查隐藏武器和地下工作者为名，乘机掠夺人民财富，强奸妇女等，使人民受到莫大损害，还在城墙的外围二里以内将庄稼全部砍掉了。我住了两天把第二团留在平谷县防守，我率领第五团经过三谷〔河〕县，回到蓟州城。

七月下旬，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来命令，规定我伪支队担任的防守线和地区，即平谷县——蓟州县——马伸桥——石门镇，这些地区指定我伪支队担任，因此我感到兵力不足，向伪治安部请求增援。八月初给派来了骑兵第三团(兴安西地区部队，司令部宝山少将所部)，团长仁钦宁布中校，和山炮一个排，共兵员约三百二十名。同时还派来了梁濑部队的装甲自动车三辆，人员约四十名，队长小畑中尉。又伪宪兵儿玉笃二以下约二十名(后配属第五团一起行动)，另外有马匹二百余头。留在后方的两门山炮也来到了蓟州，这时甘支队兵力大增，共一千一百余名。八月初，我率领第五团和第三团打算到马兰峪与日寇军联络，协商担任区域问题。天明时到马伸桥，遇见抗日军(李司令)部队，战斗由早晨到午后四五点钟，抗日军始向东北方向退走。这次战斗抗日军伤亡二百余名，缴获步枪八十多支；伪军伤亡三四名，当天晚回到蓟州城。又过了

一个多星期，我又率领第三团和第五团、山炮两排，预备到马兰峪，仍在天刚亮时到马伸桥，又遇见了抗日军，我们战斗约十小时，抗日军向东北方向退走。伪军在当日回到蓟州城。这次战斗抗日军伤亡二百多名，缴获步枪六十多支。八月下旬，我率领第三团和第五团，向蓟州东南地区马伸桥南部一带扫荡抗日军，伪宪兵在马伸桥南烧掉了一所很大的民房（据说是抗日军某科长家），这次没有战斗。九月上旬，我命令第三团和小畑装甲车队向马伸〔神〕桥南扫荡抗日军。该团在马神桥南某地遇见抗日军，战斗了几小时，抗日军退走。战斗结果抗日军死伤了二十多名，缴获步枪七八支，第二天回到蓟州。八月，第二团在平谷西某地讨伐抗日军，打死打伤抗日军一百余名，缴获步枪五十支。九月初，我派第五团到平谷县和第二团连络事务，并在来回的途中随时注意扫荡抗日军。第五团在经过三河县回来途中至邦均镇西，遇见了抗日军发生激战，共数小时，打退了抗日军。这次战斗中抗日军伤亡二百多名，缴获枪八十余支。该团于当晚回到蓟州城。

甘支队在冀东、热河地带讨伐抗日军邓华将军和李司令的部队，历时半年，在此期间发生大小战斗四十余次。我所说的还是主要的战斗，如在磐石山等其他小的战斗和战果，我记不住了。总战果是打死打伤抗日军三千多人，缴获步枪、卡宾枪、手枪等一千六七百支，卡车一辆，俘虏抗日军十余名（这些俘虏是如何处理的，我已记不清楚）。伪军还在热河和蓟州以东地区强征了民间的马、骡、驴等二百多匹，伪军在撤离前多部分的牲口虽仍交还原主，但仍带回三十多匹，这些回到通辽以后都分了。以后第五团带来的骡子送给了我四头，我可耻地接受了。在讨伐期间伪皇帝派来侍从武官慰问过伪军。十二月末回到承德时也派来侍从武官，还在承德设大宴会招待欢迎我们。回通辽时，通辽市民在敌伪驱策下，

也对伪军表示欢迎。十二月末到长春坐红汽车到伪皇宫,给溥仪报告战况,还受到溥仪的口头夸奖。在军人会馆治安部设宴招待我,治安部大臣并给我伪甘支队奖金(金额忘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给我伪支队感谢状。

总之,我在热河、冀东地带,讨伐抗日军期间给抗日军造成的损害是极大的,同时给这些地区的人民也带去了严重的灾难,其损害也是无可估计的。特别是因我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仇视汉人,又为了我个人的升官发财,极端无耻地去给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积极效忠,惟恐不够。我的部下,也受到我这些罪恶思想的影响,因此军风纪特别不好。这些滔天罪行我个人应负完全责任的,现在只有衷心来向人民认罪。

六、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任期的罪行(在通辽):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南警备军管辖区域是兴安南省和兴安西省全区,司令部在通辽。部队是骑兵第三、第六、第十、第十二各团,山炮独立第一连,军事部病院等。

同年春,我带领一个团进行乘马演习(在库伦、东科前旗、东科后旗境内),共一个多月,目的是训练士兵的乘马技术,增强行军能力。

同年四月中旬,奉治安部命令,到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别府等地见学,约一个月。见学的目的主要是对伪军军官讨伐有功者的慰劳。在大阪除参观造币厂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殊行动。在东京参观了士官学校和骑兵学校,并到陆军省访问。我还特地请了两天假到长野县探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同年夏,诺门汉事件发生后,我奉治安部大臣命令,派出骑兵第十二团(团长胡福泰中校)以下三百多名,到阿尔山车站保护军事物品。同年八月在诺门汉的兴安部队士兵,纷纷自由脱离战场,

随意退回后方，无法收容，军管区司令官命令我负责去收容这些士兵，我带同教官和副官各一名，宪兵三名和学生士兵等共约十名到索伦北金银口附近，收容了三百余名教导队的士兵。这时没叫宪兵到现场。同月下旬带了十一名部下由王爷庙乘马到突泉县，收容了约三百名士兵。这时斋藤上校等十余名先到突泉从事收容工作，我到达后协助我办理收容工作。九月中旬回到通辽时，我的伪十二团一部分和其他联合的二百多名退回通辽街，不归兵营，我下令给他们两个月的假解散回家，他们到期又都回来了。九月下旬，我又到开鲁县去继续进行收容工作，这时军管区派来了一个连到开鲁，帮助我进行收容。我在这地区只收容了二三十名，其他一无所获。九月下旬回到原驻地通辽。这时金川耕作中佐充我的顾问，我告诉他，还有没有收容完的吉宝以下十七名在通辽北五十里地方，其他全部收容完了。金川即带参谋长去收容他们，但他们不答应，因此，金川带参谋长到查布干庙，指挥该地的一个连兵力，把十七名全部枪杀了。收容完毕的士兵除在王爷庙被伪宪兵分团逮捕送法院三名上等兵以外，其他均没有任何惩罚。

同年冬，担任兴安西省和南省南半部的一般防卫任务，我兼充防卫司令官，在开鲁召开了防卫委员会议，我任委员长，省次长、警务厅长、参谋长、各旗参事官等任委员，讨论了一般防卫任务，即战时物资动员计划，警备道路情况，粮食储存情况，思想对策等问题，我鼓励行政机关要积极去完成任务。

一九四〇年初我视察属下各部队及西省各旗公署。我在这一年期间对部下实行奴化、法西斯教育、赤诚效忠日寇和伪皇帝，给人民增加了莫大的痛苦。

七、在陆军兴安学校校长任期内的罪行(在王爷庙)：

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转任王爷庙陆军兴安学校校长。学校的

组织如下：

顾问松山中佐

校长甘珠尔扎布少将

干事田中收少将

- 教育部长栗野重业上校
- 研究部部长(名忘记)吉永？上校
- 军需处
- 军医处
- 军械处
- 生徒队队长橘高告一上校 ┐
- 少年队队长(名忘记)中校 ┘-共六百多学生
- 教导队队长金永福上校、团长以下约五百名
- 军士候补队队长包玉昆中校，队长以下约一百多名

校长以下约共一千三百人。

教育目的：是要教育出有文化、有军事能力的军事干部，来增强伪军的战斗力量，使之镇压人民，扫荡一切不利于敌伪的反满抗日势力，成为赤诚効忠日帝的人物。

教育内容：军事学、普通学、军事训练、精神教育。

教育期间：少年科四年，预科二年，本科二年，共约八年。全部用日语上课及教练。

我任校长期间，积极地执行了教育方针，教育出军官约三百名，军士约三百名，充实了伪军的力量。我并以唯神之道，武士道精神，或成吉思汗的侵略主义、英雄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教育的内容，使学生不仅变成敌伪忠实奴隶，还养成了他们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一九四二年在学校内设立了“元神庙”，以供“天照大神”，作为学生的精神资料，每日要向这个庙参拜。我还参加了建立成吉思汗庙的活动，当了建立成吉思汗庙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每年学校有定期的游泳演习、水马演习和现地战术等，每回我去视察几天。每年初在长春军事部开一回校长会议，我去参加会议报告学校的

教育概况，并听伪军政部大臣和军事最高顾问的训示。内容大要是巩固日满一德一心，共同防御等。一九四二年夏，伪皇帝溥仪到我学校巡狩，我领导全校学生实行攻防演习，给溥仪观看。我在学校的三年期间，一心一意实行奴化教育，使学生变成半日本人。还受我的影响，许多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这就是我危害人民的严重罪行之一。我初任学校校长时，还在研究部研究了对苏作战法，但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对苏作战这件事就不研究了。

八、在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任期内的罪行(在通辽)：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转任为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同时担任西南防卫军委托给的兴安西省和兴安南省南半部的一般防卫任务。我到任时前司令官郭文林并没有交代任务，仅有日寇戒能参谋向我报告管内情况。当时的情况是：林西北有一个教会附近的村落里，隐藏着若干反满抗日分子；开鲁、鲁北间三百多里的公路，正强制附近的老百姓在修筑中；此外，管内的治安状况基本上还良好。我任期内对部队官兵实行奴化教育，强化部队的教育训练。司令部和各部队里建立了元神庙，用唯神之道和武士道精神来教育士兵，巩固了伪军的力量。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夏，实行了征兵检查工作，每次派出六个征兵检查班，两次共征了壮丁约六千名(概数)，半为汉人，半为蒙古人。汉人约三千名交给伪第三军管区，我军留约两千，其余约千名交给伪第十军管区。每次开始检查后，管区征兵检查官(军管区司令官)须亲自到某几个地区去视察工作。

一九四三年夏我到西科中旗检查该旗的防卫状况，召集旗长、参事官、警务科长等听取报告后实行了动员演习，强化了地方行政人员动员的计划。同年夏，到奈曼旗公署，也实行了同样的工作，也教育了该旗的行政人员。一九四三年冬，我伪军管区陆军看守

所寄押的四名犯人(一名是蒙古人,其他三人是汉人经济犯),偷了武器仓库中的毛瑟枪五支,子弹五百粒,将看守所的门破坏了逃去。发觉后我通知宪兵、警察,并派出二十余名伪兵,跟宪兵警察协力追捕,第三天在通辽西南约五十里附近发现了该犯人,双方交战后不久把该四人全部枪杀了。我还在军法会审起诉了不少人,判处徒刑,但人数、罪名确实记不清了。

一九四三年秋,解除了我的防卫司令官的任务。同年冬天,我以参议的名义参加了在开鲁召集的防卫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是省长、参与官、旗参事官、警务厅长、旗警务科长等组成的。会议讨论了战时动员计划、警备道路修筑计划、粮食保管状况等。

我任防卫司令官期间,领导督促行政机关执行了粮食出荷工作,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在鲁北、林东一带的人民(特别是汉人多),因没有吃的,向热河通辽方面移住的很多。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情况,饿死的也有不少(人数我不知道)。鲁北、开鲁间修公路,均强迫附近的老百姓劳动,使他们种不上地,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这些都是我为了讨好日寇,为了升官发财,而残酷地去压迫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十月晋级中将。

一九四四年正月和一九四五年正月,我参加过长春的伪军管区司令官会议,我报告了管内地方治安和部队训练的情况,并聆听了伪军事部大臣的训示。一九四五年七月末,伪军事部将第二师配属于我的军管区,交接的手续尚未办理,就因苏军进兵东北而告停止。总之,我任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期间,又兼任防卫司令官,并指挥行政机关,压迫残害人民的罪行,也是十分严重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木里图站被苏军俘虏。

119—2—1162,1,5

赵秋航笔供

(1954年5月4日)

赵秋航,男,六十五岁,汉,籍贯辽西省辽中县,伪满军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中略〕

一九二七年三月任吉林陆军第十五师步兵二十六旅十六团团长,一九二八年改为中央陆军步兵二十六旅六百七十五团团长。一九三二年伪满吉林省军政厅参事,任哈尔滨军事特务部情报科长,秋七月转任伪满军政部总务课课长,一九三五年任伪满第一军管区骑兵第三旅旅长,一九三九年转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六教导队队长,一九四一年转伪满治安部部附,一九四二年转伪满禁卫队司令官,一九四三年转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

我的主要罪恶

(一)集体罪恶:伪满军于一九三六年秋实行东边道大讨伐。

参加部队: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主任顾问河崎中佐指导。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指示,本年秋实行东边道大讨伐,以平梅线梅通线以东十四县地方,用第一军管区全兵力,第一旅旅长王殿忠,第二旅旅长高明,第三旅旅长李寿山,第四旅旅长阎家梅,第五旅旅长廖弼宸,第六旅旅长董国华,骑兵第三旅旅长赵秋航,第一教导队队长吕衡;增援部队第三教导队队长石兰斌,步兵旅长朱凤阳,第五军管区支队队长索景清,一军团步兵一团团长赵明达,步二团团长李海澄,步三团团长赵宝源,步四团团长黄

方刚，步五团团长戴元，步六团团长李玉平，步七团团长杨春煜，骑三团团长部凤麟，骑四团团长马国栋，骑五团团长马养贤，骑八团团长王殿斌，骑九团团长于泽圃，骑十六团团长房德库，骑十七团团长汪景春，三军教导步兵团团长于明甲，教导骑兵团团长王英贤，五军支队步兵三十二团团长刘连珏，步兵营营长王维周，骑兵队队长范佐臣。

地区和对象：

1.东边道讨伐总司令部、讨伐指导部设在通化县城，十四个县分四个讨伐地区：临江地区讨伐司令第一旅旅长王殿忠，顾问小越少佐；抚松地区讨伐司令第三旅旅长李寿山，顾问田中中佐；濛辉地区讨伐司令第五旅旅长廖弼宸；金柳地区讨伐司令第六旅旅长董国华，军事教官驹井中佐，骑兵三旅归金柳地区指挥，驻金川县。

2.对抗日军王凤阁、杨靖宇、×××、陈汉章、××实行讨伐。

讨伐主要办法：

1.用兵力包围、游击、扫荡、堵击、断粮道。

2.组织肃正工作班，宪兵、特务、警察检举、调查、搜集情报，分到临江、抚松两地区各一班。

3.县警察协助讨伐军修道路、集家拆房盖房，山里划无住地带、白纸地带，村屯修围墙，用民夫背给养、用柴草。

进行战斗情况：

1.1936年冬季，抚松地区日系军官友座部队进山里讨伐，遇抗日军战斗一二小时，被抗日军把伪军击溃，死伤多名，抗日军撤走。

2.一九三七年二月，在临江地区通化东山里，第一教导队及第一旅部队，包围抗日军王凤阁，交战很久。〈王〉弹尽粮绝，交枪投降，在通化遇难。

3.一九三八年冬季，步一团、骑九团、教导步兵团、骑十六团、

步六团、骑八团，在辉南东南金川东北山里，包围抗日军。午后交战半天半夜，抗日军发火撤走，官兵无损失，仅遗下十二只枪。

〔中略〕

以外，一九三六年春季，奉天日本守备队司令官三毛中将管下部队，驻柳河县中川大尉，讨伐进大荒沟东白家店入山时，被抗日军包围痛击一二小时，全部击死伤，掳获枪弹撤走。该队长说白家店人通匪，把该村男女老幼绑到大荒沟东山脚下，枪杀三百零四名，房子全烧毁。同年夏季，该队长骑马偕金川县王凤鸣县长视察肃正工作班，行到拉蛄河沿，见一老头一小孩钓鱼，认为无住地带有人，枪杀。

临江地区顾问小越少佐，在一九三六年冬检举出说通匪人民，杀死三百余名。本年冬肃正工作班在抚松地区检举，〈日军〉杀死一般人民七百余名，夜晚吃杀死人心喝酒，把人心用箱子装上，寄回日本国去。一九三七年夏季，检举〈日军将〉一般人民八九名枪杀，余一名女子带走二三里，三个日寇轮奸后，用战刀刺死。

讨伐时人民损害：

1.集家时拆房盖房。

2.修道路修围墙。

3.讨伐军占用房间。

4.出民夫、柴草。

5.做木业、砍柴、打猎、采山菜、采药均停止。

6.山里土地山附近土地撂荒。

7.给伪满军背给养冻伤、被流弹打死伤的、集家后冬春两季因饥寒劳作死亡率很大。

〔下略〕

119—2—1165

赵秋航补充笔供

（1954年5月4日）

〔前略〕

一九三六年秋季实行东边道大讨伐使用手段：使用伪军一军管区全兵力外，有三、五军增援部队，实行包围，山里派部队游击扫荡，山外堵击，使抗日军一步不准出山外来，一个人也不准进山。

集家法：集团部落、集团家屋，划无住地带、白纸地带，组织肃正工作班，宪兵特务警察担任检举、调查、搜集情报。对象：通匪、济匪、窝匪、纵匪、嫌疑，暗控、指控等情形。

集家时把在山里住家的，警察限期勒令搬家于指定地点，有人力畜力者即刻搬家，无人力畜力者稍一迟缓即将房子烧了，据说有烧死人的，有把屋里东西都烧了的。此刻人民正收拾庄稼，又得忙搬家拆房盖房，还得给讨伐伪军修汽车道路。临时盖的房子，用秫秸夹墙，房盖苫豆秸草，屋里地上铺秫秸豆秸草睡在上边，每一烧火往四外冒烟气，火一住满屋上白霜，再一烧火满屋滴水，身体弱年老人冬令死去，次年春解冻盖房，一冬饥寒交迫，积累得病。金柳地区为讨伐集家死亡人数约一千五百余名，山里山外共集家户约三千余户，每户以五口人计算，约一万五千余人，撂荒土地约两三万垧，给人民带去这样大的灾难，执行讨伐者及参加的一律应负责任。

无住地带：集家后认为是匪区，划归无住地带，一个人也不准

进入，如有进入者，遇见立刻枪杀。人民不知道，有搬家后地里有粮食未收拾净，惦记一年辛苦所得的生活果实去收拾去，还有砍柴的，误走错道路的，如遇山里肃正工作队即为枪杀。因此，副业不能做了，如做木业、砍柴、采山菜、采药材、打猎都不能进山。伪军讨伐用民夫背给养，占用民房，修道路、围墙等等劳役事项，这些灾难，是伪讨伐军执行者给人民带去的。〔下略〕

119—2—1165

任广福笔供

（1954年8月24日）

姓名：任广福。别名：仲仁，年龄：六十岁，出生年月：一八九五年七月五日。性别：男。民族：汉。个人成份：军人。家庭成份：城市小资产阶级。原籍：北京市西直门内前桃园三十四号。

学历

一九〇九年七月入京师陆军小学校，一九一一年革命起义学校停课，一九一三年入直隶陆军小学校补习，一九一四年七月入北京清河第一预备学校，一九一六年七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附设的入伍生队，一九一七年一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一八年六月毕业。

简历

一九一八年六月至十月，任参战军军士教导团第三营第四连准尉助教，驻北京北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任参战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第六连中尉排长，驻北京北苑。一九二〇年夏因病去职。

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月，任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四旅上尉副官，驻锦州。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任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四旅第十七团第三营上尉营附，驻锦州东八家子。

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四月，任混成第二十一旅少校

副官，驻宁安。

一九二五年五月至八月，任步兵第四团中校团附，驻东宁。

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六月，任绥宁镇守使署上校参谋长，兼混成第二十一旅中校参谋长，驻宁安。

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任骑兵第十六师上校参谋长，驻农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任吉林督办公署上校参议，驻吉林省城。

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四月，任东铁护路军吉林自卫军联合军前敌总指挥部少将参谋长，驻哈尔滨。

投降后的经历。

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任伪军政部中校嘱托，在伪宣传部服务，驻长春。

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任伪军政部军事课中校情报股长，驻长春。

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任伪新京地区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驻长春。

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伪禁卫队上校队长，驻伪宫内府右侧营房。

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任伪第五军管区上校参谋处长，驻承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任伪教导步兵第五团上校团长，驻承德街北狮子沟。

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任伪中央陆军训练学校上校教官，兼研究部部员，驻奉天东山咀子。

一九四三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任伪第二军管区少将参

谋长,驻吉林市。

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同年“八一五”,任伪第三军管区少将参谋长,驻齐齐哈尔市。

一、抗战及投降的经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以武力侵占我国的沈阳,旋更侵入吉林。彼时我任吉林督办公署上校参议。当应前吉林陆军训练监李振声之召赴哈尔滨。抵哈后,始知前代理过吉林省长诚允及在押犯王之佑(前吉林警务处长)等,奉前吉林督办张作相之命,自锦州进入宾县,重新组织吉林省政府,李振声则在哈尔滨任旧吉林军的掌握,遂辅助之。嗣因环境日非,曾两次去北京(最后一次偕同各部队的代表),向张学良、张作相请示应采取的行动,并说明非消极态度所能维持,但无结果。当日晚则说:“汝等速归,已电令宾县省政府与熙洽议和。”我归哈时,宾县省政府已因电令解组,李振声亦停止工作。此时,前依兰镇守使李杜及前吉林督办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突然相继率队来哈,并击溃逼近哈市的汉奸于琛澄部(汉奸熙洽命彼进占哈市)。我与彼等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李杜、丁超(前滨江镇守使,后来任伪省长等职务)为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我为其参谋长(少将待遇)。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迄二十二日,与日寇多门二郎师团的先遣支队战于哈尔滨顾乡屯附近,失败后,退守方正(总司令部驻该地)、延寿(前敌总指挥部驻该地),并以前敌总指挥部所属的邢占清旅驻一面坡,以赵毅旅残余的陈德才团驻延寿、珠河间的平安镇,以杨子彬部(由胡匪千名而成的)驻黑龙宫,任各该地的警备。

一九三二年四月上旬,王之佑参加了李桂林(前吉长镇守使)与丁超在平安镇的会谈,丁超命其随李桂林赴哈尔滨接洽投降,以致被拘留于哈尔滨。当王之佑被诱走的翌日早,日寇进入珠河的

部队，即指挥汉奸熙洽所属的刘宝麟旅及杨秉藻旅，向平安镇攻击前进。彼时任平安镇警备的陈德才团擅自避往新开岭，一面坡的邢占清旅亦向谢捷斯木厂方向退走，乃命自珠河来归的薛县长率其所部的保卫团暂守平安镇，更令参谋杨奉璋往黑龙宫指挥杨子彬部袭敌左侧背以挽危局。但杨子彬部业已远遁，薛县长所部亦溃走，我遂率总指挥部的人员退至延寿东南方约三十里的某地（地名忘了）。刘宝麟旅则进占延寿。同时王之佑的副官长李春熙（曾随王之佑赴哈），自刘宝麟旅部用电话传达汉奸王之佑命结束前敌总指挥部去哈尔滨的命令，并告结束一事，影响着汉奸王之佑的安全。当因前敌总指挥部的人员均系汉奸王之佑的旧部，为了今后的团结，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除参谋杨奉璋外，均愿结束。但我既不满于中央的默视抗战态度，特别愤慨汉奸丁超不顾抗战前途，使汉奸王之佑去哈，以致陷入了当时的境地，而对抗战起了悲观，且联想到自身的安危，更兼对于帝国主义没有明确认识，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率前敌总指挥部人员（约二十名）投降于刘宝麟旅。因此，对于该指挥部的解组投降，我应负其责任。

其后，佩戴了伪军刘宝麟旅的臂章，在汉奸李春熙的引导下到哈尔滨的伪军政分厅（厅长为汉奸郭恩霖），尔后被命为伪上校参事。该分厅旋改称伪吉林军事特务部，在汉奸郭恩霖部长下，共有约三十名的人员，以收抚旧吉林军为目的。部内设有总务、情报、宣传三科，我任总务科长，办理该部的文书、会计、庶务等事务。〔中略〕

二、伪宣传部服务时期

1.我任伪军政部中校嘱托后，派在该部的伪宣传部服务。该部计伪部长王之佑以下，有张寄千、李懋勤、杉谷善藏、小岛钊及我等十二人，专办对伪军公开宣传的《精军周刊》（后来改为旬刊）的

编辑刊行事务。其内容主为伪军的战斗胜利消息，日满军的团结，军事常识和有关伪军的掌握鼓舞事项。我担任的事务为该周刊资料的收集，即由一般报纸上剪取有关的材料，并收集部员编写经部长认可的材料和交来的演说、训话、感想等各稿件。更有时亦编写材料。在手续和印发上，是将认可的材料交与杉谷善藏，由其拟定排版顺序、用字种类后，再由小岛钊与日商连络印刷，然后分发于各警备司令部及直属的伪部队等。

2.一九三二年秋，曾奉命赴奉天伪警备司令部，视察其所属教导队和卫队营对于《精军周刊》的分配状况，看到该刊已分配到了各连，并有时为伪士兵讲述，说明该刊已为重视而起了作用。

3.一九三二年冬，伪军政部因法库县请求将保卫该县有功的自卫团(团长包善一)改编为伪军的关系，派我视察该团的状况。我到法库后，知该团为某蒙旗所属的自卫团，人员约为四百名，多系蒙旗，枪械马匹尚属齐全；曾将包围法库县的匪众数百名击溃，保护了县城的安全，遂留驻该县。我将上述状况报告后，伪军政部未行收编。

4.在伪军政部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高级顾问佐佐木到一策划下，以伪军张海鹏部与日寇第六、八两师团主力联合攻占了热河县。当伪军和日军集结于开鲁、朝阳一带时，临时以伪军政部大臣张景惠为讨热军总司令的名义下，附以伪参谋司长郭恩霖等十余名的日满职员，为该伪总司令的随行人员，我被指定为随行人员之一。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各随行人员跟随汉奸张景惠及日寇多田骏等顾问，并带有约百名的卫兵，由伪新京乘专车出发，到锦州车站停留了两天。在这两天内，见有着西服的日寇四五名和清肃亲王之女(着军服)与列车上的顾问先后进行了会谈。该伪总司令部的列车更进入通辽，停留了半天后，返回伪军政部(往返共七

天)，解除编组，各回原有职务。〔中略〕

三、伪军事课情报股长时期

1.伪情报股除股长外，有少校股员一(汉奸张寄千)。该股是新成立的，专任伪军政部所属各伪军管区及直辖伪部以所呈战斗报告和情报的整理，汇成日、旬的简单要图或表，送阅后存查。此外，更随时向伪宣传部提供关于伪军教育鼓舞上的资料，如曾提供过伪营长闻长仁在罗子沟以少数伪军击破千名以上匪众的资料，鼓舞了伪军。

2.一九三四年秋，伪军举行第一次秋季演习时，我被编入该演习统监部的随员，负帮助接收演习上报告的任务。此次演习是在怀德县黑林镇和长春南岭间举行，南军演习司令官为汉奸应振复(伪中央陆军训练处步兵部长)，北军演习司令官为日寇藤井重郎(伪靖安军司令)。演习使用兵力共为六个团及少数的炮兵。第一天在大屯西的阜丰山演习了遭遇战斗及追击退却，第二天拂晓演习了攻防的战斗，并由傀儡溥仪举行阅兵后而解散。

3.一九三五年春，汉奸张景惠被命为伪特命检阅使，我为其随员之一，检阅了伪第一、二、三、四各军管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的教导队和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伪翊已步兵营、伪军政部等。我担任的事务为检阅宣传、内务及对伪军官的军事学问答等。〔中略〕

四、伪新京地区上校参谋长期间

1.伪新京地区司令官为汉奸李文炳，顾问为日寇田中春雄，教官为日寇松井卯吉，伪参谋长为汉奸任广福。部内计有五处，即参谋处掌管用兵、教育、编制各事务；副官处掌管文书、命令传达、人事异动、庶务等；军械处掌管军械的补充修理事务；军需处掌管被服、粮秣、金钱出纳等事务；医务处掌管人马的卫生事务。

该伪司令部所担任的警备区域为农安，长岭、扶余、长春(市

除)、德惠、伊通、双阳等县。所辖部队为混成第十旅，旅长由汉奸李文炳兼任，该旅所属的步兵第十三团驻长春，骑兵第十三团驻伊通。骑兵第二旅(旅长为汉奸尹宝衡，驻农安)，该旅有两个团，一个山炮兵连，分驻于农安、伏龙泉、长岭、扶余等地。

我的任务是辅助伪司令官统辖伪司令部的一切事务，任伪司令官事务上的整理和监督对其命令的实施，故对于伪司令部各处的事务，应乎必要予以指导，以达成伪司令官的意旨。

2.一九三五年秋，伪司令官李文炳被命为秋季演习的蓝军司令官，我为其参谋长，指挥伪第五教导队及伪第二教导队的步兵团，伪宪兵训练处的学生营和山炮连，与红军演习司令官汉奸邢士廉(伪中央陆军训练处长)的所部，在放牛沟南岭间举行了遭遇、追击、退却及攻防的战斗演习(演习日数为两天)，演习后，在南岭举行阅兵，其诸兵指挥官为汉奸邢士廉，我任其参谋长，受傀儡溥仪检阅后。解除编成。〔中略〕

五、伪禁卫队上校队长时期

1.伪禁卫队队长以下有队附三(于百清中校、川上少校、园部上尉)及军需、副官、军医等人员。此外，顾问为日寇田中春雄、牛方一角、三毛逸、立在中佐，军事教官为松井卯吉、久米乙彦等。

该队有步兵营二(营有步兵连二)，骑、炮兵连各一，人数共为六百余名。队部及步兵营驻伪宫内府右侧营房，骑、炮兵连驻南岭。伪禁卫队的任务为伪宫内府外围的警备，更任伪军政部的卫兵勤务。一九三七年秋又奉伪治安部命令，以骑兵一个排任伪新京水源地的警备两个月。对于伪宫内府外围警备的实施，是以步兵在围墙内的固定哨所及围墙的各门派遣哨兵以任警备；当傀儡溥仪外出时，派遣禁卫军官四名(外有预备军官一名)随行护卫，必要时派遣仪仗骑兵；我更在溥仪的外出和归还时，指挥一部部队施

行堵列。在伪士兵的教育、训练上，是以思想、技术、体力为重点，特别强调其忠于傀儡溥仪的思想及警备伪宫内府的荣誉。

2.一九三七年三月，奉到以伪禁卫队一个营参加通化地区讨伐，受在通化讨伐总司令部区处的伪军政部命令。奉命后，日寇顾问牛方一角曾说：此次参加讨伐虽属特殊，但可使部队取得实际经验，且可鼓舞其他部队，关于此点曾向伪军政部顾问部连络过。遂决定派遣伪第一营长王亚侨以下一百六十七名前往。我除对该营下达出动命令外，更与以好好听受指挥，努力任务，保持伪禁卫队荣誉的讲话。该营从三月出发，迄九月归还。在讨伐期间，曾对约二百名的抗日军施行渡河攻击，给与了歼灭性的打击，该营仅有准尉以下五六名的伤亡，因而不仅受到讨伐总司令部汉奸于琛澄的表扬，且鼓舞了其他伪军的讨伐情绪，而在归还时受到伪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以下的欢迎。又该营长张连长曾为了邀功而枪杀了良民一名，再中尉连附关禄昌更有强奸某民女的万恶行为。是皆由于执行伪军政治命令，派遣部队致使抗日联军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害，我应负其罪责。

3.一九三七年四月，奉伪军政部命令，参加了赴日本的见学团，共约三十人。在日寇顾问嘉悦三毅夫引导下到日本，参拜了明治、伊势各神宫，受了日寇天皇裕仁观樱会的招待，参观了步兵、士官、户山、海军各学校、川崎造船所、钟纺株式会社和朝鲜神宫，更受过日寇在乡军人会和朝鲜军司令官的招待，归还后(往返四十余天)，在长春无线电台广播了不知耻的谄媚的虚伪的感想，为日寇作了宣传。〔中略〕

六、伪第五军管区上校参谋处长时期

1.我任该伪军管区参谋处长时，统辖伪参谋处的一切事务。更有中校参谋一(樵铭远)，辅助我统辖一切，并担任警备事务；少

校参谋一(张士宏)、附以中尉处附一名,掌管部队的教育;上尉参谋一(徐培元)掌管编制、人事、庶务;上尉处附一(日寇田中巽)、附以中尉处附一,掌管情报、宣传,并与顾问部的连络。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警备状态,是伪步兵三十二团残余(团长刘连钰,率主力参加通化讨伐驻锦州;步兵三十三团(团长冯秉忱)驻北票;伪步兵三十四团(团长庞振江)驻平泉,其一个营驻马兰峪;伪步兵三十五团(团长阎充)驻四海堡,其一个营驻大阁镇;伪骑兵四十团(团长张百川)驻朝阳;伪骑兵四十一团(团长宋殿选)驻青龙;伪骑兵四十二团残余(团长吴国贵率主力参加通化讨伐)驻赤峰;伪骑兵四十三团(团长张四维)驻围场;伪骑兵四十四团(团长王冠英)驻大滩;伪教导骑兵五团(团长富璇善)驻滦平;伪教导步兵五团(团长姜学博)驻承德狮子沟。

2.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八路军袭击驻四海堡的伪步兵三十五团,更袭击兴隆后,则在滦平、兴隆、青龙等县南部暨长城一带展开活动。当时伪军管区除命大滩的骑兵往援外,更增加汤河口(伪承德地区司令官王永清带兵三连驻该地)、鞍匠屯(教导步五团的一营驻该地,后来更以一部驻拉海沟)、鹰首营子(伪教导步五团的一连)及隆化、围场等地的警备。其后骑兵王冠美、张四维、宋殿选等部队主力,即在热河省南部地区施行游击活动。七月中旬以后讨伐计划概要如下:

(1)伪骑兵四十四团(团长王冠英)为主力部队,在滦平南方一带地区对八路军施行游击活动。

(2)伪骑兵四十一团及四十三团的主力部队与伪骑兵四十四团保持联系,协力该团的游击。

(3)各队对于八路军的游击活动,不限于滦平南方地区,可相机进出长城线迄密云附近。

(4)各地任警备的部队,除任各地的警备外,相机对游击部队予以协力。

(5)驻汤河口的患者收容班,应撤至鞍匠屯开设。

(6)关于给养,适用讨伐间的规定。

一九三八年八月,伪治安部直辖的甘支队(伪队长甘珠尔扎布),进出于兴隆、青龙迤南长城线一带施行游击,协助伪第五军管区的警备。

日寇驻承德防卫司令部所属日军约为四个大队,当八路军进入热河省境后,亦展开游击活动。伪军管区的部队,约在九月基于伪治安部的命令,受该日寇司令官的区处。

3.一九三八年八月,因汤河口伪军受八路军夜袭,我随伪司令官邢士廉、顾问三毛逸赴汤河口、鞍匠屯视察警备状况,当悉八路军在中旬某夜半突入街内施行袭击,约战斗一小时后退去,伪军方面负轻伤者十余名,八路军方面亦受有损害,因系夜间,详情不明。

4.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以兼任后方补给主任的名义,与伪军需处协力,对汤河口、鞍匠屯的警备部队作了两个月面粉及日用品的补给,迄十月解除该任务。

5.一九三八年九月,顾问三毛逸将顾问部掌管作战、情报、宣传的日寇田中厚道等二人改任伪上尉参谋及处附,而强化伪参谋处。

同年九月下旬,基于伪治安部的命令,先取消了承德伪地区司令部,更取消了锦州伪地区司令部,将该地区的警备区域改属于伪第一军管区,更改编部队,迄十一月下旬改编完了,结果该伪第五军管区除伪第五教导队外,尚残存伪步兵团二,伪骑兵团一。

6.伪军与八路军的战斗状况:

(1)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八路军袭击驻四海堡伪军时,激烈

战斗了三日,遗尸约四十具而退去。

(2)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八路军袭击兴龙县,与该县警察发生战斗,驻该县的日军亦参加,战斗了约半日后退去,在这次战斗上,警察的损失较重。

(3)一九三八年六月下旬,伪军宋殿选部队在四海堡西南方某地与八路军发生战斗,给与八路军约五六十名的损害,并有弹药等的得获。

(4)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伪军张四维部队,在滦平东南县境长城附近,与八路军发生战斗,双方各有约二十名的损害。

(5)伪步兵三十四团第一营长雷振坤带兵两连,于七月中旬的某日晚宿营于金坑,当夜受八 路军的袭击,损失去人员一百余名。

(6)八路军于八月上旬夜袭驻拉海沟的伪教导步兵第五团的一个连,彼此各损害人员十余名。

(7)伪步兵二十三团第一营长朱宝兴率兵两连,于八月中旬在青龙县南方长城线附近某地为八路军所包围,仅伪连长一名带兵三、四十名逃走,余均被俘。

我在这个期间,由于执行了伪参谋处的业务,对于八路军给与了约近千名的重大损害,妨碍了八路军的收复失地解除人民痛苦的行动,并减轻对日寇后方的威胁,我应负其罪责。

七、伪教导步兵第五团上校团长时期

1.伪教导步兵第五团有步兵营二(每营有步兵连三,机关枪连一),迫击炮连一,共约一千一百名,驻于承德北的狮子沟。该团除担任伪军管区所属步兵团教育第一期的初年兵外,更担任伪军管区司令部的卫兵勤务。我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养成忠于伪满的思想技术和体力为重点,代各步兵团实施了五百名初年兵的第一期(四个月)教育。伪满国兵法实施后,初年兵的教育改由各团自行

实施，遂于一九四〇年为本团教育了约五百名的初年兵。

2.一九三九年九月，奉伪军管区的命令，派遣伪第一营长寒川好夫带兵两连任半壁山的警备，同年十一月上旬归还。

3.一九四〇年七月下旬，丰宁县驻窄岭的警察署为八路军所袭击，伪军管区命我带步兵第一营及迫击炮连，于八月上旬出发，任窄岭及五里营子一带的游击。抵窄岭后，据该地警察通报，八路军似在窄岭西方附近活动，遂派伪营长寒川好夫带兵两连于某日早向窄岭西方进出，我在午前八时余接到该伪营长的报告，据称在窄岭西方约三十里某山地与八路军发生战斗，请求往援，当即带兵一连前往。据伪营长寒川好夫声称，午前六时许与八路军发生战斗，约在八时因八路军退去而中止，结果：伪军伤连长一（即舌部受伤的连长）、亡兵一，至于八路军的损伤状况不明，并无所获等语，旋即率该营归还。

其后，又接到窄岭警察署的通报说，有土匪十一二名在窄岭西方八九十里的黄土坑盘踞，遂带兵一个连前往搜剿，到达现地时为其警戒者所发现而遁走，当即尾追射击，只打下了驴五六头。

我在窄岭游击了约七天，乃进至五里营子，更在该地游击了四五天后，奉到伪军管区进出渤海所（我带三个连驻该地）、大水峪（由寒川好夫的后任袴田营长带两连驻该地）任该地警备的命令，八月下旬到达渤海所，接收了步兵三十五团移交来的通八路军的嫌疑犯四名，我劝说他们一次后，交由当地的李乡长保释。〔中略〕

十一月上旬奉命解除渤海所等地的警备任务，听受伪军管区进出密云指挥部的指挥。遂进出于密云县，在该伪指挥部的指挥下（指挥者为伪军管区司令官应振复，顾问江岛虎之助）与张名久步兵团（在我左方）及兴安骑兵团（在我右方）协同，经龙潭沟盘山邦君至下仓，共作了四天的游击。在这个游击期间，袴田营长曾带

兵两连在盘山出口附近，与一二十名的八路军发生小冲突，给与了一二名的损害。

其后我向密云归还中，行抵蓟县时，更接到赴冯家峪游击的命令（因日寇铃木部队在冯家峪受了八路军的游击），抵冯家峪时，看到冯家峪的二三十间民房已被日寇铃木部队焚烧中，我在该地附近游击了三四天后，奉命经鲇鱼口归还承德，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承德后，办理团的改编事务。

八、伪中央陆军训练学校教官时期（含研究部部员）

伪中央陆军训练学校，为伪中央陆军训练处的后身，该校校长为汉奸郭恩霖，其后为汉奸王之佑及日系梅村笃太郎，顾问为日寇近藤弥太郎，干事为日系真井鹤吉。更有校本部、教育部、研究部、骑兵部、炮兵部和附设的教导团等。该校以教育既成的伪军官和候补生为目的。曾教育过：专科学生，校、尉官学生，团长学生，配属军官学生，少尉候补者和候补生等。

我在该校所负的任务：主为战术的教育，曾对第一期约三十名的团长学生（教育期间为一个月），担任过一次（一小时三十分间）思想战的教育。教育内容是讲述思想战的概要，说明思想上的战胜强于武力上的战胜（根据伪满铁军刊物上所刊载的）。又担任过一小时三十分间的防谍教育，讲述伪军方面有关防谍的事项和防谍的事例等。对第二期约二十名的团长学生，担任过三小时的内务教育，摘要讲述伪满军的内务规定。对五六十名的校官学生（教育期间为三个月），担任过四、五小时的国兵法教育。对约五十名的少尉候补者（教育期间一年），担任过一百二十小时的战术教育，讲述该校所采用的战术教程。此外，更因为伪军所用的典范令，系以日寇所用者为基础，不合于伪军的编制，曾参与过步兵典范令的研究修改工作。〔中略〕

九、伪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时期

1. 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为汉奸王济众、吴元敏、关成山，顾问为日寇永吉实展、江岛虎之助，参谋长汉奸任广福。部内设有八处，即参谋处掌管作战、情报、教育、建军、编制等事务；副官处掌管文书、人事异动、庶务、命令传达等事务；军械处掌管军械的补充修理各事务；兵事处掌管兵员的补充、检查等事务；军需处掌管被服补充、保管、粮秣、经理、金钱出纳、营缮各事务；军医处掌管人员的卫生事务；兽医处掌管马匹的卫生、补充等事务；军法处掌管法务裁判各事务。

伪第二军管区所辖的部队为混成第二旅（旅长张印符），其旅部及所属的步兵第十三团（团长宁宝祥、刘自聪）驻吉林，其所属的骑兵第十三团（团长赵伟）驻桦甸，第七工兵队（队长王凤萱）驻吉林，第八工兵队（队长刘颢良、宋玉堂）驻盘石，通信连驻吉林，高射炮队（队长服部实）驻长春。一九四四年春，改归伪高射炮队司令官张大任统辖。

我任参谋长时，除辅助伪司令官任其对各处业务的整理，并监督职员对其命令的实施外，对所属团队长实施过图上战术及兵棋的教育各一次。又对于伪司令部的职员（除军需、医务、法务人员）共实施过三次图上战术，一次现地（在吉林）战术的教育。〔中略〕

十、伪第三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时期

1. 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为汉奸赵秋航，顾问为日寇今田茂、生田吉五郎，伪参谋长为汉奸任广福。伪司令部内的各处及所执掌的事务，与伪第二军管区司令部的各处相同。所辖的部队有步兵第四旅（旅长张金祥、黄方纲），在我任伪第三军管区参谋长之前，进出热河讨伐，受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的区处。迄“八一五”亦未归还。又有骑兵旅一（旅长徐化鹍），该旅有骑兵团二，驻洮南，八

月将旅部取消,其一个骑兵团改为工兵队,仍驻洮南。有新成立的工兵队三,一个工兵队驻讷河,两个工兵队驻齐齐哈尔市。更有新成立的辎重队一(队长范鹏飞),和山炮营、通信连、军乐连,均驻齐齐哈尔市。自动车队一驻昂昂溪。〔中略〕

2.六月基于伪军事部的命令,在少校参谋臧镇的计划下,派通信连的少尉连附及士兵十余名,对于通讷河、甘南和醴泉的干线道路及两侧,作了地志的补充调查,即调查道路状况、路侧村落的宿营力、饮用水和食粮状况等,约十四五日调查完了,报告于伪军事部。

3.七月。日寇驻齐齐哈尔市村上司令官召集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赵秋航、顾问今田茂及我和参谋处长南清明(同时被召集者有汉奸周大鲁、郭文林等),到日寇的司令部,下达以驻讷河的工兵队赴嫩江受该地日寇驻军的区处,修筑防御工事,以驻齐齐哈尔的两个工兵队为日寇修筑齐市北端防御工事外壕的命令。工事的修筑开始后,曾随伪司令官、顾问及伪参谋处长赴齐市的工作地视察,并由伪司令官赵秋航说了几句鼓舞工作的话。

4.八月八日基于日寇司令官村上的命令,以山炮营长带一个连进出昂昂溪,受该地日寇军队的区处,任当地的警备,迄十五日晚,当地日寇驻军在山炮营长(日系)同意下,拟缴收该炮兵连的武装,以防不虞。事为该山炮连某军官所悉,遂先期炮击该地日寇驻军,迄于夜半始行避去。事后,日寇因已降服,双方则以不了了之。

〔下略〕

119—2—1174—1—5

富璇善关于张海鹏问题的笔供

(1954年5月24日)

张海鹏在满清光绪二十六年前后，与冯麟阁、汲金纯结成一个大匪帮，在辽西一带行抢，绰号大连字。他在那时候，与张作霖、张景惠的匪帮，也声气相通，所以他们都算是线上朋友。

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之际，张海鹏同冯麟阁被日寇花田、天鬼勾结，即以他们这帮土匪，编成给日寇满洲军利用的游击队，名为东亚义勇军，进行对于沙皇俄国作战军的扰乱，日俄战后，由于日本满洲军与满清政府的斡旋，就把冯麟阁这一部匪帮，收编为奉天左路巡防，冯麟阁是左路巡防统领，张海鹏是第一营管带。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各省军制改革，奉天军队由奉天都督赵尔巽着手，把左路巡防改编为暂编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张海鹏被提升为五十五旅旅长。他的旅司令部先驻在法库，以后移至黑山新立屯。他的隶下部队步兵一〇九团(团长吴宝贵)，步兵一一〇团(团长刘连升)。

一九一七年，张海鹏同冯麟阁一同去北京，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冯麟阁被捕，张海鹏变装逃回新立屯。由那时候起，他与溥仪发生密切关系。

一九一九年，孙烈臣当了黑龙江督军，因为朋友关系，把张海鹏调到黑龙江省混成第四旅旅长(驻在齐齐哈尔)。隶下部队步兵

第七团(团长梁泮)、步兵第八团(团长李桂林)、骑兵队(队长刘纯玉)。

一九二〇年,张海鹏兼任哈满护路司令(由哈尔滨到满洲里路线)期间,曾把被苏联红军击败退到中国境内满洲里附近的谢米诺夫白俄军,由他率领部队,把谢部全般武装解除,以后,他派马弁日寇兰亭,护送谢米诺夫到大连。

一九二一年,孙烈臣调充吉林督军,张海鹏也随之调到吉林步兵第七旅旅长(驻在一面坡)。隶下部队两个团(团的番号及团长姓名都不记得了)。同年六月,他因为没有争得吉长镇守使,愤而辞去步兵第七旅旅长职务,回到新立屯。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奉直战起来,张作霖因为要增厚兵力,令他成立部队,他在新立屯一带招了四营骑兵,编成及营长的姓名如下:

奉天第一游击队统领官张海鹏,骑兵第一营(营长徐景隆),骑兵第二营(营长鹏飞),骑兵第三营(营长刘纯玉),骑兵第四营(营长王青山)。

张海鹏率这一部人马,进到滦州。在奉军退回关外以后,他受命率所部驻在洮南、安广、镇东、突泉一带,担任这个地区剿匪。

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二次奉直战,张海鹏的部队编入第五军(军长关俊升),他的部队随着第五军部进到赤峰,没有作战,战局就结束了。以后他率领部队归还洮南。

一九二五年三月,张海鹏由张作霖任命为洮辽镇守使。在一九二六年,又把他隶下部队扩编。编成如下:

骑兵第二团(团长徐景隆),骑兵第三团(团长傅铭勋),骑兵第四团(团长鹏飞)。

以上的部队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又改编成如下部队:

辽宁骑兵第二团(团长徐景隆),辽宁骑兵第三团(团长傅铭勋),辽宁骑兵第四团(团长鹏飞),辽宁骑兵第五团(团长刘茂义)。

张海鹏因为张作霖、张学良始终没有提升他当督军、省主席,因而心中非常不平。同时他由于历史关系,又有亲日倾向,最显著的事实: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中,日寇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到洮南视察(关于满铁经营的事业)之前,洮南爱国人士要张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标语及作示威运动,曾被张海鹏密令警宪制止了。反至内田康哉到洮南时候,他又亲自迎送,竭力趋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关东军占领了沈阳、长春以后,张海鹏预想日寇一定要进犯洮南,这时兴安屯垦军也派张俊卿(张海鹏侄子在兴安屯垦督办公署充督察处长)来研究退守之策。最后决定,两方行动一致,先向突泉退去,预定尔后向热河或向黑龙江方面转进。但在同时,洮南满铁公所长河野正直,却暗中拉拢(他自任向日本军给接洽)张海鹏。虽然这样,当九月下旬日寇第六守备队首次进入洮南之前,张海鹏率洮辽军约同屯垦军一同向突泉方面退去;可是他把参谋长李盛唐、军需处长李延龄留在洮南。由河野正直从中斡旋,李盛唐与日寇指挥官羽山少佐(?)见面,羽山声称,日本军不在洮南驻留,并保证对洮辽一带军政权秩序不变。在次日,日本第六守备队即返还辽源,张海鹏也从中途率队回到洮南。过两天,张海鹏派我赴锦州给张作相(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父丧吊祭。我到那见着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长荣臻,报告了一切,他当时指示:"暂时可以这样敷衍,以后听司令长官指示。"我回洮南把这话向张海鹏交代了。可是这时在他家中,正有一个日本人大矢(日寇关东军的特务工作者)同一个翻译李香洲(他们是由沈阳温泉旅馆经理宫川隆介绍来的),与参谋长李盛唐、军需处长李延龄密谈什么事情,以后听说是日寇关东军给

张海鹏三千支步枪、二十万元钞票，劝诱他投降。张海鹏把三千支枪、二十万元钞票拿到手里，就大行扩编军队，改编了洮南附近各县的警甲及收降土匪（这时土匪蜂起洮辽，地方人民受到很大损失），由于这样，张海鹏的实力，骤然膨大起来，共计编成了以下部队：

伪洮辽骑兵第一支队，支队长徐景隆。伪洮辽骑兵第二支队，支队长鹏飞。伪洮辽骑兵第三支队，支队长刘茂义。伪洮辽骑兵第四支队，支队长傅铭勋。伪洮辽骑兵第五支队，支队长张俊哲。伪洮辽骑兵第六支队，支队长程雅宾（?）（四洮路警务科长，这个部队未成立）。伪洮辽骑兵第七支队，支队长彭金山（以后改编唐豫森部为第七支队）。伪洮辽骑兵第八支队，支队长王永清。伪洮辽骑兵独立团，团长张俊武。伪洮辽步兵独立团，团长李铁珊（树田）。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上旬，张海鹏由无线电受到张学良命令，任命他为蒙边督办，将蒙边一切事情，付以权宜，他随即组织蒙边督办公署，编成如下：

蒙边督办，张海鹏。少将参谋长，李盛唐。少将参议，李作民。上校参谋处长，哈玉良。上校军务处长，许松涛。上校医务处长，赵万福。政务处长，申振先。上校副官处长，张锡铭（乐三）。上校军需处长，李延龄。上校军法处长，李式朴。财务处长，恩麟。

张海鹏一手从日寇关东军方面接军火、钞票，一手从张学良方面接官，一只脚踏着两只船，看风色，哪边合适往哪边走。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日寇第六守备队羽山少佐到他家中，对张海鹏施行威吓手段，要他表明态度。张海鹏在这种情势下，乃派参谋长李盛唐带翻译李香洲到奉天关东军露面，与日寇片仓衷参谋接洽。结果，令张海鹏率洮辽军夺取黑龙江，然后把黑龙江军政权交付给

他。张海鹏就欣然的接受这个条件,正式表示投降日寇关东军,动员军队准备侵攻黑龙江,召集各支队长会议。在会议席上,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几个支队长,副官处长张锡铭及我,反对这样去做,张海鹏拍案大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 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这时参谋长李盛唐在旁边助纣为虐,愤然的说:"我们受张家父子(指张作霖、张学良)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在不可开交的情势下,由徐景隆、鹏飞等给他跪下赔了罪,就任他的意思去做了。在这以后,张海鹏派军务处长许松涛,抄了兴安屯垦公署,二十旅留守处,缴收若干汽车、兵器弹药、军用器材、被服等物品(从这时起兴安屯垦军离开兴安区向黑龙江转进)。他又令参谋长李盛唐,强由洮南东三省官银号、交通银行、边业银行提取了若干万现款(数目不详)。在十月下旬前后,日寇第六守备大队长上田中佐,率他的部队进入洮南,由张海鹏率洮南各界首脑把他们接入城内,从此洮辽一带沦陷到日寇手里。

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日寇关东军派了一个大矢与黑木教官,担任伪满洮辽军侵攻黑龙江作战的指导。编成伪作战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代参谋长哈玉良,副官处长张锡铭,军需处长李延龄,医务处长赵万福。张海鹏先派伪洮辽军第一支队,由陆路行军到江桥,掩护主力的前进。又令第三支队由陆路行军到安广方面,准备尔后对大赉方面攻击。伪作战司令部率第二支队、骑兵独立团由铁道输送到泰来下车后,第二支队到塔子城准备尔后对景星方面攻击(后续部队伪第八支队以后到达泰来附近)。张海鹏到达泰来后,发生以下情况:伪第一支队长徐景隆在江桥被地雷炸死;江桥被破坏;马占山指挥的抗日兵力厚集;伪洮辽军士气沮丧。在这样情况下,张海鹏乃踌躇不进。后来日寇关东军知道张海鹏部洮辽

军不济事，乃派多门师团直接从江桥正面开始对于马占山部抗日军作战。在日本军的攻击进展之后，伪洮辽第三支队由安广夺取了大赉；第二支队夺取了景星；追至日寇多门师团攻占了齐齐哈尔，张海鹏即归还洮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有满清肃亲王第十一子宪原、第十七子宪基，到洮南见张海鹏，他即时任命宪原为伪蒙边督办公署参谋处长（因为在对马占山抗日军作战末期，参谋处长哈玉良不愿意当叛国逆徒，乘机脱开了）。后来才知道，宪原是带着溥仪给张海鹏一道密旨，令之在洮辽一带规划扩张军队，养成实力，以帮他建国。张海鹏奉到这种圣旨纶音，于是对于伪满建国就积极活动。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奉天开的伪满建国四巨头会议（马占山、熙洽、张景惠、臧式毅），张海鹏曾派参谋长李盛唐去接头了。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仪就伪满执政以后几天，即火速的把伪满洮辽军调到长春附近，以行拱卫（伪满洮辽第一支队、第四支队）。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张海鹏受日寇关东军命令，率伪满洮辽军第一、三、四支队赴铁、法、彰、康一带讨伐农民起义的抗日军。在铁岭、法库的讨伐内容，详我以前提出的认罪事实。还有另外的是，伪满洮辽第一支队在追击长江好生擒的十数名农民军，由张海鹏亲自命王自安支队长枪决了（在法库衣素牛系堡子）。伪满第四支队（傅铭勋），在彰武把东北军二十旅的于澄营收编到伪满第四支队里边。仅在一个月间就把铁、法、彰、康二、三千名抗日势力削平。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伪满军政部因为吉林长春一带空虚，命令把伪满洮辽军第一、四、七支队调到长春一带，以后移到三岔河附近。在五月中，由张海鹏率这些部队，协力吉兴的伪满吉林军，讨伐李海青部义勇军，到达扶余，没有接触，以后部队归还三岔河。

七月中，又由张海鹏的命令，派伪满第四支队到榆树，协力日寇舟桥联队讨伐舒兰的冯占海、宫长海部吉林自卫军（由伪满军顾问日寇佐久间亮三指导）。伪满第四支队同日本军到舒兰前，宫、冯部回避作战，已由舒兰撤出，没有接仗。

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张海鹏在洮南枪杀了被伪满洮辽独立步兵团中校团附冯秉忱所破获的要起义的英雄赵万里等数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间，伪满军政部命令，把伪满洮辽军第四、五、八支队拨归伪满吉林警备司令官吉兴指挥下，在吉林地区讨伐。

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张海鹏率伪满洮辽军第三、七支队、骑兵独立团，讨伐在瞻榆的胡宝山部义勇军，当第三支队近薄到瞻榆时，胡宝山部未抵抗，即放弃瞻榆走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张海鹏同张景惠受日寇关东军侵略热河策划，用一种和缓手段，由他们二人给汤玉麟写一封劝降信，派我送到北京，交给汤汉卿（汤玉麟之次子）转递。后来被汤玉麟拒绝了。

一九三三年，日寇关东军与伪满军政部顾问多田骏、佐佐木到一等计划侵略热河，编成伪满讨热作战军，协力日寇关东军侵攻热河。张景惠是伪满讨热作战总司令，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他下的命令，开始行动。张海鹏是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他也是被日寇以热河的军政长官为钓饵，才干出帮助日寇侵攻热河的勾当。那时的讨热伪军编成如下：

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张海鹏（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顾问佐久间亮三、金川耕作、北部邦雄、生田吉五郎）。参谋长李盛唐，参谋处长富璇善，副官处长许松涛，军需处长李延龄，军医处长赵万福，军法处长孔（?）。

伪满洮辽军第一支队（王永清），伪满洮辽军第二支队（鹏飞），

伪满洮辽军第三支队(刘茂义),伪满洮辽军第四支队(傅铭勋),伪满暂编第三支队(索景清),伪满洮辽军独立骑兵团(张俊武),伪满洮辽军第一炮兵大队(李文),伪满洮辽军第二炮兵大队(刘本善)。

伪满讨热作战前敌司令部及张海鹏的部队,于二月中旬到达开鲁(第四支队以后由长春开到的)。张海鹏和佐久间亮三,命令伪满第一支队王永清,协力日寇茂木骑兵旅团进攻林西。这个部队在汤部董旅(以前误为石旅)没有抵抗退出后,把林西占领了。在三月上旬,张海鹏率主力进到赤峰。在三月中旬,在日寇第八师团、第六师团、茂木骑兵旅团攻击进展到热河省西境、南境线上时候,张海鹏命伪满军第二支队为先遣,他率伪满讨热作战前敌司令部继之进到承德,第四支队进驻丰宁,第三支队进驻隆化,索支队进驻鞍匠屯。由于这种帮助,使日寇关东军的侵略作战,很快的占领了热河,并进到长城线上的作战。又伪洮辽军在这次进军中,征用车马,各部队宿食不给钱,还有掠夺行为(损失数目不详),使热河省人民遭到很大的损害。

一九三三年四月,伪满第三支队大部官兵不愿意给日寇去当侵略工具,由隆化结队奔回洮南,张海鹏命令驻洮南伪满第五支队剿抚。以后,由该支队长张俊哲将这一部人安抚遣散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伪满政府命令成立伪满热河警备司令部及伪满热河省公署,任命张海鹏为伪满热河警备司令官兼伪满热河省长。由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在伪满热河警备司令部方面,由张海鹏命令区分了各部队的警备地区及担任的任务:伪满热河省承德地区,第五支队由洮南后移到承德的,担任承德警备及对汤玉麟残部扫荡;围场地区,第四支队担任热河西部警备,对汤玉麟残部扫荡;赤峰地区,第一支队担任热河西北部警备;朝阳地区,第三支队担任对孙永勤部义勇军讨伐。由之就巩固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的统治局势。

张海鹏在伪满热河省长任内，在日寇中野琥逸总务厅长主持下，由他的命令，令热河省大量种植鸦片，并对热河省各旗、县进行治安工作，这一切苛政，是给热河省人民很大的毒害，给日本帝国主义作成了殖民地政权。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张海鹏被免去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职务，被调到伪满皇帝溥仪近旁当侍从武官长。他于一九三五年四月随溥仪访日。他武官长职务是：把伪满军的军状上奏及溥仪给伪满军的敕谕、敕令由他下达；再有由溥仪派遣侍从武官到日寇关东军各地驻军及各地伪满军队及陆军病院的慰问；对伪满军讨伐凯旋的慰劳；对各军事学校学生毕业典礼钦派。这些差遣，都是由他给武官下命令。

一九四一年二月，张海鹏被免去侍从武官长职务，以伪满将军身分在长春居住，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降服。

〔下略〕

119—2—1171，2，12

富璇善笔供

（1954年7月20日）

富璇善，五十四岁，男，满族，住沈阳市郊财落堡区大辛屯，成份中农。伪满乡兵第十二旅旅长陆军少将。

履历

一九一七年六月，由沈阳县财落堡公立高等小学校毕业。

一九一八年三月，投入陆军第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步兵一百零九团当兵。

一九二〇年三月，任黑龙江混成第四旅旅部上士，一九二一年六月辞职。

一九二三年十月，任奉天第一游击队司令部上士，一九二五年三月，任洮辽镇守使署上士，一九二五年六月，洮辽镇守使署上士被开除。

一九二七年四月，任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三师师部少尉副官。

一九二七年七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本校第八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东北陆军讲武堂本校第八期骑兵科卒业。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任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三师中尉副官。

一九二九年一月，任辽宁步兵第四团第一营上尉营附，一九三〇年六月，任辽宁骑兵第四团少校团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任洮辽镇守使署少校副官。

一九三一年十月，任伪蒙边督办公署中校，副官，一九三二年

三月，任伪满洮辽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处长（伪满洮辽警备司令部三月中旬编成）。

一九三三年二月，任伪满讨热前敌作战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一九三三年五月，任伪满热河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

一九三四年八月，任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

一九三五年四月，任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受伪满五等景云章、建国功劳章、一九三六年受日本瑞宝章（五等）、访日纪念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任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部附。

一九三九年五月，任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部部附（一九三九年受伪满四等景云章，同年受日本四等旭日章）。一九四〇年三月，任伪满第八军管区兵事处长，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任伪满第八军管区高级副官（一九四一年受建国神庙纪念章）。

一九四二年二月，任伪满第一军管区兵事处长（一九四二年受伪满三等景云章）。

一九四三年八月，任伪满混成第一旅旅长，进级少将。

一九四四年五月，任伪满混成第十二旅旅长。

一九四五年三月，任伪满步兵第十二旅旅长。

伪蒙边督办公署中校副官期间：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正当东北洮辽镇守使署少校副官。于十月中旬，张学良任命张海鹏为蒙边督办，组织了蒙边督办公署，我被任为蒙边督办公署中校副官。十月下旬，张海鹏正式表示投降日寇关东军时候，我因为对国家、对民族的观念不深切，徒恋恋于禄位，恋恋于家庭，只计较个人之得失，而竟没有能断然脱离张海鹏，结果跟随他一道背叛祖国，当了汉奸。这就是我在伪满十四年所干的一切罪恶的发足。

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大汉奸张海鹏率伪洮辽军帮助日寇多门师团侵攻黑龙江作战时期，我被留在洮南，受参谋长李盛唐指示，担任公署内庶务及涉外事项，与驻洮南日本第六守备大队、日本宪兵队事务连络。例如下记事项：

（一）日寇第六守备大队队附成友大尉，找我指给对于洮南市街的警备要旨，我归向参谋长李盛唐报告了内容，由他指命伪步兵独立团准之实施，洮南各城门设置军士哨，对于出入城的百姓盘诘或搜查，夜间在街内各要道口增设步哨，并派巡察，禁止一般人通行。

（二）日本宪兵队野木曹长，常到伪蒙边督办公署连络情报，都经我到参谋处把材料要出，交付给他，是属于伪洮辽军前方作战情况及洮南附近各县的治安状况（有无抗日军、农民起义军 的活动）。

以上是我帮助日寇进行镇压洮南人民与供给日寇维持治安工作的材料，以巩固他们的占领地域。这是我的罪行之一。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我随张海鹏赴铁、法、彰、康一带讨伐，在伪讨伐司令部内担任副官职务。当到达法库那天，张海鹏即命我把伪洮辽第一支队长王自安找到伪讨伐司令部内，由他亲口命令王自安率他的所部，要迅速的将在法库西部的农民起义军天缘好部、法库南部的农民起义军长江好部剿灭，这时由伪少将参议李作民在旁作书面命令。次日早，王自安率伪洮辽第一支队驰至侯三家子，把天缘好部围在陈区长院子内，战斗至傍午，骑兵第一团由大门冲入，农民军除一部逃出外，其余天缘好以下约八九十名全被打死在陈区长院内，虏获步枪约七八十支。这时伪讨伐司令部也到达侯三家子，张海鹏在王自安支队长的报告后，他听到陈区长家与天缘好勾结非常震怒，乃命王自安把陈区长及其家中十五岁以

上的男子十三名，押送到伪讨伐司令部，在张海鹏自己略行讯问后，就把这一干人交给我，令我一律执行枪决，随后他就带伪讨伐司令部赴丁家房去了。恰在这时，有法库士绅梁维新给我来电话，嘱告我先不要执行，等待他到张海鹏那儿去说情往外营救，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执行。后来由梁维新竭力向张海鹏关说，张海鹏不得已，乃令人传告我把情节较重的陈区长之二弟一个人执行枪决，其余十二个人可由梁维新保出。我在张海鹏的命令下，就把陈区长之二弟交由王自安支队长派人执行枪决了。这是我执行张海鹏的命令枪决一个良善人。

伪洮辽第一支队于侯三家子作战以后，即向法库南方转进。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行到衣素牛录堡子，适逢长江好部农民军由衣素牛录堡子向南方急奔中，伪洮辽第一支队长王自安乃指挥所部从后边尾追，沿途打死三十余名，而长江好部农民军竟于这次战斗溃灭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末，张海鹏依日寇关东军命令，率所部伪洮辽军转进到铁岭，受日寇第五守备大队大队长田所中佐区处，讨伐在铁岭南部汛河、上下石碑山一带驻在的刘海泉部义勇军、金山好部农民起义军。伪讨伐司令部到达铁岭后，参议李作民带我到日寇田所大队长处连络，当由田所大队长按地图指示伪洮辽第一支队要配置在上下石碑山北方一带，伪洮辽第四支队要配置在汛河西方，准备对刘海泉部、金山好部攻击。至三月初，伪第一支队、第四支队都到达指定位置以后，日寇田所大队长找我到守备队，告诉我要张海鹏即时给两个支队下命令，对于刘海泉、金山好部开始攻击。我回到伪讨伐司令部向张海鹏报告后，他即命参议李作民做了命令，随后由我派传令送达两个支队长。他们于接到命令后，即指挥他们的部队开始进攻。刘海泉部为回避作战，向山岔子东方

转进，伪第四支队从后方追击，沿途打死约百余名，这部义勇军从此就溃散了；金山好部为回避作战，向破车沟方面转进，伪第一支队从后方尾追，打死金山好以下约百余名，这部农民军从之也溃散了。

按以上的几次讨伐行动给予人民的危害，使英勇抗日起义的人民牺牲有三四百名之多，尤其因为把这几部抗日势力消灭以后，为日本帝国主义除去在这个地区建设殖民地道路上的障碍。所有这几次的讨伐，都有我参与，这是我最大罪行之一。

伪满洮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期间：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仪即伪满执政，因为吉林兵力不足，长春空虚，应乎要求，伪满军政部乃命伪满洮辽军第一支队、第四支队、第七支队十三团（临时受第四支队指挥），移住长春及其附近一带，担任这个地区的防卫。以后随着情况的转变，又将这两个支队移驻在陶赖昭及三岔河一带。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伪蒙边督办公署改编为伪满洮辽警备司令部，我被提升为伪满洮辽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处长。因为前述伪满洮辽第一支队、第四支队的驻在吉林及对于他们使用上的关系，伪满洮辽警备司令部派我住在长春，担任与伪满军政部方面的连络。我由于溥仪当了伪满执政，从个人存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封建思想的作祟，我还幻想承袭满清皇朝之殊恩，所以在伪满军中的服务，也一时的积极起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大汉奸张海鹏率伪满洮辽第一支队、第四支队、第七支队十三团，协力吉兴率领的伪满吉林军，讨伐在扶余，长春岭一带之李海青部义勇军。这役，我在伪满洮辽军讨伐司令部内担任作战，关于部队的出发命令及行军计划，都经我手做的。当我军到达扶余县城之前，李海青部义勇军已全向长春岭方面移

动，因而我部并未接触。伪洮辽警备司令讨伐司令部及部队随即归还三岔河。

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大汉奸张海鹏派我随伪满军政部顾问日寇佐久间亮三到三岔河给伪满第四支队下命令，命令要旨：第四支队到榆树县城集结，受顾问佐久间少佐的指导，协力日本军舟桥联队，讨伐在舒兰境内的冯占海、宫长海吉林自卫军。第四支队受到命令后，前进非常迟慢，佐久间亮三又令我前往催促一次，待伪满第四支队到达榆树后，我即归还长春（此次讨伐，因伪满吉林军刘宝麟旅士兵起义，中途而罢，并未接仗）。

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张海鹏率伪满洮辽第三支队、第七支队、骑兵独立团，讨伐在瞻榆的胡宝山部义勇军。伪满洮辽讨伐司令部设于开通县城内，这次我在这个讨伐司令部担任作战，对于讨伐部队的出动及对于瞻榆方面胡宝山部义勇军的攻击准备计划，都是由我做成的。后来，张海鹏为劝汤玉麟投降伪满事（详下文），派我赴长春与张景惠连络，我就离开了伪满洮辽讨伐司令部（后来听说于十一月初，当伪满洮辽讨伐部队近薄到瞻榆县城时，胡宝山部义勇军没有抵抗，即行撤走）。

以上几次伪满洮辽军的讨伐行动，都是由我一手制做的命令及一切计划，这是我的最大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月末，大汉奸张海鹏、张景惠两个人，派我拿着他们给汤玉麟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劝汤玉麟投降伪满事。我到北平，把信托汤汉卿（汤玉麟之次子）给转递，我等到汤汉卿把汤玉麟拒绝的回信交给我以后，就回来向张景惠、张海鹏复命。这是我帮助大汉奸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热河活动的一个罪恶。

伪满讨热前敌总司令部参谋处长期间：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伪满讨热前敌总司令大汉奸张海鹏，率

他的所部伪满讨热军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由吉林出发这时尚未赶到)索景清支队、炮兵第一大队、炮兵第二大队,到开鲁集中完了。张海鹏及顾问日寇佐久间亮三,令我给伪满讨热第一支队长王永清下一个命令,令他率所部协力日寇茂木骑兵旅团进攻林西。这个命令是由我交给中校参谋宋道仓办的。当伪满讨热第一支队同茂木骑兵旅团于到达林西时,驻在那的汤玉麟部董旅早已撤走了,他们没有交战就占领了林西。

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伪满讨热前敌总司令部,伴随日寇第八师团夺取了凌源、建平以及第六师团夺取了赤峰的进展,张海鹏乃率所属各部队推进到赤峰。三月中下旬间,当日寇第八师团夺取了平泉、承德、隆化等地,向热河西南部省境线上进展;日寇第六师团夺取了宁城、凌南等地,向热河南部省境线上进展。日寇茂木骑兵旅团夺取了围场以后,伪满讨热前敌总司令部顾问日寇金川耕作,对我指给一个命令要旨:伪满讨热第二支队为先遣,迅向承德前进,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继之进驻承德;伪满讨热第三支队进驻隆化;伪满讨热第四支队进驻丰宁;伪满讨热索景清支队进驻滦平鞍匠屯;伪满讨热炮兵第一大队、炮兵第二大队随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进驻承德。这个命令是由我做的,而以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张海鹏、顾问佐久间亮三名义下达的。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及所属各部队,于三月下旬大都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仅有伪满讨热第四支队,因为后由吉林出发,延至四月中始到达丰宁。

由于伪满讨热作战军的推动作用,使日寇关东军很快的底定了热河全局并迅速进到长城线上作战,致使热河省沦陷了十三年。在这次作战中,对日寇顾问部,我经常派一员参谋与他们连络,对他们提出伪满讨热各部队(张海鹏隶下各部队)各时期情况,及由

他们那受到的指示，而由我做成命令付与各部队的任务，这就给日寇顾问们指挥上的便利，与达到他们使用伪满讨热作战军的目的。这是我的最大罪行。

伪满热河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期间：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伪满讨热作战已告终了，奉伪满军政部命令，把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改组为伪满热河警备司令部，大汉奸张海鹏任警备司令官、李盛唐任参谋长、我任参谋处长、许松涛任副官处长、李延龄任军需处长、赵万福任医务处长、孔健时任军法处长，伪满热河警备司令部军事顾问佐久间亮三少佐、生田吉五郎大尉、本间诚大尉。

一九三三年七月，日寇顾问佐久间亮三和参谋长李盛唐找我指示伪满热河省的警备要旨，令做警备计划。当由我交给参谋处警备科长把这个警备计划做成，用伪满热河警备司令官张海鹏、顾问佐久间亮三名义，令各部队遵照实施。计划的内容：伪满承德地区司令张俊哲，兵力伪满热河骑兵第二旅（原伪满洮辽第五支队，后移驻到承德），独立步兵团（后移驻到承德），任务担任承德市街的警备及扫荡区内的汤玉麟残部。伪满赤峰地区司令王永清，兵力伪满热河骑兵第一旅，任务担任对伪满热河省西北部国境的警备及扫荡区内的农民军。伪满丰宁地区司令傅铭勋，兵力伪满热河骑兵第四旅、独立步兵营，任务担任伪满热河省西南部国境的警备及扫荡区内的汤玉麟残部。伪满朝阳地区司令鹏飞，兵力伪满热河骑兵第三旅（原伪满讨热第二支队），任务担任对孙永勤部义勇军讨伐。由于这个警备计划，就镇压了热河省人民，渐次消灭了抗日势力，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在热河的坚强统治地位。这是我的罪行。〔中略〕

一九三四年六月间，施行的全伪满军的编制改正案，是由伪满

军政部顾问部制定的，而由各地方伪军内日本顾问，准据它另做成适合本军现况的编制改正实施要领，并且由他们统制来进行实施。伪满热河警备军的编制改正实施要领，就是由日寇顾问关原六一手做成的，把这个案交给参谋长李盛唐和我，并作了说明之后，我令教育股长张恒楷专责办理，给各部队下改编命令。各部队的拆拨、编合、移驻及运输等事，在我的督励之下，伪满热河军先期改编完了，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成立了伪满第五军管区。它的编成如下：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大汉奸张海鹏、参谋长李盛唐、参谋处长富璇善、副官处长李宝忱、军械处长张恒楷、军需处长李延龄、军医处长赵万福、兽医处长杭承祖、军法处长代理陶远进、伪满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关原六。第五军管区管辖两个地区：伪满锦州地区（司令官田德胜），混成第二十四旅、混成第二十五旅；伪满承德地区（司令官王永清），混成第二十六旅、骑兵第七旅。由于这次编制改正的完成，达到日寇军事顾问更进一步控驭伪满军的目的，做成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东北人民的应手工具。这是我的罪行之一。

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长期间：

一、参加伪满第二次陆军特别大演习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奉命补为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长（驻在打虎山）。到任后，即从事于参加陆军特别大演习的准备教育。于当年十月初，奉伪满军政部命令，本团随伪满第五教导队编入在溥仪统裁下的第二次陆军特别大演习的东军部队内（东军支队司令官李文炳，演习部队伪满第五教导队全部、伪满吉林军约四个营）。演习地域由龙家堡到长春市间，演习课目，第一日遭遇战、追击、退却，第二日攻击、防御，第三日溥仪对参加演习部队的全部军官赐餐。我觉参加这个演习，是无上光荣，因而对部下官兵训话：我们是皇帝陛下的军队，应当要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安内而攘外。由于

这种鼓励，就坚定了他们帮助日寇与人民为敌的心。这是我的罪行之一。

二、吉林地区讨伐

一九三五年十月，伪满第五教导队受伪满军政部命令，归入伪满吉林地区司令官吴元敏指挥下，担任蛟河县官地北方地区的讨伐。本团(欠第三连，回打虎山原防留守)随伪满第五教导队司令部驻在官地。于当年十一月中，受伪满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命令，令我率骑兵第二连、迫击炮连徒步赴官地北方二道沟里，破毁抗日联军的山寨。受命后出发，我同日系团附森田胜丸上尉率第二连为右纵队，进二道沟；迫击炮连为左纵队，进二道沟北沟。当我右纵队行到距山寨约千米处，山上对我方开始射击，我即命第二连散开攻击上去，抗日联军没有抵抗竟向后方大林子中撤去，我令第二连把山寨(约容八九个人一个地窨子)破毁后，即归还官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本团受伪满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命令，协力敦化驻在的日寇守备队在官地北方山林地带中的搜剿，令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担任由二道沟至马鹿沟中间各谷口的防堵。防堵十日间，与抗日联军并未发生战斗。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本团受伪满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命令：令本团(欠骑兵第一连、骑兵第三连)分散配置于烧锅屯、三合屯、塔拉站一带，担任区内的扫荡。团部驻在烧锅屯。于二月九日，接到八家子百姓报告：抗日联军李师长部约百余名，由八家子向玄天岭行去。我接到报告后的处置，我携日系军官杉本中尉率机关枪连经八家子向玄天岭追去，一面用电话命令驻在塔拉站的迫击炮连迅向玄天岭东方前进，以行夹击。当我率机关枪连行到玄天岭顶子上时候，突被埋伏好的抗日联军不意的攻击，陷于被包围的形势，这时我也指挥团部及机关枪连一部向左方移动，施行反包围，

同时追击炮连也由玄天岭东麓攻击上来，抗日联军乃向北方撤去。战斗后检点战场，发现血渍一处，预想抗日联军似有损伤。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驻在三合屯的骑兵第二连，接到青沟子附近有小部抗日联军出现，第二连长独断的率领第二连前往讨伐。据他战斗后的报告说，抗日联军牺牲两名。

在吉林讨伐全过程中，我曾帮助日寇指挥我的部队与爱国志士抗日联军作战，使抗联战士遭到损害；并破毁山寨，压缩了革命根据地。以上是我的最大的罪行。

三、锦州地区讨伐老梯子农民军之役

一九三六年三月间，本团由吉林讨伐归还打虎山原防，五月中旬，受到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命令，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归入伪满锦州地区司令官田德胜指挥下，参加锦州地区春季大讨伐，讨伐对象是老梯子农民军（约三百余名）。参加这次讨伐的部队，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骑兵十六团、骑兵三十九团、骑兵四十团、骑兵四十一团、骑兵四十二团。这个讨伐计划，是由伪满锦州地区顾问日寇于保正隆制做的，它是用分进合击的方法，在讨伐开始前，由伪满第五军管区顾问部向我团派来一名军事教官日寇中岛中佐，担任讨伐间的指导。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由阜新北方鹜欢池开始行动，以骑兵第一连、骑兵第二连为第一线，我率其余部队为第二线，由日寇中岛教官指导，按照计划在本团战斗地境内遂期向前推进，这些行动的命令，都是以我的名义下达的。于五月下旬，在阜新西北方官才山附近，被伪满骑兵四十二团击溃的老梯子一部，遭到我团第一线骑兵第一连骑兵第二连的迎头痛击，他们受到损害，即转向西南方奔去。此役共打死老梯子部农民军二十余名，获步枪十余支。由于这次伪满锦州地区春季大讨伐结果，老梯子全部农民军完全归于消灭，使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得从事

它们的开发。这是我的最大罪行。〔中略〕

五、在伪满热河支队指挥下的全期行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伪满治安部最高顾问日本战犯佐佐木到一,做出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计划,乃编成伪满热河支队以帮助日寇侵攻察哈尔。这个部队的编成及付与的任务,是佐佐木到一于七月末亲自到承德伪满第五军管区司令部,用伪满治安部大臣于芷山、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名义下达的命令。伪满热河支队编成:支队长日寇藤井重郎少将、顾问皆藤喜代志。部队:伪满靖安步兵团(团长山崎积)、伪满第五教导队司令部(队长朱家训)、伪满教导步兵第五团(团长姜学博)、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欠第二连在滦平留守,团长富璇善)、伪满靖安炮兵队(山炮四门,队长姓名不详)、伪满卫生队(队长姓名不详)。任务:协力日寇华北军作战,相俟应的对察哈尔准备进攻。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由滦平出发,于三日到达古北口,受伪满热河支队长藤井重郎命令,令本团派骑兵第一连,附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门,由本团军事教官日寇平川森引率,赴怀柔一带侦察。旋又受到伪满热河支队长藤井重郎、顾问皆藤喜代志命令,令我率本团下余的部队向热河省西境喜峰寨转进,准备对当面的汤恩伯军攻击。我们的部队于八月十日到达喜峰寨。在这同线上配备的部队,巴图营子伪满靖安步兵一个营(因遭到汤恩伯军的袭击以后撤回黑达营子),井儿沟伪满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带伪满教导步兵第五个团一个营(于八月中旬遭到汤恩伯军袭击,朱家训以下被击毙若干人,因而也将这个地方放弃了)。于八月二十日早六时,忽然汤恩伯军高桂滋师步兵一个团,向我喜峰寨部队来袭击。得到报告后,团附日系军官藤井辰已上尉,即指挥骑兵第三连、一个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进入喜峰寨村东方山

上的阵地，我亲自把骑兵第三连的主力布置在喜峰寨村缘阵地里，以后我也到山上的阵地里。交战约一个小时，在喜峰寨村缘的骑兵第三连，因受压迫，也退到山上阵地内，同时高桂滋部以大部兵力由我们后方迂回，包围攻击，我同藤井团附继续指挥部队抵抗，最后不支，乃下山乘马率部队由喜峰寨村北口突围而出，向杨木栅子方面退却。此役因为我们是退却，所以对于高桂滋部的伤亡状况不详。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伪满热河支队长藤井重郎，在黑达营子附近山上视察阵地时候，突被一个起义的中国爱国志士伪满靖安步兵团一个军士，把他刺杀了，以后由伪满靖安步兵团团长日寇山崎积代理支队长职务。于八月末，由伪满热河支队长山崎积和顾问皆藤喜代志给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命令，令本团经由巴图营子、龙门索进占赤城（这时由军事教官平川森率领赴怀柔侦察的部队已经归还）。我遵照命令，率本团于九月一日没有战斗进入了赤城（由于张家口方面刘汝明军的退却，汤恩伯军因战略上的关系，已于前两天自动的由这方面向南方撤去）。入城后，由本团军事教官日寇平川森，指派一个姓张的担任赤城临时维持会会长，在我的同意之下，着他组织了赤城临时维持会。次日，又奉伪满热河支队代理支队长山崎积、顾问皆藤喜代志命令，本团进驻龙关。我率部队于三日进入龙关，又由日寇军事教官平川森，指派原龙关县政府王科长担任龙关县临时维持会会长，在我的同意下，着他组织了龙关县临时维持会。在维持会成立时，我按着伪满热河支队指示的意旨，曾有致辞：日本军作战目的，是为铲除蒋介石，而不是对中国人民有什么仇怨，并且还要给大家建立一个合意政权，例如满洲国，王道乐土的建设，希望大家努力合作。另外为龙关县城的警备，我曾做出警戒部署，龙关街市各要道口设立复哨，夜间派出巡

察任街市的巡察。我团在龙关约驻一个月。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我团受伪满热河支队长山崎积命令,令团随支队部移住到宣化。在宣化驻在时,我受伪满热河支队部顾问日寇皆藤喜代志指示,令代伪满治安部调查科搜集图书。我通知了各连,之后,曾由第一连连长张树义,由他的住处强取了一部《东华录》,由团转送到的伪满热河支队部。这是我帮助日寇掠夺的一种罪行。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受伪满热河支队长日寇美崎丈平、顾问皆藤喜代志命令,令本团移驻下花园,担任下花园附近煤矿的警备。到达后,我曾派出警戒部队,为警戒上周慎起见,我还时常自己去巡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伪满热河支队长日寇美崎丈平命我率本团(除煤矿的警戒部队)到新保安讨伐农民军。在向新保安的行军途中,尖兵连(骑兵第一连)日系军官川上大吉上尉因带错了道路,用战刀砍死百姓一名。我到达新保安后,侦知附近并无情况,于次日乃率部队归还下花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伪满热河支队受日寇奈良联队长区处,讨伐在蔚县境内林彪将军部下的八路军。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于十一月末到达桃花堡集结。于十二月一日,伪满热河支队长日寇美崎丈平命令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为独立骑兵队,沿支队的行进道路,由桃花堡、九宫口向岔道搜索前进。本团于十二月一日,由桃花堡出发,在桃花堡南门外,第三连日系连附畑柰知三,用战刀砍死百姓一名,是因为带错了道路。十二月三日,当我率团主力行抵麦子疃村东方时,接到军事教官平川森所率的在前方搜索的骑兵第一连已在九宫口北方与八路军发生战斗的报告,我当即与日系团附藤井辰已按图研究,做了以下的部署:令骑兵第三连由麦子疃通九宫口的南侧道向九宫口村西方攻击前进,我率机关枪

连、迫击炮连沿骑兵第一连的道路向九宫口北方急进。当我带迫击炮连到达九宫口北方一个村落近旁,迫击炮进入阵地,将开始射击,在九宫口村内的八路军即以一部在高地掩护,主力向南方撤走了,因为天色已暮,没有追击。此役检点战场,八路军战士牺牲三名;另外在九宫口村北方,一名百姓因为带错了道路,被骑兵第一连连附日系军官川上大吉用战刀砍死。十二月四日,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由九宫口向岔道前进途中,行到九宫口西南一个村落西方时,急遭西北山上射击,当尖兵连散开攻击,这个八路军小部队即行撤走了。同时日系团附藤井辰己上尉,由山上搜出有二十余名百姓,他即命令随从兵及传令兵们,要把这些人一律枪杀,将毙了一名,我赶到了,用严辞把他阻止住,随后由我把其余的那些百姓都释放了。十二月四日晚,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在岔道南方约十里处某村宿营,于五日早三点多钟,接到伪满热河支队长日寇美崎丈平命令: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速派出骑兵一个连,追击由岔道至涞源道上向南转进中的八路军后尾部队。受令后,即由军事教官日寇平川森,率骑兵第一连前往追击,当他们抵达距岔道四五十里处,与八路军后卫尖兵接触,战斗约二十分钟,他们即向西南方山地中撤走了。日寇平川森也率骑兵第一连归还团内。伪满教导骑兵第五团到此任务终了,遵照伪满热河支队长日寇美崎丈平命令,回到桃花堡驻防。

〔下略〕

119—2—1171—1—5号

爱新觉罗·宪均笔供

（1954年7月22日）

姓名：宪均，别号：复之。性别：男。年龄：五十二岁。族别：满族。籍贯：北京市东四牌楼北船板胡同十八号。现住所：吉林市延庆街（吉兴的东邻）。家庭成分：满清亲王，自己出身学生。文化程度：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毕业。〔中略〕

一九三二年四月任伪满禁卫步兵团少校军医官。

一九三二年夏兼任伪满宫内府警备处行走。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入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皮肤科留学至一九三四年七月毕业。

一九三四年八月任伪满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一九三五年春升中校。

一九三七年春任伪满治安部医务课长，一九三九年秋升上校。

一九三九年十月任恩赐病院长，同时兼任恤兵院长。

一九四二年五月任第一军管区军医处长，一九四四年八月升少将。

一九四四年春兼任警护军军医处长。

一九四五年五月任第二军管区军医处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吉林市被苏联军逮捕。

罪恶事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发动侵略祖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这时我在北京东四牌楼北船板胡同十八号家里。于二十八日日寇参谋本部参谋骑兵少佐森某来到我家,向我哥哥宪原、弟弟宪基和我三人说明东北的时局情形,并说日本希望满洲独立,溥仪出山,和我们弟兄活动。他来我家三次。宪原、宪基同他去天津,后我感到我家左右有便衣警察出没,于是我保护着两位母亲、嫂子、弟妇和我的妻子等逃到天津,我把他们寄居日本租界花园街新津里丁士源家里。我于十月中旬乘轮船,经由大连回到奉天满洲医科大学,这时我因患腰椎骨加列斯入该学校附属病〈院〉平山外科手术。在十一月中宪基来病院,说他同宪原到天津后见了溥仪,溥仪交给他二人一个圣旨,内容是命张海鹏为黑龙江大将军,叫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宪原、宪基到了洮南传达了溥仪的圣旨,张海鹏任宪原为上校参谋处长,宪基为上校参谋。十二月中宪基又来病院,这回是给张海鹏由关东军领军饷来的,据他说是三十万,用柳条包包装,有日本兵护送,预定乘晚车回洮南。宪原也来过病院二三回,于是我的病房就成为我们弟兄作政治活动的地点。这段过程是由我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亲日思想出发,同宪原、宪基企图复辟,而与祖国人民对立,也就是通过复辟给日寇侵略东北作殖民地政权,以便于日寇掠夺人民财富的阴谋罪行。

一九三二年冬任伪满宫内府行走时,曾受警备处长佟济煦委托,给溥仪招募护军。我派军医上尉丛春藩随同由佟济煦派出的海某科员二人,第一回到扶余县招募了护军一百名整,第二回到海拉尔招募了七十名蒙古人护军,计一百七十名,组成了护军的雏形。当时的护军统领是郭文林。这是由于我所招募的护军巩固了溥仪身边安全,使他能安心去卖国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在满铁医院实习皮肤科,当时的关东军军医部长伊藤贤三,因患手背湿疹来该院皮肤科治疗,经两三次之

后，我托该皮肤科医长吉村宁向他说，我愿意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留学求他帮助。他答应之后，替我作了一个计划，是留学陆军军医学校一年，陆军病院实习四个月，部队卫生勤务二个月，计一年六个月。在七月中旬他向我说，我的留学已被日本陆军省许可，叫我在八月一日到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卫生科向神林浩科员报到。我又向伪满军政部请求批准留学后，于八月一日到东京入陆军军医学校。

〔中略〕

在我留学当中，该学校长小泉亲彦升任日寇陆军省医务局长，后不久一九三四年三月派日寇陆军军医中佐嘉悦三毅夫到该校向我说，嘉悦三毅夫被任伪满军政部军事顾问，要求我同他一道去伪满工作，经过陆军省医务局认可，把我原订的一年半留学改为一年，即取消病院实习和部队实习。在当日晚小泉亲彦请我和嘉悦三毅夫在他家里吃饭，在饭中向我说，要我帮助嘉悦三毅夫为日满两国出力报效，我答应愿意。会后嘉悦三毅夫在三月下旬去伪满，我于八月毕业回归伪满，任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

一九三四年二月下旬，我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干事长，我为拥护伪满执政溥仪登皇帝位，和该俱乐部干事耿希珍、赵蔼民、尤宗汉三人商量，结果用我的名字代表东北留日学生一千余名，给伪满宫内府、国务院打电报，表示拥护溥仪登皇帝位。后于三月一日下午五时，在伪满驻日公使馆楼下客厅，看了溥仪登极时的记录影片后，在学生俱乐部开了庆祝会。到会学生约二百余名，在会上我讲了话，大意是我们满洲国有了皇帝，这是人民所希望的，将来一定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等的话。在会中有日寇《朝日新闻》记者来访，要求我发表意见，我说我们东亚国家，都需要有皇帝，这是合乎天意民情的，就是蒋介石内心也在希望作皇帝，不过他作不到了。这

段话和我的照像登在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上了。这是我伪装民意拥护溥仪登极，以便于日寇对祖国东北进行掠夺和骂祖国的罪行。

一九三四年三月，我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干事长，日寇外务省嘱托小笠原省三来访问我，要求我给介绍学生组织日满学生讲习会。讲习地点在一桥商科大学讲堂，期间十日，每晚四小时，课目"由地理历史上看满洲"，白鸟敏夫博士讲；"满洲古代建筑"，伊吹某博士讲；"支那佛教"，某博士讲；"支那乐器特征"，田边尚雄博士讲；"老庄哲学"，小柳司气太博士讲；共十题。讲习内容如"由地理历史上看满洲"，是说祖国的东北地区，由地理上可分为三部，一是以辽河松花江为中心的大片产粮地带，二是兴安长白等森林地带矿产地带，三是蒙古的游牧地带，这个地区有富余的农产、矿产、木材、牲畜。北有黑龙江，东有乌苏里江、鸭绿江；南有万里长城等天然界线，又有大连、营口、安东等海口，因此由地理上看满洲是一个独立的地区；由历史上看满洲曾有过高句丽、渤海、辽、金、元、清等的兴起，因此满洲也是一个独立的地区。总之，就是说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其他如"满洲古代建筑"、"支那佛教"、"支那乐器特征"，都是说东北的建筑如塔，辑安的古冢是与祖国内地不同；蒙古的喇嘛与祖国的和尚不同；直至胡琴、弦子也有南北之区别。这一个讲习，总之是说祖国东北的一切一切都与祖国没有关系。我给这个讲习会介绍了学生，每晚出席听讲的少时三十名左右，多时一百二三十名。这一个讲习会是日寇对祖国东北青年学生所进行民族离间的罪行，我帮助小笠原省三组织了讲习会是有责任的。

一九三四年八月，任伪满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当时该课只有代理课长王汉相、课员刘长胜、松尾久八、山崎久夫四人。我任股长后，就采用了崔其盛、丛春藩、王乃公、王敬则、朱学林等五人，扩充了医务课，当时医务课的编制和人员如次：

医务课代理课长军医中校王汉相。

卫生股掌管事务：人事、教育、卫生、防疫、治疗。股长军医少校宪均，课员刘长胜、崔其盛、朱学林、松尾久八。

医事股掌管事务：编制、预算、卫生材料、恩给。股长缺，课员从春藩、王敬则、王乃公、山崎久夫。

至一九三五年春，又设立司药股，补小川贞雄为医事股长，佐藤某为司药股长。

一九三四年九月，任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伪满军政部在奉天军管区病院内召开第一次军医处长、病院长会议，目的是为推行军政部整备全军的医务政策。出席会议的有：医务顾问嘉悦三毅夫、大臣代表次长王静修、医务课代理课长王汉相、卫生股长宪均、医务课员松尾久八、第一军管区军医处长兼奉天病院长任荣巽、第二军管区军医处长兼吉林病院长寿乃彭、第三军管区军医处长兼齐齐哈尔病院长蔡亚民、第四军管区军医处长兼哈尔滨病院长刘永维、第五军管区军医处长兼承德病院长赵万福、新京病院长孙伯彝，及其他翻译事务官等二三人共十四五人。在大臣代表次长王静修和医务顾问嘉悦三毅夫的训示后，医务代理课长王汉相说明军政部装备全军的方针和计划：一是要建设军医学校；二是开设卫生材料厂；三是扩充奉天病院；四是关于卫生人员和卫生材料补充上的情形。其次是由我提倡建立军医团，后由各军管区军医处长作了关于各管下的卫生情况报告。会议第二日在嘉悦三毅夫的领导下，参观了满洲医科大学、小河沿医科专门学校和日本陆军病院后散会。在这次会议当中，嘉悦三毅夫命我考察各处长的学识和人物，会后我向他报告：第五军管区军医处长赵万福和第二军管区军医处长寿乃彭二人较好，第四军管区军医处长刘永维较差。这个军医处长病院长会议是伪满推行医务政策的有力措施，由于

它的结果，加强了伪满军的医务方面业务，加强了伪满军人的力量，使伪满军更有力地能够帮助日寇镇压人民，以便于掠夺人民的财产，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伪满军政部派我在嘉悦三毅夫的领导下，赴日本东京出席第十五次万国红十字会总会，目的是为使世界各国从红十字会事业方面承认伪满存在。到东京后由嘉悦三毅夫向红十字会请求参加，未得许可，仅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和园游会上出席，使各国代表看到伪满的军医。这是我利用红十字会会议的机会，向世界各国宣传伪满存在的阴谋罪行。

一九三四年十月，任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奉伪满军政部大臣命同医务课员松尾久八二人到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部，把原属于第四军管区私设的军医养成所——哈尔滨王兆屯旧东铁护路军病院的一部房设与生徒六十名接收过来，于次年即一九三五年三月正式成立了伪满军医学校。当时的编制和人员如次：

学校长陆军军医上校刘永维，于一九三五年秋进级退伍，改任为军医上校寿乃彭。

干事军医上校中稻近彦。

本部分三科：副官、庶务、军需。

教育部分八科：解剖、组织、生理、卫生、病理、细菌、医化、药物。

解剖学教官军医上尉赵恩昌。

组织学教官。

生理学教官。

病理学教官。

细菌学教官军医上尉崔其盛、陆军少校池田谦一。

医化学教官。

药物学教官军医少校松山某。

卫生学教官军医上尉松永茂。

附属病院院长军医中校古川某，分内科、外科、眼科、耳鼻科、皮肤科、齿科。

内科教官　院长军医中校古川某。

外科教官　军医少校鬼冢某。

眼科教官　军医少校池田某。

耳鼻科教官　军医上尉黄某。

皮肤科教官　军医上尉李某。

齿科教官　齿科军医上尉五十岚某。

生徒队长　陆军轻重兵上校长房某。生徒分四队，每队三十名生徒，即一期成为一队。

该学校生徒所使用的解剖材料即尸体，至一九三九年十月止（即我由医务课转出），共用二百体，这是医务课通过司法部由哈尔滨监狱领来的。这些人是不甘心忍受伪满的压榨掠夺反抗伪满法律的祖国爱国志士。

该学校由一九三五年秋，在医务课的主持下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十月即我由医务课转出为止，供给日寇“七三一”和“一〇〇”部队年约一万头以上的“摩尔摩多”（海猪），以供该部队研究杀人武器细菌战。这个供给径路是通过日寇哈尔滨陆军病院送去的。

该学校给伪满养成医务方面的忠实走狗，使用祖国爱国志士作为解剖材料外，还供给日寇大量“摩尔摩多”（海猪），便于日寇研究杀人武器，对于这一系列的罪行我都有责任。这是由于我的亲日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而来的仇视祖国人民的具体表现。

一九三四年十月任伪满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为调办制造保管补充卫生材料，由日本陆军卫生材料厂买来锭剂制造机一架

价一万多元,同时并由该厂请来技师管野一郎,任伪满司药上尉,在奉天病院内开始制造锭剂。又于一九三五年春请来日寇退伍司药少佐佐藤某,任伪满司药中校充军政部医务课司药股长,从此逐年扩充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奉天大东边门外旧东北兵工厂俱乐部完成了伪满军卫生材料厂,奉天病院内的一部分制药工场改为伪满军卫生材料分厂。当时该厂的编制和人员如次:

厂长司药上校阿部俊男。

分厂长司药中校茂木某。

本部分庶务、购买、发送等科,人员不明。

制剂部分锭剂、注射剂、膏药等各工场,人员不明。

磨工部,人员不明。

仓库,人员不明。

由于该卫生材料厂的完成,加强了伪满军,帮助了日寇掠夺祖国的罪行,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日寇陆军省医务局长小泉亲彦,为准备进攻苏联来伪满视察苏联国境时,我同医务顾问嘉悦三毅夫到奉天迎接他,随他访问满洲医科大学。在该大学遇到"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这时石井四郎改名叫东乡,着陆军步兵少佐军服。访问该大学后,小泉亲彦携同日寇陆军省医务局卫生科长神林浩,"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三人,乘飞机视察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满洲里以西的苏联国境,去后我和嘉悦三毅夫回归新京。小泉亲彦视察苏联国境后,来到新京视察了南岭骑兵第一旅后回归日本了。小泉亲彦回日本后半年即一九三五年十月,派日寇陆军军医大佐北野政次任满洲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于一九三六年春军政部医务课经我的主办,派伪满第一军管区军医处员池田谦一到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教授下研究细菌发疹窒扶斯,二年后即一九

三八年春任池田谦一为伪满军医学校教官。这是我帮助日寇作细菌武器研究的阴谋罪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伪满军政部在哈尔滨病院内召集了第二次军医处长、病院长会议，出席者：医务顾问嘉悦三毅夫、军政部次长郭恩霖、医务课长赵万福、卫生股长宪均、医务课员松尾久八、第一军管区军医处长任荣巽、第二军管区军医处长寿乃彭、第三军管区军医处长蔡亚民、第四军管区军医处长刘永维、第五军管区军医处长梁国荣、兴安南省警备军军医处长兼通辽病院长山本升、兴安北省警备军军医处兼海拉尔病院长松冈九郎、奉天病院长王汉相、吉林病院长邱有馨、新京病院长孙伯彝、齐齐哈尔病院长刘毓堂、哈尔滨病院长贾树屏、承德病院长翟福昆及其他翻译等共十九人。会议第一日由次长郭恩霖和顾问嘉悦三毅夫作了训示之后，医务课长赵万福说明了本年度医务整备重点是扩充哈尔滨病院和医务人员的补充教育。第二日在顾问嘉悦三毅夫的领导下，与会的军医全体到日寇哈尔滨病院参观毒瓦斯演习，在演习中全员学习“乙别利得”、催泪和窒息三种瓦斯的一般知识。这一个教育是伪满军与日寇关东军共同向苏联作瓦斯战进攻的演习的阴谋罪行，我是有责任的。

〔中略〕

一九三六年五月，任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时，被任为特命检阅使随员，其他随员有张益三、刘卜忱、侯起尧、服部实、松本铁男、张文启、张寄千、马金波、涩谷某、孙世法、万兴文等人，随同特命检阅使于芷山及以佐佐木到一最高顾问为首的顾问一行共二十余人，至通辽检阅通辽病院时，看到在该病院墙上挂有人皮一张和在桌上摆有人头骨四五个。一行人中有的议论惨无人道，彼时我认为这是解剖的标本没有什么。检阅结果，认为该病院成绩为甲，该

病院长山本升为一九三七年夏提升军医中校，任医务课卫生股长（我升医务课长）。山本升在通辽病院长任内，即由一九三四年夏至一九三七年夏，共剥人皮十五六张，割人头骨的二百多个，所使用的这些人是由通辽监狱要来的祖国爱国志士，目的是为研究中国人的骨胳、皮纹等统计解剖学。他的论文提到日本九州医科大学，因此山本升得到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一部分“中国人头盖骨的形态”、“中国人的下颚骨”、“指纹”、“皮纹”等，被我给登载在伪满军医团杂志上，目的是鼓励他的研究，同时叫全伪满的军医学习他。与山本升同时研究者有该院军医少校今村剑和米田某。对山本升等的罪行，在当时我不仅认为这是解剖学的研究，并且奖励提升了他，还叫其他军医向他学习，这是失去了爱国心，仇视祖国人民的严重错误思想的表现，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三六年春，任军政部医务课卫生股长时，伪满军政部判决凌升、福龄、春德、华霖泰等四人死刑，枪决在南岭刑场时，其检案书是由医务课经我手派出的医事股长小川贞雄作成的。这是我帮助日寇镇压伪满官吏的罪行。

〔中略〕

又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为收容冻伤患者二百余名至通化，其中重伤者七十余，命军医少校安井某和军医上尉赵庚寅送往奉天病院收容，其他较轻者分别收容在通化病院。在这时期前后收容在通化病院及抚松患者收容所的抗日军的冻伤患者，在通化病院约三十名，在抚松约六名，皆用以试验药物的效力和练习手术了。

于一九三七年春夏之间，在柳河、通化、临江一带流行天然痘、发疹窒扶斯等传染病，死亡约三千多老百姓，这时我曾命通化病院长毛逢桥，指导当地军医，协助由民生部卫生司黑井忠技正派出的该卫生司防疫科长符志坚，试验了天然痘、发疹窒扶斯等的传染情

况。

以上是我指导东边道讨伐部队卫生业务，用爱国抗日志士与老百姓作试验的罪行。

〔中略〕

一九三七年八月任伪满治安部医务课长时，在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冢隆二的指导下，新京满铁医院技师高桥某为研究百斯笃菌，试验的结果死亡了某男性青年一名，于是在梶冢隆二的主持下，组织了新京地区百斯笃防疫委员会、委员与干事如次：

委员长　梶冢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长。

委员　大平得二，民生部技监。

委员　阿部，卫生技术厂长。

委员　冢本禛二，新京满铁医院院长。

委员　安部某，千早病院院长(传染病院)。

委员　宪均，治安部医务课长。

委员　张继有，新京特别市卫生科长。

委员　温乃即，首都警察厅卫生科长。

干事长　北岛某，关东军军医部附。

干事　山本升，治安部医务课卫生股长。

干事　符志坚，民生部防疫科长。

干事　其他数名。

该委员会，在新京日满军人会馆开了第一次会，出席者以上所述委员干事全部人员，首先由委员冢本禛二报告新京满铁医院技师高桥某研究的经过，并说还有蔓延的可能。在冢本禛二的报告后，委员长梶冢隆二作指示说："今天的医学已不许可停留在消极的治疗方面，要积极地配合国策向前进才行。但本年度只此一名，别无感染。

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新京日满军人会馆开了第二次会议，出席者上述全体人员，梶冢隆二指示说：预想今年可能有百斯笃的发生，希望各委员在作防疫当中充分掌握近代医术等话后，由梶冢隆二向各委员分配了防疫业务：关东军方面的防疫由梶冢隆二担任，伪满军方面由宪均担任，伪满各机关由大平得二担任，患者的收容由张继有、温乃即担任，病理研究由安部担任。就在一切准备完了之后，于七月下旬，卫生技术厂长阿部某把百斯笃菌的昆虫散布在城里兴运路和日本桥等处一带的所谓贫民区之间，于是在该地带首先由小孩发生了三名，至八月下旬共发生八十余名百斯笃患者，发生患者处的房屋皆被烧坏，该八十余名患者和四百余疑似患者皆被收容在千早病院，患者死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疑似者于九月中释放。这一次的新京百斯笃流行，是日寇关东军用大都市密居的地方试验感染情况的罪恶行为，我是该委员会的委员是有责任的。

〔中略〕

一九四一年五月任恩赐病院长时，治安部医务课卫生股长山本升，为研究发疹窒扶斯的传染情况，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准备场所和帮助他观察经过情况。我由于该恩赐病院没有传染病隔离室的设备，派卫生官畠中某到治安部和山本升连络，结果由治安部医务课担任经费，由新京军需处运来木板等材料，在该恩赐病院内科病房楼上东端作了隔离室一间，宽六公尺长十二公尺，山本升由新京卫生技术厂厂长阿部某取来带发疹窒扶斯菌的昆虫——虱(数量容器不明)，放在治安部军法课拘留所内。当时拘留者有爱国志士张世勤和孙家铎等十二名。经六七日后，该十二人中的张世勤和孙家铎等八人发病，用患者自动车收容在该恩赐病院内科隔离室。我命内科主任赵庚寅诊察经过。在入院当时八名患者皆高热

三十九度以上乃至四十度,经四五日后八名一致的逐渐退热,在该病院住了二十多日后,八名一起送回了军法课拘留所。张世勤由于与关里某方面有联系,在伪满潜伏工作,被判反满抗日处于死刑,孙家铎被释放,其余十名不明行方。上述经过是我和山本升使用祖国人民爱国志士十二人,试验发疹窒扶斯传染情况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我们的目的是想把伪满的医务作成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的后备力量,由于这次的试验,认识到用发疹窒扶斯带菌昆虫是能够在团体生活者当中媒介感染的具体事实。

〔中略〕

由辛亥革命后至九一八事变之间的过程:

一九一一年底我父亲善耆看到满清必定灭亡,不愿意作中华民国的官,不愿意作中华民国的民,一人跑到天津租界。日本鬼子知道了他的心思,派川岛浪速到天津把他接到了旅顺口,后川岛浪速又把我全家母亲五位、兄弟十六人、姐妹八人、嫂子四人,由我家北京市东四牌楼北船板胡同十八号后门,坐轿车分三四班逐次到了交道口分厅胡同川岛浪速家里,在他家住了一个礼拜(在这中间过了旧历的小年腊月二十三日)后一天早晨,我们分乘轿车到北京东车站坐火车,于当日晚到了秦皇岛,在这里乘日本军“千代田”军舰,于第二天早到了旅顺口。尔后至一九一六年四年没有入学,也没有就业,荒过了四年。我家所以搬到旅顺口居住,是由于我父亲善耆想借日寇的力量复辟,而川岛浪速所以帮助我父亲,是为给日寇资本家准备作殖民地政权的忠实走狗。

一九一三年我父亲善耆在川岛浪速的援助下,派我的二哥宪德到东京,以东京为本部组织了以我父亲为首的宗社党,目的是为满清的复辟。宪德在东京组织宗社党时有一张摄影,宪德坐在中央,左手坐着升允(满清的遗老,曾作过满清的陕甘总督),右手坐

着日本浪人头山满，后边立着数名中国人和十数个日本人。这个宗社党的领袖们有恭亲王溥仪〔伟〕（毓嶦的父亲），巴布扎布（甘珠尔扎布的父亲）。宗社党成立之后，经川岛浪速的介绍，我父亲勾结了日本民政党领袖大限重信和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由大仓喜八郎借给我父亲一百万元，用这笔款当作军费，和巴布扎布掀起了为满清复辟的军事行动。一九一四年我父亲善耆派我的七哥宪奎（后改名金璧东）作代表，同川岛浪速的弟弟川岛量平和日本几个退伍军人：本告辰二、斋藤源吾、井上晴能、入江种矩、松隈据吉，到了哈尔哈河巴布扎布的营里。他们有三千多人，枪械是日寇关东军买来的。他们还发出军票，挂起龙旗，由哈尔哈河出发到了郭家店，预定侵犯奉天。这时大限重信的内阁倒了，巴布扎布也死了，这个运动瓦解了。我父亲由大仓喜八郎借款有密约，让给大仓喜八郎东三省某种权利。日寇所以援助我父亲，是为侵略祖国东北作殖民地卖国政权。大仓喜八郎借给我父亲一百万元是很大的借款，这正是日本财阀向东北的资本输出，由此掀起的军事行动，给祖国东北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我在当时把我父亲的这种罪行，看成是正义的忠臣行为，我也把日寇的援助，错误地看成是真诚的援助，这就给我种下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复辟思想和崇拜日寇的思想基础。

一九一六年七月，我父亲企图东山再起，首先把我的十四妹显〇过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改名叫川岛芳子，同时把宪奎、宪邦、宪原和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浓乃、甘珠尔扎布送往日本留学，把我以下的弟弟妹妹全部送入日本小学校念书。由这时起至一九三二年满洲医科大学毕业止十六年间，所受的完全是日本殖民地奴化教育，日本鬼子告诵我东洋道德，忠君爱国，恢复满清，继续父志，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并向我宣传日本的强盛。在这时我又看到日

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发了财，海军力量与美英得到五、五、三的对比等情形，这就加强了我崇日的思想，也加强了我复辟思想，中了日寇民族离间计，错认为满洲是我们满洲人的满洲，同时从心里憎恨汉民族，完全失去了爱国心。

由于上述二十年间的经过，使我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错误，把我父亲善耆组织宗社党掀起复辟运动军事行动，认为是正义的忠臣行为，而不知道他的企图是为给日寇造殖民地政权，和给封建地主在谋福利，而不知道他的汉奸行为是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我还错误地把日寇对我父亲的帮助，认为是真诚的帮助，而不知道他是为给日本资本家在作殖民地政权，他是在推行日寇的满蒙政策。我也不认识大仓喜八郎借我父亲款正是资本输出，由于这个血腥的资本掀起了巴布扎布的军事行动，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日寇教育我，豢养我，是为养成为它服务的忠实走狗，由于我不认识这一系列的错误反动行为，才使我二十年间没有离开旅大租界地而甘心作了走狗。这就是我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变后能够在伪满作了十四年汉奸，还觉得有正当理由的错误思想根源。

119—2—1169，1，5

刘玢笔供

(1957年4月4日)

(一)姓名刘玢,别名国琳,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城。在我被捕时家住黑龙江省克山县城内,汉族。

〔中略〕

(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占我国东北沈阳、吉林、长春以后,于九月三十日向齐齐哈尔市进犯,当时我是东北军独立骑兵第五十五团中校团附。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成立,我随马占山投降日寇。以后马占山又起义反正,我又随马占山到海伦县东山里安古镇参加抗战。以后因战斗不利,马占山取道苏联返回关内,当时骑兵第五十五团由海伦县回通北县,我就与团长石兰斌共谋之下于八月一日率领全团共有六百人投降日寇,从此我就死心塌地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了,这是我投敌的严重罪行。

(五)投敌后所任的职务:

1.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任伪满黑龙江警备司令部驻林甸县独立骑兵第五十五团中校团附。

2.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混成第十三旅步兵第十七团中校团附,驻黑龙江省克山县。

3.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骑兵第五旅中校参谋长,驻黑龙江省讷河县。

4.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三团中校团长，驻齐齐哈尔市。

5.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独立第一旅骑兵团上校团长，驻齐齐哈尔市。

6.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混成第十二旅步兵第十七团上校团长，驻黑龙江省克山县。

7.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步兵第四旅步兵第十七团上校团长(由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驻黑龙江省海伦县，由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驻齐齐哈尔市)。

8.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一日，任伪满第八军管区混成第八旅少将旅长，驻通化省城。

9.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任伪满第一军管区混成第八旅少将旅长，驻通化省城。

10.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至同年十二月一日，任伪满第六军管区混成第七旅少将旅长，驻牡丹江省宁安县。

11.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任伪满第六军管区步兵第三旅少将旅长，驻牡丹江市。

投敌后任各伪职我的罪行如下：

(一)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任伪满黑龙江警备军司令部驻林甸县的独立骑兵第五十五团中校团附时，团长是石兰斌。全团共有六个连，都驻林甸县城，活动地区西至小蒿子，东至依安县。于十一月间团长石兰斌带四个骑兵连和迫击炮连赴小蒿子讨伐救国军孙鸿裕，因为第三连上尉连附郭凤来带兵起义，石兰斌仅带余下的兵三四名，跑至黑龙江省。那时我带机关枪连在林甸县驻防，我为了回避起义的救国军郭凤来的回来袭击，所以我

带机关枪连到依安县去了。这次所谓讨伐救国军孙鸿裕我虽未参加，但是我驻在林甸、依安两县，人吃马喂，给了有限的钱，人民所受的损失和灾难，这是我危害人民的罪行。

(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混成第十三旅步兵第十七团中校团附时，团部和第一、二两营及迫击炮连驻黑龙江省克山县城，第三营驻克山县城以北七十多里的北兴镇。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伪满黑龙江警备军改为第三军管区，同时伪步兵第十七团由三营制改为两营制。

〔中略〕

同年二月间我入伪满在奉天的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处，于八月底毕业仍回团附职务。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伪满在长春以东至放牛沟中间地区举行陆军特别大演习，奉伪治安部的命令伪步兵第十七团参加了，在演习以前由七月至九月底有三个月的集中训练，驻北兴镇的第一营也集中在克山县城，这时团长仍是杨廷举，第一营长仍是谢某，第二营长是尚其悦。同年六月中旬，据驻北兴镇的第一营谢营长报告，在北兴镇以北三十多里的山里有抗日联军，他曾派第一连长王殿臣带兵一连前往讨伐，战斗了一次约有一小时，给抗日联军的损害情况不详。又于同年十二月上旬，据驻北兴镇的第一营长谢报告，在北兴镇以东四十多里的德都县界有抗日联军四五十人活动，他曾派第二连长西久贞带兵一连前往讨伐，战斗了一次约有三四小时，给抗日联军的损害情况不详。

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伪混成第十三旅长李静带同旅部官兵移驻黑龙江省洮南县，同时驻黑龙江省拜泉县的混成第十四旅长朱凤阳带同旅部官兵来驻克山县城，伪步兵第十七团编入该旅仍驻克山县城。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旬伪团长杨廷举曾赴北兴镇第一营指导讨伐，在北兴镇以南十余里处曾与抗日联军战斗了一

次约有四、五小时，给抗日联军以战死战伤各十余人的损害。

(三)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伪骑兵第五旅中校参谋长时，伪旅长是王士秀，共辖两个团：伪骑兵第二十一团，团长是高广寅，第二十二团，团长是张(名忘了)。伪旅部和第二十一团驻黑龙江省讷河县，第二十二团驻嫩江县。该伪旅活动地区是讷河、嫩江两县全境地区。同年八月上旬奉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的命令，派骑兵第二十一团长高广寅率领全团赴三江地区的汤源县讨伐，归该地区司令官朱榕指挥。该团到达汤源县以后，所有讨伐行动状况都不向旅部报告，因之该团在汤源县的讨伐行动的结果我不知道，在我于一九三七年四月间离开该旅后，该团尚未归回。可是该团赴三江地区讨伐的命令是我下达的，该团在三江地区给抗日联军的损害和人民的灾难，这都是我的罪行。

(四)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二团长时，驻齐齐哈尔市。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在伪第三军管区日寇顾问池边万三少佐和伪第三教导队长石兰斌指挥下，全队由齐齐哈尔市出发，赴我国华北支援日寇对我国侵略作战，于八月二十五日全队到达热河省承德。于九月一日奉伪第三教导队长石兰斌的命令，我带骑兵两连赴热河省的朝阳县搜索伪第五军管区的骑兵第四十团的逃兵(约二十多人)，于当天下午五时我到朝阳县以西三十多里的宋杖子车站，下车后在梅勒营子宿营，于第二天赴梅勒营子东南六十多里六家子宿营。这时伪骑兵第四十团长张(名忘了)也在该处，我们两人见面商量于第二天早晨他由六家子向东南去搜索，我向西方搜索。到了十一日逃兵没有消息，我就奉伪第三教导队长石兰斌的命令回承德向华北前进，于十二日我回到承德。这时伪第三教导队长

石兰斌和步兵第三团长张金祥早已赴华北，我于十四日由承德出发，二十日到达河北省的怀柔县，我带骑兵第三连（连长王洪升）和机关枪连（连长名忘了）驻怀柔县城，第二连（连长刘恕）驻怀柔县城东南二十多里的一个镇（名忘了），第一连驻密云县城（连长张，名忘了），第三教导队长石兰斌和步兵第三团长张金祥驻北京以北高丽营。全部队归日寇驻北京的山下奉文兵团长指挥。这时我国对日寇作战部队已退至张家口、大同一带。我驻怀柔县担任治安任务，这时该处非常安静，我对该处行政、经济都没有过问，但对该处人民搔扰是有的，我应负责。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伪满第三军管区的日寇顾问池边万三少佐和伪第三教导队长石兰斌指挥下，各部队由各地出发，于二十六日回到齐齐哈尔市原驻地。这次我出动我国华北，虽然没有作战，可是我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巩固了日寇的后方，危害了当地人民的安全，妨碍了当地人民的抗日。这是我背叛了祖国、危害了人民的利益，为敌帮凶，我有严重的罪行。

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奉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的命令，派骑兵第二连长刘恕带兵一连赴滨北地区（哈尔滨至通北县）的海伦县讨伐，归该地区司令官贾金铭指挥。于八月上旬该连又奉司令官张文铸的命令归回齐齐哈尔市。据连长刘恕报告，该连到达滨北地区的海伦县后就驻在该县城内，在这四个月的时间内，曾奉滨北地区司令官贾金铭的命令，该连曾有四次赴海伦县城以东四、五十里的地方讨伐抗日联军赵尚志，但是一次也没有战斗。

（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伪独立第一旅骑兵团长，驻齐齐哈尔市。这个团的编成是两个骑兵连，第一连长薛景昆，第二连长刘恕。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奉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的命令，我带骑兵两连

赴德都、嫩江两县讨伐抗日联军赵尚志,归驻北安省的伪混成第十二旅长胡文藻指挥。于二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在德都县城西二十五里的谷万春屯与抗日联军赵尚志遭遇,他占据了该屯西头几个院落,我占据了东头几个院落,当中相距约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我令第二连长刘恕由该屯南面绕至赵尚志占据的院落西边取包围形势,我令各连等到天黑再攻。这次随我讨伐的就有伪混成第十二旅的部附日寇佐藤(名忘了),他也很同意我的计划,于下午四点多钟有伪步兵第十七团的迫击炮连张排长(名忘了),他闻信带兵一排由德都县城赶到谷万春屯放了三炮,到了五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下攻击命令,就见赵尚志占据的院内有火光很大,我知道这是赵尚志走了,我就带队进入该院检查,赵尚志是由该院东北角将墙扒倒向东北五大连池方向走去。当时我令中校团附王玉璋检查,抗日联军方面战死二人,打死马五匹。

(六)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混成第十二旅步兵第十七团长,团部和迫击炮连驻北安省克山县城,第一营驻北安省城,第二营驻距北安县城东北六十多里的龙镇。这时该团活动地区克山、德都、北安三县境内。

〔中略〕

于十一月上旬某日奉伪满混成第十二旅长胡文藻的命令,我带第一营长日寇池知良水和步兵两连赴德都县讨伐。到达该县后据警务科长说,在二三天以前在县城以北二十多里的五大连池有抗日联军五六十人活动,我就住在县城内,派池知良水带兵赴五大连池地方讨伐,十余天以后接池知良水报告,他到五大连池以后就在山里活动,抗日联军已闻信向北安县以东的山里去了。

〔中略〕

于十二月十五日奉伪混成第十二旅长胡文藻的命令,我同他

和第二营长孙德裕带步兵两连赴海伦县讨伐，乘火车于当天夜间到达海伦县城。据海伦县杨县长报告，在四五天以前在海伦县城以东六十多里六井子东山里有抗日联军六十多人。旅长胡文藻同我和孙德裕会议先由孙德裕带兵前往六井子看一看，于十九日我坐汽车到六井子，据孙德裕说抗日联军已赴绥化县东山里去了。〔中略〕二十八日，我回克山县城，留孙德裕仍在六井子继续讨伐，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四月间因部队改编，孙德裕才回到他的新驻防地通北县城。在这个讨伐期间，孙德裕曾在九井子与抗日联军战斗了一次，约有四五小时，在铁骊县界与抗日联军战斗了一次，约有三四小时。这两次战斗给抗日联军有多少损害，我现在记不清楚。可是我应负完全责任，是我的罪行。

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上旬奉伪混成第十二旅长胡文藻的命令，我带第一营长日寇池知良水和步兵两连赴北安省城以东五十多里的二〇二高地讨伐抗日联军赵尚志。我到该地后每日派兵一连轮流在附近的山中活动，过了一星期以后没有情况我就回克山县城，池知良水带兵回北安省城，这次讨伐虽然没有战斗，可是妨害了抗日联军由该处通行，这是我的罪行。

（七）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步兵第四旅步兵第十七团长，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因部队改编，步兵第十七团编入步兵第四旅，团部同迫击炮连由克山县和第一营机关枪连由北安县移驻海伦县城，第一营由北安省城移驻海伦县东北五十多里的海兴镇，第二营由龙镇移驻通北县城。

〔中略〕

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奉伪步兵第四旅长王作震的命令，我带第二营长孙德裕和步兵两连赴海伦县城以东六十多里六井子讨伐抗日联军赵尚志。我到该处后，据警察分驻所长说，前几天在六

井子东南三十多里的山边有抗日联军四十多人活动，我就派孙德裕带兵一连前往讨伐，过了五六天据孙德裕报告，他到六井子东南山边后侦查，抗日联军已向绥化县东南山里去了。

〔中略〕

同年三月上旬我曾派少校团附赵玉文带兵两连赴绥棱县的九井子讨伐抗日联军赵尚志，该团附曾与抗日联军在九井子战斗了一次，约有二三小时，给抗日联军的损害不详。可是妨碍了抗日联军的救国活动，这是我的罪行。

同年四月上旬奉伪步兵第四旅长王作震的命令，我赴通北县第二营指导讨伐，我到通北县后据营长孙德裕报告，在二三天以前在通北县城以东五十多里的山里有抗日联军赵尚志的部下四十多人活动。我就派第五连长刘树藩带兵一连并携带给养十日份前往讨伐，过了五六天以后接该连长报告，他到达目的地后，看见山里炭窑的人说抗日联军已赴东山里去了。

〔中略〕

同年六月至九月共四个月的时间我派第六连长宋宝林在海伦县东山里讨伐，该连长在这个时期内曾与抗日联军前后共战斗了四次，给抗日联军的损害是战死二十多人，伤的人数不详。可是这次讨伐日期非常之多，给抗日联军的损害，在我知道的以外，我都负完全责任，我向人民面前认罪。

同年七月下旬奉步兵第四旅长王作震的命令，我带第四连长（姓名忘了）赴海伦县东北五十多里的海兴镇讨伐抗日联军赵尚志的部下。我到海兴镇以后据该镇警察分驻所长张（名忘了）说在前几天在该镇东南二十多里山边有抗日联军活动，我就带队前往，该处有海伦县的警备哨所一处，有电话直通海伦县公署，常驻警察十余人在该处警备，他们说抗日联军已向东山里去了，我就派便衣侦

探三人(内有警察一人)赴山里去侦查,过了四、五日他们回来说没有情况,我就用电话报告旅长王作霖命令我回海伦县,第四连回通北县城。这次讨伐虽没有战斗,可是抗日军因我带兵去的关系他们才退走了,妨碍了他们的救国行动,这就是我的罪行。

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因准备伪满第二期国兵入队,伪步兵第十七团部同迫击炮连由海伦县移驻齐齐哈尔市。第二营改为国兵营,营长是高址仁,孙德裕改为少校团附,赵玉文免职。第二营和迫击炮连旧有官兵编成第三营,营长是日寇鹤卷(名忘了),该营于四月间由通北县移驻海伦县,由伪步兵第四旅长关成山直接指挥,于十二月一日该营又由海伦县移驻讷河县。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伪满第二期国兵入队后,伪步兵第十七团部同第一、二两营和迫击炮连驻齐齐哈尔市,从此以后我就在齐齐哈尔市担任国兵教育。步兵第十七团于一九四一、四二年两次入队国兵共有八百人。对部队的奴化教育是:“日满一心”、“共存共荣”、“共同防卫”、“大东亚圣战”、“王道乐土”、“忠心于满洲国”、“信仰天照大神”、称日寇为“亲邦”、“大东亚共荣圈”、“皇帝的诏书和敕语”等。并在营内设有“天照大神”庙,每有纪念日部队向之行最敬礼。

〔中略〕

于一九四三年任伪满第三军管区步兵第四旅步兵第十七团长时,驻齐齐哈尔市。于五月五日在伪旅长王家善指挥下全旅赴热河省青龙县讨伐。于十一日我到青龙县以东三十多里的口门子村,团部同第一营驻口门子村,第二营驻口门子村东南五十多里一个村庄(名忘了),第三营驻口门子村以北六十多里的一个村庄(名忘了)。伪旅长王家善驻青龙县城南三十多里的双山子村,伪步兵第二十四团长王锡鹤驻青龙县城东南五十多里的龙王庙村。这时步兵第十七团的中校团附是日寇内村柳太郎。

〔中略〕

于六月上旬我派第一营长日寇(姓名忘了)带兵两连在口门子村东南三十多里的花果山地方讨伐,该营长曾在该山上与八路军遭遇,战斗约有四五小时,八路军向西南方退走,这次战斗八路军的损害不详。又于六月中旬某日第三营长日寇鹤卷(名忘了)带兵两连在青龙县以北五十多里的宽城地方讨伐,该营长与八路军战斗了一次,约有二三小时,给八路军的损害是很大的,但是详细数目不知道。又于六月下旬某日第二营长田生库带兵两连在长城线冷口讨伐,曾与八路军战斗了一次,约有五六小时,给八路军的损害是战死二人,伤的人数不详。以上三次的战斗,对八路军的损害和当地人民的灾害,我都得负责,这是我的罪行。

于七月上旬某日奉伪步兵第四旅长王家善的命令,我带步兵三个连赴伪步兵第二十四团驻土胡洞屯的第三营应援,该营被八路军的夜袭,我到土胡洞屯时,八路军早就退走了。又于七月中旬某日第二营长田生库带步兵一连在双山子村东北十六公里的山中讨伐,曾与八路军遭遇战斗了一次,约有三小时之久,八路军向东南方退走,这次战斗给八路军的损害不详,可是我有责任,是我的罪行。

于八月一日因我进级伪陆军少将转任伪第八军管区伪混成第八旅长,于十一日我到达热河省兴隆县的鹰手营子村旅部任职的。

于九月中旬某日伪步兵第三团第一营长日寇武田曾带兵一连在长城线的冷口与八路军战斗了一次,约有七八小时之久,八路军方面战死二十多人,俘虏八人。又于十一月一日第一营长日寇武田派第三连长高(名忘了)带兵一连在鹰手营子村东南六十多里的山中与八路军遭遇,被八路军包围打死伪军兵五名,打伤十名,高连长和日寇连附一名被八路军生擒,第二天将他们二人放回,就被

他们的营长日寇武田送交伪第五军管区军法处，这次战斗八路军方面损害不详。

〔中略〕

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中旬，伪步兵第三团第一营长日寇武田带步兵两连，在后生堂峪地方曾与八路军战斗了一次约有三四小时，给八路军的损害是战死一人，伤的人数不详。又于一月下旬该团第三营长郝逸群带兵两连在五凤楼地方曾与八路军战斗了一次，给八路军的损害不详。又于二月上旬该团第二营长日寇石岛带兵两连，在庙岭山与八路军战斗了一次，给八路军的损害是战死三人，伤的人数不详。以上三次战斗给八路军的损害以及日期和战斗地点，现在我虽然记忆的不甚清楚，可是我都负完全责任，我向人民面前认罪。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十二月底共八个月，伪第五军管区在这个时期内共打死八路军五百八十多人，俘虏一百多人。我在热河省西南部担任一部分讨伐，我有相当的责任。

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我带伪步兵第十七团和伪步兵第三团在热河省青龙、兴隆两县讨伐时，我曾命令该两团协助伪行政方面进行集家工作，因而使该地人民由于集家以致流离失所并致饥寒而死的，更不知有多少。我不但命令伪军作了这样的非人罪行，我还曾到过青龙县口门子村西南四五里的一个村庄看集家工作，因修筑围墙不好，我就用蝇甩杆殴打屯长。

(八)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任伪满第六军管区混成第七旅长，驻牡丹江省宁安县。步兵第八团在热河省青龙县西南部半壁山讨伐，团长是杨崇武。骑兵第十九团驻延吉县，团长是唐际荣。于十二月一日部队改编，伪混成第七旅改编为步兵第三旅，骑兵第十九团改为步兵第七团，团长是荣绍英，同时旅部和

步兵第七团移驻牡丹江市，步兵第八团仍在热河省讨伐，团长是唐际荣。

（九）一九四五年任伪满第六军管区伪步兵第三旅长驻牡丹江市时，于七月二日奉伪司令官贾华杰的命令，我带步兵第七团（团长荣绍英）和驻宁安县的伪第十一军管区的步兵第三十团（团长张贵卿）赴宁安县西南百余里的镜泊湖附近尔站地方给日寇构筑防御阵地，于七月下旬贾华杰又派第三工兵队、辎重队两队、炮兵一连陆续到达尔站，和先到尔站的拜泉县的劳工二百人统归我指挥。伪步兵第七团和三十团都是两营编成，每团有八百人共一千六百人，第三工兵队三百人，辎重队一百五十人，炮兵连八十人，共二千三百三十人。拜泉县的劳工待遇非常恶劣，每天竟吃包米面，因吃的不好每天有病的很多。对劳工的使用是分配在各部队担任运搬材料和砍伐木材等工作。尔站的防御阵地是日寇的军队开始构筑的，在我未到以前构筑成功的有三四处，是机关枪用的。这个阵地构筑的目的是日寇想要防御苏联进攻。全阵地的面积是够日寇一个师团使用的作战工事，东西纵深有二十公里，南北横宽有十五公里。于八月九日下午五时接伪第六军管区司令官贾华杰的电报，苏联已向伪满进军，于八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多钟贾华杰同日寇顾问松枝退到尔站，于五点钟贾华杰召集各部队长命令各部队照常构筑阵地，以防苏联前进。我执行了这一命令。这时因部队已发生了大批逃亡，到了七点多钟的时候，贾华杰命令我带旅部副官迟玉泉和伪第六军管区的日寇少校、第六自动车队长日寇少校、辎重队长龚云章、第六宪兵团中尉共八人，于十七日早赴尔站西南敦化县方向去追逃兵，于下午四时我到距尔站六十多里的一个村庄就住下了。于十八日上午我带迟玉泉和伪兵一人，伪军管区的日寇少校一人，第六自动车队长日寇少校一人，第六宪兵团中尉一人共

六人回尔站，行距东京城六十多里的大道上，于十九日早遇见苏联军，就将我俘虏了。

（十）派军官对青年训练所和国高学生进行军事教练的情形：

派军官赴各青年训练所和各县国高向学生进行军事教练的军官，是由伪军管区司令官下令指名派遣的。我任伪满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三团长时，曾于一九三八年向齐齐哈尔市青年训练所派军官一名。任伪步兵第十七团长时，曾于一九四一年向海伦、绥化、望奎、明水等县国高学校各派军官一名。又于一九四二年向讷河县青年训练所派军官一名。教练的科目分制式、战斗各种教练。青年训练所的制式教练到班、排为止，战斗教练到班为止。国高学生的制式教练到连为止，战斗教练到排为止。其教练目的是为伪满国兵作准备，为日寇侵略作炮灰，也可在国兵身体检查不合格时作为劳工的先决条件。我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间和一九四一年八月间、一九四二年四月间，奉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命令，先后赴各青年训练所和各国高学校进行军事教练查阅，其主要目的是看军官服务的成绩，其次是看学生教练的成绩。在各处查阅完了对于学生我都得讲话，其内容是让学生好好学习将来好当国兵，“防卫伪满国土”，帮助日寇进行“大东亚圣战”，“共存共荣”，称日本为“亲邦”等等欺骗青年的汉奸鬼话，这是我的最严重的罪行。

（十一）一九三八年任伪满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三团长时，〔中略〕每年九月十五日举行军旗祭，这是因为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颁给步、骑各团军旗一面，如同他亲临各团一样，无论何时，无论何人见着都得向之行礼。每回举行军旗祭，当地学校的学生都得全体参加，商、民也得派代表参加行礼。在行礼完了由伪团长宣读伪满“皇帝”溥仪颁发的军旗诏书，

内云“朕是尔等大元帅，尔等是朕的股肱”等语。商、民和各机关的代表还须献纳祭礼金，每回都能收千元左右，在行礼完了后就以此款举行庆祝宴会，商、民和各机关的代表也都参加。

〔下略〕

119—2—1168，1，5

吴国贵[①] 笔供

(1954年7月28日)

〔前略〕

五、我参加的两次日寇西南地区防卫会议的内容及我所执行的结果。

第一次：一九四一年秋季我参加的日寇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召开的防卫会议。

参加会议的：

被召集者：

日寇方面：大、中队长约二十余名，四名大队长中我知其姓者为宫崎、铃木。

伪军方面：第八旅长冯秉忱、混成第二十五旅长阎充、参谋长吴国贵、参谋田中厚道、宪兵团长张英权、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

伪地方机关方面：热河省次长渡边(忘其名)、警务厅长"日系"(忘其姓名)、协和会省本部事务长梅本(忘其名)。

参与者：伪锦州高等法院长孙(忘其名)、代理一日寇(忘其姓名)、高等检察厅长周(忘其名)、代理一日寇、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吕衡及热河省长张联文。

---

① 吴国贵于1932年投敌后，历任伪少校参谋、中校参谋长、第五军管区上校(少将)参谋长、江上军训练处少将处长等职。——编者注。

主持会议者：日寇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同会议的干事长小原真一（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兼任）。

会议的目的：是指示实行“秋季肃整工作”及“重点集家”，及其实施方法并任务附与。“秋季肃整工作”分做两部分，一是“治本工作”（检问检索），一是“治标工作”（即是“讨伐”）。关于“秋季肃整工作”的全般计划与实施，由日寇防卫司令部担任，重点置于“治本工作”。该工作的计划与实施，由日寇宪兵、伪满宪兵及警察担任；“治标工作”由日寇军队及伪军担任计划实施。关于“集家”的具体计划与实施，由伪省公署及伪协和会担任。关于实施方面：要求日寇军队及伪军各部队做好协同“讨伐”；日寇宪兵、伪满宪兵及伪警察做好检问检索，努力侧面支援“集家工作”的实施。

我根据这次会议的指示，召集了幕僚（河野满、田中厚道、田中巽、幸增、久米），在司令官吕衡及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的莅会下，研究了会议所发的“秋季肃整计划”及伪军所担当的任务并其执行方法。会后，我命田中厚道按照上项计划，制成本军管区的“肃整计划”，其内容：配合“治本工作”（检问检索），彻底实施“治标工作”（“讨伐”），要求情报、作战、后方勤务三位成一体，实施有机而灵活的“讨伐”。为此，划管内为三个地区，即八旅驻在的滦平地区，二十五旅驻在的兴隆地区及邓云部队驻在的青龙地区，使各区部队担任该区的警备，按期实行“搜剿”，与邻区联系，一旦与抗日军遭遇时，采取包围的态势，把它歼灭于现地。这个计划，经我通过后，以军管区司令官吕衡的名义，下达于所属各关系部队。

军管区“肃整计划”的执行结果，见第三一览表的第三项。〔中略〕

第二次：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日寇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召开春季防卫会议（日寇防卫司令部管这次会议叫做春季会议）。参

加人员：在军管区方面除增添了周大鲁一名及更换了日寇顾问岩本二名外，其他参加的人员与去年召开的所谓秋季防卫会议相同。

主持会议的：是由日寇关东军派来的一名参谋大佐(未发表姓名)。

会议的目的：是要求加紧实施“集家工作”；要求日寇军队及伪满军队加紧实施“讨伐”，扫清“集家工作”中的障碍。日寇参谋大佐发言：为“国家”百年大计，必须舍小我就大我(意思就是说，为了将来的利益，就是让老百姓多遭受点涂炭，也是应该的)。伪协和会、伪省公署自去秋以来实施“集家工作”的情况，由于过于对老百姓的“同情”，未能做到采取断乎处置的地步，所以工作效率不高，进展缓慢，望今后再多加把劲，使其早日完成计划才好！要求日寇军队及伪满军队要做好及时有效的“讨伐”，防止抗日军对“集家工作”的“妨害”。要求日寇宪兵及伪宪兵、伪警察彻底实施“治本工作”，断绝抗日军与人民的联系，使人民顺从“集家工作”的实施。

其次，由伪省协和会事务长梅本发言：说明自去秋以来实施“集家工作”的情况，并表示今后虽在人力、物力缺乏的现状下，也要努力满足军部的要求。

我为了执行该会议的指示，命田中厚道起草一个给予所属各部队的指示，其内容大意：自去秋的“肃整工作”结束以来，管内各地区的抗日军又渐次活动起来，各伪部队应提高注意力，按照去秋的“肃整计划”，加紧“讨伐”，扫清“集家工作”中的障碍。为此，新划一丰宁地区，使增援的伪第八教导队周大〈鲁〉部队担任该区的警备。

这个指示的执行结果，见第三一览表第四项。

〔中略〕

六、我带领日寇到热河西南部各地巡视的目的及我所起的作

用。

〔中略〕

七、光头山地区事件的具体情况及我应负的责任。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有冀东抗日军高乔率领的约五百余名的部队，由青龙方面挺进到承德东北七八十里的光头山地区建设抗日根据地。伪军管区得此情报，立即由司令官吴元敏、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生田吉五郎及我以下幕僚樵明远、中山、田中、道畑、马场、春田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内容大意是，光头山距承德仅几十里，承德又是热河的心脏，若不把占据该地的抗日军驱逐出去，对管内民心的影响甚大。由我的提议，驻赤峰的步兵第十二团（新从吉林调来的）立即开往光头山地区，对抗日军进行“讨伐”。

步兵十二团依命进出到光头山地区，与抗日军接战过几次，但未得到显著的“效果”，我遂又决定把驻大滩的骑兵四十四团调来两个连，由白子（日系）少校团附率领，进驻平泉，支援步兵十二团的“讨伐”。

在此期间，抗日军的行动非常活跃，袭击了三沟、六沟的警察所，把村公所的存粮布匹等分发给现地的贫苦住民。十一月间日寇关东军增援了日寇两个大队，一驻平泉，一驻凌源。军事部增派了步兵第十团，团长田春风，驻宽城；步兵第十三团两个营，队长猿渡，驻三沟；赫魁部队（约八百名）驻宁城县及其附近，宪兵“讨伐”队，队长桥本岬，驻平泉；同时，第五军管区奉军事部的命令，成立混成第六旅，旅长杨子新，驻平泉；所属：步兵第十二团，团长刘树勋，驻六沟，骑兵四十四团，团长张四维，主力驻大滩，一部驻平泉。

十一月末上述的各部队到着所命的驻在地后，我为对光头山地区实施“讨伐”，对各关系部队拟定了如下的“讨伐”命令：在光头山地区约五百余名的抗日军，在活泼地进行地下工作，扩展根据

地,伪军管区以歼灭抗日军的目的,对光头山地区的抗日军进行“讨伐”。伪混成第六旅长杨子新指挥步兵第十团、第十二团及第十三团的一部、骑兵第四十四团之一部,对光头山西部和南部的抗日军进行“讨伐”;赫魁部队对光头山北部的抗日军进行“讨伐”;宪兵“讨伐”队配合各部队的“讨伐”,做好“治本工作”,断绝住民和抗日军的联系,俾使上项之“讨伐”不生遗憾。在各部队依命开始行动后,虽然各皆进行了积极的“搜剿”,但由于抗日军的战法巧妙,化整为零,使从事“搜剿”的各伪部队,不得与抗日军遭遇,因此未获得显著的“效果”。宪兵“讨伐”队针对这种情况,为做好“治本工作”,便积极活动,特别是对抗日军活动过的三沟、六沟,尤其是对曾接受过抗日军分配物品的住民,严厉实行检问检索、逮捕拷问。

一九四三年二月初(旧历十二月末),司令官吴元敏、日寇顾问江岛及我等核计如何达成任务,结果,决定了我和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去到前方亲自指导“讨伐”,以之鼓舞士气,而期扩大“讨伐”效果。一九四三年二月初我和日寇顾问江岛赴平泉混成第六旅去进行“讨伐”指导。在该旅部,旅长杨子新报告,各部队正在光头山地区进行积极的“讨伐”中;宪兵“讨伐”队长桥本岬报告,为配合“讨伐”,断绝抗日军和住民的联系,他于昨夜(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把光头山附近一带的住民逮捕了约五百余名,拘留在平泉北黄土梁子警察分所附近,请示解决的办法。当由日寇顾问江岛指示,我也同意,除把有“嫌疑”者羁押外,余者按照互相连保的办法释放。结果:约二百余名的所谓嫌疑者(即爱国分子)被伪宪兵分别送往承德法院严处,约三百余名就地释放。

二月六日即所谓“万寿节”约二十二点左右,得前方的报告:大妻营长率领步兵十二团第一营,在光头山南部地区与高乔率领的抗日军主力战斗一次,给予抗日军的损害,除高乔首长牺牲外,死

伤十余名，虏步枪两支，手枪一支。

在本事件中我应负的责任：对光头山地区抗日军“讨伐”计划和命令，是由我拟定的，并为提高“讨伐”的效果，要求宪兵“讨伐”队实施彻底的“治本工作”也是我策划的，并且我还亲自到第一线指导“讨伐”，鼓舞了伪军的士气，因此，我应负杀死伤光头山地区抗日军高乔首长以下二十余名爱国分子及使该区附近一带住民遭受到空前的灾难和耻辱的滔天罪责。

八、执行日寇防卫司令部制造无住人地带及修筑“防卫”抗日军堡垒计划之罪行。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召集我以下各幕僚（樵明远、中山、田中厚道、道畑、马场、春田）等会议，目的：传达日寇西南防卫司令部在伪“国境”地带制造无住人区，及在长城线修筑防御抗日军的堡垒计划，并研究其执行的方法。日寇防卫司令部的计划是：预定在本年解冰后，即将开始在西南“国境”一带制造一条东起义院口，西至独石口约五六百里，宽四公里的“禁住地带”，并在长城线缺口处，修筑堡垒，以防止抗日军的进入。在此地带内的住民一律撵走，房子限期自行拆毁，否则焚烧。任务的分担：驱逐住民的计划与实施，由行政机关省公署、协和会、警察及宪兵担任；修筑堡垒的调查、计划与实施，由第五军管区担任。会议后，我便拟制了如下的命令：命步兵第五旅长周大鲁、第八旅长冯秉忱、步兵二十五旅长阎充酌派兵力，实行调查该担任警备区域内的长城线上应修筑堡垒的地点、个数及所要经费的概算。命田中厚道及道畑两参谋基于这次调查的材料，制成计划，呈报军事部，请求预算。

本计划未及实现，我于三月一日即行转至伪江上军训练处长。

我应负执行日寇为了对中国人民施行更进一步的屠杀与镇

压，而修筑防止人民救星抗日军进入的堡垒线计划的后果之罪责。

九、由于我执行和援助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种种万恶的罪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和耻辱。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我带领日寇顾问岩本到所属各伪部队视察时，在途中看见罗文峪附近民间家屋和大庙正在被日寇军队焚烧中，问其原因，说是没有给日寇军队送情报，受到了日寇的报复；在罗文峪以南（遵化县境）长城线一带，看见道路两侧的民间家屋尽被烧毁，仅剩残垣断壁；在兴隆县城看见伪警察署内，坐着约五六十名的老百姓，他们说是因为拒绝“集家”而被逮捕的；在永宁看见老百姓搜集树叶，晒干，准备冬天食用；在山神庙看见该处正在大举实施“集家”工作，如盖连脊房、修围墙；在汤河口、松树沟门等地所看到的民间住家大部分都是由“集家”而成的。这些地方被强迫移来的农户，估计不下八百余户，过着极贫困、极不卫生的生活。

以上是我在这次视察中所亲眼看到的事实，人民之所以受到这种惨绝人寰的生活，这都是由于像我这类的人，丧尽天良，援助日本帝国主义而残害祖国人民的结果，我应负直接杀害抗日军及爱国分子，而间接摧毁人民的生活并陷之于水深火热之悲惨环境的罪责。

119—2—1143，1，5

王光寅笔供

(1954年5月18日)

王光寅,五十三岁,男,汉族,原籍四川省奉节县城内。

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原籍有土地百亩,自从我投到伪满当了汉奸,老家就和我断绝了关系,迄今已二十三年。我从二十五岁以后,就是依靠自己的薪俸独立生活。一九四五年我的薪水,是伪币五百元(月薪)。

我在伪满最后的职务阶级是伪满第二军管区军法处长,伪陆军军法少将。

一、详细履历

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三年在私塾读书。

一九一四年入奉节县立高等小学,一九一六年毕业。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在夔州联合县立中学校学习。

一九一九年秋——一九二一年夏在北京汇文学校学习。

一九二一年秋——一九二二年夏在北京砺群学院学习。

一九二二年秋入北京朝阳大学学习,一九二六年夏在同校法科毕业。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经张伯翔、于驷兴的介绍,投到黑龙江封建军阀吴俊升门下,派我充督办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公署军务课课员、兼黑龙江省国防筹办处办事员至一九二九年二月。

一九二九年三月调补黑龙江省步兵第一旅第六团上尉副官,

至同年十二月。

一九三〇年一月充黑龙江陆军骑兵第一旅第二团三等兽医正，至同年七月。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充黑龙江省拜泉县政府秘书兼同县清乡局正审判员。

一九三二年一月调充黑龙江省绥化县政府秘书兼同县清乡局正审判员，同年五月末随着呼海线抗日军撤退而去职。我到海拉尔，想投当时还在抗日的苏炳文、张殿九部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我赴海拉尔，在车站检查处长陈占元家闲住了两个多月。谋事未成。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由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官张文铸的援引，加入伪满，充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秘书，从此走上反人民叛祖国的罪恶道路，铸成了大错。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伪军大改编，我被调充伪第三军管区军法处长，任伪陆军军法中校，九月中旬，军管区编制改正，任为陆军军法上校(驻齐齐哈尔)。

一九三四年秋授建国功劳章。

一九三五年秋叙勋五位景云章。

一九三五年授大典纪念章。

一九三六年授访日纪念章。

一九三七年四月转补伪满第五军管区军法处长(驻承德)。

一九三八年十月叙勋四位柱国章。

一九四〇年七月转补伪满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军法官兼军法处长，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降伏时止(驻吉林)。

一九四一年授建国神庙纪念章。

一九四二年三月叙勋四位景云章。

一九四五年七月叙勋三位柱国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进级伪陆军军法少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苏联军解放吉林，我于八月二十六日被苏军俘虏。

119—2，1176，2，12

王光寅笔供

(1954年5月28日)

我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受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官张文铸的援引，加入伪满，充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秘书，在副官处秘书股服务，办理应酬文字函件，即庆祝、吊词、慰问谋事、介绍职业等等函件，其间并曾一度阅过关于"讨伐"李海青、霍刚的电报。这是我堕落到反人民叛祖国的罪恶深渊的第一步。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伪满军大改编，伪第三军管区司令部成立，我被任命为伪第三军管区军法处长(驻齐齐哈尔)，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转补伪军第五军管区(驻承德)军法处长，至一九四〇年七月转补伪满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军法官兼军法处长，直继续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降服时止。计任伪满第三、第五、第二军管区军法处长，共十一年一月，在这个漫长的错误道路上，作出了许多危害祖国人民的严重罪行。万分对不起祖国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先和儿女，今天一一回想，愧悔得无地自容。我任伪军法处长期间(指第三、第五、第二全期间)共处了伪军军人军属、常人的"犯罪"事件四百四十多件，人数约计七百七十来名。其中最突出的是"反满抗日"事件，"间谍"事件，部队内思想问题，逃亡兵事件，"国兵法"违反事件，经济统制诸法令违反事件。其余的是一般犯罪事件。谨按其性质分别陈明，向祖国人民认罪。

一、关于"反满抗日"事件的裁判。

甲、一九三六年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法西斯的血腥残酷手段镇压东北人民爱国活动的一年。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五月〕，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在队长中田敏雄的策划决定下，突然开始齐齐哈尔教育界的大检举，秘密逮捕了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宾章、督学科长厉通维、杨崇文、伪师范学校校长王宸章、伪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伪齐齐哈尔市公署职员刘松山及教员学生市民若干人(人数不知道)。一时人心惶惶。过了约两个月，听说王宾章在日本宪兵队被枪杀了，人心更加恐慌，日寇为了作一个形式裁判来结束此案，日本宪兵机关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法务顾问池田武雄(中佐)、伪第三军管区主任顾问那须弓雄(大佐)，商议决定由伪军政部命令第三军管区军法会审受理裁判，以便顾问直接控制。九月初〔七月十日前后〕伪军政部派遣军法官内山光雄(少校)来齐齐哈尔，会同伪第三军管区军法官菅野利审判这案。这时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已将本案书类秘密送交伪第三军管区顾问那须弓雄转给菅野利。案内人共计二十九名〔三十一名〕，仍拘禁在日本宪兵队，菅野利、内山光雄每天带同译官石村太助到日本宪兵队去审问，过了二十多天审问终了。这时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派遣法务顾问池田武雄来齐齐哈尔，他和主任顾问那须弓雄、日本宪兵队长中田敏雄等商议，决定了对这一事件裁判的布置与如何处刑后，这时日本宪兵队才把案内人送交伪第三军管区军法处。计王甄海(龙江民报社长)、厉通维(伪龙江省教育厅督学)、杨崇文(伪龙江省教育厅科长)、王宸章(伪师范学校长)、麻秉钧(教员)、王柱国〔华〕(教员)、刘松山(伪齐齐哈尔市公署科长)、姜赓年(伪龙江省教育厅体育股长)、王文兰(学生) 刘大风(龙江民报编辑)、哈尔滨大北新报社员金健硕、黑龙江民报社员阎达生及学生市民等共二十九〔三十一〕名。由伪司

令官张文铸、主任顾问那须弓雄命令组织军法会审，命令我为审判长，命令菅野利、内山光雄、高山彦九郎（少校）、今村上尉等为审判官，于九月末开始公判。由我对案内人讯问姓名、年龄、籍贯、住所、职业后，由菅野利、内山光雄担任犯罪事实的讯问和证据调查。日本宪兵队给这案内人所定的罪名是"叛徒罪"、"秘密结社反满抗日意图组织第三国际颠覆政府"。在公判庭讯问中，案内人王甄海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没作任何活动，其余的人如厉通维、杨崇文、姜赓年、王宸章、麻秉钧、王柱国〔华〕、刘松山等都否认有秘密结社组织第三国际颠覆政府的意图和活动。菅野、内山就拿案内人在日本宪兵队被严刑逼认的虚构的情况和日本宪兵队对案内人讯问调查书中的供述记载，问"被告人"等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签的字？"被告人"等都承认在日本宪兵队是这样说的，是我签的字，但是被严刑强迫的。最后终于根据日本宪兵队对"被告人"等讯问调查中的供述记载作为证据，认定案内人是秘密结社反满抗日，意图组织第三国际颠覆政府。经过匆匆两天简短的公判，就结束了所谓公判手续。公判讯问完了后，那须弓雄、池田武雄、菅野利、内山光雄、高山彦九郎、今村上尉等在顾问部会议，决定了处王甄海、王柱国〔华〕、麻秉钧等五名死刑（内二名姓名忘了）。处姜赓年、厉通维等五〔二〕名无期徒刑。处王宸章等十三名以五年至十五年的徒刑。王文兰等六〔八〕名无罪。然后把我找去把判决主文告诉我，我也同意。由菅野利、内山光雄作成判决书〔八月十五日〕，宣告王甄海、王柱国〔华〕、麻秉钧等五名（内二人名姓忘了）处死刑。姜赓年、厉通维等五〔二〕名处无期徒刑。王宸章等十三名处五年至十五年的徒刑。王文兰等六〔八〕名无罪释放。处死刑的五名在齐齐哈尔北郊执行，处徒刑的十三名交齐齐哈尔陆军监狱执行。

乙、我参加过龙江省明水县普济佛教会"反满抗日"事件的裁

判。

一九三六年冬，齐齐哈尔日本宪本队检举了龙江省明水县普济佛教会员刘景太、马国升、乔传孔等共九名的“反满抗日”事件，于一九三七年春以“叛徒”罪送到伪满第三军管区军法处。经军法官菅野利审问，马国升等承认在明水县组织普济佛教会并募集会员，他们受北平行营方面某工作人员的指示，用宗教作掩护，暗中进行反满抗日的救国活动。三月末审问完了，组织军法会审，我当审判长，菅野利当审判官（其他审判官姓名忘了）。裁判结果，以秘密结社反满抗日的“叛徒”罪名，判处了刘景太、马国升、乔传孔等三名死刑，下余的人有四名处徒刑十年，有两名无罪释放。这个判决经伪司令官张文铸、主任顾问那须弓雄批准后，死刑在齐齐哈尔北郊执行，有期徒刑在齐齐哈尔监狱执行。

丙、我参加对义县普济佛教会张铸臣等十二名“反满抗日”事件的裁判。

承德日本宪兵队于一九三六年底，在锦州省义县检举了当地普济佛教会会员张铸臣等以下十二名反满抗日事件，于翌年三月，以叛徒罪名，送交伪满第五军管区军法处。经军法官内山光雄预审完毕，伪军政部法务顾问池田武雄赴承德和伪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荒木正二商议，决定了对这案的如何处理。同年四月末，我转勤到承德。五月上旬，组织军法会审，我当审判长，内山光雄当审判官（其余审判官姓名忘了）。案内人张铸臣等在公判时承认在义县组织五台山普济佛教会的分会，募集会员，发卖普济佛教会会章，借此收集会费，并利用佛教会收集伪满和日伪军的情报，作“反满抗日”的地下活动。裁判结果，以利用宗教作掩护，秘密结社意图颠覆政府的“叛徒”罪名，判处张铸臣等三名死刑（内二名姓名忘了），其余的人都处徒刑七年或十年，有三名无罪。这个判决，经伪

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主任顾问荒木正二批准命令执行。死刑在承德水泉沟执行。

二、关于间谍事件的处理

甲、一九三四年秋，伪满齐齐哈尔宪兵队长魏福海，在齐齐哈尔盘查出间谍两名，一个姓陈(?)(另一个姓忘了)，送到伪第三军管区军法处。陈某夹衣内藏有北平行营发的盖印的白绸证章，他们承认是一九三三年张学良派来探知并收集伪满军和日军的情报的。这件事经我和军法官宛鹤峙讯问，押了一个多月，经伪司令官张文铸的认可而释放了。

乙、一九三七年冬，承德日本宪兵队检举了李某等三名间谍事件，一九三八年春，送到伪满第五军管区军法处，经军事检察官内山光雄讯问，李某等承认是关里人，装扮作卖杂货的小商人，经喜峰口到热河，目的是到各地收集日军和伪军的情报和伪满各地方的情况。以后起诉送交军法会审，我当审判长，石突重坚当审判官(判士名忘了)。裁判结果，李某等两名以“间谍”罪名被判处死刑，另一名处徒刑五年。判决经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主任顾问荒木正二命令执行。死刑在承德水泉沟执行。

丙、承德日本宪兵队于一九三八年春，在热河省丰宁县检举了刘某等三名“间谍”事件，送到伪第五军管区军法处。经军事检察官内山光雄审问，刘某等承认探知收集日军、伪军情报，供给中国军方面不讳。经伪第五军管区军法会审裁判，我当审判长、石突重坚当审判官(判士是谁不记得了)，公判结果以“间谍”罪判处刘某死刑，其余二名各判处徒刑几年。判决经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主任顾问荒木正二批准后，死刑一名在承德水泉沟执行。

丁、一九三八年秋，承德日军宪兵队在承德检举了崔国治(?)一名“间谍”事件，送交伪满第五军管区军法会审，经内山光雄审

问。据被告人说他从前在日寇特务机关当特务，一九三三年承德松室(大佐)特务机关长被农民军抓住，曾派他去说和，花钱赎回，后来特务被开革了，卖私鸦片为生，因有熟识的中国军方面的人来往，他受托探听收集日寇伪军和伪满的情报，供给中国军方面。这案经军法会审裁判，我当审判长，石突重坚当审判官(判士是谁忘了)，裁判结果以“间谍”罪，判处崔国治(?)死刑，经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主任顾问荒木正二命令执行。

戊、吉林日本宪兵队于一九四二年夏，在吉林郊外检举了苏联间谍赵俊英(女)、赵藩九、谢文翥等五名间谍事件，送到伪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赵俊英是女中毕业，思想很进步，她在被捕的四年前，曾秘密经由牡丹江、东宁进入苏联国境，在苏联某部队受过红军的谍报和无线电通信教育，半年之后，由东宁秘密回国，和她的弟弟赵藩九及她的朋友谢文翥(伪满江上军司令部属官)共同工作。她的任务是给红军探知收集伪满政治方面和日军伪军的情报，她秘密带回无线电发报机，中苏文密码电本，准备通信。一九四二年初夏，在吉林郊外正进行工作中，被日本宪兵发觉逮捕，并将无线电发报机和电报本没收。经伪第二军管区军法官佐坂邦助检察结果，提起公诉。七月末送交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裁判，我当审判长，军法官纪海鹏和另外一名判士当审判官。赵俊英、赵藩九、谢文翥等在公判庭供认前情不讳，结果以“间谍”罪名，判处赵俊英徒刑十年，赵藩九徒刑八年，谢文翥徒刑二年半，交吉林地方监狱执行。还有两名判刑，缓期执行。

己、四平街日本宪兵队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在四平市内检举了八路军的“间谍”一名，送到伪满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这个人的姓名我记不清了，似乎姓李。他承认他是冀东方面八路军某部队的兵，他被派遣来东北是探听并收集日寇伪军和伪满各地的情报，

但是没有什么重要收获，在四平街八杂市遛跶，被宪兵认为形迹可疑而逮捕。这案经佐坂邦助检察起诉后，由军法会审裁判，我当审判长，纪海鹏和判士某(姓名忘了)当审判官。裁判结果，按间谍罪判处徒刑二年。交吉林地方监狱执行。

三、关于部队思想问题

一九三五年春末，伪满第三军管区所属骑兵第二十二团的一个排(约三十几名)，在日系军官排长岩山半一指挥下驻在龙江省嫩江县四站。士兵们痛恨日系军官岩山半一平日待兵苛刻，亲身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痛苦，于某天夜里举行了起义，枪毙了岩山半一，向山里奔国境方面逃走。被日寇发觉派日军伪军追击，抓回来军士孙得胜和兵李某等共三名(一名姓名忘了)，送到伪第三军管区军法处。正由我和军法官贾元衡进行审判中，还未判决，突然顾问部把这三个人要去，说是日系军官全要求替岩山报仇，无须经过裁判和军政部批准(当时的法规规定，死刑须伪军政部大臣批准)，当由第三军管区顾问内田实带日系军官丰福十四郎、高山彦九郎等十余人，把孙得胜、李某等三名带到齐齐哈尔西大桥西空地，被他们用战刀杀害了。这个办法，是主任顾问河崎思郎和内田实商定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向伪军上下表示顾问的权威和凶恶，来吓唬镇压官兵的起义。另方面是安抚团结日系，因为这是最初次的日系军官被杀。以后由军法处补了一个判决归档，算这案结束。

伪第三军管区混成第十五旅于一九三五年秋有兵一名，名叫于得水，拐带步枪一支逃亡，打算逃入山里入反满抗日军来反对伪满和日帝。经部队缉获，经黑河地区顾问内田实派人送到军法处，经军法官菅野利审判，我当审判长，结果被判处死刑。经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主任顾问那须弓雄报请伪军政部批准执行。

四、逃亡兵处理情况

我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止，任伪满第三、第五、第二军管区军法处长期间，总共处理了逃亡兵二百八十来名（内计募兵一百八十名、国兵一百名）。对这些逃亡兵除百分之五不起诉外，其余的都是酌量逃亡的原因和情况处了刑。募兵时期的逃亡原因：主要是兵们不愿为伪满为日寇当兵；其次是家庭贫困，生活无法维持，请长假请不下来，因而厌恶兵役；（三）父母年老，家庭有事故，请假回家不许可；（四）在军队年久，感觉没有什么兴趣，想谋别的职业或到工厂作工，另寻出路；（五）军官待兵不好；（六）请假回家逾期多日不归队。国兵逃亡的原因：首先是青年们不愿为伪满服务，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侵略炮灰；其次是家庭观念深，想念自己的父母和爱人；（三）入队后不堪军队严格教育的痛苦；（四）军官军士官待兵太刻，随便打骂；（五）部队给养太坏，棉絮破碎不暖。以上就是逃亡兵的一般情况。逃亡兵都是由宪兵团或逃亡兵所属部队自己抓的，由他们检举送到军法会审裁判。拐械（指拐带刺刀）逃亡的，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处刑一年多一点，以后处刑六月至八九月。共计二十多名。敌前逃亡的二名，处一年半至二年的徒刑。一般逃亡兵处刑从三个月到六七个月。国兵逃亡的通常处刑二月到四月。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时，伪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把未决的“逃亡”、“恐吓”“毁损军用物”十四个兵全部释放了。八月十六日吉林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吉林治安维持会，并决定把吉林伪军改为吉林保安军，临时维持治安。这时以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关成山、参谋长萧玉琛、混成第二旅长张印符、独立通信队长吕梦龄为首的汉奸们（我也在内），想保存实力，幻想投靠蒋介石，遂摇身一变，变为吉林保安军的首领。这个“保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的

利益，防穷人的暴动，实质上就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作看门狗。但国兵都想回家，纷纷逃亡。关成山、萧玉琛为了镇压逃亡，逮捕了独立通信队两个拐步枪逃亡的兵，命令我把他判处死刑。我当时表示反对，迟迟未决，但关成山、萧玉琛的意思很坚决，未等到照他的意思判决，苏联军进军吉林，我就把这两个兵释放了。同月十七日关成山、萧玉琛还交给军法处逃兵一名（第二工兵队的），独立通信队"煽动逃亡"的张上尉和某日系连长，拘禁了两天就释放了。

以上就是我在伪满执行反动法令，处理逃亡兵，违反人民利益的严重罪行。

五、"国兵法违反"的裁判

伪满"国兵法"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毒辣政策的具体表现。从一九四〇年"国兵法"公布实施以来，"国兵法"违反的裁判权，暂属于军法会审。吉林征兵管区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征兵，当年征兵两次，违反国兵法受裁判的约有二十七八名。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年间，每年受裁判的都有十六七名。共计征兵五次，因违反国兵法被征兵官告发或宪兵检举送经伪第二军管区军法会审裁判的，共计约八十名。这些满二十岁的国兵适龄的青年，一般在思想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更不愿为巩固汉奸统治而受苦受训练，因而以避忌兵役的目的，于受检前逃走。其次是适龄壮丁由于父兄的指使帮助而逃走潜匿。或故作疾病，或得到村吏员的帮助变造民籍的年龄。凡以上述方法来企图避免兵役的，我都以违反国兵法的罪名判处以一个月或二三月的徒刑。仅极少数是不起诉。这就是我执行伪"国兵法"罚则，严重危害人民的罪行。

六、粮谷统制经济统制诸法令违反的裁判

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到一九四〇

年就暴露了制造了它本国和伪满的经济困难和人民贫困。从一九四一年起,加强了米谷、粮谷、特产物的管理,棉花、棉布、棉织物及一切生活必需品无一不严格统制,配给品更感不足,因而士兵"犯罪"的更多。伪第二军管区所属部队的士兵们,因为买点或卖点大米、白面、棉布、皮革、豆油、粮谷等被宪兵检举,送到军法会审裁判的每年都有八九名左右。我酌量情况,除自己食用数量不大的是不起诉外,只要私自买卖以营利为目的的,都处以二月到五月的徒刑。我当时也明知士兵们是生活所逼,情有可原,但为执行伪满的经济统制诸法令的罚则,仍予以处罚。这就是我效忠敌伪的罪恶行为。

〔下略〕

119—2—1176,1,5

正珠尔扎布笔供

（1957年7月3日）

姓名:正珠尔扎布。别名:韩信宝、川岛成信、韩绍宏、田中正。性别:男。年龄:四十九岁。族别:蒙。原籍辽西省彰武县大冷营子,现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呼纳盟海拉尔市西大街七〇号。

一、个人经历

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生。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入旅顺日本小学校,用韩信宝名。

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小学毕业。

一九二二年五月留学日本、入东京府立第六中学校,用川岛成信名。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学修业。

一九二六年四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用韩绍宏名。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当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嘱托。在郑家屯满铁公所服勤务,用田中正名。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辞满铁嘱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组织内蒙自治军。

一九三二年三月脱离内蒙自治军。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入伪满充兴安局政务处警务科属官委任二等(长春),从此以后用正珠尔扎布名。

一九三三年五月任兴安总署事务官荐任五等，充警务科保安卫生股长（长春），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转任治安部警务司检阅电影股长（长春）。

一九三七年七月转任治安部官房事务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任陆军骑兵上校充治安部部附，在军事科服勤务。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任兴安军管区参谋处长（驻郑家屯）。

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兴安军管区部附（八月参加宝清讨伐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入奉天陆军训练处第二回专科。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参加诺门汗战斗（专科中途停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奉天陆军训练处第二回专科毕业后，任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附。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任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驻钱家店）。

一九四〇年三月兴安骑兵第四团改为第二师兴安步兵团，我仍任该团团长（驻钱家店）。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任第十军管区参谋长（驻海拉尔）。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升任陆军少将（仍驻海拉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在海拉尔南五十公里乌兰哈尔嘎那投降苏联红军。

二、我的罪恶

1. 我在日本学校时期的非法活动：

一九二六年四月关东军派我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学手续是由川岛浪速的代理人村井修与日本陆军省十川次郎大尉办的。当时中国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各军阀和地方政权派才允许入学的，我是没有军阀背景，家住关东州旅顺。我入士官学校的

目的是预备将来继承亡父的意志,实行蒙古独立,因此我入了士官学校。我当时认为外蒙已被苏联侵略,内蒙古独立没有日本的援助是办不到的,所以我在日本期间尽量交际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比如:畑英太郎大将、畑俊六元帅、松井石根大将、古庄平郎大将、田代皖一郎中将、小岛吉藏中将、金子定一少将、堀内一雄中佐、野田又男中佐(这些人在我认识时阶级还没到这个阶级,这是他们最后的阶级)、东久迩宫、闲院春仁宫等日本皇族,大川周明(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长)、盐田清一(有名小儿科医师)、佐佐木安五郎(国会议员)、阿部宗孝(东亚府立第六中学校长)、盐谷温(文学博士),其他入江种矩(黑龙会干部)、伊达顺之助(满洲浪人)岩田爱之助(爱之王国社主)、岩田富美夫(大化会主)、西田税(日本改造论者)、笹目恒雄(蒙古浪人)、高网信次郎(西伯利亚浪人)等等。那时我见了以上的人就谈希望蒙古独立,希望日本的援助和我父亲的事等。此外我写了两个小手册子(各印二百册)送给了知己和同学。一个是:"就蒙古",内容是外蒙独立后的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原是白云梯等写的蒙古小册翻译的。另一个是:"回顾祖国蒙古",内容是由日本浜田某等著一九一七年出版的"蒙古地志"上、中、下三册中抄来的东部内蒙古事情。〔中略〕

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日本九州福冈县参加了日莲宗和尚高锅日统主办的在博多湾志贺之岛上建立"蒙古供养塔"除幕式典。在公会堂我还讲了日蒙亲善和日本武士道精神。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于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大连。家族生活费和我的留学费,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末我入满铁为止,全是川岛浪速由肃亲王的大连露天市场的收入中来供给的(母亲和妹妹是每月壹百元,我留学时每月七十元)。

有一次我同甘珠尔扎布上旅顺见了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

他在官邸请我们吃饭，谈了父亲的事和家庭生活状况及将来想蒙古独立的事等。又见了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堀内一雄、花谷正参谋等，都同样谈了希望蒙古独立的事。他们都表示同情，叫我好好努力。

2. 我在郑家屯满铁公所期间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拿着阿部宗孝（东京府立第六中学校长）的介绍信，见了满铁理事田边敏行（他俩是大学同学），说明了我想入满铁的事。同年十二月我当了满铁的嘱托，根据我的希望指定在郑家屯满铁公所服勤务。所长是蒙古通菊竹实藏（别名稻穗）。满铁公所是满铁本社的支店，表面是管理农场搜集货源情报，但实际是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扩张往东部内蒙古势力为目的的间谍机关。当时我的职务是担任翻译和抄写文件的事情。我所以希望来郑家屯任事，因为我虽说是蒙古人，没有蒙古知己和不懂蒙古实情，所以在这研究蒙古事情比较方便。

一九二九年秋我受命随同满铁牛疫预防注射队（奉天满铁兽疫研究所派来两名兽医编成的）到了西扎鲁特旗。因该地有满铁的预托牛。这是满铁买了牛以后放在该地令人民饲养，饲养人可以随便使用，但死了得缴皮张。我一面当翻译一面还给牛注射，并帮助了兽医和满铁职员林冒雄等的调查该地牛疫、鼻疽、炭疽、牛蜱等状况，和羊、牛、马等数目的间谍工作。

一九二九年五月我上洮南去了一次，目的是想见张海鹏索要先人在彰武县的房地。洮南满铁公所庶务主任真锅某陪同我见了张海鹏。张海鹏曾跟我父亲一块打过胡匪有交情，我父亲离开家乡上外蒙大库伦去后他把父亲的房地没收了。可是这次来到并没说出来要房地。

一九三〇年我上北京一次，目的是听说北京有些蒙古青年在

国民党内活动，我想参加他们的工作，可是我到北京时候他们的组织垮台了(扩大会议时)。我见了国民党的白云梯和他的兄弟白云航等。〔中略〕

一九三〇年以来东北政权和日本当局发生了许多问题，如：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神原农场事件等。从这些事件看出时局是很紧迫的，我也想像到必有一场中日冲突。于是我就活动起来，搜罗帮凶，上沈阳找过郭道甫和他的学生们谈话。内容是蒙古王公的状况和东北军阀的关系，郭道甫的呼伦贝尔独立失败的原因，师范学校成立的来源等。认识了张鸿绶、哈豐阿、仁亲莫德格等二十余名蒙古学生。又经过张鸿绶的介绍，在沈阳天聚东客栈认识了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在茂林饭店认识了东科中旗协理韩色旺。〔中略〕

3.我在组织内蒙自治军期间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我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翌日我便起身回到大连住了三四天(在四平街站，我听说关东军司令部已转进到沈阳)，即又到沈阳万国旅社见了甘珠尔扎布等人。在这里我就召集(过去已有连络)蒙族师范的学生进行研究组织蒙古独立军的事情。参加者有甘珠尔扎布、哈豐阿、仁亲莫德格、张鸿绶、张贯一等二十余名。研究内容是关于组织蒙古独立政府和组织蒙古独立军的问题。结果决定是先组织蒙古独立军(后改内蒙自治军)。还有一次是在我的朋友(日寇满铁职员)汤川敬三的家中，参加人员与前同。

内蒙自治军的行动计划，是以包善一(东科后旗)和韩色旺(东科中旗)及西科中旗(该旗的王是业喜海顺。这人与甘珠尔扎布的老婆川岛芳子是亲戚，一九三〇年时甘珠尔扎布和川岛芳子曾在这住过半年多。可是这次业喜海顺并没有参加我们的行动。)为根

据〈地〉往北发展，同时在北面由郭道甫带领军队从海拉尔向南发展，在兴安岭索要吉山汇合。（郭道甫是在我到沈阳以前就已和甘珠尔扎布商量妥当，他带着海拉尔方面的学生回到海拉尔进行活动去了。郭道甫系旧东北时代闹呼伦贝尔独立的主动者，失败后被张学良软禁在沈阳，给他设立了一个蒙旗师范学校，他任校长。）

在沈阳，甘珠尔扎布向包善一和韩色旺商量妥后（当时他两人表示同意），甘珠尔扎布即向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说明蒙古独立计划，并索取步枪（奉天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大盖枪）三千支、子弹三十万发，同时板垣派了顾问一名叫和田劲（日寇退伍中尉）。我自己也到关东军向板垣要了四支自来德枪和他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了板垣许可的字样做为我们的证明），并报告了我们要往现地出发的事。在板垣答应给枪弹之后，还派了宋福山到彰武县附近连络胡匪天红来参加内蒙自治军。

在万国旅社商量时就已组织了内蒙自治军的八大处。甘珠尔扎布为司令，萨嘎拉扎布为参谋长，哈豐阿为秘书长，韩凤麟为副官处长，耐勒特为宣传处长，我担任后方与关东军连络和军械处长。当时买了宣传活动用的誊写板，准备了标语，内容是宣传蒙古独立，叫蒙古人团结起来。还编制了青旗歌，又制定了军旗，是天兰色，正中有红色“蒙古”的蒙古字。

于是，在十月初我们即由沈阳出发经郑家屯到了包善一家大薰子。枪弹是随火车运到一棵树站，由甘珠尔扎布带领着包善一的部队车辆搬运到大薰子。这时韩色旺也派人来领枪。这时内蒙自治军正式成立。包善一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韩色旺为第二军司令，甘珠尔扎布为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第三军的骨干部队是学生队及天红部队，以后发展到八个团）。

在我带着学生二三十名由郑家屯经大薰子到大林站。到了大

林站与韩色旺等协议攻击通辽县城，并先派博彦满都等十名便衣队潜入通辽县城，与通辽当局谈判许可内蒙自治军入县城，结果未成。于是在十月十二日早开始攻击通辽县城，目的就是想夺通辽县城做为扩充力量的根据地。攻击时我同第三军的一部带着手提式枪、手榴弹（手榴弹是和田劲由关东军要来的），由东方攻进了县城一角，我亲手向连盛长（买卖家）投掷了数枚手榴弹。包善一自己并没参加，派了铁官以下二百余人攻进了通辽县城中心地带后，被第三旅反击全部歼灭了。韩色旺是在通辽县城东小街集抽大烟，自己未参加，派了一部分人。甘珠尔扎布是带着学生队由通辽车站攻击。和田劲带领了七八名日本浪人由大林站坐火车头到通辽车站。战斗是由早八时到下午二时许，因遭受第三旅的反击撤退到大林站。战后听说死伤约三百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蒙自治军的团结不好和没有正确领导人，各人都是想维持个人的势力。包善一得到了多数枪弹，但却不肯动窝，表现骑墙的态度。他曾说：张学良回来怎么办？日本军撤退怎么办？我走后我的家族怎么办等等。以后听说张学良派来了一个叫高专员，他也跟他保持连络，一面也应付我们。韩色旺也不积极。军队是很短期间搜罗的乌合之众。

攻通辽县失败后，和田劲嫌内蒙自治军无能，于是回到沈阳报告关东军说：内蒙自治军造反了，非消灭他不可。他借词不当顾问了。但以后我们在大林站的时候，一天晚上松井清助（退伍大佐、日本浪人，曾在内蒙古搞过间谍活动）来到大林站，听了我们的情况后，便回沈阳跟关东军连络，他当了顾问，并要来了四门重迫击炮和四挺轻机枪。该批武器分配第一军各二，第二军各一，第三军各一。并雇来了两个白俄人炮手。于是派白云航为炮队长，因为他懂得俄语。十月下旬第三军攻击了“瓜毛特”一个窑，并使用了

迫击炮，打死了一个大人和小孩，破坏了两间房子。十一月又攻击了“二十八户”屯。同年冬，我又亲自参加了攻击舍伯吐(辽北，该地共一百余户，这时人民都逃走了)，打了几枪部队就进驻了。在这驻了小一个月，并祸害了人民的食粮和财物。

一九三一年十月底和十一月，我曾两次到沈阳连络买被服的事，共买大氅五百件(系旧东北军用)，这些被服的购买手续完全是由松井顾问的哥哥松井常三郎给办理的。同年冬关东军又派来了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两个退伍少佐当顾问，这时有日寇顾问连松井在内三个人。一九三二年春关东军片仓衷参谋曾来到内蒙自治军驻地。

一九三二年春内蒙自治军第三军由舍伯吐经仁发合到了莫里庙，驻在莫里庙活佛阿旺图巴丹处。活佛阿旺图巴丹自称救国大师，搜罗了他的信徒和地户等一百多人，他的目的是想勾通内蒙自治军，保护自己的财产。

我由莫里庙同松井到卓里克图王府，见了李守信部下胡宝山营长。我去见他的目的是劝他协助内蒙自治军，并要求不要妨碍我们的行动。当时我给了他一个望远镜，他也给了我狐狸皮一张。我送他礼物的目的就是想不以血的代价占领开鲁，结果未逞。以后我到通辽县城(十一月初已被日军羽山支队占领)设立了内蒙自治军办事处(驻天惠地局)任务是与日军守备队连络。这时我抢夺了人民粮食四十石，充自治军人员来往之用。

一九三二年春，我和甘珠尔扎布、萨嘎拉扎布、天红等同谋杀害了小喇嘛等以下四人。谋杀他们的原因是因小喇嘛(他是第二军韩色旺部下的一个团长)行为非常野蛮，他不仅随便的杀人，还随便缴他部队的械，韩色旺管制不住。于是就骗他说是去见关东军司令官，但把他带到四平街后日本警察星原等把他杀了。具体

计划是萨嘎拉扎布和关东军的军属茂木(?)某二人主谋的。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通辽时,驻舍伯吐的第三军第二团(团长那钦双和尔)被驻开鲁的李守信军队袭击,溃不成军,重迫击炮也被李守信部队抢去。

是年三月我离开了内蒙自治军,原因是因为日本顾问盘井等不满意内蒙古自治军的成绩,没搞好,同时我也感到达不成我的蒙古独立的企图。后来这支乌合之众就是由关东军派来的顾问带领(如松井冒充内蒙自治军司令,进攻开鲁被打死),内蒙自治军最后于伪满成立后改编成兴安军。〔中略〕

4.我在任伪满官吏期间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我当了伪满兴安局警务科保安卫生股股员属官(长春),该科当时主要办理的是兴安四省警察局成立的事务,我在这里担任一般事务连络和翻译。这是我参加强化伪政权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随兴安局政务处长寿明阿和属官田口义男到索伦下木局子,但任翻译工作。这时日军三宅支队侵入了索伦。

同年十月我又随警务科长坂水梧郎到葛根庙给西科中旗、西科后旗、西科前旗、扎赉特旗分发所谓维持治安用的步枪四百支,子弹四万发。这是我协助日寇强化镇压人民的工具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升为事务官,任保安卫生股长,八月我受命与兴安总署调查科五十岚浩五郎参加满铁西乌珠穆沁调查队(满铁调查队十余名,有科学专家,兽医等,关东军小川泰三郎大尉也参加了)。调查了盐池的大小、深度、浓度、埋藏量,牛、马、羊概数,道路的状况,气象、人情风俗等,并参观了"鄂保"祭,还拍了电影,参观了乌兰呼热庙。这是我帮助日寇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我随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到了

日本，参加者兴安北省长凌升、东省长额勒春。参加了东京、横须贺、日光、千叶、名古屋、京都、大阪、奈良、别府、伊势、山田等地。在东京见到了陆军省次官阿部信行、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外务省次官重光癸。于十一月二日回长春。这是我协助汉奸谄媚日寇，增加日满亲善的罪行。

一九三四年春兴安总署召开省长会议，长官齐为主席。参加者兴安南省长、兴东省长额勒春、兴安西省长扎噶尔、兴安北省长凌升、其他各科长、各部有关者约五十名。我也曾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关于春耕贷款、公文用的言语、关于治安维持、成立学校问题和互相事务连络，这些都是我翻译。这是我协助日寇推行奴役政策的罪行。〔中略〕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任随员参加了满蒙会议(划定国境问题)。代表是：兴安北省长凌升、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海拉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等。我是担任翻译和事务连络。我还颠倒黑白的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谈了会议的状况，主要诬蔑苏联和蒙古共和国代表对会议没有诚意，受苏联的监视。这是我协助日寇欺骗人民和诬蔑苏联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我升了荐任四等，职务是保安卫生股长。五月初我当了语学检定试验委员，到辽源、王爷庙执行了语学检定试验。这是我帮助日寇奴化同胞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转任治安部警务司检阅股长(电影)，同年七月中旬转任治安部官房服勤务，八月我随治安部次长薄田美朝视察了锦州、承德、山海关、古北口等警察。这是我帮助日寇督励巩固伪警察特务的罪行。

5. 我在任伪满军官期间罪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我任陆军骑兵上校。我在日本士官学校时认识的野田又男大尉来到伪满当军事顾问，他说：要扩充兴安军，你们(指我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士官学校，为什么不当军人？你们愿意的话我给你们办。于是我从此就当了军人。起初在治安部军事科见习，曾上沈阳奉天陆军训练处和王爷庙兴安陆军学校学习。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任兴安军管区参谋处长(郑家屯)，任务是担任教育、训练、检阅、出动、讨伐、情报、演习等。同年二月底我随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顾问野田又男巡视和检阅了博克图和海拉尔、满洲里(有一连任国境监视)等部队，鼓励了他们。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任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部附，同年七月初到七月底在王爷庙兴安陆军学校见学。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被派到三江省宝清讨伐队。该队是从一月就在该地讨伐(司令官绰罗巴特尔两个骑兵团)。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入奉天陆军训练处专科第二回学生(专学战术)。

一九三九年诺门汗事件勃发，我受命令由七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参加了这个战斗，曾经因为顽强抵抗最后受命才撤回战线，因此我受了三级武功章还有赏金五十元。这是我帮助日寇侵略蒙古共和国的罪行。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任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四月改为第二师兴安步兵团，我仍任团长(驻钱家店)。〔中略〕

一九四〇、四一、四二、四四年四回我参加了通辽蒙古忠魂塔慰灵祭，并有一次我率领部队参加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受司令官郭文林的命令当了征兵官，在东科后旗、东科前旗、库伦旗、通辽县强征了一千多名人民子弟。

〔中略〕

在我由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三年二月末当团长三年多的期间里，我主要是给一千多名子弟实行了奴化教育、训练，这是给日寇训练准备炮灰，巩固日寇的奴役统治，危害人民的罪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转伪第十军管区任参谋长(驻海拉尔)。

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参加了在扎兰屯召开的日军防卫司令官某大佐的防卫会议。出席的有兴安东省长额勒春、同次长高冈信次郎、各旗长、参事官、伪第十军管区顾问田古里直中佐等五十余名。主要内容是防空防谍，强化搜集情报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任陆军少将，仍任伪第十军管区参谋长。

一九四四年春我出席了军事部召开的各军管区参谋长会议。参加会议的第一军官区参谋长女屋岩、第二军管区参谋长任广福以下各军管区参谋长、学校干事、各司长、各科长、顾问等七、八十名。我报告了管内状况和军队教育的各项进度、准备接受新兵入队状况等。〔中略〕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参加了在齐齐哈尔日军司令官上村干男中将召开的阵地构筑会议。参加的有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赵秋航、顾问、参谋长任广福、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周大鲁、参谋长赵伟、伪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顾问萩原某等。我军管区担任了兴安岭和哈克附近构筑阵地。回海拉尔后即派了四十七团团长率领一个连在哈克，四十八团团长率领一个连在兴安岭给日寇构筑阵地到八一五。

〔下略〕

119—2—1128,1,5

赵竞昌笔供

(1954年7月22日)

一、背叛祖国投敌的经过：一九二九年中俄战役时，被苏联海空军的压迫，我东北海军败绩，江亨炮舰为避免损失，自沉于富棉码头。一九三〇年海军司令沈鸿烈由沈阳派来日本商人(姓名忘记)承办打捞。当时尹祚乾是海军补充队队长，原来是江亨舰长，所以派尹祚乾办理打捞江亨事宜。于是他与这个商人发生关系，相处甚得。"九一八"事变后，他任哈尔滨海军江防舰队长，他看东北大势已去，饷源无着，于一九三一年年末开始与该商人勾结，托与日本海军连络，转达他投降日寇的意图。于一九三二年二月，该商人引导日寇海军少佐佐佐木来哈接洽，尹祚乾与佐佐木在马迭尔饭店召集各舰长会谈，出席的有海军补充队长黄勋、舰长范熙申、赵文溶、吴镔和我(当时是补充队副队长(中校)等八名。由日寇佐佐木说："成立新国家，你们都赞成吗？"其中一二人就应声赞成，其余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我也是默认了。从此东北海军首脑全部投敌，我走上了背叛人民的道路，做了许多危害人民的事情。

海军江防舰队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改为伪满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尹祚乾任海军司令(少将)，范熙申任参谋长(上校)，黄勋和我仍任原职。当时海军的状况有：炮舰六只、海军补充队、海军修船处、兵营、船坞，共有士兵二百多名，官员四十余名。

二、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三三年七月，在伪满海军江防队司令部

参谋处服务期间：一九三二年三月参加了伪满海军后，我因病请假休养两三个月，于五月以海军补充队中校副队长的名义，在伪满海军司令部参谋处服务，受参谋长范熙申的指示，办理以下的事务：一、办理一切文稿，上行公文，各机关往来文件，隶下部队的命令汇报等；二、担任警备事务。划分松花江为五个防区——第一防区上游哈尔滨到肇州；第二防区下游哈尔滨到通河；第三防区通河到依兰；第四防区依兰到佳木斯；第五防区佳木斯到同江。派遣舰队警备。利济派第二区；江清派第三区；利绥派第四区；江通、江平派第五区。第一防区因无重要的情况所以未派舰镇防；三、教育训练。教育训练的目的是：训练伪满海军，巩固国防和江防。首先注重精神教育，使士兵养成日满一德一心，共同防卫的精神。教育训练每年分为两期。由五月至十月为巡防期，主要是协助陆上日、伪军队讨伐，因此关于枪炮的教练、机器的操纵，务须熟练，对于防空、防水、防火各项也要注意。实弹射击每年一次，约在七八月实施。由十一月至四月底为打冻期，着重精神和技术教育，训练机枪、迫击炮、打冰工作，当此时期，正是补充装备协助日寇讨伐抗日军队。以上是我训练伪满海军，巩固伪满国防、协助日寇镇压抗日人民的罪行。

(一)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富锦下游利济炮舰士兵起义的原因是：由该舰日寇教官(姓名忘记)平日待兵不好，非打即骂，瞧不起中国人；士兵原来就不愿供日寇的指使，因此仇恨日寇的心情日益高涨，为爱祖国的热诚所驱使，全体士兵三十余名一同起义，杀死日寇教官，投往抗日救国军中去了。司令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代理参谋长黄勋命令我起稿，下一通令，所属各队、舰整顿军纪，调查反满抗日思想，加强精神教育，防止事件发生。由于这个通令压制了士兵爱祖国的思想，迫使他们供给日寇奴役，这就是我的罪行。

(二)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由伪司令尹祚乾与海军顾问日寇井简大尉合谋,包庇私运大批烟土,由下江运到哈尔滨毒害人民从中取利。十月底由黄勋代理参谋长交给我二百元纸币,用意是要我为他们守秘。

(三)一九三三年五月,伪满军政部命令江防舰队司令部,派员参加招募海军新兵事,伪司令尹祚乾派我和少尉李春荣到长春军政部联络,会同舰政课课员上尉日寇佐佐木丙二、军事课属官冯杰,到沈阳借用中央训练处为考场。考试题是:论文、算术、身体检查,共考取七十名,由少尉李春荣率领。到哈尔滨后,听新兵说:这也不是学校啊! 这一句话是他们知道受骗了。本来是把学生骗来当兵,因为学生素质好,进度快,和学生家庭多为富裕,逃亡比较少。我帮助日寇欺骗有为的中国青年学生,充当伪满海军士兵,作日寇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我的罪行。〔中略〕

三、在舰长服务期间(一九三三年八月——三五年十二月)的罪行。

(一)一九三三年八月,我由参谋处转任利绥炮舰舰长。舰长任务是:教育训练本舰的士兵,保卫沿江治安、并协助日寇讨伐。

利绥舰三百吨,舰上装备:汽机、七生的五口径炮一门、捷克式机枪二挺、步枪十五支、手枪五支。人员编成:舰长一、副长一、甲板准尉一、轮机正一(上尉)、轮机副一(中尉)、轮机准尉一、日寇教官一、教练员四、士兵三十五名,共四十六人。

一九三三年夏秋之间,陈东山、李华棠等在抚远、饶河、虎林沿乌苏里江一带作抗日的活动,日寇广濑师团饭冢联队的部下担任这一带的讨伐,为防止抗日军队渡江起见,通知伪满海军援助。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伪海军司令官尹祚乾海军顾问日寇海军少佐川畑正治同乘本舰(利绥),率领江清炮舰引曳拖船一只,出

发乌苏里江虎头,协助日寇讨伐抗日军队。六日到抚远县,我随尹祚乾上岸,与该县取连络,知道此地没有情况,又用电话与饶河县连络,得知二人班地方数日前有李华棠抗日军出没,乃邀请密探一名随舰指引。该二人班距江边约四里远近隐约不明零散的小山村。我奉命向该村发炮四发,见有十数人转避山后,经过半小时不见动静。因未登岸调查,不知伤亡有无。乃继续上航,于十日进虎头港,有日寇军官一人上舰与川畑连络,乃起锚下航,对距港约五里江的西岸靠江边的山麓下,开炮二发,见有二人先后隐避山隅,嗣后不见动静,乃返港停泊。尹祚乾对我说:饭冢联队的一个中队,七八天前与陈东山抗日军百余人在虎头发生过战斗,抗日军向宝清方面逃窜,日军随后追击。方才炮击的地方,据连络员的报告说还有少数潜伏的抗日军,为防止他们渡江所以发炮镇压。为镇守虎头,防止抗日军渡江,停泊了一周,虎头出动遂告结束。

(二)一九三四年三月,海军添造新舰二只。顺天、养民,由日本播磨造船所承造,派来技师、船工约六十人,到哈尔滨海军船坞舣装。于三月伪司令部派我充当养民新舰舣装委员长,同时由日本海军派海军少佐山田(名忘记)指导养民新舰全般的舣装,并率领军士十人,分担各部门的装置责任。

新舰养民舣装委员长的任务,是监督指导养民新舰全般的装置工作。我每日认真监督,预防偷工减料和拖延时间。为求舰体坚固、运用灵活、操作便利起见,我也曾有所建议,如烟筒改造椭圆形和高度减低,以便瞭望;预备人工舵,在舵机通电发生故障时应用;重机枪塔减低,大水时便于过桥等,都按照我的意图修改。至八月底,顺天养民两舰装成,九月下水。

养民炮舰三百吨。装备:十二生的口径高角炮二门,十五生的口径迫击炮一门,一生的五双管高射机枪三台,四一式机枪二台,

步枪二十支，手枪十支；内燃机二台、电机一台、探照灯一架、无线电机二台。编成：舰长一、副长一（日系）、甲板准尉一、轮机长一、轮机副一（日系）、轮机准尉一、日系教官一、日系教练员十八、日本现役海军少佐指导官一、现役轮机中尉副指导官一、现役军士十五，士兵四十，共计八十二人。

九月，伪司令部任我充当养民炮舰舰长。于九月在松花江上游试验新舰：如试内燃机，上下水的快慢车、轮转数和用油量；试电机，通电探照灯、起锚机、舵机和炮台等；试航，上下水的快慢车的速度；试汽艇的速度和用油量；试枪炮，上下水的射击和枪炮弹发射数等。十月奉令巡防松花江下游哈尔滨同江间，航行中受顺天舰的指挥，训练各项操作，如信号教练、两舰指定距离快慢车教练、无线电报问答教练、枪炮教练等。巡防中未遇事故。

十一月各舰入坞，各舰官兵搬入兵营，施行冬期的教育训练，主要是精神教育和学科教育，其次是术科教练。〔中略〕

（三）一九三五年三月，转任顺天炮舰舰长。顺天养民两舰，同一型式，人员编成与武器装备也是一样，两舰编为一队，同一行动，一切操作皆由顺天舰长指挥。

六月一日，奉令顺天养民巡防松黑两江，即日出发。又奉指示，有参议府副议长筑紫雄七、关东军大佐二人、中佐一人，便乘顺天舰赴黑河。沿江途中，一面巡防，一面操练。巡防的人员配备：在驾驶台，有舰长一、教官一、司舵员一、掌阵钟兵一、信号员一、信号兵二；在观测台，有观测员二、兵二；在前后炮台和机枪塔，各看守员一；在甲板、有测水兵一、值日官一、兵一，共十七人。其余员兵，一半教练，一半工作，有事时各就部署岗位，候令应战。巡防中于必要时，见有行迹可疑的上下水民船、渡江民船、打鱼的网房和农民的窝棚等，则施行检查。对于检查民船时，先令民船下锚，派

军官一名率领士兵数名，乘汽艇上民船检查，先检查船上所有的人，有无携带武器，再检查船舱，有无掩藏武器，然后检查旅客，有无旅行证，如无旅行证或发现有武器者，均认为有嫌疑；对于检查网房、窝棚时，派军官一名士兵数名登岸检查，先令渔人集合，检查有无携带武器和渔人证，一方检查网房或窝棚，有无窝藏奸细或武器，如有武器者，虽有证明，也认为是有嫌疑，均带到军舰上，详细询问，确有可疑时，送交当地宪兵队或警察局处理。

出同江口入黑龙江时，两舰均着盖炮衣，士兵学习船艺，表示与苏联没有敌意，这是欺骗人的手段。沿黑龙江北岸，筑紫等四人窥视苏联的军事设备，时时记录，有时摄影，终日在甲板上工作。八日到黑河港，他四人离舰去了。此行可说是专舰为日寇服务，窥视苏联边境设备，这是我的罪行。

顺天养民停泊黑河四日，主要是召集各学校学生各机关职员和商人来舰见学。各舰每日均有五六十人来见学的。十二日出黑河港，沿黑龙江瑷珲、奇克特、乌云等地，召集各小学校学生、各机关职员和商人见学，各舰每日多则四五十人，少则二三十人见学的。在回航中，时时有苏联海军汽艇轮换随行侦察。入松花江于同江、富锦、佳木斯、依兰、通河、木兰等地，召集各中小学校学生，各机关职员和商人等见学，各舰每日均有五六十人来见学的，并演枪炮教练、夜演照空。这就是我召集人民见学和训练演习，夸耀伪满新舰的威力。〔中略〕

十月末回哈尔滨入坞。十一月中旬，奉派赴日本见学。海军见学团，有上校参谋长严昌泰、中校军需官邢伟周、少校军医官任鸿志和我四人，由治安部海军顾问龙崎大佐率领。到东京的翌日，先临二重桥签名参拜。所到各处都是先参拜神宫，如橿原神宫、明治神宫、桃山御陵等。见学各处，如士官学校，商船学校(中国海军

留学生的基校),横须贺海军港,海军飞行学校,海军飞机制造厂,吴海军港,金城战舰(舰长伊藤是一九三二——三三两年在伪满当海军首席顾问,伪满海军一切改编,都是他计划的),海军石炭工作,海军兵学校,播磨造船所,及其他炼钢厂、制铁厂等重工业企业。见学历时一个月,回来司令部召集见学团会谈感想。我说,这次见学,看到了日本海军的宏大,使我景仰赞美不置,现在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的时机,满洲国也要建设海军,更盼日本的指导提携。回到兵营,我积极对士兵宣传。〔中略〕

四、在海军补充队服务期间(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月)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一月由顺天舰长转任海军补充队队长。任务是教练新兵的学术,一年毕业后补充到各舰服务。

补充队的编成:队长一、轮机少校、上尉中尉各一、甲板少尉一、甲板准尉四、军医准尉一、日寇副长一、日寇教员五、军士训练班二十名、新兵四十名、旧兵二十五名,共计一〇一名。

补充队教育训练:训练的对象是新兵、旧兵和军士。教育分为:新兵教育、军士教育和旧兵教育三种。〔中略〕

五、在长春宫内府侍从武官处服务期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一年二月)罪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由哈尔滨海军补充队长转任长春宫内府侍从武官处海军侍从武官。同时晋级海军上校。

武官处的编制:侍从武官长一(伪满将军陆军上将张海鹏)。主任侍从武官一(空缺),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以伪满陆军少将曹秉森充之。侍从武官四,内有蒙古武官一人,海军武官一人(步兵上校于宗谦、骑兵上校连组、骑兵上校郭文林、海军上校是我)和其他职员共十人。

由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四〇年二月，陆军武官三人先后转出，补充了炮兵上校满丰昌、骑兵上校那钦双和尔、炮兵中校孙家铎。一九四一年二月武官长张海鹏退职，由伪满将军陆军上将吉兴补充。

对于武官人选，要思想纯正忠诚可靠的人，又须经过军事部、宫内府和关东军三处同意才能决定。我自背叛祖国，投降日寇，忠诚伪满，所以派我充当武官。

武官在府内任务是：四个武官，每日一人轮流值夜，在平日武官二人轮流在内廷楼下伺候溥仪，每班两点钟。这个任务于一九三八年停止了。有事时，如张景惠、臧式毅上奏溥仪各项法令、议案，呈候批示时，由武官长率领武官二人随从溥仪临勤民楼，此时武官不侍班。又如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率领的大臣亲任式、各部大臣政务奏上、各司令官军情奏上；张景惠率领的出国、回国的大使公使、差遣出国的团体；军事部大臣率领的司令官特派式；建国节、万寿节、年始朝贺、接见外宾和日本军部队长等，皆由武官长率领武官二人随从溥仪临勤民楼，站班侍立。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每月来会溥仪一次，关东军参谋长每十日来给溥仪晋讲一次，由武官长率领武官二人随从溥仪临勤民楼，此时不侍班。

以上这些站班侍立，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给殖民地政权规定的制度，这种仪式是表示傀儡皇帝的威严。我忠心耿耿按步就班的遵照仪式执行可耻的职务，我积极保护危害人民的大汉奸头子溥仪，这就是我的罪行。

溥仪出府的行动：溥仪每年于三月二日赴关东军司令部答谢关东军司令官代表裕仁祝贺伪满建国节，又每年于五月三日赴关东军司令部答谢祝贺溥仪访日。这时武官长随行。溥仪“行幸”地方，武官长率领武官二人侍从保护。

武官的差遣行动：差遣侍从武官，慰问全伪满各军区的军队、

病院和学校的开学式、毕业式，传达溥仪关心军人的辛劳、疾苦，并奖励军官学生忠满服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被差遣慰问到哈尔滨伪满海军病院，宣读溥仪对海军伤病兵的慰问文，并赐金和纸烟。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被差遣慰劳海军江防舰队，由黑河乘舰，沿黑龙江、松花江各防区慰劳各舰官兵，宣读溥仪的慰劳文，对日满军官及士兵的辛劳勉励有加，并赐烟酒各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国，我奉差遣到车站欢送，宣读溥仪的感谢文。又数日后，后任日寇梅津美治郎接充关东军司令官，也是我被差遣到车站欢迎，宣读溥仪的欢迎文。同月我奉差遣慰问旅顺日本海军病院，宣读溥仪的慰问文，并赐金和纸烟。回长春后，又奉差遣慰问长春日本驻满海军部海军病院，宣读溥仪的慰问文，赐金和纸烟。一九四〇年七月溥仪由哈尔滨乘定边军舰“行幸”佳木斯，我在另一个舰随行，是保管“皇帝旗”的任务。十一月一日上午三时，我侍从溥仪举行奉安“天照大神”仪式于宫廷院内元神庙。〔中略〕

六、在富锦江上军第一地区队队长期间(一九四一年三月——四四年八月)罪行。

一九四一年一月伪满海军正式改编为陆军江上军。三月伪陆军中将李文龙转任为江上军司令官。同时我由侍从武官转任富锦江上军第一地区队队长。

第一地区队队部的组织：队长一、参谋二、副官二、军需官二、军医官二、无线电官一、连长一、排长一、士兵八十名，共计九十二人。

第一地区队所管辖舰队：计有三百吨的舰二只、六十吨的舰四只、四十吨的艇二只、三十吨的艇二只、十五吨的艇四只，共十四只。约共官兵四百五十人。

第一地区队的任务：主要是为巩固伪满国防，派遣舰艇巡防松黑两江各段防区，协助日寇镇压人民。

各舰任务：主要警备是巡弋防区、检查民船、保护沿江治安，镇压人民。

四月，划分松黑两江为六个防区：黑龙江由黑河——抚远为第一防区；松江由同江——佳木斯为第二防区；由佳木斯——依兰为第三防区；由依兰——通河为第四防区；由通河——巴彦为第五防区；由巴彦—哈尔滨为第六防区。〔中略〕

一九四二年二月，任我为陆军少将。五月照例派遣舰艇巡防。六月，江上军司令部参谋（名忘记）来富锦队部连络，他说是奉命到兴凯湖国境侦察苏联国境情况，要求派舰前往。因他是司令部参谋，负有特别任务，于是我派晋江、晓江二艇前往兴凯湖，商同该参谋便宜行事。入湖第一日，沿湖的北侧航行，次日向南航行，约二百余里，忽转向东南，驶出国境线。该参谋妄自尊大，一意孤行，不听艇长的阻拦，竟深入苏联境内，该参谋正向湖的南侧侦察中（约在下午三时），苏联飞机驶来，向晋江舵楼扫射，枪弹由舵楼直贯而入，一弹正中晋江艇长日寇林上尉的头顶，两艇乃仓皇逃回，苏联并未追击。〔中略〕

九月伪满陆军中将宪原转任江上军司令官。

十二月奉司令部命令，我率富锦江上军伪满军官，参加学习在牡丹江全江上军伪满军官现地战术。伪司令官宪原临场，由陆军顾问日寇小川伊之助中佐统裁，矛头指向苏联，经过三天教育，伪满军官得到许多知识，将来对苏作战是有相当利益的，这是我遵命奉行，预防苏联的罪行。

一九四三年六月，奉司令部令："为保护日寇商船由大连往来南洋等处掠夺物资，召集本队伪军官兵志愿者。"通知所属舰艇照

办。舰上有日寇少年军官一名报名(名忘记),各舰士兵报名者很少,数目忘记了。嗣后传闻,全军共召集了士兵一百二三十名,由冬季开始,分班去大连办事处听候派遣。士兵去日本商船服务的,除头几次外,其余去者都没有回来。〔中略〕

三月,伪陆军中将曹秉森转任江上军司令官。〔中略〕

七、在哈尔滨江上军江防艇队司令期间(一九四四年九月——四五年八月)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九月由富锦江上军第一地区队长转任哈尔滨江上军江防艇队司令。江防艇队部的编成:司令一(赵竞昌)、参谋一(道正)、副官三、轮机官一、军需官二、军医准尉一。

江防艇队部所属舰艇:六十吨的舰六只、四吨的艇四只、三十吨的艇二只、十五吨的艇十只,共二十二只。其余三百吨的舰五只,四只归司令部直辖,一支归训练处作练习使用。

江防艇队部主要任务:监督隶下各艇教育训练,划分防区,派遣舰艇担任松、黑、乌三江的任务,协助日寇镇压人民,巩固伪满国防。

九月,我着任后,巡视所属舰艇,了解全般情况。十月,派遣小型各艇八只、在松花江上下游各防区巡防,其余各舰艇在哈尔滨训练,十月末,令巡防各艇回港准备入坞。

一九四五年四月,计划划分松、黑、乌三江为七个防区和巡防每区的舰艇数:黑龙江由黑河——抚远为第一防区,拟派舰艇三只;由抚远入乌苏里江——饶河为第二防区,拟派舰艇二只;由饶河——虎头为第三防区,拟派舰艇三只;松花江由同江——佳木斯为第四防区,拟派艇三只;由佳木斯——通河为第五防区,拟派艇四只;由通河——哈尔滨为第六防区,拟派艇二只;由哈尔滨——肇州为第七防区,拟派艇二只。〔下略〕

119—2—1177,1,5

张秉哲笔供

（1954年8月17日）

张秉哲，别号明辅，年五十五岁，汉民族，原籍河北省盐山县羊二镇西段庄。出身军人，学历私塾七年。

一九一五年在吉林陆军第二混成旅步兵团当兵。

一九一九年任吉林陆军步兵第十三旅（二旅改编）步兵第七团上士。

一九二四年任步兵第七团第一连少尉排长，一九二五年任中尉。

一九二六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

一九二七年由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任步兵第十三旅上尉参谋。

一九二九年秋入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

一九三一年秋任步兵第七团少校团附，仍在讲武堂学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侵占东北，讲武堂的学习终止。

一九三二年一月任伪吉林警备第六旅中校参谋长。

一九三二年八月任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校特务员。

一九三三年二月任伪满讨热军第二军上校参谋。

一九三三年四月任伪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

一九三四年七月伪满吉林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部，仍任少校参谋。

一九三五年九月任伪满第二军管区中校参谋。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同年六月任上校教官。

一九四一年三月任伪满第八军管区上校参谋处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任伪满步兵第三团上校团长。

一九四三年五月任伪满第六宪兵团上校团长。

一九四五年二月任伪满宪兵训练处上校干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任伪满陆军少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吉林市被苏联军逮捕。

我的罪恶事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侵略事变时，我正在以吉林陆军步兵第十三旅步兵第七团少校团附的原职，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习。当时跑到锦州去投见代理张学良职务的吉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在锦州停留几天之后随张作相到北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我以归还原部队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回到吉林。当时代理张作相职务的熙洽已投降了日寇，他正给大汉奸于琛澄拼凑反人民的帮凶军——伪吉林剿匪军。步兵第七团由团长王树棠带领也划入于琛澄的指挥下，以外还有伪步兵两个旅、骑兵一个旅、炮兵一个队。在于琛澄统一指挥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由吉林出发，其目的是经榆树县到哈尔滨去打击旧吉军丁超。这种行动完全是在日寇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阴谋下实现的。由于我自顾自己的升官发财，忘掉了时代，竟驯顺的接受了少校团附的职务随队出发，从此踏上了反人民叛祖国的罪恶道路，并从此一天天的发展下去，做了身该万死的人民敌人。

于伪军由吉林出发的第四天，到了榆树县，很顺利的驱除了原

驻榆树的旧吉林军张作舟旅，并将其残余由团长杨秉藻带领编成一个步兵团，与步兵第七团合编为一个伪吉林警备第六旅，由熙洽委团长王树棠为少将旅长，委我为中校参谋长。经半月的时间，在旅长的主持下，由于我的计划起案完成了旅的编成。越发的增强了反人民的力量。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在于琛澄统一指挥下，由榆树出发向哈尔滨前进，本旅原来的步兵第七团（两个营）作为于的卫队而由于直接指挥，新编入的杨团由伪总司令给与特别任务单独行动，始终没归入旅的指挥系统。于琛澄进出哈尔滨的目的，是要以实力威胁原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下台，他好取而代之。但是当于伪军先遣部队刘宝林旅接近哈尔滨市时，被预先进入哈尔滨市的援助丁超的李杜、冯占海军击溃。于琛澄指挥的后续部队也受到刘旅的影响混乱后退，退到双城东方哈尔滨以南的白旗屯附近停止整顿。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军攻占了哈尔滨，于琛澄当上了伪护路军总司令，本旅原来的一个团接于琛澄命令到榆树县驻守。即旅部同团部和一个营驻榆树县城，一个营驻五常县城。在此期间，因忙于营舍的修整和物品的补充，没有作战行动。

一九三二年五月接到于琛澄的命令，令原来的两个营到依兰去打击抗日军。当时一般士兵的心情不愿作日寇的帮凶，因而接到移驻的命令，驻五常的赵德懋营的第十连第十一连由连长周怀龙带领首先起义，其余的部队六个连在榆树集合，出发到双城以后拒绝乘车东下，由连长陈烈武带领全部起义归还延边地区。旅长王树棠借驻双城的李伪旅骑兵两个连追两天没赶上。〔中略〕

一九三二年六月因伪六旅部队起义走散，我到吉林去投见伪满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在当年八月吉兴为收拢一些甘做日寇帮凶的旧吉林军官，为他自己扩张反人民实力作准备，在他的司令

部内设立了一个特务部，部长是前吉林省城警备司令少将齐知政，由吉兴委任的特务员约三十名，我被任为少校特务员。以后由齐知政组成三科，并指名前吉林粮秣厂长上校张云阁为总务科长，前吉林陆军军官教练处上校教官汪钟勋为警备科长，伪中校参谋刘显良为情报科长。其余的人没分科也没开始办公，到同年十一月因为都陆续的有了反人民的新职务，这个特务部就无形的消灭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伪满军政部组织所谓讨热军，张景惠任总司令，出动到锦州，编成第一第二两个军，第一军长张海鹏，第二军长程国瑞。我当了第二军的上校参谋，参谋长是前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少将闻庆善。第二军有两个等于旅的支队，一个卫队团，一个炮兵队。第一支队长刘佩臣，第二支队长王铁相。当年二月向热河出动时，基于伪总司令的命令，由我起案作了一个第二军的行军计划，是在新立屯集中以后经过阜新、北票进入热河省境，再经朝阳到承德东北部与第一军和日本军会合，并规定了行军日程和宿营地点，但是因为伪军没有纪律，且不按规定日程行动，刚到达北票没进入热河省境一步，伪第一军和日本军已驱跑了汤玉林，占领了承德。这时伪总司令以第二军误了军机，以转移到洮南驻防为名，由火车输送到打虎山车站附近全部缴械遣散。这是当年三月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又没耻的回到吉林，吉兴委任我为伪满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三四年七月改编为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三五年九月任伪中校参谋，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一直担任教育参谋的业务。具体的职务表现是：

一、伪军管区司令官吉兴每年有一次对隶下部队的年度教育指示，它的内容是按照伪军队教育令制定的，一部是所谓精神教育，以伪满的“敕令”、“诏书”“军人誓文”等做中心材料，灌输伪官

兵忠伪君亲日寇的奴化思想。一部是规定并强化伪军队和人民为敌的战斗技术，并规定教育训练期间及训练课目等。这样的教育指示由一九三五年度起到一九三八年的四个年度的教育指示都是由我起案的，每次调制的部数五十分下达给团以上单位及各处科。〔中略〕

以下两个实例，是与我忠诚的完成了汉奸参谋的任务分不开的。即：

一、一九三三年抗日军王德林部下约四五百名，在汪清县罗子沟遭到当地驻守伪满军的顽强抵抗，伪连长闻长仁和缪延光因为深深的中了忠伪君亲日寇的毒素，备棺誓死，顽强的与抗日军为敌，使抗日军不意的遭受了伪军援军（旅长朱榕由汪清派出的两个连）的奇袭，使五十多名抗日战士的宝贵生命流血牺牲。

二、一九三五年秋冬季，伪满第二军管区实施所谓敦化地区讨伐时，伪步兵第十团在敦化南方大蒲柴河杀害了不知队号的抗日游击队员十四五名。第五教导队在官地附近先后杀伤了由窜山红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员约二十名。以上的战斗中，都是由于伪士兵在反人民的教育训练中，中毒太深，所以在与人民为敌时表〈现〉出凶狠顽强的抵抗。

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在长春。同年六月任上校教官。

在长春的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是伪满军一九三九年春新建立的养成伪满军初级干部的唯一学校。在当年四月首次入校的预科学生二百名，日本籍和伪满籍各一百名，各编成一个连。一九四〇年三月同样又入校二百名各编成一个连。初成立时只有一个预科学生队，一个文官教授部，校本部的编组除军需医务以外，教育部没正式编成，校长是在沈阳的伪满陆军训练学校长中将郭恩林兼

任。因为预科学生没有军事教官担任的课目，所以我实际上任经理委员长，对被服、粮秣、物品、营舍任监督保管，并任物品出纳命令官。〔中略〕

一九四三年五月任伪满第六宪兵团上校团长。在牡丹江市。宁安和延吉各有一个直属下的宪兵分驻队(一九四四年秋天都改为分团)。最初全团官兵共四十余名，计牡丹江市本部士兵十五名，宁安分队长以下五六名，延吉分队长以下官二名，士兵十一名。

牡丹江本部设警务、特务两科，外有副官、军需和翻译等。警务科长最初是植松繁夫，他的次任是金子克己，最后是小宫(已改为总务科长)。特务科长也换过三人，是难波、高桥、近藤。宁安分队长是大友，延吉分队长是田中三治，他的后任我忘记了姓名。

伪宪兵的任务。按伪条文规定是：保护伪军的健全发展与安全而实施军事警察。基于这个任务的实际行动，为保护伪军的发展与安全，对内对伪士兵实行思想压迫。对外即对共产党和抗日爱国人士，以防止对伪士兵的破坏工作作口实，就实行特务宪兵的密侦和镇压。特务科常利用兵痞流氓做眼线，据我了解到的，特务科就在本团说来也非公开的，在牡丹江市利用了眼线七八名，每月每人只给与三元至五元不等的报酬。分团也免不掉有相同的情形。但是，因为这是一种非规定的行为，因而没了解其真象。因为他们是在特务科长直接操纵下活动的，我没能知道他们的姓名。

伪宪兵团日常业务的分科，大概如下：

(一)警务科的日常业务

1. 对于伪满军的所谓纪律维持事项；

2. 对于伪满军的所谓犯罪检举事项；

3. 对于伪满军的所谓逃亡兵逮捕检举事项；

4. 对于伪满军的所谓窃盗、火灾等检证事项；

5. 对于伪满军的涉外纷争事项；

6. 对于伪满军人的婚姻登记事项。

(二)特务科的日常业务

1. 对伪满军人尤其是对于伪士兵的思想考查；

2. 以防止对士兵破坏工作为借口，对爱国人士实行特务侦查；

3. 对当地民心动向即反满抗日心理的考查。

基于以上反人民的活动实绩，每月制成月报，会报总团司令部及各宪兵团和分团，并通报当地驻在的日本宪兵队。月报的主要内容概如下：

一、军心动向。例如当太平洋战争时期，为明了伪军人对时局认识的心理状态，每当日寇作战状况发生转变时，伪特务宪兵就以明问暗访的手段，刺探伪官兵的动向。对此所得的回答和结论，都是赞扬日寇的威武与必胜。

二、民心动向。同样是日寇某一战役的转变，探听人民对时局认识的心理状态。所得的回答和结论概分两类，一类是代表汉奸地主阶级的言论，赞扬日寇的武勇，歌颂伪满的王道乐土。另一类是劳苦人民大众的反抗呻吟声音，这种声音都是以民谣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在全伪满散布中，人都知道的“日德意败”的剪纸，和以关东军为“砍头军”，以兴农部为“倾农部”，以协和会为“蝎虎会”，以生活必需品会社为“生逼会社”，以出荷为“出祸”等，互相通报作为镇压检举人民的资料。

三、其他事项。如伪满军队犯罪事项和镇压人民的活动等。

以我为长的伪满第六宪兵团经常做着以上的反人民活动以外，在一九四四年春，我曾到长春参加了一次由伪满宪兵总团司令官郭若霖召开的团长会议。郭若霖要求各团长，善体日伪共同防

卫的本意，为协助日寇的所谓大东亚圣战的胜利，主要是“把握军心”。为做到这点首先要与伪军的部队长尤其与部队中的”日系军官”保持密切连系。第二为防止外来的共产党对士兵的瓦解工作，而增强特务宪兵的密侦活动。我回团以后将受到的指示首先用文件下达给本部和分团，并于同年夏天亲到宁安和延吉分团，要求他们把总团的要求付诸实施。

我在伪宪兵团长的职务中，时刻的站在反人民最前线和抗日爱国人士为敌，造成了难以自谅的数不尽的反人民罪恶。以下是我知道想到的罪行：

一、我曾纵容伪宪兵邱连财以敲诈目的，把一个良善市民拘压〔押〕了四五天并加以殴打(详细经过和年月忘记)。

二、一九四四年特务宪兵于某为泄私愤把牡丹江新江浴池的经理(姓名忘记)弄到宪兵团拘压〔押〕了四五天。

三、我曾纵容伪宪兵以赊买不遂，拘压〔押〕过饭馆的经理人，曾记得三次，每次一人一夜，都诬指侮辱伪军人的理由。

四、我曾纵容伪宪兵以诈财目的，诬牡丹江紫云街粮谷加工厂主王逸民和其柜伙二人侮蔑伪宪兵，无辜拘压〔押〕了六七天。

五、我曾纵容伪宪兵诬与团部杂役有私仇的农民一人(姓名住址忘记)侮辱伪军属，在团部加以殴打。

当释放以上那些无辜被押被打的人的时候，都强迫他们写一份“认罪悔过书”。

我对于以上摧残人权的暴行，既没适时加以处理，也没讲求防止措施。

六、我曾纵容伪宪兵十余名，依势强赊商店货物，金额达伪币万余元。使许多小商店受到损失，我并没讲求赔偿措施。

七、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警务科镇压戏院的伪宪

兵，在戏院观众中，逮捕了一个没一定住所的爱国劳动人民（关里人，姓名忘记）。在逮捕的当天正由警务科长金子克己询问，还没确认口供的时候，牡丹江日本宪兵像太上皇似的给要去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多的几天，宁安宪兵分团长近藤报告说，他在宁安县逮捕了抗日爱国人士二名，都没一定住所，都是劳动者模样，有抗日游击队员的可疑。当时经警务科长金子克己到宁安去询办，他回团以后说，两个人中一名抓错当时释放，另外一人也是在他询问中没认口供的时候，又被宁安的日本宪兵分遣队要去了。〔中略〕

八、一九四三年秋天，在我的命令下，派出伪宪兵五名，支援牡丹江伪警务厅追捕过在他们监押中越监脱走的爱国人士。没捕获。

九、伪满第六军管区在牡丹江、宁安、延吉驻在部队中，有的伪国兵不甘心做反人民的炮灰，常发生自动脱营归乡事件，就是那时的所谓逃兵。在我任伪宪兵团长期间，经宪兵逮捕这样青年约三十名，都通过宪兵的检查送交伪第六军管区军法处叛处二至六个月徒刑，刑期满后仍须充当伪兵。〔中略〕

一九四五年二月任伪满宪兵训练处上校干事。在吉林市。

伪满宪兵训练处是养成伪宪兵的唯一出处。在伪满宪兵总团司令官直接隶属下，担任伪宪兵官兵的养成。当时的处长少将齐藤美夫，它的构成上有处本部——副官、军需和医务人员。教育部中校部长桥本岬任官兵学生教育的计划和实施。学兵队少校队长植松繁夫任宪兵学生的教育训练。我上校干事职务：在条文上是补助处长处理一切事务，实际上是承处长之命任（一）处内值日勤务的监督指导；（二）物品出纳命令和监督保管；（三）人马的卫生保健。以下是教育训练的状况：〔下略〕

119—2—1175，1，5

曹秉森[1] 笔供

(1954年5月14日)

1.〔略〕

2.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还是本着以往维持地方治安的宗旨，作了反人民的行为，拿人民的起义，看作是非法，而镇压打击，这是我的错误思想。如九一八的两三天后，我接到于芷山的命令，说是清源县大孤家子一带来了二三千名军队，让我去维持秩序，我就带了第三第四两个骑兵连，由西丰县出发，到达了大孤家子。以后知道了这些军队大多数是原来在奉天抗日的王以哲旅长的部下，其中也有一部是东北讲武堂的职员和学生。这时我也知道王以哲已经到了沈海路的草市车站，我就转告王旅的部下，让他们到草市去集合，同时对讲武堂的职员和学生到西丰县骑兵团部集合(这里有吕梦龄)。不久王旅的部下及讲武堂的职员和学生先后离开了大孤家子。又二三天后，听说在大孤家子东南十数里的地区，发现军民联合的起义，约有二三十名，我就派第四连连长李仁才前往镇压，结果逮捕了八名，其余打散。这八名中，六名是王以哲的部下，二名是地方抗日人民，我竟本着于芷山的意旨，把抗日的英雄打死了。

3.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接到于芷山的命令，说清河县清河

---

① 曹秉森最后职务为伪满江上军司令官。——编者注。

沟有人民的起义，让我去镇压，并且说已经命令各县警察队在各县境协助堵击，让我向清河沟里进攻，我就带了第四连前往。在我未到以前，抗日军就与警察队发生战斗，有二百多名因受各县警察队的压迫甚急，情况不利，及我到达以后，还未参加战斗，他们知道是军队来了，不得已放弃抗日行动，向我接洽投降，我收容了他们，就近交给西丰县冯广民县长，各发给证明书，遣返回家了，这是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便利了日寇的统治，这是反人民的。

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十月上旬，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在山城镇召集我们团营长会议。说明当时的局势，发表了奉天治安维持会、吉林熙洽、洮辽张海鹏等的劝降书，同时又发表张学良的不抵抗意见。会议的结果，于芷山暂时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表示接受各方意见。那时我认为国际及国内的情势，以为这种局面绝不能长久，就以等待的心情，同意了于芷山的意见，这是我的大错误。会议决定后，于芷山表示接受投降，不久日寇关东军派河本大作(退役大佐)到山城镇与于芷山见面，接洽投降事宜。

5．一九三一年于芷山投降日寇，我和镇守使署参谋长对调，我当了镇守使署参谋长，留守在山城镇，作了于芷山与奉天日寇的连络机关，便利了于芷山镇压抗日军唐聚五的行动，如接洽弹药、架设无线电台等，这全是反人民的行为。

6．一九三二年秋，我在奉天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任内，奉天驻在伪靖安军的一部，于夜间十时左右起义，先烧飞机场，后攻奉天城。我对于这个起义，以警备司令部的卫队营的兵力，配备在奉天城墙上，实行镇压。相峙半夜，天将亮前，终久打退了起义军(伤亡不详)，保卫了奉天的治安，这是替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了人民。

7．一九三三年九月，转任伪满驻日公使馆附武官，我的职务是伪军政部派遣的在日本报考的留日陆海军学生的监督。前后留

学生共八九十名，这些学生虽不经我直接的教育，但执行了伪军政部的指示，考查学生的行动、思想、言论，并指导学生忠于伪满等。〔中略〕

一九三六年夏季，曾帮助日寇向东北的移民政策，在京都作了一次演说，这是日寇陆军省的授意，并由它交给我的稿子。内容大意是说，东北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劝日本人向东北移民开垦的意思，我就忠实的替日寇作了宣传。

8. 一九三八年，在侍从武官任内，每年照例代表溥仪出去几次慰问日满军队病院，有的病院收容的患者之中，很多是因镇压人民而受伤的，我对于这种残害人民的敌人，我还去慰问他，给与慰问品，这是我不顾人民的灾难痛苦，只顾自己利益的反人民的行为。

此外还随同溥仪访问过日本(一九四〇年)，请过日寇的天照大神(自请来以后，每月照例有一次拜庙)，还随同溥仪巡视过伪满各大城市，如海拉尔、扎兰屯、黑龙江、三江、牡丹江、锦州、延吉、佳木斯等处。但溥仪到那去那里就算倒了霉了，在他去的一个月前，警察就清查户口，检举闲人，伪满退役官吏也同样检举。只以巡视黑龙江省的一次来说，在警察厅内羁押的就有六百多名，其他的警察署也有相当的人数被羁押。听说这也是警察发财的机会，有钱的花些运动费就可以出去，否则就被押受罪，直到溥仪离开了当地才能放出。我就这样为虎作伥的、危害了各地人民，这是反人民的。

9. 一九四三年，在飞行队任内，除原有的三个飞行队外，在通辽又添编了一个飞行连，飞机四架，强化了镇压人民的力量。廉价收买了人民的土地约一千多平方公尺作了飞机场，给与人民很大的损害，这是反人民的。

10．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左右，我在江上军时曾派松尾中校(原训练处教导团团长)为艇队长，带领照春阳春开往下江警备，后来听说被苏联海军打沉(地点不详)。因此主张派遣的日系少校参谋岩下某，感觉责任而自杀。八月十四日下午，驻哈尔滨的江上军第一团第三团训练处的教导团约有二千多名，由第一团团长张洪山领导起义，临走前打死打伤日系军官四名，向呼兰方向转进。同日夜艇队也有起义的(艇队的名字不记得了)，因此以大同利民编成追击队(队长名字不记得了)前往下江追击，以后的情形就不记得了。

〔下略〕

119—2—1166,1,5

附录:

伪满中央政府机构职官表*

(1932—1934 年)

执政　皇帝	溥仪	
参　议　府	议　长	张景惠
	副议长	汤玉麟→筑紫熊七
侍从武官处	侍从武官长	张海鹏
尚　书　府	秘书长	胡嗣瑗→大臣郭宗熙,秘书官长加藤内藏助
宫　内　府	府中令	宝熙→大臣沈瑞麟,次长胡嗣瑗
国　务　院	总理大臣	郑孝胥
监　察　院	院长	于冲汉→罗振玉
立　法　院	院长	赵欣伯
最高法院	院长	林　棨
	首席庭长	井野英一
最高检察厅	厅长	李　槃

* 本表系编者根据有关资料编制。1934 年 3 月 1 日实行伪帝制时,执政改称皇帝,各部总长改称大臣。——编者注。

国务院所属机构

总　务　厅　厅长　驹井德三→远藤柳作
　　　　　　次长　坂谷希一
大同学院　院长　驹井德三(兼)→远藤柳作(兼)
法　制　局　局长　松木侠(代)→三宅福马→远藤柳作→大达茂雄
恩　赏　局　局长　荒井静雄(代)
国都建设局　局长　结城清太郎(代)→阮振铎
大陆科学院　大河内正敏
国　道　局　局　长　滕根寿吉
　　　　　　副局长　陈承修→孔世培

国务院各部署

民　政　部　总长　大臣　臧式毅
　　　　　　次长　葆康→赵鹏第
外　交　部　总长　大臣　谢介石
　　　　　　次长　大桥忠一
军　政　部　总长　大臣　张景惠
　　　　　　次长　王静修→郭恩霖
财　政　部　总长　大臣　熙洽
　　　　　　次长　孙其昌→洪维国
实　业　部　总长　大臣　张燕卿
　　　　　　总务司长　高桥康顺
交　通　部　总长　大臣　丁鉴修
　　　　　　总务司长　竹内德亥
司　法　部　总长　大臣　冯涵清

	总务司长	古田正武
文　教　部	总长　大臣	郑孝胥(兼)
	次长	许汝棻
兴安总署	署长	齐默特色木丕勒
	次长	菊竹实臧→依田四郎

一九三五年人事变动后伪满中央政府机构职官表*

皇　帝	溥仪	
参议府	议长	臧式毅
	副议长	筑紫熊七
侍从武官处	侍从武官长	张海鹏
尚书府	大臣	袁金铠
	秘书官长	高木三郎
宫内府	大臣	熙洽
	次长	入江贯一
国务院	总理大臣	张景惠
监察院	院长	罗振玉
立法院	院长	赵欣伯
最高法院	院长	林　棨
	首席庭长	井野英一
最高检察厅	厅长	李　槃

国务院所属机构

总务厅	厅长	长冈隆一郎

---

* 本表系编者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伪蒙政部的前身是兴安总署，1934年12月1日由署改为部的。——编者注。

	次长	大达茂雄
大同学院	院长	井上忠也
国道局	局长	直木伦太郎
	副局长	孔世培
恩赏局	局长	藤山一雄
国都建设局	局长	郑禹
营缮需品局	局长	大达茂雄(兼)
大陆科学院	院长	直木伦太郎(兼)

国务院各部

民政部	大臣	吕荣寰
	次长	赵鹏第
外交部	大臣	张燕卿
	次长	大桥忠一
军政部	大臣	于芷山
	次长	郭恩霖→李盛唐
财政部	大臣	孙其昌
	次长	洪维国
实业部	大臣	丁鉴修
	总务司长	高桥康顺→岸信介
交通部	大臣	李绍庚
	总务司长	平井出贞三
司法部	大臣	冯涵清
	次长	谷田正武
文教部	大臣	阮振铎
	次长	许汝棻

蒙　政　部　大臣　齐默特色木丕勒

　　　　　　次长　依田四郎

一九三七年行政机构改革后伪满中央政府机构职官表*

皇　　帝　溥仪
参 议 府　议　长　臧式毅
　　　　　副议长　田边治通
侍从武官处　侍从武官长　张海鹏
尚 书 府　大臣　袁金铠
　　　　　秘书官长　高木三郎
宫 内 府　大臣　熙洽
　　　　　次长　入江贯一
国 务 院　总理大臣　张景惠
立 法 院　代院长　寺崎英雄(七月撤消)
　　　　　秘书厅秘书长　刘恩格
最高法院　院长　林　棨
　　　　　次长　井野英一
最高检察厅　厅长　李　槃
　　　　　次长　柴硕文

---

* 本表系编者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伪监察院于 1937 年 7 月撤销。关于国务院总务厅首脑的称呼，驹井德三时期称总务长官，他下台后改称总务厅长。1937 年行政机构改革后，自星野直树起又恢复总务长官之称，直到最后。——编者注。

国务院所属机构

总 务 厅	总务长官	星野直树
	次长	神吉正一、谷次亨
国 道 局	院长	直木伦太郎
国道建设局	局长	郑禹
恩 赏 局	局长	藤山一雄→寿聿彭
审 计 局	长官	寺崎英雄
地籍整理局	局长	寿聿彭→袁庆濂
营缮需品局	局长	笠原敏郎
内 务 局	长官	大津敏男
外 务 局	长官	大桥忠一
兴 安 局	总裁	扎噶尔
	参事官	博彦满都→白滨晴澄
大陆科学院	院长	直木伦太郎(兼)→铃木梅太郎
大同学院	院长	井上忠也
建国大学	总长	张景惠(兼)

国务院各部

民 生 部	大臣	孙其昌
	次长	宫泽惟重
治 安 部	大臣	于芷山
	次长	薄田美朝
司 法 部	大臣	张焕相
	次长	古田正武→及川德助
产 业 部	大臣	吕荣寰
	次长	岸信介

经　济　部	大臣	韩云阶
	次长	西村淳一郎
交　通　部	大臣	李绍庚
	次长	平井出贞三

伪满中央政府机构职官表*

（1940年）

皇　　帝　溥仪
参议府　议　长　臧式毅
　　　　副议长　田边治通→桥本虎之助
祭祀府　总　裁　桥本虎之助(兼)
　　　　副总裁　沈瑞麟
侍从武官处　侍从武官长　张海鹏
尚书府　大臣　袁金铠
　　　　秘书官长　武宫雄彦
宫内府　大臣　熙洽
　　　　次长　鹿儿岛虎雄
国务院　总理大臣　张景惠
立法院　秘书厅秘书长　刘恩格
最高法院　院长　井野英一
最高检察厅　厅长　徐维新
　　　　副厅长　平田勋

---

* 本表系编者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伪军事咨议院是1939年1月4日发令设立的，直属伪皇帝。1940年3月营缮需品局改设为建筑局、官需局和印刷厂。1940年2月地籍整理局改为地政局。祭祀府是1940年7月15日设立的。1940年6月产业部改组，矿工部门移交经济部；为管理农林牧部门成立兴农部。——编者注。

军事咨议院

国务院所属机构

总　务　厅　总务长官　星野直树→武部六藏
次长　岸信介→松木侠
次长　谷次亨
恩　赏　局　局长　张联文
审　计　局　局长　荒井静雄
地政总局　局长　曹承宗
官　需　局　局长　生松净→向井俊部
建　筑　局　局长　笠原敏郎
外　务　局　长官　韦焕章
次长　田代重德→三浦武美
兴　安　局　总裁　扎噶尔
参事官　白滨晴澄→山口凯夫→河内由藏
印　刷　厂　厂长　小原三郎
大陆科学院　院长　铃木梅太郎
大同学院　院长　井上忠也
建国大学　总长　张景惠(兼)
副总长　作田庄一

国务院各部

民　生　部　大臣　吕荣寰
次长　土肥颙
治　安　部　大臣　于琛澄
次长　涩谷三郎

司　法　部	大臣	张焕相
	次长	及川德助
产　业　部	大臣	于静远
	次长	结城清太郎
经　济　部	大臣	蔡运升
	次长	松田令辅→古海忠之
交　通　部	大臣	阮振铎
	次长	饭野毅夫

伪满中央政府机构职官表*

(1942 年)

皇　　帝　溥仪
参 议 府　议　长　臧式毅
　　　　　副议长　桥本虎之助
祭 祀 府　总裁　桥本虎之助(兼)
　　　　　副总裁　沈瑞麟
侍从武官处　侍从武官长　吉兴
尚 书 府　大臣　袁金铠
　　　　　秘书官长　武宫雄彦
宫 内 府　大臣　熙洽
　　　　　次长　鹿儿岛虎雄
国 务 院　总理大臣　张景惠
立 法 院　秘书厅秘书长　刘恩格
最高法院　院长　娄学谦
　　　　　次长　西久保良行
最高检察厅　厅长　徐维新

* 本表系编者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伪外交部是 1942 年 4 月 20 日恢复的，原外务局长官韦焕章任外交部大臣，当年 9 月 28 日，伪满驻日大使李绍庚改任外交部大臣。——编者注。

国务院所属机构

总　务　厅　总务长官　武部六藏
　　　　　　次长　松木侠、古海忠之
　　　　　　次长　卢元善
审　计　局　长官　荒井静雄→青木佐治彦
地政总局　局　长　杨乃时
　　　　　　副局长　古馆尚也
官　需　局　局长　向井俊郎
建　筑　局　局长　冈大路
兴　安　局　总裁　巴特玛拉布坦
　　　　　　参与官　山口凯夫、河内由藏
大陆科学院　院长　直木伦太郎
　　　　　　副院长　志方益三
大同学院　院长　井上忠也
建国大学　总长　张景惠(兼)
　　　　　　副总长　作田庄一→尾高龟藏

国务院各部

民　生　部　大臣　于静远
　　　　　　次长　源田松三
治　安　部　大臣　邢士廉
　　　　　　次长　涩谷三郎
司　法　部　大臣　阎传绂
　　　　　　次长　前野茂
外　交　部　大臣　韦焕章→李绍庚
　　　　　　次长　三浦武美

兴　农　部	大臣	黄富俊
	次长	稻垣征夫
经　济　部	大臣	阮振铎
	次长	青木实
交　通　部	大臣	谷次亨
	次长	饭野毅夫

伪满中央政府机构职官表*

(1944—1945 年)

皇　　帝　溥仪
参 议 府　议　长　臧式毅
　　　　　副议长　桥本虎之助
祭 祀 府　总裁　桥本虎之助
　　　　　副总裁　沈瑞麟
侍从武官处　侍从武官长　张文铸
尚 书 府　大臣　袁金铠→吉兴
宫 内 府　大臣　熙洽
　　　　　次长　荒井静雄
国 务 院　总理大臣　张景惠
立 法 院　秘书厅秘书长　[姓名不详]
最高法院　院长　娄学谦
　　　　　次长　西久保良行
最高检察厅　厅长　徐维新
　　　　　次长　石井谦二

---

* 本表系编者根据有关资料编制。1943 年 4 月 1 日撤销伪治安部，设立军事部。警察业务移交给新设立的总务厅外局警务总局。同时恢复文教部。1944 年 1 月 17 日恢复恩赏局(1941 年 1 月 1 日合并于总务厅人事处)。1945 年 3 月 11 日民生部改为厚生部，其劳务司和外局国民勤劳奉公局的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勤劳部。——编者注。

国务院所属机构

总　务　厅　总务长官　武部六藏
次长　源田松三、古海忠之
次长　徐家恒→王贤沛
审　计　局　局长　松木侠
恩　赏　局　总裁　韦焕章→郑禹
建　筑　局　局长　冈大路
地政总局　局　长　杨培
副局长　古馆尚也→三菅正诚
官　需　局　局长　向井俊郎→河谷俊清
兴　安　局　总裁　巴特玛拉布坦
参事官　向野元生、佐枝常一
大陆科学院　院长　志方益三→大村卓一
大同学院　院长　井上忠也
参与　星子敏雄
建国大学　总长　张景惠(兼)
副总长　尾高龟藏

国务院各部

军　事　部　大臣　邢士廉
次长　真井鹤吉
外　交　部　大臣　阮振铎
次长　大村信贞
文　教　部　大臣　卢元善
次长　田中义男→前野茂

司法部	大臣	阎传绂
	次长	辻朔郎
民生部	大臣	金名世
厚生部	次长	关屋悌藏
兴农部	大臣	黄富俊
	次长	稻垣征夫→岛崎曹一
经济部	大臣	阮振铎→于静远
	次长	青木实
交通部	大臣	谷次亨
	次长	田仓八郎
国民勤劳部	大臣	于镜涛
	次长	半田敏治

